



维普数据库全文收录

中国国际中文期刊卓越行动计划 建设期刊

国际中文学术期刊数据库ICAJD 收录期刊

人文与社会科学学刊

Journal of Humanities and Social Sciences

Humanities

Social Sciences



香港人文社會科學研究院
HONG KONG RESEARCH INSTITUTE OF
HUMANITIES AND SOCIAL SCIENCES



WISVORA

ISSN 3079-4552



9 773079 455255



ISSN 3079-4552

eISSN 3079-4560

编辑出版:广东国图出版管理有限公司

1卷8期
2025年9月

人文与社会科学学刊

Journal of Humanities and
Social Sciences

主办 香港人文社会科学研究
Hong Kong Research Institute of
Humanities and Social Sciences

编辑出版 广东国图出版管理有限公司
《人文与社会科学学刊》编辑部
编辑部邮箱 xk@wisvora.com
投稿地址 www.wisvora.com



维普数据库全文收录
中国国际中文期刊卓越行动计划 建设期刊
国际中文学术期刊数据库ICAJD 收录期刊

总编辑 陈科存
副总编辑 梅见华 孙文杰

编辑委员会

李兆祺	林鑫	苏天	穆艾伟	熊森浩
刘伟伟	吕憬岩	黄少安	刘宇	叶明裕
陈曦	景瑞宾	崔健	王正威	李泽宇
姚金芳	李明蔚	吴钰双	穆尚海	曹一君
陈立立				

青年编委

舒波 袁臣辉

版权声明

文章版权由文章作者与维思沃尔出版社(WISVORA Publishing)所有。单篇文章由 WISVORA Publishing 正式出版, 所刊载文章均依照 Creative Commons Attribution 4.0 International License (CC BY 4.0) 进行许可。根据该许可协议, 任何第三方在明确署名原作者与出处的前提下, 均可对本刊内容进行复制、传播、演绎使用, 无需作者及出版社另行个别授权。

《人文与社会科学学刊》© 已获得Creative Commons Attribution 4.0 International许可



香港人文社會科學研究院
HONG KONG RESEARCH INSTITUTE OF
HUMANITIES AND SOCIAL SCIENCES

香港人文社会科学研究专注于人文与社会科学领域的学术研究与交流, 旨在为学者提供研究支持, 并促进知识的共享与应用。研究院通过出版学术期刊、举办学术会议及提供政策建议, 推动学术界与社会各界的对话与合作。

网址: www.hks.ac.cn 邮箱: info@hks.ac.cn



Journal of
Humanities and
Social Sciences

国际标准连续出版物号

印刷出版 ISSN 3079-4579

电子出版 ISSN 3078-4387

出版社 WISVORA Publishing
维思沃尔出版社

地址 香港新蒲岗景福街99号启德工
业大厦8楼D07

wisvora-publishing@wisvora.com
www.wisvora.com

中国大陆引进
北京中科进出口有限责任公司

中国大陆运营
广东国图出版管理有限公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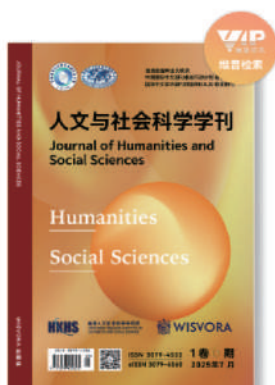


WISVORA
Publishing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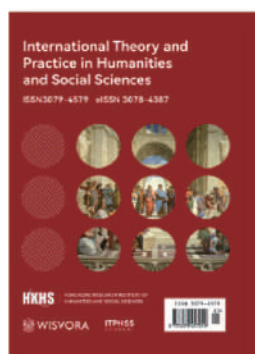


微信扫一扫

维思沃尔出版



人文与社会科学学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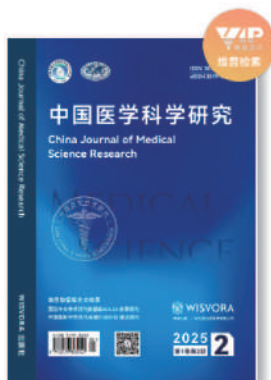
International Theory and Practice in Humanities and Social Sciences (ITPHSS)



经济与管理学报



中国现代教育学报



中国医学科学研究



中国科学与技术学报



Research on Economics and Management Science



Journal of Global Governance and Sustainability



Journal of Economic Insights



Journal of Emerging Academic Research



Journal of Medical and Health Sciences Research



目 录 TABLE OF CONTENTS

文化与文学研究

理学浸润下宋元书家心性修养的书法投射 - 张欣钰 1-4

《法华经》“一乘”思想与多元宗教对话——佛教圆融观对宗教排他性的消解路径 - 赵汉章 5-9

从赋魅到祛魅：摩尔诗歌中的“正义”想象与谦逊诗学 - 苑华美 10-14

文明在张力中对话——评韦伯《儒教与道教》的宗教社会学方法论 - 赵汉章 15-19

重置小山河：旅迹与虚室的互译——候清诗歌探赜 - 高若栋 20-23

《酒诰》与《酒德颂》中“酒德”之对比研究 - 张晔, 周锐 24-26

魏晋南北朝时期志怪小说中的鬼魅形象研究 - 史劭涛 27-30

浅谈西汉西域都护府的设立 - 李碧波 31-36

马克思现代性思想视域下中华文化主体性的境遇审视与巩固路径 - 刘国 37-40

教育理论与实践

破解同质化：TF 职业学校差异化战略的多模型实证 - 秦雯, 梁天悦 41-46

问题导向的“电工电子技术”教学方法研究与实践 - 李培, 于晟伟 47-51

三峡地区红色文化融入职业教育体系的实践路径研究 - 李杰, 熊杨 52-56

乡村青年幼儿教师的自我价值感与教学创新的现状与提升策略 - 鞠晓蕾, 邵良超 57-61

《现代产业学院建设指南（试行）》背景下高校产业学院协同育人机制研究——基于建设原则与任务的分析视角 - 陈名凯, 邹鸣民 62-68

布鲁纳发现学习模式（BDLM）视域下粤港澳大湾区初中语文教学创新研究 - 李群英 69-74

农村基础教育数字化的困境与路径探索——基于 Citespace 文献可视化分析 - 单逸梦, 吴松樵 75-80

数字化时代英语教学的创新路径与实践研究 - 罗纬地 81-83

4-5 岁儿童同伴冲突言语运用及指导策略研究 - 杨晓岚, 刘菲 84-91

绘画疗愈视角下水性材料特性体验的课程思政路径研究 - 崔宝琨 92-95

任务导向教学在钢琴个别课中的实践与反思 - 邹鸣民, 涂园园 96-102

社会与治理

城市社区多主体协同治理实践、困境与优化——以南通 YL 社区为例 - 吴硕硕, 周道 103-107

单位小群体识别与风险防控：理论框架与实践路径 - 马杰 108-112

短期下沉到长效治理：党员干部下沉机制常态化的路径探索 - 潘逸航, 赵伊玲, 王嘉临 113-117

空间生产理论视域下我国城市规划与治理的策略建构 - 董桂彬 118-121

社工站赋能基层社区治理的路径优化研究——基于江苏省 T 市实证分析 - 张冉, 阚皖豫, 王刘飞 122-127

婚姻纠纷中裁判设立居住权之探究 - 杨皓媛 128-133

婚内强奸犯罪化的理论争议与立法路径：基于性自主权平等保护的视角 - 游程棚 134-139

新中国初期“革命外交”影响下的周边观——以 20 世纪 50 年代初中印外交实践为例 - 杨哲 140-143

近代中国两个大变局论断：比较、关联与时代启示 - 郑裕龙 144-149

经济与管理研究

智慧物流环境下供应链协同增效路径探析 - 王奕棹, 李佩, 王培 150-152

成渝双城经济圈影视高等教育成果转化与吉利集团产业对接机制研究 - 王子萱, 俞沁东 153-156

文旅融合视域下：乡村地区旅游发展与文化传播的发展路径 - 贺骁, 司孟功 157-162

“两山”发展理念下生态产品价值实现路径研究——以承德市为例 - 高亚琳, 魏强, 马艺嘉 163-167

从成果沉没到生态共生：高校农业类社会实践成果转化落地的机制创新探索 - 徐庆学 168-173

农业农村现代化：历史演进、现实难题和实践进路 - 王语霏 174-179

现代产业学院产教融合长效机制研究 ——以光伏与生物医药类产业学院为例 - 邹鸣民 180-186

中小企业 A 公司基层员工绩效考核研究 - 董学鹏 187-193

乡村振兴背景下关于绿色农业技术研究的文献可视化分析 - 魏 斌, 赵丽婷, 刘锦清 194-201

传媒与艺术研究

中国馆的叙事建构与传播景观研究：以 2025 年大阪世博会为背景 - 常景皓 202-207

传播性景观的建构逻辑：日本藤田美术馆的视觉体验机制分析 - 常景皓 208-212

认知语言学视域下的现代汉泰量词比较研究述评 - 苏盛滢, 孙月红 213-217

浅析漏窗及其纹样美学 - 井怡然 218-221

中小型主题公园的服务质量与品牌资产、游客满意度、目的地形象间的影响关系研究 - 武扬, 张蒙蒙, Sangguk Kang, 汤亮 222-228

华语女性电影的创伤叙事与复原机制 - 李春裔, Low Yong San 229-233

中文短视频在国际中文语音教学中的应用研究 - 丁笑寒 234-237

博物馆展陈设计中互动性缺失成因与改进策略 - 祁俊, 贺敏靓 238-242

理学浸润下宋元书家心性修养的书法投射

张欣钰¹

(1. 淮北师范大学, 安徽 淮北 235000)

摘要: 宋元时期是中国书法艺术转型的关键阶段, 这一转型与当时的思想变革密切相关。程朱理学的体系化与禅宗的世俗化构成了书家精神世界的底色, 促使书法艺术从唐代“尚法”的技术规范转向“尚意”的心性表达。正如梁巘《评书帖》所概括的“晋尚韵, 唐尚法, 宋尚意, 元明尚态”, 宋代书法的“尚意”特质并非孤立的美学现象, 而是理学“格物致知”与禅宗“明心见性”思想交融互渗的产物。这一时期的书法创作, 成为书家心性修养的视觉投射。

关键词: 理学; 宋元书风; 书法艺术

DOI: doi.org/10.70693/rwsk.v1i8.1233

一、理学心性论与书法实践的相互影响

1.1 “格物致知”的观物方式与书法“观物取象”

程朱理学将“格物致知”作为认知世界的基本方法, 强调通过观察万物变化来体悟天理。这一思想深刻影响了书家对自然与书法关系的理解。郑构在《衍极》中提出: “草本隶, 隶本篆, 篆出于籀, 籀始于古文, 皆体于自然, 效法天地。”刘有定进一步注解: “自仓颉古文变而为篆、隶、八分、行草, 皆形势之相生, 天理之自然, 非出于一人之智。”这体现了理学视域下书法演化的宇宙观——书体变迁并非人为创造, 而是对自然之理的顺应与呈现。

黄庭坚的“观荡桨悟笔法”正是这一理念的实践典范。他在《跋唐道人编余草稿》中自述: “元祐间书, 笔意痴钝, 用笔多不到...晚入峡见长年荡桨, 乃悟笔法。”船夫操纵舟楫时力的传递与调节, 使其领悟到书法线条中力度与节奏的平衡之道。这种领悟并非简单的形式模仿, 而是对自然动态中蕴含的“理”的把握, 正如朱熹所言: “事事物物, 皆有之极, 是道理极至。”黄庭坚将自然现象转化为笔法的抽象韵律, 实现了从物理到书理的哲学升华。

1.2 “涵养用敬”与书法创作的“虚静”状态

理学家强调“涵养须用敬”的修养功夫, 要求主体保持内心的虚静澄明。这一思想投射到书法创作中, 形成了对“无意于佳乃佳”创作状态的推崇。苏轼在《小篆般若心经赞》中提出: “心忘其手手忘笔, 笔自落纸非我使。”这种“忘我”境界与程颐“主一之谓敬”的修养论一脉相承, 要求书家超越技术层面的刻意求工, 进入物我两忘的自然书写状态。

南宋姜夔在《续书谱》中对这一理念进行了深化批判。他质疑唐人“折钗股”“屋漏痕”等拟物化笔法描述: “用笔如折钗股...然皆不必若是。笔正则锋藏, 笔偃则锋出, 一起一倒, 一晦一明, 而神奇出焉。”姜夔主张超越形式化的技法规范, 回归心性的自然流露, 其思想根源正是理学对主体心性的重视。当书家通过“涵养用敬”达到内心的澄明, 笔墨自然契合天理, 无需刻意遵循外在法则。

1.3 “字有九德”: 书法的道德维度

理学将伦理道德提升到宇宙本体的高度, 这一思想在书论中体现为“字有九德”说。郑构在《衍极·书要篇》中提出: “夫字有九德, 九德则法。”刘有定注曰: “九德出于《虞书》...宽而栗, 柔而立, 愿而恭...惟字亦然, 亦书有德, 亦言其字有德。”这一论述将书法的形式美与儒家的道德品格相类比, 赋予点画结构以伦理内涵。

赵孟頫的复古主义实践可视为这一理念的延伸。他提出“用笔千古不易”的观点, 表面强调技法的传承, 实则蕴含着对书法“正统”的维护——正如理学对“道统”的重视。其小楷《道德经》结体端严, 笔意醇和, 体现的不仅

是晋唐法度的回归,更是“温柔敦厚”的儒家道德理想在书法中的显现。倪瓒评其书“清雅温润,如周鼎商彝,蔚然古意”,正是对其书法中道德意涵的体认。

二、禅宗修行与书法创作的相互渗透

2.1 从“看话禅”到“参书法”:内省式悟入

宋代禅宗经历从“不立文字”到“不离文字”的转变,大慧宗杲倡导的“看话禅”成为主流修行方式。看话禅强调通过参究“话头”(如“无”字公案)实现顿悟,这种方法深刻影响了书家的学书路径。黄庭坚提出:“学书须胸中有道义,又广之以圣哲之学,书乃可贵。”他将书法品格的提升与心性修养紧密结合,认为书法的至高境界来自禅宗式的顿悟,而非单纯的技法训练。

张即之的写经书法是禅修与书写融合的典范。其《华严经》残卷以楷书为基,融入行书笔意,字形在严整中富有变化,墨色浓淡相宜。这种书写既非机械抄经,也非刻意表现,而是通过书写过程体味“平常心是道”的禅理。正如大慧宗杲所言:“参禅须是一超直入如来地”,张即之的写经实为“以笔作佛事”的修行实践,在点画运行中参究心性本源。

2.2 “即心即佛”与“我书意造”:主体性的高扬

禅宗“即心即佛”思想极大解放了书家的创作主体性,推动了对成法的超越。苏轼“我书意造本无法”的宣言,正是对禅宗“非法非非法”精神的艺术诠释。他在《石苍舒醉墨堂》诗中进一步阐释:“点画信手烦推求”,强调创作应顺应心性的自然流露,而非受制于外在规范。这种思想促使宋代书法从唐代的“尚法”转向“尚意”,开辟了书法表现的新境界。

米芾的“刷字”说将这一主体精神推向极致。其《蜀素帖》以“八面出锋”著称,笔势翻腾跳跃,结体奇崛多变,在看似无法中暗合古法。这种创作方式与禅宗“于相而离相”的智慧相通——既深入传统法度,又不为法度所缚⁶。董其昌评米芾书“如禅家悟后拆肉还母,拆骨还父,呵佛骂祖,面目非故”,生动揭示了其书法中的禅宗精神。

2.3 “平常心是道”与“平淡天真”的审美理想

禅宗将日常生活提升到修道的高度,“平常心是道”的思想促使书法回归质朴本真的状态。倪瓒的“逸气说”是这一理念的集中体现。他提出:“仆之所谓画者,不过逸笔草草,不求形似,聊以自娱耳。”其小楷《淡室诗》字形疏朗,笔意简淡,墨色枯润相生,营造出空灵静谧的审美意境。这种“淡”的趣味,既源于禅宗对执着相的破除,也受到理学“去人欲存天理”思想的影响,是宋元书家心性修养的艺术结晶。

宋代焚香文化中的“鼻观”修行法为理解这种审美提供了独特视角。士大夫通过焚香进行“澄怀观道”的冥想,在氤氲香气中体悟心性的本然状态。这种修养方式与书法创作相通:正如“香令人幽”,倪瓒书法中的“淡”亦旨在引发观者的超然之思,在简淡笔墨中体味宇宙生机。程颢“万物静观皆自得”的诗句,恰可作为这种审美意境的注解。

三、儒释道融合的个案实践与美学呈现

3.1 苏轼:儒释道融通的“无意”之境

苏轼的书法实践完美体现了儒释道思想的融合。其《黄州寒食诗帖》被誉为“天下第三行书”,笔势跌宕起伏,字形大小错落,墨色浓枯变化,生动记录了贬谪生涯中的情感波动。黄庭坚跋曰:“此书兼颜鲁公、杨少师、李西台笔意...它日东坡或见此书,应笑我于无佛处称尊也。”这一评论不仅点出苏轼书法的技法渊源,更揭示了作品中的精神境界——既有儒家“穷则独善其身”的坚毅,又有道家“安时处顺”的豁达,还有禅宗“即烦恼成菩提”的超越。

苏轼提出“无意于佳乃佳”的创作观,强调在“虚静”状态中实现心手双畅。他在《书所作字后》自述:“仆醉后辄作草书十数行,觉酒气拂拂从十指间出也。”这种看似放纵的创作状态,实则建立在深厚的学养根基上。正如其自评:“笔成冢,墨成池,不及羲之即献之;笔秃千管,墨磨万锭,不作张芝作索靖。”苏轼的“无法”恰源于对古法的精深把握,在“积学”基础上达到“心忘”的境界,体现儒家的功夫论与禅宗顿悟说的辩证统一。

3.2 黄庭坚:禅悟中的“字中有笔”

黄庭坚的书法是禅悟与笔墨交融的典范。他早年学周越,苦于“二十年抖擞俗气不脱”,后在涪陵见怀素《自叙帖》真迹而悟草法。这一经历与禅宗“顿悟”相通——长期积累的技法困惑在经典启发下豁然贯通。其草书《李白忆旧游诗卷》线条如“树梢挂蛇”,盘曲回环,笔势连绵不绝,空间分割打破常规,营造出“天花乱坠”般的禅意。

空间。

黄庭坚对书法本质的理解充满禅机。他提出：“字中有笔，如禅家句中有眼。”强调书法应超越形式表现，在点画间蕴含灵动的生命感。这一思想源于其对禅宗公案的参究，如“万法归一，一归何处”的话头参悟，使其书法在变化中保持内在的统一性。晚年贬谪宜州时所作《范滂传》，笔力愈发沉郁，结体趋于简淡，展现“看破世间如梦幻”的禅者心境。正如其诗云：“身如泡沫亦如风，刀割香涂共一空”，书法成为其安顿生命的修行方式。

3.3 张即之：禅意写经的“平常心”

张即之的写经书法代表了南宋禅意书风的极致。其《华严经》残卷以楷书为基，融入行书笔意，字形端庄而不失灵动。与唐代写经的严谨工整不同，张即之的经卷在笔法上富有变化：横画起笔多露锋，收笔顿挫明显；竖画挺拔而略带弧度；转折处方圆兼用，形成丰富的节奏感。这种书写既保持了对佛经的虔敬，又体现了禅宗“平常心是道”的自然。

张即之的写经实践可置于宋代“焚香修身”的文化语境中理解。宋代士大夫将焚香作为“鼻观悟道”的修行方式，在氤氲香气中进入冥想状态。张即之的写经同样是一种修行仪式——通过专注的书写调息凝神，在笔墨运行中体味“应无所住而生其心”的禅理。其书风的“平淡天真”，正是禅宗破除形式执着后心性本然的流露。

3.4 倪瓒：逸气中的“淡”与“寂”

倪瓒的书法是元代隐逸书风的代表，融合理学的“格物”与禅宗的“空观”。其小楷《淡室诗》字形瘦硬疏朗，笔意简淡含蓄，结体多取斜势，章法疏密有致。全篇墨色枯淡，飞白频现，营造出“寂寥天地暮，心与广川闲”的意境。这种审美特质源于其对宇宙人生的独特体悟——历经战乱后对世俗荣华的疏离，在书画中寻求精神的超脱。

倪瓒提出“逸笔草草，不求形似”的艺术观，将书法视为“写胸中逸气”的载体。其书风中的“淡”有三重意涵：一是笔墨形式的简淡，二是情感表达的冲淡，三是生命境界的淡泊。这种“淡”并非贫乏，而是绚烂之极的升华，如理学追求的“表里俱澄澈”的心体，亦如禅宗证悟的“本地风光”。王原祁评倪瓒：“迂翁之妙，在不著一字，尽得风流”，正是对其书法中空灵境界的精准把握。

四、“韵”“气”“意”“淡”：范畴的哲学内涵与实践转化

4.1 “韵”：道德修为的审美显现

宋代书论中的“韵”是理学人格论在美学中的投射。黄庭坚强调：“书画以韵为主”，并指出“书者能以韵观之，当得仿佛”。他认为“韵”源于书家的道德修养：“若使胸中有书数千卷，不随世碌碌，则书不病韵。”这一观点将艺术品格与人格修养直接关联，体现了理学“文以载道”的思想。

赵孟頫的复古实践赋予“韵”新的内涵。他力倡回归晋唐，表面是技法溯源，实则通过追摹古人之“韵”重塑士大夫文化品格。其行书《洛神赋》融二王笔意与自家风神，笔势流畅而不失端重，结体秀逸而内含骨力，展现“中和之美”。董其昌虽批评赵书“因熟而俗”，却不得不承认其“自有一股清雅之韵”，这正是理学“涵养性情”功夫在书法中的体现。

4.2 “气”：宇宙生命的笔墨律动

“气”在宋元书论中既是生理能量，也是宇宙生命力的表现。苏轼提出“书必有神、气、骨、肉、血”的五要素说，将书法视为有机生命体。其《寒食诗帖》以浓墨重笔开篇，字形宽博厚重；中段线条渐趋激越，字形倾侧；尾段复归疏淡，形成情感的完整律动。这种“气”的流转，既是作者情感起伏的记录，也是“阴阳二气化生万物”的宇宙观在书法中的微观呈现。

理学对“气”的论述深化了书法的哲学意涵。朱熹认为：“天地之间，有理有气。理也者，形而上之道也...气也者，形而下之器也。”书法中的“气”正是“形而下之器”与“形而上之道”的联结媒介——通过笔墨的“气势”体悟宇宙的“气化流行”。倪瓒书法的“逸气”，便是将个体生命融入大化流行的尝试，在简淡笔墨中蕴含无限生机。

4.3 “意”：主体精神的自觉表达

“意”是宋代书法的核心范畴，其内涵在儒释道融合中不断丰富。苏轼“我书意造本无法”的宣言，标志着主体精神的高度自觉。但宋代“尚意”并非随意妄为，而是“学养化意”与“法度载意”的统一。黄庭坚强调：“凡作字须熟观魏晋人书。令之于心，自得古人笔法也。”其草书虽个性鲜明，却深合张旭、怀素笔意，体现“有法而化”的创造精神。

禅宗“即心即佛”思想为“意”注入新的内涵。大慧宗杲主张“直心直行”，反对文字义理的纠缠。这种思想影响

下,宋代书家追求“无意之意”的创作状态——如苏轼醉后作书,米芾“刷字”,皆是通过破除刻意求工的心理执着,回归心性的本然流露。正如宗杲所言:“是一超直入如来地”,书法的至高境界亦在刹那的顿悟与解脱。

4.4 “淡”:心性修养的终极境界

“淡”是宋元书法美学的核心范畴,融合了理学的“去人欲”与禅宗的“破执着”。欧阳修首倡“古淡”审美:“世好争尚古且稀,古货难售人亦疑...岂惟时俗好新尚,古道与此成参差。”他通过对古碑的推崇,表达对浮华时风的反拨。这种“淡”的趣味在元代倪瓒处达到极致,其书风“淡而有味”,如“清水出芙蓉”,在简淡中蕴含无限意蕴。

“淡”的哲学基础是理学的“天理自然”观。朱熹认为:“饮食者,天理也;要求美味,人欲也。”书法中的“淡”正是去除“美味”修饰后本真状态的呈现。倪瓒书法的枯淡笔触、疏朗章法,皆是对形式繁华的超越,直指心性的本源。

五、结论

宋元书法的“尚意”转型,本质上是理学与禅宗思想在艺术领域的创造性转化。书家通过“格物穷理”的观物方式、“涵养用敬”的修养功夫、“明心见性”的禅悟实践,将心性修养投射为书法美学。苏轼的“无意”、黄庭坚的“字中有笔”、张即之的“写经修行”、倪瓒的“逸气”,皆是在儒释道融合的思想土壤中开出的艺术之花。

参考文献:

- [1]史劼.从“书道”“法书”到“书法”[D].中国美术学院,2020.
- [2]陈晓春.苏轼书法美学思想述略[J].四川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5(2):6.
- [3]刘媛.浅谈苏轼在书法艺术上的成就[J].青春岁月,2012(2):1.
- [4]徐鼎一.白云终不染缁尘——元代倪瓒生平与绘画特色[J].荣宝斋,2012(6):38.
- [5]傅录志.中国古代艺术功能研究[D].东南大学,2018.
- [6]傅录志.苏轼书法美学思想管窥——从《黄州寒食诗帖》谈起[J].中国书法,2018, No.330(10):142-144.

The calligraphic projection of the calligraphers' temperament cultivation under the influence of Neo-Confucianism in the Song and Yuan dynasties

Zhang Xinyu¹

¹Huaibei Normal University, Huaibei, Anhui 235000, China

Abstract: The Song and Yuan dynasties were a crucial stage in the transformation of Chinese calligraphy art, which was closely related to the ideological changes at that time. The systematization of Cheng Zhu Neo Confucianism and the secularization of Zen Buddhism form the foundation of the spiritual world of calligraphers, prompting calligraphy art to shift from the technical norms of the Tang Dynasty's "emphasis on law" to the expression of the "emphasis on intention" of the heart. As summarized in Liang Ping's "Pingshu Tie", "Jin Shangyun, Tang Shangfa, Song Shangyi, Yuan Ming Shangshi", the "Shangyi" characteristic of calligraphy in the Song Dynasty is not an isolated aesthetic phenomenon, but a product of the integration and permeation of Neo Confucianism's "investigating things to gain knowledge" and Zen's

Keywords: Neo-Confucianism; calligraphic style of the Song and Yuan dynasties; calligraphic art

《法华经》“一乘”思想与多元宗教对话

——佛教圆融观对宗教排他性的消解路径

赵汉章¹

(1. 南京大学 电子科学与工程学院, 江苏 南京 210023)

摘要:在当代全球化加速与文化冲突频发的背景下,宗教排他性引发的文明对立成为重大议题。基督教、伊斯兰教等一神论及印度教种姓制度均表现出排他性。而《法华经》的“一乘”思想为消解此问题提供了路径。本文以《法华经》为核心,探讨其“开权显实”与“会三归一”理论如何重构宗教对话范式:通过“诸法实相”否定真理垄断,以“佛性平等”瓦解选民意识,以“常不轻行”建立他者尊重。佛教圆融观以“空性”哲学解构排他性,视多元宗教为法界显现,为跨宗教对话开辟“和而不同”的空间,对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具有深远启示。本文将从真理观、救赎论、他者论三维度论证其非排他性的和解力量。

关键词:《法华经》;“一乘”思想;佛教圆融观

DOI: doi.org/10.70693/rwsk.v1i8.1236

引言

在宗教对话的语境下,宗教排他性问题作为一道哲学裂隙,横亘于人类文明多元共生的进程之中。《法华经》的“一乘”思想以其独特的哲学内核和包容性建构,为消解宗教排他性提供了路径。在真理观层面,通过空性破执与实相无相,颠覆了实体化真理的排他逻辑;在救赎论层面,一乘开三与多元归元的思想揭示了所有修行法门终指向同一实相,消解了选民与弃民的对立;在宗教他者论层面,常不轻行与异教尊重的实践典范,展示了处理宗教他者关系的包容性态度。佛教圆融观不仅承认多元教法的价值,更超越形式差异,以非排他的坚定性促成多元宗教在终极关怀层面的深层和解。这一思想为当代多元宗教对话提供了理论支撑,为构建“和而不同”的文明共存范式奠定了思想基石,对推动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构建具有深远的文明启示意义。

一、《法华经》“一乘”思想的哲学内核与包容性建构

(一) “一乘”思想的提出与形成

“一乘”思想诞生于大乘佛教与部派佛教的教义张力中,旨在整合佛教内部的分裂。早期佛教强调声闻、缘觉二乘的个体解脱,而《法华经》提出“三乘归一”,批判小乘的“化城涅槃”观念(如《化城喻品》中幻化城池的譬喻),主张一切教法终归“一佛乘”^[1]。这一思想通过“如来寿量品”揭示佛陀法身久远实成,超越历史局限,为“一乘”提供了本体论依据。

(二) “一乘”思想核心理念

《法华经》“一乘”思想核心理念集中体现为“开权显实”与“会三归一”两大命题,其哲学建构既包含对佛教教法本质的深刻揭示,又具有超越宗教界限的普世价值。

“开权显实”通过权智与实智二重性的辩证关系,破解了宗教教义的固化壁垒。《方便品》明言“唯此一事实,余二则非真”,指出佛陀虽以三乘(声闻、缘觉、菩萨)作为权宜教化的工具,但终极目标始终指向“一佛乘”的究竟实相。这一思想在“火宅三车喻”中得到了具象化呈现:长者(佛陀)以羊车、鹿车、牛车(三乘)诱引众生逃离火宅(三界苦海),最终却赐予所有人同一大白牛车(一佛乘)。此喻揭示了三乘的暂时性与一乘的究竟性,既承认阶段教法的必要性,又破除了对教法形式的执着。天台宗智顗以“五时八教”判教体系将《法华经》列为圆教顶峰,通过“化法四

教”（藏、通、别、圆）与“化仪四教”（顿、渐、秘密、不定）的辩证性整合，承认不同教法的阶段性价值，最终提出“开三显一”的方法论框架统摄多元，强调三乘差异本质上是同一实相的权宜显现。正如《化城喻品》所言，佛陀以幻化城池（权法）激励众生前行，终归于真实宝所（佛果），此隐喻即昭示了“即权即实”的真理观——权法虽为方便，却始终指向实相。

“会三归一”则从佛性平等论的层面统摄宗教差异。《譬喻品》“诸有所作，常为一事”的宣言，昭示佛陀一切教化终为令众生悟入佛之知见。天台宗“理一乘”思想进一步阐释：三乘修行主体（声闻、缘觉、菩萨）本质皆具佛性，其修证差异仅为究竟实相在不同根器中的显现形态。此平等性（Samatā）原则在“常不轻菩萨品”中得到实践印证：菩萨礼敬众生如佛的行持，彻底消解身份等级区隔，与印度教《摩奴法典》的种姓制度形成了鲜明对比。而“龙女成佛”的叙事（《提婆达多品》）更以女身即身证道，突破性别与物种限制，彰显佛性超越世俗规定范畴的绝对平等性。

二者共同构建了“一乘”思想的哲学内核：“开权”以包容差异，“显实”以指向终极；“会三”以统摄多样性，“归一”以证悟平等性。这种既承认多元教法价值、又超越形式差异的圆融观，不仅为佛教内部的教义整合提供理论支撑（如天台宗“五时八教”体系），更为当代的多元宗教对话消解排他性、构建“和而不同”的文明共存范式奠定方法论基础。

二、《法华经》中的佛教圆融观的理论体系

（一）核心思想：“开权显实，会三归一”

《法华经》的教理体系，其核心建构于“开权显实，会三归一”这一命题之上，此思想贯穿全经，体现了佛教圆融观的智慧。《方便品》指出：“如来但以一佛乘故，为众生说法，无有余乘，若二若三。”这表明，佛陀说法的最终目的是引导众生契入一佛乘，即究竟的觉悟境界。所谓“权”，是指佛陀根据众生不同的根机和接受能力，施設方便善巧法门，说三乘之法；而“实”直指一佛乘所诠显的究竟实相。通过“开权显实”，《法华经》将三乘归一，揭示了佛法的圆融本质。

（二）“十如是”说与诸法实相

《法华经》提出著名的“十如是”说，深入阐述了诸法实相的内涵。“十如是”即如是相、如是性、如是体、如是力、如是作、如是因、如是缘、如是果、如是报、如是本末究竟等，从不同角度揭示了一切诸法的真实状态和本质。《方便品》中指出：“唯佛与佛乃能究尽诸法实相”，这意味着唯有通过修行达到佛陀的智慧，才能真正了达一切诸法的实相，同时暗示了众生若要达到这一究竟境界，就必须发心修习成就无上佛道。此过程本质上是主体通过内在转化与智慧开启，实现对存在终极真实性的亲证与契合。

（三）三谛圆融：空、假、中的统一

三谛圆融思想是《法华经》圆融观的重要体现，它将空、假、中三种谛理统摄于一个无碍互摄、相即不二的整体性真理视域之中。在三谛圆融中，空谛代表一切法皆无自性的真理，假谛表示一切法在缘起上的假有现象，中谛则是超越空与假的对立，直指那非空非假、即空即假、离诸边见、不落两边的中道实相。《法华经》正是运用此三谛圆融的辩证架构，作为诠释“诸法实相”的关键法门，强调在修行过程中，不应执着于空或假的任何一边，而应圆融地体悟三谛的统一。例如，《方便品》中“是法住法位，世间相常住”的宣示表明了世间与出世间都以“如”为位，都以“如”为相，根本上消解了世间与出世间的本质性对立，证成二者在终极实相层面乃是圆融无二的。

（四）一念三千：心与法的圆融具足

“一念三千”理论是天台宗对《法华经》思想的进一步发展和阐释，它深刻地体现了《法华经》圆融观的极致。该理论认为，一念心具足三千诸法，即一念心包含十法界（地狱、饿鬼、畜生、阿修罗、人、天、声闻、缘觉、菩萨、佛）的百界，每一界又具三十种世间，总计三千诸法。这些诸法既各有差别，又互相依赖、互具互入，构成一个圆融的整体，宗教差异仅为缘起假相。心与法皆归实相，同体而殊用，故一念与三千平等不二、互即互融。这一思想以《法华经》的诸法平等和性空缘起等思想为依据，强调在修行中，通过对一念心的深入观照，可以体悟到三千诸法的圆融具足，从而达到对宇宙人生的全面而深刻的觉悟。

三、宗教排他性的表现与根源

（一）宗教排他性的主要表现

宗教排他性的核心表现体现为各信仰体系对终极真理的垄断性宣称及其制度化实践。基督教通过“道成肉身”神学构建绝对排他框架：耶稣基督作为上帝“独生子”的位格独特性，使得救赎成为排他性事件。《约翰福音》中“我是道路、真理、生命”的宣言，将救赎权柄全然收束于基督信仰，而《以赛亚书》“在我以外并无别神”

的旧约命题，则为新约排他性提供神学奠基。这种独一性不仅针对异教体系，更在基督教内部催生张力——宗教改革时期“唯独信心”原则对天主教圣礼救赎的否定，本质上仍是排他逻辑的教派化延伸。伊斯兰教则以“认主独一”（Tawhid）为核心建构更彻底的一神论排他结构。《古兰经》“纯洁篇”通过否定性定义（“无求”、“无生”、“无匹敌”）确立安拉的绝对唯一性^[2]，而“谁寻求伊斯兰以外的宗教必不被接受”的教令，将信仰边界具象化为教法制度——从摧毁麦加多神偶像的历史事件，到《布哈里圣训》中穆斯林社群（乌玛）与异教徒的严格区隔，形成从神学到社会治理的全方位排他体系^[3]。这种排他性甚至投射于伊斯兰内部，逊尼派与什叶派围绕继承权的千年分歧，本质上仍是独一真理观的分裂再现。

佛教因其缘起性空的本体论，在理论上消解绝对排他的哲学基础。《法华经》“一切众生皆可成佛”的佛性平等观，以及禅宗“即心即佛”的心性论，从存在论层面否定了先天神圣权威。然而实践层面仍存在隐性排他：净土宗以“专修念佛”贬斥杂修法门为不纯，南传佛教依据“声闻乘”传统质疑大乘经典的神圣性，显示教义开放性背后潜藏的方法论竞争。相比之下，印度教通过吠陀宇宙论与《摩奴法典》的神圣化种姓制度，将排他性深植社会结构：婆罗门“从梵天之口出生”的起源神话，与首陀罗“从足生出”的阶层定位，借由业力观（Karma）将社会等级固化为宇宙秩序，通过“民族-宗教”的双重认同，将非印度教徒边缘化，从而形成制度性排他的伦理闭环^[4]。可见宗教排他性既源于启示宗教对真理唯一性的宣称，也受限于特定文明的社会建构——前者体现为一神教的神学垄断，后者则呈现为多神信仰体系中的等级固化，二者共同构成人类追求终极意义过程中难以回避的认知困境。

（二）宗教排他性的思想根源

宗教排他性现象的思想根基，深植于不同信仰体系围绕真理本质、神圣权威合法性以及社会秩序正当性所进行的差异化本体论与价值论建构。在一神教传统中，结构性排他源于启示的独断性与选民意识之间的互构关系。基督教与伊斯兰教均以“唯一启示”为核心构建真理垄断：基督教将《圣经》视为神启的终极文本，宣称其神圣默示性不可僭越；伊斯兰教则通过《古兰经》的“降示”叙事确立启示的闭合性，并以此拒斥后世文本的同等权威。这种启示的排他性垄断直接导向真理宣称的独占，因为启示的接受者（如先知或使徒）被赋予不可复制的神圣中介身份。选民逻辑进一步强化此结构：犹太教“特选子民”概念被基督教吸纳并转化为“新以色列人”的属灵身份，伊斯兰教则以“中正民族”自居，通过神圣拣选的叙事将信仰共同体与他者严格区隔。末世论审判机制则为此结构提供终极威慑，基督教永恒火狱与伊斯兰教火刑的恐怖意象，将排他救赎的必要性锚定在终极救赎的稀缺性上，形成“非此即彼”的生存焦虑。

此般排他性博弈并非止于宗教教义之执见，而是诸宗教在面对多元性时产生的“焦虑转译”——将差异性转化为神圣性的证明。正如马克斯·缪勒（Friedrich Max Müller）所主张的“知其一者，实无所知”（He who knows one, knows none）^[5]的超越性立场，单维度的信仰主体性建构往往陷入认识论层面的独断困境，而泛融合的同质化路径则可能丧失宗教独特的精神内核。因此，构建和而不同的圆融性宗教对话机制，使信仰主体在“认同的内在性”与“间距的外在性”的辩证运动中实现海德格尔所谓“本真性状态”（Eigentlichkeit）的生存论重构，则是避免认识论僭越、消解宗教排他性的不二法门。

佛教通过本体论层面的系统性解构实现了对宗教排他性的超越。龙树中观学派的“缘起性空”理论否弃任何实体性真理的预设，主张现象界的存在皆依因待缘而生灭。《金刚经》以“如梦幻泡影”的隐喻消解对教义绝对化的执着。天台宗的“方便说”更将多元修行路径纳入权宜施设的范畴：《法华经》以“诸佛随宜说法”的命题为教法差异性提供辩护，智顗“化法四教”体系将小乘至圆教统摄为渐进真理的不同面向。菩萨道的伦理实践则超越教条主义，《维摩诘经》主张“直心是道场”，将修行的重心从经典权威转向心性觉悟，禅宗“不立文字”的实践观进一步瓦解了语言对真理的垄断，使佛教能够在保持核心教义自治性的同时，具备兼容多元文化的理论弹性。

印度教的排他性根源则深植于宇宙论等级与业力观的互构性固化。《梨俱吠陀》的“原人歌”通过神话叙事手法将社会种姓与宇宙躯体部位对应，婆罗门（口）、刹帝利（臂）、吠舍（腿）与首陀罗（足）的阶层划分被神圣化为了永恒秩序。《薄伽梵歌》中的“达摩”伦理强调各阶层严守本位义务，将社会分工的不可逾越性上升为宇宙法则^[6]。业力观则为此体系提供循环论证：现世身份被解释为前世行为的必然结果，形成“结构性恶”的宿命论逻辑。这种宇宙—伦理的双重锁定，使种姓制度既成为神圣秩序的社会表达，又作为业力法则的现实显化，个体突破阶层的行被视作对宇宙真理的悖逆，从而在哲学基础与社会制度层面形成了自我强化的排他性闭环。相较于一神教的启示垄断与佛教的哲学解构，印度教的排他性特质更体现为文明演进中神圣叙事与社会结构的深度媾和。

四、佛教圆融观对宗教排他性的消解路径

（一）真理观层面：空性破执与实相无相

《法华经》以“诸法实相”为终极真理，但其核心并非建立某种教义垄断，而是通过“空、假、中”三谛圆融消解真理的实体化执著。《方便品》直言：“诸佛智慧，甚深无量，其智慧门难解难入”，揭示真理的不可言说性。龙树《中

论·观因缘品第一》以“不生亦不灭，不常亦不断，不一亦不异，不来亦不出”构成“八不颂”否定命题，进一步破斥一切二元对立，为佛教真理观奠定“非实非虚”的哲学基调^[7]。

《法华经·如来寿量品》更以“久远实成”颠覆线性历史观：释迦牟尼并非局限于公元前6世纪的印度圣人，而是“无量劫前早已成佛”。这种时间观的超越性直接消解了“唯一历史启示”的排他逻辑（如基督教道成肉身的时空唯一性）。智顗在《法华玄义》中指出：“实相无相，无相而相”，真理既非耶和華式的位格神，亦非伊斯兰教安拉的绝对独一性，而是“即空即假即中”的全体法界^[8]。

佛学家平川彰在《法华思想》中强调，《法华经》的“开权显实”并非否定其他宗教，而是将其视为“未显实之权”^[9]——正如《药草喻品》中“一雨普润，三草二木各得生长”，不同宗教如同草木，虽形态各异，却同沐法雨。日本学者松本史朗进一步指出，佛教的“空”不是虚无主义，而是“对一切实体化真理的悬置”^[10]，这为一神教启示的对话提供了可能：上帝或安拉可作为“世俗谛”的方便存在，但不可执为“胜义谛”的终极实体。

（二）救赎论层面：一乘开三与多元归元

《法华经》的“一佛乘”思想彻底重构救赎路径的排他性。《譬喻品》以“三车诱子”为喻：声闻、缘觉、菩萨三乘如同羊车、鹿车、牛车，本质皆为引导众生脱离火宅（轮回）的权宜工具，最终皆归于“大白牛车”（一佛乘）。这种“会三归一”并非否定多样性，而是揭示所有修行法门终指向同一实相。正如《中论·观涅槃品》中所言：“涅槃与世间，无有少分别，世间与涅槃，亦无少分别”，涅槃并非实体，而是对世间实相（空性）的觉悟，故曰“世间际即实际”^[11]。

天台宗据此发展出“性具善恶”论：“阐提断修善尽，但性善在；佛断修恶尽，但性恶在”，九法界众生（含外道）皆具佛性，即使“一阐提”亦能成佛。众生差异，唯在于修行实践之殊途，而非本质之高下。这从根本上消解了“选民”与“弃民”的对立——迥异于基督教“预定论”将救赎权归于上帝主权，《法华经》主张“佛性平等”，救赎可能性内在于众生本体。进一步而言，“一乘”思想可类比约翰·希克的“终极实在”多元显现论：各宗教如同指向月亮的多元手指（权），而月亮本身（实）超越所有指涉与象征^[12]。

《提婆达多品》更以戏剧性叙事突破救赎的伦理边界：曾谋害佛陀的提婆达多，因其过去世为佛陀说法之缘，竟被授记成佛。此叙事彻底颠覆善恶二元论，表明救赎不依赖道德完美主义（如伊斯兰教“五功”的严格遵行），而在于觉悟缘起性空。京都学派西谷启治由此引申：佛教救赎是“对救赎概念的自我解构”，当人们放下“必须被救赎”的执念时，反而证入本然解脱^[13]。

（三）宗教他者论层面：常不轻行与异教尊重

《常不轻菩萨品》提供了处理宗教他者关系的典范：常不轻菩萨礼拜一切众生，称其“皆当作佛”。此修行不仅针对佛教徒，更涵盖“增上慢比丘”等外道。佛陀在此品中明示：“不轻未学，敬心无慢”，直接回应了宗教排他性中的傲慢心态。《大智度论》以萤火的譬喻进一步阐释：“外道智慧如萤火，佛法智慧如日光；虽明暗悬殊，然萤火亦能破暗”，承认外道学说局部的真理性。

这种包容性在佛教史上具象化为“判教”体系：华严宗将外道思想判为“迷真执妄”，但《华严经·入法界品》中，善财童子参访的53位善知识包含拜火教徒、裸形外道等。澄观以道类比如来藏：“彼以虚无自然为道，无法不是虚无自然，故无不在。今以类取，则真如寂灭，无所不在。道符于灭，何所不在？”体现出会通三教的圆融立场，故曰：“外道法本是佛法，众生迷故成外道”——差异缘于认知层次，而非本质对立。化普乐·罗睺罗尊者（Ven. Walpola Rahula）在《佛陀的启示》中指出，佛陀拒绝回答“世界是否永恒”等形而上学问题，并非否定其他宗教的探索，而是避免陷入“见网”的教条主义争执^[14]。

在实践层面，《杂阿含经》记载佛陀对耆那教徒尼乾子说：“汝自立论端，我今善求真实之义，都无坚实，如芭蕉树也”^[15]，既肯定其修行价值（如苦行的行为与逻辑思辨），又指出其执著“我见”而未触及无我、无常的终极真理的局限。这种“批判性包容”不同于相对主义的无原则接纳，而是以“四依止”（依法不依人、依义不依语、依智不依识、依了义经不依不了义经）为对话准则。因此，佛教的他者伦理可借鉴列维纳斯的“他者面容”理论来阐释：面对他者时，不是简单地否定其差异性，而是在这种不可化约的差异中洞见共有佛性。在这种更为根本的维度中，每种宗教他者关系都承载着内在的神圣性和无尽的可能性，从而在多元性的基础上构建更为包容和谐的伦理共同体。

五、结语

《法华经》“一乘”思想以佛性平等理念为根基，通过“开权显实”的权实辩证逻辑重构宗教真理观，其“会三归一”理论（《譬喻品》）揭示声闻、缘觉、菩萨三乘皆为权宜施設，终极指向唯一佛乘，可从根本上消解一神教“唯一救赎”的排他性预设。佛教圆融观依托龙树中道哲学与智顗“三谛圆融”体系，以“诸法实相”破除真理的实体化垄断，并通过《常不轻菩萨品》“敬众如佛”的伦理实践，构建差异包容的对话范式。这一理论体系以“性空无我”瓦解选民意识，以《药草喻品》“一雨普润”隐喻宗教共生关系，从认知、伦理双重维度系统解构排他性结构。

面向未来,研究可从三重路径深化:首先,探索圆融观与基督教“普遍恩典”、伊斯兰教“中正之道”的对话机制,挖掘“佛性论”与“上帝形”的哲学互释可能,推动多元启示观的范式转换;其次,将《法华经》“治生产业皆顺正法”思想转化为跨宗教合作方案,以“缘起共生”智慧应对生态危机、文明冲突等全球议题;最后,融合佛教“慈悲利他”精神与世俗伦理实践,在医疗、教育等领域构建宗教协同网络,借《法华玄义》“自行化他”的菩萨行精神,激活圆融观对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建构潜能,讲好中国故事,为文明共存提供兼具超越性与实践性的东方智慧。

参考文献:

- [1] 翟艳春.《法华经》一佛乘思想研究[J]. 中国佛学, 2021, (1): 164-178.
- [2] S. Omer, The concepts of GOD, MAN, and the environment in Islam: Implications for Islamic architecture[J], Journal of Islamic Architecture, 2012, 2(1): 1-12.
- [3] [埃及] 穆斯塔发·本·穆罕默德艾玛热著, 穆萨·宝文安哈吉、买买提·赛来哈吉译. 布哈里圣训实录精华: 圣训[M]. 北京: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1981: 268.
- [4] 吕庆春. 种姓社会阶序的对立和隔离[J]. 世界宗教研究, 2023, (5): 107-122.
- [5] [英] 麦克斯·缪勒著, 陈观胜译. 宗教学导论[M]. 上海: 上海人民出版社, 2010: 35.
- [6] 鲁楠.《薄伽梵歌》的平等观[J]. 清华法学, 2022, 16(1): 33-46.
- [7] 崔杰. 从《中论》解读龙树的中道哲学思想[J]. 黑龙江生态工程职业学院学报, 2010, 23(3): 138-140.
- [8] 沈海燕. 论天台总摄万法的圆融哲学[J]. 上海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08, 15(3): 138-149.
- [9] [日本] 平川彰等著, 林宝尧译. 法华思想[M]. 高雄: 佛光出版社, 1998: 4.
- [10] 孙晶. 日本“批判佛教”的最新进展及其理论意义[J]. 日本研究, 2009, (2): 10-17.
- [11] 刘雄峰. 从世间际到实际: “二谛”之“观”下的涅槃——以《中论·观涅槃品》为中心[J]. 五台山研究, 2022, (4): 22-25.
- [12] [日本] 菅野博史.《法华经》与宗教间的对话[J]. 佛学研究, 2006, (00): 65-72.
- [13] R. Motiekaitis, Emptying Śūnyatā: a Critical Reading of Nishitani's Religion and Nothingness[J],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Area Studies, 2015, 10(1): 69-83.
- [14] [今斯里兰卡] 化普乐·罗睺罗尊者著, 法严法师译. 佛陀的启示(What the Buddha Taught)[M]. 台北: 财团法人台北市慧炬出版社, 1972: 18-19.
- [15] (刘宋) 求那跋陀罗著. 杂阿含经[M]. 北京: 宗教文化出版社, 1999: 225.

“Ekayāna” Thought in the Lotus Sūtra and Interreligious Dialogue: ——The Path of Buddhist Harmonious Integration in Dissolving Religious Exclusivity

Zhao Hanzhang¹

¹*School of Electronic Science and Engineering, Nanjing University, Nanjing, Jiangsu 210023, China*

Abstract: Amidst the intensifying globalization and recurrent cultural conflicts in the contemporary era, the civilizational antagonisms stemming from religious exclusivity have emerged as a critical concern. Exclusivist tendencies persist in Abrahamic monotheisms and Hindu caste systems, yet the Lotus Sūtra's Ekayāna (One Vehicle) doctrine offers a constructive paradigm to address this challenge. This paper examines how the Lotus Sūtra's theoretical frameworks—*kaiquan xianshi* (opening the expedient means to reveal the truth) and *huisanguiyi* (integrating the three vehicles into one)—reconfigure interreligious dialogue by: negating claims to absolute truth through the doctrine of *zhūfā shíxiàng* (ultimate reality of all dharmas), dismantling notions of divine election via the principle of *fóxing píngděng* (equality of Buddha-nature), and fostering respect for the Other through the practice of *Chángbùqīng xíng* (the Venerable Constant Non-Disrespect). Rooted in Śūnyatā philosophy, Buddhist harmonious integration transcends exclusivity by reinterpreting religious pluralism as manifestations of the Dharma Realm (*fǎjiè*). This perspective not only creates a dialogic space of *hé ér bùtóng* (harmonious coexistence amid diversity) but also holds profound implications for constructing a global community of shared future. By analyzing three dimensions—epistemology, soteriology, and ethics—this study elucidates the non-exclusivist resilience and transformative potential of Buddhist thought in interreligious contexts.

Keywords: Lotus Sūtra; Ekayāna Doctrine; Religious Exclusivity; Buddhist Harmonious Integration

从赋魅到祛魅：摩尔诗歌中的“正义”想象与谦逊诗学

苑华美¹

(1.北京外国语大学, 北京 100089)

摘要: 本文聚焦玛丽安·摩尔的《盔甲正在瓦解谦逊》与《光辉的幻影》，结合亚里士多德正义理论与荣格人格面具理论，探讨诗中“正义”的赋魅与“谦逊”的祛魅机制。研究指出，玛丽一世与黑太子爱德华的“正义”实为虚假的面具，以“受损”为名实施暴力扩张，扭曲了正义的平等本质。摩尔通过飞蛾、丢勒犀牛与啤酒广告等意象，强调“谦逊”作为自我反思与认知节制的美德，揭露面具虚伪，倡导包容差异的平等秩序。本文认为，摩尔诗歌回应历史中的“正义”滥用，并强调谦逊是防止其异化的重要伦理力量。

关键词: 玛丽安·摩尔；正义；谦逊；人格面具

基金项目: 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21世纪英语文学纪事与研究” (23&ZD304)

DOI: doi.org/10.70693/rwsk.v1i8.1250

一、引言

“正义”作为人类文明的核心伦理范畴，始终在理想与现实的张力中被反复审视。从亚里士多德对“平等”与“矫正正义”的哲学界定，到现代社会对正义异化现象的批判，这一概念的复杂性在于：它既承载着人类对平等与公正的永恒追求，又容易被权力、欲望等因素裹挟，异化为谋取私利的工具。玛丽安·摩尔作为20世纪美国重要的现代派诗人，其诗歌以精准的意象与深刻的哲思著称，尤其善于通过日常与历史的交织，反思社会伦理的核心议题。

本文聚焦摩尔的《盔甲正在瓦解谦逊》(“Armor’s Undermining Modesty”, 1950)与《光辉的幻影》(“Apparition of Splendor”, 1952)两首诗歌，探讨其对“正义”赋魅现象的批判与“谦逊”祛魅功能的倡导。这两首诗歌对“正义”的反思不仅具有文学价值，更暗含对伦理实践的深刻洞察。研究将以亚里士多德的正义理论为哲学基础，解析“正义”的平等本质与“矫正正义”的应有之义；以荣格的人格面具理论为分析工具，揭示诗歌中历史与文本形象所建构的“正义”面具的虚假性。在此基础上，进一步阐释摩尔如何通过“飞蛾”、“丢勒犀牛”、“博克啤酒海报”等显性情节，赋予“谦逊”以认知节制与自我反思的伦理意义，使其成为抵御“正义”异化的重要力量。

通过梳理诗歌中的隐性叙事线，本文旨在揭示：当“正义”被建构为保护性的人格面具，当“矫正正义”沦为暴力与压迫的借口，其赋魅的光环便会消解；而谦逊作为一种承认认知局限、包容差异的美德，能够引导人们回归正义的本质——平等、公正与共存。这一研究不仅有助于深化对摩尔诗歌伦理内涵的理解，更为当代社会反思正义的实践路径提供了文学镜像与伦理启示。

二、被赋魅的“正义”

玛丽安·摩尔的《盔甲正在瓦解谦逊》中“英雄们不会列出他们所厌恶的事物”的表述、对“约翰·戴公司”座右铭的引用、对一位陌生骑士的刻画，以及《光辉的幻影》中讨论丢勒的犀牛图的显性情节，构建了一条关于“正义”效用赋魅现象的隐性叙事线，对“正义”被扭曲与滥用的状况进行了深刻反思。

从词源学角度看，“正义”意为“公平公正的品质”；从哲学层面而言“正义”是“在政治、经济、法律和道德领域中对是非善恶的一种道德认知和价值评判”(金炳华等, 2001: 1950)。作为道德范畴，“正义”既指符合特定社会道德规范的行为，也指“处理人际关系和利益分配的一种原则，即平等对待”(金炳华等, 2001: 1950)。词源学与哲学定义共同指向“平等”这一核心内涵。亚里士多德亦认为，“正义即是合法且公平之物”(Aristotle, 2009: 81)，而“不义之人贪婪无度”(Aristotle, 2009: 81)的论断则暗示了不平等状态的存在——即一方有所失、另一方有所得。针对这种不平等，亚里士多德提出“矫正正义”(rectificatory justice)概念，认为其“在人与人之间的交往中起

作者简介: 苑华美(1998—)，女，博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为19-20世纪英美诗歌。

到矫正作用”(Aristotle, 2009: 84), 并指出平等处于多与少之间, 正义则处于损失与收益之间 (Aristotle, 2009: 86-87)。

摩尔《盔甲正在瓦解谦逊》标题中的“盔甲”一词, 暗喻着不平等与不正义的存在。从词源上看, “盔甲”指“铠甲, 战斗中穿戴的防御性装备, 通常也指保护手段”, 其作为保护主体免遭攻击的工具属性, 与正义概念中隐含的“不正义前提”形成呼应, 暗示着收益方的存在, 而这种得失状态的正当性有待审视。瑞士心理学家卡尔·荣格 (Carl Jung) 提出的“人格面具”理论为这一审视提供了视角: “人格面具”是个体适应世界、与世界打交道时所采用的方式, 其防御性特征体现在促使主体融入群体、避免排斥与迫害。而人格面具展现出的特质与主体的真实性格未必相符, 因而具有一定虚假性 (Jung, 1959: 164)。结合这一理论审视诗歌中玛丽一世、黑太子及相关形象所展现的“正义”, 可见其本质是通过构建自身受损局面以实施“矫正正义”的手段——表面为弥补“损失”, 实则通过不正当行为获取更多利益。

《盔甲正在瓦解谦逊》第六节的“非象征性显性情节” (nonsymbolic overt plot) 中, “英雄们不会列出他们所厌恶的事物” (Moore, 1981: 152) 的表述, 与诗歌的“象征性隐性进程” (symbolic covert progression) 形成鲜明互补 (Dan, 2021: 12), 揭示了“正义”人格面具的建构逻辑。诗中相关段落写道: “他们不会让自己妨碍/他们对他人的助益/ (且他人与他们) 相异。尽管玛尔斯是过分的/是防御性的, /英雄不需要写下属性列表来列举/他们所讨厌的” (Moore, 1981: 152)。这里的“英雄”特质被定义为不对“相异”者持有敌意, 更不会通过“罗列厌恶之物”来强化对立。这种特质反衬出一种相反的行为逻辑: 通过构建“厌恶清单”塑造自身的“正义”形象——即把特定群体定义为“威胁”或“不义”的来源, 以此合理化自身的“防御”或“矫正”行为。这种行为的本质是通过制造“受损”假象, 将自身置于“正义”的道德高地, 进而实现对他人的压制或利益的掠夺。从亚里士多德的正义理论来看, 这种行为的自愿性使其丧失了正义属性, 因为“一个行为是否正义 (或不义), 取决于其是否出于自愿; 因为自愿的行为会受到谴责” (Aristotle, 2009: 93)。当“正义”成为刻意建构的人格面具, 其背后的贪婪与偏私便会逐渐暴露, 最终导致“正义”表象的崩塌。

《光辉的幻影》中对“丢勒的犀牛”的刻画, 进一步深化了对“正义”赋魅现象的反思。该诗第一节明确写道: “因从未被真正了解, /故而带有奇迹色彩, /丢勒的犀牛/即便长着精致的黑白脊背, /也可能同样让我们感到震惊” (Moore, 1981: 158)。标题中的“光辉”一词意为光辉、辉煌, 是卓越或杰出的象征; 与“奇迹”一词共同指向一种因认知局限而被神化的形象特质。丢勒的犀牛木刻创作于 1515 年, 这位德国版画家并未亲眼见过真实的印度犀牛, 仅根据文字描述和匿名草图完成创作, 导致其笔下的犀牛身披坚硬盔甲、脚呈鳞片状、背上有螺旋小角, 与真实犀牛形象存在显著偏差。然而, 这一并不准确的形象却在历史上广泛流传, 成为人们对犀牛的经典认知, 正如摩尔所描述的“带有奇迹色彩” (Moore, 1981: 158)。这一意象恰如被赋魅的“正义”——由于认知的片面性或刻意的建构, “正义”被赋予了光辉的表象, 但其真实性却被遮蔽。摩尔通过这一隐喻暗示, 当“正义”像丢勒的犀牛一样基于片面认知被塑造时, 它便会成为一种“光辉的幻影”, 失去其应有的平等与公正本质。

《盔甲正在瓦解谦逊》第五节对“约翰·戴公司”座右铭的引用, 构成另一条隐性叙事线。诗中引用该公司“起来吧, 因为白天到了” (Moore, 1981: 151) 的座右铭, 结合英国宗教改革时期的历史语境可窥见深层意涵: 戴作为新教印刷商, 在玛丽一世时期坚持印刷新教文献并遭受迫害, 而玛丽一世的“正义”人格面具恰与其宗教政策相关。玛丽一世早年因宗教改革沦为“私生女”的受损经历, 使其形成保护性人格面具以融入群体, 继位后则以“矫正正义”为名恢复天主教、迫害新教徒。这种将自身与“正义”人格面具等同的行为, 导致了对异见者的压制, 显露出人格面具过度发展后的虚假性与不义性 (Jung, 1959: 164)。摩尔借座右铭的引用, 既指向历史中以正义之名的迫害, 也暗含对“正义”本质的追问。

诗歌对“陌生骑士”的刻画, 从历史维度进一步揭示了“正义”人格面具的虚假性。《盔甲正在瓦解谦逊》第五节写道: “就像那些熟悉的/如今变得陌生的、追寻圣杯的骑士, 他们曾是/古罗马式的公爵。/没有额外的装饰/没有花环和银杖, 盔甲也未镀金/或镶嵌宝石” (Moore, 1981: 151-152)。摩尔在注释中指出, “公爵”指“古罗马式的军队军官或指挥官” (Moore, 1981: 283), 与“追寻圣杯的熟悉骑士”相关联——这些骑士象征着亚瑟王圆桌骑士团的理想形象, 以“仁慈、荣誉、公正”为核心美德, 盔甲“没有任何额外装饰”, 代表着纯粹的正义追求。相比之下, 诗中“陌生的骑士”则装饰着“花环、银杖, 盔甲镀金/或镶嵌宝石” (Moore, 1981: 152), 这一形象指向康沃尔公爵 (Duke of Cornwall) 黑太子爱德华 (the Black Prince), 他“头戴花环、指戴戒指、手持银杖” (Moore, 1981: 283), 外在的华丽装饰与其行为形成鲜明反差。

黑太子爱德华的“陌生感”源自其“骑士”人格面具的虚假性。作为嘉德勋位的创始成员之一, 他本应践行骑士“仁慈”的核心美德——“永不残忍, 对请求宽恕者予以宽恕”, 并凭借这一人格面具赢得民众的尊敬与支持, 顺利融入以骑士精神为核心的社会群体。但历史记载显示, 他的行为严重违背了这一美德: 1370 年利摩日战役中, 因前盟友利摩日主教变节, 他下令处决约 3000 名男女老少以示报复, 这场血腥屠杀使其获得“黑太子”的称号,

也彻底暴露了其人格面具的虚假性。从亚里士多德的正义理论来看,盟友的背叛或许使他陷入某种“受损”处境,但他的报复行为并非“矫正正义”——矫正正义旨在恢复平等,而非以更大的暴力制造新的失衡。荣格的人格面具理论更深刻揭示了这一行为的本质:人格面具的异常发展导致了心理扭曲,使他在“正义”的名义下实施极端暴力(Jung, 1959: 164)。他以“被背叛”为由建构“正义”人格面具,实则通过屠杀宣泄暴力欲望、巩固权力,这种行为使他从民众心中“熟悉的正义骑士”变成了“陌生的施暴者”。摩尔通过对比理想骑士与黑太子的形象,批判了将“正义”异化为暴力工具的行为,警示人们警惕外在装饰下的“正义”假象。

综上,摩尔通过《盔甲正在瓦解谦逊》与《光辉的幻影》中的多重显性情节,构建了一条贯穿历史与文本的隐性叙事线。本文以亚里士多德的正义理论为哲学基础,以荣格的人格面具理论为分析工具,深入剖析了玛丽一世、黑太子爱德华及相关形象的“正义”实践:当“正义”被建构为保护性的人格面具,当“矫正正义”沦为利益扩张或暴力压制的借口,“正义”的平等本质便会被扭曲,其赋魅的光环也会随之消解。诗歌对“英雄不罗列厌恶之物”的强调、对丢勒犀牛“光辉幻影”的刻画、对约翰·戴座右铭的引用以及对陌生骑士的批判,共同指向一个核心命题:真正的正义不应依赖虚假的人格面具,而应回归平等与公正的本质;不应通过制造对立与仇恨实现所谓“矫正”,而应包容差异、促进共存。这种对“正义”本质的深刻反思,既回应了特定历史语境中“正义”被滥用的现实,也为后世理解“正义”的真正内涵提供了启示。

三、谦逊美德祛魅“正义”

摩尔还揭示了谦逊美德的隐性进程,蕴含在叙述者误将飞蛾当作害虫的错觉、对奥斯卡·奥格(Oscar Ogg)《26个字母》(The 26 Letters)的引用、对东方饮料公司(Eastern Beverage Corporation)海报的描述、对犀牛形象的推测,以及对《刺猬、狐狸与苍蝇》(“The Hedgehog, the Fox, and the Flies”)这则寓言的引用的显性情节中。

“谦逊”出现在《盔甲正在瓦解谦逊》的标题和第七节中,摩尔重复:“盔甲正在瓦解谦逊”,并补充道“而非无心的堕落”(Moore, 1981: 152)。诗人展现了“盔甲”、“谦逊”与“堕落”(depravity)之间的关系:盔甲瓦解谦虚,助长堕落,指向“正义”盔甲的虚假性。

从词源上看,“谦逊”意为“不夸张,有自制力”。摩尔在其诗歌《致蜗牛》(“To a Snail”, 1921)中将谦逊视为一种美德,她写道:“谦逊是一种美德”(Moore, 1981: 85)。在其散文《谦逊、专注与热情》(“Humility, Concentration, and Gusto”)中,摩尔揭示了谦逊的认识论意义,谦逊使她意识到:“原创——即做从未有人想过的事——是不可能的”(Moore, 1986: 421)。正如休谟所界定的那样,“谦逊与厚颜无耻和傲慢相对,表达的是对自己判断的怀疑,以及对他人应有的关注和尊重”(Hume, 1983: 69)。可见,“谦逊”作为一种认识论现象,体现为对错误归因的理性节制与自我反思。玛丽一世和黑太子爱德华“正义”人格面具的虚假性,反映出他们缺乏这种自我反思的谦逊,体现在他们对自身利益受损的笃定上。

针对缺乏谦逊所导致的暴力后果,摩尔在《盔甲正在瓦解谦逊》前两节中,通过“叙述者误将飞蛾当作害虫”的显性情节,质疑了玛丽一世和爱德华的正义。“起初我以为有一只毒虫/一定落在我的手腕上”,叙述者产生了安全受到害虫威胁的错觉。然而,这只害虫实际上是一只无害的飞蛾,“几乎像猫头鹰”(Moore, 1981: 151)。实际上,从生物学角度来看,飞蛾和猫头鹰确实有相同的智慧与和平特质。猫头鹰捕猎时更倾向于制定策略而非诉诸暴力。同样,飞蛾也通过信息素吸引雄蛾,而非以攻击的形式繁殖。飞蛾的智慧与和平特质,与害虫的攻击性形成鲜明对比,解构了叙述者的错觉。摩尔对“害虫”这一概念的颠覆,质疑了玛丽一世和爱德华对自身“正义”的笃定。

诗歌引用《26个字母》中“曾经自决/打造过一柄石斧/并且用毛爪削东西”的显性情节强化了这种质疑。该书介绍了字母的演变,“人类早期祖先留下的最古老的遗物是粗糙的石器。他用毛茸茸的爪子握住这些石器,并用它们来敲打和切割”(Ogg, 1948: 6)。石器工具的使用标志着人类与动物的区别,象征着人类文明的诞生。字母和语言的出现则加速了人类社会的形成。摩尔“我们错位的/字母表”则暗示着人类文明可能呈现的扭曲与错误,体现了谦逊的必要性。

描述东方饮料公司海报的显性情节,将自我归因错误的存在正常化。第三节“就算是天才的学者们也会迷路/在错误的词源中”(Moore, 1981: 151)。指的是对“博克”(bock)一词的误用,暗示了谦逊的重要性。诗中的“博克啤酒雄鹿”(bock beer buck)表达来源于东部饮料公司的博克啤酒海报。根据第13行“错误的词源学”的提示,“博克啤酒”(bock beer)名称的起源让学者们感到困惑。“博克啤酒”是一种浓烈的深色德国啤酒,“雄鹿”(buck)特指“公山羊”,也是这家公司海报图片中的山羊。在德国文化中,“公山羊”象征着“强壮”,酿酒商将其与啤酒联系起来,以突显啤酒的浓烈特质。然而,“雄鹿”所蕴含的强壮含义与博克啤酒的浓烈特质之间的密切联系,是一种“错误的词源学”,因为“博克啤酒”的名称并非源于“雄鹿”。博克啤酒起源于艾恩贝克(Einbeck)。德语中,“ein”意为“一个”,“beck”是“beckon”的古老形式,与驿站有关,而非与山羊有关。关于词语的误用,摩尔评论道:“有什么比精确更精确?是幻觉”(Moore, 1981: 151),这暗示了谦逊对于准确使用词语的重要性。

谦逊还体现在《光辉的幻影》中叙述者推测犀牛形象的显性情节中。摩尔注意到丢勒所画犀牛背上的“尖状黑点”，进行了各种详细的推测：“丢勒的犀牛/或许会让我们同样吃惊/若是精巧地长着黑白刺/……/像另一只豪猪，或蕨草，/拱曲的白鹭身上的嘴巴/太黑而难以分辨”（Moore, 1981: 158）。“蓟”是一种多毛植物，其叶子形状类似豪猪的刺。“弓起的白鹭”有一个又长又尖的嘴，具有豪猪和蓟的尖刺形状。然而，摩尔用“太黑而难以分辨”收回了对“犀牛背上长有坚硬尖刺状毛发”的推测，体现了她的谦逊美德。“但双排列阵的喷口状的蓟——/据推测是不适宜的——/从未长过一根硬毛”（Moore, 1981: 158）。摩尔意识到，并非所有带刺的东西，如蓟，都是具有威胁性的。尽管蓟长满了尖刺状的苞叶，但它从不主动攻击。同样，摩尔暗示，从木刻中无法确定犀牛背上的是坚硬的刺还是柔软的毛。因此，摩尔提出了另一种假设：“它是否/是某种令人愉快的想象，/长着像纯色绒鸭耳朵般的/扎根在乌黑苔藓上的刺毛”（Moore, 1981: 158），推测犀牛背上的尖状黑点并非像豪猪的刺那样坚硬，而是像绒鸭的羽毛一样柔软。

在第四节和第五节中，摩尔通过引用《刺猬、狐狸与苍蝇》寓言的显性情节，进一步弱化了豪猪的威胁。开头的两行：“由豪猪托起的裙裾——/有十一码长属于一个仙女”（Moore, 1981: 158），引自爱尔兰作家奥利弗·戈尔德史密斯（Oliver Goldsmith）的散文。摩尔在1928年的散文中专门探讨了戈尔德史密斯的创作风格：“他或许将那些奇幻中略显怪诞的形象视为转瞬即逝的轻浮之物——比如那位拖着长达十五码、由豪猪托举的裙摆的仙女，或那只蓝色的猫，它向王子揭示：“你对白老鼠的痴情不过是一场虚构，根本不是真正源自你灵魂的情感。”但戈尔德史密斯笔下的这种邪恶的消逝，总是意味着一种伤害的逆转”（Moore, 1986: 211）。

其中的核心观点是，邪恶的消逝意味着一种伤害的逆转。然而，邪恶的是谁？人们首先想到的是具有威胁性的豪猪。然而，戈尔德史密斯用“怪异”来描述驯化豪猪的仙女，解构了仙女传统的正义形象。此刻，豪猪从威胁性的动物变成了仙女的受害者，证实了邪恶的消逝总是对伤害的逆转。摩尔通过戈尔德史密斯的观点暗示，有着尖刺的犀牛——就像豪猪一样，其有害形象并非永恒不变，而是可以逆转的，这预示着以谦逊态度接近真相的重要性。

摩尔不仅瓦解了犀牛和其他带刺动物的攻击性，还通过拉·封丹（La Fontaine）的寓言《刺猬、狐狸与苍蝇》赋予它们保护者的形象。“一排尖刺短过一排尖刺之间，/林立以为防护”（Moore, 1981: 158）出自该寓言，讲述了一只刺猬遇到一只被吸血苍蝇困扰的虚弱狐狸，并试图帮助它。然而，狐狸拒绝了刺猬赶走苍蝇的提议，解释说这些苍蝇已经吸饱了血，如果把它们赶走，会引来另一群贪婪的苍蝇吸干它剩下的血。刺猬不像吸血苍蝇那样落井下石，而是前来救援，这使得刺猬、豪猪和犀牛等带刺动物从攻击者转变为保护者。

除了改变对带刺动物形象的认知外，《刺猬、狐狸与苍蝇》还具有政治隐喻。亚里士多德在《修辞学》中提到了这则寓言，伊索为一位被判处死刑的平民领袖辩护时声称：“你们不会再受到这个人的伤害了，因为他已经变得富有。如果你们处死他，其他穷人会来偷窃公共财物，并将其挥霍一空”（亚里士多德, 2005: 125）。伊索暗示，自私的政客是一种“必要之恶”，就像“驯化豪猪的仙女”一样，这也暗示了“丢勒的犀牛”是“必要之恶”的产物。“丢勒的犀牛”是基于一只从远东带到里斯本，用于外交目的的印度犀牛，它是人类欲望的受害者。然而，摩尔并不认同伊索关于“必要之恶”的观点：“缅甸州应该欣慰它的动物/不是一个摇摆不定者，而与其/斗争，宁愿让一触即发的硬毛垂下。/肤浅的压迫者，入侵者，/坚持者，你已找到了一个抵抗者”（Moore, 1981: 158-159）。

缅甸州是美洲原住民和皮毛商人的居住地，这不仅暗示着白人对原住民的征服历史，也暗示着人类对野生动物的征服历史。摩尔将“必要之恶”的实施者描述为“肤浅的压迫者”，他们入侵土地，并设定以自我为中心的标准。与被迫顺从的原住民和被制成皮毛的动物不同，出现了一个反抗者。在这则寓言中，“必要之恶”由吸血苍蝇实施，狐狸是不反抗的动物，刺猬是选择改变现状的反抗者。带刺的动物从攻击者和保护者转变为反抗者，拒绝“必要之恶”。“必要之恶”违背了谦逊的美德，谦逊强调清醒地认识自己，而非固执己见。由于缺乏谦逊，玛丽一世和黑太子以“必要之恶”的形式实施“矫正正义”，体现在他们将他人置于不公处境的行为中。摩尔贬低压迫者、入侵者和固执己见者的肤浅，以此反对玛丽一世和黑太子实施的暴力“矫正正义”，并赞扬谦逊这一美德。

四、结语

玛丽安·摩尔在《盔甲正在瓦解谦逊》与《光辉的幻影》中，以精妙的意象与深刻的哲思构建了一条贯穿“正义”赋魅与“谦逊”祛魅的隐性叙事线索。通过对诗歌显性情节的细致解析，我们得以窥见：历史与文本中的“正义”实践往往存在双重面相——它既可以是追求平等与公正的伦理理想，也可能被异化为包裹欲望与暴力的人格面具。玛丽一世以“矫正正义”为名的宗教迫害、黑太子爱德华借“骑士美德”实施的血腥报复，乃至诗歌中隐含的对“正义”工具化的批判，共同揭示了一个核心命题：当“正义”脱离平等本质，沦为自我赋魅的工具，其结果必然是对他人的压制与对伦理的背离。

摩尔的深刻之处不仅在于批判“正义”的虚假性，更在于为这种批判提供了建设性的伦理方案——谦逊。通过飞蛾的“非害虫”本质、丢勒犀牛的“光辉幻影”、博克啤酒海报的“错误词源”等意象，摩尔赋予谦逊以多重伦理内

涵：它是对认知局限的承认，是对差异存在的包容，更是对自我中心的节制。这种谦逊并非消极的退缩，而是积极的伦理实践——它要求人们警惕“正义”面具的诱惑，拒绝以“矫正”之名行压迫之实，在承认“错位”与“错觉”的必然性中，守护正义的平等本质。

亚里士多德的“正义即平等”到荣格的“人格面具”警示，再到摩尔对谦逊美德的倡导，研究最终指向一个永恒的伦理命题：正义的实践不仅需要“善”的追求，更需要对“自我”的审视。摩尔的诗歌告诉我们，真正的正义不应依赖外在的赋魅光环，而应植根于内心的谦逊自觉——承认差异、反思局限、践行包容。这一启示不仅回应了诗歌创作时代的伦理困境，更在当代社会依然具有鲜活的生命力：在价值多元与利益交织的现实中，唯有坚守谦逊的伦理姿态，才能抵御“正义”的异化，守护平等与公正的文明底线。

参考文献：

- [1] 金炳华等. 哲学大辞典(修订本)[M]. 上海:上海辞书出版社, 2001.
- [2] ARISTOTLE. The Nicomachean Ethics[M]. David Ross, Trans.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9.
- [3] JUNG C. G. The Basic Writings of C. G. Jung[M]. Violet De Laszlo, Ed. New York: Random House Inc., 1959.
- [4] MOORE M. The Complete Poems of Marianne Moore[M]. New York: Viking Penguin, 1981.
- [5] DAN S. “Covert Progression” and Dual Narrative Dynamics[J]. Style, 2021: 1-28.
- [6] MOORE M. The Complete Prose of Marianne Moore[M]. New York: Viking Penguin, 1986.
- [7] HUME D. An Enquiry Concerning the Principles of Morals[M]. J. B. Schneewind, Ed. Indianapolis: Hackett Publishing Co., 1983.
- [8] OGG O. The 26 Letters[M]. California: Thomas Y. Crowell Company, 1948.
- [9] 亚里士多德. 修辞学[M]. 罗念生,译. 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 2005.

From Enchantment to Disenchantment: The Imagination of “Justice” and Poetics of Modesty in Moore’s Poetry

Yuan Huamei¹

¹ Beijing Foreign Studies University, Beijing 100089, China

Abstract: This paper examines Marianne Moore’s “Armor’s Undermining Modesty” and “Apparition of Splendor”, analyzing the enchantment of “justice” and the disenchantment function of “modesty” through Aristotle’s theory of justice and Jung’s concept of persona. It argues that figures like Mary I and Edward the Black Prince wear false personas of “justice,” using “rectificatory” rhetoric to justify violence and power expansion, thereby distorting justice’s egalitarian essence. Meanwhile, Moore employs images such as moths, Dürer’s rhinoceros, and Bock beer posters to highlight modesty as a virtue of self-reflection and cognitive restraint. This modesty unveils the falseness of performative justice and affirms a just order grounded in equality and tolerance. Ultimately, the poems critique historical abuses of “justice” and advocate modesty as a crucial ethical force resisting its alienation.

Keywords: Marianne Moore; Justice; Modesty; Persona

文明在张力中对话

——评韦伯《儒教与道教》的宗教社会学方法论

赵汉章¹

(1.南京大学 电子科学与工程学院, 江苏 南京 210023)

摘要: 马克斯·韦伯的《儒教与道教》以跨文明比较范式探讨中国宗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理性化的关系。本文剖析了韦伯对儒教、道教的辩证分析,揭示其“宗教心态-经济伦理”因果链的内在逻辑,探讨其对现代性问题的解释路径。同时,批判性检视韦伯诠释过程中的“西方中心主义”偏差,反思了单向度比较范式的局限。通过对“理想类型”建构范式的解构,本文揭示了在抽象理论与具体文明间构建认知桥梁的路径,为全球化时代超越文明隔阂、实现平等对话提供哲学回应。研究既肯定韦伯对中国社会结构和文化传统的精辟剖析,也指出其结论的历史局限性,强调其问题意识的启发性,为理解西方现代性与东方传统之间的复杂张力提供理论支撑。

关键词: 马克斯·韦伯;《儒教与道教》;跨文明比较;理想类型;西方中心主义

DOI: doi.org/10.70693/rwsk.v1i8.1258

引言

德国著名哲学家、历史学家、社会学家马克斯·韦伯(Max Weber)在其宗教社会学经典著作《儒教与道教》中,通过跨文明比较研究的范式,系统探讨了中国宗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理性化过程之间的关联性。作为继《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之后的宗教社会学第二部核心论著^[1],该文本则依托丰富的汉学文献考据,构建了以“西方式的理性资本主义为何未在中国兴起”为枢纽的解释框架。韦伯在分析货币经济形态、科层制官僚体系、宗法制度、法律实践等方面的中国社会基本结构要素的基础上,聚焦于儒教作为理性的主流意识形态与道教作为非理性的宗教思想的辩证关系,揭示二者在价值取向、伦理规范及社会功能维度的差异性。同时着重对比中国社会与西方社会的差异,特别是中国宗教与西方清教的互鉴,进而得出核心结论:中国宗教伦理在一定程度上对中国资本主义的兴起构成阻碍。

从研究的视角而言,该书致力于探讨宗教思想与经济行为之间的互动关系。全书八章体例中,仅两章直接聚焦儒道二教的“理念因素”,用较大的篇幅深入研究了中国的社会学基础,最后才剖析了建立其上的中国正统文化儒教及被视为异端的道教,并将“理性化”命题嵌入更宏阔的文明比较视域,这种系统性考察路径充分彰显出韦伯作为一位欧洲顶尖人文学者的深厚底蕴与卓越见解^[2]。

时至今日,重新审视这部经典之作,我们不难发现其瑕瑜互见,虽然蕴含着人文学者的诸多深刻洞见,但也由于文化隔阂与时代局限不可避免地存在对中华文化的诸多误读与曲解,而且洞见与误读常常交织难辨。因此,初读时内容似显松散、观点隐晦;唯有深入研读后,才能看出其逻辑脉络清晰,观点明确。尽管韦伯的结论带有明显的历史局限印记,但其背后的问题意识仍颇具启发性,为当代学人提供了持续的思考启迪。《儒教与道教》不仅是一部聚焦中国宗教与社会的学术巨著,更为我们理解西方现代性与东方传统之间的复杂张力提供了关键的理论支撑。尽管韦伯的观点在当代视角下存在一定局限,但他对中国社会结构和文化传统的精辟剖析,依然为社会学和历史学研究提供了极具价值的参考。

本文正是在这一思想脉络中展开论述:在理论维度,通过文本分析,探讨韦伯“宗教心态-经济伦理”因果链的内在逻辑,旨在为理解现代性问题的文明根源提供解释路径。在方法论层面,本研究批判性检视韦伯对儒道思想诠释过程中潜藏的“西方中心主义”认知偏差,通过反思单向度比较范式固有的认知局限,为构建真正平等的跨文

作者简介: 赵汉章(2001—),男,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为光电子材料与器件。

明对话机制提供方法论警示。在实践向度,通过对其“理想类型”建构范式的深度解构,揭示如何在抽象与具体、普遍与特殊之间构建具有解释张力的认知桥梁,旨在借鉴韦伯跨文化研究的框架,对当代全球化时代如何超越文明隔阂、实现真正平等对话作出哲学回应。这种对话进路的探索不仅具有深化宗教社会学基础研究的学术价值,更对全球化语境下多元文化的共生共存具有重要的现实启示意义。

一、文明互鉴视野下的哲学洞见

马克斯·韦伯在《儒教与道教》中构建的宗教社会学图景,绝非局限于东方社会的文化解剖,而是其宏大的文明比较研究的有机组成部分。这部著作通过理想类型的建构展开跨文化比较的方法论,将中国的儒教与道教置于与西方新教伦理的对话场域,揭示了两种宗教传统与中国社会结构、经济伦理及政治秩序的内在关联,为宗教社会学研究提供了经典范式。

韦伯的学术勇气在于,他敢于在资料匮乏的情况下进行“思想实验”。尽管他不懂中文,也未曾踏足中国,但在一百年前,仅凭传教士与汉学家的零散译作,他竟构建起一个关于中国文明的解释模型^[3]。这种“远距离观察”反而赋予其研究以独特的哲学气质——当韦伯将儒教伦理与清教伦理并置时,他实际上在进行一场关于“现代性”的元哲学对话:究竟何种文化基因更能孕育理性资本主义?这种比较不是非此即彼的判断,而是对文明多样性的礼赞。

韦伯对中国社会结构的洞察,展现出宗教社会学家的哲学敏锐。韦伯以中国的儒道教伦理以及他所能觉察到的中国资本主义萌芽去验证他的宗教社会学命题:他先讨论了中国社会的制度结构,从五个方面论述了中国的社会基础——货币制度、城市与行会,家产官僚制度,宗族组织与村民自治、家庭财产制度和法律结构,再通过分析儒道教伦理观对中国本土文化、社会精神气质的影响,分析中国之所以没有成功地发展出资本主义,乃是因为中国的儒教与道教都缺乏一种类似于新教伦理的理性精神。他描绘的“家产官僚制政体”图景,不仅是对传统中国国家形态的精辟概括,更揭示了文明演化的制度性约束条件。与西欧封建制下的多元竞争不同,中国统一政体对资本流动的制度性限制,以及由此导致的形式法律与理性行政发育迟缓,在韦伯的剖析中成为理解文明路径依赖的重要维度^[4]。当韦伯探讨道教“出世与入世”的双重面向时,也在哲学层面触及了宗教伦理与社会实践的张力关系。道教追求自然清静的终极理想,与其经国安民的社会关怀之间形成的辩证统一,在韦伯的解读中成为理解中国宗教伦理复杂性的关键^[5]。从认识论的视角考察,韦伯认为中国科技落后也与“天人合一”思想体系相关——科技发展需以“天人”为客观研究对象,而“天人合一”刚好可以转化为探究天和入如何合一的动力,但道儒两家均未从这个方向发展:道教以“天地与我并生,万物与我为一”(《庄子·齐物论》)的境界以及“其一也一,其不一也一。其一与天为徒,其不一与人为徒。天与人不相胜也,是之谓真人”(《庄子·大宗师》)的追求消解认知主体和客体的界限^[6],导致“天人”不被当作独立的研究对象。而儒家用“天人”这种形而上学的讨论最终是为了给日常的伦理找起源,如朱熹所言“今为学而不穷天理,明人伦,讲圣言,通世故,乃兀然存心于草木器用之间,此是何学问?如此而望有所得,是炊沙而欲成其饭也。”^[7]这种将认知限制在伦理形而上学的传统,阻滞了科技所需的实证思维形成。

值得注意的是,韦伯理论在中国语境中的接受史,本身就是一个充满张力的思想实验。当我们将视野扩展至世界文明与中国思潮的讨论时,不难发现这部著作的真正价值在于它作为“时代思潮化石”的标本意义^[8]。韦伯对19世纪欧洲中国观的总结与反思,既暴露出西方理论范式在解读东方文明时的认知局限,更彰显出其作为方法论工具的持久生命力,为理解当代中西文化对话提供了历史参照。当中国学者指出韦伯对儒教和道教的理论局限的过程中,实际上是在进行一场跨文化的知识考古——他们既要解构西方中心主义的话语霸权,又要避免陷入文化本质主义的窠臼,这一过程完成了从“误读韦伯”到“善用韦伯”的学术转型,这种转型本身构成了中国宗教哲学研究现代化的重要维度。这种批判性继承的过程,充分印证了韦伯方法论的开放性:比较宗教社会学从来不是提供现成的答案,而是培养问题意识的训练场^[9]。当我们将目光投向中国学者对韦伯理论的创造性转化时,不难发现这部著作的价值早已超越了文本本身,成为推动中国人文社科领域现代性转型的重要思想资源。

二、异质文明碰撞中的认知裂痕

马克斯·韦伯在《儒教与道教》中的分析路径也隐含了文明比较范式,以“理性化”为主轴,本质上是一种将复杂文明现象简化为可比较范式的理论工具——其以西方主体性哲学对非西方文明强制阐释,不可避免存在启蒙理性对异质文明的认知暴力。因此,当我们以当代哲学与宗教学的视野重新审视这部经典时,不难发现其分析框架中潜藏的“西方中心论”预设显露出的方法论上的根本性困境,以及由此引发的对中国儒道文化精神的误读。

韦伯构建的儒教伦理图景,呈现出鲜明的功能主义特征。在韦伯看来,儒教属于一种“适应现世的伦理”,通过“礼”的规范体系将社会秩序内化为个体的道德自觉,这种世俗理性注定只能孕育出“传统主义”的温床。这种观念本质上是一种文化他者的凝视,他试图将儒家纳入西文“Religion”的解释体系下比较,却忽视了儒家伦理独特的“内在超越”特质,如韦伯将“天”概念简化为伦理性神祇的缺失,实则用新教伦理的救赎逻辑裁剪儒家“天人合一”的宇宙论^[10];将祭祀仪式仅仅理解为维护现世秩序的工具,而未能把握其中内化于礼教秩序的“慎终追远”的终极关怀维度^[11]。这种文化移植的谬误,暴露了比较宗教研究中的方法论困境——当研究者以自身文化编码为唯一标尺时,异质文明的丰富性必然被压缩为单维度的解释变量。而在道教研究部分,韦伯文明比较的认知盲区则愈发凸显。他将道教中的一些行为贬斥为“巫术”,其“救赎论”被视为缺乏系统性的“神秘主义”,将道教仪式实践等同于“非理性”的原始宗教,这种认知模式与19世纪欧洲汉学界的“停滞论”形成呼应^[12]。然而,韦伯忽视了道

教内生的理性化潜流——道教的内丹修炼体系实则蕴含着独特的身体哲学，可视作身心修炼的技术化阐释，其对“气”的循环认知构建了迥异于基督教时间观的宇宙论。更关键的是，道教对自然的系统化观察（如《抱朴子》中的矿物学分类），恰是前现代科学理性的萌芽形态，这种悖论性关联在韦伯的叙事中却付之阙如。韦伯这种判断本质上延续了启蒙理性对神秘主义的贬抑传统，而忽视了不同文明对“理性”概念的多元诠释。

在宗教社会学层面，韦伯构建的“宗教伦理-经济行为”因果链，在解释中国社会时遭遇了经验与理论的双重断裂。他武断地将儒教伦理归咎于中国资本主义的缺席，却忽视了一个基本事实：明清时期江南地区的工商业繁荣恰恰是在儒教文化土壤中孕育而生，晋商票号中“以义制利”的伦理规范、徽商家族“贾而好儒”的价值取向，无不证明儒教伦理与经济理性存在深刻的契合性。这种“去历史化”的理论预设，折射出韦伯思想中隐含的“西方现代性神话”^[9]，证明韦伯未能洞察儒教伦理中“中庸”智慧的辩证性——这种看似保守的处世哲学，实则蕴含着对资本无限扩张的伦理制约。当我们将视野扩展到徽商、晋商等历史现场，不难发现儒家伦理中“诚”、“信”等价值理念，实则构成了商业文明的道德基石。在当代中国，儒商精神的复兴与“经济伦理”的重建，更是对韦伯命题的最好回应。韦伯的误判在于将这种将复杂历史进程简化为单一变量作用的线性因果思维模式，本质上源于韦伯对“资本主义精神”的预设性定义——将中国的经济发展等同于西欧式的资本积累模式，而遮蔽了其他文明形态中可能存在的替代性现代性路径。

韦伯方法论的困境更深刻地体现在其对“理想类型”的滥用。通过非此即彼的二元对立，他将复杂的社会现实简化为“入世禁欲”与“出世神秘”的机械对立^[10]。这种操作方式在比较儒教与道教时尤为明显：前者被贴上“理性化”标签，后者则沦为“非理性”的范畴。然而，中国宗教史实呈现的却是“儒道互补”的动态平衡——道教的内丹修炼从未脱离世俗伦理的约束，儒家的礼教规范也始终包含着超越性追求，道教“道法自然”的生态智慧与儒教“天人合一”的宇宙论，在中国文明史中始终构成动态的张力结构。这种互补性在宋明理学中达到新的综合，程朱理学“理一分殊”的宇宙论与陆王心学“心即理”的直觉主义，恰是儒道对话的哲学结晶。这种互补性不仅体现在思想层面，更渗透于社会治理实践：汉代“独尊儒术”与唐代“三教并立”的政策摇摆，恰是文明内在张力的制度显现。韦伯的失误在于，他未能理解中国文明中“即世间而超世间”的智慧，这种智慧既非纯粹的入世理性，亦非彻底的出世遁世，而是在“执两用中”的哲学思维中实现入世与出世的辩证统一。

这种误读更深层地反映了韦伯对非西方宗教的认知遮蔽与方法论困境，其比较宗教研究存在三个层面的方法论局限：在资料运用上，完全依赖二手文献构建的“理想型”中国宗教，难免陷入“隔岸观火”的诠释困境；在理论预设上，将新教伦理视为理性化的唯一范式，实质是“以西方之镜照东方之像”；在价值判断上，将儒教伦理简单归为“传统主义”的标本，忽视了其内在张力和历史嬗变。这种认知局限在具体论述中表现为多重悖论：既承认儒教伦理的“形式理性”特征，又否定其与资本主义精神的兼容性；既看到道教对现世利益的超越性追求，又断言其缺乏“系统理性”；既指出中国城市的经济功能，又否认其孕育资本主义的可能性。这些矛盾折射出韦伯在文明比较时的理论焦虑——如何在承认中国文明独特性的同时，维系其“理性化”叙事的整体性？基于此，在哲学层面引发我们更深层的思考：当我们将宗教伦理视为文明基因时，是否预设了某种本质主义的文明观？当比较不同宗教的经济伦理时，如何避免“发展主义”的价值判断？这些追问不仅关乎学术研究的客观性，更触及文明比较的伦理维度。

三、启示

韦伯比较宗教研究的精髓，在于在《儒教与道教》中对宗教与经济关系的深度剖析。在分析宗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时，他敏锐地捕捉到宗教信仰与经济行为之间的辩证互动，不仅关注经济活动的工具理性，还深入挖掘了宗教信仰所承载的精神利益，这种精神利益，成为推动经济行为的强大动力。无论是经济利益还是精神利益，都深刻影响着社会行动的轨迹，而这种对利益与制度的综合分析，为理解社会现象背后的主观意义提供了关键线索。此外，韦伯巧妙地将“社会类型-文化-结构分析”与“利益-动机-制度分析”结合起来^[4]，深入挖掘了中国传统社会的经济伦理与宗教观念，探讨了家产官僚制的制度性阻力以及保守文化心态的束缚，这些因素如何与西方社会的资本主义精神形成鲜明对比，成为中西社会走向分野的关键要素，将行动背后的利益驱动与结构制约纳入统一分析框架。韦伯的分析提醒我们，文化并非只是经济的附庸，而是深深嵌入社会行动的脉络之中，涉及法律、阶级、社会团体、国家政策等多方面因素^[13]。这种研究路径为社会现象的解读提供了富有洞察力的视角，将文化价值视为构成行动脉络的重要力量，强调文化与制度的双向互动，而非简单归因于单一变量。这种多元因果分析的方法论，不仅避免了文化决定论的偏颇，也为理解中国社会的特殊性提供了立体范式。它启示我们，在研究中国社会时，既要关注制度结构的硬约束，也要深挖文化观念的软影响，二者交织才是社会现象生成的深层逻辑。例如，在探讨中国市场经济转型时，既要看到制度变迁的外在压力，也要理解文化传统如何潜移默化地塑造经济主体的行为选择。只有这样，才能真正把握中国社会的独特性与复杂性，避免陷入西方中心主义的思维惯性。推而广之，这种分析框架在分析其他社会时依然适用，尤其是在探讨不同文化背景下经济行为的多样性时，为我们提供了深入挖掘的理论工具。

韦伯处理理论与资料关系的一般原则同样具有普遍意义。在《儒教与道教》中，韦伯一方面基于新教伦理命题推进其“宗教之经济伦理”理论应用，另一方面审慎对待该理论在中国社会的适用性。他承认儒教中缺乏先知、救赎、神义论等概念的对应物，但又将儒教视为一种理性的、非救赎宗教，从而丰富了一般宗教社会学理论。这

种以理论观照现实、以现实完善理论的双向提升模式，为我们提供了一个良好的研究范例。在中国社会学研究中，我们需要借鉴这种理论与资料双向互动的模式，每种社会理论都有其优长和适用范围，推进社会学研究中国本土化需要博采众长，依据主题与研究目的选择相应理论来组织资料。理论与资料之间的关系应是双向互动的，中国研究中的独特经验现象不应被导向中国特殊论，而应成为建构和完善一般社会理论的潜在资源，从而形成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学理论。

韦伯在《儒教与道教》中构建的“理想类型”分析框架，虽为比较宗教学开辟了新的研究范式，但书中对儒教和道教的诠释却深嵌于西方中心主义的认知窠臼之中，这种理论局限恰恰凸显了跨文化比较的元问题。当韦伯将儒教界定为“理性化但非救赎型宗教”时，其分析框架已暗含价值排序：新教伦理的“工具理性”被预设为现代性的理想类型，而儒教的“适应理性”则沦为前现代的残余。这种比较的悖论在于，它既承认文化价值的不可通约性，又无法摆脱欧洲中心的价值判断。这促使我们反思，真正的跨文化对话不应是文化特质的罗列比较，更不是以“中心-边缘”的等级制思维将文化模式盲目套用，而应在“视域融合”中重构理解的可能性。比较宗教学应当建立双向诠释的对话机制来突破诠释困境：既要以现象学的方法悬置既有概念框架，在“去中心化”的视域中理解他者文化；又需借助解释学循环，在历史文本与实践传统的互文性中重构意义网络。这种跨文化对话不是要消弭文明差异，而是要在保持各自“认知型构”完整性的前提下，穿透文化表象把握内在逻辑，保持对异质文化的价值中立态度，从而构建真正平等的比较维度。真正的文明对话不在于评判优劣，而在于理解不同宗教传统如何以独特方式回应人类存在的终极问题。韦伯未能完全实现的，正是这种超越文化优越论的主体间性。这种反思并非对韦伯《儒教与道教》学术价值的否定，而是对其理论的进一步深化。在跨文化比较研究中，尊重主体间性、秉持中立的态度至关重要。只有这样，我们才能真正超越“民族中心主义”的局限，构建更为平等和多元的文化对话平台。正如学者所言：真正的文明对话需要超越“接受-拒绝”的二元对立，在理解差异中重构认知框架^[9]。

四、结语

当我们站在 21 世纪的全球视野回望，韦伯在《儒教与道教》中的研究既是一种未完成的命题，也是一种开放的可能性。他未能完全挣脱启蒙理性对非西方文明的凝视框架，却为后来者提供了反思的契机。这部作品既是西方学者对中国宗教伦理与社会结构的一次大胆探索，也是西方中心主义思维模式的一次潜在显露。韦伯以新教伦理为参照，剖析儒教的理性特质与道教的神秘主义，试图阐释为何西方式的理性资本主义未能在中国生根发芽。他构建的分析框架，虽在理论深度上令人叹服，却也因时代与文化的局限，对中国传统思想的多元维度与内在张力存在一定的误读与简化。

从文明比较的视角出发，韦伯的论断揭示了两种文明在宗教伦理与经济行为上的深刻差异，但同时也暴露了以西方理性化标准衡量非西方文明的局限性。他的分析提醒我们，在跨文化研究中，必须警惕以单一框架裁剪复杂文明的倾向，而应尊重每种文化自身的逻辑与价值。韦伯的研究既是对中国宗教伦理的一次理论化尝试，也是对西方中心主义的一次无意识印证。他的“理想类型”方法为比较宗教学提供了方法论工具，但其对中国宗教的诠释却深陷西方中心主义的泥沼。然而，正是这种不完美，赋予了《儒教与道教》独特的学术价值——它不仅是中国宗教研究的他山之石，也是跨文化对话的反思镜鉴。这种两面性恰恰构成了学术进步的动力——正如韦伯通过比较宗教学揭示了现代性的文明根源，当代学者亦需在批判性继承中，构建起更具包容性的跨文化对话机制。唯有如此，我们才能在文明互鉴的道路上，真正实现从“误读”到“互鉴”的学术转型。另一方面，韦伯的论点提醒我们，资本主义的兴起并非单一宗教伦理的必然结果，而是多种社会、文化、政治等因素共同交织作用的产物。他的研究促使我们重新审视宗教与经济、文化与制度之间的复杂关系，以及不同文明在现代化进程中所面临的机遇与挑战。

在当代全球化背景下，韦伯的《儒教与道教》依然具有重要的启示意义，它最终指向了一个更为宏大的哲学命题：在全球化日益加深的今天，如何构建一种超越文明隔阂、实现真正平等对话的知识体系？这需要我们不仅具备批判性检视既有理论范式的勇气，更需要拥有在多元文化交汇中保持价值中立、寻求共识的智慧。它提醒我们，在多元文明的对话中，应超越简单的比较与评判，而应深入理解每种文明的独特性与内在逻辑。这种理解不是为了消弭差异，而是为了在差异中发现共通的人类价值与智慧。真正的跨文化研究，不是以一种文明为标准去衡量另一种文明，而是试图在文明的相遇中，发现人类共同的精神追求与存在意义。

《儒教与道教》的学术价值，并不在于提供了关于中国社会的终极答案，而在于其激发的问题意识与思考路径。它是一座通向过去与未来的桥梁，连接着韦伯的时代与我们的时代，连接着西方的理性传统与东方的智慧思辨。我们既能看到韦伯思想的光辉，也能发现其阴影；既能感受到跨文化对话的艰难，也能体会到其深刻的必要性。通过对这部经典的重新审视，我们不仅更深入地理解了韦伯的理论，也更清晰地认识到在多元文明共生的时代，如何以开放与尊重的态度，构建真正平等的跨文化对话机制，这是我们从中汲取的最为宝贵的学术遗产与时

代启示。

参考文献:

- [1] 陈中权. 从《儒教与道教》看马克斯·韦伯对道家的误读[J]. 温州职业技术学院学报, 2015, 15(03): 62-66.
- [2] 顾忠华. 韦伯学说[M]. 桂林: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2004: 91.
- [3] 黄长著, 孙越生, 王祖望. 欧洲中国学[M], 北京: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05: 18-19.
- [4] 苏国勋. 韦伯思想在中国[J]. 学海, 2021, (01): 68-80.
- [5] 孙亦平. “即世而超越”: 论道教的出世与入世——读马克斯·韦伯《儒教与道教》[J]. 深圳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 2011, 28(02): 22-28.
- [6] 陈鼓应. 《庄子今注今译(上册)》(最新修订版)[M], 北京: 商务印书馆, 2007: 88、200.
- [7] 朱熹. 《朱子全书》(第22册)[M]. 上海: 上海古籍出版社, 2002: 1756.
- [8] 何蓉. 《儒教与道教》里的世界与中国[J]. 广东社会科学, 2020, (06): 175-183+259.
- [9] 苏国勋, 黄万盛, 吴飞等. 走出韦伯神话——《儒教与道教》发表百年后之反思[J]. 开放时代, 2016, (03): 11-62.
- [10] 苏国勋. 重读《儒教与道教》[J]. 江海学刊, 2015, (01): 24-42.
- [11] 任剑涛. 张力的存废: 重思儒道互补的韦伯解释[J]. 文史哲, 2025, (02): 5-17+165.
- [12] 何蓉, 何莹. 汉学史视域下的《儒教与道教》: 文本基础、思想框架和方法意义[J]. 世界宗教研究, 2023, (02): 12-23.
- [13] [美]卡尔伯格 (Stephen Kalberg) 著, 张翼飞, 殷亚迪 译. 韦伯的比较历史社会学今探[M], 上海人民出版社, 2020: 108-110.

Dialogue Across Civilizational Tensions: A Critique of Max Weber's Religious Sociological Methodology in The Religion of China: Confucianism and Taoism

Zhao Hanzhang¹

¹ School of Electronic Science and Engineering, Nanjing University, Nanjing, Jiangsu 210023, China

Abstract: Max Weber's *The Religion of China: Confucianism and Taoism* employs a cross-civilizational comparative paradigm to explore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Chinese religious ethics and the rationalization of capitalism. This paper dissects Weber's dialectical analysis of Confucianism and Taoism, unveiling the internal logic of his "religious mentality-economic ethics" causal chain and examining its explanatory framework for modernity. Simultaneously, it critically examines the "Eurocentric" biases inherent in Weber's interpretation and reflects on the limitations of unilateral comparative paradigms. By deconstructing the "ideal type" construct, this study reveals pathways to bridge cognitive gaps between abstract theories and concrete civilizations, offering a philosophical response to transcend civilizational barriers and achieve equitable dialogue in the era of globalization. While affirming Weber's insightful dissection of Chinese social structures and cultural traditions, the research also underscores the historical limitations of his conclusions. It emphasizes the heuristic value of his problematics, providing theoretical support for comprehending the complex tensions between Western modernity and Eastern traditions.

Keywords: Max Weber; *The Religion of China: Confucianism and Taoism*; Cross-Civilizational Comparison; Ideal Type; Eurocentrism

重置小山河：旅迹与虚室的互译——候清诗歌探赜

高若栋¹

(香港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院, 中国 香港 999077)

摘要: 自20世纪以来中国诗学的发展脉络, 主要以欧风美雨的润泽、格物义理的探究、古典精神的回归和自然山水的描摹为四条主线展开, 其中相互涉及影响、对峙和博弈, 从而形成近40年汉诗相对繁盛的局面, 不同年岁的数代文人, 各自引作品为风格的旗幡, 试图丰赡文化版图。候清作为当下诗坛最年轻的一批成员, 写作态势既不同于以“非非”或“莽汉”为代表的口语群像, 也近乎迥异于学院集群所包裹的“知识分子”写作路径, 他以山水自然为道统, 视古典情怀为理论资源, 推动自身语言价值的建构。研究候清的作品及思想谱系, 或将有利于对新生代诗学生态的剖析, 并阐释部分镜鉴价值。

关键词: 当代诗歌; 古典美学; 语言变构; 山水价值

DOI: doi.org/10.70693/rwsk.v1i8.1232

文学发展与先锋意识似乎永久绑定, 语言裂隙和文化脱钩成为长久连缀的问题, 在虚与实的景况更迭、语言系统的复旧或新生、山水的片面化和信息谜语的倾轧之间, 写作在部分维度上成为一种价值之争、主义之辩。眼花缭乱的纸面街衢, 是数年来承载候清推动自身诗歌探索和理论建构的基底, 置身丰饶多源的思想时代, 他的文本既呈现一种针对公共现实的镜鉴, 又倾注才华于单向透明的梦境, 在高山滚石和良夜无边之中, 享受欢欣与危脆交织的“山河”剧幕。

一、语言的回归或摆荡

并不多数的文人具备“倒退”的力量和胆识。这并非技艺水平或思辨能力的单纯退化乃至走向固步自封的境地, 恰好相反, 面临天花乱坠的价值版图与情绪狂飙的未来构想之时, 立足于一种对已知岁月的信赖和根脉意识的确立, 拒绝全然投身宏大的、群体性的潮流开展相对盲目、从众的写作, 保持自身的独立性, 这种智慧曾造就了若干时期分流于主潮之外的好诗。在过去数年的文学生活状态中, 可以清晰窥见候清正具备上述的特征。对于传统文化和文人精神的认同和复归, 是他从写作发轫阶段便彰显的语言取向, 在时下的诗学环境中, 几乎无法搜寻到与之意志类似、腔调同频的侪辈, 沿着时间轴探向往昔, 百年新诗发展历程的“知己”以三段主要版块呈现。距今最近的是1985-2010年代间由“第三代”运动洪峰中演化而出的诸如赵野、杨键等人, 只是前者深爱于恢复某种两宋时代的士大夫气韵, 以及开创和“逍遥”思想高度捆绑的诗学道统, 后者以禅宗思想为根基, 沉浸于极简化的水墨山川之间。相比之下, 候清显然不具备如此浓郁的宗教氛围或特定时期的沉湎感。其次则是1930-1945年代间以闻一多、张君勱、丁文江等为代表的“新格律诗派”先驱, 他们的语言姿态和候清相去甚远, 但堪称致力于通联古典汉诗和近现代新诗价值的奠基者, 客观上为后续的唐湜、杜运燮、穆旦等“九叶派”诸君提供了理论和实践的先导, 继而启迪更后来者。

移居海外的程抱一是一古典美学关照下诗画技艺融汇的典型, 一度旅居域外的北岛则是以“故国残月”的古雅方式寄托思想怀旧情愫的代表, 他们都对候清的诗学观念潜移默化存在影响。台海地区“1949一代”中以周梦蝶、痖弦、余光中等诗人名气颇大, 且脱胎于“蓝星诗社”时代后普遍都怀揣强烈的传统底色, 都在现代乃至后现代主义的西学漩涡中浸泡已久, 不约而同地“似乎是寻求某种中断了的连续性”[1], 重新回归富饶的历史文化中。除此之外, 候清的语言之上还能猎获譬如陈先发、汗漫、欧阳江河的部分影子, 虽然目前的成熟度尚不如前辈宿将, 但气质已有几分抵近。

作者简介: 高若栋(2003—), 男, 香港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院研究员, 中国通俗文艺研究会会员、中国诗歌学会会员, 主要从事中国当代诗学批评及文化思想史研究。

早慧的候清，从时代因素而言是幸运与不幸的混成体。比起郭小川、孙静轩、邵燕祥、蔡其矫等特殊时期的诗人，身处“在统一的政治主调中容留一点点个人情感经验的空间，很快就被视为异类受到批判和迫害”[2]的状态维持写作，候清所坐拥的语言施展自由度和信息环境，无疑是地覆天翻后的开阔，进入李泽厚所谓“再度启蒙契机”[3]的1980年代后，汉语新诗在大陆很快便迎来了第二高潮，1978-1990年代间从“新诗潮”到“知识分子写作”连续诞生并迭变，争鸣之下的诗坛将范式推翻又新建、新建复又推翻。而候清的不幸在于当今诗学生态的权利资源“内循环”为表象的“圈子”问题持续弥漫，无特定背景或丰腴家资的年轻写作者总是面临一堵长城般的南墙阻隔，同时由于候清自身语言体系所呈现的既非学院化，亦非口语江湖化的特性，很难依靠任何一支强有力的流派或群体组织去阐释价值，继而抬高“身价”。他看似柔顺绵蔓的诗歌，实则内里藏锋、骨节分明，在现实诗坛无所襄助的条件下，惟有思想的肌理赋予其撑扶。

诚如陈世骧所言“中国文学传统从整体而言就是一个抒情传统”[4]，历代诗歌以抒情为主要方式，阐述其沉郁顿挫、望洋兴叹、壮怀激烈或闲散静怡的各异画卷，总体造就了古典诗歌美学熔铸一体的遗泽，即细腻、温润的质地，候清的作品几乎对此进行了隔代继承。他善于围绕爱欲和枯萎、腐朽和永恒两项母题展开写作，一面以清丽娟秀或疏朗尔雅的文风推动错位或流动感觉下的物事关系运转，催动和谐美的折射。另一面则以剥夺、抽离为主的语言动态，以隐喻为主的词藻排布完成“枯或必朽性”[5]的阐释，让破碎之美、离乱之美乃至绝迹之美得以呈现。候清的文质彬彬却内含道德使命的语言，长期以针对微观世界的写作而谛听宏大乾坤所承载的命运，纸面上所创造的“小山河”图景，类似于近20年政治哲学领域所热衷的“天下体系”概念内，其中一部插曲或章节。

候清的诗歌以中土传统为根基，但并不对域外诗学价值体系产生排异，相反诸如托马斯·特朗斯特罗姆或注重“生态批评（ecocriticism）”[6]风格的露易丝·格丽克，都在一定程度上影响、涉入着他的诗学观念形成，和语言探索进程。关于中西之间、古典与欧美之间文化系统的甄别、遴选和汲取，候清高度类似王元化在1995年提出“以西学为参照系，而不以西学为坐标”[7]的文学理论研究思想，在充分尊重本位文化主体性地位和价值主干的同时，以客体的姿态接纳更多输入信息，而非以完全置换中国古典诗学统绪为代价投入欧风美雨的怀抱，以哈罗德·布卢姆、皮埃尔·布吕奈尔来替代钟嵘、严羽，以里尔克、叶芝的语言系统为族谱而掏空自《诗经》《楚辞》等汉语诗学的祖产。在处理格物写作和抒情关系上具有经验的候清，在“异化”和“私人化”的凹穴中并不过分斟酌、徘徊，他在公共现实和历史信息、古典审美之间糅合、创造新的谱系为己用。譬如欧阳修或林逋式的诗歌笔触和郭熙、沈括般的艺论，便被他袭仿在身，并以一而生万象，譬如在《青城山》中，他从“爬行的韵脚”和“青霉的扇面”[8]写起，凭借微粒之间的词语和意象设计，完成整幅画面的多位面穿针引线，一虚一实、动静之间将“平地上所不能望见的山水的深度与曲折”[9]有节奏地表露。而《植物园锁记》则在进一步超出了单纯“山”或“景”的范畴，开始以某物/地为锚点，浮游今古、洞悉人情：

午时不知道几刻，看花
戳破叙事的谎言，石板小径外
二十年前，向我驶来
樱花，海棠，木兰安放着脂粉
萤草群，潋滟的橙黄色
止不住眼泪。一切都是流水的世纪[10]

先推倒自身设立的“午时”时间，随之又观赏一段戳破的“谎言”，然后让并不明确出身来历的诸多“花卉”登台抒情，继而谈“眼泪”和“世纪”，用一个庞大和寂寞的意象收尾。细读文本，如欲分辨候清笔端的实际事物和虚构情节，其实无从搜迹，米哈伊尔·巴赫金曾提出的“存在即事件（Being/Existence as Event）”[11]概念被他完整搬挪到了诗的表达上，所有曾经存在、此刻发生以及外“我”之外曾有序进行的诸多元素，都能被统合入事件的箱包内。候清的写作总体以一场掉头、转弯的弧度为概述，先从纷繁喧扰的现代社会中埋入古典的墓冢寻找昔日桃花源，同武陵人对谈、和烂柯人对弈。然后从古雅的时代再度迂曲，开拓一种属于自身的命运化写作，在虚实之间感性压过理性、浪漫略胜真实，对于整体感官的建构一定大于砖石瓦砾上的雕琢，如此的诗歌在中西方诗学体系内似乎都无从有效追索到完美的“祖源”或“替身”，既无法纳入自维吉尔的《农事》以来“描写诗”[12]的范畴，也在客观上和明末虞山一系盛行的“灵心、世运”[13]不能全然相符，呈现继承关系。一种以回归古典为主脉，兼具摆拨向外探索、拓生的气质，凝聚成候清的诗歌。

二、历史的融摄或想象

人文社科领域的学术融合发展趋势，已近乎不可逆的潮流，过去30余年间在“打通文史哲”的理念建设之下，诸细化领域的研究成果呈现出高度共享、启发和互涉的状态，候清堪称此类思想工程的受惠者。他对于生活细节、

情绪微末的体察,和关乎大时代的倾心、历史价值的信赖,彼此结合,从朝代更迭的战火烟云写到江淮船舫外的小桥流水,甚至是枯坐书室之内依托一线窗口,展开对明媚世界或凄风苦雨的想象,都不存在绝对隔断、割裂的诗学锁心。在文字的纯进度、清透质感上,近似于傅元峰、柏桦或沈苇等历经多年悲喜与风霜,自酒桌人情场面和权利博弈棋局中渡过来的恬淡感,有沉舟侧畔重生春色的意趣,所谓“既是历史、记忆和地理、文化层面的,又是心理、语言、修辞、技艺和想象层面的”[14]的诗歌,当如是也。候清在诗体中为历史塑形进而复生,他无意于开展道德教化或伦理的灌输,避开令人沉闷、乏陈的辞令组合,更注重于某种匠心的打磨、视阈的增幅,从桌案前如何写向千里外,又如何为凌驾于生活琐碎的美感创造落地生根的条件,将高踞云端的审美空间,转换为足以和读者同频共呼吸的表达句段。巫鸿曾在考古美术研究中尝试引入的,表现个体或群体的特殊观点和思维方式的“mentali”[15]概念与之颇为接近,候清对图像美术、画面艺术的敏锐感,恰也是支撑诗人走出芸芸人海,得以自风尘寰宇脱颖而出的重要因素。

想象的才华,对于诗人而言堪称消解、融汇历史信息的关键。在“知识主(subject)与知识对象(object)”[16]的对立之间,如何动态的求取并保持一项平衡,并不容易实现。稍有不慎即是对语言阅读美、可读性的牺牲,以此换取内容意涵的丰饶;或针对文本结构的消磨,为了将叙事的场面尽数铺开,不至于过分单薄。所举两例,皆是汉语百年新诗发展史上所积淀的经验与教训,取与舍似乎成为大多数文人必须面对的抉择,窄门之外惟有遗憾千行。候清显然不愿顺从此等规训和旧疾,最终在写作中实现了“得兼”的价值成果,如明代学者项穆以“中和”来概括书法的艺术特质一般,所谓“千形百状,不过曰中和”[17]的逻辑,直指古典时代的中国最源远流长和深邃丰裕的美学思想,由先秦诸子百家所融汇,秦汉以来儒道两家又在多方位走向合流,加之魏晋时代第二次佛学大规模传入(以鸠摩罗什为代表),儒道释三宗的相互纠缠、补充与整合造就了自然超脱、克己复礼、受想行识所综合的价值体系。候清几乎不专治美学、思想史领域,但传统文化所拥聚的强大“介入”能力,早已潜移默化地滋润了他的诗歌。

山水与自然的关怀,作为候清文学思想终极的底色,长期驱动阅读谱系、诗学观念和文本风格的成长,乃至为其贡献了诸如“植物诗人”或“花卉诗人”(源自文林好友张润泽、陈生平等)的戏称。候清的诗歌创作几乎与关怀的价值存在孪生关系,或是针对旧时人或事的叹惋、悲慨,他写杜甫去日苦多,昼夜之间已然两鬓生白,命运使其愈发频繁从虚室中攫取词语,以抵抗周身的贫乏、拱卫生存的意志,甚至在纸稿上,可以视生辰如祭辰,目送一个去年的文人,抱憾而终。或是对于完整的时代或母语的眷念,在部分崇敬古典的诗人眼中“汉语新诗自诞生以来,其表里即在不断地衰落”[18],候清虽不曾爆发尖锐的批评或哀叹,但他的诗歌文本却在为内心的激荡隐约证道。诚如长期勘考近现代华语文学的王德威在2010年代所言的,文学场域“挟洋以自重的姿态早已过时”[19],近乎二百年的西学东渐浪潮已经逐退化,且在未来大概率彻底变革为平等尊重、文明对话的局面。但当今的汉语诗人们却不得不面临一种彷徨乃至失措,古典价值虽与当代文脉关系深切、一以承之,但遥远的文本生态和社会形态距离此刻的中国未免相差巨大,当代的诗学面临着从农耕文明向现代文明的转型,从精英文人执掌或垄断纸面话语权的时代,向更沉降于基层、社会参与面更为宽阔和纵深的全民文学时代转型。李元胜曾感慨“我们的背景是非常模糊的,需要一边写作一边建立背景”[20],候清在关怀思想的指引下,正投身于“背景”建设和丰盈化的历程。

地缘性写作与候清之间存在原生思想上的隔阂,不同于胡弦、梁平、叶舟、蒋立波等老牌名家,擅长围绕家乡、定居或长期旅居地,而展开一种贯穿地缘历史、古典文化、当代社会之间的诗歌活动,无论是《重庆书》《大敦煌》亦或是《运河活页》《蜀道辞》都彰显着候清难以具备的乡梓情怀、史料功底和宏大及多层次空间与时间的叙述驾驭能力。因此候清的诗歌往往客观上无法锁定、主观上也不愿拘泥于一处城郭或古迹,他以丰沛的想象力和阅读基础,站立于前人肩头之上,创造超出固定地缘的概念,以思想的发散、虚构的让渡和一定程度上信息的“模糊化”或“魔幻化”处理,来完成写作。譬如山林传统在六朝时期初步建立,基本完成了从“岩穴之隐向林泉之隐的转变”[21],候清对于“隐”的价值充分挖掘,谢朓式的圆美流转、王维式的无为空寂,都成为所能借鉴或化用的诗学资源。在较长篇幅的作品内,移步换景和人景分离成为惯用的技巧,这近似美国机能主义心理学所谓“stream of consciousness”的效果,但本质的根系实则维持在古中国山水诗的熏陶中,淡化景物局部的勾勒描摹,从而在具体部位“避免身在山中见木不见林的观览方式”[22]发生。而在完整诗学系统中,注重“互译”的价值运动,从人与生态、世俗与超然、明堂与暗室、星斗与雾埃等板块不断以探讨、反射和阐化等举措,实现个人意志、命运的抒发,抵近“澄怀观道”的古老概念,对文本中主客体交融升华、互鉴和互显的效用,直击古典艺术内“气韵生动与时空玄远之幽思”[23]的要旨。

在无需商榷的闲静风度之外,还存有一种悲悯,始终缠绕于候清笔迹。研究他的诗境无法忽视这种近似“母港”概念的思想装置,在守序与自由的博弈之际、现实紧张与理想松弛之间,呈现出两端或多端交织的轴心点。候清年少,以至于需要岁月洗炼才可得的温柔敦厚的风貌,出现在他连篇的文本中时,不免令人诧异,原来中国传统美学“包容怀纳”的特性长期统摄着他的创作之路。早在30余年前,陈超曾向中国当代诗坛发出过一道令人深省而难以应声的疑问,即“如何在自觉于诗歌的本体依据、保持个人乌托邦自由幻想的同时,完成诗歌对当代题材的处理,对当代噬心主题的介入和揭示?”[24]诸流派出身各异的诗人、学者都曾致力于贡献高分的答卷,实现个人的诗艺抱负,长久以来,悬上匾额或落魄而归的名字不胜枚举。而今台阁又换新人,同一章考题掸落积尘,递入候清的案上。

参考文献:

[1] 耿占春. 退藏于密[M], 陕西: 陕西人民教育出版社, 2015: 34-35.

- [2] 陈超. 汲取与掣肘——当代诗歌批评与文学（诗歌）史写作[J]. 燕赵学术 2011(2):88-96.
- [3] 郭萍. 当代中国哲学的情感主体理论——以李泽厚、蒙培元为中心[J]. 清华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4(3):, 155-167.
- [4] 陈国球, 王德威. 抒情之现代性: “抒情传统”论述与中国文学研究[M]. 北京: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2014:5.
- [5] 耿占春. 恍惚之思, 其中有道——读陈先发近作札记[J]. 扬子江文学评论 2025(1):第 16-26.
- [6] 包慧怡. 格丽克诗歌中的多声部“花园”叙事[J]. 外国文学研究 2021(1):51-63.
- [7] 胡晓明. 万川之月: 中国山水诗的心灵境界[M]. 上海: 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2020:252.
- [8] 侯清. 青城山（组诗）[J]. 西府 2024(1):41-42.
- [9] 徐复观. 中国艺术精神[M]. 北京: 九州出版社, 2020:398.
- [10] 侯清. 植物园锁记[J]. 诗词报 2025(8):16.
- [11] 江马益, 周媛媛. “文学作为事件”: 巴赫金文艺美学思想的新维度[J]. 福建论坛（人文社会科学版）2025(6):, 84-96.
- [12] Chris Fitter. Poetry, SpaceLandscape: Toward A New Theory,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5, pp.42-43.
- [13] 葛永海. 情理通融与灵心雅致: 论吕祖谦的诗歌创作[J]. 浙江社会科学 2013(7):137-142.
- [14] 霍俊明. “诗路之诗”与空间诗学——读沈苇诗集《水上书》[J]. 文学报 2025(7):11.
- [15] 巫鸿. 天人之际: 考古美术视野中的山水[M]. 北京: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2024:61.
- [16] 夏中义. 重读克罗齐——从美学原理到《美学纲要》[J]. 华东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8(6):135-152.
- [17] （明代）项穆. 书法雅言[M]. 浙江: 浙江人民美术出版社, 2012:41.
- [18] 杨键. 长江水[M]. 江苏: 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 2021:3 页.
- [19] 王德威. 现当代文学新论: 义理·伦理·地理[M]. 北京: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2014:56.
- [20] 李元胜. 无限事[M]. 重庆: 重庆大学出版社, 2018:46.
- [21] 程磊. 唐代的山林传统与隐逸精神价值蛻嬗[J]. 长江学术 2025(4):78-89.
- [22] 魏耕原. 谢朓山水诗审美时空的拓展[J]. 文学遗产 2001(4):121-123.
- [23] 沈沫. 论中国古典美学的理论演进——以文人绘画为例[J]. 哲学研究 2025(3):159-171.
- [24] 王晓平, 夏冬. 主体形塑与形式生成的诗学探究——评吴晓东《辽远的国土: 中国新诗的诗性空间》[J]. 现代中文学刊 2024(5):151-159.

Resetting Xiaoshan River: The Mutual Translation between Travel Traces and Emptied Rooms-- Exploring the poetry of Hou Qing

Gao Ruodong¹

¹ Hong Kong Academy of Humanities and Social Sciences, Hong Kong 999077, China

Abstract: The development trajectory of Chinese poetics since the 20th century unfolds primarily along four main lines: the nourishment of European and American influences, the exploration of material and philosophical principles, the return to classical spirit, and the depiction of natural landscapes. These threads interact, confront, and engage in a game of give-and-take, culminating in the relative prosperity of Chinese poetry over the past four decades. Several generations of literati, spanning different ages, have each adopted works as their stylistic banner, attempting to enrich the cultural landscape. As one of the youngest members of the current poetry scene, Hou Qing's writing style differs from both the colloquial group represented by "non-non" or "brutal man" and the academic cluster's "intellectual" writing path. He embraces natural landscapes as the orthodoxy, regards classical sentiment as theoretical resources, and promotes the construction of his own linguistic value. Studying Hou Qing's works and ideological lineage may facilitate the analysis of the ecology of the new generation of poets and elucidate some of its mirror-like values.

Keywords: Contemporary poetry; classical aesthetics; language transformation; landscape value

《酒诰》与《酒德颂》中“酒德”之对比研究

张晔¹ 周锐¹

(1.西南科技大学, 四川 绵阳 621000)

摘要: 酒作为生活调剂品具有丰富的文化意味, 而现当代的饮酒文化与古代饮酒精神密切相关。通过探索古代饮酒观的思想来源和历史背景有利于加深对现当代酒文化的进一步理解、展示酒中中国文化的传承和发展。周公和刘伶是中国古代著名的历史人物, 由于政治、文化、个体性格等因素, 他们对酒的看法和态度截然不同, 但这种不同又在当代酒文化中和谐共存。

关键词: 酒文化; 周公; 刘伶; 中国文化

基金项目: 西南科技大学研究生创新基金资助 (CXJC202411)

DOI: doi.org/10.70693/rwsk.v1i8.1231

中国的酒文化不可谓不丰富。自仪狄、杜康造酒以来, 酒就是文人政客嘴中常吟的角色。但酒与醉的连带关系使得不同时期的古人对酒的态度有了区别。周公旦在《酒诰》中将酒视为礼仪象征与工具, 认为过度饮酒是政权的洪水猛兽, 强调控“酒”, 讲究节制。而“七贤”之一的刘伶则与周公的观点截然不同, 在他看来, 酒与醉酒不再是一种羞耻, 而是解放束缚, 回归本我的解药。基于两者不同, 本篇将讨论其背后隐藏的历史原因, 揭开周与魏晋的浓烈酒香。

一、酒在文字中

《酒诰》出自《尚书·周书》, 其作者周公旦是周文王的第四子, 封邑于周。周公是杰出的政治人才, 曹操曾在其诗作中写道“周公吐哺, 天下归心”, 可见在统治者眼里周公是礼贤下士、治国有方的典型和榜样。《酒诰》是时任摄政王的周公写给弟弟康叔的治理法则之一, 被今人看作是中国历史上第一篇禁酒令。

《酒诰》中的很多语句都明确的提出了当权者对“喝酒”的政策管控。

从政策的延续性看, 周公在《酒诰》中提到, 文王在位时, 就曾提出“饮酒”规范, 如在饮酒场合或时间方面, 文王就提出了“祀兹酒”“惟元祀”才饮酒的限制。而文王除了在“饮酒”场合和时间的限制之外, 对饮酒的频率也进行了约束, 即“无彝酒”, “彝”在此处是“经常”的意思, 文王认为不能把饮酒作为一种日常行为。除此之外, 文王还主张“德将无醉”。因此在周公之前, 周朝就已经有了“祭祀才饮”、“不经常喝酒”、“不要醉酒”的饮酒束令, 周公于是在此基础上对禁酒进行发展。

周公的补充则更为详细, 比如在饮酒场合一事上, 他根据对象的不同提出了不同的限制。如对百姓, 需在农事已毕、贸易完成、赡养父母之后, “厥父母庆”便可设宴饮酒。而对官员, 则需忠君敬老, 便可“饮食醉饱”。但周公对于官员的饮酒还是格外严苛, 他将限制饮酒与为官生涯结合在一起, 同时对“贤臣、能臣、近臣”下达“刚制于酒”也就是强制戒酒的戒令, 对官员进行了政治约束。在未饮酒时周公便有如此告令, 在“违规”饮酒之后他也更是惩罚分明。周公对于饮酒的态度无疑是严肃的, 尤其群聚饮酒在周公眼里就是不可饶恕的罪恶, 应该逮捕起来送到周, 然后“予其杀”。但处于政治考量, 殷的旧臣若饮酒, 周公还是秉承先劝告教导的态度, 但若有人还是屡教不改, 就只有同前者一样处以死刑了。

《酒诰》一文是周公汲取前朝经验、先贤观点、个人思考而凝聚出的思想结晶, 全文围绕“饮酒”这一主旨, 从饮酒的弊害、周王室一贯的观念、对饮酒的态度和处理等方面详细论述了“禁酒”的可行性和必要性, 具有浓厚的政治性, 展现出周公卓越的政治眼光。同时, 正是由于本篇的作用和目的明显, 因此“酒”的形象也十分清晰, 与现在人们“饮酒消遣”的态度不同, 对于周公来说, 酒更多是一种需要严加控制的礼仪工具。

而时间来到魏晋, 酒在文本中又有了崭新的意义。

《酒德颂》是一篇极具魏晋风骨的骈体小文。作者刘伶与嵇康、阮籍等友善, 为“竹林七贤人”之一, 也是中国历史上与酒联系最为紧密的人物之一。史载刘伶嗜酒, “常乘鹿车, 携一壶酒, 使人荷锺而随之, 谓曰: ‘死

作者简介: 张晔(2000—), 女, 硕士研究生, 研究方向为中国文学, 跨文化;

周锐(2000—), 女, 硕士研究生, 研究方向为中国文学, 跨文化。

便埋我”。在魏晋名士众多逸事中，刘伶的形象始终独树一帜。他既是“竹林七贤”中最具浪漫逸趣的一位，也是那个时代清谈风气的缩影。《晋书·列传十九·刘伶》载其：身長六尺，容貌甚陋。放情肆志，常以细宇宙齐万物为心。澹默少言，不妄交游，与阮籍、嵇康相遇，欣然神解，携手入林。初不以家产有无介意。他的《酒德颂》，虽名为“颂”，却不只是对酒的歌颂，更是他对人生观、处世态度的一次尽情表达。文中虚构了两个截然不同的人物群像，一边是把喝酒当作人生头等大事的“大人先生”，洒脱不羁、饮酒为乐、无视世俗；另一边是那些讲究身份与规矩的“贵介公子，搢绅处士”，谨小慎微、受礼教束缚，不敢有丝毫越矩之举。刘伶看似在颂酒，实则是借酒发声，不仅是对那些虚伪礼教的批判，同时也是为美酒与饮者正名。因此，酒的侠义之风、直率之气在这段时期有了更好的展示，酒不再是需要克制、收敛甚至回避的“双刃剑”，反而是向外呼喊的、释放自我的缺口。

二、酒的罪与德

过度饮酒往往被打上了“祸国”的烙印，成为国家的亡音，《夏书》中就有“其二曰：‘訓有之：內作色荒，外作禽荒。甘酒嗜音，峻宇彫牆。有一于此，未或不亡’”的观点，认为不加节制的饮酒同贪恋女色、生活奢侈等一样是亡国的预兆。同时王君“过度饮酒”有时也会成为被讨伐的理由，如胤侯出征伐羲、和二氏之前誓师词中就曾说明讨伐原因，即“胤侯命掌六师羲和废厥职，酒荒于厥邑。胤后承王命徂征”。到了殷商王朝，“过度饮酒”的弊处更加明显，统治者的沉湎于酒使官员和百姓都不安于国家前途：“天毒降灾荒殷邦”，我们的君王不节制于酒是天神降下的灾祸，天要灭亡殷商。这时过度“饮酒”已与天命相连，改朝换代已经有了理由和必要。确实，“酒”在商朝灭亡的条件中十分突出，在很多作品中“沉湎于酒”是商纣王荒淫暴政的典型代表，比如《荡》中就以文王的口吻细数了纣王的“罪行”，其中就提到了“天不湍尔以酒”。除此之外《史记·殷本纪》也描绘了纣王“以酒为池，悬肉为林，使男女裸相逐其间，为长夜之饮”的荒淫生活。

正是因为这些“前车之鉴”，节制“酒”就成了周公心中必须遵循的治国大策，酒甚至成为了禁令严苛的“爆炸物”。

此外，从《酒诰》一文中也可发现，在这一时期“酒”和“祭祀”一事有着莫大的关联。“祭祀”是每朝每代都极为重视的仪式，古代帝王除了祭祀家庙等，还会进行封禅等耗资巨大的祭典仪式。尤其《左传》还提出了“国之大事，在祀与戎”的观点，将“祭祀”之事与军事相提并论，使其成为国家兴亡的一种象征。而“酒”是祭祀中不可缺少的一部分，“祭以清酒，从以騂牡，享于祖考”《小雅·信南山》中就记载了周王室祭祖祈福时已将清酒作为必要祭物。同时“酒”与“礼”的密切相关还有一个重要证物——酒尊。“尊，酒器也”，尊是一种大的盛酒器，现存青铜尊包括四羊方尊、晋侯鸟尊、酗亚方尊等，尊体带有铭文，铭文多与祭祀礼仪有关，不难看出尊也是青铜礼器的重要组成部分，其用途具有强烈的宗教、政治色彩。所以，酒对于封建统治者来说本身就具有极大的政治性代表性，再结合历史因素，对其严加管控也就不足为奇。

而魏晋时期醉酒又成为一种潮流。不仅因为吃药与喝酒的流行，更是因为政权更迭迅速，政局动荡，促进了人们个体自我意识的觉醒，酒与现实人生的结缘日趋紧密。曹操“对酒当歌，人生几何”，陆机“来日苦短，去日苦长”，第一次提出了酒与人生价值的思考。“何以解忧，唯有杜康”，百姓为逃避祸患，又有了借酒浇愁的习惯。正如文章所写“先生于是方捧罍承槽，衔杯漱醪……兀然而醉，豁尔而醒。”酒在文中不只是饮品，更是一种寄托、一种精神工具。饮酒成了抵御现实、获得片刻超脱的手段。醉态中“无思无虑”、“不觉寒暑”、“不闻雷霆”、“不睹泰山”，更是对现实的主动屏蔽。

三、酒中的儒、道之意

周公与儒家的联系颇深，孔子就曾经用“‘甚矣吾衰也！久矣吾不复梦见周公’来鞭策、自勉。《尚书·大传》说：“周公摄政，一年救乱，二年克殷，三年践奄，四年建侯卫，五年营成周，六年制礼作乐，七年致政成王”，周公是儒家讲究的仁、义、礼、智、信“五常”道德标准中“礼乐文化”的奠基人。孔子对于周代礼仪制度十分推崇，“周监于二代，郁郁乎文哉！吾从周”，周公时期的礼教文化对后世儒教“礼”的构建具有深厚的影响和奠基作用。

虽然政治局面已然变化，但对于酒，孔子的态度与周公基本一致。“唯酒无量，不及乱”、“不为酒困”，孔子认为饮酒虽然没有定量，但需量力而行，以不失态为饮酒标准。孔子的饮酒观同样涉及到“节制、克制”的主旨，讲究保持清醒，不失礼节。同时，孔子还对饮酒文化作出了规定和阐述，比如“乡人饮酒，杖者出，斯出矣”，这就是饮酒场合中尊老习俗的具体阐释。从这些记载中我们就可以发现，周公与孔子在“酒德”一事上都秉持“节制、克己”的观念，但周公具有更强的政治束缚力，而孔子强调自我把控、自我节制。

从汉朝开始，儒家思想逐渐成为主流，“礼”也成了士大夫和读书人最重要的价值观。对他们来说，遵守教义和礼法是一种基本的精神追求。然而，由于魏晋时期，社会政治黑暗，雄心壮志在现实中无法实现，人们只能放弃理想转而追求人性的最大自由，于是许多文士转而消极避世，企慕羽化登仙，加之玄学思想的盛行。像刘伶这样的人物和他们提倡的思想便应运而生，成为对主流观念的一种反抗。比如喝酒这件事，在传统士人看来，必须按照各种礼节来进行，称之为“守礼”。但在刘伶眼中，那些所谓的“礼”不过是虚伪的规则，是对人性自由的压抑。“唯酒是务，焉知其余？”刘伶借“酒”来象征一种摆脱礼法约束、追求自由解脱的生活状态。“以天地为一朝，以万期为须臾”“幕天席地，纵意所如”体现“天地与我并生，万物与我为一”的庄子思想。“止则操卮执觚，动则挈榼提壶”，刘伶将“饮酒”日常化，彻底“唯我独尊”地活在自己的节奏里，不在乎世人目光。正如《世说新语·任诞》载：“刘伶恒纵酒放达，或脱衣裸形在屋中，人见讥之。伶曰：‘我以天地为栋宇，屋室为狄拢诸君何为入我抵校俊’”。刘伶不是不知道世俗的规则，而是他选择不认同。他不是“无知者无畏”，而

是“看穿者不屑”。他“以天地为栋宇，屋室为狄拢”，他眼中所谓的“家”不是房舍，而是天地本身。他并不是一个纯粹意义上的“酒徒”。他在醉酒的状态里，无不彰显出自己的政治主张和个性，也无不彰显和体味着他所推崇的老庄思想。他是一位在醒中醉，又在醉中醒的历史人物。

四、现代酒杯中酒的节制和放纵

节制和放纵是周公和刘伶的酒中形象，如今这两者矛盾又和谐的共存于当代酒文化中。

中国当代酒桌文化是酒文化的典型代表，酒桌礼仪又是酒桌文化中不能忽视的重要部分。而从行为上看，节制和克制就藏在这一系列的礼仪之中。当代宴会如古代一般，酒都是其中的必需品，若无酒则显得不够正式。此外，酒在宴会中的作用除了佐餐清口之外还承担着开宴、引起话题等社会性功能，若无酒则对话的开启就显得稍许僵硬。因此，备酒是当代宴会准备的必要工作，而与此同时，酒类的选择、酒的份量、酒杯的选择、倒酒的多少等都是大型正式会议不得不认真考虑的部分，中规中矩，不破例，不唐突。而在当代，酒虽不必与政治的覆灭产生关系，但该有的限制也绝不少，比如在交通管理方面，我国对酒驾有着严格限制，一旦饮酒驾车将会面临严重处罚。同时，随着医学研究和社交媒体的不断发展，过度饮酒对大脑、心血管等身体器官的直接影响被人所熟知，出于对身体的考虑，饮酒也有了新的控制线。

而放纵与酒脱则是当代酒文化的另一面。刘伶崇尚饮酒，就是得意于寄情，酒中逍遥千古以来被众多文学作品记录、传诵，如“白日放歌须纵酒”，又如“何以解忧、唯有杜康”。当代社会压力激增，饮酒变成了一种唾手可得的排遣方式。酒类在中国的售卖并不受限，除了未成年人之外，多数人能够选择到一种心仪的酒类，而酒的品牌也数不胜数，中国各省基本都有属于本省的酒类企业。同时，酒也常常配有“轻松、愉快”的光环，啤酒节、酒馆街、酒吧等新的社会娱乐场所逐渐成为年轻人聚会、娱乐的第一选择。

参考文献：

- [1] 尚书·酒诰[M].十三经注疏.北京：中华书局.1987.
- [2] 礼记·乡饮酒义[M].长沙：岳麓书社.1989.
- [3] 晋书·卷四十九·列传：第十九[Z].北京：中华书局.
- [4] 刘义庆,著.世说新语[M].北京：沈海波,评注.北京：中华书局,2007.
- [5] 曹础基,著.庄子浅注[M].北京：中华书局,2014.
- [6] [唐]房玄龄.晋书[M].卷一百一十二.北京：中华书局点校本.1974.
- [7] [汉]许慎.说文解字·酉部[M].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台北：台湾地区商务印书馆.1986.
- [8] 王守国著，酒文化中的中国人[M]，河南人民出版社，1990.
- [9] 韩胜宝编著.华夏酒文化寻根[M].上海科学技术文献出版社，2003.

A Comparative Study of ‘Alcohol Virtue’ in *Jiugao* and *Jiudesong*

Zhang Ye¹, Zhang Ye¹

¹ Southwest Universit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Mianyang, Sichuan 621000, China

Abstract: As a complement to daily life, alcohol carries rich cultural significance, and contemporary drinking culture is closely linked to the drinking ethos of ancient times. Exploring the intellectual roots and historical context of ancient views on alcohol helps deepen our understanding of modern drinking culture and reveals the inheritance and evolution of Chinese culture through alcohol. Zhou Gong and Liu Ling were renowned historical figures in ancient China. Shaped by political, cultural, and personal factors, they held vastly different perspectives and attitudes toward alcohol—yet these differences coexist harmoniously within today’s drinking culture.

Keywords: Alcohol Culture ; Zhou Gong ; Liu Ling ; Chinese Culture

魏晋南北朝时期志怪小说中的鬼魅形象研究

史劲涛¹

(1.马来西亚新纪元大学学院, 马来西亚 加影 43000)

摘要: 本文旨在全面而深入地探讨魏晋南北朝时期志怪小说中鬼魅形象的塑造特点、文化意蕴及社会影响。魏晋南北朝, 一个社会动荡、政治分裂而文化交融的时代, 其志怪小说作为当时文学的重要分支, 以其独特的鬼魅形象塑造, 不仅展现了这一时期的宗教信仰、哲学思潮及审美趣味, 还对后世文学与文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通过对《搜神记》、《述异记》等代表性志怪作品的分析, 本文揭示了鬼魅形象如何超越人类常态, 以形态多样、行为诡异、情感丰富及象征隐喻等特点, 深刻反映当时社会的复杂性与多元性。同时, 这些鬼魅形象还蕴含着丰富的文化意蕴, 体现了道教、佛教等宗教思想的融合, 映射了魏晋玄学、佛教因果报应等哲学思潮, 折射了人们对生死、命运等问题的社会心理, 并展现了从恐怖到奇异再到富有诗意的审美趣味变迁。本文进一步探讨了鬼魅形象对后世文学创作、民间信仰形成、社会文化心理塑造及艺术表现创新等方面的社会影响, 强调其在文学、文化乃至社会心理领域的多维度价值。通过对魏晋南北朝时期志怪小说中鬼魅形象的深入研究, 本文为理解该时期社会文化特征及其后世影响提供了新的视角^[2]。

关键词: 魏晋南北朝; 志怪小说; 鬼魅形象; 宗教信仰; 哲学思潮; 审美趣味

DOI: doi.org/10.70693/rwsk.v1i8.1309

一、引言

魏晋南北朝时期, 是中国历史上一个政治分裂、社会动荡而文化交融的特殊时期。在这一背景下, 志怪小说作为一种独特的文学形式应运而生, 以其丰富的想象力和独特的叙事手法, 展现了当时社会的种种奇异现象和人们复杂的精神世界。志怪小说中的鬼魅形象, 作为这一文学体裁的重要组成部分, 不仅以其形态多样、行为诡异、情感丰富等特点吸引了广大读者的目光, 更以其深刻的文化意蕴和社会影响, 成为研究魏晋南北朝时期社会文化的重要窗口。

魏晋南北朝时期, 社会动荡不安, 战乱频繁, 人们生活在这种充满不确定性和恐惧的环境中。这种社会环境促使人们更加关注超自然现象和神秘力量, 从而为志怪小说的兴起提供了肥沃的土壤。同时, 这一时期的文化交融也为志怪小说的发展注入了新的活力。道教、佛教等宗教思想的传播, 魏晋玄学、佛教因果报应等哲学思潮的兴起, 以及人们对生死、命运等问题的深刻思考, 都为志怪小说中的鬼魅形象塑造提供了丰富的素材和灵感。

二、魏晋南北朝志怪小说概述

魏晋南北朝时期的志怪小说, 以其独特的想象力和丰富的故事情节, 展现了当时社会的种种奇异现象和人们的内心世界。这些作品不仅数量众多, 而且风格各异, 共同构成了这一时期文学的重要组成部分。

《搜神记》是魏晋南北朝时期志怪小说的代表作之一, 由东晋干宝所著。该书广泛搜集了民间传说、神话故事和历史逸闻, 通过丰富的想象力和细腻的笔触, 塑造了一系列形态各异、性格鲜明的鬼魅形象。这些鬼魅形象不仅形态多样, 而且行为诡异, 既有善良可爱的精灵, 也有凶猛恐怖的恶鬼, 充分展现了当时社会对超自然现象的丰富想象和深刻认识^[2]。

《述异记》是南朝梁代任昉所著的志怪小说集, 该书同样以搜集奇异故事为主, 涉及神仙鬼怪、异物奇闻等多个方面。与《搜神记》相比, 《述异记》在鬼魅形象的塑造上更加注重情感表达和人性揭示, 通过细腻的心理描写和生动的情节安排, 使读者能够更加深入地了解这些鬼魅形象的内心世界和复杂情感。

除了《搜神记》和《述异记》外, 魏晋南北朝时期还有许多其他优秀的志怪小说作品, 如《幽明录》、《齐谐记》等。这些作品在内容和风格上各有特色, 共同构成了这一时期志怪小说的丰富宝库。

三、鬼魅形象的塑造特点

魏晋南北朝时期志怪小说中的鬼魅形象, 以其独特的塑造特点成为这一时期文学的重要特征之一。这些鬼魅形象在形态、行为、情感和象征意义等方面都展现出了超越人类常态的奇异性和复杂性。

作者简介: 史劲涛 (1998—), 男, 马来西亚新纪元大学学院, 学士, 中国语言文学系。

1. 形态多样，超乎寻常

魏晋南北朝志怪小说中的鬼魅形象，在形态上往往超越人类常态，展现出奇异而多样的特征。这些鬼魅形象有的具有人类的外形，但身体部位却发生了奇特的变异，如头部巨大、四肢细长或眼睛凸出等；有的则完全脱离了人类的形态，呈现出兽类、鸟类或其他神秘生物的特征。这种形态上的多样性不仅增强了故事的奇幻色彩，也反映了当时人们对超自然现象的丰富想象和深刻认识。

2. 行为诡异，善恶并存

在行为方面，魏晋南北朝志怪小说中的鬼魅形象往往表现出诡异而复杂的特征。它们既有恶行也有善举，既可能对人类构成威胁，也可能成为人类的保护者。例如，一些恶鬼会残害人类、制造灾难，而一些善良的精灵则会帮助人类解决困难、实现愿望。这种善恶并存的行为特征，不仅增加了故事的复杂性和趣味性，也反映了当时社会对人性复杂性的深刻认识。

3. 情感丰富，具有人性

魏晋南北朝志怪小说中的鬼魅形象，在情感表达上也具有人性化的特点。它们不仅能够感知人类的喜怒哀乐，还能够与人类产生情感共鸣和互动。例如，一些鬼魅会因为人类的善良和关爱而感动落泪，也会因为人类的恶意和冷漠而心生怨恨。这种情感丰富的特点，使得鬼魅形象在故事中更加立体和生动，也增强了读者对它们的同情和理解。

4. 象征隐喻，寓意深远

除了形态、行为和情感方面的特点外，魏晋南北朝志怪小说中的鬼魅形象还具有深刻的象征隐喻意义。它们往往被用来隐喻社会现实或人生哲理，通过夸张和变形的手法，揭示出隐藏在现象背后的本质和真相。例如，一些恶鬼和怪物可能象征着社会的黑暗和邪恶力量，而一些善良的精灵和神灵则可能代表着人类的希望和信仰。这种象征隐喻的手法，不仅增加了故事的深度和内涵，也反映了当时人们对社会现实的深刻思考和批判。

四、鬼魅形象的文化意蕴

魏晋南北朝时期志怪小说中的鬼魅形象，不仅具有独特的塑造特点，还蕴含着丰富的文化意蕴。这些文化意蕴反映了当时社会的宗教信仰、哲学思潮及审美趣味等多个方面。

1. 宗教信仰的体现

魏晋南北朝时期是中国宗教信仰发展的重要阶段，道教、佛教等宗教思想在这一时期得到了广泛的传播和融合。这种宗教氛围对志怪小说中的鬼魅形象塑造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一方面，道教中的神仙鬼怪等元素被大量引入志怪小说中，成为鬼魅形象的重要来源之一；另一方面，佛教中的因果报应、轮回转世等思想也在鬼魅形象中得到了体现。例如，《搜神记》中就有许多关于神仙鬼怪的故事，这些故事不仅展现了道教神仙世界的奇异和神秘，也反映了当时人们对长生不老、羽化登仙等道教信仰的向往和追求。同时，《述异记》等作品中也有许多关于佛教因果报应的故事，通过鬼魅形象的塑造和情节的安排，揭示了佛教思想对当时社会的影响和渗透。

2. 哲学思潮的映射

魏晋南北朝时期也是哲学思潮发展的重要阶段，魏晋玄学、佛教哲学等思想在这一时期得到了广泛的传播和深入的发展。这些哲学思潮对志怪小说中的鬼魅形象塑造同样产生了重要的影响。一方面，魏晋玄学中的“贵无”思想、“言意之辨”等哲学观念被引入志怪小说中，成为鬼魅形象塑造的重要思想基础；另一方面，佛教哲学中的“缘起论”、“中道观”等思想也在鬼魅形象中得到了体现。例如，《搜神记》中的一些鬼魅形象就具有超越现实、追求真理的哲学意味，反映了当时人们对宇宙本质和人生意义的深刻思考。同时，《述异记》等作品中也有一些关于佛教哲学的故事和隐喻，通过鬼魅形象的塑造和情节的安排，揭示了佛教哲学对当时社会思想的深刻影响^[7]。

3. 社会心理的折射

魏晋南北朝时期的社会动荡不安，战乱频繁，人们生活在这种充满不确定性和恐惧的环境中。这种社会环境对人们的心理产生了深刻的影响，也反映在志怪小说中的鬼魅形象塑造上。一方面，人们对超自然现象的恐惧和敬畏被转化为对鬼魅形象的描绘和想象；另一方面，人们对生死、命运等问题的思考和担忧也被融入鬼魅形象的故事情节中。例如，《搜神记》中就有许多关于生死轮回、命运无常的故事，这些故事不仅展现了当时人们对这些问题的深刻认识和理解，也反映了他们对生命意义的追求和对死亡的恐惧。同时，《述异记》等作品中也有一些关于人间善恶、道德伦理的故事和隐喻，通过鬼魅形象的塑造和情节的安排，揭示了当时社会对道德伦理的深刻思考和批判。

4. 审美趣味的变迁

魏晋南北朝时期也是审美趣味发生重要变迁的时期。随着社会的动荡和文化的交融，人们的审美观念逐渐从

传统的儒家美学转向更加多元和开放的审美趣味。这种审美趣味的变迁也反映在志怪小说中的鬼魅形象塑造上。一方面,鬼魅形象的形态和特征变得更加多样和奇特,满足了人们对新奇和刺激的追求;另一方面,鬼魅形象的故事情节和情感表达也变得更加丰富和细腻,体现了人们对情感和内心世界的关注。例如,《搜神记》中的一些鬼魅形象就具有浓郁的神话色彩和奇幻元素,展现了当时人们对神秘和奇异的审美追求。同时,《述异记》等作品中也有一些关于情感和道德的故事和隐喻,通过鬼魅形象的塑造和情节的安排,揭示了当时社会对情感和道德的深刻思考和关注^[11]。

五、鬼魅形象的社会影响

魏晋南北朝时期志怪小说中的鬼魅形象,不仅具有独特的塑造特点和丰富的文化意蕴,还对后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这些影响体现在文学创作、民间信仰、社会文化心理及艺术表现等多个方面。

1. 文学创作的启发

魏晋南北朝时期的志怪小说,以其丰富的鬼魅形象为后世文学创作提供了不竭的素材与灵感。这些鬼魅形象不仅形态各异、性格鲜明,而且背后往往蕴含着深刻的社会寓意和道德观念。它们激发了后世作家的想象力,使得鬼魅元素成为文学创作中一个重要的组成部分。

在唐代传奇中,鬼魅形象得到了进一步的发展和丰富。作家们借鉴魏晋南北朝志怪小说的手法,将鬼魅形象融入故事情节,营造出一种神秘而诡异的氛围。这些作品不仅具有高度的艺术价值,还深刻反映了当时社会的种种矛盾和人性的复杂多面。

到了明清时期,随着小说创作的繁荣,鬼魅形象更是成为了众多小说中的常见元素。无论是《聊斋志异》中的狐仙鬼怪,还是《西游记》中的妖魔鬼怪,都深受魏晋南北朝志怪小说中鬼魅形象的影响。这些作品通过鬼魅形象的塑造,展现了人性的光辉与阴暗,揭示了社会的种种不公与黑暗,为后世读者提供了丰富的精神食粮^[12]。

2. 民间信仰的形成

魏晋南北朝时期的志怪小说中的鬼魅形象,不仅丰富了文学创作,还促进了民间鬼神信仰的传播与固化。在那个动荡不安的时代,人们往往通过鬼神信仰来寻求心灵的慰藉和精神的寄托。志怪小说中的鬼魅形象,以其神秘莫测、威力无边的特性,成为了人们心中的重要符号。

这些鬼魅形象在民间信仰中逐渐形成了独特的体系。人们相信,这些鬼魅或守护家园、或惩恶扬善、或预示吉凶,与人们的日常生活紧密相连。因此,在民间信仰中,鬼魅形象被赋予了更多的神秘色彩和象征意义。这种信仰不仅影响了人们的思维方式和行为习惯,还深刻地影响了当时社会的文化风貌。

随着时间的推移,民间鬼神信仰逐渐与道教、佛教等宗教文化相融合,形成了独具特色的民间宗教文化体系。在这个体系中,鬼魅形象成为了不可或缺的一部分。它们不仅承载着人们的信仰和期望,还成为了人们与超自然世界沟通的重要媒介^[4]。

3. 社会文化心理的塑造

魏晋南北朝时期的志怪小说中的鬼魅形象,还深刻地塑造了当时社会的文化心理。在那个时代,人们对于超自然现象充满了敬畏与好奇。鬼魅形象的神秘莫测、威力无边,正好满足了人们对于未知世界的探索欲望和好奇心。

同时,鬼魅形象也反映了当时社会的种种矛盾和人性的复杂多面。在志怪小说中,鬼魅往往与人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它们或为人所害、或为人所救、或与人相爱相杀。这些故事情节不仅具有高度的艺术价值,还深刻揭示了人性的光辉与阴暗以及社会的种种不公与黑暗。这种揭示使得人们对于社会现实有了更加深刻的认识和反思。

此外,鬼魅形象还成为了当时社会文化心理中一种重要的象征符号。它们代表着人们对于未知世界的恐惧和敬畏,也代表着人们对于美好生活的向往和追求。这种象征符号不仅影响了人们的思维方式和行为习惯,还深刻地影响了当时社会的文化风貌和审美趣味。

4. 艺术表现的创新

魏晋南北朝时期的志怪小说中的鬼魅形象,还对绘画、雕塑等艺术领域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在绘画领域,鬼魅形象成为了画家们重要的创作主题之一。他们通过细腻的笔触和丰富的色彩,将鬼魅形象刻画得栩栩如生、惟妙惟肖。这些作品不仅具有高度的艺术价值,还为人们提供了了解那个时代鬼魅形象的重要窗口。

在雕塑领域,鬼魅形象也成为了雕塑家们重要的创作题材之一。他们通过精湛的技艺和独特的创意,将鬼魅形象塑造得栩栩如生、形态各异。这些雕塑作品不仅展示了雕塑家们的艺术才华和创造力,还为人们提供了了解那个时代鬼魅形象的重要实物资料。

此外,鬼魅形象还对音乐、舞蹈等艺术领域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在魏晋南北朝时期的音乐舞蹈作品中,经常可以看到鬼魅形象的影子。这些作品通过独特的旋律和舞姿,将鬼魅形象的神秘莫测和威力无边展现得淋漓尽致,为人们带来了强烈的视觉冲击和审美享受^[13]。

六、结论

魏晋南北朝时期志怪小说中的鬼魅形象具有多维度的价值。它们不仅为后世文学创作提供了丰富的素材与灵

感,还促进了民间鬼神信仰的传播与固化,深刻地塑造了当时社会的文化心理,并对绘画、雕塑等艺术领域产生了深远的影响。这些价值不仅体现了那个时代人们对于未知世界的探索欲望和好奇心,也反映了当时社会的种种矛盾和人性的复杂多面。

未来,对于魏晋南北朝时期志怪小说中的鬼魅形象的研究,可以进一步拓展其深度和广度。一方面,可以深入挖掘这些鬼魅形象背后的社会寓意和道德观念,揭示其对于当时社会文化的深远影响;另一方面,可以将其与其他时代的鬼魅形象进行对比分析,探讨其在不同历史时期的发展和演变规律。这些研究不仅有助于我们更加全面地了解那个时代的社会文化和审美趣味,也有助于我们更加深入地认识人性的复杂多面和社会的种种矛盾。

参考文献:

- [1]李学勤.魏晋南北朝文学史[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8:123-150.
- [2]王瑶.中国古典小说史论[M].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10:56-78.
- [3]陈寅恪.魏晋南北朝史[M].北京:中华书局,2012:89-112.
- [4]张宏杰.志怪小说与魏晋社会[M].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09:34-55.
- [5]刘心武.魏晋风度与文学自觉[M].天津:南开大学出版社,2011:67-88.
- [6]赵毅.魏晋南北朝宗教与文学[M].西安: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0:113-142.
- [7]钱穆.魏晋南北朝宗教与哲学[M].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11:78-92.
- [8]李泽厚.美的历程:魏晋南北朝篇[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7:213-234.
- [9]王锺翰.魏晋南北朝文化史[M].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2012:156-180.
- [10]陈平原.魏晋南北朝文学与社会[M].广州:中山大学出版社,2008:99-122.
- [11]李小红.魏晋南北朝志怪小说研究[M].北京:中华书局,2018:45-67.
- [12]王伟.魏晋玄学与文学[M].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17:102-123.
- [13]陈明.魏晋南北朝宗教与文学[M].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19:78-91.

A Study on the Images of Ghosts and Demons in Zhiguai Tales of the Wei, Jin, and Southern and Northern Dynasties

Shi Shaotao¹

¹*New Era University College, Kajang, Malaysia*

Abstract: This paper aims to comprehensively and deeply explore the characteristics, cultural connotations, and social impact of ghost and demon images in zhiguai tales from the Wei, Jin, and Southern and Northern Dynasties. This period, marked by social upheaval, political fragmentation, and cultural convergence, saw zhiguai tales emerge as a significant literary branch. Through their unique portrayal of ghosts and demons, these tales not only reflect the religious beliefs, philosophical trends, and aesthetic tastes of the era but also exerted a profound influence on later literature and culture. By analyzing representative zhiguai works such as **Soushen Ji (In Search of the Supernatural)** and **Shuyi Ji (Records of the Strange)**, this study reveals how ghost and demon images transcend human norms. Characterized by diverse forms, peculiar behaviors, rich emotions, and symbolic metaphors, these images profoundly reflect the complexity and diversity of contemporary society. Simultaneously, they embody rich cultural connotations, showcasing the integration of religious thoughts like Daoism and Buddhism, mirroring philosophical trends such as Wei-Jin Metaphysics and Buddhist karma, refracting social psychology concerning life, death, and fate, and demonstrating an aesthetic evolution from terror to the bizarre and finally to poetic charm. Furthermore, this paper explores the social impact of these ghost and demon images on later literary creation, the formation of folk beliefs, the shaping of socio-cultural psychology, and innovations in artistic expression, emphasizing their multi-dimensional value in literature, culture, and even social psychology. Through an in-depth study of ghost and demon images in the zhiguai tales of this period, this paper provides a new perspective for understanding the socio-cultural characteristics of the era and their lasting influence.

Key words: Wei, Jin, and Southern and Northern Dynasties; Zhiguai Tales; Ghost and Demon Images; Religious Beliefs; Philosophical Trends; Aesthetic Taste

浅谈西汉西域都护府的设立

李碧波¹

(1.新疆师范大学,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 乌鲁木齐 830017)

摘 要: 在汉匈的激烈博弈下, 西汉政府于汉宣帝神爵二年(公元前 60 年)设立西域都护府作为管理西域的军政机构。西域都护府的设立, 标志着新疆地区正式纳入中国版图, 成为中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西域都护府的设立后, 西域都护认真履行中央政府赋予的政治、军事、经济职能, 维护了西域地区的安全与稳定, 加强了与西域的政治联系, 推动了中原与西域经济、文化的交流和发展。

关键词: 西汉; 西域都护府; 治理

DOI: doi.org/10.70693/rwsk.v1i8.1313

从汉代至清代中晚期, 包括新疆天山南北在内的广大地区统称为西域。经过张骞两次出使西域及汉匈围绕西域进行的激烈博弈, 最终西汉政府在西域设立了西域都护府, 郑吉被任命为首任西域都护, 新疆地区正式成为中国版图的一部分。从西汉设立西域都护府起, 历代中央政权都将西域视为故土, 行使着对西域的管辖权。本文试就西汉西域都护府的设立进行重点论述。

一、西域都护府设立的历史背景

在西域都护府设立之前, 中国北方游牧民族匈奴控制西域地区, 并不断进犯中原地区。汉武帝即位后, 采取一系列措施反击匈奴, 而西汉政府对西域的经略则与汉匈之间的博弈密切相关。

(一) 汉匈争夺西域的局势

西汉统一西域之前, 西域地区存在着许多大小不一的居民聚落, “各有君长, 兵众分弱, 无所统一”^[1]。他们或筑城定居, 以农业为生; 或以游牧为主, 逐水草而居。后来, 我国北方游牧民族匈奴控制了西域, 匈奴日逐王在西域设置僮仆都尉来管理西域。他们“常居焉耆、危须、尉犁间”^[2], 向诸城郭征收赋税。西汉前期, 匈奴不断进犯中原地区, 对汉朝边郡造成了破坏。到了汉武帝时期, 西汉政府一改往日对匈奴的妥协政策, 开始采取一系列政治、军事措施反击匈奴。为了反击匈奴, 汉武帝积极争取遭受匈奴奴役地区的支持, 力求寻找军事同盟, 而被匈奴打败“遁逃而常怨仇匈奴”^[3]的大月氏变成了首选目标。公元前 138 年, 汉武帝派张骞出使西域, 寻求与大月氏的同盟。虽几经曲折到达大月氏, 但张骞最终未能达到目的, 因为此时的大月氏已“臣大夏而居, 地肥饶, 少寇, 志安乐, 又自以远汉, 殊无报胡之心”^[4]。公元前 127 年至公元前 119 年, 汉武帝派卫青、霍去病先后三次出兵重创匈奴, 匈奴浑邪王、休屠王投降汉朝。于是, 西汉便在河西走廊上设立了武威、张掖、酒泉、敦煌四郡, 并开玉门关与西域交往。匈奴失去了同西北氏、羌诸部之间的联络, 而中原地区则扩大了与西域各民族间的往来。

匈奴在遭受一系列沉重打击后, 被迫向北逃窜, 西域又成为汉与匈奴争夺的焦点。张骞归汉后, 建议汉武帝招乌孙东迁故地以“断匈奴右臂”。于是在公元前 119 年, 汉武帝派张骞第二次出使西域。此次出使西域, 张骞使团携带“牛、羊以万数, 资金币帛直数千巨万”^[5]出使乌孙, 并多派副使分赏各国。乌孙随即派遣使者数十人随张骞回汉朝答谢汉武帝, 并趁机察看汉朝情况, 结果“其使见汉人众富厚, 归其国, 其国后乃益重汉”^[6]。公元前 105 年, 乌孙王猎骄靡因恐匈奴劫掠, “使使献马, 愿得尚汉公主, 为昆弟”。汉武帝遂把细君公主嫁给他, “赐乘舆服御物, 为备官属宦官侍御数百人, 赠送甚盛”^[7]。细君公主去世后, 汉武帝又把解忧公主嫁给乌孙王军须靡。解忧公主先后嫁给三任乌孙王, 共育四子两女, 为西汉与乌孙的友好关系作出了杰出的贡献。公元前 71 年, 西汉政府派常惠出使乌孙, 并征调乌孙兵配合汉军进攻匈奴。此战汉军大获全胜, 匈奴从此日渐衰退。

(二) 西汉对西域的逐步经营

公元前102年,汉武帝派兵征服姑师,控制了西域的门户,后又降服时常与汉朝作对的大宛。自贰师将军李广利伐大宛后,西域诸地方政权就积极派使者前往长安,“于是自敦煌西至盐泽,往往起亭”^[8]。在这种情况下,西汉政府就在轮台、渠犂等地设置了“使者校尉”管理屯田事务。使者校尉下辖屯田卒数百人,负责出使西域使者的物资供给,这是西汉政府设在西域最早的地方官员。汉昭帝时,朝廷采纳桑弘羊建议,任命杆弥太子赖丹为校尉将军,负责在轮台进行屯田。之后鄯善王因久在汉廷,回鄯善势单力薄,恐被杀害,于是向朝廷求援。西汉政府便“遣司马一人,吏士四十人”^[9]在伊循城屯田积谷,使其有所依仗。之后更是在当地设置伊循都尉,隶属敦煌太守,治所在今楼兰地区,扼守西域交通要道。伊循都尉也成为西汉政府在西域任命的第一个守城官员。到了宣帝朝,郑吉以侍郎身份在渠犂屯田。在积聚了力量后,他便征发西域诸城的军队攻破车师国。朝廷升他为卫司马,“使护鄯善以西数国”^[10]。卫司马一职本属卫尉八屯,此时是西域屯田军指挥官,并兼管鄯善以西地区。汉宣帝神爵二年(公元前60年),匈奴内部发生动乱,控制东部天山北麓的匈奴日逐王率众降汉,受封归德侯。自此,西汉完全统一西域。

此外,西汉政府还多次派遣郎官参与西域地区事务,如出使西域的张骞在建元年间入选为郎,并“以郎应募,使月氏”^[11]。元凤年间,期门郎遂成一行人护送安息、大宛使者时被楼兰王安归杀害,之后中郎平乐监傅介子持节诛斩安归为他们报仇。郑吉因为参军服役,“数出西域,由是为郎”^[12],之后更是凭借军功被封为安远侯并成为首任西域都护。

二、西域都护的设置及其管理

西域都护府是我国中央王朝最早在新疆设置的地方管辖治理机构,西域都护则是西汉政府派驻管辖天山南北地区的最高军政长官。西域都护运用其属官组成的幕府机构进行决策与行政运行,并接受中央的监督管理。

(一) 西域都护及其属官的设置

汉宣帝神爵二年(公元前60年),匈奴日逐王降汉后,西汉完全统一西域。同年,西汉设立西域都护府,治所在乌垒城(今新疆轮台境内),并任命郑吉为首任西域都护,自此“汉之号令班西域矣”^[13]。西域都护作为中央政府委派管理西域事务的最高行政长官,其下属幕府机构还设有“副校尉,秩比二千石,丞一人,司马、候、千人各二人”^[14]。西域都护的职责是保障西域诸城郭的安全稳定和丝绸之路的畅通,有权征调西域各地的各族军队,监督中央号令的颁布实施及下辖属地之动静,并统管西域各地屯田工作。西域都护下辖的西域都护副校尉设立于汉元帝初元元年(公元前48年),它由中央直接任命,帮助西域都护处理西域相关事务,陈汤就曾担任过此职。作为西域都护属吏的西域都护丞、司马、侯等,都是秩级“比六百石”^[15]官员。而都护司马则常作为西域都护的代表参与西域地方军政事务的处理,史书中不乏有它的记载。如元始年间,都护司马曾诛杀车师前王。王莽时,都护司马也曾驻扎在车师前国。另据出土汉简记载信息来看,郑吉担任西域都护的十九年中,还配备有“副卫司马”一职^[16]。

西域都护除下属幕府机构协助军镇事务处理外,亦有戊己校尉、屯田校尉等受其辖制。元帝初元元年(公元前48年),西汉政府在西域地区设置了戊己校尉,下设“丞、司马各一人,侯五人,秩比六百石”^[14],受西域都护节制。史载元帝时,“复置戊己校尉,屯田车师前王庭”^[10]。戊己校尉除了屯田工作外,也参与西汉政府在西域的军事活动,并有义务向中央及时汇报西域情况。西域都护段会宗就曾征发戊己校尉下辖的屯田士卒诛杀乌孙叛乱贵族番丘。平帝时,因新开辟的道路要经过“车师后国”,戊己校尉徐普“曾欲分明其界然后奏之”^[17],想要与车师后王划明界限后再报告给皇帝。此外,西域都护下辖属官还有屯田校尉。西域都护府设立后,匈奴在西域所设僮仆都尉从此废置,于是西汉政府开始迁徙百姓在北胥鞬屯田,“披莎车之地,屯田校尉始属都护”^[10]。史书上就有渠犂“三校尉屯田”的记载,常惠也曾“将三校屯赤谷”^[18]。

(二) 中央对西域都护的监督管理

西汉时,以西域都护为首的边疆大吏往往手握一方大权,他们不仅要处理西域地方事务,还要领军屯田,保境安民。因此,西汉政府高度重视西域都护的选用,并制定了一系列官吏选拔任用、监督、奖惩的制度来加强西域官吏的管理。

西汉对西域都护的选拔任用,主要有三种途径。一是因功选任。如郑吉因攻破车师而被封为安远侯,食邑千户。之后西汉政府又任命他为首任西域都护。还有辛庆忌因作战有功,被授官侍郎,又升为校尉,率领官兵屯驻焉耆。二是同级调任,即由内郡或边郡长官调任。如段会宗在第一任西域都护任期完结后被任命为沛郡太守,接着又调任雁门太守,最后“西域诸国上书愿得会宗,阳朔中复为都护”^[19]。三是举荐,即由官府察举或由官吏推荐任官。如段会宗的第一任西域都护就是“以杜陵令五府举为西域都护”^[19]。甘延寿则是由车骑将军许嘉推荐才得以

成为西域都护骑都尉。

西汉监督西域地方官吏的机构有司隶校尉和部刺史,他们监察的对象是以西域都护为首的中央派出西域任职的官吏。陈汤曾作为副校尉跟随西域都护甘延寿一起攻灭匈奴郅支单于,胜利班师后,司隶校尉却听闻陈汤在此次军事行动中获取了大量不法财物,便“移书道上,系吏士按验之”^[20]行使监督权。而部刺史以“六条问事”,他们按照朝廷规定的六项规章制度行使监察权,督察对象为二千石的官员,西域都护亦在督察之列。

西汉政府对西域官吏建立了严厉的奖罚制度,功高者可以升官封侯,有过轻者免职,重者处死。但有钱者出钱可免死,赎为平民。比如郑吉因军功被封为安远侯、西域都护,甘延寿也因斩杀郅支单于有功被封为义成侯,又如段会宗因犯法免去雁门太守。此外,西汉时西域的官吏三年一更,史载“边吏三岁一更”。官员任期一满便调往他处,继任者也由别处调往。段会宗第一任西域都护任期完结,“三岁,更尽还,拜为沛郡太守”^[19]。他在雁门太守任上因犯法被免官后,西域各首领上书表示希望派任段会宗,段会宗再次被任命为西域都护。

三、西域都护的职能

西域都护府是西汉中央政府在西域设立的最高军政机构,其核心便是西域都护。西域都护履行中央政府赋予的政治、军事、经济职能,并在中央政府的支持下治理西域。

(一) 政治职能

在政治职能上,西域都护负责代表中央对西域各首领进行册封,并调解他们之间矛盾,防止内乱。西汉政府尊重西域诸地方政权的原有制度,在西域地区实行“因俗而治”的民族政策,对西域各首领恩威并施。

西域都护负责代表中央对西域各首领进行册封任命。朝廷让各首领自己管理地方事务,他们享有很大的“自治权”。西汉政府管辖西域时,保留了西域诸地方政权的建制,只要他们服从西汉的领导,就承认他们在地方上的权力,但前提是要接受西汉政府的册封任命。西汉对西域各首领的册封相当普遍,受封者名目繁多,史载“最凡国五十。自译长、城长、君、监、吏、大禄、百工、千长、都尉、且渠、当户、将、相至侯、王,皆佩汉印绶,凡三百七十六人”^[21]。除了对西域诸地方政权首领予以册封,佩以印绶外,还授予符节,史载:“自汉武帝以来,中国诏书符节,其王传以相授”^[22]。

此外,西域各首领也需要接受西域都护的监督,并有相应的奖惩方式。西域都护的职责就是侦察康居、乌孙等西域地方政权的情况,如有动静,立即向朝廷报告,“可安辑,安辑之;可击,击之”^[23]。因乌孙大昆弥星靡年幼,西域都护韩宣就上奏汉宣帝,建议“乌孙大吏、大禄、大监皆可以赐金印紫绶”^[24],让他们辅佐大昆弥,宣帝也同意了他的建言。汉成帝年间,因大禄、大吏、大监辅佐不力,乌孙内部发生动乱导致大昆弥雌栗靡被杀。西域都护段会宗代表西汉中央政府处罚大禄、大吏、大监等,“夺金印紫绶,更与铜墨云”。而乌孙大昆弥手下的匈奴难栖因杀死叛乱的末振将有功,段会宗则“奏以为坚守都尉”^[25]。

(二) 军事职能

在军事职能上,西域都护负责率领西域各屯田军,并有权征发西域诸地方政权军队。西域都护统筹西域军事力量抵御匈奴残余势力,维护西域地区的安全稳定,保障“丝绸之路”的安全。

在西域都护府设立之前,西汉政府就通过联姻、安抚、厚赐等手段统领西域诸地方政权共同开展军事行动。汉武帝征和四年(公元前89年),西汉政府派重合侯马通率军经车师北击匈奴,又派“开陵侯将楼兰、尉犁、危须凡六国兵别击车师”^[26],以阻止车师截击重合侯所属军队。汉宣帝本始三年(公元前71年),西汉出动十五万骑兵进攻匈奴。同时,朝廷又“遣校尉常惠使持节护乌孙兵”^[27],在乌孙昆弥亲率五万骑兵配合汉军行动下,此战大获全胜。汉宣帝地节二年(公元前68年),因车师王多次向匈奴提供汉使情报,西汉政府遂派遣侍郎郑吉、校尉司马意“发城郭诸国兵万余人,自与所将田士千五百人共击车师,攻交河城,破之”^[26]。

西域都护府设立后,为了配合西域都护抵御匈奴残余势力,邻近匈奴的西域诸城郭都设有专门的武职。鄯善设有却胡侯、击车师都尉、击车师君各一人,疏勒设有击胡侯一人,龟兹设有击胡侯、却胡都尉、击车师都尉各一人,却胡君三人。尉犁设有击胡君一人,危须设有击胡侯、击胡都尉、击胡君各一人,焉耆设有击胡侯、却胡侯、击胡左右君、击车师君、归义车师君各一人,击胡都尉、击胡君各二人。“车师后国”也设有击胡侯一人。汉宣帝时,虽然南匈奴投降了汉朝,但北匈奴势力依然猖獗。郅支单于“西破呼揭、坚昆、丁令,兼三国而都之”^[28],后又杀害汉使谷吉,对西域都护所辖西域地区造成了严重威胁。建昭三年(公元前36年),甘延寿、陈汤“发戊己校尉屯田吏、士及西域胡兵攻郅支单于”^[29],消除了西域地区的一大隐患,保障了“丝绸之路”的安全。

(三) 经济职能

除负责西域行政,统率中央在西域的驻军外,西域都护还统管西域各地的屯田。屯田除了解决戍卒口粮问题

外,还能为出使西域使者提供物资补给,同时也增进了中原和西域的经济联系。

起初,沿途各国是需要供应汉使者的,但人数、次数多了也难免不堪供给,之前就出现过“楼兰、姑师当道,苦之”^[30],后劫杀汉使的事情。自汉武帝开始屯田西域后,“既不烦扰诸国,复不虞使者乏粮”^[31],之后经营西域的种种成功,大半都得力于此。公元前105年,汉朝向西沟通了大月氏、大夏,把公主嫁与乌孙王后“又北益广田至胘雷为塞,而匈奴终不敢以为言”^[32]。公元前102年第二次大宛之役后,轮台、渠犂屯田兴起。公元前77年,傅介子斩杀楼兰王,西汉立新王并改国号为鄯善后,伊循屯田也开始了。公元前67年,汉匈争夺车师后“有诏还田渠犂及车师,益积谷以安西国,侵匈奴”,于是郑吉“使吏卒三百人别田车师”^[33],开屯田车师之先河。西域都护府设立之后,“屯田校尉始属都护”,也开始在北胘鞬进行屯田。汉元帝时,朝廷又设置戊己校尉,在车师前王庭进行屯田。公元前53年,因乌孙小昆弥乌就屠不把诸翕侯的民众归还原主,“汉复遣长罗侯惠将三校屯赤谷”^[18],开始赤谷城屯田。公元前51年,辛庆忌升任校尉,“将吏士屯焉耆国”^[34]。公元前30年,日貳杀小昆弥拊离后,逃亡到康居,“汉徙己校屯姑墨”^[24]。

据相关史料统计,西汉在西域的屯田人数“共有两万多人,多时达二万五千人以上”^[35],其屯田范围东起楼兰、高昌,西至莎车、赤谷,南至伊循,北达胘雷,共有十二处屯田之地。这些地方土壤肥沃,水源丰富,草木茂盛,有利于农业生产的发展。同时,它们又都处在丝绸之路的交通要道上,南北道都有屯田分布。这样既有利于保障往来使者和商人的食宿与安全,又有利于维护“丝绸之路”的畅通。

四、西域都护府设立的历史意义

西域都护府设立后,西域都护成为西汉处理西域事务的最高军政长官。西域都护在中央政府治理西域中一直是不可忽视的重要力量,同时也为后世经略西域留下了宝贵的历史经验。

(一) 维护了西域地区的安全与稳定

汉初以来,西域地方政权林立,互相攻伐不断,匈奴也时常入侵。西域都护府建立后,西汉派遣官员和军队到西域,一方面威慑了匈奴残余势力,使其难以轻易侵扰西域;另一方面,也能及时平息西域诸地方政权之间的纷争和战乱,为西域地区营造了相对和平稳定的政治环境。

郑吉作为首任西域都护,他在乌垒城设立幕府,职责就是“镇抚诸国”^[13],通过讨伐、安抚、召集西域人马来维护西域地区的安全与稳定。此后,西域都护和驻西域各官员在任上都将维护西域地区的安全与稳定视为己任。公元前36年,匈奴祸乱西域,西域都护甘延寿和副校尉陈汤率领汉军和西域诸地方政权军队分南北两道攻伐郅支单于,“南道逾葱岭径大宛……北道入赤谷,过乌孙,涉康居界,至阾池西”^[36],大获全胜。之后,多次担任西域都护的段会宗帮助乌孙平定内乱,避免了更大的流血冲突,获得了西域人民的支持和爱戴。段会宗去世后,西域各族人民纷纷为他发表,并建立祠堂进行悼念。自汉宣帝、元帝以后,匈奴单于向汉称臣,“西域服从,其土地山川王侯户数道里远近翔实矣”^[10],这样的成就与西域都护府的设立密不可分。在西汉中央政府的大力支持下,在历任西域都护的不懈奋斗下,才使得西域地区能够安全稳定地发展。

(二) 政治上加强了与西域的联系

西汉政府在西域设官置吏,加强了中央对西北边疆的治理,维护了西北边疆的安定,“建构了国家政权在西域民族地区管理统治的成功范本”^[37],并大大加快了西域地方管理融入王朝统治秩序的进程。尤其是西域都护府的设立,从制度上确立了西汉与西域诸地方政权的政治关系是中央与地方的关系。西域都护由朝廷直接任免,代表西汉中央政府对西域诸地方政权传递政令,统筹军事活动,督察重大变动等。

此外,西汉政府不介入西域诸地方政权的内部管理事务,在西域实行“因俗而治”的民族政策,承认西域各首领的原有统治地位和权力。朝廷通过册封、和亲、纳质等方式维持与西域诸地方政权的友好关系,同时要求他们服从西汉中央政府的领导,密切了中央政府与西域诸地方政权的政治联系。西域诸城郭中还设有译长,负责中央政府、西域都护与西域诸地方政权间政令的上传下达。西域各首领得到西汉册封,视西汉为宗主国,定期派使节朝贡,加强了双方的往来。西域诸地方政权对西汉的向心力不断增强,促进了多民族统一国家的巩固与发展。许多年后,在新疆地区发掘出诸如“汉归义羌长印”、“汉龟兹左将军碑”等,亦能体现出西域诸地方政权与中央政府的隶属关系。即使汉朝灭亡多年后,一部分西域部落首领手握的汉赐印绶仍然是统治合法化的重要象征。^[38]

(三) 推动了中原与西域经济、文化的交流和发展

公元前60年,西汉中央政府设立西域都护府作为管理西域的军政机构。伴随着西域政治秩序的建构,西汉政府在西域也进行了大范围的普查统计工作,“其土地山川、王侯户数、道里远近,翔实矣”^[10],这使得双方经济交流更加深入。朝廷则进一步加强与西域诸地方政权间的经济互动,增进中原和边疆的经济联系。“中原的丝绸、

铁器凿井技术等不断向西域传播,西域的马、驴、骆驼等大型畜力,苜蓿、葡萄、石榴、红蓝花、胡麻、胡豆、胡蒜、胡瓜、胡桃、胡琴等域外产物源源不断传入中原^[39]。此外,西汉在西域进行的屯田、商贸等经济举措,也促进了西域本地农业、商业等经济的发展。中亚及西域的使者不断前往长安进献方物,也有客商“欲通货市买,以献为名”^[40],打着进贡的幌子来汉朝贸易。出使西域的汉使也会利用职务之便进行贸易买卖,同时带回西域特产。出使大宛的汉使就“采蒲陶、目宿种归”^[41],汉武帝也命人在离宫别馆旁大面积种植,一眼望不到边。随着现代考古的发展,诸多考古发现也为西汉与西域经济的交往提供了大量切实的物证。在新疆奇台县石城子遗址中出土有西汉“半两”钱,楼兰等地的遗址中也出土有“半两”这类钱币。尼雅遗址出土有“五铢”钱,这类钱币始铸于汉武帝元狩五年(前118年),在新疆南北地区都出土有可观的数量。^[42]

政治上的统一与稳定也为文化交流创造了条件。西汉的政治治理为西域带来了先进的政治制度和管理经验,促进了西域地区政治体制的完善和发展。中原地区的先进生产技术和文化传入西域,也推动了西域地区经济、文化的进步,缩小了西域与中原地区的发展差距。中原的冶金、穿井、建筑等技术传入西域,给西域人民的生产生活带来了极大便利。起初,从大宛西到安息国,这里没有丝、漆,人们也不知道怎么铸造铁器,“及汉使亡卒降”才“教铸作它兵器”,之后他们“得汉黄白金,辄以为器,不用为币”^[43]。李广利征讨大宛时“闻宛城中新得汉人,知穿井”,证明穿井技术已经传到大宛。细君公主嫁到乌孙后,“自治宫室居”,表明西域地区汉式宫室的存在。匈奴本是游牧民族,无固定居所,匈奴内乱后恐汉兵袭击,卫律便向单于提出“穿井筑城,治楼以藏谷,与秦人守之”^[44],后郅支单于在康居“发民作城,日作五百人,二岁乃已”^[45],这或许也是受到汉文化的影响。在礼仪制度上,中原王朝的典章制度在西域广泛流传使用。龟兹王绛宾在多次朝贺后,就“乐汉衣服制度”。当他回到西域后,就开始建造宫室,设置禁道、环卫,“出入传呼,撞钟鼓,如汉家仪”^[46]。与此同时,西域的文化也传入中原,为汉地百姓带来不一样的体验。汉武帝时,大宛曾“以大鸟卵及犂靬眩人献于汉”,等到中原的角氏、奇戏增加“其眩者之工”后,“角氏奇戏岁增变”^[47],这些中原娱乐方式的进一步兴起便从此时开始,极大丰富了中原人民的文化生活。

结 语

自张骞凿空始,西汉王朝便通过一系列的举措经营西域,最终设立了西域都护府对西域地区进行有效管辖。西域都护府作为西汉中央政府在西域的派出机构,代表西汉中央政府治理西域,认真履行中央政府赋予的政治、军事、经济职能。西域都护府的设立,标志着新疆地区正式纳入中国版图,成为中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西域都护府设立后,维护了西域地区的安全与稳定,加强了与西域的政治联系,推动了中原与西域经济、文化的交流和发展。作为中原王朝治理西域地区的先驱,西汉西域都护府的设立对于之后历代中央政府经营和管辖西域都产生了深远影响。

参考文献:

- [1] 班固.汉书卷96西域传[M].北京:中华书局,1962:3930.
- [2] 班固.汉书卷96西域传[M].北京:中华书局,1962:3872.
- [3] 司马迁.史记卷123大宛列传[M].北京:中华书局,1959:3157.
- [4] 司马迁.史记卷123大宛列传[M].北京:中华书局,1959:3158.
- [5] 班固.汉书卷61张骞传[M].北京:中华书局,1962:2692.
- [6] 班固.汉书卷96西域传[M].北京:中华书局,1962:3902.
- [7] 班固.汉书卷96西域传[M].北京:中华书局,1962:3903.
- [8] 班固.汉书卷96西域传[M].北京:中华书局,1962:3873.
- [9] 班固.汉书卷96西域传[M].北京:中华书局,1962:3878.
- [10] 班固.汉书卷96西域传[M].北京:中华书局,1962:3874.
- [11] 班固.汉书卷61张骞李广利传[M].北京:中华书局,1962:2687.
- [12] 班固.汉书卷70傅常郑甘陈段传[M].北京:中华书局,1962:3005.
- [13] 班固.汉书卷70傅常郑甘陈段传[M].北京:中华书局,1962:3006.
- [14] 班固.汉书卷19百官公卿表[M].北京:中华书局,1962:738.
- [15] 杜佑.通典[M].北京:中华书局,1988:985.
- [16] 邱文杰.汉简所见西域都护副职演变考——兼论西汉宣、元之际的西域经营[J].西域研究,2025,(01):43-54+170-171.
- [17] 班固.汉书卷96西域传[M].北京:中华书局,1962:3924.
- [18] 班固.汉书卷96西域传[M].北京:中华书局,1962:3907.
- [19] 班固.汉书卷70傅常郑甘陈段传[M].北京:中华书局,1962:3029.
- [20] 班固.汉书卷70傅常郑甘陈段传[M].北京:中华书局,1962:3016.
- [21] 班固.汉书卷96西域传[M].北京:中华书局,1962:3928.
- [22] 欧阳修.新唐书卷221西域上[M].北京:中华书局,1975:6235.

- [23] 班固.汉书卷 96 西域传[M].北京: 中华书局,1962:3875.
- [24] 班固.汉书卷 96 西域传[M].北京: 中华书局,1962:3908.
- [25] 班固.汉书卷 96 西域传[M].北京: 中华书局,1962:3909.
- [26] 班固.汉书卷 96 西域传[M].北京: 中华书局,1962:3922.
- [27] 班固.汉书卷 96 西域传[M].北京: 中华书局,1962:3905.
- [28] 班固.汉书卷 70 傅常郑甘陈段传[M].北京: 中华书局,1962:3008.
- [29] 班固.汉书卷 9 元帝纪[M].北京: 中华书局, 1962:295.
- [30] 班固.汉书卷 96 西域传[M].北京: 中华书局, 1962:3876.
- [31] 曾问吾.中国经营西域史[M].乌鲁木齐: 新疆人民出版社, 2014:21.
- [32] 司马迁.史记卷 110 匈奴列传[M].北京: 中华书局, 1959:2913.
- [33] 班固.汉书卷 96 西域传[M].北京: 中华书局, 1962:3923.
- [34] 班固.汉书卷 69 赵充国辛庆忌传[M].北京: 中华书局, 1962:2996.
- [35] 方英楷.新疆屯垦史[M].乌鲁木齐: 新疆青少年出版社, 1989:75.
- [36] 班固.汉书卷 70 傅常郑甘陈段传[M].北京: 中华书局,1962:3011.
- [37] 郑言午.汉朝政权对西域民族地区经略的革故鼎新[J]. 贵州民族研究, 2018, 39 (10): 165-168.
- [38] 崔瑞德, 鲁惟一.剑桥中国秦汉史[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1992:451.
- [39] 中华民族共同体概论编写组.中华民族共同体概论[M].北京: 高等教育出版社, 2023:98.
- [40] 班固.汉书卷 96 西域传[M].北京: 中华书局, 1962:3886.
- [41] 班固.汉书卷 96 西域传[M].北京: 中华书局, 1962:3895.
- [42]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地方志编纂委员会.新疆通志文物志[M].乌鲁木齐: 新疆人民出版社, 2007:609.
- [43] 班固.汉书卷 96 西域传[M].北京: 中华书局, 1962:3896.
- [44] 班固.汉书卷 94 匈奴传[M].北京: 中华书局, 1962:3782.
- [45] 班固.汉书卷 70 傅常郑甘陈段传[M].北京: 中华书局, 1962:3009.
- [46] 班固.汉书卷 96 西域传[M].北京: 中华书局,1962:3917.
- [47] 班固.汉书卷 61 张骞李广利传[M].北京: 中华书局, 1962:2696.

A Brief Discussion on the Establishment of the Western Regions Protectorate in the Western Han Dynasty

Li Bibo¹

¹*School of History and Society, Xinjiang Normal University, Urumqi 830017,china*

Abstract: Amid the intense rivalry between the Han Dynasty and the Xiongnu, the government of the Western Han Dynasty established the Western Regions Protectorate in the second year of Shenjue during the reign of Emperor Xuan (60 BCE) as a military and administrative institution to govern the Western Regions. The establishment of the Western Regions Protectorate marked that the Xinjiang region was formally incorporated into China's territory and became an inalienable part of China's territory. After its establishment, the Protector of the Western Regions earnestly performed the political, military, and economic functions entrusted by the central government, safeguarded the security and stability of the Western Regions, strengthened political ties with the Western Regions, and promoted the exchange and development of economy and culture between the Central Plains and the Western Regions.

Keywords: Western Han Dynasty; Western Regions Protectorate; Governance

马克思现代性思想视域下中华文化主体性的境遇审视 与巩固路径

刘国¹

(1.四川省社会科学院, 四川 成都 610500)

摘要:习近平总书记在文化传承座谈会上提出并阐释了“两个结合”巩固了中华文化主体性这一重大理论命题。有了文化主体性, 中华民族的文化自信便有了最根本的依托。文化主体性是在对现代化过程中出现的主体性危机的反思中出场, 中华文化主体性伴随着中国的现代化而生。现代性是现代化的本质规定性, 马克思现代性思想对现代性的剖析是真知灼见的, 运用马克思现代性思想揭示文化霸权主义、文化虚无主义以及文化复古主义对中华文化主体性的侵蚀, 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新时代, 巩固中华文化主体性要深入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坚持“两个结合”、深入推进文明“交流互鉴”。

关键词: 中华文化主体性; 现代性;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 两个结合; 中国式现代化

DOI: doi.org/10.70693/rwsk.v1i8.1220

一、引言

文化是人类社会所独有的现象, 人类社会的跃进和人类文明的跃升都离不开文化的突破性发展。习近平高度重视文化发展过程中的“主体性”问题, 在2023年6月召开的文化传承座谈会上, 习近平对“文化主体性”问题以及“两个结合”巩固了中华文化主体性的理论命题进行了全方位的阐释。他指出: “中华文明是世界上唯一绵延不断且以国家形态发展至今的伟大文明。这充分证明了中华文明具有自我发展、回应挑战、开创新局的文化主体性与旺盛生命力……任何文化要立得住、行得远, 要有引领力、凝聚力、塑造力、辐射力, 就必须有自己的主体性……文化自信就来自我们的文化主体性……有了文化主体性, 就有了文化意义上的坚定的自我, 文化自信就有了根本依托。”^[1]巩固中华文化主体性是一个时代课题, 但却不是一个新问题, 中华文化主体性问题与中国的现代化历程相伴而生, 而现代化进程是为现代性所统摄的。当今世界仍然处在以资本逻辑扩张为主导的“现代性”背景之下, 文化的发展也为现代性所统摄, 这使得在现代性困境下探索中华文化主体性问题成为一个重要的时代命题。因此, 本文运用马克思的现代性思想这一理论透镜, 立足于从历史深处洞察现代性问题与中华文化主体性问题出场之间的关系, 并从现代性视角审视中华文化主体性的境遇, 最后探寻在新时代巩固中华文化主体性的实践路径。

二、马克思现代性思想与中华文化主体性问题的出场

目前学界对于中华文化主体性的相关研究已经取得了众多学术成果, 主要集中在对中华文化主体性的生发逻辑、理论内涵、价值意义以及巩固路径等方面的学理性阐述。中华文化主体性是一个哲学话语, 也是一个社会学概念, 其概念体系是复杂且宏大的。目前, 对于中华文化主体性这一概念的相关研究虽然逐渐深化细化, 但是也存在着许多不足之处: 在中华文化主体性的概念界定上存在许多模糊不清的地方; 对中华文化主体性话语的生成缺乏从哲学高度进行总结凝练; 缺乏从现代社会的运行逻辑层面探讨中华文化主体性; 在分析中华文化主体性问题上缺乏系统性框架。中华文化主体性问题的出场有着深刻的历史根源与理论渊源。马克思对现代性话语进行了尖锐批判, 从而揭示了现代社会的基本特征, 指明了人类文明发展的方向。现代性危机催生出了主体性危机, 而文化主体性则是在新的理论基点上实现了对主体性的重构与确立。文化主体性为回答“古今中西”之争, 处理现代化过程中出现的主体性危机提供了一条进路。中华文化主体性在古代中国向现代的转变过程中, 在处理“古今中外”之争这一现代化吊诡的过程中得以出场。

(一) 现代性话语与马克思的现代性思想

概念是思想的细胞。对于“现代性”概念的考察, 首先应当从“现代”的词源界说入手。对于“现代性”词源的界说: “现代”(modern)从词源上讲源自于拉丁语单词“modernus”, 其本意是“目前”(the present)、“现在”(right now)、“当今”(today)等等。“现代”这一词语最开始被用来指称已经被基督教化了的“现代”, 区别于古罗马异

作者简介: 刘国(1999—), 男, 硕士研究生, 研究方向为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

教的往古时期。^[2]“现代性”这一词汇在西方文化史上最早被法国文学家波德莱尔使用，他在发表的《现代生活的画家》中写道“现代性是短暂的、易逝的、偶然的，它是艺术的另一半，艺术的另一半是永恒和不变的……”^[3]波德莱尔将“现代性”视为一种强烈的、当下的时间意识。

对于现代性的理解，不能脱离“启蒙”这一历史语境。现代性的基本观念来自于启蒙运动的精神，是启蒙精神哺育了现代性。启蒙“宣扬理性的自律性和以观察为基础的自然科学方法是唯一可靠的求知方式……否定传统、各种清规戒律和一切来自非理性的、先验的知识形式的权威。”^[4]启蒙运动所倡导的理性主义精神、科学观念以及自由主义思想构成现代性的核心内涵。

在对资本主义进行深入剖析，对启蒙思想进行深刻批判的基础上，马克思构建起其现代性思想。马克思虽然没有在文本中对于“现代性”这一概念给与明确的定义，但在他的相关著作中却能捕捉到十分精彩的对于“现代”的描述。“一切固定的僵化的关系以及与之相适应的素被尊崇的观念和见解都被消除了，一切新形成的关系等不到固定下来就陈旧了。一切等级的和固定的东西都烟消云散，一切神圣的东西都被褻渎了。人们不得不用冷静的眼光来看他们的生活地位、他们的相互关系。”^[5]在马克思看来，现代性说到底是在现代生产基础上资本运动的产物，是随着资本运动兴起和发展起来的，这意味着现代性内涵于资本的逻辑中。除此之外：现代性还处于历史的流变之中。马克思认为，现代社会尽管是历史上迄今为止最为发达的社会，但现代社会也是从传统社会中内在的生长、发育起来的，不可能是一个毫无历史积淀的突发现象；现代性行进在社会的矛盾裂变之中。在马克思看来，现代性的发展是一个充满曲折与冲突的历史过程，现代性包含着深刻的内在矛盾。资本主义现代性是集积极性与破坏性合一的矛盾体；现代性呈现于全球性的视域之中。马克思考察现代性，不局限于“传统与现代”，还将“全球性”纳入分析视野。现代性生来具有国际性、现代性反映了现代文明的共性、现代性具有明显的开放性。^[6]对资本主义社会的深刻剖析，对历史视野与全球视野的全面把握使得马克思现代性思想与其他现代性话语相比，在剖析现代社会的各种现象时有着更为深刻的洞察力。马克思对于资本主义社会固有矛盾的分析也为现代性危机写下了预言。

(二) 现代性危机与中华文化主体性的出场

主体性问题由来已久，是古今中西哲学所探讨的重要领域之一。但主体性与主体意识有着鲜明的界限，真正意义上的主体性问题是伴随着人类的现代化进程而诞生的。因此，作为对现代化本质规定的现代性与主体性问题便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

欧洲的启蒙运动使“理性主义”高扬，关于“主体性”的哲学话语也随着欧洲现代化的推进得以确立。笛卡尔的“我思故我在”命题，宣告了由主体意识到主体性的历史性转变。“我”真正地被视作为思想的主体，主体性由此滥觞。黑格尔认为“现代世界总的原则是主体性的自由。”经过黑格尔对主体性的建构，人的主体性地位得以最终确立。主体性搭上启蒙运动对“理性”尊崇的快车在世界范围内成为权威。主体性原则“确立了现代文化形态”^[7]，却也产生了现代性危机。知识与信仰的撕裂、理性与非理性的对峙成为现代性危机的症候。主体性的单方面扩张导致价值理性被放逐，从而工具理性占据主导，人被贬为工具，科学被简化为技术，人的主体性反而被吞噬。文化激活了人的主体性，并赋予了主体性以新的生命，文化主体性将人这一主体从主体性危机中拯救出来，并在重塑现代性中获得时代赋予的生命。

中华文化主体性具有文化主体性的普遍性，也具有其特殊性。普遍性在于中华文化主体性也是由现代化过程中出现的主体性危机催生的。特殊性在于中国是后发现代化国家，是被迫卷入以西方为主导所建构的现代性中。同时，中国有着悠久的文明史和灿烂的文化，这使得中华文化主体性有着鲜明的中国特色与民族气质。中华文化主体性就是整个中华民族的文化主体性。中华文化曾经有着坚定的主体性意识，在应对现代化过程出现的主体性危机中得以出场。

三、马克思现代性思想视域下中华文化主体性的境遇审视

巩固文化主体性蕴含一个前提，那就是文化主体性曾经失落过，因此我们需要巩固文化主体性。近代以来，现代化是中华文化所要应对的时代任务。同时，如何在现代化的复杂局面下保持自身的主体性则是中华文化所面临的时代难题。马克思现代性思想为我们从历史深处审视中华文化主体性的境遇，从而把握中华文化在现代化过程中的主要任务以及解决巩固中华文化主体性的时代难题提供了理论武器。

(一) 资本逻辑扩张的本性：文化帝国主义对中华文化主体性的侵蚀

马克思对资本的辩证批判是马克思现代性思想的支柱之一。马克思深刻揭示了资本逻辑的扩张本性。全球化的历史在资本向世界范围内扩张的过程中开启。由于全球化，人类历史真正成为世界史，因而散落在世界各地的各民族日益成为一个整体。在现代性的驱动下，世界格局日益被理解为中心——边缘模式，这种二元对立的思维模式成为文化帝国主义生成的逻辑基点。在现代化过程中，由西方现代性所构建的中心——边缘模式运用文化霸权对中华民族自身民族身份标识认可的消除，生成出“我是谁”的文化认同的主体性危机，这种危机侵蚀了中华民族的文化主体性。西方霸权主义国家时常运用和平演变来宣扬其普世价值观念，从文化上瓦解掉当代中国所赖以发展的文化根基。西方反华势力通过挑起中国内部民族矛盾的方式，破坏民族团结，瓦解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等行为无不表露出其帝国主义行径。其试图通过冠以其他民族之名消灭中华文化主体性的“中华”之名来侵蚀中华文化主体性。文化主体性主体之名的瓦解，会从根本上瓦解掉中华民族的文化主体性。

（二）现代性对价值的消融：文化虚无主义对中华文化主体性的消解

理性作为认识万物的尺度已然成为人类追寻自己安身立命之地的坐标系。但是理性主义的神话终究还是破灭了，理性主义的高扬使得工具理性压倒价值理性，最终使得人们信仰崩塌、价值撕裂。中国的现代化历程是西方用坚船利炮开启的，在与西方列强数次失败的对抗中，在一次次签订不平等条约的过程中，中国人的自信受到了深深的打击。民族危机的不断加重使得中国人对于自己文化的价值走向怀疑，文化虚无主义盛嚣尘上，一些人甚至鼓吹“全盘西化论”，认为西方的月亮比东方圆。对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批判走向极端，认为中国落后挨打根本在于中国的文化落后，主张全面学习西方的各个方面。中华文化所提倡的重视家庭、忠孝、重义轻利等观念因与西方主导的现代性所强调的价值相背，因而被认为是落后的，是封建愚昧的，是应当被抛弃的。现代性所展现的抽象性将中华文化的丰富内涵抽离掉，只剩下一个抽象的文化概念符号。这种抽离作用，将中华民族赖以存在的共有精神家园摧毁掉，最终导致中国人对自身文化价值的虚无感。西方凭借着其掌握的宣称媒体机器，运用话语霸权兜售虚无主义价值观念，宣传个人主义价值观念消解社会主义文化的集体主义观念，以此消融掉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现代性对价值的消融作用从各方面对中华文化主体性造成长期冲击。

（三）传统符号的机械复制：文化复古主义对中华文化主体性的遮蔽

文化虚无主义渴望从西方世界求得解决中国难题的药方，文化复古主义则企图从历史故纸堆里去寻找处理时代难题的答案。对现代社会的不满以及对古代社会充满幻想是文化复古主义者的心理映射。他们渴望回到过去，做一个卫道士，在他们眼中现代是不堪的，过去是美好的天国。文化复古主义企图用历史的尘埃来塑造当代，用当代事迹来为历史做注脚。现代化的历史是全球化的历史，任何民族或者国家想要退回到封闭状态都是徒劳的。由于文化主体性本身就是伴随着人类现代化的历史实践进程而产生的，也只有在现代化中展现其时代价值。因而，拒绝现代化本身就意味着对文化主体性的抛弃。文化复古主义幻想重新回到前现代时期，完全恪守本土文化、古代文化，无条件排斥外来文化，拒绝全球化，最终只会将自身营造成“文化孤岛”。

四、新时代巩固中华文化主体性的路径依循

现代化是人类社会发展不可逆的趋势，文化主体性需要处理好“古今问题”；全球化在给文化主体性带来挑战的同时，也给予文化主体性在更广阔的文化空间内表露自己生命力以机会，因此需要处理好“中外问题”。在新时代，需要深入推进中国式现代化为巩固中华文化主体性奠定现实基础；要坚持“两个结合”为巩固文化主体性提供根本方法；在推进文明“交流互鉴”中拓展中华文化主体性的生命力。

（一）奠定现实基础：在深入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实践中巩固中华文化主体性

以中国式现代化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是我们的时代课题。中国的现代化催生了中华文化主体性问题，因此推进中国式现代化便是当代中国巩固文化主体性的关键。中国式现代化“不是简单延续我国历史文化的母版，不是简单套用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设想的模板，不是其他国家社会主义实践的再版，也不是国外现代化发展的翻版。”^[8]中国式现代化具有鲜明中国特色，就在于中华文化主体性在中国式现代化过程中生成、构建与巩固。没有坚定的文化主体性，就没有在现代化过程中对于自身文脉、发展模式、发展道路坚持，也就失去了现代化的中国特色。中国式现代化与中华文化主体性是深度耦合的。历史唯物主义认为“物质生活的生产方式制约着整个社会生活、政治生活和精神生活的过程。”^[9]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必须坚持实现经济高质量发展，为巩固文化主体性提供物质基础。中国推进现代化建设不是为了少数人，而是为了最广大的人民群众。中华文化主体性也不是某一部分人的文化主体性，而是全体中国人的文化主体性。在中国式现代化过程中，实现了人口规模巨大的现代化，这就巩固了文化主体性的主体数量基数。现代化归根到底是人的现代化。文化主体性就是为了将人这一主体从现代性的危机中拯救出来，中国式现代化走出了一条与“人被奴役”完全不同的现代化之路，他以实现人的自由而全面发展为价值导向，实现了对人的价值的回归，也实现了对中华文化主体性的回归。

（二）坚持根本方法：在深入推进“两个结合”的过程中巩固中华文化主体性

“历史正反两方面的经验表面，‘两个结合’是我们取得成功的最大法宝。”^[10]中国共产党领导全国各族人民进行的革命与改革之所以能够取得成功，就在于善于运用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来解决实际问题。

只有将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运用到解决中国的具体问题当中，才能展现马克思主义的理论伟力。必须坚持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的指导地位，指明引领当代中国文化发展的方向标。将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从根本上来说就是巩固了中华文化主体性。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是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促进社会主义文化发展的必由之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蕴含的治理思想、家国情怀、精神追求、经济伦理、生态理念、哲学思想、思维方法、交往之道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精神，是中华五千年文明的结晶。这些文化精神与马克思主义有着高度契合点。实现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能够唤起中华文化精神的生机与活力。中华文化的精神在当代传承、坚守、创新的过程中得以延续，中华文化主体性由此得以巩固。

（三）拓展文化生命：在深入推进文明“交流互鉴”的过程中巩固中华文化主体性

他山之石，可以攻玉。在全球化时代，文明与文明之间坚持相互交流才能延续与创造文明新的辉煌。“开放

包容始终是文明发展的活力来源,也是文化自信的显著标志。中华文明的博大气象,就得益于中华文化自古以来开放的姿态、包容的胸怀。”^[11]文明在交流的过程中,地位是平等的。文明没有高下、优劣之分,只有特色、地域之别。中华文明善于学习其他文明的优秀文化成果,在他者之镜中照亮自我。道并行而不悖,在文明“交流互鉴”的过程中,中华文化主体性得以巩固。“推动中华文明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激活其生命力,让中华文明同各国人民创造的多彩文明一道,为人类提供正确精神指引”^[12]巩固文化主体性要在世界舞台上更好讲好中国故事,传播中国声音,讲述中国立场,展现中国智慧。让中华文化为世界发展贡献力量。在推动中华文化走向更广阔地世界舞台时,也要保持开放的胸怀,善于从不同文明成果中汲取力量。但是有一个原则是不能丢掉的,即要以我为主,为我所用。“我们的态度是批判地接受我们自己的历史遗产和外国的思想。我们既反对盲目接受任何思想也反对盲目抵制任何思想。我们中国人必须用我们自己的头脑进行思考,并决定什么东西能在我们自己的土壤里生长起来。”^[13]借鉴不能囫圇吞枣,更不能邯郸学步。在积极吸纳、去粗取精、去伪存真的过程中做到取长补短、择善而从、兼收并蓄,中华文化主体性得以巩固。

中华文明历经五千年而不绝,经受忧患而不衰,就在于中华民族对于自己的文化有着坚定的主体性,其根本原因在于中华文明具有突出的统一性连续性。鸦片战争将中国从“天朝上国”的幻梦中惊醒,中国在现代化的冲击下出现了主体性危机。在现代性的统摄下,文化霸权主义、文化虚无主义、文化复古主体对中华文化主体性造成了极大挑战。马克思主义的传入以及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扭转了中华文化主体性衰落的危机。新时代,在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推进“两个结合”、推进文明“交流互鉴”的过程中,中华文化主体性得以巩固。

参考文献:

- [1] 习近平.在文化传承发展座谈会上的讲话[M].北京:人民出版社,2023:8-9.
- [2] 谢立中.“现代性”及其相关概念词义辨析[J].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1,(05):25-32.
- [3] 马泰·卡林内斯库.现代性的五副面孔,顾爱彬等译[M].北京:商务印书馆,2002:49.
- [4] 伯林.反潮流:观念史论文集,冯克利译[M].南京:译林出版社,2002:1.
- [5]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一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403-404.
- [6] 丰子义.马克思现代性思想的当代解读[J].中国社会科学,2005,(04):53-62+206.
- [7] 哈贝马斯.现代性的哲学话语,曹卫东译[M].南京:译林出版社,2011:21.
- [8] 习近平著作选读(第一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23:48.
- [9]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二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2.
- [10] 习近平.在文化传承发展座谈会上的讲话北京[M].人民出版社,2023:5.
- [11] 习近平.在文化传承发展座谈会上的讲话北京[M].人民出版社,2023:10-11.
- [12]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习近平关于社会主义文化建设论述摘编,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83.
- [13] 毛泽东文集(第三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6:192.

Examination and consolidation path of the subjectivity of Chinese culture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Marx's modernity thought

Liu guo¹

¹ Sichuan Academy of Social Sciences, Chengdu, Sichuan 610500, China

Abstract: At the symposium on cultural inheritance, General Secretary Xi Jinping proposed and elaborated on the "two integrations," which consolidates the major theoretical proposition of the subjectivity of Chinese culture. With cultural subjectivity, the cultural confidence of the Chinese nation has the most fundamental support. Cultural subjectivity emerged from the reflection on the subjectivity crisis that occurred during the process of modernization, and the subjectivity of Chinese culture was born with China's modernization. Modernity is the essential defining characteristic of modernization, and Marx's thought on modernity provides insightful analysis of modernity. It is of great practical significance to use Marx's thought on modernity to reveal the erosion of cultural hegemony, cultural nihilism, and cultural revivalism on the subjectivity of Chinese culture. In the new era, consolidating the subjectivity of Chinese culture requires deepening the promotion of Chinese-style modernization, adhering to the "two integrations," and further promoting the "exchange and mutual learning" of civilizations.

Keywords: The subjectivity of Chinese culture; modernity; excellent traditional Chinese culture; the integration of the two; Chinese-style modernization

破解同质化：TF 职业学校差异化战略的多模型实证

秦雯¹ 梁天悦¹

(1.安徽职业技术大学, 安徽 合肥 230011)

摘要:近年来, 国家及地方政策持续支持职业教育发展并推动“职普融通”, 为民办职校带来机遇。然而, 监管趋严与生源竞争加剧, 使得民办职校面临生存危机, 亟需明确竞争战略。本文以 TF 职业学校为例, 运用多模型展开实证研究, 使用 PEST、波特五力模型分析该校的外部环境, 并评估其内部资源能力, 通过 SWOT 识别机遇挑战与优劣势。经定量战略规划矩阵分析, 最终选定差异化战略作为该校的核心竞争战略。

关键词:职业教育; 差异化战略; 民办职校; 产教融合

基金项目:安徽省科研计划编制项目人文社科类重点项目“融合应用‘科技+绿色金融’赋能新质生产力发展”(项目编号:2024AH052674)

DOI: doi.org/10.70693/rwsk.v1i8.1234

一、绪论

(一) 研究背景

我国自 1982 年《宪法》修正案明确民办教育合法地位后, 民办教育逐步发展。近年国家出台《职业教育法(2022)》等文件规范办学, 地方如《山东省职业教育条例(2023 修订)》《安徽省民办职业培训学校办学管理办法(2023)》同步推进, 形成“扶持与监管并行”体系。

然而, 职业教育仍面临多重挑战: 设施师资不足、教学质量与实践能力薄弱、社会认可度低。其中, 民办学校无政府资金, 需自负盈亏, 学杂费高于公办校, 生源多依赖公办指标外学生, 导致生源质量差、规模不稳的情况更加突出。此外, 合肥乃至全安徽省职校招生人数逐年递减, 2023 年更出现大幅下滑, 形成“生源差—质量弱—招生难”的恶性循环。

(二) 研究意义

本研究将为职业教育竞争现状与趋势提供理论参考, 以 TF 职业学校为研究对象, 补充民办职校战略调整的实践案例。值得一提的是, TF 学校的困境具有普遍性——外部竞争加剧、内部变革滞后、特色缺失等问题制约发展, 分析其破局路径有助于推动职教改革、促进民办校健康发展, 也可为企业竞争战略研究提供借鉴。

二、TF 职业学校内外部环境分析

(一) TF 职业学校基本情况分析

1. TF 职业学校简介

TF 职业学校成立于 1997 年, 位于安徽省合肥市庐阳区, 占地 80 亩, 2007 年在双凤开发区新建双凤校区(集团总部), 现设淮南路(升学)、双凤(就业)、金川路(护理)三个校区, 总占地 518 亩。学校现有在校生 8000 余人, 教职职工 470 余人, 董事会下设三大分校, 每校设校长 1 名(董事会成员)、副校长 3 名, 财务部直接向校长负责, 见图 1。

作者简介: 秦雯(1994—), 女, 硕士, 研究方向为工商管理、金融科技、税法等。

梁天悦(1994—), 女, 硕士, 研究方向为金融、工商管理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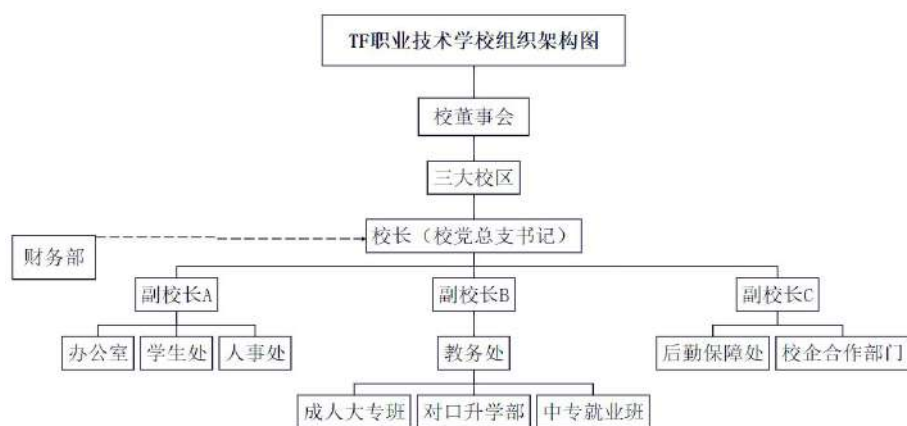


图1 TF 职业学校组织架构图

专业设置上，学校开设 16 个重点专业，涵盖动漫、幼儿艺术、数字出版、数控、机电一体化、网络工程等领域，采用“订单式”人才培养模式，与格力、北大方正等企业合作，学生在校期间参与企业实训、实习及项目合作，同时开设创新创业课程。

2. 学校业务发展现状介绍

目前，TF 职业学校的三大校区整体发展良好，各具侧重，淮南路校区（以升学方向为主）、双凤校区（以技术就业为主）、金川路校区（以护理专业为主）。淮南路校区在校生 2000 余人，要求中考 420 分以上，2022 年对口升本 125 人，3+2 五年一贯制升学率 95%，略高于同类民办校；双凤校区是主校区，在校生 4000 余人，毕业生双证率 100%，与格力、苏州腾飞等企业合作，就业率近 100%，月均收入 3500 元（部分超 5000 元），开设 12 个成人大专班，满员率 85% 以上；金川路校区在校生 2000 余人，年招生 600 人，开设幼儿护理、老年服务与管理专业，但优势不突出。

（二）TF 职业学校的外部环境分析

1. 宏观环境分析

（1）政治环境

国家《关于推动现代职业教育高质量发展的意见》（2021）、《关于深化现代职业教育体系建设改革的意见》（2022）明确职教发展方向；安徽省 2020-2023 年出台《职业院校教师队伍建设实施办法》《民办职业培训学校办学管理办法》等，规范办学行为，提升行业门槛。

（2）经济环境

2022 年合肥 GDP 12013.1 亿元（同比+3.5%），第二产业增速 5.4%，新增“芯屏汽合”“急终生智”等 16 条重点产业链，贡献 60% 以上工业产值；2023 年 GDP 预计超 13100 亿元，新兴产业人才缺口大，推动职教需求。

（3）社会环境

2022 年合肥常住人口 963.4 万（城镇化率 84.64%），15-59 岁劳动主力占比 67.92%，大专及以上学历占 37.4%，职教学历占比 51.8%，在政策推动下社会对职教认可度逐步提升，但暂未根本改变“职教低人一等”偏见。

（4）技术环境

互联网+推动产业升级，合肥向高端制造、现代服务转型，需技能人才适配；现代化教学设施（实验室、多媒体教室）普及，提高教学质量，但在线教育平台同时冲击着学校的非全日制办学业务。

2. 行业环境分析

（1）安徽省职业教育行业概况

安徽省为制造业大省，职业教育需求旺盛，但 2019-2022 年中职学校数量从 328 所减至 249 所，可见中职学校关停倒闭情况严重；在校生从 75.1 万降至 72.8 万，生源竞争压力大；热门专业（装备制造、电子与信息等）点数占比超 50%，同质化严重，竞争白热化。

（2）波特五力模型分析

TF 职业学校成立于 1997 年，是一所集成人教育、职业教育及高级技能培训为一体的民办学校。下文将运用波特五力模型展开分析。

供应商议价能力：教学设备供应商分大型（新华、希沃）与本地小厂商，学校因规模较大，因此对大型供应商有一定的议价权，但议价空间有限。

消费者议价能力：虽然技能培训因市场竞争激烈，消费者（学生家长）通常倾向低价平台，但学历教育学杂费由教育局统一定价，学生消费场景集中校内（食堂、超市），总体来说消费者议价较弱。

新进入者的威胁：学历教育办学资质审核严格（场地、师资、收费），行业门槛高；民办校依赖口碑，TF 职校 27 年办学历史也形成一定的市场壁垒。

替代品的威胁：在线教育平台（如我要自学网）冲击非全日制办学业务，但实践类课程（工科）难替代；TF 职校全日制教育辐射成人培训，提供就业服务，替代风险较低。

同行间竞争者：主要对手选定合肥 LG 学校（民办中专），具体见表 1。

表 1 TF 职业学校与合肥 LG 学校对比分析表

项目	TF 职业学校	合肥 LG 学校
性质	民办	民办
校区数及规模	3 个/518 亩	1 个/462 亩
建校时间	1997 年	2006 年
办学地点	长丰县、庐阳区、肥东	肥东
业务范围	全日制中专/成人培训	全日制中专
专业数	16 个	17 个
	老年人服务与管理、汽车运用与维修、出版与发行、城市轨道交通运营管理、影像与影视技术……	计算机应用、无人机应用、工业机器人技术应用、动漫游戏制作、园林技术……
特色专业		
学生人数	8556 人	8677 人
教职工人数	470 人左右	520 人左右
学杂费	800-1200/学期	600-1100/学期
生活费	926 元/月	874 元/月
对口升本人数	125	128
3+2 升学率	95%	95.5%
就业率	近 100%	94.7%
政策补贴	2800~3000 元/3 年	2800~3000 元/3 年

对比显示, TF 职校办学历史更久(1997 vs 2006)、校区分布更优(主城区)、社会知名度略高;合肥 LG 学校规模稍大(8677 人 vs 8556 人)、专业更灵活(无人机、工业机器人等新兴专业),但两校规模、师生数接近,竞争胶着。

(3) TF 职业学校面临的机遇和挑战

据上文分析可以得出 TF 职业属学校的外部机遇与挑战如下。

机遇因素包括:政策扶持(贫困生补助)、竞争对手淘汰(监管趋严)、企业合作需求(定制化培养)、技术进步(现代化教学设施)、合肥工业化需求(新兴产业人才缺口)、护理专业壁垒(资质要求高)。

挑战因素包括:行业竞争加剧(存量学校质量提升)、政府监管趋严(新专业设置受限)、社会认可度低(招生难)、疫情冲击经济(企业用工减少)、在线教育冲击(非全日制业务)、中职生源减少(2019-2022 年减 2.3 万)。

(三) TF 职业学校内部资源及能力分析

1. 内部资源分析

学校教职工 470 余人,专职教师 374 人(本科率 91%,研究生 54 人,高级职称 70%),双师型教师 37%,师生比 19.4:1,师资水平略高于安徽民办中专平均水平。在硬件设施方面三大校区按定位配置设施——双凤、淮南路校区设计计算机实验室、模拟实训室;金川路校区设 8 个护理实验室、2 个技能训练室、1 个临床基地。此外,学校在全国设立 18 个就业办事处,与海尔、北大方正等企业合作,毕业生双证率 100%,就业率近 100%,就业指导能力突出。

2. 内部能力分析

校企合作部门协调企业资源,开设出版与发行、影像与影视技术等市示范专业,但专业更新较慢(3 年一调,部分专业近 10 年未变)。在学生管理方面已经建立健全的学生管理体系,包括招生、学籍管理、培养计划等方面的规范和措施,并注重学生个性化发展。学校在教师团队培养方面具备一定能力,但部分老教师学历水平提升困难,这阻碍了学校教师团队的整体提升。目前,学校通过三大校区的布局,提升知名度和社会影响力。此外,学校也紧随时代需求,建立官方网站,并开设官方校园公众号,通过文字图片新闻、直播的方式提升社会影响力。

3. TF 职业学校竞争优劣势分析

据上文分析可以得出 TF 职业学校的竞争优势和劣势如下。

优势方面,办学历史久(27 年)、规模大(518 亩)、升学率较高(3+2 95%)、就业率突出(100%)、企业资源丰富(160+合作企业)。

劣势方面,教师团队建设不足(师生比 19.4:1,部分教师学历偏低)、管理制度僵化(部分规章沿用 20 年前)、专业调整慢(课程更新滞后市场需求)、学杂费较高(800-1200 元/学期)、专业特色不突出(双凤校区专业雷同,金川路校区护理优势弱)。

三、TF 职业学校竞争战略选择

(一) 内外部因素评价矩阵分析

下文将通过 EFE 矩阵和 IFE 矩阵来对学校的外部环境和内部因素进行赋值分析,表中参评因素的权重和评分是由 12 名校内外专家通过对关键因素进行评分,再运用德尔菲法进行三轮打分,确定每项关键因素的权重。

1.外部因素评价矩阵 (EFE) 分析

根据上文对 TF 职业学校外部环境中的机遇和挑战的分析,制成 TF 职业学校外部因素 EFE 矩阵分析表,具体见表 2。

表 2 TF 职业学校外部因素 EFE 矩阵分析表

	关键外部因素 (KEF)	评分	权重	加权分数
机遇	O1 政府对职业教育的政策扶持。	3	0.1	0.3
	O2 职业教育学校数量减少,竞争对手数量下降。	4	0.08	0.32
	O3 外部投资者加入,校企联培,改善办学条件。	4	0.09	0.36
	O4 技术进步推动学校教学水平提升。	3	0.07	0.21
	O5 所在地重视工业发展,技能型人才需求缺口加大。	4	0.1	0.4
	O6 护理专业开设具备一定行业壁垒。	4	0.08	0.32
威胁	小计		0.52	1.91
	T1 行业竞争激烈,竞争对手实力强劲。	1	0.09	0.09
	T2 民办学校监管日益严格,政策变化产生风险。	2	0.07	0.14
	T3 仍存在歧视职业教育的情况,社会认可度低。	2	0.08	0.16
	T4 疫情影响,经济形势下滑,就业市场不景气。	2	0.08	0.16
	T5 线上技术培训教育产生巨大冲击。	1	0.07	0.07
	T6 中职学生入学人数日益减少。	1	0.09	0.09
	小计		0.48	0.71
	总计		1	2.62

(说明: 4-反应很好, 3-反应超过平均水平, 2-反应为平均水平, 1-反应差。)

根据评分结果,TF 职业学校外部环境因素评价总分: 2.62 分 > 2.5 分,因此,TF 职业学校所面临的发展机会高于威胁。

2.内部因素评价矩阵 (IFE) 分析

根据上文中对 TF 职业学校内部环境中的优势和劣势的分析,制成 TF 职业学校内部因素 IFE 矩阵分析表,具体见表 3。

表 3 TF 职业学校内部因素评价矩阵 (IFE) 矩阵

	关键内部因素 (KIF)	评分	权重	加权分数
优势	S1 办学历史悠久,社会声誉良好。	4	0.09	0.36
	S2 办学规模大,社会影响力大。	4	0.08	0.32
	S3 3+2 升学率高,对口升本稍不足。	3	0.11	0.33
	S4 就业指导完善,学生就业率高。	4	0.12	0.48
	S5 企业资源丰富,提供实习、工作机会。	4	0.11	0.44
劣势	小计		0.51	1.93
	W1 教师团队稳定性不足,积极性不够。	1	0.08	0.08
	W2 学校管理制度更新慢,缺少科学研究。	2	0.07	0.14
	W3 专业调整与更新速度慢。	1	0.11	0.11
	W4 学生学杂费、生活费较高。	2	0.1	0.2
	W5 专业特色不突出,竞争力较弱。	1	0.13	0.13
	小计		0.49	0.66
	总计		1	2.59

(说明: 4-反应很好, 3-反应超过平均水平, 2-反应为平均水平, 1-反应差。)

根据评分结果,TF 职业学校内部环境因素评价总分: 2.59 分 > 2.5 分,说明其内部状况略处于劣势。

(二) QSPM 评价矩阵对三大竞争战略评分结果及战略选择

根据 QSPM 矩阵原理以及前文对 TF 职业学校的外部、内部环境的研究,可以得出 TF 职业学校的 QSPM 矩阵见表 4。

从 QSPM 定量分析可以得出,实施差异化战略的吸引力得分是 6.52 分,远高于成本领先战略的 4.18 分和集中化战略的 5.29 分,因此,应选择差异化战略作为 TF 职业学校的竞争战略。

表4 TF 职业学校 QSPM 矩阵分析表

	关键因素		成本领先战略		差异化战略		集中化战略	
			AS	TAS	AS	TAS	AS	TAS
机会	O1 政府对职业教育的政策扶持。	0.09	2	0.2	3	0.3	1	0.1
	O2 职业教育学校数量减少, 竞争对手数量下降。	0.07	2	0.16	3	0.24	1	0.08
	O3 外部投资者加入, 校企联培, 改善办学条件。	0.09	3	0.27	4	0.36	2	0.18
	O4 技术进步推动学校教学水平提升。	0.07	2	0.14	3	0.21	3	0.21
	O5 所在地重视工业发展, 技能型人才需求缺口加大。	0.09	2	0.2	3	0.3	4	0.4
威胁	O6 护理专业开设具备一定行业壁垒。	0.09	2	0.16	3	0.24	4	0.32
	T1 行业竞争激烈, 竞争对手实力强劲。	0.09	2	0.18	4	0.36	3	0.27
	T2 民办学校监管日益严格, 政策变化产生风险。	0.07	2	0.14	3	0.21	4	0.28
	T3 仍存在歧视职业教育的情况, 社会认可度低。	0.08	2	0.16	3	0.24	1	0.08
	T4 疫情影响, 经济形势下滑, 就业市场不景气。	0.09	4	0.32	3	0.24	3	0.24
优势	T5 线上技术培训教育产生巨大冲击。	0.08	3	0.21	4	0.28	2	0.14
	T6 中职学生入学人数日益减少。	0.09	2	0.18	3	0.27	1	0.09
	S1 办学历史悠久, 社会声誉良好。	0.09	2	0.18	3	0.27	1	0.09
	S2 办学规模大, 社会影响力大。	0.08	1	0.08	4	0.32	3	0.24
	S3 3+2 升学率高, 对口升本稍不足。	0.1	1	0.11	3	0.33	2	0.22
劣势	S4 就业指导完善, 学生就业率高。	0.12	2	0.24	4	0.48	3	0.36
	S5 企业资源丰富, 提供实习、工作机会。	0.11	2	0.22	3	0.33	4	0.44
	W1 教师团队稳定性不足, 积极性不够。	0.08	1	0.08	3	0.24	4	0.32
	W2 学校管理制度更新慢, 缺少科学研究。	0.07	1	0.07	2	0.14	3	0.21
	W3 专业调整与更新速度慢。	0.11	2	0.22	4	0.44	3	0.33
	W4 学生学杂费、生活费较高。	0.11	4	0.4	2	0.2	3	0.3
	W5 专业特色不突出, 竞争力较弱。	0.13	2	0.26	4	0.52	3	0.39
	总计			4.18		6.52		5.29

(说明: 1-没有吸引力, 2-有一些吸引力, 3-有相当吸引力, 4-很有吸引力)

四、差异化竞争战略的实施与保障

(一) TF 职业学校实施差异化战略的措施

当前职业教育宏观环境与行业竞争加剧, 民办职校面临生源拓展困难、兼并倒闭风险上升等问题, 市场需求向特色化、高质量转变, TF 职业学校需通过差异化战略提升竞争力。结合内部资源分析, 其核心举措包括以下五个方面。

1. 强化特色专业群建设

针对专业设置问题(王牌专业社会需求不足、更新慢), 结合三校区定位差异化调整: 双凤校区(就业方向)整合电子信息(电子元器件、计算机硬件)、现代服务业(物流、旅游、文化设计)同类专业, 形成大类通识技能学习与特色专业集群; 淮南路校区(对口升学)重点支持城市轨道交通运营管理(3+2 升学率近 100%)、计算机网络技术(升学率 98%)、出版发行(对口升本成功占比超 50%)等优势专业, 加强电子商务、汽车运用与维修等低升学率专业的实训与师资投入; 金川路校区(护理方向)依托幼儿护理、老年护理、眼视光技术等已形成的特色群(百度搜索合肥护理中专排名前三), 需进一步向头部护理院校(庐州卫生科技学校等)看齐, 倾斜资源提升知名度。同时, 加快专业更新速度, 通过董事会、市场调研等方式压缩调整年限, 借鉴合肥理工学校增设特色课程。

2. 打造德育特色校园

针对职校普遍存在的校风松散, 如染发纹身、卫生差、逃课等问题, TF 职业学校强化立德树人, 制定严格学生管理制度(班主任、教师、学生处、学生会综合监督), 规范日常行为; 加强师资培训, 提升教师教育水平, 培育职业道德与职业素养并重的差异化社会声誉。

3. 校企共建特色实训基地

针对实训资源不足(如汽车装配难以在小实训室完成), 拓展多样化实训项目; 与企业合作共建特色实训基地——由企业提出人才需求、签订用工协议, 区别于通用型实训基地, 特色实训基地, 既符合企业要求“毕业即上手”的用工需求, 又能满足学生实操需求, 保障学校就业率。

4. 培养特色双师资队伍

应对教师流动大问题, 通过培训、学术交流提升教学科研能力, 出台教师学历提升方案; 引进行业专家、技术人才扩大“双师”队伍; 修正教师评价及薪酬体系, 提高待遇以吸引和稳定优秀教师。

5. 优化特色就业指导

依托 100 多个战略合作伙伴的企业资源，打破公办学校的政策限制，更灵活地拓展校企合作项目；利用全国 18 个城市就业指导办事处网络（拟向二、三、四线城市延伸），将招生与就业深度捆绑，强化就业竞争力，形成‘高就业率’的核心差异化竞争优势

（二）差异化战略实施的保障

1. 人力资源保障

加强教师引进与培养，如按学历、专业背景等分为 A/B/C/D 四类人才，提供住房补贴、科研经费等差异化支持；寒暑假通过线上线下培训、企业实践等提升教职工能力；为学历提升教师提供物质支持并签订定向合同。同时，针对校企合作部门人力不足的情况，补充校企合作等部门人力支持。

2. 财物资源保障

建立完善财务管理体系（责任制度、风险控制、资金效率优化），引入社会资本并争取政府政策资金支持；重点向金川路校区倾斜资源——该校区原老卫校设备近五年采购仅占三校区 22%，部分设备超十年使用期，需新增护理实验室与实训大楼。

3. 管理制度保障

完善教学管理系统（如升级指纹考勤、增加阶段性评价功能），建立人员组织架构、工作流程等标准化体系；通过激励机制、培训计划提升团队协作效率；细化企业合作部门职能，参与行业协会活动，深化产教融合与产学研合作，动态调整战略。

五、研究结论与展望

在“职普融通”政策与产业升级背景下，职业教育机构面临需求扩张与竞争加剧的双重挑战。本文通过 PEST 模型、波特五力模型、QSPM 矩阵等多模型分析 TF 职业学校的内外部环境，揭示其生存困境源于同质化竞争与特色缺失，确定差异化战略为破局核心。并具体提出五大实施路径：强化特色专业群建设（如护理、智能制造），打造德育特色校园重塑职教形象，校企共建实训基地深化产教融合，培养“双师型”队伍提升教学效能，优化全国就业网络增强就业竞争力。同时，为战略落地需配套人力、财力、制度保障机制，确保差异化战略的有效实施。

未来研究可以进一步联合行业协会构建职教数据库，采用定量建模（战略绩效评估）与质性访谈（企业-学生-教师三角验证）交叉验证，引入 SWOT-AHP 模型量化战略优先级，并深化差异化战略在课程创新、师资激励中的实施路径。

参考文献：

- [1] 黄颖. 从企业竞争战略看企业成长[J]. 经济研究导刊, 2023, (05): 15-19.
- [2] 王桂云, 王明明. 差异化战略视域下民办高校专业建设策略研究[J]. 中国成人教育, 2016, (24): 84-89.
- [3] 盛文锋. 广东 A 职业学院发展战略研究[D]. 西南交通大学, 2018.
- [4] 李丹丹. “双减”背景下职业教育有效赋能基础教育的 PEST 分析[J]. 职教通讯, 2022, (06): 42-50.
- [5] 宋砚秋, 齐永欣, 高婷, 王瑶琪. 政府创新补贴、企业创新活力与创新绩效[J]. 经济学家, 2021, (06): 111-120.
- [6] 李平, 王盈. 试论高等学校的差异化战略定位[J]. 高等理科教育, 2007, (05): 1-7.

Breaking Homogeneity: A Multi-model Empirical Study on TF Vocational School's Differentiation Strategy

Qin Wen¹, Liang Tianyue¹

¹ Anhui University Of Applied Technology, Hefei, Anhui 230011, China

Abstract: In recent years, national and local policies have consistently supported the development of vocational education while promoting “convergence between vocational and ordinary education,” bringing opportunities to privately-run vocational schools. However, intensified regulatory oversight and heightened competition for student enrollment have plunged these institutions into a survival crisis, necessitating clear competitive strategies. Taking TF Vocational School as an example, this paper employs PEST analysis and Porter’s Five Forces Model to examine its external environment, evaluates its internal resources and capabilities, and utilizes SWOT analysis to identify opportunities, challenges, strengths, and weaknesses. Through quantitative Strategic Planning Matrices (QSPM) analysis, a differentiation strategy is ultimately selected as the core solution.

Keywords: Vocational Education; Differentiation Strategy; Private Vocational Schools; Integration of Industry and Education

问题导向的“电工电子技术”教学方法研究与实践

李培¹ 于晟伟^{1*}

(1.中国消防救援学院, 北京 北京 102202)

摘 要: 面向学生拓展与创新思维能力的培养需求, 结合教学实践经验, 开展问题导向的“电工电子技术”课程教学方法探究与实践。通过调研分析, 探讨问题导向“电工电子技术”探索式教学的实施困境与对策, 以笼型电动机正反转控制线路为例进行教学设计与实践, 结合教育背景、实际学情和电工电子课程特色, 基于层次化推演开展问题导向的教学过程, 设计具有强逻辑性的递进式问题驱动链, 并进行教学成效总结与反思。驱动学生在掌握理论知识的基础上启发创新思维, 增强学生发现-分析-解决问题的能力, 亲历电工电子知识的鲜活性, 达到良好的教学效果。

关键词: 电工电子技术; 问题导向; 电动机正反转控制; 教学方法

基金项目: 北京市高等教育学会 2024 年面上课题(MS2024231); 北京市高等教育学会 2024 年面上课题(MS2024037); 中国消防救援学院 2025 年教改项目(2025KCSZ03); 中国消防救援学院 2025 年预研项目(XFKYY202513)

DOI: doi.org/10.70693/rwsk.v1i8.1235

一、引言

高等教育人才培养目标的重要内容之一是形成“发现-分析-解决”问题的逻辑思维和拓展创新能力, 高校应跟进时代发展要求不断创新教育教学方法, 培养时代新人。以作者所在单位——中国消防救援学院为例, 以问题引导和驱动学生学是教师常采用的教学方法, 在激发学生学习兴趣的同时可有效促进学生对知识的思考与探索, 利于多方面能力的培养, 极具现实意义, 是满足消防救援应用型人才培养需求的重要教学方式之一。“电工电子技术”作为本校非电类专业学生的一门必修课程, 一般以“高等数学”、“物理”等课程作为先修课程, 教学目的和任务是使学生掌握必需的理论知识, 形成解决问题的逻辑思维与能力, 具备可适应未来职业需求变化的能力, 为学生的后续课程及未来工作打下必要基础, 因此“电工电子技术”课程与人才培养目标具有较高契合性。

以问题驱动教学的方法具有自主性、实践性、开放性等特点, 在信息技术飞速发展的当下, 学生的思维习惯越发趋向于多样化, 更愿意主动探索更加深刻有价值的问题^[1,2], 因此该方法更符合学生的认知水平及思维发展需求, “电工电子技术”课程与培养学生逻辑能力、辩证思维等方面具有较高的契合性。此外, 问题驱动的教学方法对教师的专业能力、逻辑思维等具有较高要求, 是推动电工电子教师学科素养的客观需要^[3]。

教师作为直接关联课程质量的关键角色, 需要合理有效的利用问题提高学生的逻辑能力与思考力。然而, 中国消防救援学院招收的学生包括来自消防基层的队伍生和来自高考的青年生, 学生具备基础差异大、训练时间长、理论学时较常规高校短、未来职业指向性明显等鲜明特征, 面向具有消防教育背景的特殊学情, 以问题导向的“电工电子技术”教学需立足实际, 适应学生的未来消防职业发展需要, 根据课程特征探思问题导向的教学原则, 设计问题驱动链, 搭建层次化的逻辑问题体系, 满足学生培养需求。

二、问题导向“电工电子技术”教学实施困境与对策

作者简介: 李 培(1986—), 女, 博士, 讲师, 研究方向为电工电子、高等数学教育;

于晟伟(1995—), 男, 博士, 讲师, 研究方向为偏微分方程、次黎曼流形、动力系统、复杂网络、高等数学教育。

通讯作者: 于晟伟

以问题导向教学对培养学生的创新能力与逻辑思维具有明显的促进作用。然而,考虑到实际学情,面对“电工电子技术”课程具有的逻辑思维强、内容抽象、知识量庞杂等特点,科学合理的实施问题驱动的启发式教学存在一定的困境,如教师的问题情境设置不够精准、对问题的挖掘不够深入,学生的问题意识不够足、解决问题的能力不够强,师生受传统教学评价影响较深形成固化思维而不够灵活等,围绕这些问题及困境,探究与其相应的对策。以教学目的为导向,以实际学情为基础,合理且精准的设置问题情境。合理的问题设置和精准的情境设置发挥好以问题为导向的“电工电子技术”教学方法的基础,与促使学生具备“问题意识”有直接关联。教师需明确目标导向,如是“为了学生掌握某个知识点”,还是“为了让学生利用所学解决问题”,抑或是“为了激发学生的创造性思维”等。在明确教学目标后,还需综合考虑学生的实际水平、问题难度及复杂度等要适应学生的知识水平与认知能力,如消防队伍生对于复杂问题难以透彻理解等,但问题过于简单又不利于激发青年生的学习兴趣和思维能力。以深厚的理论功底与强大的逻辑思维能力,深度挖掘问题实质。为展现“电工电子技术”课堂的思想性与逻辑性,教师需具备深厚的理论功底、扎实的知识储备与素养、以及强大的逻辑思维能力,还要延伸与电工电子相关学科的广阔视野。以深厚的理论功底深度挖掘课堂内涵,以强大的逻辑思维能力探索与思考知识本体,充分利用各类事实或案例(如面对消防学子未来职业需求,采用“电工电子技术”在消防领域排烟机、水泵、对讲机、消防车等的实际应用)剖析教材的重难点问题,利用专业化的能力素养精准发现并阐释问题本质,在问题破解中建好课堂,由碎片化、随意性、机械化的“碎问”向系统性、差异化、递进式的“深问”发展,由惰性知识向活性知识转化^[4,5]。借助多元化的媒介,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为导向,引发问题意识。通过多样化方式引导学生探究问题背后蕴藏的原因和本质,注重引导学生思考,在探究的过程中提出与课堂知识相关的问题。教师要关注问题引导方式,尽可能的吸引学生注意力,针对学生的视觉性学习风格及对知识点的实际应用与仿真具有浓厚兴趣的特点,借助新媒体、新平台等,采用真实的案例、动画或图片等引出学生疑惑与思考(如采用 Multisim 软件制作实验仿真动画加强学生对抽象问题的理解和新知识的接收度),结合生活实际,找寻学生的兴趣点,激发学生对问题的发现与思考,促进学生积极参与,令学生“敢问、会问、想问”,引领教学方向^[5]。以多元化方法为径,构筑逐层推进的问题驱动链,师生合力分析解决问题。从课程内容及学科特色及出发,采用多样化的工具(如B站、慕课网、视频播放器等资源或工具),利用开放性、启发式问题等,掌握问题设置方法,针对问题特点采用不同的分析与解决方案,以增强课程的“思想性”。除了采用直接给出答案的方法外,可以采用逻辑性引导的方式引发学生间/师生间/师师间的互动探讨,合力分析与解决问题;而针对开放性问题,可提供给学生各类学习资源,如相关教材数目、慕课网、公众号等学习平台与资源,令学生自主分析与解决问题(如调研电动机正反转在消防领域、生产/生活等多个方面的广泛应用),让学生在不同类型的问题分析解决过程中启发自主“分析-解决”思维,形成“问题意识”^[6,7]。建立健全方法评价体系,重视总结评价与反思,促进师生共同成长。在对学生的及时反馈与评价过程中,需要令学生知道“答案是否正确”、“为什么正确/错误”,引导学生对问题的发现-分析-解决全流程进行总结与评价,并予以建议,促使学生在未来能更好的应对相似问题,不断优化改进。课程结束后教师对问题的设置与学生表现进行反思,总结分析“哪些问题需要继续改进”、“如何进行改进”、“哪些问题的设置不够恰当”等,以便在以后的教学中做出相应的调整^[8]。

三、问题导向的“笼型电动机的正反转控制线路”教学实践

教学采用的教材是秦曾煌教授所著的《电工学简明教程》^[4],以其中的关键章节——笼型电动机正反转的控制线路为例,遵照上文提出的方式开展问题导向的“电工电子技术”课程教学计划与实践,探思问题导向链,形成以问题导向的教学逻辑思维体系,如图1所示。

3.1 教学准备

笼型电动机的正反转控制线路是章内及章节间具有承上启下关键角色的重要内容之一,教学重点是线路的设计优化原理,难点是如何理解设计优化逻辑及如何开拓应用。通过采用与消防密切相关的案例(如防火卷帘门的升降、消防送风/排烟系统等)设置情境,设计逐层推进的问题驱动链,以阶梯式问题的挖掘与创设,引导学生发现其中可能存在的问题并合力探讨解决问题的方法。该知识的学习将有助于培养学生的“发现-分析-解决”问题

的逻辑思维能力，以及严谨求实的职业态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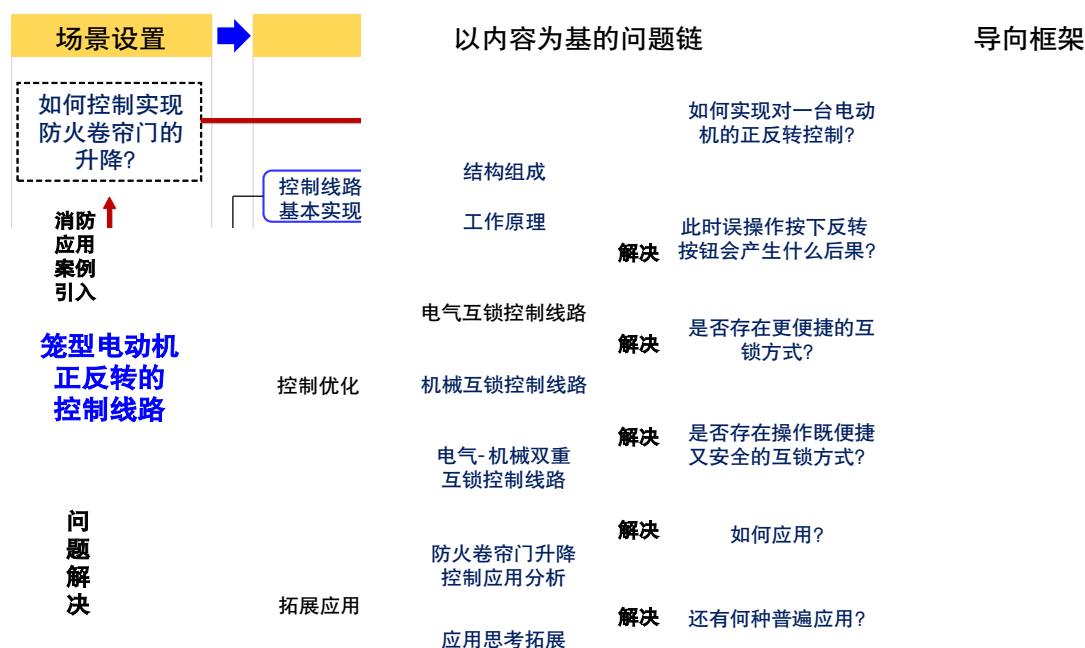


图 1 以问题导向的教学实践

3.2 教学设计与实施

结合消防教育背景，设置导入情境。结合消防教育背景及学情，从消防学子的职业发展需求出发，创设新课知识情境，用其在消防中的应用案例引入笼型电动机正反转控制线路理论知识点。以各类防火卷帘门（如无机布防火卷帘门、快速防火卷帘门、玻璃防火卷帘门等）的上升与下降为例，令学生观察卷帘门的上升与下降的动画，以“如何控制实现防火卷帘门的升降”问题揭开本次课程知识的序幕，后续层次化的问题设置及解决过程中，解答该导入问题。消防应用案例的知识情境及问题的设置，引发学生的学习兴趣，培养学生理论联系实际的思想意识，助力学生未来职业开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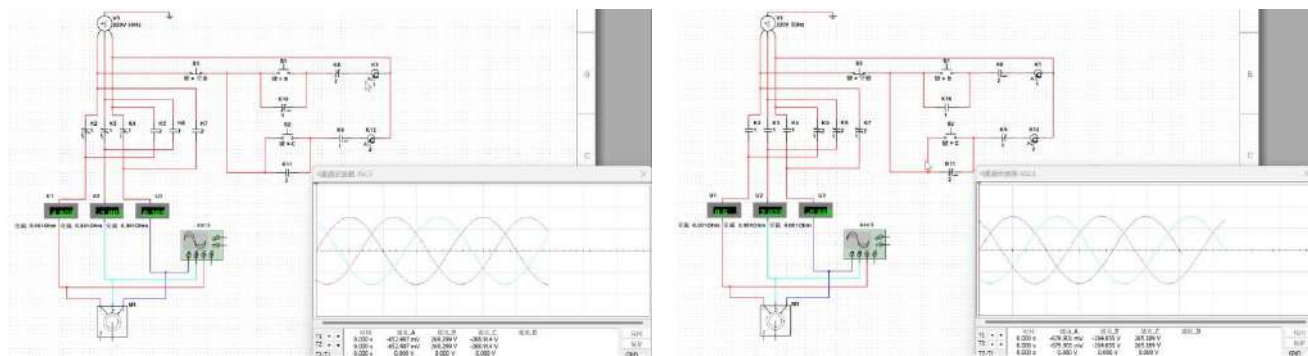
基于层次化推演开展问题导向的启发式教学过程。以内容为基，以基础、优化与应用为导向框架，通过层次化问题设置，以严密的逻辑思维进行逐层推演，利用仿真软件、动画、网络平台等多样化的工具，采用讲授式、互动式、反转课堂等多元化教学方法，通过对不同电路间递进式问题的提出与解决，触发学生思考，培养其发现-分析-解决问题的严密逻辑思维以及不断创新的革新意识。基于知识逻辑关联，以问题导入新课。“电工电子技术”课程的理论知识之间具有较强的逻辑关联，通过对教学过程中需要的电动机正转与反转的实现原理这一知识点进行简要回顾，以“如何实现对一台电动机的正反转控制，控制线路是怎样的”的问题设置，带学生探索新知识。本知识含有电动机正反转控制线路的基本实现、优化及应用三个模块。结合三部分内容特征分析，通过层次化的问题设置，以严密的逻辑思维进行逐层推演，带领学生通过对不同类型互锁间的递进式解决，培养学生发现-分析-解决问题的严密逻辑思维以及不断创新的革新意识。

一是基本实现。电动机正反转基本实现电路是本次课程内容的基础，结合动画实现正反转的控制流程呈现，引导学生观察动作次序，并由电动机正转呈现，引发学生思考反转如何实现，反转课堂令学生讲解。之后，设置问题“若在正转过程中按下反转按钮，则此时电路会产生何种结果”，在此过程中，学生可从不同角度提出不同问题，启发学生之间及师生间的互动探讨，最终通过协同分析可得此时电动机的正反转实现会出现故障，不可同时进行，该电路亟需改进优化，进而引出后续教学内容。

二是设计优化。以已学的接触器、复合按钮等元件知识为出发点，启发学生如何对基本电路进行优化。①电气互锁。以接触器为出发点，考虑采用正反转接触器的动断触点共同实现控制线路的电气互锁，总结其安全可靠，但存在操作不便的特征。如图 2 所示，利用 Multisim 对笼型电动机正反转控制线路的工作过程进行仿真验证，

结合动画展示,令学生观察动作次序,提升学生对抽象问题的理解力和对新知识的接收度。在电动机由正转向反转转换的过程中,必须先停车,这种控制方式虽然增大了安全性但操作较为繁琐,启发学生对“是否存在更便捷的互锁方式”问题的思考。②机械互锁。以复合按钮为出发点,启发学生将正反启动按钮改为复合按钮,共同实现机械互锁,总结其操作便捷性,但存在安全性低的特征,启迪学生思考“是否存在既操作便捷又安全的互锁方式”。③电气—机械双重互锁。通过对“基本电路误操作易引发故障”、“电气互锁不安全”、“机械互锁不便捷”环环相扣的问题设置,将电气互锁和机械互锁合在一起,最终得到构成既含有电气互锁,又有机械互锁的双重互锁方式。这种方式不仅弥补了电气互锁操作不便的不足,还可能弥补机械互锁安全性低的不足,实现操作便捷、安全的电动机正反转控制。

三是应用拓展。利用学到的理论知识开展消防卷帘门实际应用、解决实际问题,令学生体会到学有所用、学以致用,使其利用学到的知识去认识和了解世界,从而在进行知识与技能体系构建的过程中,增强思维逻辑能力。利用电动机正反转控制线路知识应用分析防火卷帘门升降运动,说明卷帘门升降的动作次序,通过对防火卷帘门的应用分析培养学生理论联系实际的意识。电动机正反转控制除了在防火卷帘门,还在如消防领域中其他方面(如自动喷淋系统、消防水泵、消防排烟/送风系统等)、生产/生活(如电梯升降、数控机床主轴进退等)中具有广泛应用。令学生体会到学有所用、学以致用,使其利用学到的知识去认识和了解世界,从而在进行知识与技能体系构建的过程中,增强思维逻辑能力,助力素质情感价值的培养。



(a)电动机正转

(b)电动机反转

图2 Multisim 仿真电动机正反转电气互锁

3.3 教学成效与反思

以问题驱动“电工电子技术”课程教学的实施,逻辑严密,条理清晰,更易于学生理解和掌握,结合该节课的授课实施效果,从学生、督导、自我评价三个方面总结该方法的教学成效。从课后调研分析结果来看,学生明显对这种教学方式具有较为明显的兴趣,课堂的参与性、主动性和积极性更高,学生更喜欢以体系化、结构化问题为导向的课程设计,也更加容易理解“为何要学”,“能够解决什么问题”等,激发了学习兴趣。督导认为本次课呈现了教师的专业知识与技能,逻辑层次分明,知识讲解结合实际,重视对学生逻辑能力的锻炼,及批判性辩证思维的形成。结合本次课程知识的个性化特征,最大程度的让学生参与进来。本次课程的教学根据教学内容特点设计了合理有效的教学方法,以问题导向“电工电子技术”课程教学的实施,逻辑严密,条理清晰,更易于学生理解和掌握,准确把握教学内容知识点间的逻辑层次,环环相扣的形成强逻辑性知识体系,精准把控授课进程,以更加有趣、更紧密的方式开展授课,最大程度的吸引学生的注意力,最大程度的调动他们的学习热情,令其“既懂又会”。

但在实际教学过程中,学生思维在现有问题设置中往往难以有效激活,问题的提出及解决过于依赖老师,学生在问题探究活动中专注度较弱。呈现出问题情境后,相对较少的学生会主动提出问题,虽然在课上不断地诱导学生主动提出新的问题,但是较多学生仍然处于沉默状态,而另一方面,鉴于课时有限,教授学生提出方法和技巧难以实施展,因此在今后的教学实践中需要注重对学生问题意识培养以及提问技巧等,培养学生思维能力的培养。

四、结论

针对“电工电子技术”课程内容多、概念抽象等特点,本文从提高课堂效果以及教学质量的目标出发,深度剖析了实施困境与对策,以实际课程内容—笼型电动机正反转控制线路为例,开展了问题导向“电工电子技术”课程教学方法的研究与实践,对提高学生的学习积极性和能动性,在培养学生独立思考问题和解决问题的能力方面具有积极的促进作用,取得了一定成效。但是在把控问题提出方法以及充分调动学生提出问题的积极性方面尚有明确不足,仍存在一定问题,需要不断改进,也是本文后续需要不断努力改善的方向。

参考文献:

- [1] 崔芳. 问题教学法在高中《哲学与文化》中的运用研究[D]. 赣州: 赣南师范大学, 2023.
- [2] 陈本峰. 提问式教学法在高职“高等数学”课堂中的实效研究[J]. 课堂教学, 2024, 07: 53-59.
- [3] 陈海燕, 何继爱, 蒯莹. 基于问题引导的“数字信号处理”课程教学方法研究[J], 教育教学论坛, 2018, 1(4): 173-174.
- [4] 秦曾煌, 姜三勇. 电工学简明教程 [M]. 北京: 高等教育出版社, 2017.
- [5] 刘真真, 胡宝安, 李梅英, 等. 问题牵引式教学法在高等数学中的应用实践—以“零点定理”为例[J]. 高等数学研究, 2023, 26(4): 11-13, 30.
- [6] 徐兆可, 张海军, 张翰伟, 等. 以需求为导向的《空气动力学基础》教学改革研究[J]. 西安航空学院学报, 2023, 41(3): 89-94.
- [7] 焦超群. 类比教学法在“工程电磁场”教学中的实践[J]. 电气电子教学学报, 2023, 45(3): 153-156.
- [8] 闫峰, 韩丽飞. 基于问题驱动教学法的“朝花夕拾”名著导读教学设计[J]. 语文世界, 2024, 08: 84-85.

Research and practice on the problem-oriented teaching method of ‘power electronics technology’

Li Pei¹, Yu Chengwei^{1*}

¹ China Fire and Rescue Institute, Beijing 102202, China

Abstract: In order to meet the needs of students to expand and develop innovative thinking ability, combined with the teaching practice experience, the problem-oriented teaching method for the course of ‘power electronics technology’ is explored and practiced. After investigation and analysis, the implementation dilemma and countermeasures of problem-oriented exploratory teaching of ‘power electronics technology’ is discussed, and the positive and negative control circuit of cage motor is taken as an example to carry out teaching design and practice. Based on the educational background, the actual learning situation and the characteristics of electrical and electronic courses, the problem-oriented teaching process is carried out based on the hierarchical deduction, and the progressive question driving chain with strong logic is designed, and the summary and reflection of teaching effect are carried out. Which aims to drive students to inspire innovative thinking on the basis of mastering theoretical knowledge, enhance students' ability to discover, analyze and solve problems, and experience the fresh activity of electrical and electronic knowledge, to achieve good teaching results.

Key words: Power electronics technology; Problem-oriented; Motor forward and reverse control; Teaching method

三峡地区红色文化融入职业教育体系的实践路径研究

李杰¹ 熊杨¹

(1.重庆安全技术职业学院, 重庆 万州 404100)

摘要: 本文旨在系统探讨三峡地区特有的红色文化资源融入现代职业教育体系的有效实践路径。研究首先界定了以“舍小家、为国家”的奉献精神、艰苦创业精神和万众一心的协作精神为核心的三峡移民红色文化基因的深刻内涵,并阐述了其在新时代背景下进行创造性转化的必要性。通过对以万州区为代表的三峡地区职业院校的实践审视,文章揭示了当前红色文化融入过程中存在的价值认知表层化、内容供给同质化、德技结合“两张皮”以及协同机制碎片化等现实困境。在此基础上,本文以守正创新为原则,重点构建了三条相互贯通的核心实践路径:一是内容转化路径,即推动红色文化从历史叙事向课程元素深度转变,实现专业思政化与课程模块化;二是方法转化路径,即推动育人模式从单向灌输向体验育人深刻变革,实现数字赋能与实践赋能;三是载体转化路径,即推动育人场域从第一课堂向多元矩阵系统拓展,实现校园文化与社会实践的协同联动。本研究以期三峡地区乃至全国职业院校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培养德技并修的高素质技术技能人才提供有益的理论参考与实践借鉴。

关键词: 红色文化; 职业教育; 实践路径; 创造性转化

基金项目: 万州区社会科学重点课题《万州区三峡移民红色文化基因融入职业教育体系的创造性转化研究》(项目编号:WZKT2025170)

DOI: doi.org/10.70693/rwsk.v1i8.1255

立德树人乃教育之根本,传承红色基因是时代赋予教育工作者的重要使命。随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党和国家对职业教育发展提出了新的更高要求,强调要将德技并修作为人才培养的核心标准,着力培养数以亿计的高素质技术技能人才^[1]。在此背景下,如何充分挖掘和运用区域特色红色文化资源,为职业教育铸魂育人,提供深厚滋养,已成为一项兼具理论价值与现实紧迫性的重要课题。本文聚焦于实践路径这一核心议题,以创造性转化为研究视角,旨在系统回答三峡地区红色文化如何有效融入职业教育体系这一关键问题。

一、三峡地区红色文化融入职业教育的现实审视

(一) 三峡移民红色文化基因的核心内涵

三峡移民红色文化并非泛化的历史符号,而是诞生于当代中国伟大建设实践中的一座精神丰碑,是与时代同频共振的鲜活教材。对其核心内涵的深刻理解与精准提炼,是实现其在职业教育体系中进行“创造性转化”的逻辑起点与坚实基础。所谓基因,即其最稳定、最核心、最具传承价值的构成要素。结合三峡百万大移民的壮阔历程,其红色文化基因主要体现为以下三个相互关联、层层递进的维度。

第一,以“舍小家、为国家”为标识的爱国奉献精神。这是三峡移民红色文化基因的价值底色,面对故土难离的复杂情感与未来生活的不确定性,百万移民作出了服从国家战略、服务国家发展的历史性抉择。这种精神超越了简单的服从,是一种将个人命运与国家前途紧密相连的大局意识和集体主义情怀的高度体现^[2]。对于职业教育而言,这种奉献精神是破除“利己主义”和“技术工具论”思想的有力武器,它引导学生将个人技能的提升置于服务社会、建设国家的宏大坐标系中,从而培育其作为大国工匠应有的家国情怀与责任感。

第二,以“自强不息、艰苦奋斗”为特征的开拓创业精神。这是三峡移民红色文化基因的行为亮色,移民搬迁不仅是地理位置的转移,更是一场从零开始的生存与发展挑战。广大移民在新的土地上,不等不靠、自力更生,用勤劳和智慧开辟新家园、创造新事业,展现了中华民族百折不挠、勇于开拓的顽强品格^[3]。这种精神与职业教

作者简介: 李杰(1998—),男,硕士,研究方向为职业教育;

熊杨(1999—),女,硕士,研究方向为职业教育。

育所倡导的工匠精神、劳模精神高度契合，它蕴含着直面困难的韧性、精益求精的追求和锐意创新的勇气。将其融入职业教育，能够有效激发学生的职业自豪感和奋斗激情，培养学生解决复杂问题的实践能力和在平凡岗位上追求卓越的职业素养。

第三，以“万众一心、顾全大局”为表现的团结协作精神。这是三峡移民红色文化基因的组织亮色，三峡工程的成功，离不开从中央到地方、从迁出地到接收地、从干部到群众的系统性组织与高效协同。移民个体之间、不同群体之间守望相助、共渡难关，形成了强大的凝聚力。这种精神深刻揭示了系统思维、团队合作对于完成宏大工程的决定性作用^[4]。在现代产业分工日益精细的今天，团结协作能力已成为技术技能人才的核心竞争力之一。将此精神融入教学实践，有助于培养学生的团队意识、沟通能力和系统工程观念，使其能更好地适应现代企业对复合型人才的需求。

综上，爱国奉献精神、开拓创业精神与团结协作精神共同构成了三峡移民红色文化基因的完整序列。它们源于实践，又超越实践，为新时代职业教育注入了鲜明的价值导向、强大的精神动力和科学的行事方法。厘清并坚守这三大核心内涵，是确保后续实践路径不偏离方向、不流于形式的根本前提。

（二）当前融入实践面临的现实困境

在三峡地区的职业教育实践中，尽管对三峡移民红色文化的育人价值有着普遍的共识，但在将其转化为有效的教育资源时，依然面临着诸多结构性难题。首要的挑战源于价值认知的浅层化。在师生层面，对红色文化的理解多停留在一种宏观的、符号化的层面，虽然承认其重要，却未能真正内化为指导个人成长与职业发展的精神动力。这种认知偏差使得红色文化教育常常被视为一项外在的、附加的任务，而非职业教育的内生需求，尤其在部分专业教师群体中，“思政与我无关”的观念依然存在，阻碍了红色文化向专业教学领域的深层渗透。这种认知的表层化，不可避免地传导至教育内容与方法的供给层面，导致了供给的“同质化”与吸引力的不足。在实践中，这种供给不足集中体现为对“讲座报告+场馆参观”传统模式的路径依赖。以万州区为例，区域内职业院校对此模式尤为倚重。例如，重庆安全技术职业学院在三峡移民纪念馆开展“移民故里种春风，红色精神续华章”主题参观活动，重庆三峡职业学院也多次组织入党积极分子到该馆学习，切身感受百万大移民的壮阔历史。这些活动无疑是红色文化教育的重要环节，但其育人效果深度依赖于教学设计。若缺乏前置的问题引导、过程中的互动体验和后续的深度研讨，这类参观极易停留在“走马观花”式的浅层感知，难以真正触及在数字化时代成长起来的青年学生的内心世界，无法有效激发其情感共鸣与思想认同。

更为关键的困境，体现在红色文化教育与专业技能培养过程的深度脱节，形成了普遍的“两张皮”现象。红色文化被局限在思政课堂、主题活动等特定场域，未能与学生的日常学习和专业实践形成有机联动，德技融合的通道并未完全打通。在实训课堂上，鲜有将三峡移民攻坚克难的奋斗精神与解决技术难题的过程巧妙结合；在专业伦理教育中，也较少将移民顾全大局的奉献精神与培育学生的敬业、诚信品质深度关联。这种割裂使得红色文化的铸魂功能与职业教育的育人目标分离，文化的力量未能有效赋能于学生专业技能和职业素养的提升。

这些内在的挑战，又因外部协同育人机制的碎片化而愈发凸显。红色文化育人是一项需要多方联动的系统工程。虽然学校与重庆三峡移民纪念馆等社会机构之间存在联系，如前述提及的组织学生参观学习等活动，但这类合作多为临时性、项目式的“点状对接”，而非基于课程共建、师资互聘的深度战略合作。各方未能形成资源共享、实践共管的稳定长效机制，导致宝贵的社会育人资源难以被系统性地转化为职业院校的教育优势，最终制约了三峡地区红色文化育人整体效能的提升。

二、红色文化融入职业教育的创造性转化路径构建

针对前文所揭示的价值认知表层化、内容供给同质化、德技结合“两张皮”以及协同机制碎片化等现实困境，解决问题的关键已不能满足于对红色文化教育进行简单的加法植入，而必须开启一场系统性的育人生态重构。这场重构的核心指导思想，便是守正创新，即坚守三峡移民红色文化精神的内核，并运用与时俱进的理念和技术手段对其进行重塑与再造。这要求我们秉持创造性转化的系统思维，以学生为中心，对当前职业教育的育人模式进行多维度升级^[5]。为此，本文提出并构建三条相互衔接、彼此赋能的核心实践路径。如图1所示，一是实现从“历史叙事”到“课程元素”的内容转化路径；二是实现从单向灌输到体验育人的方法转化路径；三是实现从“第一课堂”到“多元矩阵”的载体转化路径。这三条路径共同作用，旨在形成一个全方位、立体化、协同性的育人格局，使红色基因真正内化为新时代技术职业技能人才的成长底色。

（一）内容转化路径：从历史叙事到课程元素

要破解红色文化教育内容供给同质化的困境，其逻辑起点在于实现从“外部的历史叙事”向“内部的课程元素”的深度转化。这意味着不能再将红色文化视为一种与专业知识平行的附加品，而必须将其基因植入到课程体系的

细胞之中，通过专业思政化与课程模块化两大抓手，让红色精神在专业课堂中落地生根。

首先，以专业思政为抓手，探寻红色基因与专业精神的内生耦合点。这是破解“德技两张皮”问题的关键所在。其核心是推动每一位专业课教师成为红色文化育人的实践者，深入挖掘三峡移民红色文化基因中蕴含的奉献、创业、协作等精神特质，并将其与本专业所需的核心素养与职业伦理精准对接，实现同频共振。例如，在机械、汽修类专业教学中，可将三峡移民的“攻坚克难、不畏艰险”奋斗精神，与学生在实训中解决复杂技术故障的挑战相结合，引导他们涵养专注、坚韧的工匠品格。在康养、护理类专业，可将“舍小家、为国家”的奉献精神，与南丁格尔誓言中的人道主义关怀相贯通，培育学生敬佑生命、甘于奉献的职业操守。在财经、电商类专业，则可将移民“不等不靠、开拓创新”的创业精神，转化为鲜活的商业案例，激发学生的创新意识与市场开拓能力。通过这种方式，红色文化不再是空洞的口号，而是被物化为可指导专业实践的思维方法和价值准则。

红色文化融入职业教育的创造性转化路径



图1 红色文化融入职业教育的创造性转化路径

其次，以课程模块化为依托，推动红色文化教育的体系化与规范化。在进行润物无声的专业思政渗透的同时，建设专门的、显性的课程载体也至关重要。这能确保红色文化教育的系统性、稳定性和深度。具体操作上，可以开发系列化的校本课程或特色课程模块。一方面，可开设面向全体学生的通识选修课，如《三峡移民精神与职业生涯规划》、《红色文化与工匠精神塑造》等，从宏观层面帮助学生建立红色文化与个人成长的联系。另一方面，更应鼓励开发嵌入人才培养方案的特色必修模块。例如，针对性地开发“三峡移民文创产品设计与开发”项目课程，或编写一本包含丰富移民故事、奋斗案例的《职业素养与红色基因》校本教材。这使得红色文化的学习从零散的活动，转变为有教材、有课时、有学分、有考核的规范化教学环节，从而保障了教育的实效性与长效性。

通过专业思政化与课程模块化的双轮驱动，“三峡移民红色文化”这一宏大叙事被解构、重组、内化为一个个具体的课程元素、教学案例和实训项目，真正实现了从墙上的标语到桌上的课本，再到心中的信仰的深刻转变。

（二）方法转化路径：从单向灌输到体验育人

若要让三峡移民红色文化真正触及当代职业院校学生的内心，就必须对沿袭已久的“教师讲、学生听”的单向

灌输模式进行根本性变革,转向以学生为主体、以体验为核心的育人方法。这意味着教育的目标不再是单纯的知识传递,而是引导学生在主动参与、亲身实践和情感共鸣中,自主完成对红色精神的认知内化与价值认同,实现从“要我学”到“我要学”的深刻转变。

一方面,拥抱数字时代,以技术赋能实现沉浸式体验。针对“数字原住民”一代学生的学习习惯与媒介偏好,必须让红色历史借助数字技术活起来,打破时空壁垒。职业院校应积极联合三峡移民纪念馆等机构,共同开发数字化教学资源。例如,可以利用虚拟现实(VR)技术,创设“重走移民路、再现淹没前的家园”等虚拟仿真场景,让学生身临其境地感受搬迁过程的艰辛与奉献的伟大。可以组织学生团队,拍摄制作一系列关于三峡移民故事的微电影、短视频或动漫,通过青年人的视角和话语体系来重新诠释和传播红色精神。此外,建设一个集图文、音视频、口述史、三维模型于一体的线上数字化红色资源库,也能将零散的教育内容系统化,为学生提供一个可自主探索、可互动分享的学习空间,将单向的知识接收转变为多维的感官体验。

(三) 载体转化路径:从第一课堂到多元矩阵

三峡移民红色文化的深度融入,其效能最终取决于育人载体的广度与协同性。若仅仅将其禁锢于第一课堂的有限时空内,其影响力必然大打折扣。因此,必须推动一场从单一课堂向多元矩阵的载体转化,将校园物理空间、文化活动与广阔的社会场域进行系统性整合,构建一个全员、全程、全方位的立体化育人格局。

首先,要着力于校园内部育人环境的整体营造,让校园文化本身成为承载红色基因的无声课堂。这意味着要超越悬挂标语、张贴海报的表层装饰,推动红色精神向校园物质文化和精神文化的深层渗透。在物质文化层面,可以规划建设三峡移民精神主题文化长廊,将感人的故事、奋斗的场景以艺术化的形式呈现;可以为校园道路、建筑物或实训中心赋予蕴含红色精神的名称,让学生在日常行走坐卧间,潜移默化地接受熏陶。在精神文化层面,更应鼓励和支持学生社团,以青年人的视角和喜爱的艺术形式,进行二次创作。例如,组织戏剧社编排一部反映移民搬迁心路历程的舞台剧,或支持新媒体中心拍摄系列讲述新一代移民后代奋斗故事的微电影。当学生从被动的文化接受者转变为主动的文化创造者时,红色基因的传承便获得了最鲜活的生命力。

在此基础上,必须勇敢地推倒校园的围墙,将育人载体向更广阔的社会实践领域拓展。真实的社会是检验和深化理论认知的最佳试炼场。职业院校应将红色主题的社会实践和研学活动,作为人才培养方案中的必要环节进行顶层设计,确保其规范性和普惠性。可以系统化地组织学生深入三峡库区腹地,开展专题性的社会调查或田野研学,在与山水的对话、与当地民众的交流中,完成一次深刻的精神洗礼。更重要的是,要建立与地方政府、相关企业及移民社区的长期战略合作关系,共建一批稳定的校外育人实践基地。这不仅能为学生提供持续的志愿服务平台,让他们在服务社会的奉献中体验价值,更能将企业的生产一线、社区的治理现场,都转化为检验和锤炼学生德技水平的真实课堂。

通过将严谨的第一课堂、浸润式的校园文化以及开放的社会实践这三大载体有机编织,一个多维度、立体化的育人矩阵便得以形成。在这个矩阵中,各载体之间相互支撑、相互赋能,共同构成了一个强大的育人场域,确保了三峡移民红色文化不仅能被学生所认知,更能被其所认同、所践行,最终沉淀为伴随其职业生涯成长的宝贵精神财富。

三、结语

将三峡移民红色文化这一独特的精神财富融入职业教育体系,是新时代赋予三峡地区教育工作者的重要课题^[6]。本文立足于当前实践中所面临的价值认知表层化、内容形式同质化及德技结合不深等现实困境,提出其根本破解之道在于实现一场以“守正创新”为核心理念的系统性育人生态重构。研究表明,这一重构过程必须通过三条相互支撑的创造性转化路径来具体实施:即以专业思政化与课程模块化为抓手的内容转化路径,以数字赋能和实践赋能为核心的方法转化路径,以及以校园文化与社会实践协同为目标的载体转化路径。这三条路径共同构成了一个从顶层设计到实践操作的完整逻辑闭环,其理论价值在于,它丰富了红色文化育人的理论内涵,为区域性特色文化如何与国家主流教育话语体系相融合提供了新的分析框架;其实践意义则在于,它为三峡地区乃至全国拥有类似红色文化资源的职业院校,提供了一套可供参考、可操作的行动方案,旨在推动红色文化教育从软任务向硬支撑转变,切实服务于立德树人的根本目标。

三峡移民红色文化绝非尘封的历史记忆,而是一座蕴藏着巨大育人价值的精神富矿。我们这一代教育工作者的使命,便是通过持续的探索与创造,将其精心开采、悉心提纯,使其所蕴含的奉献、创业与协作精神,真正转化为新时代技术技能人才成长成才的不竭动力,为中华民族精神谱系的赓续与传承,贡献出职业教育的独特力量。

参考文献:

- [1] 陆宇正,陈鹏.教育强国战略引领下中国特色职业教育质量治理的目标指向与行动路径[J/OL].现代教育管理,1-9[2025-08-04].<https://doi.org/10.16697/j.1674-5485.2025.08.011>.
- [2] 文红玉,王雨晨.论弘扬三峡移民精神的新时代阐释[J/OL].中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1-8[2025-08-04].<https://link.cnki.net/urlid/14.1329.C.20250310.2113.014>.
- [3] 陈沉,龙冠雨.三峡移民精神中集中力量办大事特质论析[J].重庆三峡学院学报,2024,40(04):10-19.DOI:10.13743/j.cnki.issn.1009-8135.2024.04.002.
- [4] 刘立,胡红梅.三峡移民文化在高校立德树人中的实践探究——以重庆地区部分高校为例[J].黑龙江教师发展学院学报,2024,43(03):52-55.
- [5] 刘朋,宋明江.三峡移民精神赓续伟大建党精神的逻辑进路[J].重庆交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5,25(01):18-26.
- [6] 肖娟.三峡移民红色基因融入青少年思想道德建设的路径思考——以重庆三峡移民纪念馆为例[J].江苏经贸职业技术学院学报,2024,(03):26-28+32.DOI:10.16335/j.cnki.issn1672-2604.2024.03.007.

Research on Practical Approaches to Integrating Red Culture into the Vocational Education System in the Three Gorges Region

LiJie¹, XiongYang¹

¹ Chongqing Vocational Institute of Safety Technology, Chongqing 404100, China

Abstract: This study aims to systematically explore effective practical pathways for integrating the unique red culture resources of the Three Gorges region into the modern vocational education system. The research first defines the profound connotation of the Three Gorges migrants' red cultural heritage, centered on the core values of "sacrificing individual interests for the nation," the spirit of arduous entrepreneurship, and the ethos of united cooperation, and further elaborates on the necessity of its creative transformation in the context of the new era. Through an empirical examination of vocational institutions in the Three Gorges region, with Wanzhou District as a representative case, the study identifies current challenges in the integration process, including superficial understanding of cultural values, homogenization of content delivery, the "phenomenon of disconnect" between moral education and technical training, and fragmented collaborative mechanisms. Guided by the principle of "upholding core values while innovating," this research constructs three interconnected practical pathways: first, the Content Transformation Pathway, deepening the shift of red culture from historical narrative to curricular elements to achieve "ideological integration into professions" and modular course design; second, the Methodological Transformation Pathway, transforming educational models from one-way instruction to experiential learning to enable digital empowerment and practice-oriented cultivation; third, the Platform Transformation Pathway, expanding educational spaces from classroom settings to multidimensional matrices to foster synergy between campus culture and social practice. This study aims to provide theoretical and practical references for vocational institutions in the Three Gorges region and nationwide to fulfill the fundamental mission of "fostering virtue through education" and cultivate high-skilled talents with both moral integrity and technical excellence.

Keywords: Red Culture; Vocational Education; Practical Pathways; Creative Transformation

乡村青年幼儿教师的自我价值感与教学创新的现状与提升策略

鞠晓蕾¹ 邵良超²

(1.内江师范学院, 四川 内江 641100, 2.德阳城市轨道交通职业学院, 四川 德阳 618400)

摘要:为探究乡村幼儿教师自我价值感对教学创新的影响,本研究选取四川省116名乡村幼儿教师作为样本,运用问卷调查法与分组回归分析方法展开研究。结果显示:新手教师(教龄≤5年)的自我价值感对教学创新无显著的预测效应,而资深教师(教龄>5年)的自我价值感对教学创新具有显著的正向预测作用($\beta=0.324$, $p<0.05$)。研究提示需构建分阶段教师支持体系,以提升乡村学前教育质量。

关键词: 乡村幼儿教师; 自我价值感; 教学创新; 提升策略

基金项目:四川省高等学校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农村幼儿教育研究中心项目乡村幼儿教师心理资本、自我价值感与教学创新的关系研究(NYJ20230606)

DOI: doi.org/10.70693/rwsk.v1i8.1261

引言

在全面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时代背景下,教育被明确界定为“优先发展领域”,其基础性、先导性与全局性作用愈发显著。学前教育作为国民教育体系的起始阶段,不仅是儿童身心实现全面发展的关键时期,更是阻断贫困代际传递、推动社会公平的重要途径^[1]。在广大农村地区及偏远地域,高质量的学前教育被视为增进乡村人力资本、推动可持续发展的重要基石。在此过程中,教师作为教育实践活动的核心主体,发挥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其专业能力以及内在积极性,直接关系到政策实施的效果以及教育质量的提升。

乡村幼儿教师肩负着双重使命:一方面,作为国家教育政策于基层“最后一公里”的执行者,其承担着将宏观教育理念转化为具体保育与教育实践的重任;另一方面,作为乡土文化传承与再生产的重要载体,需要促进儿童的身份认同与社会适应。教师的专业素养、心理状态及其行为抉择,对儿童的认知发展、社会情感技能以及学习动机具有深远影响,进而关乎乡村未来一代的整体素养^[2]。然而,长久以来,乡村学前教育的发展受限于资源分配不均、师资短缺、职业发展空间受限等结构性问题。尽管近年来政府持续增加投入,改善硬件设施与教师待遇,但教师的内在发展动力仍常被忽视。

外在条件的优化为教师专业成长奠定了坚实基础,但真正对教师职业行为模式、教学参与度和创新能力起决定性作用的,往往是其内在的心理资本与精神状态。其中,自我价值感(sense of self-worth)至关重要,它不仅反映了教师对自身职业能力的信念强度,还深刻体现了其对教育工作内在价值的深刻体悟与高度认同。具有较高自我价值感的教师,往往更相信自身能力与价值。这种积极的自我认知能够激发其对教学工作的热忱与责任感,推动其主动探寻提升教学质量的路径,而教学创新则是其中的重要方式^[3]。更为关键的是,这种内在信念是驱动教学创新的重要心理动力源。当教师笃定自身有能力对儿童成长产生影响、确认自身工作具有社会价值时,例如,在面对新兴教育技术或教学理念时,自我价值感较强的教师会更为积极开展探索与应用,将其融入课堂教学之中,以推动教学创新。

因此,在乡村振兴与教育现代化协同推进的时代背景下,关注乡村幼儿教师的自我价值感,不仅与教师个体的职业幸福感及专业成长紧密相连,更在深层次上影响着学前教育质量的持续提升以及教学创新的内在驱动力。

作者简介:鞠晓蕾(1987—),男,博士,讲师,研究方向为青少年心理危机干预、家庭咨询、绘画心理分析;

邵良超(1995—),男,博士,研究方向为校园心理、大学生心理健康教育。

通讯作者:鞠晓蕾

探究自我价值感与教学创新之间的内在关联,有助于揭示教师发展的心理机制,为构建支持性制度环境、优化教师专业发展路径提供理论支撑与实践参考。

一、研究与设计

(一) 研究对象

本研究采用文献分析法、问卷调查法及统计分析法等研究方法,对四川省乡村学前教育师资队伍展开实证调查。通过系统抽样共获取有效样本 116 份,问卷回收率与有效率均达到 100%。样本数据显示,女性教师占比 86.21%,男性教师占比 13.79%。具体师资分布特征详见表 1。

表 1 乡村幼儿教师的具体分布情况

人口学变量	类别	人数 (人)	人口学变量	类别	人数 (人)
性别	女性	100	婚姻状况	未婚	76
	男性	16		已婚	40
月收入	三千元以下	101	职称	初级	113
	三千到五千元	12		中级	3
	五千元以上	3	教龄	1 年以下	10
学校所在区域	省会城市	8		1~2 年	10
	地级城市	10		3~5 年	34
	普通市县	98		5 年以上	62
年龄	21-30 岁	110			
	31-40 岁	6			

(二) 研究工具

1. 中小学教师自我价值感问卷

采用王金素和司继伟编制的中小学教师自我价值感问卷^[4],测量乡村幼儿教师的自我价值感水平。问卷共 23 题,采用 5 点评分,从 1“完全不符合”到 5“完全符合”,涵盖五个维度。本研究的问卷内部一致性系数是 0.849。

2. 教师教学创新问卷

采用王振宏编制的教师教学创新问卷^[5],测评乡村幼儿教师在教学方法与内容等方面的创新意愿。问卷共 18 题,采用 5 点评分,从 1“完全不符合”到 5“完全符合”,问卷测评的教师教学创新意愿为单维结构。本研究问卷的内部一致性系数为 0.89;间隔 1 个月的重测信度为 0.91,效标关联效度为 0.61。

(三) 统计处理

本研究运用 SPSS26.0 软件对所收集的数据展开分析。具体操作包括对数据实施正态分布检验,同时开展相关分析以及回归分析,旨在探究数据的分布特征以及各变量之间的关联性与影响。以教龄作为分组依据,将样本分为新手教师(教龄 ≤ 5 年)和资深教师(教龄 > 5 年)两组分别进行分析。

二、研究结果

(一) 乡村幼儿教师自我价值感与教学创新的相关分析结果

为深入探究乡村幼儿教师自我价值感与教学创新之间的关联,运用皮尔逊相关分析方法对相关变量展开检验。研究结果如表 2 所示,新手教师(教龄 ≤ 5 年)组的乡村幼儿教师,其自我价值感与教学创新在统计学层面不存在显著负相关关系($r = -0.072$, $p = 0.603$);资深教师(教龄 > 5 年)组的乡村幼儿教师,其自我价值感与教学创新呈现显著正相关($r = -0.324$, $p < 0.05$)。

表2 乡村幼儿教师自我价值感与教学创新的相关分析

教龄分组	变量	教学创新
资深教师（教龄>5年）	教学创新	1
	自我价值感	0.324*
新手教师（教龄≤5年）	教学创新总分	1
	自我价值感总分	-0.072

注：* $p < 0.05$

（二）乡村幼儿教师自我价值感与教学创新的回归分析结果

为进一步探究乡村幼儿教师自我价值感与教学创新之间的关系，开展了回归分析。结果如表3所示，新手教师（教龄5年及以下）自我价值感对教学创新（ $\beta = -0.072$ ， $p = 0.603$ ）不具有预测作用。相反，资深教师（教龄5年以上）自我价值感对教学创新具有显著的正向预测（ $\beta = 0.324$ ， $p < 0.05$ ）作用。

表3 乡村幼儿教师自我价值感与教学创新的回归分析

教龄分组	结果变量	预测变量	R	R ²	F	β	SE	t
资深教师	教学创新	自我价值感	0.324	0.105	7.018	0.324	0.277	2.649*
新手教师			0.072	0.005	0.274	-0.072	0.318	-0.523

注：* $p < 0.05$

三、讨论与结论

本研究借助针对乡村幼儿教师的问卷调查，探究了自我价值感与教学创新之间的关联。研究表明，教龄在5年及以下的教师，其自我价值感对教学创新并无显著的预测作用；而教龄超过5年的教师，其自我价值感对教学创新具有显著的预测作用。

（一）讨论

1. 新手教师（教龄≤5年）的自我价值感对教学创新的预测作用不显著

新手教师（教龄≤5年）的自我价值感虽然处在较高的水平，但是与教学创新并无显著的联系。这意味着，对于新手教师而言，内在的积极自我评价并不能直接、自动地催生出创新的教学方法。教学创新要求教师具备诊断既有教学模式缺陷、预判新教学方法潜在成效的能力，这依赖于大量基于实践的“隐性知识”。然而，新手教师通常欠缺此类知识的积累，在创新教育实践能力方面存在显著不足，缺乏将理论层面的创新理念转化为具体课堂教学操作的能力^[6]。课堂作为一个复杂且动态的生态系统，创新性教学通常伴随着较高的不确定性^[7]。经验丰富的教师可凭借既往经验，从容应对突发状况；而新手教师在未知挑战面前易产生焦虑与无所适从之感，这种对教学过程失控的担忧会在很大程度上抑制其创新教学尝试^[8]。教学经验是差异化教学实践的关键预测指标，经验丰富的教师能够更加灵活地运用多样化教学方法，而新手教师则更倾向于遵循最为稳妥、熟悉的传统教学模式^[9]。

此外，新手教师的自我价值感通常呈现出泛化性与理论性特征，他们需要具体地引导，以将“我相信我能行”转化为“我知道该怎么做”。但许多学校未能提供充足的创新指导与专业培训。创新必然伴随风险。新手教师需要一个允许试错、鼓励分享的协作环境。然而，他们往往处于学校人际关系的边缘，难以获得资深同事的实质性帮助。在线上教学等新兴领域，师生互动不足和缺乏有效的教学支持亦成为公认的障碍^[10]。

2. 资深教师（教龄>5年）的自我价值感显著预测教学创新

与处于职业生涯初期的教师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当教师教龄超过五年后，其自我价值感与教学创新行为之间呈现出显著的正相关关系，并且自我价值感能够对教学创新产生显著的正向预测作用。资深教师凭借对课程标准、教材内容和学生认知特点的深度把握，能更敏锐地洞察现有教学模式的痛点与不足。他们对学生的学习风格、认

知水平等方面的理解更加精准,从而能够进行更有针对性地创新,而非盲目跟风^[11]。多年的课堂管理经验和对各种教学情境的成功处理,使得资深教师建立了稳固的专业自信。这种自信并非凭空而来,而是建立在可预见的成功概率之上。因此,他们在尝试新的教学理念与技术时,心态更为从容,能够将创新巧妙地融入日常教学,实现“润物细无声”的变革^[12]。这种由经验淬炼出的高自我价值感,是推动其持续创新的核心动能。教龄较长的优秀教师往往在学校和教育系统内积累了良好的专业声誉。这种“声誉资本”是一种无形的资产,它使得教师在申请教学改革项目、获取实验资源或推行创新举措时,更容易获得领导的信任和支持。其他教师也更愿意追随和配合,从而降低了创新实践的推行阻力^[13]。

(二) 结论

1. 新手教师的自我价值感与教学创新之间不存在显著的相关性,且无法对教学创新产生显著的预测作用。
2. 资深教师的自我价值感与教学创新之间呈现出显著的相关性,并且能够对教学创新起到正向的显著预测作用。

四、建议

(一) 构建全方位、分阶段的新手教师专业发展与支持体系

强化实践导向的专业培训,针对新手教师缺乏实践经验和“隐性知识”的问题,提供更多基于案例、情境模拟和真实课堂实践的培训,而非纯粹理论教学。例如,通过录制视频并通过资深教师结合 AI 智能分析课堂表现,帮助新手教师形成“教师自我”的认识,并识别教学中的优缺点^[14]。

健全导师制与同伴协作机制,为新手教师指派经验丰富的导师,并建立正式和非正式的同伴协作网络。导师应侧重于提供个性化的指导,帮助新手教师应对课堂管理、教学设计等具体挑战,并分享其在创新实践中的经验和应对策略。这种支持体系不仅能提升新手教师的信心和能力,也能帮助他们更好地适应职业初期面临的困难^[15]。

营造宽容的创新试错环境,学校管理者应明确支持新手教师的创新尝试,即使初期出现失误也应给予理解 and 鼓励,而非苛责。通过设立创新基金、提供创新资源等方式,降低新手教师创新实践的风险和成本。此外,应鼓励新手教师积极参与学校的创新文化建设,让他们感受到被接纳和支持,从而敢于尝试和探索。

(二) 建立资深教师创新领导与知识共享平台

发挥资深教师的创新引领作用,资深教师是学校教学创新的核心驱动力。应鼓励和支持他们承担更多创新项目的牵头人角色,例如组建创新工作室、开展校本研究、主导学科教研组的创新实践等。通过正式和非正式的机制,让资深教师的“声誉资本”转化为推动整体教学创新的强大动力,降低其他教师参与创新的阻力^[16]。

促进经验和隐性知识的系统化共享,资深教师拥有丰富的实践经验和隐性知识,这些是教学创新的宝贵财富。学校应搭建多样化的知识共享平台,如定期举办创新教学沙龙、经验分享会、线上教学资源库等,鼓励资深教师将成功经验、失败教训和创新思路进行系统化总结和传播。这不仅有助于新手教师快速学习成长,也能促进资深教师对自身教学实践进行更高层次的反思和提升。

提供持续的专业发展与前沿对接机会,即使是资深教师,也需要持续的专业发展来保持创新活力。学校应为他们提供接触前沿教育理念、技术和研究成果的机会,例如邀请专家讲座、组织参加国内外高端学术会议、支持参与跨学科合作项目等。这能帮助资深教师保持对教育改革的敏感性,并将其深厚的经验与最新趋势相结合,产生更高质量的教学创新。

参考文献:

- [1] 秦旭芳,朱琳.我国幼儿教师质量综合治理的困境与突破——基于三期学前教育行动计划回溯与反思[J].教育科学,2022,38(3):90-96.
- [2] 黄晓茜.嵌入乡土与自我提升——一位乡村教师在社会变迁中自我认同的深化历程考察[J].全球教育展望,2023,52(4):118-128.
- [3] 徐云,陈相宇,张宇慧.特教教师的自我价值感对其职业倦怠的影响:教学创新意愿的中介作用[J].中国特殊教育,2019(6):5.
- [4] 王金素.中小学教师自我价值感、应对方式与职业倦怠的关系[D].山东师范大学,2008.

- [5] 王振宏,王克静,游旭群,等.教师效能、工作动机与心境对教学创新的影响[J].心理学,2010,33(05):1254-1257.
- [6] HUANG Y. Strategies for enhancing the teaching design ability of novice Chinese teachers in primary schools [J]. Region - Educational Research and Reviews, 2024, 6(9): 181.
- [7] Yu G. The Characteristics and Intervention Strategies of Novice Teachers' Inappropriate Behaviors in Classroom Teaching [J]. Journal of Contemporary Educational Research, 2025, 9(2): 46–56.
- [8] You B, Pamela Mantuhac. Classroom Management and Teaching Effectiveness of Novice Teachers [J].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Education and Humanities, 2024, 14(2): 209–221.
- [9] Sha L, Zhang G, Feng P, et al.. Teacher–child interactions during picture book reading in Chinese preschool classrooms: A comparative study of novice and experienced Teachers [J]. Early Years, 2022, 44(2): 283–298.
- [10] Caspersen J, Raaen F D. Novice teachers and how they Cope [J]. Teachers and Teaching, 2013, 20(2): 189–211.
- [11] Torabzadeh S, Hashamdar M. Exploring Differences in Novice and Experienced Teachers' Self-efficacy: A Mixed Methods Study [J]. Mextesol Journal, 2022, 46(1): 1–6.
- [12] Tschannen-Moran M, Hoy A W. The differential antecedents of Self-efficacy beliefs of novice and experienced Teachers [J]. Teaching and Teacher Education, 2007, 23(6): 944–956.
- [13] Mulyaningsih D U, Arifin R A. Teacher professional development: a study of motivating factors between novice and experienced teachers[J]. JEPAL (Journal of English Pedagogy and Applied Linguistics), 2021, 2(1): 1-11.
- [14] Bertram C. A systems approach to understanding novice teachers' experiences and professional learning [J]. Journal of Education, 2023(90): 11–31.
- [15] Paula L, Grinfelde A. The Role of Mentoring in Professional Socialization of Novice Teachers[J]. Problems of Education in the 21st Century, 2018, 76(3): 364-379.
- [16] Men Z. The role of professional learning communities for teacher innovation: A comparative study in Beijing and Hong Kong[J]. Educational Research Review, 2023, 40: 100-115.

The Current Situation and Improvement Strategies of Sense of Self-Worth and Teaching Innovation among Young Rural Preschool Teachers

JU Xiaolei¹, Shao Liangchao²

¹ School of Educational Sciences, Neijiang Normal University, Sichuan 641100, China

²School of General Education, Deyang College of Urban Rail Transit, Sichuan 618400, China

Abstract: To explore the impact of rural preschool teachers' sense of self-worth on teaching innovation, this study selected 116 rural preschool teachers from Sichuan Province as samples and conducted research using the questionnaire survey method and grouped regression analysis method. The results showed that the sense of self-worth of novice teachers (teaching experience ≤ 5 years) had no significant predictive effect on teaching innovation, while the sense of self-worth of senior teachers (teaching experience > 5 years) had a significant positive predictive effect on teaching innovation ($\beta = 0.324$, $p < 0.05$). The study suggests that a phased teacher support system should be constructed to improve the quality of rural preschool education.

Keywords: rural preschool teachers; sense of self-worth; teaching innovation; improvement strategies; national security

《现代产业学院建设指南（试行）》背景下高校产业学院协同育人机制研究——基于建设原则与任务的分析视角

陈名凯¹ 邹鸣民²

(1.江西应用科技学院, 江西 南昌 330098, 2.江西科技学院, 江西 南昌 330098)

摘要:当前,中国高等教育进入提高质量和结构优化的新阶段,现代产业学院是深化校企合作、产教融合的主要依托形式。2020年,教育部、工业和信息化部联合发文公布了《现代产业学院建设指南(试行)》,提出“四项建设原则”和“七项建设任务”,为高校协同育人机制建设提供政策、实务依据。本文基于“指南”的政策背景,阐释该指南的观念要义,协同育人机制所包含的协同目标确定、协同课程建设、协同师资队伍、资源整合、评价标准等应然组成部分;从协同育人机制现状来分析高校的协同育人,指出现阶段实践过程中存在校企合作深度不够、协同碎片化、协同资源配置不合理等问题,并围绕这些案例提出以顶层设计、协同平台的搭建、协同师资队伍培养、协同课程建设、评价体系建设和评价标准的完善为主要内容的优化思路,力求为高校产业学院的建设提供理论支撑和操作指引,支持现代产业学院进行内涵式建设、实现协同育人质量提升。

关键词:现代产业学院;协同育人;产教融合;制度建设;教育改革

DOI: doi.org/10.70693/rwsk.v1i8.1285

1 引言

2016年以来,随着中国高等教育实现“以提高质量为中心”到“提质培优”的结构性变革,在产业发展背景下,由高校举办、行业企业参与,在多主体合作下协同开展人才培养、科学研究和社会服务的产教融合办学组织,产业学院正面临前所未有的政策关注与实践热潮。特别是2020年8月,教育部和工业和信息化部联合发布《现代产业学院建设指南(试行)》,为高校建设现代产业学院提供了系统性政策支持和全方位建设指向,强调“育人为本、产业为先、产教融合、创新发展”四项基本原则,明确“新机制、新路径、新师资、新平台、新质量”五大建设任务,就是要立足于体制机制改革创新,以及跨组织、跨资源的优化配置,建成一批具有中国特色并能服务区域产业发展的新型产教融合办学机构。

在这样一个背景之下,怎样贯彻《指南》提出的原则和任务,有效建立高校产业学院协同育人的工作机制,成为当前各级高校面临的一个重要任务。所谓协同育人的工作机制,是在“政产学研用”等多元主体参与基础上,以人才培养目标为导向,以制度协同、资源协同和过程协同为保障的人才培养工作协作机制,是推进现代人才培养模式转型、强化高校服务地方经济能力和培养学生成才的关键举措^[1]。

但是从高校现有产业学院的建设现状来看,协同育人的工作机制却存在以下困难:校企间协同育人的意愿不高、协同育人的内容浮于表面、协同育人大课程共建方式单一、实训教学的资源配置不均衡等问题。而缺乏制度顶层设计、考核体系的导向不明确以及对企业的激励不够等问题也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协同育人实效的形成^[2]。

基于此,本文立足《现代产业学院建设指南(试行)》的政策背景,围绕其提出的建设原则与建设任务展开分析,系统梳理产业学院协同育人机制的内涵构成、实践瓶颈与运行障碍,并提出相应的机制优化路径与对策建议,力求为高校推进现代产业学院高质量建设提供理论参考与实践支撑。

2 现代产业学院建设的政策逻辑与指导原则

2.1 《现代产业学院建设指南(试行)》的政策发布背景

作者简介:陈名凯(1994-),男,博士,研究方向为国际教育产教融合;

通讯作者:邹鸣民(1990-),男,博士,研究方向为产教融合、高等教育国际化。

在新的时代背景下,我国区域经济要同时解决产业结构转型升级和技术变革对高层次复合型高素质技术技能人才的需求,而普通高校人才培养无法与产业发展产生有效的技术协同和复合技能要求相适应,缓解这种结构性矛盾,教育部和工业和信息化部于2020年8月联合提出了《现代产业学院建设指南(试行)》,并指出要统筹推进“政产学研用”协同育人,形成高校与行业企业深度合作,建立中国特色的现代产业学院发展途径。

这份《指南》提出了四项建设原则:“以育人为核心、以产业为重心、融合产教、推动创新发展”,并规划了七项主要建设任务,目的是促进高校从“学科驱动”转向“产业导向”转型,增强其服务区域经济社会发展的能力。

2.2 现代产业学院建设的四项基本原则

《指南》指出,现代产业学院的建设应坚持以下四项基本原则:

(1) 坚持育人为本:“育人为本”是高等教育的根本任务。产业学院建设首要目标是服务学生发展,推动学生综合素质与技术技能协调提升^[3]。在这一原则指导下,课程设计、实训安排、师资配备等都必须围绕学生成长需求展开,避免“唯产业而产业”“唯就业而就业”的片面导向。

(2) 坚持产业为要:现代产业学院不同于传统学院的本质特征在于其“产业嵌入式”的组织逻辑。“产业为要”强调产业需求导向,要求高校在专业建设、课程开发、科研组织等方面充分对接区域主导产业,突出地方经济与企业发展所需技术领域,实现人才培养与产业链、创新链、教育链的联动^[4]。

(3) 坚持产教融合:协同育人机制——产教融合机制。产教融合意味着要撕裂“校内教育”和“企业实践”之间的藩篱,实现育人过程中的“协同设计、协同实施、协同评价”,通过制度化平台化的合作机制,将企业深度融入培养过程,让学生实现能力成长在“真环境”“真项目”中获得锻炼^[5]。

(4) 坚持创新发展:因此,产教融合、校企合作,要让产业学院建设创新发展原则,坚持理念、制度、技术多方创新^[6]。人才培养改革、教学资源重建、数字化教学平台建构,创新发展原则为制度体系不断创新、形成可复制可推广的经验提供内生动力^[7]。

2.3 七项建设任务的目标定位与功能解构

《指南》围绕产业学院的建设目标,进一步明确了七项关键建设任务,每项任务都对应着一类协同育人机制的建设要求:

创新人才培养模式:探索“工学结合、产教融合、项目导向”等多元化路径,形成校企双主体协同育人机制^[8]。

提升专业建设质量:推动传统专业向“产业群需求”适配转型,重构专业课程结构与实践体系^[9]。

开发校企合作课程:实现企业深度参与课程开发与教学实施,推动“项目制、案例制、岗位导向”教学改革^[10]。

打造实习实训基地:校内外融合共建,突出实践性、真实性与稳定性^[11]。

建设高水平教师队伍:探索“双师型”“产业教授”等柔性引才机制,实现“教产一体”的师资配置^[12]。

搭建产学研服务平台:以产业学院为平台开展科研合作、技术转化、人才共享与社会服务^[13]。

完善管理体制机制:推动理事会、董事会等多元治理结构落地,实现协同运行与制度保障^[13]。

这些建设任务相互联动、协同推进,形成了现代产业学院从育人理念到制度实施的完整闭环。

3 高校产业学院协同育人机制的基本内涵与构成

3.1 协同育人机制的概念界定

协同育人(Collaborative Education)是指由多元主体参与人才培养过程围绕相同的人才培养目标以制度协同、资源共享、流程协同等方式实现育人功能协同的教育组织机制,在现代产业学院的建设过程中强调高校、企业、行业组织与政府战略对接与共同参与的协同育人机制,是强调高校、企业、行业组织、政府等共同构建、共同管理、共同享有、共同育人的系统性育人新机制^[13]。这种机制既注重教学过程中的“衔接”,更加注重从育人目标的确定、课程设置、教学资源配置到评价反馈的整个过程上的协同。协同育人机制是现代产业学院打破传统的“培养内在逻辑”实现“以用促教、以产促学”的基本制度保障。

3.2 协同育人机制的核心构成要素

结合政策指导与当前高校实践,产业学院协同育人机制主要由以下五大要素构成:

(1) 协同育人目标机制

明确的人才培养目标是协同的前提。《指南》强调“产业为要”,因此育人目标必须由高校与企业、行业组织

共同商定,既要服务地方产业升级,又要满足学生职业发展需求。这一目标机制强调“三对接”:对接地方经济发展需求、对接企业技术变革趋势、对接学生成长成才路径^[14]。

(2) 校企协同课程开发机制

课程体系是育人目标实现的基本载体,普通高校的课程开发工作一般是由学校组织的,产业的前沿性和岗位的实践性体现不明显。产业学院要求高校教师与企业工程师参与设计,共同开发课程标准、教学内容,深化“项目式”“任务式”教学,同时企业也要参与到课程的实施当中,开展课程共同授课、共同讲授案例和共同实训辅导^[15]。

(3) 双元师资团队建设机制

协同育人离不开优质的师资力量。产业学院应抛弃“单纯的学校教师编制”培养模式,探索“双师融合”师资模式:一方面加强校内教师的专业技能背景与项目锻炼,另一方面引入校外教师、行业企业专家,形成兼具“教学、实践、指导”功能的“多元一体”师资团队^[16]。

(4) 资源共享与平台协同机制

协同育人需要教育资源的统筹规划与实时共享。产业学院要建立校企共建共享共用的教学平台、科研平台、实训平台,开放共享硬件设备、项目、软件资源^[17]。通过信息化平台建设实现可视化、可调用、可追踪的可视化资源,提升资源使用效果^[18]。

(5) 教学过程与质量评价协同机制

考核是有效实施育人的关卡。协同育人应建设人才培养过程中的教学设计、教学过程和教学结果三个层面的质量监控体系,企业应当介入人才培养的各个环节考核,尤其是实践型课程考核、实践性项目考核、实践成果考核等环节的考核应当引进企业的专家评估体系^[19]。学校则应该具有对学生培养的跟踪机制,形成学校、企业、第三方的三方共同评价体系,充分达到人才培养过程和产出的监控状态和反馈闭环^[20]。

3.3 协同机制与建设任务之间的逻辑对应关系

《现代产业学院建设指南(试行)》中所列的七项建设任务与前述五项协同育人机制之间存在着高度一致的对应关系:“形影相对”的关系意味着校企协同机制不仅是落实产业学院建设任务的需要,更是政策任务制度化、过程化的路径载体,以协同机制的系统构筑引领现代产业学院高效运行,发挥现代产业学院在高等结构调整与技能型人才培养方面的作用^[21]。

4 高校产业学院协同育人机制的实践现状与困境分析

4.1 机制建设的总体推进情况

自《现代产业学院建设指南(试行)》颁布以来,各高校积极落实文件政策,以建设任务为指引积极探索产业学院建设。从实践层面来讲,无论是产业学院的建设平台、共同开发课程、共同培养人才,都取得了一定成效。如高职“双高计划”学校、应用型本科学校通过与地方龙头企业共建智能制造、数字贸易、新能源等现代产业学院,初步形成了“专业对接产业、课程嵌入项目、实践依托基地”的协同育人机制。

在组织模式和制度建设方面,虽然部分高校初步构建起了一定的协同机制,但就高校产业学院在全国范围内的整体运行机制而言,与制度落实、资源整合、质量管理等方面的差距还很明显。

4.2 主要存在的问题

(1) 校企协同意愿与能力不对等:现阶段不少产业学院校企协同仍然是“浅度协同”,企业缺乏积极性和能力深入参与人才培养的实践,有些合作企业只表现为提供学徒岗位、开设讲座,而不积极参与课程、项目等关键培养环节的指导和评价,协同育人几乎是一种“秀场”。高校则存在“签了协议不想落实”的问题,合作的内容以签章、展览居多,能共同建设的很少^[21]。

(2) 协同机制制度碎片化:有的高校尚未确立课程建设、师资建设、平台建设、质量评价等整体协同“闭环式”制度,如课程共建与师资共建的联动、实训平台与教学过程的联动、目标设定与质量评价的联动等方面存在断层,会出现各类制度碎片化、条块分割的机制“碎片”化效应^[22]。

(3) 教师队伍结构难以适应产业需求:根据产业学院的建设要求,教师一方面要具备从事理论讲授的知识和能力,另一方面要具备企业的项目经验和工作基础。现实中,高校教师的“工程经验欠缺”、企业师傅的“教学能力缺失”也经常被称为“双向错位”,而“双师型”教师队伍的建设缺少稳定地考核和激励手段,很多高校没有建立起企业导师的常态引入机制,师资融合很难深入^[23]。

(4) 实践教学资源配置失衡: 校企协同育人需要企业与学校的共同投入, 实现实践教学资源的校企共享, 但在实践过程中经常会出现“学校办学实训条件有限, 校外实训难以保证企业安排、地点混乱”的窘境。部分产业学院缺少实训设备场地, 或者由于委托企业“临时借给”的实际情况, 导致实训的内容很难系统、教学化; 更主要的是, 由于企业受限于时间、人员、场地等方面的因素, 学生实践大多以观摩型、见习型为主, 很难完成“真实的环境中的岗位实训”^[24]。

(5) 协同评价机制缺位: 及时有效的质量评价机制是保证协同育人可持续发展的保证, 然而现有的大多数高校产业学院没有针对协同育人的质量评价指标体系, 对于协同育人过程的考核内容多以课时、就业率等硬性数据为依据, 没能针对课程共建、项目实训、企业导师教学成效等展开评价, 评价结果也没有形成回路闭环反馈, 无法为完善机制提供依据^[24]。

4.3 深层成因分析

上述问题的存在, 根源在于以下几个方面:

顶层制度设计不健全: 部分高校在产业学院建设中缺乏明确的发展战略与操作细则, 导致机制落地难度大、协同效应弱。

激励机制缺失: 对校内教师和企业人员缺乏有效的参与激励, 导致协同教学缺乏积极性。

协同意识薄弱: 校企之间认知差异大, 高校更关注教育目标, 而企业更重视短期经济效益, 合作愿景难以对齐。

资源整合能力不足: 缺乏统一协调平台, 校内各部门之间信息不通, 企业参与方也未被纳入资源整合系统。

4.4 案例简析: 江西理工大学“先进铜产业学院”运行观察

以江西理工大学与鹰潭市人民政府、江西铜业集团有限公司合建的先进铜产业学院为代表的是基于区域优势资源、产业特色、高校科研基础优势建立的现代产业学院。该产业学院建设过程中, 始终坚持以国家铜产业发展战略和地方产业升级发展需求为导向, 探索高校、政府、企业协同共建共享的校企合作育人模式。

该学院建设具备以下三方面突出优势:

高校科研与人才优势: 江西理工大学在有色金属领域具有较强的学科基础、科研积累与人才培养能力, 能够为铜产业提供系统化的人才供给与技术支持;

地方产业支撑优势: 鹰潭市作为我国重要的有色金属产业基地, 尤其在铜加工领域产业链完整、企业集聚, 具备产业生态协同的优越条件;

企业实践平台优势在于: 江西铜业集团有限公司属于我国特大型联合企业, 从铜矿采选到冶炼加工的生产全过程, 可为协同育人提供真实生产实践平台和高质量的实习实训平台。

尽管项目建设具备良好基础与资源优势, 但在具体运行过程中仍面临以下现实挑战:

课程开发仍以高校主导为主, 企业参与度有限, 导致部分课程缺乏产业前沿性和岗位导向性;

企业导师未形成稳定师资队伍, 流动性强, 且缺乏系统教学培训, 难以深度嵌入教学全过程;

教学过程以理论教学为主, 实践环节安排滞后, 尚未实现“教—学—做”一体化的工学结合路径;

项目评估重视结题结果, 轻视过程评价, 难以全面反映学生在项目实训过程中的能力成长与协同表现。

这也反映出即使是具有良好资源支持与协作条件的产业学院协同育人组织安排建设, 其协同育人机制真正有效“落地”的实践困境依然存在, 协同育人效能的深化还需要继续加强其机制统筹、组织协同与文化融通等方面更深层次的内涵建设。

5 构建协同育人机制的路径建议

针对高校产业学院协同育人机制中存在的制度碎片化、资源供给错位、企业参与内驱力不够等共性问题, 需要从政策、机制、实践路径等方面综合应对, 在此基础上, 文章从五方面构建协同育人机制路径建议, 旨在推动高校产业学院更好更快发展。

5.1 构建目标导向明确的顶层制度体系

协同育人机制构建首先要解决“育谁、为谁育、怎么育”的顶层设计问题。高校应在《现代产业学院建设指南

(试行)》的政策框架下,制定符合本校定位和区域产业结构的现代产业学院发展战略,并将其纳入学校“十四五”发展规划或年度重点任务,确保协同育人从理念层面上升为制度安排。

具体建议如下:

建立“校企共育发展理事会”制度,负责协同育人顶层决策与战略规划;

明确各参与主体职责与任务清单,构建“事前共谋、事中共管、事后共评”的制度闭环;

制定覆盖目标设定、课程共建、过程管控、质量评价的协同育人制度体系,形成可执行、可考核、可反馈的机制体系。

5.2 搭建稳定高效的多元协作平台

平台是协同机制中不同参与主体之间沟通和协作的载体,高校要充分发挥现代产业学院作为实施协同机制的基本载体的积极作用,建立涵盖教学管理平台、课程研发平台、项目合作平台、成果转化平台的“协同平台”,促成“结构性”合作向“功能性”合作的有效转化^[25]。

建议路径:

推行“企业入校、教师进企”双向互访制度,建立常态化沟通机制;

搭建“产教协同工作室”,联合企业工程师与专业教师,开展教学内容共创与项目实践;

建立“课程共建资源库”与“项目化教学数据库”,实现校企教学资源实时共享与协同调用。

5.3 完善双师融合型师资培养与激励机制

高水平的“双师型”师资队伍是产业学院协同育人的关键支撑。高校应围绕“教学-科研-服务”三位一体目标,改革师资培养、引进与使用机制,提升教师服务产业与教学融合的综合能力^[25]。

具体措施包括:

制定“双师型”教师认定标准与考核体系,将企业实践能力纳入教师职称评定与绩效考核;

鼓励教师承担企业真实项目,按教学贡献、技术服务、成果转化等建立多元评价指标;

引入“企业导师兼职化”机制,对企业工程师实行聘任、培训、考核“三统一”管理;

设立“协同育人教师奖励基金”,用于激励在协同课程建设、项目指导、学生实训等方面有突出贡献的教师团队。

5.4 构建贯通校企的课程体系与实训平台

课程是协同育人的关键纽结点,实践是最有效的检验路径。打造由校企联合设计的“产业导向型”专业课程体系,推动课程内容与产业标准、职业能力与职业资格对接融合^[25]。

建议举措:

建立“企业主导+高校协同”的项目课程体系,鼓励以企业真实项目为载体开展教学;

实行“模块化+嵌入式”课程结构设计,便于校企共同教学与资源整合;

推动校企共建“开放式共享型”实训基地,实现“理论+实训”无缝衔接;

强化企业岗位实习环节,将企业实训成绩纳入学生学业评价体系中,确保实践教学落地生效。

5.5 构建科学完善的协同评价与反馈体系

科学的评价机制是协同育人机制有效运行的保障,应建立全过程、全参与、全维度的协同质量评价与动态反馈机制^[25]。

具体建议如下:

构建“学校—企业—第三方”三元协同评价体系,涵盖课程实施质量、教学内容适应度、学生能力提升、用人单位满意度等;设置“动态监测+年度评估”两级评估机制,实现质量管理的常态化、精准化;推行“学生成长跟踪档案”制度,记录学生在校企协同育人中的成长轨迹,作为后续教育改进与企业反馈的依据;建立评价结果应用机制,将评价数据与教师激励、企业合作续签、课程更新直接挂钩,提升评价的决策价值。

通过上述五个维度的机制构建路径,可以有效推动高校从“政策响应”向“机制转化”升级,实现从“结构共建”向“过程共育”过渡,推动现代产业学院协同育人进入高质量、规范化、制度化发展阶段。

6 总结与展望

6.1 研究总结

《现代产业学院建设指南（试行）》的印发，是国家以宏观制度性设计及政策性措施指导我国高校“产教融合”发展的顶层设计文件，我国高校产教“深度融合”步入了高校产教融合“机制协同、任务驱动、质量提升”建设阶段。本文以该文件为视角，根据《现代产业学院建设指南（试行）》的现代产业学院建设原则、建设任务为依据，论述了高校产业学院协同育人机制构建的路径。

本文通过阐释“以育人为中心，以产业为重点，产教融合，创新驱动”四条原则与七项重点任务，以及协同育人机制在产业学院制度框架中的作用等政策逻辑，初步提出协同育人机制主要由协同育人目标机制、协同育人课程共建机制、协同育人双元师资机制、协同育人资源共享机制、协同育人评价反馈机制等组成，并进行了其与《指南》任务内容的逻辑关联分析。

另外，笔者指出现有合作育人模式在实施过程中总体呈现校企合作不均衡、制度割裂、资源匮乏、评价缺失的状况，阻碍产业学院建设的质量和效率，因此有针对性地给出了顶层设计、平台协同、师资协同、课程一体、评价体系化五方面措施的实证建议，以期为提升院校产业学院建设质效提供实践思路。

6.2 未来展望

当前，现代产业学院建设仍处于从政策试点向全面推广的过渡阶段，未来发展需要在以下几个方向持续深化：

第一，联动机制分区域差异化建设：各地区产业结构、企业基础和高校定位都不一样，未来应因地制宜、因类施策，尝试分区域联动、分产业联动的协同育人模式，促进“地方高校+地方产业”的有效衔接。

第二，建立共性的现代产业学院协同育人评估制度和认证制度：建立统一的现代产业学院的协同育人评估制度，实现与高校教育教学质量评估制度对接与国际化。

第三，数字化平台支持协同过程：搭建“智慧产业学院”平台，如人工智能、大数据等助力协同机制运行智能化、可视化、数字化等。

第四，强化长效激励：细化完善校内外激励协同机制，如企业认定、教师绩效捆绑、学生实践成果产出等制度路径，进一步激发参与各方内生动力。

总而言之，产业学院作为高等教育服务国家服务产业的重要平台，产业学院协同育人机制建设还有待在实际的产业、教育实践过程中不断地迭代、修正。今后，只有遵循“协同建设、机制引导、质量引领”的发展逻辑，才能真正促进中国高等教育高质量内涵式发展，培养出更适应新时代产业发展的复合型创新型技术人才。

参考文献：

- [1] 余璇. (2023). 宁波大学经济专业政产学研协同育人机制创新与实践. *Creative Education Studies*, 11, 1333.
- [2] 张扬, 宋素亚, & 祖湘莎. (2023). 工程管理类专业“四体系一平台”产学研用协同育人模式设计及实现. *高等建筑教育*, 32(2), 63-70.
- [3] 李泳璋, & 李永朱. (2024). 我国现代产业学院建设研究. *Advances in Education*, 14, 1591.
- [4] 胡文彬. (2024). 产教融合背景下高校校企协同创新就业育人模式探索与构建. *Creative Education Studies*, 12, 395.
- [5] 罗云. (2025). 产教融合背景下高职市场营销专业课程体系构建研究. *财经管理*, 1(1), 93-97.
- [6] 林蕙青, & 谢阿娜. (2022). 坚持改革创新, 实现八年制医学教育新发展. *协和医学杂志*, 13(1), 1-4.
- [7] 刘秀玲, 张巨勇, 李旻, & 张吟雪. (2023). 国际商务专业硕士校地协同育人机制创新. *大连民族大学学报*, 25(5), 457-462.
- [8] 宋磊. (2021). 产学研用协同育人模式驱动高校教学创新研究. *辽宁科技学院学报*, 23(5).
- [9] 王雪利. (2025). 校企协同育人模式下涉外专业群实践课程教学改革创新与实践. *Journal of Hubei Open Vocational College*, 38(9).
- [10] 晓龙张, 强谢, & 凤霞贾. (2025). 产教融合模式下高职机电一体化技术专业课程改革与实践. *现代教育进展*, 3(7).
- [11] 徐洵. (2022). 现代高职教育实习实训基地协同建设研究. *教育理论与实践*, 42(33), 29-33.
- [12] 张向华, 李江, & 栗梅. (2021). 地方本科院校“双师型”教师共同体建设研究. *教师教育学报*, 8(6), 130-138.
- [13] 姚锦金. (2024). 应用型高校建设现代产业学院产学研平台的模式与运行机制研究. *Advances in Education*, 14, 490.
- [14] 何健, & 胡燕. (2024). 多元育人视域下双师型教师共同体建设路径研究. *Journal of Hubei Open Vocational College*, 37(12).
- [15] 江丰光, 梁晓妮, 蒋竹君, & 周赟. (2023). 校企合作视域下人工智能课程开发与实践的设计研究. *Journal of Distance Education (1672-0008)*, (3).
- [16] 刘俊, 吴瑛, & 谭苗. (2024). 基于现代学徒制的“双导师”教学团队建设研究. *Journal of Hubei Open Vocational College*, 37(13).
- [17] 孟雯雯. (2024). 校企共建共享教学资源, 构建三元四维数智评价体系. *教育论坛*, 6(10).
- [18] 覃京翎. (2022). 产教融合背景下校企协同共建共享实训基地策略研究. *教育观察*, 11(7), 58-61.
- [19] 王鸿燕, 赵小燕, 林喆, 赵云鹏, & 曹景沛. (2025). 工程类研究生课程教学质量多元化评价体系探索. *Creative Education Studies*, 13, 394.

- [20] 陈璐, & 王秀. (2024). 基于岗课赛证融合的高职线上课程教学评价路径探索. *教育天地*, 6(8).
- [21] 教育部、工业和信息化部. (2020). 《现代产业学院建设指南(试行)》
- [22] 吕云鹏, 赵志刚, 朱郑, & 乔若. (2024). 产教融合背景下高职院校“政校行企”协同育人的策略研究. *College and Job*, 13, 907.
- [23] 刘艳芳. (2025). 双师教育模式对高校应用型人才培养的效能提升路径. *教育研究与实践*, 1(1), 72-76.
- [24] 管细宇. (2025). 现代产业学院驱动专业建设的实践研究. *Advances in Education*, 15, 1462.
- [25] 陈金武, 齐璐璐, 孙炯, & 徐忠东. (2023). 新工科背景下生物技术专业“政产学研用”融合的人才培养模式探索. *安徽工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40(2), 75-77.

Cooperative Education Mechanism of Modern Industry Colleges and Industry

Research on the Collaborative Education Mechanism of Industry Colleges in

Universities under the Background of the “Guidelines for the Construction of

Modern Industry Colleges (Trial)” —— An Analytical Perspective Based on

Construction Principles and Tasks

Chen Mingkai¹, Zou Mingmin²

¹ Jiangxi University of Applied Science, Nanchang, Jiangxi 330098, China

² Jiangxi University of Technology, Nanchang, Jiangxi 330098, China

Abstract: Currently, China's higher education has entered a new stage of quality improvement and structural optimization. The modern industry college is the main form for deepening school-enterprise cooperation and integrating industry with education. In 2020, the Ministry of Education and the Ministry of Industry and Information Technology jointly issued the "Guidelines for the Construction of Modern Industry Colleges (Trial)", proposing "four construction principles" and "seven construction tasks", which provide policy and practical basis for the construction of the collaborative education mechanism in universities. Based on the policy background of the "Guidelines", this paper explains the key concepts of the guidelines and the necessary components of the collaborative education mechanism, including the determination of collaborative goals, collaborative curriculum construction, collaborative teaching staff, resource integration, and evaluation criteria. It analyzes the collaborative education in universities from the current situation of the collaborative education mechanism, points out problems such as insufficient depth of school-enterprise cooperation, fragmented collaboration, and unreasonable allocation of collaborative resources in the current practice process. Around these cases, it proposes optimization ideas mainly including top-level design, construction of collaborative platforms, cultivation of collaborative teaching staff, collaborative curriculum construction, construction of evaluation systems, and improvement of evaluation criteria, aiming to provide theoretical support and operational guidance for the construction of industry colleges in universities and support the connotative construction of modern industry colleges and the improvement of the quality of collaborative education.

Keywords: Modern Industry Colleges; Collaborative Education; Integration of Industry and Education; Institutional Construction; Education Reform

布鲁纳发现学习模式（BDLM）视域下粤港澳大湾区初中语文教学创新研究

李群英¹

(1.广东省东莞市松山湖实验中学, 广东 东莞松山湖, 523808)

摘要:本研究立足于布鲁纳发现学习理论,结合粤港澳大湾区教育发展背景,探讨初中语文教学模式的创新路径。通过分析粤港澳三地语文教育的历史与现状,指出现有教学模式的优势与困境,并在此基础上,构建基于布鲁纳发现学习理念的初中语文教学优化模式。该模式强调学生中心,任务驱动、评价先行、成果导向,旨在提升学生的语文素养、探究能力和跨文化理解力。最后,通过实证研究验证该模式的有效性,为粤港澳大湾区初中语文教学的协同发展提供理论支持和实践借鉴。

关键词:布鲁纳发现学习理论; 粤港澳大湾区; 初中语文; 教学模式创新

DOI: doi.org/10.70693/rwsk.v1i8.1287

一、引言

《粤港澳大湾区发展规划纲要(2019年)》明确提出“建设教育和人才高地”的目标,强调促进教育合作发展,包括:支持大湾区建设国际教育促进教育资源共享;鼓励粤港澳高校合作办学,促进课程互认、学分互换;加强基础教育交流,促进教学模式创新^[1]。《关于推进粤港澳大湾区高等教育合作发展规划》中也提到:推进华文教育数字化改造,探索教学手段智能化。鼓励湾区学校共同开发中文课程,提升文化认同感。

语文教育在粤港澳大的大背景下,面临着创新教学模式的时代要求。布鲁纳发现学习理论强调通过主动探索建构知识体系,这与初中语文新课标“学习任务群”“整本书阅读”等理念高度契合。研究选取东莞市松山湖实验中学开展教学实验,重点解决两个问题:(1)如何基于布鲁纳理论构建适应大湾区特点的语文教学模式;(2)实际教学中该模式的有效性验证。

二、初中语文教学模式发展的理论研究

(一)国内外语文教学模式的发展演变

- 1.传统语文教学模式:以教师讲授为主,强调知识的系统性和完整性,但容易忽略学生的个体差异和学习兴趣。
- 2.启发式教学模式:强调教师引导学生思考和探索,但容易流于形式,缺乏深入的探究。
- 3.自主学习模式:注重学生的自主性和合作学习,但可能因教师指导不足而影响学习效率。
- 4.项目式学习(PBL):注重学生在真实项目中应用知识解决问题,提升实践能力和创新精神,但需教师科学设计项目并提供必要的指导。
- 5.信息技术与语文教学的融合:通过信息技术手段丰富教学内容、提升教学效率,但需合理运用技术,避免过度依赖。

(二)布鲁纳发现学习理论的核心思想(Bruner's Discovery Learning Theory)

布鲁纳(Jerome Bruner)的发现学习理论(Discovery Learning)是认知心理学的重要理论之一,强调学生通过主动探索和问题解决来获取知识。其内核概括为以下几点^[2]:

- 1.主动学习:强调学生通过自主探索、发现和创新构建知识,而非被动接受。
- 2.情境驱动:学习需依托真实或模拟的情境,以激发学生的兴趣与内在动力。
- 3.结构主义:学科知识应呈现为可理解的“结构”,如语文的“叙事结构”“语言逻辑”。
- 4.螺旋式课程:知识在不同学段重复深化(如文言文教学从诵读到文化分析)。

作者简介:李群英(1989—),女,本科,研究方向为初中语文教法与学法研究。

(三) 布鲁纳发现学习理论对初中语文教学模式创新的启示

- 1.创设真实情境：教师可结合多媒体、实地考察等方式，设计与学生生活经验紧密关联的情境，以激发学习兴趣与动机。
- 2.提出挑战性问题：通过开放性问题、辩论题等，提出能引发深度思考的挑战，驱动学生主动探究。
- 3.提供支架式支持：适时给予资源、方法指导或组织小组讨论，帮助学生逐步突破认知难点，构建知识体系。
- 4.鼓励合作探究：利用小组讨论、角色扮演或项目合作等形式，引导学生协作解决问题，培养团队能力。
- 5.注重反思评价：通过撰写日志、自评互评等活动，引导学生总结学习经验，促进元认知发展。

表 1：布鲁纳发现学习模式与初中语文核心素养的对应关系

发现学习要素	对应的语文核心素养	教学实施策略
直觉思维	思维发展与提升	通过开放式问题激发学生跳跃式思考
知识结构	语言建构与运用	引导学生归纳语言规律和文本叙事结构
内在动机	审美鉴赏与创造	创设真实情境激发表达欲望
螺旋式课程	文化传承与理解	在不同学段反复深化文化主题

三、粤港澳三地语文教育发展的历史与现状

(一) 粤港澳三地语文教育的历史演进

粤港澳三地的语文教育因历史渊源各异，发展路径各具特色。广东作为岭南文化中心，其语文教育继承了中国传统教育精髓，又得改革开放风气之先，形成了“扎实基础、注重能力”的教学特色。香港在 150 多年的英国殖民统治下，语文教育呈现出中西交融的特点，一方面保留了传统中文教育的元素，另一方面吸收了西方教育理念和

方法。澳门作为中西文化交流的桥梁，其语文教育受到葡式教育影响，同时保持着浓厚的中华文化底蕴。回归后，港澳语文教育均经历本土化调适。2001 年，香港课程发展议会于《学会学习：课程发展路径》报告中提出四大关键项目：德育及公民教育、阅读学习、专题研习及资讯科技互动学习；澳门则通过新编《中国语文》教材，着重深化文化认同教育。这些变化反映了两地在保持特色的同时积极融入国家教育体系的努力。

(二) 粤港澳三地语文教育的现状分析

1.课程设置：三地的语文课程各具特色。广东侧重基础知识与综合能力的培养；香港强调语言实践与跨文化交流；澳门注重文化传承与身份认同。

2.教材使用：三地教材的编写方向差异明显：广东突出本土文化元素；香港侧重国际视野的拓展；澳门倡导多元文化融合。

3.教学方法：三地的教学策略各有侧重。广东以教师讲授与学生练习为主；香港重视自主学习和合作探究；澳门偏向情境创设与体验式学习。

4.评价方式：三地的评价体系各有特点。广东关注知识掌握与技能运用；香港强调语言表达与应用能力；澳门注重文化理解与价值判断。^[3]

(三) 粤港澳三地语文教学模式的优势

粤港澳三地在语文教学模式方面各有独特之处，彼此形成了互补优势。

广东地区采用“五行环状”教学模式，该模式围绕“导、研、展、练、评”这五个教学环节依次推进，各环节紧密相连。它着重提升课堂效率，助力学生掌握基础知识，确保了语文教学具备系统性与连贯性，让学生能够扎实地掌握语言的基础知识与基本技能^[4]。

香港则推行专题研习模式，此模式秉持以学生为中心的理念，借助真实情境中的项目任务来驱动学习。以“整本书阅读”教学为例，学生要自主选定研究方向，收集相关资料，并最终形成研究报告。这种教学方法能有效培养学生的信息处理能力、批判性思维以及表达能力，与布鲁纳的发现学习理念高度相符^[5]。

澳门的情境教学模式则擅长通过创设文化情境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和情感体验。在文言文教学中，澳门教师常采用角色扮演、戏剧表演等方式，帮助学生理解古代文学作品的历史背景和情感内涵。这种方法符合布鲁纳关于“直觉思维”和“内在动机”的主张，能够促进学生对文化的深层理解^[6]。

尽管粤港澳三地的语文教学模式在侧重点上存在差异，但均彰显了对学生主体地位的重视，以及对学生语文素养实现全面发展的不懈追求。广东模式保证了教学的基础性，香港模式强化了学习的探究性，澳门模式丰富了教育的文化性，三者结合可以形成更加完善的语文教学体系。

表 2：粤港澳三地初中语文教学模式主要特点比较

地区	教学理念	典型方法	评价方式	优势	不足
广东	效率导向	五行环状教学（导、研、展、练、评）	考试测评为主	知识扎实	创新不足
香港	能力导向	专题研习	多元评估	自主性强	深度不够
澳门	体验导向	情境教学	过程性评价	情感丰富	系统性弱

四、初中语文教学优化模式及其实证研究

(一) 基于布鲁纳发现学习理念的初中语文教学优化模式构建

本研究基于布鲁纳发现学习理论,结合粤港澳三地语文教学优势,构建了“CSMSR (情境 (Context)、支架 (Scaffolding)、建模 (Modeling)、共享 (Sharing))、反思 (Reflection) 视域下的初中语文教学模式,强调以情境为基础,为学生提供支架式学习支持,通过建模引导学生掌握知识和技能,通过共享促进学生的交流与合作,最后通过反思评价培养学生的语文素养。

以初中语文朱自清的《背影》为例,这里介绍一种包含四个紧密相连环节的教学模式:

1. 情境创设 (Context)

教师借助链接生活经验的方式,营造出真实的情境,并提出具有引导性的问题,以此激发学生的情感共鸣。比如开展大湾区“父辈记忆”展,在课前展示粤港澳三地的老照片,像广东茶楼、香港码头、澳门骑楼下父子互动的画面,让学生挑选一张照片配上 50 字左右的旁白,思考“父爱的共同表达”。又或者让学生采访家中长辈的“一件遗憾往事”,记录下类似朱自清文中那样的细节,如人物的衣着、动作等,为课堂分享做好准备。

2. 支架搭建 (Scaffolding)

为了打破时空限制和文化隔阂,教师会搭建语言、情感以及文化方面的支架。例如利用 AI 技术模拟火车站场景,重现父子离别的情境,引导学生体会父子之间的深厚情感。再如播放港片《岁月神偷》中的父子片段,与《背影》里“买橘子”的段落进行对比,探讨“东亚家庭的情感克制”。

3. 建模示范 (Modeling)

为学生提供能够迁移运用的文本分析方法。教师可以通过示范朗读,用“电影分镜法”拆解“买橘子”的场景,包括镜头角度、背景、配乐建议等内容,组织小组合作制作普通话、粤语双语分镜脚本,或者撰写“祖父的背影”分镜脚本。还可以示范“细节密码分析法”,聚焦“黑布小帽”与“紫毛大衣”,解读色彩符号中所蕴含的阶级差异,讨论民国知识分子对父权文化的矛盾心理。

4. 共享交流 (Sharing)

通过多元的表达形式促进学生的深度理解。各小组分享“大湾区背影”创作计划,比如拍摄 3 分钟的微电影《2025 父与子》,要求影片中包含无声动作特写,类似现代版的“买橘子”情节;或者创作图文故事集《家族记忆的褶皱》,收录家庭老物件的故事;也可以组织“给父亲的一封信手写家书”活动,挑选优秀作品在广深高铁站进行展览。

5. 反思评价 (Reflection)

教师要重视学生的反思评价,帮助学生总结学习过程中的经验教训,推动学生实现自我发展。例如组织学生撰写学习日志、进行自我评价以及同伴互评等。反思评价应注重过程性评价,全面关注学生学习效能,而不只是看重考试成绩。评价维度可以设定为:过程性档案(学习日志占 50%)、成果展示(视频作品占 30%)、跨组互评(占 20%)。

CSMSR 模式格外强调技术的赋能作用,运用智慧平板、点阵笔、人工智能、大数据等工具,支持学生进行发现、协作、建构和评价。这种教学模式既契合布鲁纳“技术是认知工具”的观点,也顺应了大湾区教育信息化的发展潮流。

(二) 实证研究设计

1. 研究对象

本研究以东莞市松山湖实验中学八年级学生为研究对象,为提高样本普适性,从八年级随机选取 2 个班级作为研究对象。八年级学生具备一定语文基础,便于深入分析学习效果。开展为期 20 周的对照实验,量化分析学习参与度与自我报告学业成就的变化,从实践视角验证 CSMSR 的有效性,确保结论的科学性与教学参考价值。

2. 研究工具

本研究的量化工具为《学习参与度测量量表》与《自我报告学业成就测量量表》,测量量表均为成熟量表,基于李克特五级标准赋分,以此清晰划分回答者的倾向与立场,均通过线下问卷的方式进行收集。

3. 数据收集方式

本研究的数据收集方式为问卷调查,本研究在东莞市松山湖实验中学八年级随机选择的 2 个班级中进行现场发放问卷,由教师组织学生进行填写,随后对问卷进行现场收集。剔除教学实验期间请假或缺课等学生无效样本后,本研究采集实验班有效样本量 45 人,对照班有效样本量 45 人。将纸质版问卷录入电子表格进行数据分析,确保样本的代表性与有效性。

4. 实验内容

选取四个教学单元进行重点研究:部编版八年级上册文言文第六单元(《愚公移山》《周亚夫军细柳》等)、现代文阅读第四单元(《背影》等)、第一单元活动·探究(新闻阅读、采访与写作)、名著教学。每个单元教学持续 3-4 周,对照组采用传统教学法,实验组实施基于布鲁纳发现学习理论并融合粤港澳语文教学优势建构的 CSMSR 教学模式,强调智慧终端与数据技术对学习发现、协作与评价的支持。实验时长为 20 周,实验课次 120 节。

5. 数据分析方法

本研究将使用统计分析软件 SPSS 26.0 对收集的问卷数据进行分析。通过采用独立样本 t 检验进行组间分析,

采用配对样本 t 检验进行组内分析, 以确保研究结论的可靠性与有效性。

(三) 研究结果

1. 实验前对照组与实验组对比

表3 实验前对照组与实验组对比

前后分组		对照实验	个案数	平均值	标准偏差	t	p
实验前	学习参与度	对照组	45	3.506	1.087	0.626	0.533
		实验组	45	3.353	1.226		
	自我报告学业成就	对照组	45	3.460	1.234	0.169	0.866
		实验组	45	3.415	1.251		

如表3所示, 在学习参与度维度上, 实验前对照组与实验组对比分析的 t 值为 0.626, p 值为 0.533, p 值大于 0.05, 说明学习参与度在实验前对照组与实验组之间没有显著差异; 在自我报告学业成就维度上, 对照组与实验组对比分析的 t 值为 0.169, p 值为 0.866, p 值大于 0.05, 说明自我报告学业成就在实验前对照组与实验组之间没有显著差异, 为后续因果判断提供了条件。

2. 对照组实验前与实验后对比

表4 对照组组内实验前后对比

对照实验		前后分组	个案数	平均值	标准偏差	t	p
对照组	学习参与度	实验前	45	3.506	1.087	-0.825	0.414
		实验后	45	3.686	1.073		
	自我报告学业成就	实验前	45	3.460	1.234	-0.831	0.410
		实验后	45	3.656	1.087		

在学习参与度维度, 对照组实验前得分均值为 3.506, 标准差为 1.087, 试验后得分均值为 3.686, 标准差为 1.073, 对比分析的 t 值为 -0.825, p 值为 0.414, p 值大于 0.05; 在自我报告学业成就维度上, 对照组实验前得分均值为 3.460, 标准差为 1.234, 试验后得分均值为 3.656, 标准差为 1.087, 对比分析的 t 值为 -0.831, p 值为 0.410, p 值大于 0.05。说明在传统教学法下, 学生的学习参与度与自我报告学业成就虽稍有提升, 但无显著性差异。

3. 实验组实验前与实验后对比

表5 实验组组内实验前后对比

对照实验		前后分组	个案数	平均值	标准偏差	t	p
实验组	学习参与度	实验前	45	3.353	1.226	-3.294	0.002
		实验后	45	4.049	0.544		
	自我报告学业成就	实验前	45	3.415	1.251	-3.054	0.004
		实验后	45	4.059	0.575		

由表5可知, 实验组在学习参与度维度上, 实验前得分与试验后得分对比分析具有显著性差异, t 值为 -3.294, p 值为 0.002 (p 值 < 0.05); 在自我报告学业成就维度上, 实验前得分均值为 3.415, 标准差为 1.251, 试验后得分均值为 4.059, 标准差为 0.575, 对比分析的 t 值为 -3.054, p 值为 0.004, p 值小于 0.05, 说明实验组在自我报告学业成就在实验前后有显著差异。

表6 学习参与度测量量表题项前后测得分差异 ($n=45$)

题目名称	平均值±标准差		p 值
	前测	后测	
1、每当我做这门课的功课时, 我感到充满活力。	3.27±1.372	4±0.879	0.007
2、学习这门课程时, 我觉得自己充满能量并很有能力。	3.4±1.529	4.13±0.726	0.007
3、我总是愿意参与这门课的所有活动。	3.33±1.261	4.02±0.866	0.005
4、我对这门课充满热情。	3.42±1.485	3.82±0.984	0.178
5、学习这门课激励了我。	3.4±1.498	3.93±0.809	0.046
6、我为学习这门课相关的内容感到自豪。	3.38±1.542	3.31±1.474	0.005
7、我在深入学习这门课时感到快乐。	3.31±1.474	4.07±0.72	0.005
8、我全身心投入到这门课程的学习中。	3.29±1.392	4.22±0.67	<0.001
9、学习这门课时, 我常常沉浸其中。	3.38±1.6	4.07±0.751	0.014

由表6所示, 在实验组前后比较题项层面上, 学习参与度条目大多显著提升, 尤其是“全身心投入” ($p<0.001$), “愿意参与课程活动” ($p=0.005$) 与“深入学习时感到快乐” ($p=0.014$), 反映了 CSMSR 对投入与沉浸体验的显著促进; “对课程充满热情”未达显著 ($p=0.178$), 表示情感唤起维度的变化可能缓于行为认知投入。

表7 自我报告学业成就维度实验组前测与实验组后测对比 (n=45)

题目名称	平均值±标准差		p 值
	前测	后测	
1、我能够学习到这门课的所有相关内容。	3.56±1.423	4.09±0.821	0.047
2、完成这门课程后，我觉得自己能够向他人解释所学内容。	3.69±1.328	4.16±0.706	0.045
3、我掌握了与这门课程相关的所有技能。	3.33±1.279	4.07±0.809	0.003
4、这门课程让我能够解决与所学内容相关的问题。	3.18±1.669	3.96±0.737	0.004
5、完成这门课程后，我能在需要时运用所学的内容。	3.38±1.466	4.11±0.775	0.008
6、我觉得自己在这门课程很有能力。	3.36±1.433	3.98±0.839	0.019

由表7可知，在自我报告学业成就条目中，“能向他人解释所学”（ $p=0.045$ ）与“掌握相关技能”（ $p=0.003$ ）等显著提升，凸显建模、共享与反思环节对知识建构与迁移的促进。

4.实验后对照组与实验组对比

表8 组间对照组与实验组对比

前后分组		对照实验	个案数	平均值	标准偏差	t	p
试验后	学习参与度	对照组	45	3.686	1.073	-2.023	0.047
		实验组	45	4.049	0.544		
	自我报告学业成就	对照组	45	3.656	1.087	-2.201	0.031
		实验组	45	4.059	0.575		

由表8可知，实验后对照组的学习参与度得分均值为3.686，标准差为1.073，实验组得分均值为4.049，标准差为0.544，对照组与实验组对比分析的t值为-2.023，p值为0.047，p值小于0.05，说明学习参与度在实验后对照组与实验组之间有显著差异；实验后对照组的自我报告学业成就得分均值为3.656，标准差为1.087，实验组得分均值为4.059，标准差为0.575，对照组与实验组对比分析的t值为-2.201，p值为0.031，p值小于0.05，说明自我报告学业成就在实验后对照组与实验组之间有显著差异。值得注意的是，实验组的后测标准差显著小于对照组，表明平均水平提升的同时，学生个体差异也呈现收敛趋势，这可能反映了CSMSR模式对群体表现的稳定促进作用。

六、结语

粤港澳大湾区的政策导向为语文教育改革提供了顶层设计支持，研究湾区初中语文教育的创新发展，不仅符合国家战略需求，也对探索未来教育模式具有重要实践意义。

本研究基于布鲁纳发现学习理论，结合粤港澳大湾区的教育背景，构建了一种更具启发性、探究性和实践性的初中语文教学模式。基于为期20周、覆盖四个教学单元的对照实验数据，可以看出，CSMSR模式相比传统教学，更能提升八年级学生的课堂参与度与自我报告的学业收获。更重要的是，这种提升不仅体现在“愿意参与”，还体现在“投入更深、学得稳、能把知识讲清楚、能迁移到新任务、技能掌握更扎实”等更关键的学习质量上。数据还显示，实验班同学之间的差距有所缩小，说明大多数学生都从这种教学中获益，而不是只“拉高了平均分”。

这套模式之所以有效，核心在于五个环节形成了完整的学习闭环：情境化让学习变得有意义，支架搭建把复杂任务拆解为够得着的台阶，思维建模把“老师如何思考、思维怎样生长”的思考路径可视化，协作共享促成同伴互学和表达外化，结构化反思将学生零散经验整合为可迁移的能力体系。技术在此并非噱头，而是通过即时反馈系统（如课堂应答数据）、过程性评价工具（如阶段性小测）和学习痕迹留存（如电子作品集）等载体，将这些环节转化为可落地、可观测、可追踪的工具，为师生的动态调整提供精准依据。

从教学实践看，该教学模式在初中语文各板块适配性良好。文言文学习里，情境创设和模型构建降低阅读难度，支架式指导助力学生掌握文言翻译技巧。现代文阅读中，搭建支架与成果分享锻炼学生理解感悟能力。活动探究单元里，情境设置激发兴趣，学生在实践中提升综合能力。名著教学时，模型构建拓宽文学鉴赏视野。此模式兼顾不同层次学生，为学困生提供支撑，让中上层学生展示自我、深化理解，促进高阶思维与责任感。它营造了“多数人变好，个别人更优”的良好学习氛围，达成教学目标，避免学生差距过大，为语文教学增添活力。

从课堂组织角度看，适度“慢下来”十分必要，这能为学生的共享与反思提供充足时间，将教学重点聚焦于关键产出，而非活动数量。同时，借助大数据精准洞察学生的过程表现，及时对课堂组织形式与支架的搭建进行微调，有助于营造更高效的课堂环境。

对后续改进与研究的启示是，可以进一步加入客观学业测验与行为数据，验证该模式的长效性与迁移效果，深入比较五个环节在不同教学内容中的关键作用，以实现模式的持续优化。此外，还需着重关注不同文本类型、

班额以及学校环境下的适配策略，形成具有广泛普适性的实施指南。

总体而言，CSMSR 模式推动语文课堂从“教会了什么”迈向“学会了怎么学、怎么用、怎么讲清楚”，有效提升了学习投入质量与学业成绩，为语文课堂的深度学习与技术融合提供了切实可行、可复制推广的路径。

不过，本研究也存在一定不足。比如，研究样本规模较小，研究周期较短，研究方法尚不完善等。在未来的研究中，可以进一步扩大研究样本范围，延长研究时间，并采用科学且深入的大数据研究方法，从而更全面地验证该模式的有效性。

参考文献：

- [1] 郭跃辉.构建粤港澳大湾区“教研一体化”发展的策略与路径[J].课程与教学, 2020(2):66-69
- [2] 莫德拉·斯米特·布鲁纳导论[M].南京: 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 1970:5-20
- [3] 刘慧.中国内地与香港、台湾地区语文考试对比与反思[J].教研教改, 2009(3):34.
- [4] 滕丽琴.“五行环状”教学模式在初中语文教学中的创新与实践[J].语文教学通讯, 2024(4):31-33;
- [5] 王鸿.“精因 352·五环五度”教学模式在初中语文教学中的应用探究[J].课程与教学, 2024(7):51-53.
- [6] 谢洁昕.内地和香港初中语文教科书价值取向的比较研究[D].华东师范大学.2019.
- [7] 林晖.文化认同与传承视角下的澳门新教材《中国语文》[J].教育导刊, 2020(2):11-16.

Innovation of Chinese Language Teaching in Guangdong-Hong Kong-Macao Greater Bay Area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Bruner's Learning Model (BDLM)

Li Qunying¹

¹*Dongguan Songshan Lake Experimental Middle School, Dongguan, Guangdong 523808, China*

Abstract: This study is grounded in Bruner's Discovery Learning Theory and examines innovative approaches to junior high school Chinese language teaching within the educational context of the Guangdong-Hong Kong-Macao Greater Bay Area. Through analyzing the historical development and current status of Chinese language education across the three regions, this research identifies both strengths and challenges in existing teaching models. Building on these insights, we propose an optimized teaching model for junior high school Chinese education based on Bruner's Discovery Learning principles. This student-centered approach emphasizes task-driven learning, formative assessment, and outcome-oriented outcomes, aiming to enhance students' language proficiency, inquiry skills, and cross-cultural understanding. Empirical research validates the model's effectiveness, providing theoretical support and practical references for collaborative development of junior high school Chinese language teaching in the Greater Bay Area.

Keywords: Bruner's Discovery Learning Theory; Guangdong-Hong Kong-Macao Greater Bay Area; Junior High School Chinese; Teaching Model Innovation

农村基础教育数字化的困境与路径探索 ——基于 Citespace 文献可视化分析

单逸梦¹ 吴松樵²

(1. 广西城市职业大学, 广西 崇左 532200, 2. 南宁师范大学, 广西 南宁 530000)

摘要: 农村基础教育是农村发展和乡村振兴的基石, 梳理近十年 (2014-2024) 农村基础教育的研究, 对于农村教育的理论和实践的发展具有重要意义。文章以知网作为数据分析的来源, 以农村基础教育作为关键词进行检索, 并应用 Citespace 进行可视化分析。研究发现 (1) 在理论层面, 当前关于农村基础教育数字化的研究较少, 亟待研究者对该领域的关注。 (2) 实践层面, 通过探究近十年来农村基础教育的研究趋势和热点, 发现农村教育资源浪费、教师素质素养有待提高等问题。因此, 农村基础教育可以从深化体制改革, 推动农村基础教育数字化理论发展; 加强数字化基础设施建设, 提高资源利用率; 推进数字赋能农村教师队伍, 从教育增强农村人力资本三个方面应对农村基础教育数字化转型的困境。

关键词: 农村基础教育; 教育数字化; Citespace; 可视化分析; 路径探索

基金项目: 广西研究生教育创新计划项目“数据循证视域下教师课堂教学评价模型构建与区域常模实证研究” (YCSW2025523)

DOI: doi.org/10.70693/rwsk.v1i8.1269

近年来, 国家颁布了一系列大力发展教育数字化的相关政策, 2021 年 3 月, 国务院印发“十四五”规划, 明确提出加快数字化发展, 建设数字中国, 优先发展农业农村, 全面推进乡村振兴^[1]。

农村基础教育不仅是农村教育不可或缺的一部分, 也是农业生活中举足轻重的一部分。基础教育, 也叫国民基础教育, 对国民实施基本的普通文化知识的教育, 也是提高公民的基本素质的教育, 或者指为继续升学或就业培训打好基础的教育^[2]。在中国, 基础教育包括扫盲教育、幼儿教育 (一般为 3 至 5 岁)、义务教育 (一般为 6 至 15 岁) 也就是所有适龄儿童、少年必须接受的教育, 以及高中教育 (一般为 16 至 19 岁)。教育数字化首次出现在经济领域, 习近平在 2018 年的二十国集团领导人峰会上首次提出“数字化转型”一词, 由经济数字化转型带动全领域进行数字化转型。近年来, 《教育部 2022 年工作要点》中明确提出: “要实施教育数字化战略行动, 加快推进教育数字转型和智能升级。”。因此, 教育数字化变成了近年来的热点话题, 引起无数专家和学者的重视。

以往, 农村基础教育由于历史、经济、观念等原因, 在数字化资源、教师素养、教学设备等方面落后于城市基础教育。现如今, 教育数字化转型的观念深入人心, 农村教师与学生对于农村基础教育数字化的接受度日益提高, 为农村基础教育数字化提供良好的环境。因此, 在教育数字化政策下, 全面厘清农村基础教育的研究路径, 了解近十年以来我国农村基础教育的研究状况, 对于推动农村基础教育教育数字化转型有着重要意义。本文采用文献计量学方法, 对我国 2014-2024 年农村基础教育 412 篇文献进行计量与可视化分析, 借此揭示近十年来农村基础教育研究的热点、演进趋势等, 为后续农村基础教育数字化研究提供借鉴与参考方向。

一、数据来源与分析

(一) 数据来源

文献资料全部来自中国知网 (CNKI) 学术期刊数据库, 主题检索词为“农村基础教育”, 年份在 2014-2024 年

作者简介: 单逸梦 (1999—), 女, 硕士, 研究方向为现代教育技术;

吴松樵 (2000—), 男, 硕士, 研究方向人工智能教育。

通讯作者: 单逸梦

(检索时间为 2024 年 12 月 30 日) 的文献,将文献来源选定为北大核心、CSSCI 来源期刊等期刊文献;筛选出与农村基础教育研究不相符的文献,最后得到 412 篇有效学术文献。

(二) 分析工具

本文对所选文献数据采用陈超美团队开发的 Citespace6.2.R6 版本软件进行计量分析,生成可视化知识图谱;通过深入可视化分析解读知识图谱,以便更好地探索农村基础教育数字化研究演化的热点与演进趋势。

二、研究基本情况分析

(一) 研究发文量分析

农村基础教育研究发文数量总体呈现不断下降的趋势,2014-2015 年缓慢下降至 2016 年上升,2017 年发文量由升转降,2024 年最低点比 2014 年最高点发文量降低了 84.8%。总体而言,我国在农村基础教育理论研究领域逐步进入低谷,农村基础教育研究领域低迷的原因在于,一方面,农村人口流失,农村教育根基逐渐削弱,我国农村基础教育研究领域被学者们忽视,另一方面,农村城镇化迅速推进,农村中小学出现“空壳化”的现象,但农村城镇化不代表抛弃农村,我国仍然存有庞大的农村人口,依旧需要对农村基础教育的重视与关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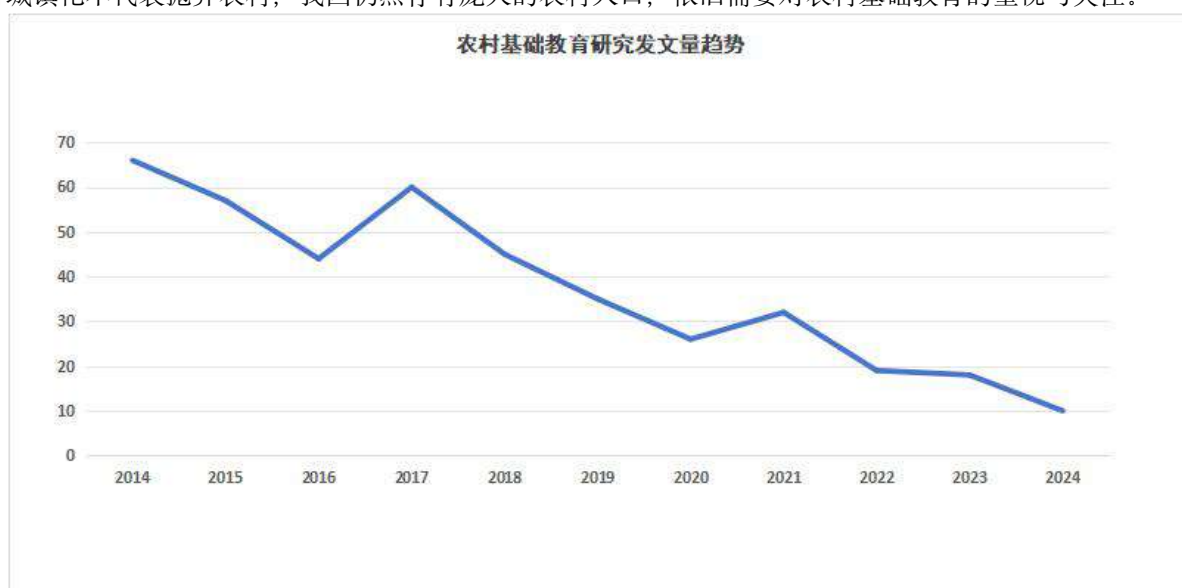


图 1 农村基础教育研究发文量趋势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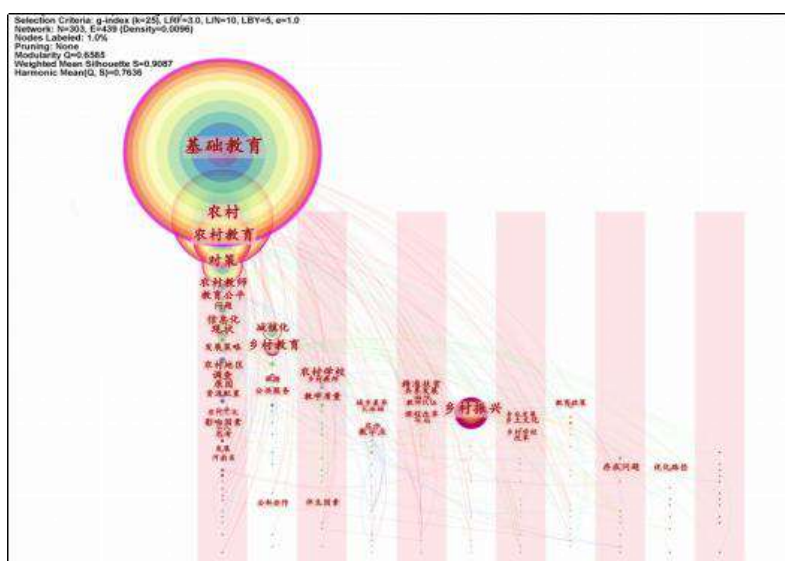


图 2 关键词时间线图

(二) 关键词共现图谱

关键词共现图谱能够展现出农村基础教育领域的热点、关键词以及它们之间的关系，图中的每个节点的连接表示两个关键词共同在文档集中出现的频次，能反映某研究主题的热点，从而能高度凝练地概括文献的主题。通过关键词共现的可视化知识图谱，观察文献集中词汇对或名词短语共同出现的情况，我们可以直观地看到一组文献中各主题词之间的关系紧密程度。如表 1，“基础教育”“农村”“乡村振兴”“农村教育”出现频次较高，其次是“信息化”“城镇化”“农村教师”“农村学校”“对策”等。本研究对于各关键词凸显的顺序进行了分析，国家对于农村教育的政策的改变会引起教育研究热点的改变，不同时期有着不同的热点关键词。结合图 1，2014-2024 年农村基础教育研究的发展阶段分为以下三个阶段：

1. 农村基础教育初步建设阶段。2014-2015 年初步建设阶段，此阶段的突现关键词有“农村”“问题”“教育改革”“调查”“现状”“价值取向”“发展策略”，中央在 2013-2015 年“一号文件”中提到改善农村义务教育薄弱学校基本办学条件，增加农村教师补助，办好村小学和教学点，所以在 2014-2015 年期间农村基础教育有许多的问题和困难亟待学者和机构研究以及解决，此阶段研究侧重于农村基础教育的基本问题识别、现状调研及改革方向探讨，因此，涌现了许多的学术成果。

2. 农村基础教育标准化建设阶段。2016-2017 年标准化建设阶段，此阶段的突现关键词有“教育资源”“大班额”“教育公平”“精准扶贫”“教师队伍”，在上一阶段农村基础教育已经完成了初步的改善，需要进行进一步的建设。中央提出标准化建设校舍，优先发展农村教师队伍师资，因地制宜保留农村学校，因此在 2016 及 2017 两年的文献中学者们更关注教育资源的分配，致力于教育公平和精准扶贫，使得城乡教育差距减小，让更多人能够留在农村，发展农村。“教育资源”“大班额”“教育公平”成为焦点，反映对资源分配不均和班级规模问题的关注。所以，我们如何去运用这些资源以及如何去分配这些资源进行农村基础教育数字化的建设，是个值得探讨的问题。

3. 农村基础教育高质量发展阶段。2018-2024 年高质量发展阶段，此阶段的突现关键词有“专业发展”“改革”“人工智能”“乡村振兴”“乡村教育”“实践路径”“存在问题”，在 2018-2024 年中国家也陆续颁布了许多有关乡村振兴、乡村教育的政策与文件，“十四五”规划中提出“加快数字化发展，建设数字中国，优先发展农业农村，全面推进乡村振兴”。无独有偶，2018 年在《乡村振兴战略规划（2018—2022 年）》中也明确强调“把农村教育事业摆在优先发展的战略地位”^[3]。专家与学者们更加关注农村基础教育的改革，将现代信息化技术与资源融合农村基础教育，依托信息化技术解决农村基础教育现存的问题，并探索农村基础教育数字化转型的实践路径。如表 1 所示，目前农村基础教育信息化的研究较少，信息化是数字化的基础，实现数字中国，农村基础教育数字化还存在着许多的困难与问题。

表 1 关键词频率图

关键词	频次	关键词	频次
基础教育	133	问题	9
农村	69	现状	8
农村教育	39	精准扶贫	8
对策	27	农村学校	7
乡村振兴	22	教育资源	6
城镇化	13	发展策略	5
农村教师	12	教育改革	5
信息化	11	农村小学	5
教育公平	10	共享发展	4
乡村教育	10	农村地区	4

(三) 聚类图谱分析

使用 Citespace 对近十年农村基础教育的关键词进行聚类分析，根据 LLR 聚类原理，联系越紧密的关键词会被聚合成一个类团，将 K 值设为 8，得到了如图 3 呈现出的 8 个聚类，包括：“0 农村”“1 乡村振兴”“2 对策”“3 城镇化”“4 农村教育”“5 教育公平”“6 农村教师”“7 发展策略”。将图 3 的聚类关键词进一步的归纳，可以分为两大类，一类是农村基础教育的问题，一类是农村基础教育的对策。

农村基础教育的问题包括五个聚类：“#0 农村”“#1 乡村振兴”“#3 城镇化”“#4 农村教育”“#5 教育公平”。对于当前的农村基础教育发展来说，依托乡村振兴的政策是重中之重，无论在关键词共现图谱中还是在聚类图谱中，乡村振兴都占据着重要的位置。而我国教育政策的基本价值诉求一直是教育公平，遵循的是从起点到过程再到结果，全过程公平的价值递进逻辑^[4]。教育公平与城镇化息息相关，正是因为农村居民的教育观念中还存在着城市与农村基础教育有着巨大差距的观念，于是无论是教师、学生、家长都存在一种“向城性”心理，农村学生和人口的流失导致农村基础教育“量多质弱”与城镇教育“量少质高”的问题。

农村基础教育的对策包括三个聚类：“2 对策”“6 农村教师”“7 发展策略”。聚类表明研究者们也在思考从什么角度进行破局，这些热点关键词都体现了研究者们对于农村基础教育的问题与现状的高度重视。为探索城乡基础教育发展对策，涌现诸多关于城乡教育的观点与理念，例如：周晔等学者基于统筹治理理论提出的城乡教育统筹

治理理念^[5]，杨挺等学者依据不同阶段的治理理念提出“向农村倾斜”的城乡教育治理观^[6]、庞丽娟基于党的十九大理念提出的城乡义务教育一体化发展观^[7]，以及孙德超等研究者重构乡村振兴理念，提出了城乡教育资源共生新理念^[8]等。除了关注城镇、城乡之外，农村教师也是教育政策关注的焦点，农村教师的发展是农村基础教育发展的必由之路，国家推出的“优师计划”“银龄计划”“农村义务教育阶段学校教师特设岗位计划”等，引进优质教师建设农村基础教育，优化农村教师队伍。

农村基础教育数字化是解决农村基础教育问题，推动问题对策实现的重要抓手，面对目前农村基础教育出现的问题，如乡村振兴、农村基础教育城镇化、教育公平等问题，教育数字化能够借助技术的优势消弭城乡之间的教育差距，为农村精神文化提供新的方向和新的思路，以农村基础教育数字化培养人才、留住人才。从而实现乡村振兴，促进城乡教育协调发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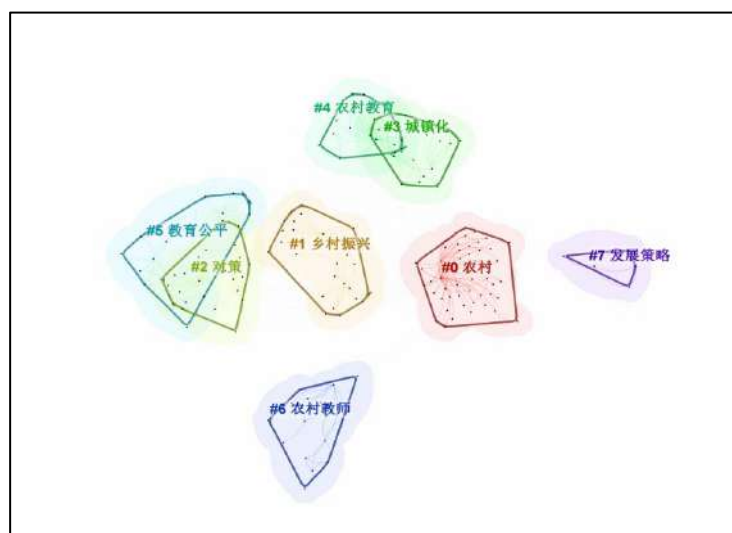


图3 农村基础教育聚类图谱

三、农村基础教育数字化转型的困境

（一）农村基础教育数字化理论研究较少

国家在2012年颁布《教育信息化十年规划（2011—2020年）》实现了“三通两平台”、“五大进展”等重大成果，2018年颁布《教育信息化2.0计划》持续推进信息技术与教育领域的融合，两项政策在教育信息化方面实现了前所未有的进展。2022年党的二十大提出推动“推进教育数字化，建设全民终身学习的学习型社会、学习型大国”，农村基础教育数字化对于农村基础教育进行数据赋能，教育数字化相比信息化拥有更高级的要求，不仅仅是信息技术与教育领域的结合，而是更注重“数据化”，也就是通过对教育过程产生的信息的处理与应用，从而创造出更大的价值，因此数字化是比信息化更高级的阶段^[9]。所以，在农村基础教育数字化建设阶段，需要技术、组织、社会化三个要素的整合发展，做到全要素发展必须在体制、政策两方面全面的改革与创新。在表1关键词频次和图4关键词时间线图谱中能够体现出农村基础教育信息化的发展脉络，“信息化”在时间线图谱中出现的时间在2014年，在近十年中只出现了11次，与农村基础教育的联系并不强，农村基础教育数字化的关键词近十年出现0次，说明我国农村基础教育的学者和研究者在2014年相关农村基础教育信息化的政策推出后，理论研究会有一段时间的上升期，但是随着时间推移，理论研究就日渐减少了。农村基础教育数字化是实现数字中国的必由之路，在探索 and 实现符合中国国情的教育数字化道路上，农村基础教育是我国教育不可或缺的一部分，因此，农村基础教育数字化领域需学者与研究者的关注和研究。

（二）农村基础教育城镇化导致资源剩余

在2014-2024年农村基础教育的研究中，苏红键统计了2014与2019年城区、镇区、乡村教育数据，对比发现小学班均学生数表现出城镇学生数显著的多于乡村学生数，2019年城区班均学生数44.69人，县镇41.74人，乡村26.84人，城市与县镇区班均学生数都比乡村多了10人以上。生均教学用计算机方面，2014年与2019年相比，城区和镇区中小学的比例下降，乡村生均教学用计算机的比例不变^[10]。这表明乡村中小学中计算机等配套设施逐渐赶上城镇，但城市与镇区的生均教学用计算机比例却在降低，此比例与农村基础教育城镇化相关，流向城镇的学生多了，导致可用资源紧张。农村中小学校的的学生变少，自然可用的资源会有剩余，生均资源比例上涨。农村基础教育城镇化的问题会导致农村的人口变少，乡村的发展失去了内生动力，然而国家又对于农村基础教育资源倾斜，导致农村基础教育学校资源剩余率增加。

（三）农村教师队伍数字素养有待提高

观察图2关键词时间线图谱,从2014年“农村教师”到2015年“乡村教师”再到2017年“教师队伍”,农村教师一直是农村基础教育持续关注的焦点,教师的数字素养和能力直接影响着农村基础教育的质量和水平。究其原因,一是教师的数字化技能学习意愿缺乏,农村地区缺乏具备数字技术学习意愿的教师,普遍存在教师老龄化、知识结构相对陈旧、习惯于传统教育方式等问题,这使得教师在教育教学方面缺乏创新和活力,农村基础教育数字化发展缺乏内在动力。二是文化原因,大众始终存在着“农村教育不如城市教育”的观念,即使国家为鼓励年轻优秀的教师到农村支教颁布了许多的教育政策,但是由于农村相比起城市,农村的医疗卫生、文化娱乐等公共服务相对缺乏,农村教师容易出现向往城市生活的心理,“向城性”心理与农村的工作形成一种割裂感,从而产生教师职业倦怠。在政策之外,有多少教师愿意扎根农村,在农村长期生活学习,这也是个需要探讨的问题。

四、农村基础教育数字化的实现路径

(一) 深化教育全方位改革,推动农村基础教育数字化理论发展

1.政策改革。农村基础教育数字化研究与国家政策的推出息息相关,通过研究图4关键词时间线图谱,可以了解到农村基础教育研究关键词频次总是在政策的提出之后而上涨,随着时间推移渐渐回落。因此,国家需要在政策上给予农村基础教育数字化支持,在社会化层面,优化城乡资源配置,增强省-市-县三级政府的联系与沟通,实现教育信息的互通有无;对于研究农村基础教育数字化的机构以及研究者给予经费支持,推动农村基础教育数字化在理论领域的发展;鼓励企业及教师机构开发和推广大数据、学习管理系统等数字化工具。在组织层面,在学校领导者中确认一名或几名农村基础教育数字化带头人,以点带面,将农村学校带上教育数字化的轨道;保证经费投入数字化基础设施的建设当中,在管理、教学、课程等多方面应用数字化工具。在技术层面,加强对于农村教师队伍的数字化素养培训,加强教师运用数字化工具进行教育教学、教育研究、学生管理的能力,鼓励教师以及技术团队对于数字化教育资源的开发与应用,保证每所学校都配备有技术支持团队或技术支持人员,定期对于硬件与软件的维修及更新。

2.体制改革。目前农村教育数字化转型迫切需要打破深层次体制机制存在的桎梏,对于体制机制进行进一步的改革创新,紧抓农村基础教育数字化转型的关键抓手,从而在乡村振兴战略背景下全方位保障农村基础教育数字化转型。首先是经费保障,经费保障是乡村振兴的经济基础,是农村教育数字化转型的关键。落实省级政府和县级政府权责机制,加入教育投入绩效评估和考核,监督每一级政府和机构是否将资源准确投入在农村基础教育当中,解决县城与农村之间经费分配不均的问题。其次,建立人才双向流动机制,改变农村教师向城市单向流动的现状,增大资本、技术、人才等资源向农村流动,为农村教育数字化转型注入活力。最后,加强农村现代化基础设施建设,良好的现代化基础设施是教师和人才留在乡村的关键。目前农村现代化基础设施的建设缺乏对人才的吸引力,人民更向往拥有更加现代化的、数字化的城镇流动,所以,一定要持续加大农村现代化基础设施的建设,发挥农村现代化基础设施建设在乡村振兴中的战略支撑作用。

(二) 加强数字化基础设施建设,提高资源利用率

依托教育数字化发展的政策和措施,加强数字化教育基础设施的建设,包括校园网络、多媒体教室、计算机房等设施,提高农村基础教育的信息化水平,为农村基础教育数字化提供强有力的保障和支持。针对农村基础教育的需求,开发适合的数字化教育资源,包括数字化教材、在线课程、多媒体课件等,丰富农村基础教育的教学内容。加强农村教师的数字化素养培训,提高他们的信息化教学能力和技能水平,推动数字化设施和资源在农村基础教育中的利用和推广。

农村社会有着“地广人稀”的特点,传统农村学校满足不了多元化增长的人的需求,因此,可以通过“专递课堂”“国家智慧教育公共服务平台”等数字化平台,建立数字化教育管理与评价机制,对数字化教育的实施效果进行评估和管理,及时发现问题并采取措施进行改进,实现农村学校教育管理与评价“数据化”,发挥资源利用最大化。建立农村基础教育多功能中心,利用“专递课堂”配合农村教师教学进度,开展城乡教育帮扶等方式解决教育差异问题,促进教育公平和均衡发展。国家智慧教育公共服务平台为农村基础教育多功能中心提供了广泛丰富的教育资源,除了传统的学科教育,平台还开设了美育、德育、家庭教育等促进学生全面发展的课程,既满足了教师的教研需求,又满足了学生的素质文化学习的需求。农村基础教育多功能中心不仅能够有效发挥设施的利用率,满足农村人民日益增长的精神文化需求,还能够为农村基础教育数字化转型添砖加瓦。

(三) 推进数字赋能农村教师队伍,以教育增强农村人力资本

人力资本是经济学理论中的一个概念,指的是依附人体体力和智力所具有的劳动价值的总和^[11]。人力资本能够提高人口质量,教育能够直接的促进人力资本不断积累,也能够间接的对于人力资本发挥作用。农村教师队伍培养是乡村教育振兴的重要途径,国家持续提出加大农村教师队伍培养力度,以教育增强农村人力资本从而推进乡村社会全面振兴。“强师计划”明确指出,培养1万名本科层次师范生,实施“两免一补”政策,毕业后去到定向县履约就业不少于6年,推动师资优质平衡^[12]。“强师计划”的推出,极大提高了农村教师师资水平,为教育增强人力资本打下了良好的基础,造就更多的农村人才。优秀的新晋老师对于教育数字化转型有较高的接受度,能够通过网络研修、“国培计划”“区培计划”等项目,利用现代教育技术建设数字教师队伍培养体系,培养扎根农村的乡土人才,从而实现农村人力资本的增强。

参考文献:

- [1] 新华社.《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 2035 年远景目标纲要》[EB/OL].https://www.gov.cn/xinwen/2021-03/13/content_5592681.htm,2021-03-13.
- [2] 顾明远.教育大词典(第一卷)[M].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1990.
- [3] 国务院.乡村振兴战略规划(2018—2022 年)[Z].2018
- [4] 周均旭,刘子俊.走向高质量发展:二十一世纪我国农村基础教育政策注意力的演进逻辑[J].当代教育论坛,2021,(03):1-11.
- [5] 周晔,王晓燕.城乡教育统筹治理:概念与理论架构[J].教育研究,2014,35(08):31-39.
- [6] 杨挺,李伟.城乡义务教育治理 40 年[J].教育研究,2018,39(12):71-80.
- [7] 庞丽娟.统筹推进城乡义务教育一体化发展[J].教育研究,2020,41(05):16-19.
- [8] 孙德超,李扬.试析乡村教育振兴——基于城乡教育资源共生的理论考察[J].教育研究,2020,41(12):57-66.
- [9] 祝智庭,胡姣.教育数字化转型的本质探析与研究展望_祝智庭[J].中国电化教育,2022,(04):1-8,25.
- [10] 苏红键.教育城镇化演进与城乡义务教育公平之路_苏红键[J].教育研究,2021,42(10):35-44.
- [11] 杜育红,杨小敏.乡村振兴:作为战略支撑的乡村教育及其发展路径[J].华南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8,(02):76-81+192.
- [12] 教育部等八部门.教育部等八部门关于印发《新时代基础教育强师计划》的通知[EB/OL].http://www.moe.gov.cn/srcsite/A10/s7034/202204/t20220413_616644.html,2022-04-11.

The Dilemma and Path Exploration of Rural Basic Education Digitalization

-Visualization analysis of literature based on Citespace

Shan yimeng¹, Wu songqiao²

¹ Guangxi City Vocational University, Chongzuo, Guangxi 532200, China

² Nanning Normal University, Nanning, Guangxi 530000, China

Abstract: Rural basic education is the cornerstone of rural development and rural revitalization. It is of great significance for the development of rural education theory and practice to sort out the research on rural basic education in the past ten years (2014-2024). This paper takes HowNet as the source of data analysis, takes rural basic education as the key word to search, and uses Citespace for visual analysis. The study found that: Firstly, at the theoretical level, there are few studies on the digitization of rural basic education, which urgently needs researchers' attention in this field. Secondly, on the practical level, by exploring the research trends and hotspots of rural basic education in the past ten years, it is found that rural education resources are wasted and teachers' quality needs to be improved. Therefore, rural basic education can deepen the reform of the system and promote the development of digital theory of rural basic education; strengthen the construction of digital infrastructure, improve resource utilization; promoting digital empowerment of rural teachers and enhancing rural human capital through education are three aspects to deal with the dilemma of digital transformation of rural basic education.

Keywords: Rural basic education; digital education; citespace; visual analysis; path

数字化时代英语教学的创新路径与实践研究

罗纬地¹

(1.西北师范大学外国语学院, 甘肃 兰州 730030)

摘 要:在数字化技术飞速发展的背景下, 英语教学正经历着从传统模式向智能化、个性化模式的转型。本文以数字化工具在英语教学中的应用为核心, 通过文献研究法和案例分析法, 系统探讨了数字化时代英语教学的创新路径。研究发现, 在线学习平台、移动学习 APP、人工智能辅助工具等数字化资源能够有效提升学生的学习兴趣 and 参与度, 但在实践过程中仍存在数字鸿沟、教学资源整合不足、教师数字素养有待提升等问题。基于此, 本文提出了优化数字化教学资源配置、构建混合式教学模式、加强教师数字技能培训等实践策略, 旨在为推动英语教学的数字化改革提供理论参考和实践指导。

关键词: 英语教学; 数字化; 教学创新; 混合式教学; 教师素养

DOI: doi.org/10.70693/rwsk.v1i8.1268

一、引言

随着信息技术的不断发展, 数字化已经成为教育领域改革的重要趋势。英语作为全球通用语言, 其教学模式的创新对于培养具有跨文化沟通能力的人才具有重要意义(魏美华, 2024)。传统英语教学以课堂讲授、课本学习为主, 存在教学方法单一、学生参与度低、个性化教学不足等问题。而数字化技术的引入为解决这些问题提供了新的可能, 在线课程、虚拟仿真、智能测评等数字化教学手段逐渐走进英语课堂, 推动着英语教学理念和实践的变革。理论意义上, 本文通过梳理数字化技术在英语教学中的应用现状和理论基础, 能够丰富英语教学理论体系, 为后续相关研究提供理论支撑。实践意义上, 本文提出的数字化英语教学创新路径和实践策略, 能够为英语教师提供具体的教学参考, 帮助学校和教育机构更好地推进英语教学的数字化改革, 提升英语教学质量和学生的英语综合应用能力。本文主要采用以下三种研究方法: 一是文献研究法, 通过查阅国内外关于数字化教学、英语教学创新等方面的文献资料, 了解研究现状和前沿动态, 为本文的研究奠定理论基础; 二是案例分析法, 选取国内几所不同层次学校的数字化英语实践教学案例进行分析, 总结其成功经验和存在的问题。

二、数字化时代英语教学的理论基础

(一) 建构主义学习理论

建构主义学习理论强调学习是学习者主动建构知识意义的过程, 学习者不是被动地接受知识, 而是在一定的情境中, 通过与他人的互动和协作, 自主构建知识体系。数字化教学环境为建构主义学习理论的实施提供了有利条件, 在线学习平台、虚拟学习社区等数字化工具能够创设丰富的学习情境, 促进学习者之间的交流与合作, 使学生在主动探索和实践获取知识和技能。

(二) 联通主义学习理论

联通主义学习理论认为, 学习是一个连接专门节点和信息源的过程, 强调学习的网络化、社会化和动态性。在数字化时代, 知识以网络的形式存在, 学习者通过各种数字化工具与他人、与信息源建立连接, 实现知识的共享和流通。英语教学中, 学生可以通过在线论坛、社交媒体等平台与其他学习者、教师进行交流, 获取海量的英语学习资源, 拓展学习视野, 提高学习效率。

(三) 个性化学习理论

个性化学习理论主张根据学习者的个体差异, 为其提供适合的学习内容、学习方法和学习进度。数字化技术能够通过数据分析和智能算法, 精准把握学生的学习特点和需求, 为学生推送个性化的学习资源和学习建议。例如, 智能英语学习 APP 可以根据学生的词汇量、语法掌握情况等, 为学生制定个性化的学习计划, 提供针对性的练习题目, 实现因材施教。

三、数字化工具在英语教学中的应用现状

在线学习平台是数字化英语教学的重要载体,如慕课(MOOC)、微课平台等,为学生提供了丰富的英语课程资源。学生可以根据自己的兴趣和需求选择课程,随时随地进行学习。许多高校和教育机构都建立了自己的在线英语学习平台,开设了听力、口语、阅读、写作等各类课程,涵盖了不同的英语水平层次。例如,中国大学 MOOC 平台上有多门优质的英语课程,吸引了大量学生参与学习。在线学习平台还具有互动功能,学生可以通过论坛、留言板等与教师和同学进行交流,解决学习中遇到的问题(孙颖, 2024)。随着智能手机和平板电脑的普及,移动学习 APP 成为学生英语学习的重要工具。这类 APP 具有便携性、即时性等特点,能够让学生充分利用碎片化时间进行学习。常见的英语学习 APP 包括词汇类 APP (如百词斩、扇贝单词)、听力类 APP (如每日英语听力、BBC 英语听力)、口语类 APP (如英语趣配音、流利说英语) 等。这些 APP 通过游戏化、情境化的设计,提高了学生的学习兴趣。例如,词汇类 APP 采用图文结合、例句讲解、单词测试等多种方式帮助学生记忆单词;口语类 APP 通过提供标准发音、实时测评等功能,帮助学生提高口语表达能力。人工智能技术在英语教学中的应用逐渐深入,智能测评系统、智能辅导机器人等人工智能辅助工具为英语教学提供了新的支持。智能测评系统能够对学生的英语听力、阅读、写作等能力进行自动测评,及时反馈学生的学习成果和存在的问题,为教师的教学提供参考。智能辅导机器人可以与学生进行实时对话,解答学生的英语问题,提供个性化的学习指导。例如,一些智能英语学习平台中的机器人教师能够根据学生的提问,进行语法讲解、词汇辨析等,帮助学生解决学习中的疑惑。

四、数字化时代英语教学的优势

数字化教学手段具有丰富的多媒体形式,如图片、音频、视频、动画等,能够创设生动形象的学习情境,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与传统的课本和黑板相比,数字化资源更具吸引力,能够让学生在轻松愉悦的氛围中学习英语。同时,数字化教学中的互动环节,如在线讨论、小组合作、游戏化学习等,能够提高学生的学习参与度,使学生从被动接受知识转变为主动参与学习过程(刘珊、田蕴萌, 2024)。数字化技术能够根据学生的学习数据,如学习进度、学习成绩、学习偏好等,为学生提供个性化的学习方案。教师可以通过在线学习平台了解学生的学习情况,针对不同学生的特点进行分层教学和个别辅导。学生也可以根据自己的需求和节奏安排学习,自主选择学习内容和学习方式,提高学习的效率和效果。例如,对于英语基础较差的学生,教师可以为其推送基础词汇和语法的学习资源;对于英语水平较高的学生,可以为其提供更具挑战性的阅读材料和口语练习题目。数字化时代,英语学习资源不再局限于课本和课堂,学生可以通过互联网获取海量的英语学习资源,如英语电影、电视剧、新闻报道、学术论文等(吴清芳, 2023)。这些资源涵盖了不同的领域和主题,能够满足学生多样化的学习需求。同时,数字化教学打破了时间和空间的限制,学生可以在家中、图书馆、公园等任何有网络的地方进行学习,实现了随时随地学习英语的目标。

五、数字化时代英语教学存在的问题

尽管数字化技术在教育领域得到了广泛应用,但数字鸿沟问题仍然制约着数字化英语教学的普及和发展。数字鸿沟主要体现在硬件设备、网络条件和数字素养等方面。一些经济欠发达地区的学校和家庭缺乏必要的计算机、平板电脑和网络设备,学生无法正常参与数字化学习。即使在有设备和网络的地区,不同学生之间的数字素养也存在差异,部分学生由于缺乏数字技能,无法有效利用数字化学习资源。目前,市场上的英语数字化教学资源数量众多,但质量参差不齐,且缺乏有效的整合。不同的在线学习平台、移动学习 APP 之间存在资源重复、标准不一等问题,给学生和教师的选择带来了困难。同时,学校和教师在使用数字化教学资源时,往往缺乏系统性的规划和整合,导致资源利用率不高。例如,一些教师只是将数字化资源简单地叠加到传统教学中,没有充分发挥数字化资源的优势。

教师是数字化英语教学的实施者,其数字素养直接影响着数字化教学的效果。然而,目前部分英语教师的数字素养有待提升,他们对数字化教学工具的掌握不够熟练,缺乏将数字化技术与英语教学深度融合的能力。在教学过程中,一些教师仍然采用传统的教学方法,没有充分利用数字化资源的优势,导致数字化教学流于形式。

六、数字化时代英语教学的优化策略

政府和教育部门应加大对教育信息化的投入,改善经济欠发达地区的硬件设备和网络条件,缩小数字鸿沟。同时,要加强对数字化教学资源的管理,建立统一的资源标准和共享平台,整合优质的英语教学资源,提高资源的利用率。学校和教师应根据教学需求,筛选和整合适合的数字化资源,为学生提供优质、高效的学习内容。例如,学校可以与优质的在线教育机构合作,引入其优质的英语课程资源;教师可以根据教学目标和学生特点,对数字化资源进行二次开发和整合,形成具有特色的教学资源。混合式教学模式是将传统课堂教学与数字化教学相结合的一种教学模式,能够充分发挥两者的优势(吴一帆, 2024)。在英语教学中,教师可以将基础知识的讲解、词汇的记忆等内容放在在线学习平台上,让学生自主学习;在课堂上,教师可以组织学生进行互动讨论、口语练习、小组合作等活动,加深学生对知识的理解和应用(黄丹玲, 2025)。通过混合式教学模式,能够提高学生的学习主动性和参与度,实现个性化教学和集体教学的有机结合。例如,教师可以在课前通过在线平台布置预习任务,让学生观看教学视频、完成练习题;在课堂上,针对学生预习中存在的问题进行重点讲解和答疑,组织学生进行口语交流和角色扮演等活动;课后通过在线平台布置作业和拓展学习资源,让学生巩固所学知识。学校和教育机构应加强对英语教师的数字技能培训,提高教师的数字素养和教学能力。培训内容应包括数字化教学

工具的使用、数字化教学资源开发与整合、数字化教学策略的设计等方面。同时,要建立教师数字技能评价机制,激励教师不断提升自己的数字技能。教师自身也应积极主动地学习数字化技术,探索数字化技术与英语教学融合的方法和途径,将数字化技术真正应用到教学实践中。例如,学校可以定期组织教师参加数字化教学培训课程和研讨会,邀请专家进行指导和交流;教师可以利用业余时间自学数字化教学工具的使用方法,参与在线教学社群,与其他教师分享教学经验和心得。

七、结论与展望

本文通过对数字化时代英语教学的创新路径与实践进行研究,得出以下结论:数字化技术为英语教学带来了新的机遇,在线学习平台、移动学习 APP、人工智能辅助工具等数字化资源能够有效提升学生的学习兴趣与参与度,实现个性化教学,拓展学习资源和空间,提高教学效率和质量。但在实践过程中,数字化英语教学仍面临着数字鸿沟、教学资源整合不足、教师数字素养有待提升、过度依赖技术忽视人文关怀等问题。针对这些问题,本文提出了优化数字化教学资源配置、构建混合式教学模式、加强教师数字技能培训、注重教学中的人文关怀、建立完善的教学评价体系等优化策略。随着数字化技术的不断发展,英语教学的数字化改革将不断深入。未来的研究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展开:一是进一步探索人工智能、大数据等新兴技术在英语教学中的应用,如智能教学机器人、个性化学习推荐系统等;二是加强对数字化英语教学效果的长期跟踪研究,分析数字化教学对学生英语综合应用能力和终身学习能力的影响;三是关注不同地区、不同层次学校数字化英语教学的均衡发展,提出更具针对性的政策建议和实践策略。相信在各方的共同努力下,数字化时代的英语教学将不断创新和发展,为培养更多具有国际视野和跨文化沟通能力的人才做出更大的贡献。

参考文献:

- [1]魏美华.基于核心素养的初中英语阅读教学实践研究[J].中学课程资源,2024,20(08):21-24.
- [2]孙颖.文旅融合背景下高校英语教学数智化转型路径探索[N].中国旅游报,2024-07-15(004).DOI:10.28109/n.cnki.nclyb.2024.001343.
- [3]吴清芳.“教学评一体化”教学理念在高中英语阅读课教学中的实践[J].高考,2023,(32):84-86.
- [4]吴一帆.新媒体在推动英语语言学课程改革中的应用[J].中学生英语,2024,(28):85-86.
- [5]刘珊,田蕴萌.中小学美育数字化路径探讨[J].上海服饰,2024,(12):76-78.
- [6]黄丹玲.数字技术赋能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教育的研究[J].作家天地,2025,(18):28-30.

Research on Innovative Paths and Practical Studies of English Teaching in the Digital Era

Luo Weidi¹

¹*School of Foreign Languages, Northwest Normal University, Lanzhou, Gansu 730030, China*

Abstract: Against the backdrop of the rapid development of digital technologies, English teaching is undergoing a transformation from traditional models to intelligent and personalized ones. Focusing on the application of digital tools in English teaching, this paper systematically explores the innovative paths of English teaching in the digital era through literature research and case study methods. The study finds that digital resources such as online learning platforms, mobile learning apps, and artificial intelligence-assisted tools can effectively enhance students' learning interest and participation. However, in practice, there are still problems such as the digital divide, insufficient integration of teaching resources, and the need to improve teachers' digital literacy. Based on these findings, this paper proposes practical strategies including optimizing the allocation of digital teaching resources, constructing blended teaching models, and strengthening teachers' digital skills training, aiming to provide theoretical reference and practical guidance for promoting the digital reform of English teaching.

Keywords: English teaching; digitalization; teaching innovation; blended teaching; teacher literacy

4-5 岁儿童同伴冲突言语运用及指导策略研究

杨晓岚¹ 刘菲²

(1.常州工学院师范学院,江苏 常州 213000; 2.南京市栖霞区龙潭幼儿园龙岸分园, 江苏 南京 210046)

摘要:同伴冲突中儿童的言语运用水平与其语言能力的发展紧密相关,儿童的语言运用能力直接影响他们在多大程度上顺利解决同伴冲突,同时,儿童与同伴的冲突又为他们语言能力的锻炼和提升带来了良好的契机。研究选取C市Y幼儿园某中班35名4-5岁儿童为观察对象,运用非参与式观察方法,记录该班儿童在室内游戏区域自主游戏活动中的同伴冲突事件,筛选60段同伴冲突语料,运用国际通用儿童语言分析系统CHILDES,从儿童同伴冲突的原因、冲突表现形式、冲突言语倾向、冲突言语行动四个维度进行编码分析。研究发现:资源争抢是引发儿童同伴冲突的主要原因,肢体冲突更容易引发儿童非言语型回应行为,儿童以自我为中心的言语倾向不能有效解决同伴冲突,儿童解决同伴冲突的言语行动策略运用不恰当,以及教师对中班幼儿同伴冲突的认识不全面且缺乏有效的引导。针对上述结果建议可从创设良好的游戏环境、聚焦语言运用能力、更新家长教育理念入手,助力儿童综合语言运用能力提升。

关键词:同伴冲突; 语言运用能力; CHILDES; 言语倾向; 言语行动

基金项目: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青年基金项目)“基于追踪语料库的4-6岁汉语儿童游戏互动语言研究”(编号:21YJC740073);常州工学院校级教学改革专项研究课题基于江苏省一流课程开展“课程思政”建设的内涵研究及实践(编号:30120300100-23-yb-jgkt34)

DOI: doi.org/10.70693/rwsk.v1i8.1322

一、问题提出

同伴互动是儿童早期口头语言交流与运用核心经验获得的重要过程。以往研究表明,儿童的语言交际能力能够在同伴互动中得到促进和发展,且具有明显的同伴效应,同伴互动语言的质量能够预测其未来的学业成就。^[1]

同伴冲突是儿童与同伴交往过程中的常见现象。最早的对儿童同伴冲突的研究始于上世纪30年代(H.C.Dawe, 1934),直到60年代相关学者才关注到同伴冲突对儿童社会性发展的重要作用,^[2]一致认为冲突是同伴互动效果的关键,4-6岁幼儿的“社会认知冲突”为幼儿的“心理建构”提供了契机,儿童认知发展前运算阶段的“自我中心”特点使得他们在同伴冲突中很难为对方考虑,但正是同伴冲突的发生为儿童提供了与他人沟通、交流的机会,使他们有机会通过协商、合作找到解决问题的方法。^[3]随着儿童年龄的增长与生活经验的丰富,他们逐渐以口语代替肢体冲突。^[4]然而,以往研究更多关注的是同伴冲突产生的原因,及其对儿童同伴关系及其他社会性发展方面带来的影响,实际上同伴冲突中儿童的言语运用水平与其语言能力的发展紧密相关,一方面,儿童的语言运用能力直接影响他们在多大程度上能够顺利解决同伴冲突,另一方面,儿童与同伴之间的冲突又为他们语言能力的锻炼和提升带来了良好的契机。成人作为成熟的会话者在与儿童互动中能够更加快速和准确地明白儿童的意图,并运用恰当的语言策略有效避免了诸多交流的障碍,但作为与儿童具有相同认知水平的同伴却不能做到这一点,儿童不得不需要调用多种语用经验,通过反复修补、解释化解矛盾,同伴会话中表现出的“消极”的现象会促使儿童“积极”的交流行为,一方面会话中的误解和中断能够激发儿童会话修补行为的出现,而另一方面否定性的言语行为能够引发儿童更加丰富的讨论内容。^[5]因此,同伴冲突过程对儿童的语言发展具有亲子和师幼互动不可替代的

作者简介:杨晓岚(1983—),女,博士,研究方向为学前儿童语言发展与教育;

刘菲(1997—),女,学士,研究方向为学前教育。

通讯作者:杨晓岚

特殊价值。部分学者指出,当儿童与同伴观点对立时彼此产生言语上的碰撞与争锋,为幼儿运用语言提供了绝佳的机会。^[6]然而,遗憾的是以往研究中对于儿童同伴冲突过程中言语运用的研究相对较少,大多只是在关注同伴冲突行为过程中提及其语言的运用,^[7]少数针对同伴冲突语言的研究也仅从互动言语运用的性质和功能上进行了分析,^[8-9]对于儿童同伴冲突中语言运用的具体言语行为特征尚未进行深入分析。

4-5岁是儿童社会交往和语言能力发展的重要转折阶段。在同伴冲突中,3-4岁幼儿更多依靠动作或依赖于教师的调节来解决冲突问题,5-6岁幼儿则已经掌握了一定的交往技巧,并学会通过谦让、协商、解释说理等方式独立面对与解决冲突,而4-5岁阶段随着儿童同伴交往频率和同伴冲突次数的不断增加,^[10]他们与同伴互动中的消极性言语反馈使用数量也明显提升,^[11]更需要在成人的帮助和引导下尝试运用恰当的言语沟通策略去解决同伴冲突。因此,探究中班儿童在同伴冲突中语言运用的特点和规律,有利于教师在充分了解儿童在同伴冲突情境中的语言水平,在此基础上把握引导儿童提升语言运用能力的良好契机,有效介入和引导儿童大胆表达观点,解决冲突,进而提升其语言综合运用能力。

二、研究设计

本研究选取C市Y幼儿园某中班35名4-5岁儿童为观察对象,运用非参与式观察方法,记录该班儿童在室内游戏区域自主游戏活动时的同伴互动行为,采用方便抽样和事件取样法,选取儿童与同伴互动过程中发生冲突的事件,即当一名儿童的某种言语或动作引起另外1-2名儿童的反对后,他们围绕各自不同观点进行的言语或非言语行为互动过程,记作一次同伴冲突事件。研究者借助观察记录表和摄像机设备,完整记录同伴冲突事件的原因、过程和结果,以及冲突过程中儿童的言语行为以及表情和肢体动作。

经筛选后选取60段同伴冲突语料进行编码分析。语料分析的具体步骤为:第一步,将同伴冲突视频转录为文本,并编辑为国际通用儿童语言分析系统CHILDES中适用的CHAT文本格式;第二步,借鉴由哈佛大学编制的“言语行动目录简略版”(Inventory of Communicative Acts-Abridged,简称INCA-A)及我国学者薛媛媛^[12](2014)“同伴冲突原因类型”的研究,对每位儿童的言语互动行为进行编码;第三步,运用“计算机语言分析软件”(CLAN)对语料编码进行运算,再借助SPSS22.0统计软件分析各类编码频次运算结果。

在同伴冲突言语行为量化分析的基础上,通过对该班级教师的半结构化访谈,全面了解教师面对儿童同伴冲突事件的态度、对儿童同伴冲突言语行为的关注与引导策略等,以期辅助解释和验证量化研究结果。

三、研究结果

(一) 儿童同伴冲突的原因类型

借鉴以往研究将儿童同伴冲突的原因分为以下五种类型:资源争抢型、规则维护型、观点对立型、无意碰撞型与故意侵犯型。如下图1所示,儿童与同伴冲突发生的原因主要是资源争抢,约占冲突行为总数的一半,其次是观点对立型冲突,约占20%。与以往研究不同的是,本研究中儿童的规则维护型冲突占比较低,尚不足10%,而以往研究中规则维护型冲突的占比接近20%,且明显超过观点对立型。这与该班儿童在区域游戏中建立的良好规则意识密不可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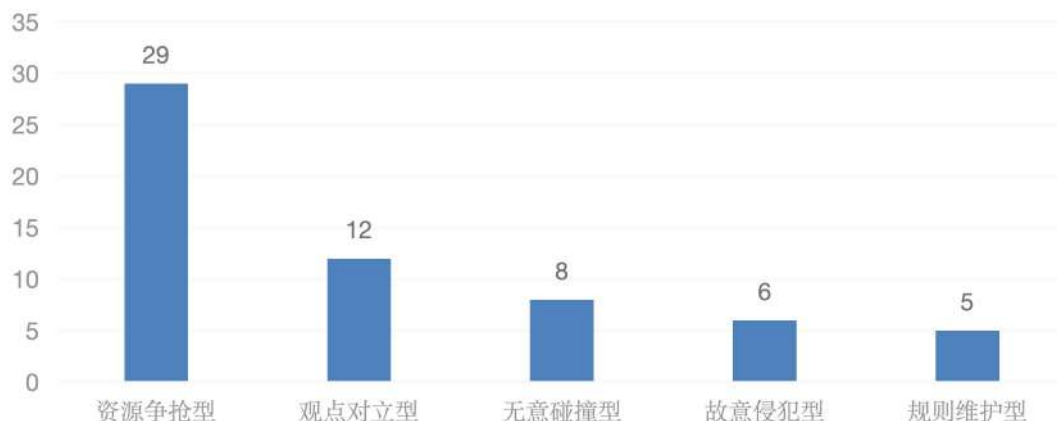


图1 儿童同伴冲突发生的原因类型

(二) 儿童同伴冲突的表现形式类型

儿童与同伴互动的行为不仅包括了说话者之间的言语行为,还包括了伴随言语谈话的非言语行为,因此,

我们将同伴冲突中的言语行为具体划分为：单纯的言语行为、单纯的言语动作行为、以及言语加动作行为三类，以语句为单位对所有儿童同伴冲突行为进行分类和统计，结果如下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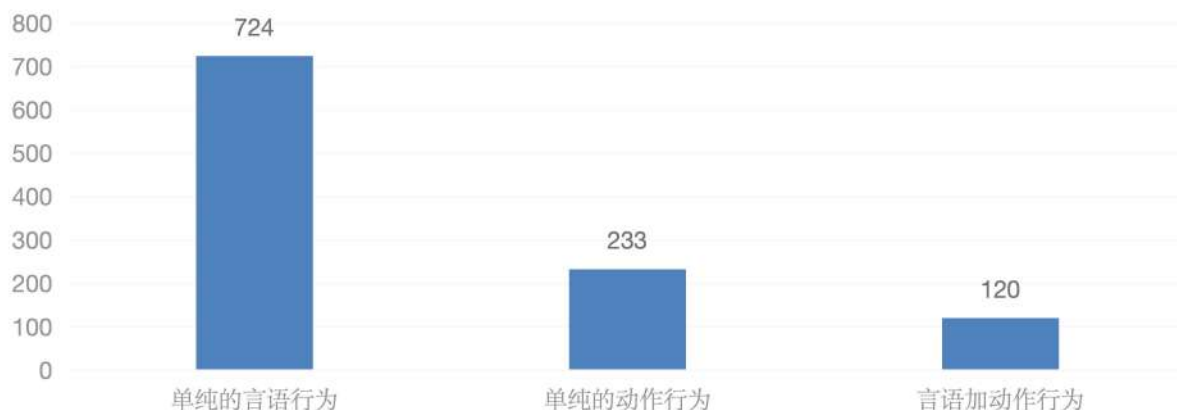


图2 儿童在同伴冲突中的行为表现形式

60段语料中儿童的同伴互动语句行为共1077次，其中单纯的言语行为发生频率为724次，占67.22%；单纯的言语动作行为发生频率为233次，占21.63%；两者兼而有之的言语加动作行为发生频率为120次，占11.14%。可见儿童更倾向于使用单纯的言语行为来应对同伴冲突，即通过言语沟通交流的方式解决同伴冲突。与此同时，单纯的言语动作行为出现频率高于言语加动作的行为，这表明当儿童无法借助语言沟通解决问题或来不及表达相互意见时更倾向于直接“动手”。

（三）儿童同伴冲突的言语倾向类型

交流倾向水平主要考察互动双方共同指向的言语交流意图和言语交际情况。对儿童同伴冲突言语倾向的分析有助于了解儿童在同伴冲突中所表达的意图指向。具体结果如下：

表1 儿童同伴冲突中的主要言语倾向类型

言语倾向类型	DJF	DSS	DFW	DRP	NFW	NIA	DHA	DNP	MRK	DCC	DRE	PRO
发生频率(次)	376	109	102	84	45	41	40	40	3	2	1	1
使用比率(%)	44.55	12.91	12.09	9.95	5.33	4.86	4.74	4.74	0.36	0.24	0.12	0.12

如表1所示，儿童在同伴冲突中使用最多的言语倾向类型是DJF(讨论当前关注的焦点)占44.55%，其次使用较多的言语倾向类型是DSS(讨论说话者的想法和情绪)12.91%、DFW(讨论想象情境的事情)12.09%和DRP(讨论与目前有关的事情)9.95%。上述四类言语倾向都是针对某一问题或事件的讨论，讨论类言语倾向也是其他同伴互动情境中儿童使用频率最高的类型。但与其他情境不同的是，在同伴冲突中儿童使用DSS(讨论说话者的想法和情绪)的比例远超其他同伴互动情境，可见同伴冲突中的言语互动为儿童提供了表达自身想法和情绪的良好契机。接下来依次为NFW(商议想象世界中的活动)5.13%、NIA(商议即刻进行的活动)4.86%、DHA(引导听者对于人和事物的注意)4.74%和DNP(讨论过去或将来发生的事情)4.74%。相比较而言，MRK(标记某一事件的发生)、DCC(讨论对某个词语的表达)、DRE(讨论刚才发生的事件)和PRO(伴随活动发出的声音)这几种言语倾向使用频率相对较低，均不足1%。NFW(商议想象世界中的活动)和NIA(商议即刻进行的活动)这两种言语倾向都属于协商类，DHA(引导听者对于人和事物的注意)属于引导类，这两类言语倾向的有效运用表明4-5岁儿童已经能够在同伴冲突中尝试使用协商与和引导的积极言语策略应对同伴冲突。

（四）儿童同伴冲突的言语行动类型

言语行动水平主要考察说话者表达交流意图的言语形式。对于言语行动类型的分析能够更加具体了解儿童在同伴冲突中的言语表达特点。具体结果如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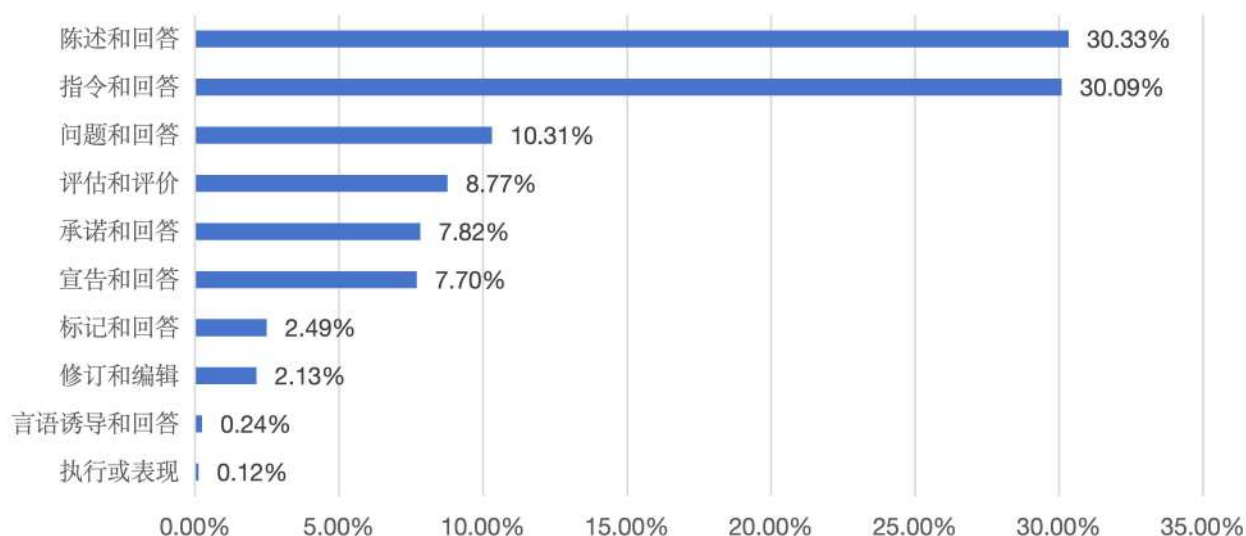


图3 不同言语行动类型所占比例分布图

由图3可知,儿童在同伴冲突中使用最多的言语行动类型是“陈述和回答”与“指令和回答”,这两类言语行动类型使用比例几乎接近所有言语行动类型比例的三分之二,可见儿童绝大多数是采用陈述或命令的方式应对同伴冲突。其次,提问、评价、承诺和宣告的言语行动类型也有一定的使用比例。然而采用标记、修补、诱导和执行相关言语行动的比例相对较低。针对儿童各类具体言语行动的使用情况分析如下:

在“陈述和回答”类言语行动类型中,ST(陈述自己的观点)占比最多,为20.50%,DW(不同意先前说话者表达的提议)占比5.69%,AP(同意先前说话者表达的提议)占比2.49%,WS(表达一个愿望)占比1.66%。上述结果表明儿童在同伴冲突中能够首先选择将自己的观点陈述清楚,借助陈述来理清事情的经过并获知同伴的看法和观点。

在“指令和回答”类言语行动类型中占比最多的是RP(向听者要求、提议、建议某种行动)占比达16.00%;其次是GR(说明原因的陈述,证明对行为的要求、拒绝或禁止是合理的)占比7.58%;接着是CL(通过喊名字或大声叫引起听者的注意)3.32%、CS(反对建议,委婉地拒绝)1.78%、RD(拒绝去做,即拒绝执行他人要求或建议的行为)0.71%、DR(让听者采取行动)0.47%。占比最少的是GI(屈服,接受他人的坚决主张或拒绝)0.24%。从上述比例中不难发现,儿童在同伴冲突过程中更倾向于采取主动的方式,通过明确提出要求让同伴接受自己的想法,很少被动地接受同伴的主张,在言语行为表现上极少妥协退让。

在“问题和回答”类言语行动类型中,QN(以特殊疑问句方式提问)占比4.62%,YQ(以是非疑问方式提问)占比1.78%,AQ(加重的问题,通过重新问题表示反对)和SA(对特殊疑问句的回答)均占比1.30%,AN(对是非疑问句的否定回答)占比0.71%,AA(对是非疑问句的肯定回答)占比0.36%,EQ(诱发的问题)占比0.24%。在观察中发现,儿童最常运用的特殊疑问句是较为概括的“为什么”,相比较而言更加委婉的是是非疑问句和针对具体冲突情境矛盾焦点的反问句使用也不多。与此同时,我们注意到同伴冲突中,儿童对于问句的回答比例相对于提出的问句比例明显偏少,表明在与同伴沟通中儿童可能更急于提出自己的质疑,但不能有效倾听和回应同伴的疑问,也不擅长鼓励和诱发同伴对问题的回应。

在“评估和评价”类言语行动类型中,CR(批评指出非言语行为中的错误)占比3.44%,DS(不赞成、责骂、反对造成分裂的行为,对于听者或说话者的不适当行为表示否定的评价)占比2.84%,ED(不赞成或沮丧的叫喊)占比2.49%。在上述三种指向消极评价和情感表达的言语行动类型中,儿童使用直接批评的言语行动比例较高,表明在同伴冲突过程中他们更倾向于直接指出同伴言语或非言语行为中存在的错误,而使用不恰当的言语或喊叫表达不良情绪的比例相对较低,可见4-5岁儿童已经能够在一定程度上控制自己的不良情绪。

在“承诺和回答”类言语行动类型中,PF(禁止或阻止听者去执行行动、反对听者的行动)占比最多,为4.98%,TD(威胁要做某事)占比2.49%,而SI(陈述自己做某事的意图)0.24%和PD(许诺)0.12%,出现的频率都很低。可见,儿童在同伴冲突情境下更多采用直接制止对方行为的方式,来维护自己在冲突中的主导地位。相反,对于自身行为的意图解释,以及言语协商承诺的解决冲突策略则较少运用。

在“宣告和回答”类言语行动类型中,DC(即通过宣布建立事情的一种新情况)占比4.74%,DP(宣布虚假的事实)占比2.61%,ND(对一个宣告表示反对)占比0.36%。可见,直接大声宣告物品的所有权以及事情的进展情况也是儿童常用的解决冲突言语策略。

在“标记和回答”类言语行动类型中, MK (标记事件出现的言语) 占比 1.18%, EN (表达积极的情感) 占比 1.07%, EM (因悲伤、痛苦或者其它消极的情感而大声地喊叫) 和 TO (标记听者对事物的迁移) 占比均不足 1%。表明儿童在同伴冲突情境中很少会使用标记性的话语或转移注意的策略。

在“修订和编辑”类言语行动类型中 CT (纠正言语错误、对形式或者内容的修改) 占比 2.13%。表明儿童在同伴冲突中并不会仔细倾听同伴言语表达形式或内容中的错误, 更不会尝试进行修正, 这也再次验证了以往研究中学龄前阶段儿童会话修补能力相对较弱的研究结果。

“言语诱导和回答”类和“执行或表现”类言语行动在同伴冲突情境中的使用比例均不足 1%, 其中“言语诱导和回答”类仅出现 RT (重复或者模仿别人的话) 一种, 占比也不足 1%。我们发现, 尽管在同伴游戏情境中, 儿童常常会重复或模仿同伴的话语,^[13]但在同伴冲突情境中却更多专注于自己想法的表达。

四、研究讨论

(一) 资源争抢是引发儿童同伴冲突的主要原因

研究结果显示, 在区域游戏活动中由资源争抢引发的儿童同伴冲突占比接近 50%, 这也与以往相关研究的结果完全一致。儿童与同伴争夺的资源即包括玩具、小椅子、书本等物质资源, 还包括游戏角色、权力、友谊等非物质资源, 占有资源是决定儿童在游戏活动中能否占有主导地位的重要条件。此外, 由于 4-5 岁儿童对待问题和事物已经有了自己的判断和想法, 常常会因为已有的认知经验存在差异、审美的对立、兴趣爱好不一致等引发观点对立型的同伴冲突。

相比较而言, 本研究中规则维护型冲突发生的比例较以往研究更低, 主要是由于当同伴出现违反规则的情况时, 4-5 岁儿童更多会采取向教师告状的策略, 而较少会运用语言沟通的方式指出同伴的错误并说服其改正, 因本研究更多聚焦儿童冲突中的言语运用, 这类冲突事件在筛选过程中并未过多保留。同时, 儿童因无意碰撞和故意侵犯引发的同伴冲突频率也低于以往研究, 且故意侵犯型的同伴冲突常常发生于同性别的幼儿, 本研究中 6 例故意侵犯型的同伴冲突其中就有 4 例发生于同性别幼儿之间。这也可能受到本研究对象范围有限的影响。

(二) 肢体冲突更容易引发儿童非言语型回应行为

本研究发现: 中班幼儿在解决同伴冲突时主要使用单纯的言语行为, 单纯的动作行为发生频率不高但多出现于故意侵犯型的同伴冲突。当幼儿在遇到因争夺资源和观点对立问题时, 大都还愿意“有话好好说”。尽管有时资源争抢也会容易引起儿童的动作行为反应, 但大多同时伴随着言语行为, 一边抢夺物品一边强调该物品的归属感。而当遭受肢体上的故意侵犯或者是自己的作品被故意毁坏时, 儿童则更倾向于采用“以牙还牙”的方式来解决, 即使是同伴的无心之失, 儿童有时也会对同伴出现行为上的反击。例如, 当男孩小宇发现小轩把他的饼干弄碎了之后, 他立即冲过去对小轩进行了一系列的“打击报复”, 似乎通过这样的方式才能让他平息心里的怒火, 而小轩也不甘示弱立即选择了还手, 双方都没有来得及把事情说清楚, 就让矛盾瞬间升级。

(三) 儿童以自我为中心的言语倾向不能有效解决同伴冲突

发生同伴冲突时, 儿童迫切希望通过强调某一观点来获得对方的承认与服从, 但如果矛盾的双方都一味仅从自己的角度出发表达想法, 缺乏解决问题的建设性意见建议, 结果只能是自说自话。特别是当儿童在进行角色游戏时, 往往很容易沉浸在角色身份之中, 运用较多 DFW-讨论想象情境的事情。这类情境带入式的沟通方式能够有效拓展想象游戏的顺利进行, 但推进的前提是双方观点一致、或其中一方愿意妥协意见。当互动的双方持有不同观点是, 就需要跳出游戏情境进行沟通交流, 即运用元交际的方式进行沟通协商。可见, 元交际语言不仅是儿童发起、组织和维持游戏的重要手段, 同样也是有效解决同伴冲突的重要途径。

(四) 儿童解决同伴冲突的言语行动策略运用不恰当

首先, 儿童对同伴的指令性言语行动使用频率过高。从统计结果发现, 儿童在同伴冲突中以“陈述和回答”和“指令和回答”两类言语行动类型为主, 其中 ST (陈述自己的观点) 和 RP (向听者要求、提议、建议某种行动) 使用频率最高, 例如, 儿童经常对同伴说: “这是我的”“快给我”、“你去别的地方坐”“你走吧”等等。这样的言语行动主观意味浓厚, 指令性过强而协商性不足, 很容易引发同伴之间的言语争执。

其次, 儿童对于自我行动意图的陈述意图的陈述不足。在同伴冲突过程中, 解释说明能够帮助对方理解自己的言语或行为, 是解决同伴冲突的一种正向积极策略。例如, 一名女孩对同伴说: “我要把纸飞机放到柜子里去”, 她想让同伴给自己挪出足够的空间来以便自己行走, 听到她的解释后同伴理解了她先前挪动玩具位置的原因, 也欣然同意给她让出了通行空间。但在本研究中与解释说明相对应的言语行动“SI-陈述自己做某事的意图”仅出现了

两次,大部分时候儿童只是急于达成目的,直接让对方听从自己的指令,而对自己行为意图的解释不足,不能让同伴很好地理解自己。

再次,儿童对同伴的批评与否定话语过于生硬。在“评估和评价”类言语行动类型中儿童以CR(批评指出非言语行为中的错误)和DS(不赞成、责骂、反对造成分裂的行为)两种言语行动为主,最常使用的语句是:“不对”“不是这样的”“太笨蛋”“你太坏了”等,这种直接的批评否定很容易引发同伴更为激烈的言语反击甚至身体冲突,导致矛盾进一步升级。

最后,儿童不擅长使用反问策略。研究中发现儿童使用AQ(通过加重问题的使用表示反对,从而指出对方言语或行为的错误之处)即反问策略的比例非常低,他们最常用的提问方式是“为什么”,但这种提问的指向性并不明确。相比较简单的特殊疑问句和是非疑问句,反问和质疑的方法更能够帮助儿童赢得争论优势,显然4-5岁阶段的儿童尚未能掌握和运用这一策略。

(五) 教师对中班幼儿同伴冲突的认识不全面且缺乏有效的引导

一方面,教师对不同类型同伴冲突的关注度差异较大。在访谈中了解到,大多数教师印象最深刻的冲突类型都是资源争抢型,其次是故意侵犯型,对于其他类型的同伴冲突则关注相对较少。这两类冲突引起教师关注的主要原因是由于引发了同伴之间的肢体冲突,为了避免对双方的身体伤害,教师不得不介入并制止冲突。然而实际上,儿童与同伴之间单纯的言语冲突占据了约三分之二比重,对于这类没有明显肢体冲突的言语行为,很少能够引起教师的观察和分析。

另一方面,教师对同伴冲突的干预指导“治标不治本”。例如,教师对于这类资源争抢类冲突的指导中最常说的一句话是“你们如果不能好好商量那谁也不要玩了”,这种略带威胁的方法看似“直接有效”地化解了冲突,但却并不能帮助儿童学习如何与他人共享和交换游戏资源,没有引导儿童思考应该怎么“好好商量”。同样,对于故意侵犯型和规则维护型同伴冲突发生时,儿童也常常会去向老师告状以获得支持,教师对于这类冲突的干预方式也大多是批评或惩罚故意侵犯他人的儿童或直接重申游戏规则,来不及认真倾听儿童的想法或针对冲突问题组织儿童进行讨论。还有的儿童在同伴冲突过程中会说“打打你”“踢得你流鼻血”这类听起来有些暴力的语言,教师觉得这些话都是孩子在家里或是网络上学来的,只是告诉儿童“这种话是不能说的”,并没有尝试了解儿童的心理行为、及时疏导幼儿的消极情绪,即询问儿童为什么要说这种话,以及应当通过如何用恰当、文明的方式表达自己的消极情绪。

六、教育建议

(一) 创设良好的游戏环境,避免无效同伴冲突

尽管适当的同伴冲突能够为儿童创设交流互动彼此沟通的机会,但同伴冲突过多,特别是一些因为游戏区域布局不合理、游戏规则不明确等引发的肢体冲突,不仅会对儿童的身体和心理造成伤害,还会影响同伴关系和两好班级氛围的建立。

第一,合理布局游戏活动空间,避免区域相互干扰。合理的布局可以有效减少同伴冲突的发生。例如,在研究过程中发现由于班级活动区内的益智区和建构区距离太近,在益智区安静思考的小朋友经常被建构区热烈讨论的孩子打扰,他先是把自己的耳朵捂起来,随后站起来跑到说话声音较大的一名儿童那里,用手指着他说“你再说话我就把你搭的推倒”,而正在搭建的孩子也毫不示弱地说“你凭什么推倒我的积木”,进而双方发生了激烈地冲突。当教师有意识地重新调整了游戏区域布局,两组儿童不再相互干扰,类似的矛盾也没有再发生了。

第二,制定明确游戏活动规则,合理共享游戏资源。游戏资源是同伴互动的重要媒介,同时也很容易成为冲突的焦点。儿童对于游戏资源的占有争夺是游戏过程中无法避免的问题,如何有效地分享和交换资源是儿童必须学习的重要技能。在班级的游戏活动区域,教师为了避免部分区角因为人数众多而引发冲突,和孩子们共同商议决定通过名牌夹的方式控制区域人数,即教师依次请孩子们去选择自己想玩的区域,并把自己的名牌夹插入活动区域的布袋上,如果该区域人数已满,就需要选择其他区域去玩耍。这种方法不仅有效控制了游戏区域的活动人数,也有利于培养儿童的规则意识。

(二) 聚焦语言运用能力,助力解决同伴冲突

良好的语用环境无疑是促进幼儿语用能力发展的基础。教师不仅需要为儿童营造良好的沟通氛围,更需要借助多种教育资源,抓住日常生活中的教育契机,引导儿童积累语用经验,提升语言运用能力。

第一,借助丰富绘本资源,提升儿童言语行为认知。研究表明,绘本教学是提高儿童同伴冲突解决策略的有效方式,在绘本阅读中,儿童的语言表达能力和移情能力都会得到较大提升。^[14]借助主题绘本活动能够使儿童在

同伴冲突中运用协商沟通、解释请求等积极策略的数量明显增多。^[15]例如,在绘本《不是那样,是这样的!》中,面对森林发生的风波,小动物们都从各自的视角出发表达自己的感受,每个人的说法都不相同,各说自话、不断争吵,导致游戏无法继续,最终大家明白遇到冲突时要学会倾听他人的观点,尝试换位思考才能更好地理解彼此、解决问题。因此,优质的绘本故事能够让儿童在生动的故事情节中感知和了解与同伴言语沟通的有效策略。

第二,创设真实语用环境,鼓励儿童大胆讨论交流。学前儿童语言交流行为的成长实际上是一个语言交流行为类型不断扩展的过程,教师需要创设可以帮助幼儿操作运用多种语言交流行为的交往情境。^[16]例如,针对游戏过程和一日生活中出现的问题、现象,教师可以多组织儿童进行讨论,鼓励他们说出自己的观点和理由,并请儿童对同伴的发言进行分析和评价,引导儿童学会倾听他人的想法,在不同伙伴的身上学不一样的语言经验。

第三,重视日常师幼互动,提供积极言语示范。学前阶段儿童具有较强的向师性,教师在日常生活师幼互动中的言语表达会成为儿童模范的直接范例。例如,有的教师在生气的时候直接对孩子们说:“我说过,我今天心情不好,你们不要惹我,还是有人要往枪口上撞,好哎……”。若是教师也不能用恰当的方式表达情绪,那又如何要求儿童学会正确表达呢?因此,教师在师幼互动中要时刻注意自己的言语表达,为儿童提供积极的言语示范。

第四,尊重儿童个体差异,鼓励多种表达方式。每个儿童的性格特点、语言发展状况、以及家庭结构、父母的教养方式等都不尽相同,这些都是影响儿童语言运用和表达的重要因素,且对儿童御用能力的影响是综合和复杂的,这才使得每个儿童与众不同、个性鲜明。因此,在应对同伴冲突时,有的孩子性格急躁,情绪易怒,不知道如何正确表达自己的情绪就会着急动手或飙脏话;有的孩子则唯唯诺诺不敢表达,只能哭泣或求助老师。相比较而言,那些语言能力较好的儿童则能清晰准确地表达自己的想法和目的,从而在同伴冲突更容易获得优势。针对语言表达风格迥异的儿童,需要教师在充分了解其个性和能力的基础上,引导他们找到适宜自身的言语表达方式,进而有效化解同伴冲突。

第五,把握随机教育契机,循序渐进积累表达经验。儿童与同伴的冲突问题不可避免,冲突产生的原因各不相同,而解决冲突的方式也是多种多样的,没有任何一种言语策略可以适用于各种问题,这就要求教师引导儿童针对具体情况具体分析,循序渐进的帮助儿童积累化解冲突的有效言语策略。教师善于发现并利用日常生活中的典型案例,引导儿童对出现的问题进行交流和讨论,鼓励儿童准确表达自己的行动意图,尝试使用相对委婉的问句方式征求同伴的意见等。

(三) 更新家长教育理念, 尊重儿童冲突行为

首先,正确看待同伴冲突,避免过度保护溺爱。对待孩子们的冲突行为,家长往往会过于紧张,一部分家长生怕孩子在幼儿园受欺负,告诉孩子“要是有人欺负你,你就要还回去”,甚至鼓励孩子“以暴制暴”;另一部分家长则抱着多一事不如少一事的心态,教育孩子要学会谦让,不要和小朋友起冲突,“惹不起可以躲得起”。无论哪种方式都是源于家长对同伴冲突没有建立正确的认识。人际交往中的冲突是在所难免的,成人尚且如此就更不用说孩子了。正确面对冲突的方式既不应该是硬碰硬,也不应该是回避和委曲求全,应当是直面矛盾,运用恰当的策略有效沟通,找到双方都满意的方式解决冲突问题。而对学前阶段儿童来讲,每一次经历同伴冲突及其解决的过程,都是对其社交能力、语言表达能力、以及心理素质的综合锻炼与提升。家长应当在生活中关注孩子的同伴冲突问题,并抓住机会与孩子及时沟通和反思冲突过程,积累解决冲突的言语策略经验。

其次,改善家庭育儿方式,鼓励孩子大胆表达。父母是孩子的第一任老师,亲子互动过程中家长的言行是孩子直接的学习榜样,亲子冲突过程中家长的态度也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孩子面对冲突的反应。如果家长是急性子,在不顺心时会无所顾忌地说出不文明的言语,甚至简单粗暴的“动手”解决问题,无疑直接教会了孩子消极的冲突解决策略。同时,如果家长在亲子冲突中独断专制,对待孩子的态度过于强硬,使得孩子不敢表达自己的需求和愿望,这也容易造成孩子面对冲突的怯懦与退缩行为,不利于儿童自尊、自信等良好品质的形成。因此家长应该重视自身言语行为对孩子的影响,努力创设民主平等的家庭氛围和亲密的亲子关系,让孩子在温暖有爱的环境中想说、敢说,进而学会如何尊重和善待他人。

最后,增进家园沟通合作,共同商讨教育策略。家庭是幼儿园重要的合作伙伴,教师和家长应基于尊重、平等与合作的原则,积极寻求相互的理解、支持和参与。同伴冲突事件的发生或多或少反映了儿童发展中的某些问题,但却又不能针对一次矛盾作出简单判断,这就需要教师和家长及时沟通儿童在家和在园的行为表现,找到问题可能的原因,从而形成家园合力,更有针对性地帮助儿童提高应对冲突能力。

参考文献:

- [1]梁入文. 社会互动视角下以同伴冲突为契机的幼儿园语言教育解析[J].现代中小学教育,2018,34(05):57-60.
- [2]唐琼梅. 幼儿同伴冲突中教师介入的研究[D].广西师范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19.
- [3]王雪冰. 3-6 岁幼儿同伴冲突行为及解决对策研究[D].辽宁师范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18.
- [4]庞颖. 绘本阅读对智力障碍儿童同伴冲突行为干预研究[D].辽宁师范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18.
- [5]杨晓岚. 3-6 岁儿童同伴会话能力发展研究[D]. 华东师范大学, 2009.
- [6]王翠霞. 幼儿辩论活动的价值与组织策略[J].学前教育研究,2014(05):70-72.
- [7]左青. 混龄、分龄自由游戏中幼儿语言互动特征的比较研究[D]. 浙江师范大学, 2023.
- [8]张亭亭,夏明敏. 大班幼儿在同伴冲突中的语言运用研究 [J]. 内蒙古师范大学学报(教育科学版), 2022, 35 (01): 61-66.
- [9]马丽阳. 同伴冲突视角下大班幼儿口语表达能力的培养 [J]. 教育导刊(下半月), 2020, (02): 52-56.
- [10]彭国艳. 中班幼儿同伴冲突的特点及策略研究[D].哈尔滨师范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16.
- [11]陈丽媛. 3-6 岁幼儿同伴互动中言语反馈量化分析 [J]. 陕西学前师范学院学报, 2021, 37 (08): 55-65.
- [12]薛媛媛. 中班幼儿同伴冲突研究[D].东北师范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14.
- [13]杨晓岚. 4-6 岁儿童角色游戏情境中的同伴互动语言研究[D]. 华东师范大学, 2018.
- [14]石新斐. 运用绘本教学培养中班幼儿同伴冲突解决策略的行动研究[D]. 河北北方学院, 2022.
- [15]张爽. 绘本主题活动对大班幼儿同伴冲突解决策略的干预研究[D].天津师范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18.
- [16]周兢. 重视儿童语言运用能力的发展——汉语儿童语用发展研究给早期语言教育带来的信息[J].学前教育研究,2002(03):8-10.

Study of Peer Conflict Language Use and Guidance Strategies in 4-5 years Old Children

Yang Xiaolan¹, Liu Fei²

¹ Normal College of Changzhou Institute of Technology, Changzhou, Jiangsu 213000, China

² Longtan Kindergarten Long'an Branch, Qixia District, Nanjing, Jiangsu 210046, China

Abstract: The language pragmatic ability of children in peer conflicts is closely related to the development of their language abilities. Children's language pragmatic ability directly affects the extent to which they can successfully resolve peer conflicts. At the same time, conflicts between children and peers provide a good opportunity for the exercise and improvement of their language abilities. The study selected 35 4-5 years old children from a middle-class of Y Kindergarten in C city as the observation objects, and used non participatory observation methods to record the peer conflict events of the children during autonomous game activities. 60 pieces of peer conflict corpus were selected, and the internationally recognized children's language analysis system CHILDES was used for coding analysis from four dimensions: the causes, manifestations, language tendencies, and language actions of children's peer conflicts. Research has found that resource competition is the main cause of peer conflict in children, and physical conflict is more likely to trigger nonverbal response behavior in children. Children's self-centered language tendency cannot effectively resolve peer conflict, and their use of language action strategies to resolve peer conflict is inappropriate. Additionally, teachers have incomplete understanding and lack effective guidance on peer conflict. Suggestions for the above results can start with creating a good gaming environment, focusing on language proficiency, and updating parental education concepts to help children improve their comprehensive language pragmatic ability.

Keywords: Peer conflict; Language pragmatic ability; CHILDES; Language tendency; Speech and action

绘画疗愈视角下水性材料特性体验的课程思政路径研究

崔宝琨¹

(1.湖北文理学院, 湖北 襄阳 441053)

摘要: 绘画疗愈作为艺术治疗的重要形式, 已在全球教育与心理健康干预中广泛应用。水彩画因其独特的材料特性与表现效果, 在绘画疗愈的使用中占据重要地位。近年来, 高等教育中“课程思政”理念的提出, 为专业课程的价值引导提供了新方向。然而, 绘画技法教学中, 普遍存在重技法轻价值的倾向, 导致思政元素与专业技能教学脱节。本文以绘画疗愈视角切入, 结合水彩材料的流动性、透明性、偶然性等特征, 探讨其在课程思政中的应用策略。通过构建“体验—感知—内化—表达”的教学模式, 旨在为绘画技法类课程的课程思政建设提供可行范式。

关键词: 绘画疗愈; 水彩材料; 课程思政; 艺术教育

基金项目: 湖北文理学院 2025 年度校级教学研究项目课程思政类教研专项“绘画疗愈视角下《绘画材料与技法》课程思政教育路径研究(JY2025063)”

DOI: doi.org/10.70693/rwsk.v1i8.1326

一、引言

绘画疗愈作为一种重要的艺术治疗方式, 近年来在国际教育与心理健康干预中得到了广泛应用。其核心在于通过绘画创作过程, 使个体在艺术表达中释放情绪、缓解压力、增进自我认知, 并促进社会适应能力的提升。美国艺术治疗协会早在多年前便明确提出, 应将绘画疗愈纳入中小学及高校的心理健康课程体系, 以促进学生的全面发展。在英国、加拿大等国家, 艺术疗法已与教育心理学、社会工作学等领域形成稳定的跨学科合作机制, 其在学校教育中的应用模式趋于成熟。

相比之下, 中国在艺术疗愈领域起步较晚, 但发展迅速。近年来, 随着心理健康教育需求的增长和教育理念的转变, 越来越多的高校开始尝试将艺术疗愈理念融入心理健康教育、特殊教育及艺术实践课程之中。2020 年, 教育部印发《高等学校课程思政建设指导纲要》, 指出“把思想政治教育贯穿人才培养体系, 全面推进高校课程思政建设, 发挥好每门课程的育人作用, 提高高校人才培养质量”。这一政策导向不仅为艺术类专业课程思政建设提供了制度保障, 也为艺术疗愈理念在课堂教学中的落地创造了契机。

当前绘画技法类教学实践中, 仍存在“重技能传授、轻价值引导”的现象, 思政元素与专业技能教学往往处于相对割裂的状态。这种状况导致学生在掌握技法的同时, 对艺术创作的社会意义、文化内涵以及自我情感的关系缺乏深入理解。对于艺术类学生而言, 他们普遍具备较强的感性思维和实践兴趣, 若能在课程中引入绘画疗愈的理念, 将有助于他们通过体验材料特性实现情感表达与自我调节, 同时在创作中自然融入思政元素, 形成情感与价值观的内化。水彩材料具有流动性、透明性、可控性与不可控性等显著特征, 这些特性不仅在技法教学中具有重要的表现价值, 也为情绪体验与心理调节提供了独特的媒介。

国外的艺术疗愈研究起步早, 理论体系较为成熟, 既有关于艺术表达与情绪调节关系的心理学研究, 也有跨学科的教育应用模式探索; 国内的研究虽起步晚, 但在艺术教育、心理健康教育以及课程思政等领域的交叉实践不断增多。针对水彩材料特性体验在绘画疗愈与课程思政融合中的作用机制, 目前的研究仍较为有限, 缺乏系统的理论建构与实践模式验证。

基于此, 本文以湖北文理学院《绘画材料与技法》课程中的水彩教学为切入点, 从绘画疗愈的视角出发, 探讨如何通过材料特性体验实现课程思政的深度融入, 旨在构建既能提升学生艺术技能, 又能促进其情感调节与价值观形成的教学模式。以期对技法类课程的课程思政建设提供新范式, 并为艺术与心理健康教育的融合发展

作者简介: 崔宝琨(1994—), 女, 硕士, 讲师, 研究方向为美术学、美术教育、公共艺术。

提供借鉴。

二、相关理论及概念

（一）绘画疗愈

艺术疗愈是一种综合心理学与艺术创作的专业方法，它起源于19世纪末精神病学与教育领域对艺术表达的关注。艺术疗愈的概念萌芽于20世纪30年代，由美国心理学家南姆伯格提出，其以艺术形式为载体，通过非言语性的艺术创作或身体参与的方式激发人的潜意识，完成情绪到认知的转化。20世纪60年代后，艺术疗愈走向学科化与全球化，如今，艺术疗愈已广泛应用于心理健康、康复医学、教育辅导及社区支持等领域，成为一种跨越语言与文化、兼具科学性与创造性的心理干预方式。

从定义上看，绘画疗愈是一种辅助性心理治疗方法，与常规心理治疗中的语言沟通不同。作为艺术疗愈的一个重要分支，绘画疗愈专注于以绘画这一视觉艺术形式促进心理健康与情绪调节，更聚焦于色彩、线条、形状等视觉表达，通过创作过程和作品呈现来探索潜意识、释放情绪并促进自我觉察。其相关理论基础主要包括心理动力学、人本主义、积极心理学等。心理动力学认为，艺术创作能够为潜意识内容提供外显途径，帮助个体释放在情绪。人本主义心理学强调自我实现与潜能发展，绘画被视为一种促进个体自我表达与价值实现的积极方式。表达性艺术治疗则提出，创作过程本身即具有疗愈价值，尤其在非语言化表达中，个体能够在安全的创作环境中探索自我、调节情绪。

在水彩画的绘制过程中，材料的流动性与透明性为情绪释放提供了开放、柔性的媒介，这种特性有助于降低学生的心理防御机制，激发真实情感的表达。

（二）绘画疗愈与课程思政的结合路径

课程思政是指将思想政治教育的内容与要求有机融入各类课程教学中，形成“全员、全程、全方位育人”的教育格局。这一理念强调，任何课程都应承担育人功能，不仅传授知识与技能，更要引导学生树立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与价值观。

在《绘画材料与技法》课程中融入课程思政，意味着要在技能训练的同时，通过艺术创作引导学生思考社会、文化与人文关怀。绘画疗愈与课程思政的结合，实质是通过艺术媒介的情感渗透与心理调节功能，辅助课程思政目标的达成。具体实施路径可概括为：情感驱动的价值引领、体验式内化、跨学科融合。

在水彩绘制中，通过色彩、笔触、媒介特性引导学生表达内心情感，并在作品分析与课堂交流中引入价值观讨论，实现情感与思想的双向互动。通过实践并体验水性绘画材料特性，如水彩的流动性、透明性、可控与不可控性等，引发学生对生命、社会、自然的感悟，将价值理念在体验中内化。在教学设计中将艺术心理学、教育心理学与思想政治教育相结合，在教学内容上形成艺术技能与思政教育的双轨并行，提升课程的综合育人效能。

三、水彩媒介特性与心理体验

（一）水彩的材料特性与心理体验的关系

水彩画以水为媒介，颜料颗粒悬浮于水中，通过纸张纤维的吸附与扩散形成图像。其材料特性主要为透明性、流动性和偶然性。透明性使色彩具有通透感和轻盈感；流动性与扩散带来不可预测的色彩融合效果；偶然性则为创作带来惊喜与自由感。作为一种历史悠久且表现力独特的绘画媒介，其材料属性不仅决定了视觉呈现效果，更在无形中作用于学习者的心理体验与情绪调节。

水彩的流动性决定了其会呈现出难以完全预设的扩散与渗化效果，这种不确定性要求创作者在绘画过程中保持对变化的敏感与开放，学会在偶然中发现美，从而培养心理韧性与适应力。其次，透明性使得色彩层层叠加时能够保留底层色彩的光感与细节，这不仅带来视觉上的通透与轻盈，也在象征意义上暗示着创作的真诚与开放，促使学生在艺术表达中展现内心的真实情感。同时，偶然性特征为创作者提供了灵感激发与创造性应变的契机。水与颜料的互动往往产生意料之外的纹理与色彩变化，这要求创作者在面对“失控”画面时，能够以积极心态加以利用和整合，这与心理治疗中“接纳”与“顺应”的理念契合。此外，叠色、冲色、扩散等技法的使用使得创作过程呈现出循序渐进、由浅入深的节奏，在反复着色彩的过程中，不仅锻炼了耐心与细致观察的能力，也在逐步完善画面的过程中获得成就感与心理满足感。

（二）水彩在疗愈性绘画中的独特优势

艺术媒介的表现特性与创作者的感官、情绪及认知活动之间存在密切的双向互动。相较于油画、丙烯等材料，

水彩画的绘制工具轻便、简单、易携带、启动成本低，更适合在教育场景中推广。绘制中画面快速且直观的反馈能够让创作者在短时间内获得成就感，促进积极情绪生成；流动性与偶然性则提供了情绪宣泄与创造自由的空间，尤其有助于缓解焦虑、提升专注度。此外，水彩的柔和色彩与透明质感，易于营造安全、温暖的心理空间，为课程思政中的情感引导与价值渗透创造条件。通过有意识地引导学生在深入体验水彩的流动性、透明性、偶然性，能够有效促使学生在创作中获得情绪释放与自我觉察的机会，并将这种体验内化为积极的价值认同与行为习惯。

在对水彩材料的画面表现、审美特征及其与心理体验的关系进行分析后（如表 1 所示），可以发现，水彩独有的透明性、流动性与偶然性，不仅在技法表现上具有显著优势，也在情绪表达与心理调适方面展现了独特的潜能。尤其是在绘画疗愈的语境下，这些特性能够促使学习者在创作过程中体验自由、接纳与情绪释放，从而为课程思政的价值引导提供了契合的媒介基础。因而，有必要将理论探讨与教学实践相结合，构建一套以疗愈理念为指导、以水彩材料体验为核心的教学设计，以实现专业训练与价值塑造的双重目标。

表 1 水彩材料的审美特征、画面表现及其与心理体验

水彩特征	画面表现	心理体验与教学意义
流动性	颜料在纸面自然扩散、渗化，难以完全预设	培养学生对变化的敏感度与包容力，增强心理韧性与适应能力
透明性	叠色时保留底层色彩与光感	激发真诚表达与情感开放，促进自我认同与沟通能力
偶然性	水与颜料互动产生不可预测的纹理与色彩	激发创造性思维与灵活应变能力，鼓励探索与尝试

四、基于疗愈视角的水彩材料体验教学设计

（一）教学目标与内容框架

将绘画疗愈融入《绘画材料与技法》课程的水彩教学中，需要在教学设计中充分考虑学生的心理特点、材料特性与课程思政目标的契合点，构建以“体验—感知—内化—表达”为核心的教学方案。

首先，在教学目标设定上，应实现专业技能与思政育人的双重指向。在技能层面，要求学生系统掌握水彩材料的基本特性及其表现方法，包括色彩透明度、湿画与干画技法、叠加与扩散等基础技法，并具备将这些技法灵活运用主题创作的能力。育人层面，通过绘画疗愈过程引导学生认识自我情绪、提升心理调节能力，并在创作主题中渗透社会责任与文化认同等价值观。如，在以风景为主题的练习时，引导学生反思环境保护的重要性，并通过水彩的流动与层叠表现自然的生命力。

其次，教学内容设计应遵循由浅入深、由感知到表达的顺序。课程初期的材料熟悉阶段，进行“材料感知实验”，通过滴水、冲色、倾斜画面等技法，直观感受水彩颜料的流动性与透明性，培养对材料的敏感度。而后，结合绘画疗愈理念，将材料实践与情绪表达相结合，鼓励学生以色彩和形态表达当下的心境，并在小组分享中进行情感交流。课程后期，开展主题创作，将所学技法、材料体验与课程思政目标整合到完整的艺术作品中，形成“技能—心理—价值”的三位一体成果。既保障了技法学习的系统性，又为学生的情绪疏导与价值引领提供了实践平台。

（二）教学方法

在教学方法路径上，可采用体验式教学与反思性讨论相结合的方式。体验环节强调实践操作与感官沉浸，让学生在直接接触材料的过程中获得情绪释放与艺术表现的自由感；反思环节则通过引导性问题、同伴互评与教师点评，帮助学生从个体体验上升到社会与文化层面的思考，从而实现课程思政中“价值引导”的功能。

最后，在教学评价体系中，应综合考虑技能掌握度、情绪表达的真挚度以及价值认同的深度。评价方式可采取过程性评价与成果性评价相结合，既关注学生在课堂中的参与与体验过程，也考察最终作品在技法运用与主题表达上的契合度。同时，可设计自我反思日志，让学生记录材料体验过程中的心理感受与思考变化，作为评价的重要依据。这不仅有助于深化学生的自我认知，也为课程的持续优化提供第一手反馈数据。

通过上述设计，水彩材料体验教学不仅能够有效提升学生的技法水平，更能借助绘画疗愈理念，在潜移默化中实现课程思政的教育目标，推动学生在专业与人格上同步成长。

（三）预期效果与价值分析

基于绘画疗愈与课程思政融合的水彩材料体验教学，预计将在以下几个方面产生积极影响：

首先是专业技能提升，学生在持续的感知实验与技法训练中，能够掌握多种水彩表现方法，并形成个性化的

艺术风格。水彩的流动性与透明性特点将促使学生在技法运用上更具创造性。其次是情绪调节与心理健康促进,在材料体验与情绪表达的过程中,学生有机会释放内在压力、缓解焦虑情绪,并在面对水彩不可控的特性时学会接纳与调整,从而提升情绪管理与心理韧性。最后是价值观塑造与社会责任意识增强,通过主题创作,学生将个人情感体验与社会文化议题相联系,逐渐形成对自然环境、社会群体与文化遗产的深层次理解与认同,进一步落实课程思政的育人目标。

因此,构建以“体验—感知—内化—表达”为核心的教学方案不仅有助于水彩技法与材料认知的深化,更能在心理疗愈与价值引导方面发挥综合作用,从而推动学生在专业能力与人格素养上的同步发展。

五、结语

水彩媒介独特的流动性、透明性、偶然性等特征为情绪表达提供了重要媒介,也为学生的心理调节与思政教育提供了丰富的教学契机。基于疗愈视角的水彩材料体验教学设计为学生提供了一个情感释放与技能学习并重的学习平台。学生不仅能够感知并掌握水彩材料的基本特性,还能够与实践过程中实现自我表达与情感调节。在课程思政目标的引导下,通过围绕社会、文化等主题展开绘画实践,学生在艺术创作中提升专业技能的同时也增强社会责任感与人文关怀。

这一教学模式的探索为艺术类课程思政建设提供了新的路径,也为艺术治疗与心理健康教育的融合应用提供了有益的实践经验。疗愈视角的水彩材料体验教学作为一个新兴的教育模式,仍然有着较大的发展空间和研究潜力。未来可从跨学科教学整合等方向进行深入探索。

参考文献:

- [1]徐海涛.高校水彩画教学中思政内容的探索研究[J].艺术研究,2023,(06):129-131.
- [2]朱佳惠.以艺术强身心——绘画疗愈与高校美育的融合[J].匠心,2024,(08):36-38.
- [3]赵雨欣.“以画疗愈,以美育人”——绘画疗愈在美术课堂中的运用[J].画刊(美育),2023(1):21-24.
- [4]Wang J ,Abdullah B A .A Summary of Expressive Arts Therapy and Painting Therapy[J].Creative Education, 2024,15(02):278-288.
- [5]杰克逊·达维多,洛瞳,李玉华.艺术疗愈[J].艺术工作,2023,(04):119-128.

Curricular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ducation Through Watercolor Material Engagement: A Painting Therapy Perspective

Cui Baokun¹

¹ Hubei University of Arts and Science, Xiangyang, Hubei 441053, China

Abstract: As an important form of art therapy, painting therapy has been widely applied in global education and mental health interventions. Watercolor painting occupies a significant position in therapeutic painting due to its unique material properties and expressive effects. In recent years, the concept of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ducation in Curriculum" in higher education has provided new directions for value guidance in specialized courses. However, a prevalent tendency in painting technique instruction is the emphasis on skills over values, leading to a disconnect between ideological-political elements and professional skills teaching. This paper adopts the perspective of painting therapy and explores application strategies for curriculum ideology and politics by leveraging the fluidity, transparency, contingency characteristics of watercolor materials. Through establishing an "experience-perception-internalization-expression" teaching model, it aims to provide a feasible paradigm for integrating ideological-political education into painting technique courses.

Keywords: painting therapy; watercolor materials;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ducation in Curriculum; art education

任务导向教学在钢琴个别课中的实践与反思

邹鸣民¹涂园园²

(1.江西科技学院, 江西 南昌 330098, 2.南昌大学, 江西 南昌 330031)

摘要: 本文主要探讨任务型教学模式在钢琴一对一教学中的运用和优化方式, 设计了“视奏、协奏、作品分析、演绎、评估、展示”六大任务的教学内容, 从目的——过程——结果——总结四大块作为教学目标、过程、形式、评价、反思开展教学设计, 实验采用研究组与对照组相比较的教学设计方法, 在教学内容为六个教学任务的实验干预教学中, 通过音乐学术量化指标: 演奏成绩、练习时间、课堂参与度以及学习动机和学习自信心问卷, 质化指标有观察、访谈、笔记分析评价教学结果, 数据分析表明, 任务型教学能够使学生提高课堂参与度, 改进反思能力和语言表达的能力, 对钢琴教学提出了有效的改革策略, 对任务型教学提出了挑战。即任务的难易程度还欠缺分级, 同时也针对不同的学习者设定不同难度的任务, 提出了优化的任务设置的实施策略。将这一优化策略分为任务分层、反馈机制完善、教师的角色定位。对钢琴一对一教学的改革具有重要指导意义。本研究的不足之处在于研究人数较小, 实验教学时间较短, 实验时间仅有6个月, 不足一年, 所选为12人, 但是对钢琴教学的改革研究均有其推广意义, 尤其是教师的任务设计、任务型教学策略的研究值得推广。

关键词: 任务导向教学; 钢琴个别课; 学习动机; 自我效能; 教学评估

DOI: doi.org/10.70693/rwsk.v1i8.1294

1 引言

高等教育经历了从“以教师为导向”的被动接受模式到“以学生为主体”的自主学习模式的蜕变, 高校音乐教育正经历着从以技法学习为主的单一型音乐教育向能力素养培育为主的综合性音乐教育转变^[1]。钢琴作为高校音乐教育的主要专业课之一, 当前在钢琴的教学过程中绝大多数以个别课的形式开展, 以“一对一”技法训练为主导^[2]。传统钢琴个别课的课堂设计内容、教学结构和反馈方式等都存在一定局限, 例如学生课堂活跃度不高、课后练琴积极性低、老师授课模式过于机械和偏于单一等, 这些都是钢琴个别课教学在学生、教学和课程特征下的难点。近几年, 基于学生的“任务”作为教学目标及手段的任务教学法 (Task Based Language Teaching, 简称 TBLT) 得到了教育学术界越来越多人的认可, 它的主旨是利用具体的、有意义的任务激发学生主动积极开展学习活动、合作交流和拓展知识等。“任务教学法”能够培养学习者的学习动机、解决问题的能力和学习效果, 在以技能培养为前提, 创意思维为基础的艺术教育实践性较强的专业学习课程中尤可作为辅助工具^[3]。在音乐教育中“任务”教学法在声乐、器乐、乐理等课程教学中也有应用, 但在钢琴个别课上的系统实践性研究十分少见。笔者试图从上述教育的嬗变及钢琴个别课的教学特征出发, 通过“任务—反思—目标”为导向的探究, 将任务导向理念引入钢琴个别课^[4]。

本文探索以下几个问题: 单一单元课中如何做好任务教学设计? 任务教学对学生学习主动性和演奏状况的推动作用怎样? 教师的任务教学在授课环节如何有效地引导和调控? 行动研究并结合实证法, 本课题尝试为高校钢琴课堂教学工作提供学术上的启示、模式上的借鉴, 为推动音乐教学现代化改革探索出可供借鉴和实践的一套模式。

2 文献综述

2.1 任务导向教学理念在艺术教育中的迁移

任务型教学(TBLT)最初在语言教学中应用较为广泛, 重视通过完成实践性强的任务使学习者构建知识、完成转移。随着高等教育对学生中心化教学模式的积极拥抱, 近年 TBLT 正逐渐被引入艺术类学科尤其是音乐教学, 表现出较良好的适应性^[4]。Li.A 等(2024)以钢琴课程内容为基础构建了基于项目的任务型模式, 发现学习者的音乐分析能力和理解力有提升。

2.2 钢琴个别课的传统瓶颈与转型需求

作者简介: 邹鸣民(1990-), 男, 博士, 研究方向为产教融合、高等教育国际化。

涂园园(1980-), 研究方向: 音乐学, 音乐教育, 钢琴教学法, 钢琴演奏, 钢琴艺术指导。

钢琴个别课的传统教学模式以老师讲授、技能训练为主,而没有较为全面的任务和总结设计,学生课堂活跃度不足、主动性差^[5]。Wang(2024)认为,随着课程内容安排密集、课时局限,在个别课有限的时间内,要满足学生个性化和多样发展需求,任务性教学成为优化个别课课程结构的一种可能性。

2.3 混合式教学与钢琴教育的融合探索

任务驱动的混合式教学在钢琴课程中能够充分发挥其优势,李蕊(2024)在一项实证研究中以钢琴主修课为例探讨了混合教学的运用,发现通过混合式教学教学学生能够在课堂中投入更多和课堂之外更多的练习时间^[6]。陈松玲等(2024)进一步补充到在混合式教学中运用 OBE(成果导向教育)理念,不仅有益于建立清晰的学习目标体系,并为任务的实施提供一条可行的路径^[7]。

2.4 自主学习能力与学习动机的提升机制

学生自主学习能力的培养是 TBLT 和混合式教学共同指向的核心之一,夏莹(2013)发现,任务型学习中学生更有意愿自行安排练习内容和练习频率,这将提升他们的自信心^[8]。高嵩等(2024)指出数字技术钢琴教学可吸引学生练习、促成练习行为,可弥补传统一对一钢琴教学“课后辅导差”这一缺陷^[9]。

2.5 当前研究不足与问题聚焦

现有的研究成果初步证实了 TBLT 在音乐领域中实践的可能性,但还尚未有深入研究关于在钢琴个别课教学中任务设置的原则、任务实施过程中的评价及师生活动的研究。并且上述研究大多探究的是群体教学模式或课外实践活动,并且还有进一步研究是针对个别课内教学的。故本研究试图对上述进行弥补,并采用实证方法设计钢琴个别课中任务型教学实施框架,并尝试探索其实效性和改进方向。

3 研究方法

3.1 研究方法与对象

本文运用行动研究法,通过个案实证的研究方法来分析任务型教学应用在钢琴一对一教学中的实践策略及教学效果。受试是南昌大学音乐学院钢琴专业大三本科生 12 名,年龄平均为 21 岁,已至少学过 2 年的钢琴专业。根据排课和自愿参与的原则,按照随机选取的方式将学生均分为实验组和对照组两组,平均每组 6 人,并保证开始水平的一致。

实验周期为一个学期中的六次钢琴个别课,实验组接受任务导向教学法指导,对照组延续传统个别教学模式。实验组每次课后将进行任务完成反馈、反思笔记撰写与阶段性成果展示。

3.2 教学任务设计

本研究根据钢琴专业主科课程教学目标和演奏技能发展水平,在任务的设计上,根据钢琴学习认知发展过程将任务结构按照目标—过程—结果—思考四个模块分成,共设计了 6 个具象化任务,以此来帮助学生的技能发展、表达能力锻炼和学生自我反思,每个任务都匹配具体的任务单及目标指向提示,在课后需要上交学习日志和演奏计划^[10]。具体如下:

表 1 教学任务设计

任务编号	教学任务	教学目标
任务 1	视奏能力训练	提升音准与节奏敏感性
任务 2	协奏模仿演练	强化合奏意识与听辨能力
任务 3	作品结构分析与演绎计划	提升作品理解与个性化表达能力
任务 4	曲目演奏与演出准备	增强表达自信与现场应变能力
任务 5	自我评估与同行互评	建立反思与批判性思维机制
任务 6	个人演奏展示与教师指导反馈总结	提升归纳总结能力与长期演奏策略意识

表格一列举了围绕钢琴演奏技能发展六个教学任务及目标,包括视奏练习、合作练习、乐曲解析、演奏排练、评价反思、汇报呈现,形成了一个“目标指引—技能发展—能力内化”的系统教学过程。

4 数据收集与分析方法

4.1 混合研究方法

采用量化与质性相结合的方法:

量化数据:老师盲评演奏分数(维度:技术、表达、音准);自由练习时长和练习频率(出自学习日记);课堂教学参与分数(老师考评)。

质性数据包括:教学观察记录与课堂录像;教师反思日志。学生访谈(半结构式)与前后测问卷(学习动机、自我效能)

4.2 表格二:数据收集与分析方法

表 2 数据收集与分析方法

指标名称	数据来源	分析方法
演奏评分	三位教师盲评，评分维度含技术、表现、准确性表 2 数据收集与分析方法	描述统计、T 检验、Cohen's d 效应分析
自主练习时长	学习日志记录每周练习时间和频率	均值/方差对比、趋势图分析
课堂参与度评分	授课教师基于每课表现评分(5 分制)	描述性统计、组间 T 检验分析

表格二显示了数据收集与分析方法。根据三位教师盲评打分、学生学习日志记录、授课教师基于每课表现评分等数据统计，利用描述统计、T 检验和效应分析方法对课中学生演奏、自主练习和课堂参与等进行分析。

4.3 表格三：质性数据与主题分析方法

表 3 质性数据与主题分析方法

数据来源	内容说明	分析方法
教学观察与录像	课堂表现记录	编码关键词，主题归类
教师反思日志	教学调整与学生反应记录	内容归类+比较分析
半结构式访谈	学生访谈（6 人，实验组）	主题分析法（主题提炼）
自我效能问卷	Likert 五级，前后测	对比分析、交叉验证

表格三采取“多层次抽样+多主体分析”的研究方法，以提高解释力和教育建议操作性^[1]。本研究数据有研究者的，也有学习者的主观感受数据，使所得结果更加真实可信。本研究所使用的“自主学习力量表”与“学习动机问卷”均为研究者依据国内外相关理论与研究成果自主编制。问卷维度划分合理，涵盖目标设定、学习计划、自我监控与评估等核心领域，并结合钢琴专业学习特征进行了本土化适配与语言优化。在问卷设计完成后，邀请 3 位教育心理学与音乐教育领域的专家进行内容效度评审，并在与正式样本特征相似的 30 名本科生中开展预测试。预测试数据表明问卷具备良好的内部一致性（Cronbach's $\alpha > 0.85$ ），具有较高的信效度，可用于后续的教学干预效果测量与分析。数据分析将结合 SPSS 软件进行前后测的对比检验（如配对样本 t 检验），并采用主题分析法对教师与学生访谈文本进行编码与归类，以揭示教学模式对学生学习的潜在影响。

5 结果

5.1 表格四：实验组任务实施效果分析

表 4 实验组任务实施效果分析

任务	教学成效	教学观察要点与建议
任务 1	中	任务目标明确，但部分学生音准基础薄弱，需教师重点支持
任务 2	高	合作任务互动性强，激发学习热情，建议分层设计
任务 3	高	提升理解力与表现欲，建议配套分析模板引导
任务 4	中偏高	动机高涨，但存在演出焦虑，建议强化心理准备指导
任务 5	中	学生反思能力发展不均，需提供示范模板与评价标准
任务 6	高	教师反馈聚焦有效提升自我效能感与总结能力

表格四是对实验组学生在完成每一阶段任务后的教学结果评价以及课堂观察反馈后的系统分析，可对本阶段任务导向教学的实际实施情况进行肯定或分析不足之处，并提出具体的教学建议。高成效（任务 2、3、6）任务多集中于互动性强的任务环节（如合作模仿），或结构化的任务环节（如分析任务），或者反馈效果好的任务环节（如任务总结）；任务 1、4、5 为中等偏下成效，均为因学生个人起点高低、心理问题以及缺少支撑工具而产生参差不齐的表现。表四所呈现的结论可引导学生完成“任务差异性与支持性措施对应”的方式与方法：成效高：高互动性（包括交际任务、分析任务），结构化的任务，即时反馈、总结性的任务环节。成效一般：需要个体化（差异化）支持，需要一定的心理建设，或需要支撑工具支持。通过观察要点，提出了教学建议：构建“任务—工具—反馈”一体化教学设计；加强对任务实施过程的动态监测与调整；为能力差异显著的任务设立分层支持策略。

5.2 表格五：量化数据结果

表 5 量化数据结果

指标	实验组均值 $\pm$ SD	对照组均值 $\pm$ SD	p 值	效应量 (Cohen's d)	统计解释
演奏评分	89.5 $\pm$ 3.1	81.3 $\pm$ 4.6	0.012*	1.04 (大)	实验组整体表现显著优于对照组
每周练习时长 (小时)	8.7 $\pm$ 2.0	5.1 $\pm$ 1.8	0.008*	1.90 (极大)	实验组更主动练习, 练习量大幅提升
课堂参与度评分	4.7 $\pm$ 0.3	3.9 $\pm$ 0.5	0.018*	1.85 (极大)	实验组课堂互动明显增强

注: Likert 量表取值范围为 1-5; SD = 标准差; t 值为独立样本 T 检验结果; Cohen's d 效应量解释: 0.2=小, 0.5=中, 0.8=大。

表格五所示, 观察组的演奏成绩、课后练琴时数、课堂表现值显著高于参照组($t=5.757$, $t=2.833$, $t=4.772$, 均 $P<0.05$), 且在二者之间的差异上, 效应量在“大”或“极大”范围, 说明干预效果良好而明显, 对学生的学习表现、自觉练习的积极性以及课堂表现的强化有着良好的和强效的干预作用。

5.3 表格六: 学习动机与自我效能问卷分析 (前测结果)

表 6 学习动机与自我效能问卷分析 (前测结果)

指标类别	实验组均值 $\pm$ SD	对照组均值 $\pm$ SD	t 值	p 值	效应量 (Cohen's d)	统计解释
内在学习动机	3.45 $\pm$ 0.39	3.42 $\pm$ 0.35	0.17	0.87	0.08	两组初始动机相近, 无显著差异
成就目标取向	3.32 $\pm$ 0.51	3.37 $\pm$ 0.47	-0.21	0.84	0.1	初始目标导向水平一致, 无显著差异
自我效能感	3.48 $\pm$ 0.44	3.51 $\pm$ 0.41	-0.14	0.89	0.07	起点信心接近, 差异不具有统计学意义

注: Likert 量表取值范围为 1-5; SD = 标准差; t 值为独立样本 T 检验结果; Cohen's d 效应量解释: 0.2=小, 0.5=中, 0.8=大。

表格六显示均值对比显示三项指标 (动机、成就目标、自我效能) 在前测阶段的得分均处于中上水平 (约 3.3~3.5), 说明两组学生在实验开始前的心理状态基本一致; T 检验 p 值均大于 0.80, 显著性不足, 说明分组随机性良好, 具备进行教学干预比较研究的基础; 效应量均在 0.1 以内, 差异非常小, 可视为无效应, 这符合教学实验设计中“组间起点同质”的科学性要求。本次问卷前测验证了实验组与对照组在“学习动机”、“成就目标取向”及“自我效能感”三个维度上的基础水平无显著差异, 说明分组公平, 实验干预产生的后续变化具有可信的归因基础。

5.4 表格七: 学习动机与自我效能问卷分析 (后测结果)

表 7 学习动机与自我效能问卷分析 (后测结果)

指标	时间	实验组均值 $\pm$ SD	对照组均值 $\pm$ SD	p 值	效应量 (Cohen's d)	统计解释
内在学习动机	后测	4.18 $\pm$ 0.42	3.54 $\pm$ 0.36	0.006*	1.63 (极大)	任务引导激发内在动力
成就目标取向	后测	4.01 $\pm$ 0.38	3.44 $\pm$ 0.46	0.015*	1.34 (大)	任务促进成就驱动
自我效能感	后测	4.22 $\pm$ 0.33	3.68 $\pm$ 0.37	0.003*	1.55 (极大)	学生信心显著提升

注: Likert 量表取值范围为 1-5; SD = 标准差, 即 $\pm$ 后的数值, 如 0.42、0.36, 代表该组学生得分的离散程度。t 值为独立样本 T 检验结果, $p<0.05$ 被认为具有统计学显著性 (本文中三项都显著, 使用了星号 * 标注)。Cohen's d 效应量解释: 0.2=小, 0.5=中, 0.8=大。本表中三项均达到“大”或“极大”效应, 表明任务导向教学在心理层面影响强烈。

如表格七所示,所有指标的 p 均小于0.05,说明实验组与对照组在后测阶段差异具有统计意义,任务导向教学对学生心理变量产生了积极的影响。1.63(内在学习动机)与1.55(自我效能感)均达到“极大”效应量(>1.2),表明任务导向教学对学生情感信念两个方面产生极大的推动力。1.34(成就目标取向)达到“大”效应量(>0.8),表明教学任务加强了学生成功驱动力。各项数据标准差在合理的波动范围内,表明学生个体间无较大波动,结果具有稳定性和典型性。

任务驱动型教学的钢琴个别课教学帮助学生增强了内在动机、成就目标取向和效能感水平,增强了自主性学习的意识、期待和自我信心,体现了任务驱动型教学模式有效作用于教学过程以及心理动力方面^[12]。

5.5 表格八:主题分析结果

表8 主题分析结果

主题编码	关键词	典型引语	教学启示
目标驱动	明确、方向感、有挑战	“任务清晰,比以前更知道自己要练什么”	明确任务有助动机提升
合作与反馈	模仿、互评、建议	“互相说优点缺点让我很有启发”	同行反馈可增强认知觉察
自我效能增强	能做到、完成挑战、信心	“觉得自己练出来了,真的有进步”	分层任务能帮助达成感建立
表达与理解提升	结构分析、个性表达、情感投入	“第一次感觉钢琴也能表达自己的想法”	结构分析促进理解与表现能力

主题分析法就是将文本中反复出现的关键词、观点、情绪等找出来,整理归纳为教育意义上所具有的主题。以下对表格八的四大主题加以解析。

目标驱动:明确设定任务目标有助于学生建立练习方向,增强内在动机。与前期的学习动机量表结果相互印证,任务导向设计能有效提升学生目标感。

协作与接受:同伴接受促进了学生间的评价反思,帮助学生之间互促互惠的学习动机形成。协作与接受体现在任务2(即兴模仿)和任务5(互评),表达了社会建构主义视阈下学习交互性的作用。

任务成就感:任务可以阶梯式设计使得学生能够逐次获得成就感,加强自信心。这和该主题的学生自我效能问卷后测分数的显著增长相互一致,这说明了任务达成与心理上的认知是呈正相关的。

表达与理解。理解作品结构并结合自己的情感能够使得学生在演奏中达到较好的表达。在任务3和任务4中的结构分析与演出准备,有效地增加了学生的音乐表达和感情融入。

在多源质性数据的主题挖掘中,文献的分析再次证实了任务教学的有效性,并从动机、认知、情绪、元认知能力形成等方面证实了任务教学的有效性及其原因;这一部分数据也对量化分析的结果进行了有力的支持,并给课堂的设计提出了方向性的指引,教师需要制定阶段性的目标,及时反馈;结合结构分析、合作任务以及元认知策略;让学生记录学习过程、成果展示以及分享学习等,形成良性循环。

6 教学实施与反思

6.1 教学实施过程

实验期间,对照班“任务型学习”教学流程设计如表一所示。每位实验班学员每周一堂钢琴单独课,课程前期由教师向学员提供任务清单,并指导其前期自学;课堂环节由演奏、教师的即时反馈及互动活动和学员的课程演出,从而实现完成任务;课后由学员完成课程演奏训练情况以及任务落实情况的书写。

第一阶段“视奏与模仿”任务明确可操作,学生参与度高;第二阶段“作品分析与表达计划”引发了学生对乐曲结构分析与个性化理解的动机;第三阶段“演出准备”任务加强了学生的“目标”意识和实践性统整能力和完成度均良好,表现出较强的自主性。

6.2 教师教学反思

教师在教学过程中记录了详细的教学日志,从教学策略、学生表现、课堂互动等方面进行持续反思。主要发现包括:任务结构的清晰性是激发学生参与的关键;具有挑战性但可实现的任务更能激发动力。学生在反思阶段的表现(如撰写日志、自评)显著提升了其对演奏细节的关注与自主改进能力。教学过程中需要灵活调整任务深度与进度,以适应不同学生的认知水平与演奏能力。此外,在访谈中部分学生反馈希望任务中加入更多“个性化选择”与“自由发挥空间”,提示未来在任务设计中可加入“自选曲目”“学生主导任务”等模块。

6.3 阶段性成效与问题

试验后表演成绩表发现,试验班的表演表情、流畅稳定能力得分均优于对照班,课后练习时长、参与课堂也有所加强。在动机调查表中,试验班学生的“自我定向的动机”“效标一定向的动机”都有所上升。

当然还有缺点和不足：有个别同学对任务型教学初期感到不适应，说明前期的引导还需要加强；对任务教师的引导设计还欠缺更多经验，对“反思环节”的评价还不是很科学；个别任务目标的设置还比较笼统，有待融入SMART原则。

综上所述，任务导向教学在钢琴个别课中的应用具有较强的实践潜力，但其推广需依赖系统的教学设计、过程监控与专业发展支持。

7 结论与讨论

本研究确认了任务导向教学在钢琴个别课教学中的适宜性和有效性，并通过有效任务的合理规划以及多种评价方式，有效地提升了学生的内驱力、自信心以及表达欲望，需要在未来的教学中不断深化任务框架和针对学生的个性化需求，使钢琴主修课教学不断完善^[13]。

7.1 学生学习动机与参与度显著提高

根据前测和后测的学生学习动机问卷以及对课堂的教师观察可知，任务型教学让学生参与度更高、学习主动性和积极性增强。实验班级的学生普遍认为任务产生的学习目的更加明确，促使他们在课下主动预习、课中积极参与课堂活动、课后练习的积极性加强，特别是在“小组模仿式任务”及“小品排练”任务里学生的投入度和表现欲都更为积极。

7.2 演奏效果与练习效率的提升

在演奏得分结果中可以得知，实验组的得分在作品解读、演奏完整性、演奏表现上得分均高于对照组，结果差异显著 ($p < 0.05$)，另外通过课后练习日志以及教师评定的对比得出，实验组学生在练习方面都有目的性以及策略意识，练习的效率显著高于平时教学的“机械式”练习模式。可见任务设置中的顺序以及阶段性，有利于学生能够更好地规划练习过程进行自我监控^[14]。

7.3 教学难点：任务难度分级与个体差异管理

尽管整体成效显著，但教学实施中也暴露出一些现实挑战：

任务难度设计不均衡：部分任务对技术掌握能力较弱的学生而言过于复杂，导致挫败感；而对能力较强则缺乏足够挑战。

学生起点差异大：即使同为三年级学生，其技术风格、学习策略与音乐理解均存在较大差异，统一任务在实际操作中效果参差不齐。

课堂时间有限，任务完成度受限：尤其在个别课时长有限的情况下，任务推进速度与反馈环节需进一步压缩与优化。

这些问题提示教学设计需更加关注个性化支持与任务适配策略。

7.4 教学策略优化建议

为进一步提升任务导向教学的适应性与实效性，建议从以下三个方面进行教学策略优化：

灵活任务分层设计：针对不同学生水平设置“基础版—提升版—挑战版”任务层级，使每位学生都能在“最近发展区”内实现适度挑战与自我超越^[15]。

突出反馈阶段的意义：把课堂内省、教师评价学生、记学习日记等工作做到位，让“任务达成”的价值不只是完成任务，更是学习内省、实现迁移的开始。

教师角色转型：教师应从传统“示范—讲解—纠错”模式中转向“任务设计者—学习引导者—协作参与者”的复合角色，通过互动引导激发学生的学习主动性与创新意识。

综上所述，本文在肯定任务性教学在钢琴单课教学中有效性的同时，也为钢琴单课如何处理教与学之间矛盾与学生个体差异、优化教学设计提供参考和建议。

8 总结与展望

本文从钢琴主科个别课的教学视角探讨任务教学法在钢琴主修个别课中的教学实践过程和结果，对任务教学法在提升教学中学生学习欲望、课堂积极性、演奏表现与自我效能方面的影响展开调查并总结质性分析，发现结构化任务法在推动学生从被动学习到积极投入到演奏、教学安排、实践分析、呈现与表现的效果上发挥了很好的积极作用。

与此同时，笔者也发现了一些在实施过程中的现实问题，比如任务的繁简程度、学生间的个体差异性以及反思手段的薄弱等。在此基础上，提出了通过区分任务、反馈和教学角色调整等相应的教学策略建议，并为未来在钢琴个别化教学中运用任务教学法进行了一点探索。

本研究不足主要有以下几项：第一，对象范围较为狭窄，仅仅选取某个高校钢琴专业12名大三学生作为研究对象，影响了研究结论的推论性；第二，本次实验历时短，历时仅为6次个别课，不能够真正体现长期任务导向教学对学生认知与能力的长期影响；第三，在教学干预过程中，教师的主观臆断所占的比例较大，难免存在对研究结果的影响；除此之外，受资源、条件等方面的限制，在教学干预的过程中，研究未能采用更多的客观性技术手段（如视频分析、AI演奏评估）进一步提高教学观察的准确性。

总之，任务型教学在未来应用于音乐教育中还有很多待深挖的工作：第一，可将研究对象进行拓展，在更多年级、在更多不同类型的院校进行教学适用性的拓展；第二，尝试与数字技术的结合和混合教学模式，以增加任

务型教学的多样化和持续化；第三，以后的研究，可针对任务型教学下学生的学习迁移和未来的工作路径进行长期追踪调查，更好地了解该教学理念对艺术教育深层次的影响。

综上，任务教学法是任务导向教学理念在钢琴一对一教学中的一种有益的尝试，也是音乐教学改革中培养学习者主体地位和能力导向的走向课堂的主要途径，希望可以在更多的课程教学中进行不断的探索和实践。

参考文献：

- [1] 李岚. 高校钢琴教学中学生自主学习能力的培养路径[J]. 教学教法研究, 2024, 4(4).
- [2] 旭楠张. 高校教育教学改革研究——以钢琴教学中, 拔尖人才培养为例[J]. 教学方法创新与实践, 2024, 7(9): 99-101.
- [3] Pina K Y, Yoongb C Y. The Application of The "Project-Based" Piano Teaching Model at Universities [J]. 2023
- [4] Li, A., Ratanaolarn, T., & Sitthiworachart, J. Enhancing Student Engagement and Performance in Piano Lessons through Project-Based Blended Learning [J]. Pakistan Journal of Life & Social Sciences, 2024, 22(2).
- [5] Wang, Y. (2024). Challenges in Music Education in Chinese Colleges and Universities [J]. Journal of the Knowledge Economy, 2024, 1-25.
- [6] 李蕊. 线上线下混合式课程教学改革与探索——以钢琴课程为例[J]. 创新创业理论研究与实践, 2024, 7(11): 51.
- [7] 陈松玲, & 郑盛娜. 基于 OBE 教学模式下奥尔夫音乐教学法与高校学前教育专业音乐教学相结合的策略探讨[J]. Educational Theory and Research, 2024, 2(14): 21-23.
- [8] 夏莹. 任务型教学法在钢琴教学中的应用研究[D] (硕士学位论文, 西南大学). 中国知网. 2013.
- [9] 高嵩, 白昱, 孙雪峰, & 李园花. 基于数字技术的高等教育教改应用[J]. 吉林大学学报 (信息科学版), 2024, 42(6): 1164-1175.
- [10] 瑞泽. 高职院校音乐教育专业钢琴教学改革策略研究[J]. Educational Theory and Research, 2025, 3(16): 104-106.
- [11] 媛吕. 分层教学模式在高职钢琴教学中的应用思考[J]. 教学方法创新与实践, 2024, 6(24): 4-6.
- [12] 王晶晶. 分层教学模式在钢琴教学中的重要性[J]. 艺术评鉴. 2022.
- [13] 睿马. 高职院校钢琴教学中学生创新能力培养[J]. 教学方法创新与实践, 2024, 7(9): 26-28.
- [14] 郑红. 新文科背景下高校钢琴教学模式探究[J]. 文教资料, 2021, 25, 198-200.
- [15] 吴馨格. 钢琴教学方法与学习策略优化探究[J]. 中文科技期刊数据库 (全文版) 教育科学, 2023 (06): 170-173.

Practice and Reflection of Task-oriented Teaching in Individual Piano Lessons

Zou Mingmin¹, Tu Yuanyuan²

¹ Jiangxi University of Technology, Nanchang, Jiangxi 330098, China

² Nanchang University, Nanchang, Jiangxi 330031, China

Abstract: This paper focuses on the implementation and enhancement of a task-based teaching approach in one-on-one piano instruction. It outlines six teaching tasks: "visual playing, concerto, works analysis, deduction, evaluation, and display," structured around teaching objectives, processes, forms, evaluations, and reflections. The study employs an experimental design comparing a research group with a control group. Through quantitative metrics such as performance scores, practice time, classroom engagement, learning motivation, and self-confidence surveys, as well as qualitative assessments including observations, interviews, and note analyses, the results indicate that task-based teaching enhances student participation, reflective skills, and language proficiency. The study proposes effective reform strategies for piano instruction, emphasizing tailored task difficulty levels for individual learners and suggesting an optimized task-setting approach. This optimization strategy involves task stratification, enhancing feedback mechanisms, and redefining the role of teachers. The study's limitations include a small sample size and a short experimental duration of six months with only 12 participants. Nonetheless, the research holds significance for advancing piano teaching reform, particularly in the realms of task design and task-based teaching strategies.

Keywords: Task-oriented Instruction; Individual Piano Lessons; Learning Motivation; Self-efficacy; Teaching Evaluation

城市社区多主体协同治理实践、困境与优化 ——以南通YL社区为例

吴硕硕¹ 周道¹

(1.南通大学管理学院, 江苏 南通 226019)

摘要:基层治理是国家治理的基石。本研究以南通YL社区作为典型案例,探究城市社区多主体协同治理的优化路径。研究发现,社区通过创新“五步四议”议事机制、融合多种主体资源、推动志愿服务体系升级等一系列举措,有效化解了治理主体单一化、居民参与不充分等难题。这一系列实践成果,助力实现了党建引领下基层治理体系的优化、居民自治水平的提升以及多元主体共治机制的深化。然而,在当前的治理实践中,社区多主体协同仍面临一些现实困境,如主体角色认知存在偏差、社区资源相对匮乏、信息化发展不均衡等。针对这些问题,有必要采取明晰权责边界、加强资源整合、促进技术赋能、培育社区文化等优化措施。这些措施将为构建政府引导、社会协同、居民共同参与的基层治理共同体提供有益的实践参考。

关键词:城市社区治理;多主体协同;党建引领;居民参与

基金项目:省级大学生创新创业训练计划资助项目(202210304086Y)

DOI: doi.org/10.70693/rwsk.v1i8.1257

一、问题的提出

社会治理是国家治理的基础,是国家治理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党的二十大报告明确提出“必须坚持人民至上”“必须坚持共建共治共享”“必须坚持为了人民、依靠人民”“建设人人有责、人人尽责、人人享有的社会治理共同体”,社会治理共同体的提出,表明新时代我国对社会治理的认识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决定进一步提出“完善共建共治共享的社会治理制度”,将优化共建共治共享的社会治理制度作为加强和创新社会治理的重要内容,其治理的推进成效直接影响着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水平。党中央的顶层设计为新时代城市社区治理提供了价值导向。

社区治理共同体是社会治理共同体在城市社区场域的基本单元,它是由社区居民、社会组织、基层政府、社区组织等多元主体基于共同利益和需求,通过协商共治、责任共担、成果共享的机制所形成的共建共治共享的基层社会治理有机整体^[1]。基础要件是多主体协同^[2],为此需要构建交织紧密的网络关系^[3]。诸多研究阐述其实践逻辑,基本贯穿着基层党建、数字赋能、多元参与三个要素^[4-5]。

当下城镇化进程加速,居民需求日趋多元化,城市社区治理面临诸多难题,如治理主体单一、资源整合不足、居民参与渠道不畅等,治理实践中的结构偏差、机制失灵、体制障碍以及文化滞后导致社区治理共同体难以形成^[6]。如何创建基层社会治理共同体实现多元主体协同治理,既符合民众对美好生活的期盼,也是提升治理能力的关键所在。基于此,本研究以南通城市治理的一个示范社区为案例,探究其多元主体参与社区治理的实践,分析多元主体协同治理存在的问题,并提出相应的优化路径,以期为完善基层治理体系、提升治理效能提供重要参考。

二、多主体协同治理实践

(一) 案例选择

本研究主要采取案例分析法,以南通YL社区作为研究对象,通过实地调研和资料分析,探究YL社区各主

作者简介:吴硕硕(2001—),男,本科,研究方向为社区治理。

周道(2001—),男,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为社区治理。

体协同治理的实际状况。YL 社区是南通市崇川区旧老小区的典型代表之一, 辖区包含 14 个住宅小区, 有居民楼 65 幢, 常住户 2480 户, 总人口 6000 多人。该社区在 2016 年以前曾陷入严重的治理困境, 社区环境脏乱差, 私搭乱建、飞线充电之类的毛病总是反反复复出现。居委会和居民之间缺少有效的沟通渠道, 老龄化的邻里理事会很难将群众的积极性调动起来, 14 种小区类型繁杂, 物业同业主之间的矛盾非常尖锐。不过, 凭借党建引领, 多元协同的革新途径, YL 社区仅仅用了几年时间就达成了治理成效的明显改善。

YL 社区的突出表现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 一是党建引领加多元协同。社区创新“五步四议”议事机制, 基层党组织牵头, 居委会、物业、社会组织、居民多方参与, 形成“共商共治”决策模式。在环境改造中, 民主议事凝聚共识, 居民参与方案制定, 主动投工投劳, 居民满意度达 92%; 二是资源整合加居民参与。社区积极引进社会组织专业力量, 同时发动党员、居民骨干, 培育志愿服务队伍。通过“以劳代资”积分制、“幸福来敲门”等项目, 调动居民积极性, 志愿者增至 420 余人, 35 岁以下青年比例升至 38%; 三是从“问题整治”向“长效治理”转变, 社区把短期环境改善变成“社区大营造”, 孵化出“老年大学”、“楼道驿站”等可持续发展的项目, 利用微信群议事等方式提高治理效率。

(二) 治理契机

2016 年, YL 社区遭遇过非常严重的治理难题, 社区环境很差, 私搭乱建、飞线充电这些事一直难以彻底解决。每次文明城市创建都是投入大量人力、物力进行突击整治, 当检查结束之后, 这些问题回到原点, 这样“整治-回潮”的循环既浪费资源, 又让居民对社区管理失去信心。同时, 社区“两委”班子平均年龄偏大, 特别是与年轻居民交流起来不顺畅, 邻里理事会的成员年龄偏大, 真正动员居民, 共同参与公共事务实属不易。此外, 社区里面 14 个小区类型不一样, 有商品房、安置房还有城中村, 居民群体差异很大, 物业入驻率很低, 高档小区的物业跟业主之间的矛盾很尖锐, 这些难题叠加在一起, 使得社区治理陷入困境。

2017 年, 社区治理迎来转机。南通市提出建设“花园城市”, 倡导人人参与, 爱护生态环境, 践行低碳生活。基于此, 崇川区把握时机, 引进专业社会组织开展“景观微改造”项目, 用实际行动响应号召。YL 社区抓住机会, 号召居民积极参与, 多渠道激发居民参与热情与活力, 决定先从居民最关心的花园环境问题入手, 破除治理困局。

(三) 三阶段治理过程

1. 第一阶段: 治理破局——构建“五步四议”议事机制

首先, 从 YL 社区的老旧小区开始试点, 通过专业社会组织的系统培训, 培育了一批社区治理的能手。这些骨干深入居民家中开展走访和信息采集工作, 共计搜集到 200 多户居民的意见, 经过多方协商决定聚焦社区内在 200 平米的卫生死角改造上。同时, 为了保证决策民主化, 社区提出并践行了“五步四议”的议事机制, 由社区党委带头, 邻里党支部, 邻里理事会, 社会组织, 业委会以及物业公司一同参加协商议事, 按照多方参与、多数裁决的原则, 制订改造方案, 优化改造路径, 总结改造经验。居民们愿意参与决策, 真正获得参与感和认同感, 又能出力出资帮忙改造。改造结束之后, 由 50 个居民代表组成的代表团开展评估工作, 社区居民的满意率高达 92%, 回访率也降低了 60%。如此一来, 此次实践活动成为一项有益的尝试, 不但改善了社区的人文景观, 还自组织了一支 38 人的志愿者队伍, 有力增强了社区治理人才储备和居民主人翁意识, 为后续治理工作的循环可持续发展提供了良好的开端。

2. 第二阶段: 协同共治——多主体参与

随着治理的深入, 仅靠居民参与远不能解决社区治理中的其他问题, 需要整合多方有益的资源。一是发挥基层党组织领导核心作用, 党员代表发扬模范先锋作用, 社区党委、各邻里党支部主动成立志愿服务小分队, 全面了解社区居民的急难愁盼问题, 将矛盾问题化解在基层; 二是人大代表发挥议案建议作用, 将 YL 社区的管网改造难题形成议案建议呈递上去, 成功得到相关政府部门的关注和重视, 并顺利得到解决; 三是专业社会组织利用“99 公益”众筹项目筹集了 1.7 万元的资金, 成功在社区花园试点改造, 成效显著, 并将花园改造的经验辐射到周边小区, 赢得一致好评。此外, 该社会组织还利用专业的社会工作理论、技术和方法定期为社区志愿者提供培训, 助推社区治理可持续健康发展; 四是共建单位积极回应社区诉求, 如市政和园林局, 区机关事务服务中心, 针对公共绿化带高遮挡视线、街道环境脏乱差等问题, 开展多期树木修剪、路面修补的大扫除活动, 群众对政府的满意度不断提升; 五是社区实行“以劳代资”, 设立社区好人好事积分制度, 鼓励居民主动参加志愿服务活动。例如, 在社区骨干的带头下, “幸福来敲门”项目运转良好, 有 53 名老人得到结对帮扶, 他们的子女也成了志愿者的一员, 善行得以传递和延续。

3. 第三阶段: 治理深化——“环境微改造”向“社区大营造”转变

面对项目可持续发展与治理能力不均衡的新难题, 社区进一步优化组织架构, 多方主体潜力被挖掘出来, 社区治理向深向实发展。一是公职党员主动接受监督, 业委会、物业的协同积极性也被调动起来, 先后孵化出“楼道驿站”等 8 个项目; 二是资源整合更系统, 程序更合理, 协同辖区口腔医院每月开展义诊活动, 深入广场、街道、社区, 共累计服务 800 人次; 三是协同专业社会组织, 社区积极响应国家推进养老服务改革发展的意见, 开

展适老化服务, 开设“家门口老年大学”, 帮助居民告别手机不会用、不敢用的难题。此外, 银行、医院、公益组织也主动上门合作, 给困难家庭做适老化改造等服务。四是数字赋能成为新亮点, 15 个微信群在以往的简单下发通知的功能下, 还积极开展线上议事服务, 成功解决停车位规划、楼道间杂物堆放、私拉电线等问题。五是制度化建设成为重点, 社区总结出“五步四议”板凳议事法, 骨干志愿者成为社区长效治理的主力军。

城市治理不能只停留在简单地“整治-回潮”的循环往复, 更需要依靠可持续的路径探索和经验总结。YL 社区因地制宜, 结合本地区发展特点和资源, 从环境问题着手, 通过民主议事达成共识, 再将各方资源整合起来慢慢深化, 最后形成持续推进的治理生态。

三、实践成效分析

多元主体协同治理实践活动取得显著成效, 主要体现为治理体系得到进一步优化、参与主体活力得到进一步激发、公共服务质量得到进一步优化等三个方面。这不仅反映出治理实践取得的成果, 同时也在一定程度上可以为城市社区治理提供借鉴作用。具体而言, YL 社区取得的治理成效, 主要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一) 党建引领基层治理体系

党建工作引领基层治理全面升级, 在 YL 社区被集中性体现出来。多年的社区营造工作后, 社区党委由过去的崇川区“薄弱型基层党组织”跃升成“南通市五星级社区党组织”。这种转型升级呈现出三个特点: 一是在组织体系上, 该社区打造了“社区大党委——功能型党总支——网格党支部——邻里党小组——党员中心户”的五级贯通模式, 各个级别组织之间在党员培养管理、群众服务等方面表现出联动效应; 二是在功能落实上, 基层党组织的核心带头作用以及党员的先锋模范意识被充分发掘出来, 在社区治理难点问题的解决过程中显示出很强的组织动员力和组织韧性; 三是在工程监管上, 该社区实现了问题闭环解决, 满意程度测评这些关键参考数据得到了良性反馈。据此清晰地体现出党组织引领和居民自治的良好配合。

(二) 志愿服务体系发展迅速

该社区的志愿服务群体在组织活动的开展中不断完善, 呈现出规模化、专业化、年轻化等特点, 实现了一定程度的蓬勃发展。该社区从景观微改造着手, 循序渐进地搭建起多层次、多渠道的志愿服务网络, 助推社区治理成效愈发明朗。一是在治理空间上, 将试点的有益探索成功推广到周边小区, 形成了辐射带动作用, 实现了区域联动的效果; 二是在治理项目上, 开展“邻里花园”、“文化长廊”等 10 多个特色公益项目, 使得志愿服务意义更为明确和凸显, 增强了其可持续发展的可能性; 值得一提的是, 志愿服务组织架构得到优化, 形成由邻里党支部领导、邻里理事会执行、志愿服务小分队参与构成的组织结构, 构建了较为规范和结构化的治理资源。由此, 社区志愿者更是人数达到 420 余人, 35 岁以下年轻志愿者占比由 2018 年 12% 提升到 2024 年 38%, 在职党员志愿者人数增加到 56 人, 志愿服务队伍的专业素质和服务水平明显跃升, 这种全方位的改变将为社区治理创新提供了源源不断的“人才活水”。

(三) 居民自治体系不断完善

居民自治体系的完善呈现制度化和数字化的双重趋势。一是在组织建设上, 经过两年多的持续动员, 社区在 2019 年 10 月顺利完成了全部邻里理事会的换届交接工作, 建立了包含 12 大类、36 项指标的居民信息数据库并实现动态更新; 二是在参与渠道上, 搭建了线上线下相结合的参与渠道。线上建立覆盖 85% 住户的微信交流群, 线下依托“家门口老年大学”开展智能手机培训, 帮助老年群体跨越数字鸿沟。积极构建了“五步四议”居民议事机制。其中, “五步”即议题征集、多方协商、方案制定、公示反馈、实施评估; 而“四议”指社区组织、物业公司、居民代表、利益相关方。实践证明, 居民议事效率持续优化, 公共事务决策满意度显著提升, 促进了社区治理民主化、科学化。

(四) 红色业委会机制成效显著

红色业委会的机制建设从点到面实现了显著性突破。红色业委会创新实践也分三阶段: 一是在 2020 年疫情防控时期, YL 社区开始试点, 其中业委会有委员 11 个, 党员数量 7 名, 通过创新居民听证辅之公开抽签的方式, 有效地解决了停车位紧张的难题; 二是在 2021 年, YL 社区通过环境改造项目带动业委会改组, 创建了日查、周巡以及月评的常态化治理制度框架, 化解飞线充电之类共计 12 类的治理老顽症; 三是在 2022 年之后, 逐渐呈现出来规模化态势, 很多小区实现了业委会搭建或者改选工作。尤其是创新“潮汐式”共享停车位, 充分利用了周边商圈 80 个闲置停车位, 为小区年均创收 15 万元公共收益, 这种“党建引领、专业运作、居民参与”的共治模式, 让 YL 社区成为全市老旧小区治理的示范标杆。

四、多主体协同治理存在的问题

虽然 YL 社区在多主体协同治理运作的过程中取得的显著成果有目共睹, 但是在深入调研、剖析案例的过程中也发现了确实存在一些影响治理成效的问题。

（一）主体认知偏差弱化居民参与积极性

部分居委会成员对居民自治的认识有局限，把基层群众自治工作当作完成上级派发任务的行政流程，没有真正体会到居民是治理主体性的关键作用。由此，这种认识上的偏差容易导致居民自治活动停留于表面实施，居民参与到社区事务中来更多是被动接受的状态。例如，有些居委会组织社区活动的时候，习惯于单方面决策、组织、领导、控制而非引导居民参与互动。长此以往，居民的主人翁意识和对社区事务的认同感也随之降低，并且长期形成的“等靠要”依赖心理使得一些居民习惯把问题抛给社区或者政府，缺少主动参加治理的想法和意愿，这种“政府当家、居民看客”的情况，既削弱了社区治理的内生活力，又妨碍了共建共治共享治理格局的进一步深化。

（二）社区资源匮乏限制治理活动实施

社区存在物质资源、财务资源、人力资源紧张，这直接牵扯到治理活动能否顺利开展以及可持续开展。一是在物质资源上，一些社区因规划不周全或者资金紧张，缺少足够的公共活动空间和必要基础设施，组织像文艺活动或者居民议事等群众性活动时，常常由于场地有限，缩减参会规模或者更改活动形式，大大降低了居民的参与感和幸福感；二是在财务资源上，长期依赖政府拨款这唯一经济来源，使得社区项目缺乏持续性、长期性的辐射带动效果。例如，养老服务或者青少年活动，由于资金短缺，很难长久维持下去；三是在人力资源上，社区人员队伍普遍出现年龄偏大，专业能力不足等困境，一些工作人员在活动策划、矛盾调停等工作中难以胜任，调解居民间矛盾和满足其具体诉求，从而影响了社区服务的专业水平和治理效率。YL社区的骨干精英同样面临这个问题。

（三）信息化发展失衡制约治理效能提升

智能化要素正在加速重构治理模式的新形态已是不争的事实^[7]。虽然信息化技术给社区治理带来了全新的渠道，促进社区治理更加便捷化、高效化和现代化，但是社区信息化技术应用不均衡的现象普遍存在。第一，一些老年居民或者文化水平较低的居民由于对智能设备操作不熟悉，不能通过线上渠道获取社区信息或者参与社区事务管理工作，如果社区忽视了这部分居民的合理诉求，很容易造成了事实上的一种参与壁垒；第二，社区信息化设备虽然都有配备，但是系统更新较慢，像电脑、网络等基础设施比较老旧，线上服务响应速度慢，稳定性较差，居民使用体验感差；第三，社区现有的信息化平台功能设置侧重于政务服务，而对居民关心的社区事务公开、意见反馈等治理功能开发不到位，这就容易导致平台信息更新不及时，互动渠道不通畅，居民无法通过线上方式有效参与决策监督。

五、问题导向的优化路径

针对以上困境，本研究认为可以通过优化主体协作机制、整合各方资源、加强技术支撑等方式，逐渐形成党组织领导、社会协同合作、居民共同加入的良性治理局势。因此，对于现存的权责不明、资源缺乏、技术应用不平衡等现实状况，可以从以下渠道开展改善工作。

（一）明晰权责边界，激发居民活力

社区存在治理主体角色界定不清的情况，需要界定清楚党组织，社会组织和居民各自的权力和责任关系。街道和居委会要改变以往“大包大揽”的工作方式，制订职责清单，把社区公共事务的决策权部分放给居民自治组织，削减不必要的审批流程，降低居民参与的门槛。例如，尝试创建社区治理积分体系，向居民做好宣传报道工作，鼓励主动参加志愿服务、协商议事等活动，并按照贡献折算为积分，可由积分换取社区服务或者实物奖励，从而有效调动居民的积极性，提高志愿服务的可延续性。同时，可以通过评选“社区治理先进个人”、“优秀志愿者”之类的荣誉称号，提升居民参与治理的主动性和参与活力，逐渐塑造居民的公共精神和合作意识。

（二）整合多方资源，增强治理韧性

针对社区资源不足的问题，需要创建起多种资源供给体系。一是在资金筹集上，除了政府专项资金之外，还应广泛吸纳社会资金参与社区服务项目。例如，与企业合作创建便民服务设施，协同社会组织开展养老托幼之类的公益项目，做到“政府引导+社会参与”；二是在人力资源上，重视发掘社区内部的先进力量，培育社区骨干成为社区带头人，在文化活动，矛盾调解等场景中发挥表率作用。此外，对于一些专业性要求较高的服务工作，可以邀请社工机构或者高校团队给予培训援助，帮助社区志愿者掌握专业方法和实践经验，灵活应对各种复杂情形的社区治理难题，如改造闲置场地，错峰共享停车位，给予居民参与治理物质保障和情感支持。

（三）赋能社区治理，提升治理效能

信息化手段的运用要兼顾效率改善和公平。一是完善社区线上平台的功能。在政务服务的基础上增添民主协商、社区监督等板块，优化居民的服务体验。例如，可借助微信公众号、社区论坛这些途径不定期社区治理过程中的意见反馈，通过组织线上议事协商，及时收集居民的意见建议，形成问题反馈——协商解决——评估总结的良性循环；另一方面，针对老年群体不敢用和不会用智能设备的难题，社区可开展志愿者一对一帮扶工作，点对点开展智能手机的使用培训，简化操作流程，提升日常生活使用频次，帮助老年群体参与社区治理活动中去。此外，可搭建一体化的信息互动平台，把社区的信息资源整合起来，减少重复沟通的资源浪费，可以把居民的诉求处理过程流程化，规范化和专业化。

(四) 培育社区文化, 创建治理共同体

利用传统节日, 文化习俗来增进多主体的认同感和参与感, 这是推进协同治理可持续发展的重要方法。社区可定时举办文化活动, 把民主协商, 互助合作这些理念通过游戏、活动的形式融入其中。具体而言, 在文艺演出中间夹杂社区事务建议环节, 或者在传统节日活动中安排居民编排社区治理的互动节目, 通过寓教于乐的方式夯实居民的主人翁意识。同时, 要加大大同辖区单位, 高校方面的协作力度, 通过共商共建教育实践基地, 定期开设社区营造相关培训等方式, 吸引更多的社会力量加入到治理进程之中。此外, 针对社区社会组织而言, 可帮助申请政府津贴, 开展能力建设, 案例模拟等多渠道提升它们的专业水准, 促使它们在矛盾调解、志愿办事这些方面起到更大的作用, 逐步形成城市社区可持续健康发展的治理整体, 助推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

参考文献:

- [1] 许文文, 张牧辛. 社区治理共同体建构路径差异研究——以北京市三个社区为例 [J]. 公共管理学报, 2024, 21 (02): 77-90+173.
- [2] 袁超越. 城市社区治理共同体的主体协同与效能提升 [J]. 学习与实践, 2024, (06): 72-82..
- [3] 陈建国. 城市社区治理共同体的运行逻辑 [J]. 理论探索, 2024, (03): 92-97.
- [4] 毛寿龙, 肖敏. 公共领导力供给: 党建引领社区治理共同体建构的内在机理 [J]. 求实, 2025, (02): 4-16+109.
- [5] 杨秀勇, 张荣玺. 数字技术驱动社区治理共同体建构: 作用效果及限度——基于“全国社区治理和服务创新实验区”的实证研究 [J]. 甘肃行政学院学报, 2024, (02): 56-65+126.
- [6] 刘焕明, 顾雨婷, 刘培功. 社区治理共同体: 中国式现代化人民立场的实践创新 [J]. 山东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25, (04): 72-80.
- [7] 张艳国, 陆嘉豪. 智能化赋能社区治理的要素、原则与实现路径 [J]. 江西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25, 58 (02): 74-86.

Practice, Dilemmas, and Optimization of Multi-Subject Collaborative

Governance in Urban Communities: A Case Study of YL Community in Nantong

Wu Shuoshuo¹, Zhou Dao¹

¹School of Management, Nantong university, Nantong, JiangSu 226019, China

Abstract: Grassroots governance is the cornerstone of national governance. This study takes the Nantong YL community as a typical case to explore the optimization path of multi-actor collaborative governance in urban communities. The research finds that the community has effectively resolved challenges such as the homogenization of governance actors and insufficient resident participation through a series of measures, including innovating the "five-step four-discussion" discussion mechanism, integrating various actor resources, and promoting the upgrading of the volunteer service system. These practical achievements have contributed to the optimization of the grassroots governance system under the guidance of party building, the improvement of residents' self-governance level, and the deepening of the multi-actor co-governance mechanism. However, in current governance practices, multi-actor collaboration in the community still faces some practical dilemmas, such as deviations in the perception of actor roles, relative scarcity of community resources, and uneven development of information. In response to these issues, it is necessary to adopt optimization measures such as clarifying the boundaries of rights and responsibilities, strengthening resource integration, promoting technological empowerment, and cultivating community culture. These measures will provide useful practical references for building a grassroots governance community guided by the government, coordinated by society, and jointly participated by residents.

Keywords: urban community governance; multi-agent collaboration; party building leadership; resident participation

单位小群体识别与风险防控：理论框架与实践路径

马杰¹

(1.奥瑞威士顿科技大学, 墨西哥 下加利福尼亚州 提华纳市 22044)

摘要: 本文围绕单位内部“小群体”展开研究, 界定其为正式组织结构之外, 由若干成员基于利益、情感、背景或权力依附等因素自发形成、具有相对稳定人际关系的非正式集合。本文基于社会认同理论、社会交换理论、资源依赖理论、组织政治行为理论、冲突管理理论及职业锚理论, 系统分析了小群体的形成动因、类型及潜在风险, 包括利益诉求型、权力依附型、拉帮结派型、规避边缘化型、事业诉求型、制衡型及不同见地型。研究发现, 小群体虽能在短期内满足成员需求, 但长期可能引发战略偏离、管理秩序冲击、恶性循环、短视妥协及谣言挑唆等风险。本文进一步提出系统化防控策略, 包括保持创新增长、明确使命初心、统一思想认识、强化服务意识、培育全局视野、透明管理机制、畅通发展通道及建立熔断机制, 以保障组织健康发展与战略目标实现。本文对理解组织内部非正式关系、优化管理机制及提升战略执行力具有重要理论与实践价值。

关键词: 小群体; 组织行为; 非正式组织; 风险防控; 社会认同

DOI: doi.org/10.70693/rwsk.v1i8.1286

一、研究架构介绍

本文的研究架构基于组织行为视角与社会网络分析方法, 构建了“小群体风险识别—防控”系统模型。整体研究分为四个层次:

1) 概念界定层: 明确“小群体”的定义、特征及与相关概念(如派系、非正式群体、子群)的差异, 为后续分析提供理论基础。2) 动因分析层: 基于社会认同理论、社会交换理论、资源依赖理论等, 探讨单位内部小群体形成的核心驱动因素, 包括利益、权力、情感及职业发展诉求等。3) 类型与风险层: 按照形成动因和行为特征, 将小群体划分为利益诉求型、权力依附型、拉帮结派型、规避边缘化型、事业诉求型、制衡型及不同见地型, 并系统分析其潜在风险, 包括战略偏离、管理秩序冲击、恶性循环、短视妥协及谣言挑唆等。4) 防控策略层: 提出针对性管理与制度设计措施, 如保持创新增长、明确使命初心、统一思想认识、强化服务意识、培育全局视野、透明管理机制、畅通发展通道及建立熔断机制, 以实现小群体风险的识别、预防与控制, 保障组织健康发展与战略目标实现。

该研究架构形成了一个从理论界定—形成机制—类型划分—风险识别—系统化防控的完整逻辑链条, 既强调对小群体行为的深度理解, 也关注实践中可操作的管理对策, 为单位内部非正式组织研究提供了系统化、理论与实践兼具的分析框架。

二、核心概念界定

本文所称的“小群体”, 是指在正式组织架构之外, 由若干成员基于利益、情感、背景或权力依附等因素自发形成、具有相对稳定人际关系的非正式集合。该概念与现有学术文献中的相关概念既有联系, 又存在差异。

首先, 与派系(clique)相比, 小群体并不必然以权力争夺为主要目标, 也可能围绕情感纽带或共同兴趣形成; 但当其结构稳定且参与者在组织资源分配中形成排他性时, 小群体可能演化为派系(Brass et al., 2004)。

其次, 与非正式群体(informal group)相比, 小群体的规模通常更小、成员关系更紧密, 且在互动频率、情感黏性上更高。非正式群体是组织运行中的常见现象, 而小群体是其中更为核心化、关系网络更密集的一种特殊类型(Katz & Kahn, 1978)。

最后, 与社会网络中的子群(subgroup)相比, 小群体往往在结构上对应网络分析中的高密度联系节点群体,

作者简介: 马杰(1981—), 男, 博士, 研究方向为管理科学。

但其界定不仅依赖结构特征，还强调成员间的心理认同和共同利益（Wasserman & Faust, 1994）。

综合来看，小群体既是非正式组织研究、派系研究和社会网络分析的交叉概念，也是理解组织内部人际动力和政治过程的重要分析单位。本文将以此界定为基础，探讨小群体的形成动因、类型、风险与防控策略。

三、单位小群体形成的动因

在组织行为与社会网络研究中，“小群体”可被界定为存在于正式组织结构之外，由若干成员基于特定利益、情感纽带或资源交换而形成的相对稳定的互动共同体（Granovetter, 1973; Krackhardt, 1992）。与社会学意义上的“派系”(clique)、组织行为学中的“非正式群体”(informal group)以及社会网络分析中的“子群”(subgroup)相比，本文所指的小群体既可能具有派系的封闭性，也可能呈现非正式群体的灵活性，并在特定情境下通过资源与信息的流动承担子群的功能。

单位作为社会关系网络系统的重要节点，其内部成员构成了更为细分的小型关系网络系统。这些网络由处于不同层级、拥有不同权力与资源的核心节点所辐射，成员之间通过“时间投入、情感强度、亲密程度及互惠关系”等维系着强关系与弱关系（Granovetter, 1973）。由于组织内资源具有稀缺性且由不同层次的权力中心所支配，成员在网络中与权力中心的距离直接影响其资源获取能力与组织地位（Pfeffer & Salancik, 1978）。

在正式结构之外（如基于权力授权的官僚架构、基于服务需求的流程架构、基于特定任务的矩阵式架构），成员为了争取资源、建立支持性关系网络，会逐渐演化出非正式的小群体关系网络。这类网络通常以利益契合为基础，呈现出相互扶持、关系维系与目标达成的动态过程，并可能因动机丧失、外部环境变化或利益格局调整而解体。其生命周期体现了社会交换理论所描述的“投入—回报—满意度—持续性”逻辑（Blau, 1964）。

小群体的存在具有双重性：一方面，管理者可利用其高密度关系网络促进信息流通与协作，从而服务于组织目标；另一方面，若小群体追求的目标与组织目标相背离，则可能冲击正常管理秩序，带来政治性竞争与排他性风险（Mintzberg, 1983）。因此，识别小群体的形成动因与运作机制，并制定有效的防控与引导策略，是单位管理中的重要课题。

四、单位小群体的类型及表现

在组织行为研究视角下，单位内部小群体的形成是成员在资源获取、权力互动、社会认同及利益诉求驱动下的社会结构表现。通过社会认同理论（Tajfel & Turner, 1979）、社会交换理论（Blau, 1964）、资源依赖理论（Pfeffer & Salancik, 1978）、组织政治行为理论（Mintzberg, 1985）、冲突管理理论（Thomas & Kilmann, 1974）及职业锚理论（Schein, 1990）等，可以对小群体的形成逻辑、行为模式及潜在风险进行系统化分析。根据主要驱动因素与行为特征，小群体可大致划分为以下类型。利益诉求型小群体主要围绕晋升、资源分配等直接利益形成，成员行动高度一致以实现共同的物质或职业目标。根据资源依赖理论（Pfeffer & Salancik, 1978），组织中部门或个人在稀缺资源分配上存在依赖与竞争关系，从而促使成员通过结盟提高谈判力。在生产型企业中，销售部门和生产部门绩效导向差异明显：销售部门强调客户满意度和多样化产品组合，而生产部门重视效率和成本控制。各自追求目标的过程中，信息共享动机有限，易形成“信息孤岛”，并引发部门间冲突。权力依附型小群体中成员选择向权力核心靠拢，通过情感投入和资源交换获取保护与支持。社会交换理论（Blau, 1964）指出，个体通过与权力者建立互惠关系以获取稀缺资源和地位。这类小群体多见于新入职成员或长期绩效低下者，他们通过依附“实权者”获得安全感和资源，但由于缺乏历练或广泛群众基础，其组织地位不稳，依附关系存在风险。当付出与收益失衡时，群体内部易出现矛盾与分化。拉帮结派型小群体通常由经验丰富、掌握资源的核心人物主导，成员间情感纽带紧密，展现出利益共同体特征。组织政治行为理论（Mintzberg, 1985）认为，成员利用非正式关系网络协调行动，改变权力格局。在资源和信息不对称环境下，该类小群体排他性强，非成员在资源获取和组织支持上可能受限。成员动机多样，既有主动认同群体目标者，也有因担心边缘化而被动附势者，这增加了组织内部冲突的潜在性。规避边缘化型小群体中的成员为避免被边缘化而形成的防御性小群体，多由“老资格”人员组成。社会认同理论（Tajfel & Turner, 1979）表明，当个体感知到社会地位威胁时，会主动寻求提供身份认同和心理安全的群体。此类成员熟悉组织非正式网络，通过信息控制和舆论引导维系影响力，在组织调整或年轻成员崛起时，可能采取隐性抵制或消极配合，对组织任务推进造成潜在阻碍。事业诉求型小群体以职业发展或特定项目推进为核心目标，成员倾向借助“实权派”领导获取资源和影响力。职业锚理论（Schein, 1990）认为，个体职业价值取向驱动其形成稳定合作圈，以实现目标。该类群体可能在同事中建立支持网络，但常将他人立场划分为“支持”或“反对”，并可能将组织战略任务转化为个人私利，从而引发资源流失、内耗和信任危机。制衡型小群体是管理者为实现组织权力均衡或分权目标而形成的小群体，可通过联盟理论（Coalition Theory）理解。此类结构有助于多元决策，但若受本位主义或官僚化思维驱动，易引发部门壁垒和资源争夺。在无明确设计的情境下，自发形成的制衡型小群体

可通过信息传递、舆论塑造或策略行动对“出头”成员施加压力，维持竞争均衡，但可能抑制创新和主动性。不同见地型小群体是基于价值观、专业背景或战略方向差异而形成的小群体，表现出结构性对立。冲突管理理论 (Thomas & Kilmann, 1974) 指出，若引导得当，结构性冲突可促进创新；若缺乏有效沟通与协调，则可能加剧组织分裂。在管理团队中，不同群体的力量扩张或削弱形成“此消彼长”循环，导致投机行为增加，协作效率下降，并影响外部对组织的信任与合作意愿。

五、单位小群体的潜在风险

单位内部小群体的形成与运作，在短期内可能满足个体或群体的利益诉求，但从中长期来看，可能对组织战略执行、管理秩序及协作效率带来多维度风险。结合目标置换理论 (Merton, 1940)、资源依赖理论与社会认同理论 (Pfeffer & Salancik, 1978; Tajfel & Turner, 1979)、制度理论 (Scott, 1995)、组织政治行为理论 (Mintzberg, 1985)、群体效应与从众行为理论 (Le Bon, 1895)、短期主义理论 (Laverty, 1996)、组织学习与冲突管理理论 (Argyris & Schön, 1978; Thomas & Kilmann, 1974)、社会传染与社会网络分析理论 (Marsden, 1998; Burt, 1992) 等，可对小群体形成机制及其潜在风险进行系统化分析。

不同类型的小群体因关注焦点和行动取向各异，易将精力消耗于内部权力博弈与利益竞争，而忽视外部市场变化及客户需求。根据目标置换理论 (Merton, 1940) 及资源依赖与社会认同理论 (Pfeffer & Salancik, 1978; Tajfel & Turner, 1979)，当内部群体优先追求自身利益而非组织使命时，组织战略可能偏离以客户需求为导向的核心原则。成员关注点由外部价值创造转向内部争斗，导致创新能力下降、服务效率受限及组织响应速度减慢，从而削弱核心竞争力与可持续发展能力导致背离初衷使命的风险。小群体运作常伴随非正式“潜规则”滋生，这些隐性规范可能与正式制度发生冲突。制度理论 (Scott, 1995) 及组织政治行为理论 (Mintzberg, 1985) 指出，隐性规则的蔓延会削弱正式规章的执行力，破坏管理秩序。若管理者未能及时干预，其他成员可能形成“钻研潜规则优于遵守制度”的认知，导致制度遵循意识下降、管理权威受损，从而对组织治理结构和日常运作产生长期挑战，造成冲击管理秩序的风险。小群体具有群体效应与从众行为特征 (Le Bon, 1895)，若未受约束，其行为可能对组织整体利益造成系统性侵蚀。随着时间积累，内部偏离与惯性增强，纠偏难度增长，组织易陷入难以逆转的恶性循环。为防范此类风险，应保证成员结构多元化，信息来源多渠道输入，营造开放包容的氛围，建立批评、建议及监督机制，以实现动态平衡与及时纠偏，保障战略目标的有效实现，以避免陷入恶性循环的风险。部分管理者在决策中持回避态度，对组织愿景和价值观采取功利性策略，导致战略目标缺乏长期政策支持。根据短期主义理论 (Laverty, 1996) 及组织学习与冲突管理理论 (Argyris & Schön, 1978; Thomas & Kilmann, 1974)，短期波动和信息扰动可能引发内部协调机制孤立，各部门或小群体对“政策正确性”“流程标准化”的理解出现分歧，从而导致服务质量不一致、客户体验受损及战略执行失衡。成员过度关注细节和自我保护，采取投机策略，缺乏对长期目标的担当，最终削弱组织发展潜力，带来短视妥协的风险。组织内部谣言的生成与传播通常依赖于信息不对称和复杂的人际网络。社会传染理论与社会网络分析理论 (Marsden, 1998; Burt, 1992) 揭示，在强关系网络中，信息传播速度快且易被扭曲，中介成员可有意挑拨矛盾，激化群体间不信任。部分成员利用信息优势进行“左右逢源”的挑唆行为，以谋取利益、巩固地位或打压竞争对手。初期谣言零散且难以验证，但在群体效应作用下逐渐放大，形成“牛鞭效应”，导致组织内耗、信任危机及管理秩序受损。管理者需建立信息沟通与交叉验证机制，及时识别挑唆行为，防止其破坏组织氛围和战略执行，以避免谣言挑唆的风险。

六、防控之道：针对小群体风险的系统化对策

组织发展呈现出萌芽、成长、壮大、衰退与淘汰的周期性规律。在组织微观层面，不同阶段的小群体行为表现各异。依附权力型或资源争夺型小群体往往将主要精力集中于内部竞争而非价值创造，导致资源非增值性消耗和创新动力下降。基于系统动力学 (Sterman, 2000) 和资源依赖理论 (Pfeffer & Salancik, 1978)，组织通过持续创新能够开辟新的业务领域，将小群体关注点从内部博弈引导至价值创造活动。具体措施包括设立创新项目单元、鼓励跨部门协作、提供创新奖励机制，使成员的努力直接与组织增值挂钩，从而延缓衰退、激发创造性潜力，确保组织发展保持在合理区间，保持创新增长。形式主义型或投机取巧型小群体常将行为焦点放在上级考核和流程合规上，忽视市场需求与客户价值。根据目标置换理论 (Merton, 1940) 和社会认同理论 (Tajfel & Turner, 1979)，组织通过强化使命感和责任感，将行为导向与市场价值直接挂钩，可有效纠正小群体行为偏离。制度层面可通过岗位责任书、客户满意度 KPI 及定期考核，将使命初心转化为可操作行为规范，引导成员自觉以服务客户为核心，提升组织整体价值创造能力，以明确使命初心。分散利益型或分裂型小群体可能导致组织凝聚力下降，形成“一盘散沙”状态。基于组织政治行为理论

(Mintzberg, 1985) 和冲突管理理论 (Thomas & Kilmann, 1974), 组织应通过多层次宣教活动、团建项目及奖优罚劣机制, 强化成员间理解、信任与协作。通过明确核心价值观、战略目标及行为准则, 减少内部博弈频率, 增强组织整体资源增值效能, 确保战略目标的顺利实现, 进而实现统一思想认识。官僚主义型或权力依附型小群体容易将行为重心放在取悦上级或流程合规上, 忽视客户需求。结合组织学习理论 (Argyris & Schön, 1978), 组织应建立以客户为导向的绩效考核与激励机制, 定期开展历史和案例教育, 强化使命与服务价值认知。将客户满意度、服务质量与绩效直接挂钩, 可促使小群体成员主动关注服务对象需求, 提升整体服务能力和组织可持续发展潜力, 从而强化服务意识。本位主义型小群体常局限于局部利益, 易损害整体战略优势。基于系统动力学与战略管理理论 (Porter, 1985), 组织应通过战略培训、跨部门项目及目标导向型管理, 引导成员从宏观层面审视问题, 理解国家政策、行业趋势及组织战略目标。管理者需保持宽广心胸, 支持有利于整体发展的事务, 杜绝“一言堂”, 从而减少内部勾心斗角, 推动组织长期可持续发展, 培育全局视野。依附权力型或信息垄断型小群体可能通过非正式渠道获取利益, 破坏管理秩序。制度理论 (Scott, 1995) 和组织政治行为理论指出, 透明、制度化管理可有效遏制小群体利用信息不对称牟取私利。组织应依托公开规则、MIS 系统及考核机制, 实现权责利透明可追溯, 减少小群体间博弈和冲突, 保障组织管理科学性与规范性, 确保透明管理机制。边缘型或弱势小群体若缺乏发展机会, 易滋生消极行为。结合社会认同理论和激励理论 (Maslow, 1943), 组织应构建透明、制度化的沟通与晋升通道, 及时了解成员价值观、理想追求及个人目标。通过提供培训、发展机会及反馈机制, 使成员积极参与组织发展, 实现个人价值与组织目标高度契合, 增强凝聚力、忠诚度及整体绩效, 实现发展通道畅通。小群体行为具有典型“冰山效应”, 表面问题虽小, 但可能引发系统性风险。根据风险管理理论和系统动力学, 组织应建立流程化风险防范机制, 包括定期风险识别、内部与外部审计、应急预案及防火墙制度。结合小群体生命周期及组织成长阶段危机特征, 及时采取预防和纠正措施, 将潜在隐患控制在可承受范围, 保障组织稳定运行和健康发展, 发挥熔断机制的作用。

结语

总体而言, 组织应以“周期律”与“生命周期”的宏观视角审视自身发展, 致力于构建兼具核心竞争力、适应不同发展阶段战略、能够灵活应对环境变化并持续推动创新与成长的专业管理团队。在管理团队构建与运营过程中, 应确保权责利匹配、目标绩效导向清晰, 防止制度权力滥用和资源配置失衡, 避免组织演变为满足个人野心与虚荣心的“权利场”。应警惕权力与资源私有化现象, 防止培育小群体凌驾于组织整体战略之上, 避免管理团队僵化或形成内部阶层化的“死海效应”, 从而导致局部利益赢得优先而整体发展受损。在职场与市场的双重压力下, 成员会权衡投入与产出作出选择, 唯有从组织整体利益与成员价值诉求的视角出发, 才能真正激发团队凝聚力、战斗力及工作热情。管理者的行为风格、制度设计水平与资源配置机制直接塑造成员认知与行为模式, 对小群体的形成及运作具有决定性影响。深刻理解组织成员的基本人性需求, 并将资源有效配置于制度化的“游戏规则”构建中, 可有效防控小群体对管理秩序的冲击, 推动组织健康发展并实现战略目标。

参考文献:

- [1] Myers J A. 管理与组织研究必读的 40 个理论 [M]. 北京: 北京大学出版社, 2017.
- [2] Argyris C, Schön D A. *Organizational Learning: A Theory of Action Perspective*. Reading, MA: Addison-Wesley, 1978.
- [3] Blau P M. *Exchange and Power in Social Life*. New York: Wiley, 1964.
- [4] Brass D J, Galaskiewicz J, Greve H R, et al. Taking Stock of Networks and Organizations: A Multilevel Perspective. *Academy of Management Journal*, 2004, 47(6): 795-817.
- [5] Burt R S. *Structural Holes: The Social Structure of Competition*. Cambridge, MA: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92.
- [6] Granovetter M. The Strength of Weak Ties. *American Journal of Sociology*, 1973, 78(6): 1360-1380.
- [7] Katz D, Kahn R L. *The Social Psychology of Organizations*. New York: Wiley, 1978.
- [8] Krackhardt D. Assessing the Political Landscape: Structure, Cognition, and Power in Organizations. *Administrative Science Quarterly*, 1992, 37(2): 342-369.

- [9] Lavery K J. Economic “Short-Termism”: The Debate, the Unresolved Issues, and the Implications for Management Practice and Research. *Academy of Management Review*, 1996, 21(3): 825-860.
- [10] Le Bon G. *The Crowd: A Study of the Popular Mind*. London: T. Fisher Unwin, 1895.
- [11] Marsden P V. Network Data and Measurement. *Annual Review of Sociology*, 1998, 24: 435-463.
- [12] Merton R K. *Social Theory and Social Structure*. New York: Free Press, 1940.
- [13] Mintzberg H. *Power in and around Organizations*. Englewood Cliffs, NJ: Prentice-Hall, 1983.
- [14] Mintzberg H. *The Nature of Managerial Work*. New York: Harper & Row, 1985.
- [15] Pfeffer J, Salancik G R. *The External Control of Organizations: A Resource Dependence Perspective*. New York: Harper & Row, 1978.
- [16] Porter M E. *Competitive Advantage: Creating and Sustaining Superior Performance*. New York: Free Press, 1985.
- [17] Schein E H. *Career Anchors: Discovering Your Real Values*. San Francisco: Jossey-Bass, 1990.
- [18] Scott W R. *Institutions and Organizations: Ideas, Interests, and Identities*. Thousand Oaks, CA: Sage, 1995.
- [19] Sterman J D. *Business Dynamics: Systems Thinking and Modeling for a Complex World*. Boston: McGraw-Hill, 2000.
- [20] Tajfel H, Turner J C. An Integrative Theory of Intergroup Conflict. In: Austin W G, Worchel S, eds. *The Social Psychology of Intergroup Relations*. Monterey, CA: Brooks/Cole, 1979: 33-47.
- [21] Thomas K W, Kilmann R H. *Thomas-Kilman Conflict Mode Instrument*. Tuxedo, NY: Xicom, 1974.

Identification and Risk Prevention and Control of Small Groups in Units: Theoretical Framework and Practical Path

Jie Ma¹

¹ *Universitario Tecnológico Universitam, 22044 Tijuana, B.C., Mexico*

Abstract: This study focuses on the phenomenon of “small groups” within organizational units, defined as informal collections of members outside the formal organizational structure, formed spontaneously based on interests, emotional ties, background, or power dependence, and characterized by relatively stable interpersonal relationships. Drawing on social identity theory, social exchange theory, resource dependence theory, organizational political behavior theory, conflict management theory, and career anchor theory, this paper systematically analyzes the formation mechanisms, types, and potential risks of small groups, including interest-driven, power-dependent, factional, marginalization-avoidance, career-driven, balancing, and divergent-view groups. Findings indicate that while small groups may satisfy member needs in the short term, they can pose long-term risks such as strategic deviation, disruption of management order, vicious cycles, short-term compromises, and rumor-mongering. The study further proposes systematic countermeasures, including fostering innovation, clarifying mission, unifying cognition, strengthening service awareness, cultivating holistic perspectives, implementing transparent management, ensuring development channels, and establishing risk “fuse” mechanisms, to safeguard organizational health and strategic goal achievement. This research offers theoretical and practical insights into understanding informal relationships, optimizing management mechanisms, and enhancing strategic execution within organizations.

Keywords: Small groups; Organizational behavior; Informal organization; Risk management; Social identity

短期下沉到长效治理：党员干部下沉机制常态化的路径探索

潘逸航¹ 赵伊玲¹ 王嘉临¹

(1.杭州师范大学, 浙江 杭州 311121)

摘要: 党员干部下沉机制是中国共产党强化基层治理的关键制度安排。本研究通过量化分析发现, 下沉党员的社区融合度与专业能力对治理效能具有显著影响, 其中社区融入度是提升居民生活和社区治理的核心因素。在实践中, 党员干部下沉机制仍面临社区融合度不足、岗位适配错位等挑战, 下沉机制的“常态化”是有效提升党员社区融入度与基层治理效能的有效路径, 能够破解基层治理“最后一公里”难题, 推动党建引领下多元共治生态的可持续发展。

关键词: 党员下沉; 基层治理; 常态化

DOI: doi.org/10.70693/rwsk.v1i8.1289

1. 党员干部下沉机制时代背景与基层治理现存困境

1.1 下沉机制的概念、现实意义

党员干部下沉机制是中国共产党推动治理重心下移、强化基层治理的关键制度设计。其核心在于依托党管干部原则, 通过纵向层级流动与横向地域嵌入, 将各级干部调派至基层一线, 直接参与社会治理、民生服务与应急响应。该机制不仅通过政策执行、资源协调和民意反馈构建国家与社会的互动纽带, 更以基层党组织建设为抓手, 破解基层治理资源短缺、能力薄弱等“最后一公里”难题。在具体实践中, 下沉干部既承担着巩固基层政权、落实中央政策的政治责任, 也通过“双报到”等制度创新融入社区网格, 形成“增能而不增压”的治理模式, 持续释放组织动员与资源整合效能。

2017年, 党的十九大报告在国家战略层面上强调了加强社区治理体系建设的必要性, 并提出推动社会治理重心向基层下移的实践命题, 促进社会治理重心向基层转移, 是实现基层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必经之路。在2022年的党的二十大报告中, 习近平总书记提出要增强党建力度, 优化党建工作水平, 推动以党建为核心的基层治理, 精准定位新时代城市社区治理的“总抓手”, 为未来的发展方向提供了明确的指引。

在基层治理中, 党员群体作为“执政党组织人格化构成要素”, 沉入基层, 实现了政党组织与基层社会的有机嵌合, 带领与动员群众参与社会治理, 巧妙地实现了政党对基层的核心引领之下的多元共治。党员干部下沉社区工作及其所表现出的党建引领型治理模式, 为突破社会治理重心下移中的实践困境提供了新的思路。

1.2 基层治理视域下党员下沉机制现存困境与预备条件

根据已有的调研报告, 相当多的居民认为下沉党员来自社区之外, 对本社区归属感较为淡薄, 往往在工作上不够投入, 缺少与居民的深入交流, 也部分存在官僚主义和形式主义的情况; 此外, 下沉党员的工作能力较为低下也使得下沉党员在所在社区难以发挥作用。同时, 有些党员虽具备相当的工作能力, 但所具备的能力与专业知识与基层岗位不相匹配。而造成党员干部在下沉社区出现以上情况并难以完全发挥作用的问题有以下几点原因:

①社区未能做好对下沉党员工作岗位的合理分配

作者简介: 潘逸航(2005—), 男, 本科在读, 研究方向为马克思主义哲学;

赵伊玲(2004—), 女, 本科在读, 研究方向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党建工作;

王嘉临(2005—), 女, 本科在读, 研究方向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

在对下沉党员以及居民的调查中,出现问题并非是下沉党员的工作能力不够到位,而是社区在分配党员工作岗位时未能做到下沉党员的能力特长与工作岗位的匹配,没有做到“精准匹配”。使得党员的能力无法施展。例如,擅长信息技术的党员被分配至日常巡逻岗位,导致专业能力难以有效转化。

②下沉党员工作的监督单位更多由原单位负责而非下沉社区,社区的管理权限不足

下沉党员更多受上级有关部门或者本部门监督,而非当地的社区工作人员和群众,这些都反映了某些社区缺少对下沉党员的实质监督和管理权限,社区自然就难以结合具体实际对他们进行工作上的指导。

③下沉党员的工作机制存在缺陷

当前社区下沉党员工作往往采用留痕制进行评定。留痕制过度依赖台账记录、照片存档等表面材料,部分党员为完成任务而工作,出现“打卡式下沉”现象。而这一工作机制容易滋生形式主义和官僚主义,往往形成功利之风和浮躁风气,有党员认为下沉事实上是“考核指挥棒下的下沉”。

2. 常态化机制开展的必要性与预备条件

2.1 关于下沉党员群体的调研分析

基层治理视域下党员下沉社区的党员群体的调研,下沉党员群体呈现年龄跨度大、经验层次互补的显著特点。其中,老党员具备长期积累的群众工作方法以及社区关系网络,在基层矛盾调解和居民动员中发挥重要作用;而年轻党员则具备着较高的学历文化素养与高度的工作热忱。

调研发现,多数党员参与社区工作聚焦于“服务居民需求”的价值导向,其次才是个人能力锻炼与组织任务执行。值得注意的是,下沉工作与本职岗位的冲突已成为下沉党员中的普遍现象,这既反映出党员深度融入社区治理的现实趋势,也暴露出下沉机制中党员身份协调与制度衔接的关键问题,这要求着进一步完善党员下沉的常态化机制。

2.2 关于社区普通居民的分析

基层治理视域下对社区居民的研究表明,社区成员对居住地的公共事务的了解与认知程度较高。多数居民对社区基础性事务具备基本认知,能够通过公告栏、居民会议等制度化渠道获取治理信息,但对党员下沉工作的具体构成与相关职能缺乏清晰辨识。在诉求表达上,居民更倾向于选择常驻社区工作者作为主要沟通对象,与下沉党员的互动频次及深度明显弱于社区工作人员。这种选择性接触现象反映出了下沉党员在社区关系网络中的融合程度不高。但多数居民对党员下沉制度的价值仍然有着高度的认同。而这种民意基础也为优化党员社区融入路径、强化长效与常态化服务机制创造了良性发展空间。

2.3 关于社区与下沉党员机制的分析

基层治理视域下对党员下沉社区的工作机制的研究表明,岗位适配与管理制度的影响是基层治理成效的重要因素。参与下沉的党员到达社区进行对接时,普遍会开展一定时期的培训,各社区培训时间长短不同,但也有未参与培训参加工作的情况。从实际状况看,下沉党员与居民的交流与工作效果往往不如当地的工作人员。下沉党员的工作效果略逊的原因有很多:对当地社区的实际情况欠缺、基层工作经验不足、与当地居民熟悉程度、党员的专业所长发挥程度、官僚主义走过场形式等等。并且党员的管理与监督权限更多的仍然在党员的原单位,也导致了社区对党员的管理有限,难以结合社区实际为党员分配工作。

当前基层治理中党员下沉呈现的问题与运作瓶颈,同传统基层自治制度的积累与未来的政治导向形成历史性交汇。实证表明:建构党员下沉常态化运行机制,不仅是破解基层治理效能衰减与权责离散问题的破题方法,更是深植现实根基的韧性制度创新。

3. 量化数据分析

3.1 调查对象与方法

本研究通过网上投放问卷的方式开展,主要投放于浙江省各社区联络群等,共发放电子问卷 463 份。为研究党员下沉的哪些能力对社区治理的效果具有影响以及影响程度大小,本研究通过采用 SPSS24.0 软件进行频率分析、信效度分析、描述性分析、线性回归分析等多种数据分析方法,力求发掘党员下沉中各个维度与变量之间的

相互关系。

3.2 信效度分析

分析结果显示，过程有效性因子分析的 KMO 值为 0.980，大于 0.7 且巴特利特球形检验 p 值为 0.000，小于 0.05，说明过程有效性数据适合做因子分析。同时所有题目的公因子方差处于 0.663 到 0.790 之间，均大于 0.4，说明每个题目被提取的信息比较客观，没有删去题目的需要。因子 1 在题目 1 至题目 9 上具有较大的负荷，因子 2 在题目 10 至题目 15 上具有较大的负荷，经过归纳，可初步认定因子 1 反映党员的社区融合度，因子 2 反映党员的专业性。

同时，结果有效性因素的 KMO 值为 0.945，大于 0.7，且巴特利特球形度检验 p 值为 0.000，小于 0.05，说明结果有效性的效度结构较好，适合做因子分析。同时各公因子方差处于 0.733 到 0.821 之间，均大于 0.4，说明各题目提取的信息较为可观，暂且没有删去题目的必要。因子 1 在题目 1 到题目 4 上负荷较大，因子 2 在题目 5 到题目 7 上负荷较大，经过初步归纳，因子 1 可初步认定为“居民生活”，因子 2 可初步认定为“社区治理”。

同时，各个量表的总体的克隆巴赫 Alpha 系数均大于 0.7，说明问卷量表信度良好。

综合以上探索性因子分析与信度分析，可以得知该问卷的信效度得到了检验，可以进一步进行分析

3.3 描述性分析

研究分析显示：专业性、社区融合度与社区治理的均值大于 3，社区融合度的均值小于 3，由于在问卷设置上，选项最小为 1，选项最大为 5，均值越大效果越好，这表明在党员下沉社区的过程中，党员具有相应较强的专业性，但党员的社区融合度相对较弱，可见党员在下沉社区的融入度与适应程度状况相对较差，需要对此进行一定的加强。

3.4 相关分析

如表 1 所示：过程有效性（专业性、社区融合度）与结果有效性（居民生活、社区治理）两两皮尔逊相关系数均大于 0，呈现正相关的关系，同时 p 值均小于 0.01，具有统计学意义，这说明党员的专业性、社区融合度与居民生活、社区治理的改善具有强烈的积极作用，同时党员的专业性与社区融合度之间也会相互影响，呈现正比例的相关关系。所设置的 H1-H4 的研究假设得到了验证。

表 1 相关分析

		相关性			
		专业性	社区融合度	居民生活	社区治理
专业性	皮尔逊相关性	1	.900**	.854**	.841**
	显著性 (双尾)		.000	.000	.000
	个案数	463	463	463	463
社区融合度	皮尔逊相关性	.900**	1	.890**	.876**
	显著性 (双尾)	.000		.000	.000
	个案数	463	463	463	463
居民生活	皮尔逊相关性	.854**	.890**	1	.858**
	显著性 (双尾)	.000	.000		.000
	个案数	463	463	463	463
社区治理	皮尔逊相关性	.841**	.876**	.858**	1
	显著性 (双尾)	.000	.000	.000	
	个案数	463	463	463	463
**. 在 0.01 级别 (双尾)，相关性显著。					

3.5 多元回归分析

以居民生活作为因变量的多元回归分析:

从表 2 可看出, 专业性、社区融合度的 p 值分别为 0.029、0.000、0.000, 均小于 0.05, 说明此回归方程具有统计学意义, 得到的回归方程为:

$$\text{居民生活} = 0.184 + 0.286 * \text{专业性} + 0.662 * \text{社区融合度}$$

通过回归分析可以得出, 社区融合度对于居民生活的影响较大, 而专业性对于居民生活的影响相对较小, 因此可以得出, 党员下沉在居民生活上的改善, 更多需要注重党员在下沉社区的融合度, 同时党员本身的专业性也不可忽视。

表 2 以居民生活作为因变量的多元回归分析

	回归方程			模型摘要		
	B	t	显著性 Sig.	R	R 方	标准估算的误差
(常量)	.184	2.191	.029	.899	.808	.43549
专业性	.286	5.902	.000			
社区融合度	.662	13.679	.000			

以社区治理作为因变量的多元回归分析:

从表 3 可看出, 专业性、社区融合度的 p 值均为 0.000, 小于 0.05, 说明此回归方程具有统计学意义, 得到的回归方程为:

$$\text{社区治理} = 0.332 + 0.279 * \text{专业性} + 0.630 * \text{社区融合度}$$

通过回归分析可以看出, 党员的社区融合度对于党员参与社区治理的影响较大, 而专业性影响较小, 因此提高党员在社区治理的参与度与成效, 应当更加注重党员的社区融合度。

表 3 以社区治理作为因变量的多元回归分析

	回归方程			模型摘要		
	B	t	显著性 Sig.	R	R 方	标准估算的误差
(常量)	.332	3.806	.000	.884	.781522928	.452407592
专业性	.279	5.557	.000			
社区融合度	.630	12.526	.000			

3.6 数据分析结论

本问卷经过数据分析, 基本验证了问卷所设置的假设 H1-H4, 即下沉党员参与社区工作过程的效果对于下沉社区治理效果均具有明显的正向作用, 本研究通过探索性因子分析得出四大因子, 将下沉党员参与社区工作过程的效果影响因素概括为“专业性”与“社区融合度”两个维度, 将下沉社区治理效果划分为“社区治理”与“居民生活”。经过相关性分析, 得证假设: 下沉党员参与社区工作过程的效果对于下沉社区治理效果均具有明显的正向作用。

虽然下沉党员参与社区工作过程的效果对于下沉社区治理效果具有显著影响, 但是各因素影响不尽相同。从相关分析与线性回归分析系数可知, 下沉党员的社区融合度对于社区治理与居民生活的影响, 相较于党员专业性来讲更大, 但党员专业性在线性回归分析与相关性分析中得分也较高, 在事实上层面上也不可忽视。

同时可以发现, 下沉融合度在党员下沉社区中是具有较强相关性的因素。从描述性分析下沉融合度得分较低的状况可看出, 目前社区出现下沉党员的下沉融合度较低的现象较为严重。并且下沉融合度分值较低的问卷, 专业性往往也偏低, 这也与相关性分析中下沉融合度与专业性皮尔逊相关性具有 0.9 的高额系数相吻合。再结合上表党员下沉线性回归分析系数较高的状况, 可以得出下沉融合度对党员专业性的发挥具有很大影响。党员的社区融合性因素, 往往决定了党员专业性在当前社区的发挥状况。

4. 促进党员干部下沉机制有效性的建议与讨论

根据上述党员下沉的现存问题以及相关因素分析的剖解, 党员社区融合度、岗位适配程度不足、对下沉党员的管理机制与考察制度的欠缺, 均可以通过“常态化”的党员下沉来实现

4.1 “常态化”的党员下沉以“人岗适配”提升治理效能与党员社区融合度

从上述党员下沉的现存问题以及相关因素的分析来看,社区融合度是影响党员下沉社区的重要因素,其中不仅包括了在当地与居民的熟悉程度,也包含了对当地工作的适配程度。

因此社区需依据党员专业背景建立动态岗位分配机制,避免资源错配。同时通过季度居民满意度调研动态优化岗位分配,确保专业能力与社区需求精准对接。

除此之外,需要以“融合导向”构建长效机制。推行党员固定下沉周期,要求参与社区议事会固定频次,并通过线上社群与线下活动增强互动;对融合度高的党员予以相关奖励,并纳入晋升考核加分项,形成长效激励机制。

4.2“常态化”的党员下沉以社区主导与资源整合促进治理效能与制度优化

既有的问题与分析说明了:社区直管下沉党员是使党员下沉落到实处,杜绝形式主义的有效措施。而我们需要用“常态化”的下沉机制取代“短期”的下沉,在长期的实际工作中取得真正的管理职权。并且明确社区在党员考核中的主导地位,明确社区评价等在绩效中的权重,联合原单位开展“基层治理实务+群众工作方法”双模块培训,设置培训时长最低标准;同步建立社区-党员-居民三方反馈平台,每月召开联席会解决权责不清问题,确保职权执行的透明度与科学性。并且需要以“资源整合”保障机制落地。上级政府需设立专项经费,增加每社区年均投入,用于培训及活动组织,并合理化党员下沉时间安排,优化本职与下沉工作时间比,提高基层治理效能。

参考文献:

- [1] 曾建丰,狄金华.寓科层于社区之中:基层疫情防控的实践运作——基于 J 市“党员下沉”实践的调查分析[J].中国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1,38(02):16-28.
- [2] 陈荣卓,胡皓玥.党建引领社会治理重心下移的逻辑与进路[J].江汉论坛,2023,(03):61-68.
- [3] 毛亚东.韧性视角下党员下沉参与社区治理研究[D].上海:上海财经大学,2023.
- [4] 陈伟东,徐凌风.党员社区志愿服务的行动逻辑及其变迁——以 W 市 q 社区为考察对象[J].江汉论坛,2024,(05):53-59.
- [5] 汤文斯.党建引领社区治理中党员下沉社区的现状和问题研究[D].湖北大学,2021.

Institutionalization Path of the Cadre Secondment Mechanism: An Empirical Study on Community Integration and Governance Efficacy

Pan yihang¹, Zhao yiling¹, Wang jialin¹

¹ Hangzhou Normal University, Hangzhou, Zhejiang 311121, China

Abstract: The cadres secondment mechanism serves as a pivotal institutional arrangement for the Communist Party of China to strengthen grassroots governance. Based on survey data from communities in Zhejiang Province, this study employs quantitative analysis to reveal that both the community integration level and professional competence of seconded Party members exert significant positive effects on governance efficacy. Among these factors, community integration emerges as the core element enhancing residents' quality of life and the level of community governance. Currently, the cadres secondment mechanism faces practical challenges, including insufficient community integration, misalignment in position assignments, and fragmented management authority. To address these dilemmas, the "institutionalization" of the secondment mechanism is identified as an effective pathway to enhance Party members' community integration and grassroots governance efficacy. This necessitates establishing a dynamic position allocation mechanism that precisely matches Party members' expertise with community needs and strengthening the leading role of communities. Ultimately, leveraging this institutionalized mechanism can overcome the "last-kilometer" problem in grassroots governance and promote the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of a diversified co-governance ecosystem under Party-building guidance.

Keywords: Cadres secondment; Grassroots governance; Institutionalization

空间生产理论视域下我国城市规划与治理的策略建构

董桂彬¹

(1.河北省唐山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丰南区分局, 河北 唐山 063300)

摘要:自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历了世界历史上规模最大、速度最快的城镇化进程。在创造了举世瞩目的经济奇迹的同时,城市空间也以前所未有的力度和广度被重塑。本文旨在引入法国马克思主义哲学家亨利·列斐伏尔的空间生产理论,尤其是其核心的“空间三元辩证法”,作为分析框架,对我国城市规划与治理中存在的深层次问题进行批判性审视。文章将首先阐述空间生产理论与中国城市问题研究的理论适切性;其次,深入剖析在当前规划实践中,以“空间表象”为主导所引发的空间同质化、空间非正义与空间异化等问题;最后,基于该理论视域,探索旨在弥合理论与实践断裂、促进空间正义、重塑“生活世界”的未来城市规划与治理策略,以期构建更加公平、包容和富有活力的“人民城市”提供理论参考与实践路径。

关键词:空间生产理论;城乡规划;城市治理

DOI: doi.org/10.70693/rwsk.v1i8.1251

一、问题的提出

进入21世纪的第三个十年,中国的城镇化率已稳步攀升至较高水平。据统计,2023年中国常住人口城镇化率已达到66.16%,^[1]标志着中国的城市发展已从追求规模与速度的增量扩张阶段,逐步转向聚焦质量与内涵的存量优化阶段。在这一历史性的转型关口,过去四十年间以土地为核心要素、以资本为主要驱动、以政府为主导力量的城市发展模式所积累的矛盾与问题,正以愈发复杂和深刻的形式呈现出来。青年群体在城市中面临着高昂的生活成本与不稳定的居住环境,其发展的空间权利受到挤压。^[2]这些问题不仅是经济或社会层面的挑战,其根源更深植于我们生产、感知和体验城市空间的方式之中。

传统的城市规划理论,无论是基于功能主义的理性规划,还是侧重形态美学的城市设计,往往将空间视为一个被动、中性、等待被填充的“容器”。这种视角虽然在特定历史时期推动了城市基础设施的快速建设,但却难以解释和应对当前中国城市发展中日益凸显的社会、政治与文化冲突。它无法充分揭示空间背后复杂的权力关系、资本逻辑和社会互动,也无法有效回应普通市民对于“诗意地栖居”这一根本性诉求的向往。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亨利·列斐伏尔的空间生产理论以其深刻的批判性和独特的分析框架,为我们提供了一个极具穿透力的理论透镜。列斐伏尔颠覆性地指出:“(社会)空间是一种(社会)产品”。空间并非先验存在,而是由社会关系、权力运作和资本积累等一系列复杂的社会实践所生产出来的。他提出的“空间三元辩证法”——即“空间实践”(spatial practice)、“空间表象”(representations of space)和“表征性空间”(representational spaces)——为我们理解城市空间的生产机制提供了精妙的分析工具。

因此,本文的核心问题是:如何运用列斐伏尔的空间生产理论,系统性地诊断当前我国城市规划与治理中存在的症结?这些症结在理论视域下呈现出怎样的内在逻辑?更重要的是,基于这一理论的深刻洞见,我们能够对未来中国的城市规划与治理探索出哪些更具人文关怀、更加公正和可持续的策略路径?本文将围绕这些问题展开深入的研讨,试图将这一充满批判活力的西方理论与中国本土的城市实践进行创造性的对话,从而为中国的城市未来贡献一份具有理论深度的思考。

二、空间生产理论作为分析框架的适切性

要将列斐伏尔的空间生产理论有效地应用于分析中国城市问题,首先必须深入理解其核心概念,并阐明其与

作者简介:董桂彬(1982—),男,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为城乡规划、城乡治理

中国特定城市化语境的高度适切性。该理论的解释力，主要源于其对空间、权力、资本与日常生活之间辩证关系的深刻揭示，这恰恰切中了中国快速城市化进程中的核心矛盾。

（一）空间三元辩证法

有观点认列斐伏尔的空间理论皇冠上的明珠，无疑是其“空间三元辩证法”（the spatial triad）。这一构架将复杂的空间现象解构为三个相互关联、相互渗透且充满张力的维度，为我们提供了一个超越物理形态的、立体的空间认知模型。

首先是“空间实践”（Spatial Practice），即被感知的空间（Perceived Space）。这是与生产和再生产紧密相连的物质性空间，是人们在日常生活中所直接感知、使用和体验到的空间。它包括了城市的交通网络、功能分区、建筑布局以及居民的日常通勤、消费、休憩等一系列可观察的社会活动。在北京的城市规划案例中，“第一空间”被理解为实践中直接感知到的空间，例如居民实际的居住通勤路线和活动范围。^[3]这种空间实践保证了社会生活的连续性和某种程度的凝聚力，它看似自然而然，实则被社会结构和权力关系所塑造和规训。

其次是“空间表象”（Representations of Space），即被构想的空间（Conceived Space）。这是属于科学家、规划师、城市技术官僚和某些艺术家的空间，是他们通过知识、技术和权力建构起来的抽象空间。它以地图、规划图则、法律条文、统计数据和设计蓝图等形式存在，体现了一种理性的、同质化的、试图支配和控制空间的意图。在列斐伏尔看来，这是一种主导性的空间，它通过对空间的量化、分割和编码，服务于资本积累和国家治理的需要。中国城市规划中常见的宏大蓝图、功能分区和技术指标体系，正是“空间表象”的典型体现。有学者指出，中国城市空间设计策略（空间的表征）的单一化，正是导致城市空间同质化的重要原因。

最后是“表征性空间”（Representational Spaces），即被活生生体验的空间（Lived Space）。这是居民、使用者通过其想象、记忆、象征符号和文化意义所赋予生命的空间，是充满了情感、欲望和冲突的“生活世界”。它常常以非语言、非理性的形式存在，潜藏在“空间表象”的秩序之下，是普通人对支配性空间进行抵抗、挪用和再创造的场所。老街区里邻里交往的榕树下、城中村里自发形成的市集、青年艺术家改造的废弃厂房，都可被视为“表征性空间”的生动载体。它代表了空间的使用价值，与“空间表象”所强调的交换价值形成了鲜明的对立。学者在研究皇城根遗址公园的设计时，就强调了要关注“再现空间”（即表征性空间），并融入时间维度，以承载居民的集体记忆和行为组织方式。

这三个空间维度并非孤立存在，而是处于一个永恒的辩证运动之中。“空间表象”试图规划和控制“空间实践”，而“表征性空间”则在“空间实践”的缝隙中顽强生长，并反过来对“空间表象”的霸权提出挑战。健康的城市空间，应当是这三者动态平衡、和谐共生的结果。反之，当其中任何一维过度膨胀，压抑其他两者时，便会产生一系列城市病。

（二）理论与中国语境的共鸣

列斐伏尔的理论诞生于对20世纪中后期西方资本主义城市化的批判，但其对中国当下的城市现实却具有惊人的解释力，其适切性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首先，深刻揭示了“效率”与“人本”之间的核心张力。中国在短短几十年内完成了西方国家上百年的城市化历程，这种“压缩式”现代化不可避免地将效率置于首位。城市规划被视为实现经济增长和社会稳定的工具，其科学性、理性化和技术化特征被不断强化。然而，这种对“空间表象”的极致追求，往往以牺牲空间的社会性和文化性为代价。居民的真实需求、情感联结和文化认同（即“表征性空间”的维度）在宏大的规划叙事中被边缘化、甚至被抹去。例如，对“资本的空间生产”与中国住房问题的研究就揭示了，住房在很大程度上被视为资本增值的工具，而非安居乐业的家园。列斐伏尔的理论恰好为我们提供了一个批判性的视角，去审视这种工具理性对“生活世界”的侵蚀，并呼吁“人的权利”，尤其是“城市的权利”的回归。

其次，为分析多样的城市空间问题提供统一的解释框架。无论是新城建设、旧城改造，还是旅游开发或社区治理，这些看似不同领域的城市问题，在空间生产理论的视域下都可以被理解为“空间三元”失衡的具体表现。例如，广州恩宁路的城市更新被分析为资本主导下对原有社区生活空间的异化。^[4]这种理论的普适性使其能够穿透不同城市现象的表层，直指其背后共通的空间生产机制和权力逻辑。尽管在某些理论应用中存在对概念理解的“不精准之处”，但这恰恰说明该理论正在被中国学界深入消化和辩证吸收，其核心思想的价值依然稳固。

三、空间生产理论视域下的城市规划与治理策略

面对上述由“空间表象”主导所引发的重重困境，出路绝非简单地否定规划或回到某种田园牧歌式的想象，而在于构建一种新的、更具包容性和民主性的空间生产模式。这意味着城市规划与治理的范式需要发生根本性的转变：从自上而下的、技术官僚式的“空间设计”，转向自下而上与自上而下相结合的、多方参与的“空间共创”；从追求抽象的经济指标，转向以人的全面发展和空间正义为核心价值。基于列斐伏尔的理论启示，我们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构建未来的策略路径。

（一）重塑“表征性空间”：走向多元共治的参与式规划

困境的核心在于“表征性空间”的失语与缺位。因此，首要策略便是创造制度性的渠道和空间，让居民的“生活世界”——他们的需求、记忆、情感和创造力——能够有效地进入并影响规划决策过程。这要求我们超越象征性的听证会和公示，建立真正意义上的参与式规划机制。

第一，构建“协商-共治”的社区治理框架。在城市更新、社区规划等与居民利益密切相关的领域，应将决策权适度下放，建立由居民代表、社区组织、专业人士（规划师、建筑师、社会工作者）、地方政府和商业主体共同组成的协商平台。西安老菜场市井文化创意街区的更新治理案例提供了一个有益的探索，其通过多方参与，在一定程度上实现了文化复兴和品质提升，探索了空间正义视角下的更新路径。在这种框架下，规划不再是规划师单向的“构想”，而是多方利益主体在具体的“空间实践”中反复博弈、协商、妥协的产物。规划师的角色也应从“蓝图绘制者”转变为“社区赋能者”和“沟通协调者”，帮助居民将他们碎片化的、感性的“表征性空间”需求，转化为清晰、可行的空间改造方案。

第二，运用多元化的参与工具和技术。传统的规划语言（如总平面图、技术规范）对于普通公众而言门槛过高。因此，需要采用更加直观、易懂的沟通工具，如社区工作坊、参与式模型制作、口述史访谈、影像记录、乃至利用 VR/AR 技术让居民“亲临其境”地体验未来的空间方案。这些方法有助于将居民潜意识中的“表征性空间”显性化，使其成为可以被讨论、被尊重的“知识”。同时，要认识到不同群体有不同的利益诉求和表达能力，尤其要关注老人、儿童、低收入者、外来务工人员等弱势群体的声音，确保参与过程的包容性和公平性。“十四五”规划以来，空间治理中也开始强调发挥社会组织和公众的参与作用，让居民从被动接受者转变为参与者和创造者，这为重塑“表征性空间”提供了政策支持。^[5]第三，保护和培育自发性的“第三空间”。除了正式的规划项目，政府更应以一种宽容和支持的态度，去保护城市中由民众自发创造的非正式空间，如跳蚤市场、街头艺术、社区花园等。这些空间是“表征性空间”最富活力的表现形态，它们以一种“游击战”的方式，暂时性地颠覆了“空间表象”的僵化秩序，为城市注入了意想不到的活力和温情。规划的智慧不在于消灭这些“非正规”空间，而在于如何为它们提供必要的支持，如安全保障、卫生设施等，并从中汲取灵感，使正式的规划设计更具生活气息和人情味。

（二）弥合三元断裂：迈向空间正义的辩证规划

健康的城市空间是“三元空间”动态平衡的产物。未来的规划策略，必须致力于打破“空间表象”的单一霸权，促成三者之间的良性互动与辩证统一，并将空间正义作为规划的核心价值准则。

第一，从“空间的规划”转向“场所的营造”。这意味着规划的出发点，不应是抽象的土地利用指标和经济效益，而应是具体的“场所”（Place）。“场所”是承载了意义、情感和社会关系的空间。规划师需要像人类学家一样，深入理解一个地方的历史文脉、社会结构和居民的日常生活实践（空间实践），并以此为基础进行设计。在设计中，应高度重视那些能够激发集体记忆和认同感的元素（表征性空间），如一棵古树、一段残墙、一个老字号店铺，并将其巧妙地融入新的空间秩序中。北京皇城根遗址公园的设计研究中，强调融入时间维度来贯穿空间系统与功能变迁，正是这种“场所营造”理念的体现。通过这种方式，“空间表象”（规划设计）不再是外在于生活的强加之物，而是对“空间实践”和“表征性空间”的尊重、提炼与升华。^[6]

第二，将空间正义原则制度化。空间正义不应仅仅停留在学术讨论或道德呼吁，而必须转化为具有约束力的规划法规和政策工具。例如，在城市更新项目中，应强制要求实施“在地安置”或提供同等区位的安置房，保障原住民的居住权；在土地出让时，可以引入“包容性区划”（Inclusionary Zoning）政策，要求开发商必须配建一定比例的保障性住房；在公共资源配置上，要确保优质的教育、医疗、文化和绿地等资源在不同收入阶层居住的区域之间实现公平分配。这些政策的本质，就是利用“空间表象”（法律、政策）的力量，去纠正由市场和资本逻辑导致的“空间实践”层面的不平等，从而保护弱势群体的“表征性空间”不被侵犯。这正是对“非正义空间”的系统性矫正。

第三，倡导“过程性”和“适应性”规划。僵化的、一次性的总体规划已经无法适应快速变化的社会现实。未来的城市规划应更具弹性和适应性。这意味着规划应当是一个持续的、开放的“过程”，而非一个封闭的、终结性的“蓝图”。规划应为未来不可预见的需求和自发性的空间创造预留“弹性”和“冗余”。例如，在社区层面推行“微更新”、“小修补”，通过一系列小型的、渐进式的介入，不断优化空间品质，并根据居民的反馈进行调整。北京城市规划演变的研究显示，“第三空间”（生活体验的空间）的存在，实际上促进了“第二空间”（规划目标）的不断调整。^[7]这启示我们，应主动将这种反馈和适应机制内化到规划流程之中，形成“实践-构想-体验-再实践”的良性循环。

（三）宏观尺度的调控：国家空间战略的再定位

在宏观层面，国家层面的空间治理战略也需要进行深刻的价值重估。中国的“十四五”规划已经开始强调发展战略的空间落地，并与京津冀协同发展、长三角一体化等重大区域战略相衔接这为实现更均衡、更协调的空间发展格局奠定了基础。^[8]在此基础上，国家空间战略应进一步明确，其首要目标是保障国民平等的空间权利和促进区域间的协调发展，而非单纯追求经济总量的增长。这意味着要对地方政府以 GDP 和土地财政为核心的政绩考核体系进行根本性改革，将生态保护、民生改善、社会包容度和文化传承等指标纳入考核范围。同时，要严格控制大城市无序扩张，通过优化区域功能布局 and 加强中小城市、小城镇的公共服务与产业支撑能力，引导人口和资源在更大区域范围内的合理分布，从源头上缓解大城市内部日益严峻的空间非正义问题。主体功能区战略的持续实施，为这种差别化的区域政策提供了制度保障，关键在于如何将“以人为本”和“空间正义”的理念更深刻地贯彻到具体的区域发展实践中去。

四、结语

展望未来,中国的城市发展正站在一个新的十字路口。要构建真正属于人民的城市,就必须勇敢地告别过去那种以物为本、以增长为纲的规划范式。出路在于一场深刻的“空间革命”。通过多元共治的参与式规划,让被压抑的“表征性空间”得以复兴;通过迈向空间正义的辩证规划,弥合“三元空间”之间的断裂,即通过国家空间战略的价值再定位,从宏观上引导一种更公平、更可持续的空间发展模式。这无疑是一条充满挑战的道路,它要求规划者、决策者乃至每一位市民的空间观念发生根本性的转变。然而,正如列斐伏尔所坚信的那样,对更美好城市的追求——即争取“城市的权利”——本身就是一场创造性的社会实践。唯有在这场持续的实践中,我们才能逐步将抽象的空间转变为充满温情、记忆和希望的家园。

参考文献:

- [1] 孔祥利,王艳.空间正义视域下县域城镇化高质量发展的理论逻辑与实践进路[J].贵州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5,(01):89-99.
- [2] 张振,武嘉瑶,尚延.面向空间正义的青年发展型城市:理论阐释与实践路径[J].青少年研究与实践,2025,40(01):1-10.
- [3] 纪凤仪,周尚意.三元空间辩证法视域下的职住空间关系——以北京城市规划为例[J].天津师范大学学报(自然科学版),2019,39(05):7-15.
- [4] 茹晓琳,钱实,顾忠华.基于列斐伏尔空间生产理论的城市更新空间异化研究——以广州市恩宁路为例[J].现代城市研究,2020,(11):101-109.
- [5] 徐萍,徐静冉.空间治理的现代化:空间生产与社会治理的嵌合与统一[J].济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4,34(03):115-124.
- [6] 张妍,李宇宏.皇城根遗址公园空间环境行为组织探析[J].南方建筑,2017,(03):51-57.
- [7] 纪凤仪,周尚意.三元空间辩证法视域下的职住空间关系——以北京城市规划为例[J].天津师范大学学报(自然科学版),2019,39(05):7-15.
- [8] 樊杰.我国“十四五”时期高质量发展的国土空间治理与区域经济布局[J].中国科学院院刊,2020,35(07):796-805.

Strategic Construction of China's Urban and Rural Planning and Governance under the Framework of Spatial Production Theory

Dong Guibin¹

¹ Fengnan District Branch, Bureau of Natural Resources and Planning of Tangshan City, Tangshan, Hebei
063300, China

Abstract: Since the reform and opening-up, China has undergone the world's largest and fastest urbanization process in history. While creating an astonishing economic miracle, urban space has also been reshaped with unprecedented intensity and breadth. This paper aims to introduce the spatial production theory of the French Marxist philosopher Henri Lefebvre, particularly its core concept of the "spatial triad," as an analytical framework to critically examine the underlying issues within China's urban planning and governance. The article will first elaborate on the theoretical relevance of spatial production theory to the study of China's urban problems. Secondly, it will conduct an in-depth analysis of the problems arising from the current dominance of "representations of space" in planning practice, such as spatial homogenization, spatial injustice, and spatial alienation. Finally, based on this theoretical perspective, it will explore future urban planning and governance strategies aimed at bridging the gap between theory and practice, promoting spatial justice, and reshaping the "lived world." The goal is to provide theoretical reference and practical pathways for building a fairer, more inclusive, and vibrant "people's city."

Keywords: Spatial production theory; Urban-rural planning; Urban governance

社工站赋能基层社区治理的路径优化研究

——基于江苏省T市实证分析

张冉¹ 阚皖豫¹ 王刘飞¹

(1.南通大学管理学院, 江苏 南通 226019)

摘要:本研究以江苏省T市为例,系统探讨社工站在基层社区治理中的功能定位、实践成效及现实困境,旨在为新时代基层治理现代化提供理论参考与实践路径。通过案例研究法与定性分析,研究发现:社工站通过资源整合、专业服务供给和多方协同机制,有效提升了基层治理效能;但实践中仍面临政社关系模糊化、社工专业化不足、跨主体联动受限等核心挑战。基于此,本研究提出要明确政府与社会组织的职能边界,构建“合作式治理”模式;完善社工职业化体系,通过培训激励提升服务专业性;搭建多元主体协作平台,激活社区内外资源网络等优化策略。

关键词:社工站;社区治理;发展困境;优化策略

基金项目:国家级大学生创新创业训练计划资助项目(项目编号:202210304208E)

DOI: doi.org/10.70693/rwsk.v1i8.1271

在推动基层治理的深化过程中,社会工作的专业价值日益凸显,成为不可或缺的一环。党的二十大报告明确强调,必须“优化网格化管理架构、增强精细化服务效能、加大信息化支撑力度以完善基层治理平台,并健全城乡社区治理体系”。社工站的建设作为此战略部署中的核心要素,不仅切实解决了服务民众的“最后一道屏障”问题,更是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进程中具有中国特色的重要实践。当前,全国范围内社工站的建设正展现出“政策引领、实践驱动、模式革新、多点发展”的鲜明特点。根据民政部2024年发布的最新统计数据,目前全国已建成近2.9万个乡镇(街道)社工站,累计吸纳超过7万名专业社工入驻服务。这些扎根基层的站点通过专业化、精细化服务,有效提升了社区治理效能和服务质量。然而需要认识到,当前社工站建设在多数地区仍处于探索发展阶段,普遍存在资源整合不足、专业人才短缺、服务模式单一等现实困境,亟需通过系统性改革实现从“量的积累”到“质的提升”的跨越。

因此,本文以江苏省T市的社工站为调查研究对象,对其职能、运行情况和特色进行基本的了解,对社工站发展过程中存在的问题进行分析,探索社工站助力基层社区治理的有效路径,不仅有助于探寻社工站独特的发展道路,而且对我国治理能力和治理体系现代化的推进具有深远的理论价值和实践意义。

一、社工站功能定位

社工站是党和政府领导下的,依靠社区力量,利用社区资源,强化社区功能,解决社区问题,促进社区政治、经济、文化、环境协调和健康发展的平台。它是将民生工作精准落实到基层和群众的重要载体,是夯实基本民生保障、提升基层公共服务、创新基层社会治理的重要手段。社工站作为“五社联动”工作机制的载体,为特殊困难群众和有需求的居民提供多样化、精细化、专业化服务的基层治理平台,有助于建设社会治理共同体,推动达成美好社区愿景。随着乡镇社工站建设的加快推进,全国各地积累了丰富的实践经验,形成了主要以湖南、广东部分地区为代表的社工站发展模式,包括:治理为本、组织为用的广州模式;行政嵌入、人才建设的广东“双百”模式;规范管理、经办服务的“禾计划”模式^[1]。同时也有学者将全国各地的发展模式概括为:政府统筹与专业支持

作者简介:张冉(2002—),女,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为基层治理;
阚皖豫(2002—),女,本科,研究方向为基层治理;
王刘飞(1989—),女,博士,副教授,研究方向为基层治理。

通讯作者:王刘飞

下的广东“双百工程”；购买服务并培育本地人才的湖南“禾计划”；基层行政主导模式：混合模式等四类^[2]。还有部分学者从行政工作与专业服务角度，将社工站的模式分为行政性社工站、专业性社工站，行政与专业融合发展三种，而这三种模式也常常被称为“内嵌式”、“下沉式”、“桥接式”^[3]。

社工站功能定位主要有：一是弥补民政力量不足，提高基层治理效能。在每个乡镇、街道统一设置社工站，可以破解社会工作区域发展不平衡的瓶颈，推动社会工作的全面发展，同时能够充实基层民政服务力量，破解基层民政服务力量薄弱的难题，为民政事业专业化、精细化发展提供人才支撑。社工站建设的核心理念在于承担并加强民政部门在公共服务领域的职能，以弥补基层民政力量的不足^[4]。同时，社工站需深入社区内部，细致分析社区组织和居民的实际需求，积极向政府反馈社区意见与服务需求等信息，协助政府持续优化公共服务政策与规划，以实现更为精准和有效的社会治理效果。

二是培育社工专业人才，改善基层治理格局。社会工作与基层治理、民政工作紧密相连，互为支持。从社会工作发展的视角审视，社工站的设立对于培育一支稳定的、深入基层服务的人才队伍具有重要意义，不仅能够推动社会工作机构、支持平台和实务的本土化进程，还进一步巩固了社会工作事业的基石^[5]。在乡镇社工站的实际运作中，工作人员需具备多重素质，包括专注于民政工作，秉持先进理念，展现人文关怀，发挥专业优势，保持活力，并融入真挚情感。这样的基层工作者能够确保乡镇社工站实现精细化、专业化的运作。因此，社工站是基层治理中不可或缺的人才储备库，为基层治理的良性发展提供了强有力的专业支持。三是提升自身服务水平，创新基层社区治理。社会工作的核心理念、实践内容及其方法，与党和政府的宗旨原则及十九大提出的民生改善、社会治理创新以及共建共治共享的社会治理体系构建目标高度契合。在当前阶段，社工站的建设承担着“巩固脱贫攻坚成果，推动乡村振兴战略深入实施”的重要使命。

二、社工站助力基层治理的实践概貌

（一）案例地社工站简介

本研究的研究方法是案例分析法，现在的案例为江苏省Y市。T市自2008年起，积极构建了新颖的政社合作模式，极大地增强了基层治理的力量。2020年开始基于“邻里家园”项目积累的丰富经验，T市全面启动了乡镇社工站的建设工作，展示了清晰的发展规划与精准的功能布局，特别凸显了“融合共治”的鲜明特色。在社会工作服务领域，T市取得了显著成就，建立了市级社会工作服务指导中心，并在其下辖的九个乡镇（街道）中设立了社工站。为了进一步拓宽基层社工服务的覆盖范围，自2021年起，T市将乡镇社工站的建设置于核心地位，并正式投入运营T市社会工作服务指导中心，由T市DYS社会工作发展中心负责其日常管理。该中心通过接单自办、任务转派、专家咨询、督导协作等多元化职能，有效整合了多方资源，运用专业的社会工作方法为当地困难群体提供了多元化的服务支持。

在实践环节中，T市以数据驱动为先导，显著提升了服务治理的精准性。具体而言，该市利用联动中心搭建的居民需求处理网络平台，将社会工作服务模块融入其中，实现了从居民需求识别到社工服务响应的全流程线上化、高效化流转，从而确保了服务供给与居民需求之间的精准匹配。通过明确15类重点特殊服务对象，采用标准化的服务流程，建立了多元化的服务机制，实现了需求的快速响应和服务的及时提供。此外，社工服务记录表单的纳入也提升了服务效能，确保了流程的专业性。

社工站建设的最终阶段着重于构建三级平台体系，并强化“五社”联动，以构建一个高效协同的服务生态网络。作为一项系统创新工程，T市注重整体性、系统性的规划，建立了由“社会工作服务指导中心”、“街镇社工站”和“社区社工室”组成的三级组织架构，并明确各级组织的功能定位与职责目标。通过深化“五社”力量的融合与联动，社工站内设立了“邻里社团发展中心”和“社区生活服务中心”两大功能区域，前者专注于社会组织的孵化与培育，后者则聚焦于提供专业的社工服务，进一步推动社区治理与服务质量的提升。

（二）社工站提升基层治理的成效

一是建立数字化平台，提高服务的及时性。在推动社会工作专业化的道路上，T市策划了县域社区与社会组织服务中心以及社区社工室的组织架构，构建了一个互补性强、协作紧密的组织网络。通过这一创新模式，成功构建了一个由“县级—街镇级—社区级”三级联动的社会工作服务体系，有效促进了社会工作服务在基层的落地生根和高效运作。为了提高服务效率与品质，社区社工室驻点的专业社工、网格化管理人员、楼栋负责人以及村（居）民自治组织的领导者等基层自治力量，通过协同合作，成功研发并推出了一套先进的“社区服务管理信息化系统”。该系统聚焦于优化“任务实施”的流程管理，采用了一种“网格化需求甄别、平台协同任务分配、指导中心集约化处理、社工机构精确响应”的运作机制，确保了从需求识别到服务供给的整个过程能够在线上实现高效协同与无缝对接。这一创新实践显著增强了服务的即时性和精准性，为社区居民提供了更加便捷、高效的社会工作服务体验。

在系统派发任务后, 驻站社工必须迅速行动, 确保在 24 小时内启动服务响应机制。对于个案服务, 他们要在规定的 60 天期限内, 实现闭环处理的全面完成; 而对于小组服务的相关流程, 则要在 80 天的时限内确保整体流程的顺畅执行。自 2021 年 3 月社会工作服务指导中心正式启动运营以来, 已独立处理案件 89 起, 并通过转派机制协助解决了 1660 起案件, 其中街(镇)社工站高效接办并妥善处理了其中的 1373 起案件, 充分展现了其高效、专业的服务能力。

二是扩大服务半径, 提高社工站服务能力。在服务对象的选择上, T 市民政局将社工站作为重要平台, 其覆盖范围不仅涵盖了传统的民政领域服务对象, 如低保低边家庭、困境儿童和空巢独居老人, 而且致力于拓展服务边界, 涵盖了医务、教育、公安、司法等多元领域, 体现了服务的广泛性和深度, 进一步将服务范围扩展至精神残障群体、司法矫正对象和社区戒毒人员等更广泛的受众, 彰显了服务的全面性与包容性。这种举措不仅彰显了民政部门的社会责任感和使命感, 也为构建更加和谐、包容的社会环境贡献了重要力量^[6]。在楼栋长、综治网格员以及社会组织的紧密合作与协同下, T 社工的服务领域得到了显著的拓展, 实现了服务对象的全方位覆盖。同时, 服务流程也得到了深度的精细化调整和完善, 进一步提升了服务的效率与质量。以 T 市 DYS 社会工作发展中心为例, 作为 T 市首个获得 5A 级认证的社会组织, 其团队由超过 800 名专业人员构成, 已经推出超过 80 项多元化养老及社工服务项目, 长期为全市逾 5 万名老年人提供专业化、人性化的服务。另一卓越典范是 T 市启航青少年事务服务中心, 该中心在青少年服务领域表现卓越, 已经成功开展 805 例青少年个案服务, 举办了多达 10,684 节的爱心课堂, 这些服务惠及了超过 25 万名青少年及其家庭, 为他们的健康成长与全面发展提供了坚实的后盾。

三、社工站助力基层治理面临的困境

(一) 政社界限模糊, 趋于行政化

一是政府和社工机构在社工站的设计、建设和服务中所追求的目标不一致, 产生了目标差异。社工站的建设旨在提供社会工作服务, 以满足社会公众的需求, 然而在实际的建设过程中, 政府更加关注政治宣传和形象建设, 社工机构更加关注社会问题的解决和服务对象的福利。以 T 市社工站为例, 政府更希望通过社工站的建设来宣传政府, 宣传政府的扶贫、民生政策有多好, 怎么利民, 以及如何搭建专业的社会工作人才队伍, 培育专业的社会工作服务机构, 提高政府在民众心目中的形象, 同时希望大力宣传 T 市的社工站, 做到领先的位置, 让大量的机构来参访学习, 但此时 T 市社工站就会花大量的精力去准备, 有时整整一天或者两天都只在做接待参访这一件事, 最长的一次准备时间花了将近一个礼拜, 严重影响了社工站的工作进度。而 T 市的社工站更希望通过社工站的建设, 解决社会问题, 帮助服务对象实现自身的发展和福利, 对在服务对象的需求更加敏感, 容易忽视政治宣传和形象建设。这种目标差异会导致社工站服务的偏离和失衡, 影响社工站的服务效果和社会影响力。

二是行政事务繁重, 服务空间缩减多。T 市社工站的工作人员除了完成本职工作外, 还会经常被要求完成街道交办的其他民生服务工作, 此举虽然有助社工快速熟悉民政工作和服务对象, 但也面临着被过度“行政化”的问题^[7]。T 市社工站的工作人员本身就少, 经常出现名义人数和实际工作人数不一致的情况, 与此同时, 仅有的少数社工不仅要在工作时间完成乡镇安排的任务, 还要在业余时间继续帮镇里做其他事情, 导致工作量大大增加, 专业服务质量下降, 出现工作台账资料有点搞模糊, 为了指标而开展工作, 服务过程充满功利性的情况。当社工被过度“行政化”时, 就会忽视自身的专业价值, 压缩原有的专业发展空间, 削弱社工的专业自主性, 不利于社工站的专业化发展。

三是制度建设缺乏。当前, 乡镇社工站建设在制度层面遭遇的主要挑战有: 第一、全国性的指导性政策文件尚未确立, 缺乏统一的引导原则和规范准则; 第二、社工站建设资金管理使用方面尚未形成完善的方法, 影响了资金的合理分配和高效利用; 第三、社工站服务标准和评价体系等制度性规范尚未健全, 使得服务质量的量化评估面临困难。

(二) 社工专业化水平低, 服务效果弱

一是“引才”难度大。为了保障社会工作服务的质量, 各地在社工站承接方的服务人员构成上均设立了严格的资质标准, 主要适用于持证社工或具备社工专业教育背景的人员。截至 2024 年, T 市在社工人才培养方面取得了显著成效, 已成功培养了持证社工共计 1624 人, 其中包括 4 名高级社工师、336 名社会工作师以及 1284 名助理社会工作师, 这一成就使得 T 市每万名户籍人口中拥有持证社工的数量达到了 31 人, 进一步彰显了其在工作领域的专业实力。然而, 在实际情况中, 受限于社会工作岗位的拓展、薪酬结构、社会认知度等因素, 社工专业的毕业生选择从事本专业的比例极低, 导致行业吸纳的人才匮乏^[8]。这些新加入的社工大多缺乏必要的专业背景和实践经验, 即所谓的“零基础”社工, 他们的专业服务能力和知识储备存在显著不足。尽管针对此类问题开展了多项专业培训, 但往往数量多且质量参差不齐, 难以确保社工站在实际运作中能够充分发挥应有的功能和作

用。

二是人才流失率较高。T市社工职业发展尚显稚嫩,这与社工机构的不稳定、非持续性的发展态势以及职业发展晋升机制的不足密切相关,从而导致了社工专业人才的流失率较高。这种流动性不仅体现了行业内的动态变化,也反映了当前社工领域在稳定性和常态化管理方面面临的挑战。加之社会对社工人才的认同感低,社工的各项福利待遇也较差,激励措施不够精准高效,晋升渠道少且难,竞争机制存在明显问题,使得大部分社工人才的职业归属感和工作积极性不断降低,最终离开社工行业。对当前在职社工进行职业生涯规划调查中,发现仅有41.12%的社工表达了继续留在社工行业的意愿,剩余超过半数的社工要么对自己的职业道路没有进行明确的规划,要么打算离开社工这一行业。在T市,社会工作者的月薪普遍在2000至3000元之间,尽管T市针对社工制定了一系列政策补贴,但这些优惠措施主要集中于社工行业中的杰出领军人才和重点人才,缺乏普惠性。因此,在薪资水平相对较低和工作强度不断增大的情况下,许多一线社工选择转行,进一步加剧了社工市场人才的短缺状况。

三是专业人才较少。社会工作者在提供服务时,需根据目标群体的具体需求,选择实施个案工作或是小组工作。同时,他们在为案主服务的过程中,需不断变换角色,并竭尽所能为服务对象提供支持。这种专业性不仅体现在服务的多元化上,更在于社会工作者在每个服务阶段都能深入理解受助者的需求,从而为他们提供更加精准和有效的服务^[9]。然而目前多数社工并未具备专业的学术背景,在专业知识、方法和技巧方面存在显著的欠缺,同时缺乏相应的资格认证。因此,在为居民提供服务时,往往难以展现出专业的水准,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服务的质量和效果。在针对T市机构内在职社工的调研中,数据显示仅有35.51%的社工接受过相关的专业教育。相对而言,高达64.49%的在职社工则非社工专业出身,未曾接受过社工领域的相关教育。在服务实施过程中,有31.77%的社工自评专业能力较强,但高达68.23%的社工认为自身专业能力尚显不足,需要进一步的提升和完善,这一发现凸显了社工在专业能力提升方面的迫切需求。

(三) 多方联动困难,可利用资源有限

社工站“自上而下”的发展模式决定了政府、社区和社工机构掌控着社工站生存与发展的核心资源,并具备较强的资源调配能力,社工站在这一体系中,处于从属地位。社工站若失去政府、社区及社工机构在人力、物质和技术上的支持,社工站的运营将面临严重挑战,甚至可能面临解体。然而,与社工站对资源的迫切需求相比,政府、社工机构和社区对于社工站提供的资源的需求则呈现出一种更高层次的发展性特征。社工站在这种模式下,为求生存与稳定,往往需作出一定妥协,这可能导致其逐渐陷入一种附属性的发展困境,资源控制力减弱,从而引发额外事务的增加、行政化趋势的加剧以及专业性的削弱。T市社工站的建设经费完全依赖于T市民政局的拨付,且双方在政府采购计划中明确规定了经费的使用规则。除了资金上的依赖,社会工作服务中心在面临身份认同和专业质疑时,也常借助政府的权威来保证服务的顺利推进,这反映了在现行体系下,政治合法性对于基层社会组织工作顺利开展的重要性和制约性。

社工站的存续与繁荣离不开与周围环境的深入交融,其效能的发挥更是根植于它所嵌入的社交网络之中。然而,当前基层主体在赋能能力上存在显著的局限,且对社工站的理解与认知亦有待加强。受自上而下建设路径的影响,社工站在基层的地位尚未得到广泛认可与确立,其专业力量和资源获取能力受到限制,导致社会认同度较低、支持网络较为薄弱,社工站的独立价值亦未能得到充分认可^[10]。此外,基层主体普遍缺乏强烈的公共意识,明显受到利益驱动和权力依赖的影响,这极大增加了社工站在资源整合和多元主体协作中面临的障碍,难以有效整合各方资源形成合力^[11]。T市社区居民对社区活动的参与度普遍较低,多数居民缺乏强烈的社区共同体意识,往往认为社区居委会发起的集体活动和讨论会议仅是行政层面的任务,其参与与否并不重要,使得这些活动往往形式重于内容。

在推进社工站协同治理的进程中,要实现精准的运作判断与定位,各相关主体必须构建有效的信息共享机制。然而,当前的核心挑战在于缺乏成熟的信息技术支撑和完善的信息披露制度,致使社工站的信息共享机制尚不具备实施的现实基础,信息不对称问题依然普遍存在,不仅严重阻碍了各主体之间的有效沟通与资源共享,也极大影响了彼此间的沟通效率,成为制约协同治理深入发展的主要障碍。此外,在实际操作中,社工站的相关主体在沟通协调机制的建设上亦存在不足。当前,各主体之间的沟通仍然显得片面和单向,缺乏有效的交流互动平台,导致联动合作的需求在信息传递和对接上遭遇瓶颈。

四、以社工站建设促进基层治理高质量发展的策略

(一) 理清政社间的关系,找准边界线

首先,各方明确自身定位,发挥专业优势。为确保社工站的持续稳定与高效运作,在与社区互动过程中必须保持其独立性和自主性。社工站并非仅仅是街道或社区居委会的协助者,而应拥有自身明确的服务界限和专业化标准,确立清晰的角色定位。政府购买社工站提供的专业服务,实质上是一种基于平等原则的契约式合作关系,而非传统的、由政府向社工站提供的单向性支持或恩赐。因此,需要转变政府工作人员对社工站的认知,避免将其视为行政体系中的“下属”,而应视为平等的合作伙伴。在释放更多资源与支持的同时,减少不必要的行政干预与“控制”,确保社工站能在基层社会治理中发挥其独特优势,形成多元主体间的协同参与。这样才能打破传统的行政壁垒,构建平等的政社关系,推动乡镇社工站的长远发展。

其次,转变现有管理模式,让渡专业空间。社工站作为发挥五社联动机制的重要载体,其直面服务对象需求的专业优势十分突出,但在开展服务的过程中仍表现出政社合作目标差异、行政事务繁重、专业服务空间缩减、

制度建设不完善等问题。社工站并未与政府、街道形成平等的合作关系,而处于被支配地位,这导致社工站服务能力受限,服务质量下降。因此,要想实现社工站的深度嵌合和稳步发展,政府层面须改变其管理方式,摆正自身定位,以合作为主要目的开展日常管理工作,明确自身职责范围,尊重社工站的独立性与专业性,考虑社工站的现实诉求与愿望,并在社工站需要时,从政府层面帮助其嵌入社区,增强社工站在社区治理与社区服务中的话语权和影响力,给社会工作专业服务让渡更多的权利和空间。

第三,加强政府监管力度。目前,基层政府普遍对社会工作的认知度不高,对专业服务的关注度不足,将社工当作“临时工”使用,或借调到相关工作以外的工作岗位,压缩了社工的专业服务实践空间。政府主管部门应成立相应的监测管理队伍,采用定期、随机检查、实地调研等监管手段,督促乡镇社工站落实各项政策。在评估社工站时,除了对服务文书进行细致审查外,还需特别关注社工站的人员配备情况,以确保社工拥有足够的工作空间来开展专业服务,这一举措不仅有助于社工在基层服务中充分发挥其专业优势,还能实现“专人专岗”,进而保障社工站的规范运作和高效运行。同时,政府还应将社工知识纳入各级单位、部门的教育培训课中,通过提升基层干部对社工专业性的认识,帮助基层干部厘清社工站的行政工作与专业服务工作定位,培养具有社工情怀的基层干部,推动行政工作与专业服务的有机融合,从而把准社工站专业化发展方向。

(二) 加大人才培育,完善激励机制

首先,建立专业培训体系,营造良好氛围。通过社区治理专题培训、跟岗社工的带教督导、先进地区实地学习的小班精训、实务技能比赛的竞技实训等方式,向社工普及专业知识,提升社工队伍的整体专业素养,助力社工快速适应岗位工作。建立起分类培训制,根据社工不同成长阶段的实际需求,实施精准再教育,鼓励社工在行业内参与互动学习,多与同事沟通,分享各自工作经验,积累服务经验,提高专业服务技能。为确保培训的有效性,要建立起培训效果评估机制。采用多种方法加强对社工学习成果的检验,了解社工对培训内容的理解与应用情况,针对培训评估中发现的问题以及社工的反馈意见,及时调整后续的培训内容或形式,更进一步健全社工的培训机制。

其次,完善社工激励机制,丰富晋升渠道。要加强对社工的培训和继续教育。鼓励社工继续学习知识、提升学历,加强专业知识的掌握,多多参加社工和心理咨询师等考试,通过这些考试的人可以获得一次性奖励。要提高社工的工资福利,由第三方根据社工学历、职称、工作年限、绩效等,制定适当的薪酬标准,全额缴纳五险一金,提供相关社会福利,建立健全的社工激励机制。同时,要建立社工职业晋升机制,畅通晋升渠道,丰富晋升机会,提高驻站社工的职业认同度,激发驻站社工的工作责任心和积极性,增强社会工作者的职业自信和专业自信。

第三,加强多方资金扶持,提供政策支持。为确保社工站的持续稳健运营,资金支持的强化至关重要。上级政府应坚决履行政策实施的责任,为社工站提供全面而有力的政策导向和扶持。同时,下级政府亦需对服务流程进行持续优化,提升服务效能,确保政府资金能够按时、足额地拨付到位,为社工站提供坚实的托底服务保障。同时社工站也要积极与政府以外的资金方进行沟通交流,发挥优势,达成合作,丰富资金来源渠道,提高自身的造血能力。优化配套支撑机制。在社工技能发展阶段和服务发展需求方面,制定中长期社工人才发展规划以及培养方案,鼓励社工掌握专业知识和技能,丰富专业技能发展的内生资源。同时完善乡镇各类社会工作站制度系统,建立健全社工站建设指导规范性文件、社工站服务标准、社工站服务评价标准等制度性规范,为一线社工创造专业和职业发展空间,提高一线社工的职业成就感,保障社工站的长效发展^[12]。

(三) 加强多方联动,充分利用资源

首先,发挥自身的优势,丰富拓展有效资源。资源是社工站生存与发展的基础。作为非营利性组织,社工站在解决资源来源的单一性上不能完全像其他营利性社会组织那样依靠联盟、兼并、合并等方式管理外部环境的需求,但社工站的持续、良好运行离不开资源控制力的提升。在建设初期社工站过度依赖于政府、社区、社工机构等主体,且这些主体掌握着社工站的关键资源,此时社工站处于附属位置的局面是不可避免的,但在政策的推动与资本的积累下,社工站可以利用好已积累的资源以及探索其他渠道获取资源,进而增强对资源的掌控权,降低对原有资源的依赖性。除此之外,社工站可利用自身优势对身边的资源进行拓展和整合,积极与相关社会公益组织或职能部门合作,通过适当的方式发挥自身优势,采取积极策略,发挥资源链接者的作用^[13]。

其次,加强站点间联动,建设长效服务体系。资源依赖理论指出,相较于单打独斗,组织在形成联盟时能释放出更强大的力量。在符合相关规定和标准的框架内,若社工站之间能够构建紧密的合作关系,逐步实现规模化与组织化,将显著提升社工站的公信力、社会影响力及其在社会议题中的话语权。这种合作不仅有助于社工站自身的发展,还能更好地服务于社会,提升整体的社会福祉。我国社工站在建设初期还未形成成熟的社会服务体系,在实际运行中深入基层解决社会问题、回应民众需求仍然面临着许多复杂的情况,如果鼓励发展不仅效率低,还可能形成不良竞争。因此在政府、社工机构、社区等对社工站提供资源有限的情况下,社工站可以搭建合作平台,交换信息,遇到难以解决的困境集思广益,探索出合适、长效的服务体系。

利用数字化技术,打造信息共享平台。在社工站建设中,建立信息共享平台,促进资源的共享和互通互联,提高工作效率和质量。信息共享平台包括社工站内的信息共享平台和社工站之间的信息共享平台。社工站内部信息共享平台,通过构建内部网络架构,不仅能够加强各部门之间的沟通与协作,还能显著提升工作效率并确保信息安全。社工站之间的信息交换平台可以建立统一的信息平台,整合各社工站的信息,促进社工站之间的信息共享,避免信息壁垒和信息障碍。在此基础上加强考核评价,建立一些数据共享和分析机制,实现资源的优化共享和配置,提高工作效率和质量,同时完善一些评价机制和信息公开发布机制,提高社工站之间的协作效率和工作

质量,推动社会工作事业的发展。

参考文献:

- [1] 徐盈艳. 协同整合:乡镇(街道)社工站的角色与功能探索[J]. 华东理工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23, 38(3): 12-25.
- [2] 尹忠海, 陈颖洁. 乡镇(街道)社工站的发展类型与融合路径——基于新公共管理视野的反思[J]. 社会工作, 2023, (1): 72-86+109.
- [3] 韩江风, 韩 恒, 张明锁. 科层为体, 项目为用: 融合式社工站运行模式研究[J]. 社会建设, 2023, 10 (06): 139-158.
- [4] 任文启, 顾东辉. 基层治理专业化视野下社会工作站建设的进程、困境与实践策略[J]. 社会工作与管理, 2022, 22(06): 50-59.
- [5] 陈 涛. 浅谈广东社工“双百计划”的四大意义[J]. 中国社会工作, 2017, (28): 30-31.
- [6] 张跃忠. T 社工站发展:专业本位、整全服务[J]. 中国社会工作, 2022, (19): 33-34.
- [7] 曹 迪, 吴玉娟. 乡镇(街道)社工站发展困境与对策的个案研究——以广东“双百工程”J市L街道社工站为例[J]. 佛山科学技术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 2024, 42(01): 66-71.
- [8] 黄 禹. “弱整合”:条块关系视角下乡镇社工站的运作机制[J]. 社会工作, 2023, (4): 64-76+107-108.
- [9] 刘 振. 走向实践自觉:社工站的实践困境与优化路径——基于 W 镇社工站实践的思考[J]. 内蒙古社会科学, 2024, 45(1): 198-205.
- [10] 高长风. 乡村振兴背景下乡镇社工站参与乡村治理的作用及困境研究[J]. 农村实用技术, 2024, (01): 57-59.
- [11] Kim Booyuel, Lee Junesoo, Chung Jongwoo. Double-edged cohesion: multidimensional impacts of community governance's cohesion in community-driven development[J]. Community Development, 2021, 52(4).
- [12] 侯国凤. 乡镇社工站一线社工专业能力提升策略研究——以湖南省基层社工站“禾计划”为例[J]. 长沙民政职业技术学院学报, 2022, 29 (04): 23-25+67.
- [13] 李文静. 社会工作在社区治理中的功能反思与优化路径[J]. 探索, 2023, (2): 152-162.

Research on the Path Optimization of Social Work Stations Empowering Grassroots Community Governance: An Empirical Analysis Based on T City, Jiangsu Province

Zhang Ran¹, Kan Wanyu¹, Wang Liufei¹

¹*School of Management, Nantong university, Nantong, JiangSu 226019, China*

Abstract: This study takes T city in Jiangsu Province as an example to systematically explore the functional positioning, practical effectiveness, and realistic dilemmas of social work stations in grassroots community governance, aiming to provide theoretical references and practical paths for the modernization of grassroots governance in the new era. Through case study and qualitative analysis, the study finds that social work stations have effectively enhanced the efficiency of grassroots governance through resource integration, professional service provision, and multi-party collaboration mechanisms; however, they still face core challenges such as the blurring of government-social organization relations, insufficient professionalization of social workers, and limited cross-subject collaboration. Based on this, this study proposes to clarify the functional boundaries between the government and social organizations, construct a "cooperative governance" model; improve the professionalization system of social workers, enhance service professionalism through training incentives; and build a multi-subject collaboration platform to activate community internal and external resource network optimization strategies.

Keywords: Social work station; community governance; development dilemma; optimization strategy

婚姻纠纷中裁判设立居住权之探究

杨皓媛¹

(1. 中央民族大学, 北京 海淀 100074)

摘 要: 离婚纠纷中, 法院是否能以判令设立居住权? 这一问题在学理和实务中均存在较大争议。本文认为, 在离婚纠纷中, 裁判设立居住权具有正当性与必要性。离婚经济补偿、夫妻共同财产分割、离婚经济帮助等制度为其提供了可行性路径。然而, 司法实践中常出现事实认定困难、法律适用模糊等问题, 应当以“满足生活居住的需要”为核心, 首先明确婚姻纠纷中裁判设立居住权的适用主体为自然人, 包括居住权人及其共同生活居住之人; 适用客体为住宅, 且及于住宅的一部分, 但需排除在建的预售商品房。其次, 基于三种制度设立目的的偏向, 确定在不同情况下裁判设立居住权的期限。

关键词: 民法典; 婚姻纠纷; 居住权; 裁判设立

DOI: doi.org/10.70693/rwsk.v1i8.1311

一、问题的提出

居住权制度滥觞于罗马法, 其设立目的在于保障特定人的居住利益^[2]。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以下简称《民法典》) 未颁布之前, 民事法律体系及其相关裁判规则鲜有关于居住权的规定, 2002 年《物权法 (意见征求意见稿)》中曾提及设立居住权, 但当时的主流观点认为“居住权制度涉及的内容多为亲属、婚姻等内容, 可由目前立法体系进行调整, 无须再单独立法”^[3], 居住权制度经多次审议后被暂时搁置。不可否认的是, 居住权益的保障依旧是重要的、亟待解决的民生问题, 因而《民法典》终以专章六条的方式将居住权制度确立于物权编之中。依据我国《民法典》第 367 条和第 371 条规定, 居住权可以通过合同和遗嘱两种方式加以设立, 但司法实践中, 尤其是在离婚诉讼中, 依旧存在法院裁判一方当事人设立居住权的现象, 在缺乏法律明确规定的情况下, 法院是否能以判令设立居住权? 这一问题在学理和实务中均存在较大争议。

持反对观点的学者认为, 《民法典》对居住权设立方式乃封闭式列举, 也即无论是基于合同而设立还是基于遗嘱而设立, 均为意定物权, 因此法院不能在无当事人合意的情况下以裁判方式设立居住权^[4]。而支持的学者认为, 一方面, 从体系性视角出发, 《民法典》第 229 条为法院裁判设立居住权提供了法律依据, 其并不违反物权法定原则^[5]。另一方面, 裁判设立居住权是长期形成的司法惯例, 且其现实需求也愈来愈强烈^[6]。也有学者认为, 在离婚诉讼中, 婚姻住宅的非产权方、高龄生存配偶居住权益也需通过裁判设立居住权加以救济。^[7]不管争议如何, 裁判设立居住权具有一定的价值性与合理性, 但其适用依据、适用范围、适用条件等问题均无定论。基于此, 本文试图从婚姻纠纷角度, 厘清两个问题: 一是婚姻纠纷中裁判设立居住权的逻辑证成; 一是对裁判设立居住权的适用问题进行探讨。

作者简介: 杨皓媛 (2000—), 女, 硕士研究生, 研究方向为民事诉讼法。

^[2] 参见刘家安:《民法物权》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 2023 年版, 第 226 页。

^[3] 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工委民法室编著:《物权法立法背景与观点全集》法律出版社 2007 年版, 第 49 页。

^[4] 参见申卫星:《〈民法典〉居住权制度的体系展开》,《吉林大学社会科学学报》2021 年第 3 期;林洋、唐万钰:《我国居住权制度的解构模式及其规则重释》,《学术探索》2021 年第 7 期。

^[5] 参见黄薇主编:《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物权编解读》,中国法制出版社 2020 年版,第 552 页。

^[6] 国家法官学院、最高人民法院司法案例研究院编:《中国法院 2022 年度案例》(第 1 册),中国法制出版社 2022 年版,第 20 页;转引自陈晓敏、张锐容:《离婚诉讼中通过裁判设立居住权问题研究》,《人民司法》2024 年第 1 期。

^[7] 前引[13], 封子路文。

二、婚姻纠纷中裁判设立居住权之证成

(一) 婚姻纠纷中裁判设立居住权具有正当性

1. 规范基础：源于传统罗马法中的体系定位

在罗马法中，役权有地役权与人役权之分，所谓人役权，是指为特定人的利益而利用他人所有物的权利，即以他人的物供自己使用和收益的权利^[8]。居住权显然属于人役权，罗马法中对其的规定主要包括：(1) 居住权是受遗赠人终身所享有的权益；(2) 居住权人的权利范畴限定于自身及其妻子、子女、被释自由人，以及类似其奴隶且供其使用的其他自由人；(3) 居住权不得转让给第三人，并且不会因未行使或人格减等情况而终止；(4) 居住权人有权将其居住权进行出租。^[9]欧陆国家的民法典基本继受了罗马法的精神，以德国为例，《德国民法典》于物权编“限制的人役权”一节中规定了居住权，同时也在《住宅所有权及长期居住权法》中对居住权进行了详细规定^[10]。实践经验表明，居住权在物权体系中的合理定位与完善规定，对于保障社会弱势群体的居住权益、维系家庭关系稳定以及促进社会公平正义具有不可忽视的重要意义。

2. 立法目的：居住权的功能与价值

我国《民法典》虽然未在人役权的概念框架内界定居住权，但在立法选择上，《民法典》总体上是按照人役权的法律属性对居住权进行了规定。^[11]《民法典》第 366 条规定：“居住权人有权按照合同约定，对他人的住宅享有占有、使用的用益物权，以满足生活居住的需要。”^[12]作为一种生活性用益物权，居住权与其他用益物权存在明显的区别：(1) 居住权具有强烈的人身属性，其通常是所有权人为与之有特殊关系的人而设立的权利，包括但不限于近亲属、非婚生子女等具有广义家庭关系的人。同时，基于《民法典》第 396 条、第 370 条规定，亦可知居住权具有人身专属性，不得转让、不得继承。(2) 居住权具有家庭伦理扶助性，从《民法典》第 368 条来看，居住权的设立以无偿为原则，有偿为例外，其具有扶助、赡养、关怀的权利特征，主要涉及居住他人房屋以满足其基本生存需要的老年人、妇女及未成年人等特殊群体，具有保护弱者权益的制度特点。^[13]基于居住权这一家庭保障功能以及特征，不难看出居住权具有社会保障功能，相比于因债权债务关系而产生的房屋租赁，居住权具有较强的物权效力，换言之，居住权人对房屋的占有、使用受物权法规保护，能够有效规避所有权人和第三人侵犯其合法权益的风险^[14]。此外，居住权期限可由当事人约定或依遗嘱而确定，居住期限甚至可及于居住权人终身，相比于《民法典》认可的最长时限为 20 年的房屋租赁期限，其提高了权利人居住利益的稳定性，能更好地保障居住权人的生活安宁。

(二) 婚姻纠纷中裁判设立居住权具有必要性

1. 立法缺位：意定设立居住权的局限性

《民法典》物权编中的居住权强调“意定”设立，也即需基于物权人的真实意思表示而为他人设立居住权，这种设立方式明显存在局限。如上所言，居住权制度的首要功能在于维护特定群体生存和发展的权益，若物权人未与另一当事人达成合意，或者不主动为特定群体设立居住权，那么弱势方的权益难以得到有效保障^[15]。婚姻纠纷中，双方当事人常因情感破裂等原因难以事先通过协议确立居住权。即便存在遗嘱设立居住权的情形，也可能因遗嘱订立时未充分考虑婚姻关系会产生变化而无法保障当事人的居住权益的情形。此时，物权编对意定居住权效力的确认，对非合意的婚姻关系下的非产权方的权益保护可能力有不逮，^[16]需承认《民法典》在此种情况下法律缺位，不符合从规范性整体关系中推导出的立法目的^[17]。可以说，正是由于当事人无法就具有居住需要的涉案房屋达成协议，才有了裁判设立居住权的需求，其可依据实际情况与公平原则，灵活保障各方在婚姻纠纷中的居住权益。

^[8] 参见周相：《罗马法原论》（上册），商务印书馆 2016 年版，第 414 页；转引自张叶东：《论我国法定居住权制度之构建——兼评《民法典》物权编中的居住权条款》，《中国不动产法研究》2020 年第 1 期。

^[9] 同上文。

^[10] 前引[1]，刘家安书，第 227 页。

^[11] 同上文。

^[12]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第 366 条。

^[13] 崔建远：《物权：规范与学说——以中国物权的解释论为中心（第二版·下册）》，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 2022 版，第 150 页。

^[14] 付子堂，付承为：《〈民法典〉居住权制度的社会功能研究》，《甘肃政法大学学报》2022 年第 1 期。

^[15] 封子路：《婚姻关系下居住权的裁判设立》，《求索》2023 年第 6 期。

^[16] 同上文。

^[17] 参见路鹏宇：《论裁判设立居住权的正当性依据与司法逻辑》，《中国不动产法研究》2024 年第 1 期。

当然,从法律漏洞认定逻辑角度而言,法律规范的缺失并不必然等同于存在法律漏洞,除非存在立法的实质性沉默。判断立法对某一规范是否存在实质性沉默的关键,在于通过法律前提与法律后果之间的逻辑关系确定反向推理能否成立^[18]。以《民法典》第376条第1款进行反向推理为例,其法律前提为“当事人应当采用书面形式订立居住权合同”,法律后果则是“居住权设立”,反向推理则产生“如果当事人没有采用书面形式订立居住权合同,那么居住权不设立”的法律命题。当订立书面形式的居住权合同会导致居住权设立的法律后果,而居住权并不以订立居住权合同为必要的设立条件时(亦可遗嘱设立居住权),反向推理所产生的命题不成立。^[19]因此《民法典》未以实质性沉默的方式否认裁判设立居住权的存在。

2. 司法需要与家庭伦理维护

《民法典》颁布之前,离婚诉讼等家事纠纷中已经出现大量裁判设立居住权以帮助生活困难者的情形。例如赵某与陆某离婚后居住权纠纷案^[20]中,审理法院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一)》(已失效)第27条第1款认定被上诉人陆某享有一审法院所判决设立的居住权。或者存在双方当事人协商赠予子女房屋后于房产上设立居住权的情形,《民法典》第371条是该种情形的回应。可以说,《民法典》颁布之前法院尚可通过裁判设立居住权以保障弱势群体的权益,若《民法典》颁布后以“法律未明确规定”限制法院为实现最大社会效益而裁判设立居住权的权力,这未免与其立法目的与精神不符。此外,当前的离婚诉讼中亦存在裁判方式设立居住权之案例,在中国裁判文书网上选择民事案件类型,将搜索范围限制于基层法院,年限限于2019年至2025年8月,以“居住权”“离婚”为搜索条件,共检索到2983份文书,具体数目如图1所示:

表1 2019-2025 离婚纠纷居住权裁判案件数量

年份	裁判文书数量
2019 年	686 份
2020 年	834 份
2021 年	643 份
2022 年	398 份
2023 年	324 份
2024 年	149 份
2025 年	66 份

从家庭伦理角度而言,裁判设立居住权有着深厚的内在需求根基。婚姻不仅是夫妻双方的情感联结,更承载诸多家庭责任与义务的共同体。基于公序良俗原则,《民法典》于第1059条、第1043条、第1091条等对夫妻之间的权利义务进行了明确规定,但婚姻关系的破裂将会终止这些权利义务,在离婚纠纷中,一方可能因长期投身家庭事务,如照顾老人、抚育子女,而在职业发展、经济积累上有所牺牲,面临离婚后居无定所的困境。裁判居住权能给予这些当事人基本的生活保障,不仅与家庭伦理中对弱势群体关怀照顾的理念相契合,也能让婚姻解体后的家庭关系过渡的更为平稳。即使婚姻关系结束,当事人也能感受到法律对于曾经家庭关系的尊重,从而促进社会形成积极向上的家庭价值观。

三、婚姻纠纷中裁判设立居住权的可行性路径

有学者认为,居住权应呈现三层构造,《民法典》第243条第3款、第1090条等形成了第三层构造中的法定居住权和裁判居住权^[21]。根据《民法典》的规定以及整合既有司法经验,裁判居住权主要包括离婚配偶居住权和商品房消费者居住权两种。^[22]在离婚配偶居住权的设立中,离婚经济补偿制度、夫妻共同财产分割制度以及离婚经济帮助制度可以作为裁判居住权的主要设立依据。

(一) 离婚经济补偿制度

《民法典》第1088条对离婚经济补偿制度进行了规定,其指在夫妻关系存续期间,一方因在家庭中承担了较多的负担,例如家务劳动、照料子女、协助另一方工作等,在离婚时有权向另一方请求给予相应经济补偿的法

^[18] 同上文。

^[19] 同上文。

^[20] 参见广东省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2015)穗中法民一终字第2069号民事判决书。

^[21] 参见曾大鹏:《〈民法典〉居住权的三层构造之解释论》,《华东政法大学学报》2024年第2期;李会勋,张琳:《论居住权处分权能的适用价值与立法探析》,《山东科技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4年第2期;万方:《居住权的双重立法目标及其问题》,《北京社会科学》2024年第12期。

^[22] 同上文。

律制度^[23]。作为一个相对开放的体系,婚姻中负担了较多义务且离婚后不享有房屋所有权的一方,可请求法院判令其在原夫妻共有房屋内享有居住权。^[24]离婚经济补偿制度的目的在于承认和弥补夫妻一方在家庭非物质性付出方面的价值,平衡夫妻双方在婚姻中的利益得失,保障承担较多家庭义务一方在离婚后的经济权益。以这一制度为依据设立裁判居住权时,应统筹兼顾两个方面:一方面要满足当事人的生活需求,这关系到当事人离婚后的生存根基;另一方面也要注重公平分配财产、推动物尽其用,实现婚姻财产处置的合理性。其中,应当以满足当事人生活居住需要为主,以实现物尽其用为辅。同时,基于离婚经济补偿制度的特殊前提条件,裁判设立居住权不宜常态化,即要求一方于婚姻期间承担诸多负担,另一方又难以单纯凭借金钱补偿解决问题之时,才适宜启用离婚经济补偿制度设立的裁判居住权。且在当事人未请求的情况下,法官不能依职权强行设立裁判居住权,以此确保司法裁判的严谨性与公正性,切实维护当事人的合法权益、尊重当事人的意思自治。^[25]

(二) 夫妻共同财产分割制度

《民法典》第1087条、第1092条以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婚姻家庭编的解释(一)》(以下称婚姻家庭编解释(一))第72条至第82条为夫妻共同财产分割的有关规定。具体而言,可依据婚姻家庭编解释(一)第66条、第68条、第76条的规定裁判设立居住权。与上述制度所设立的裁判居住权一般,该种制度下裁判设立的居住权也应当兼顾上述两个方面,但应以物尽其用为主,满足生活居住需要为辅。婚姻家庭编解释(一)第66条、第68条、第76条规定均强调“协议”“补偿”“适用”,如果夫妻双方在房屋处置问题中,出现一方意图获取房屋所有权,而另一方期望在屋内居住的情形时,可被认定双方已达成事实上的合意。在此状况下,即便当事人没有正式提出明确的设立居住权的诉讼请求,基于对当事人意愿的合理推定以及维护双方实质公平的需要,裁判者可依职权设立居住权,以平衡双方利益诉求,保障居住权益的合理分配。若双方未达成合意,则必须经当事人申请,法院方可决定是否裁判设立居住权,此时要着重考量居住权人是否因承担赡养父母、抚养子女等法定义务而产生必要性居住需求。^[26]

(三) 离婚经济帮助制度

离婚经济帮助制度旨在保障离婚后生活困难一方的基本生活需求,避免因婚姻关系解除而使该方陷入经济困境,体现了法律对婚姻中弱势一方的保护,《民法典》第1090条对之进行了具体规定,该规定可追溯至婚姻法第42条及婚姻法解释(一)第27条第3款。^[27]尽管裁判中多以金钱的方式实现经济帮助,但这并非唯一的补偿方法。住房是保障基本生活的关键要素之一,在某些情况下,维护生活困难一方的居住权益可能更契合实际需求。在实践中,基于离婚经济帮助制度而裁判设立居住权也取得了较好的审判效果^[28]。以离婚经济帮助制度为依据设立裁判居住权时,首先应当界定“帮助”的实质意义,即确保当事人拥有基本住房保障。该制度的适用主体应限定为因离婚而陷入生活困境且缺乏住所居住的夫妻一方。对于生活困难的判定标准,可参照已失效的《婚姻法解释(一)》第27条第1款、第2款的规定,结合目前当前社会经济发展的实际状况以及各地生活成本的差异情况加以判断。^[29]其次,鉴于离婚经济帮助制度的目的,裁判设立居住权时并非必须以当事人主动申请为前提条件,在案件审理期间,若法院查明一方确实处于生活困难状态,可依职权设立居住权,从而充分发挥离婚经济帮助制度保障离婚弱势一方基本生活权益、维护社会公平正义的制度效能^[30]。

综上所述,在婚姻纠纷中,离婚经济补偿制度、夫妻共同财产分割制度以及离婚经济帮助制度虽都与离婚诉讼紧密相依且有设立居住权的依据,然而各自适用情形迥异。尤其是依离婚经济帮助制度设立居住权时需谨慎考虑。其作为离婚救济制度体系中的兜底条款,需要与其他条款,诸如《民法典》第1087条、第1088条等条款衔接适用,只有穷尽其他方法均无法保障当事人居住权益时,方可适用之。

四、婚姻纠纷中裁判设立居住权的适用探讨

从居住权的传统体系定位及其功能与价值角度出发,同时考虑到我国目前立法缺位以及司法实践迫切需要,

[23] 参见王歌雅:《民法典婚姻家庭编的价值阐释与制度修为》,《东方法学》2020年第4期。

[24] 前引[13],封子路文。

[25] 前引[22],陈晓敏等文。

[26] 同上文。

[27] 参见陈晓敏,张锐容:《离婚诉讼中通过裁判设立居住权问题研究》,《人民司法》2024年第1期。

[28] 参见孙若军:《离婚救济制度立法研究》,《法学家》2018年第6期。

[29] 前引[22],陈晓敏等文。

[30] 曾大鹏:《居住权的司法困境、功能嬗变与立法重构》,《法学》2019年第12期。

可确定婚姻纠纷中裁判设立居住权具有正当性与必要性。基于《民法典》婚姻家庭编及其有关司法解释的规定,本文认为婚姻纠纷中,裁判设立居住权之构建具有可行性,但裁判设立居住权存在一定的适用困境,需明确其适用问题。

(一) 司法裁判适用的困境

首先,因事实认定困难而导致裁判标准不一。由于缺乏统一法律规范以及司法程序的不完善,在处理居住权纠纷案件时,尽管法官可基于自由裁量权、实际情况与公平原则,灵活保障各方在婚姻家庭纠纷中的居住权益,但容易出现同案不同判的问题,导致权力滥用,应当统一裁判标准以更好地保障此类弱势群体的居住利益。其次,法律适用模糊所导致的主客体界限不明。一方面,居住权的主体是否仅限于自然人、居住权益是否及于与同住之人等问题未明晰。另一方面,《民法典》以“他人的住宅”之概念界定居住权的客体,但“他人的住宅”在司法实践中的界定标准不统一,且农村宅基地的被收回是否影响居住权的实现等后续问题也需要明确地进行规范。^[31]这些问题在婚姻家庭诉讼中均存在不同的认识,对此应予以明确,使裁判设立居住权的情形更加规范。

(二) 司法裁判的适用逻辑

1. 婚姻纠纷中裁判设立居住权的适用范围

基于以上问题,需先明确婚姻纠纷中裁判设立居住权的适用主体、客体以及核心裁判依据。在现有法律框架下,结合居住权之功能与目的,本文认为:第一,法院的裁判依据必须紧扣“满足生活居住的需要”,这是贯通家庭成员的家事义务与社会普遍利益的权利概念^[32]。法院对于“满足生活居住的需要”的判定,要分情况讨论:若当事人履行法定义务,即需履行抚养义务、赡养义务以及扶养义务等时,以应当对方经常生活居住水平加以判断^[33];若基于离婚经济帮助制度而裁判设立居住权时,以当地基本生活水平而判断。第二,在婚姻纠纷中,真正对设立居住权的房屋进行占有与使用的为自然人,因此应当排除法人、非法人之适用,否则就不符合离婚诉讼中裁判设定居住权的目的。同时,参考域外立法与居住权制度的设立历史,罗马法、德、法国规定与居住权人同住者也享有居住权利,我国亦有学者持有此观点,其认为“作为居住权客体的住宅,原则上仅能供居住权人本人及其家庭成员居住。”^[34]因此,婚姻纠纷中,裁判设立居住权的主体包括居住权人及其广义范围上的家庭成员。第三,居住权人对他人房屋的利用,仅限于“满足生活居住的需要”,其客体不仅可以是整个住宅,也可以仅为住宅的一部分。有学者提出在建的预售商品房可作为居住权的设立客体。^[35]在婚姻纠纷情境下,裁判设立居住权基于当事人迫切的现实需要,在建的预售商品房显然无法达成此目的,因此不应为其适用客体。

2. 婚姻纠纷中裁判设立居住权的时间限度

前文已经讨论婚姻纠纷中裁判设立居住权的可行性规范基础。对于其居住权的存续期限,要分情况加以讨论:

(1) 以离婚经济帮助制度为依据裁判设立居住权时,由于离婚经济帮助制度的目的在于“帮助”,即解决当事人的燃眉之急,因此裁判居住权的设立期限应当与受帮助一方拥有其他可供居住的住房为限。(2) 以离婚经济补偿制度为依据设立裁判居住权时,由于该制度侧重于“补偿”,其居住权期限可长于第一种情况下的期限。(3) 以夫妻共同财产分割制度为依据所设立的裁判居住权,基于存在“协议”的客观基础,要尊重当事人的真实意愿,先以双方当事人达成合意之期限为主。

五、结语

居住权制度是一项保障社会弱势群体的重要制度,从其历史发展来看,其与婚姻家庭关系有着天然密切的关联,因而在婚姻纠纷中重新裁判设立居住权之情形,其存在具有正当性与必要性,且我国《民法典》及其相关司法解释也为其提供了规范基础。随着社会发展与法治进程的推进,裁判设立居住权制度有望在实践中持续优化完善。在司法实践方面,应进一步统一裁判标准,让这一制度真正融入日常生活,成为保障人民幸福生活、构建和谐社会的有力基石。

参考文献:

[1] 万方.居住权的双重立法目标及其问题[J].北京社会科学,2024,(12):25-34.DOI:10.13262/j.bjsshkxy.bjshkx.241203.

[31] 参见袁文全,李贵生:《宅基地流转的居住权路径检视及其入市法律规制》,《重庆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4年。

[32] 前引用[15],路鹏宇文。

[33] 同上文。

[34] 前引[1],刘家安书,第229页。

[35] 王荣珍:《解释论视角下的居住权客体》,《比较法研究》2021年第6期。

- [2]姚宇.居住权效力的体系化冲突与协调[J].政法论丛,2024,(06):168-182.
- [3]和丽军.《民法典》居住权应用模式研究[J].河北法学,2025,43(01):100-116.DOI:10.16494/j.cnki.1002-3933.2025.01.006.
- [4]郑里.裁判设立居住权的解释论[J].中国不动产法研究,2024,(01):155-170+307.
- [5]路鹏宇.论裁判设立居住权的正当性依据与司法逻辑[J].中国不动产法研究,2024,(01):171-189+307-308.
- [6]曾大鹏.《民法典》居住权的三层构造之解释论[J].华东政法大学学报,2024,27(02):179-192.
- [7]李永军.论居住权在民法典中的体系定位[J].比较法研究,2024,(01):63-75.
- [8]陈晓敏,张铠容.离婚诉讼中通过裁判设立居住权问题研究[J].人民司法,2024,(01):10-15.DOI:10.19684/j.cnki.1002-4603.2024.01.001.
- [9]封子路.婚姻关系下居住权的裁判设立[J].求索,2023,(06):145-153.DOI:10.16059/j.cnki.cn43-1008/c.2023.06.017.
- [10]冯建生.民法典居住权规范适用的疑难问题研究[J].法治研究,2023,(03):95-105.DOI:10.16224/j.cnki.cn33-1343/d.20230505.002.
- [11]付一耀.论裁判方式设立居住权[J].社会科学研究,2022,(06):55-65.
- [12]邹龙妹,宿云达.《民法典》视域下居住权设立实证研究[J].哈尔滨工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2,24(05):52-58.DOI:10.16822/j.cnki.hitskb.2022.05.007.
- [13]马强.《民法典》居住权类型之比较研究[J].中国应用法学,2022,(04):139-150.
- [14]张叶东.论我国法定居住权制度之构建——兼评《民法典》物权编中的居住权条款[J].中国不动产法研究,2020,(01):48-66.
- [15]王歌雅.民法典婚姻家庭编的价值阐释与制度修为[J].东方法学,2020,(04):170-183.DOI:10.19404/j.cnki.dffx.20200606.002.
- [16]曾大鹏.居住权的司法困境、功能嬗变与立法重构[J].法学,2019,(12):51-65.

An Exploration of Judicially Established Right to Habitation in Marital Disputes

Yang Haoyuan¹

¹ Affiliation, Minzu University of China, Haidian, Beijing 100074, China

Abstract: Can a court establish a right to habitation by way of judgment in divorce disputes? This issue has given rise to significant disputes in both academic circles and judicial practice. This paper holds that the judicial establishment of the right to habitation in divorce disputes is legitimate and necessary. Systems such as divorce economic compensation, division of community property of the spouses, and divorce economic assistance provide feasible paths for it. However, in judicial practice, problems such as difficulties in fact-finding and ambiguity in the application of law often arise. Therefore, we should take "meeting the needs of living and habitation" as the core. Firstly, it is necessary to clarify that the subjects of application for judicially established right to habitation in marital disputes are natural persons, including the right holder of habitation and those living together with them; the objects of application are residential premises, which also extend to a part of the residential premises, but presale commercial housing under construction shall be excluded. Secondly, based on the orientation of the establishment purposes of the three aforementioned systems, the term of the judicially established right to habitation under different circumstances should be determined.

Keywords: Civil Code; marital disputes; right to habitation; judicial establishment

婚内强奸犯罪化的理论争议与立法路径： 基于性自主权平等保护的视角

游程棚¹

(1.天津仁爱学院, 四川 达州 635000)

摘 要：婚内强奸由于涉及性自主权的保护和婚姻家庭关系的稳定，其定性问题是法律界长期争议的焦点。出现了肯定说、否定说和折中说。我国司法实践中因立法留白而导致了“同案不同判”和“一刀切”的现实困境，这不利于男女平等和家庭和睦，更有损司法权威。因此，对该罪的定性问题进行全面讨论，就成了迫切需要。本文采用案例分析、文献分析与比较法相结合的方法，创新性地提出了“实体扩张，程序谦抑”的协同路径：实体法中主要包括增设特殊条款，对婚姻豁免权进行限制；程序法中主要包括将该罪设为亲告罪、建立严格的取证机制和诬告反坐制度以及引入调解的前置程序，从而兼顾打击犯罪和保障人权。旨在为我国婚内强奸的问题提供可操作的立法路径参考。

关键词：婚内强奸；性自主权；婚姻豁免；理论争议；立法路径

DOI: doi.org/10.70693/rwsk.v1i8.1317

一、引言

1995 年，“白俊峰强奸妻子案”被告人白俊峰以法院判决不构成强奸罪而告终，4 年后的“王卫明强奸妻子案”又被法院判决被告人王卫明构成强奸罪，由此引发了社会各界关于婚内强奸的激烈讨论。

长期以来，对于“婚内强奸”行为的定性一直是法律界中极具争议的问题，在学术界一直没有达成共识。其主要原因在于其涉及复杂的法律、社会和文化因素，例如举证难度较为困难、法律规定有留白、婚姻关系的特殊性、传统的社会观念等。早在 18 世纪，英国法学家马修·黑尔 (Matthew Hale) 就说过：“丈夫不会因强奸妻子而被定罪，因为根据他们的婚约，妻子已奉献其身给丈夫。这项承诺是不可撤消的。”这种观点在 1889 年英国皇室诉卡伦斯一案中得到了应用，可见在人类社会中婚内强奸一直作为客观事实存在，但在早期的人们看来婚内强奸并不属于法律事实。在我国的近代以前，由于长期封建观念“夫为妻纲”和国民受教育程度较低的影响，婚内强奸是否构成犯罪根本不是一个讨论的问题，丈夫根本不能是强奸罪的主体，清代《大清律例》规定“夫妇非外淫不相告”，民国时期《刑法》仍将强奸罪限定为“婚姻外性行为”。但随着女权运动的不断进行，人人平等的观念深入人心，婚内强奸的讨论度随着时间的推移越来越高。这反映了社会的进步，有利于对女性权益的保护。推动男女平等观念的进一步发展。但是根据联合国妇女署的数据报告，截至 2024 年，在全球 193 个国家中，仅有 77 个国家对婚内强奸行为有明确的立法规制，仍有 36 个国家尚未将婚内强奸定为刑事犯罪，可见丈夫豁免权依旧有很多国家的支持，妇女的性自主权的保护仍需进一步加强。

基于此，本文在结合现有的理论和典型案例分析的基础上，以性自主权平等保护为视角，尝试从以下三个维度展开论证：其一，通过回溯婚内强奸从“事实”到“规范”的历史演进，揭示传统婚姻观中“性同意默示”理论的结构缺陷，进而证成性自主权在婚姻关系中的不可让渡性；其二，以我国司法实践中“同案异判”现象为切入点，剖析刑法第 236 条与婚姻家庭编的价值冲突，提出“法益保护个别化”解释路径，破解“婚内豁免”的体系性困境；其三，在立法论层面，主张以“积极刑法观”重构婚内强奸的构成要件，通过实体法上增设“婚姻关系特殊情节”条款、程序法上构建“被害人陈述补强”规则，实现性自主权保护与婚姻家庭秩序维护的规范平衡。

二、婚内强奸概念、特点与表现形式

作者简介：游程棚(2005—)，男，本科，研究方向为法学。

（一）婚内强奸的概念

婚内强奸需要从“婚内”和“强奸”两个方面去理解。婚内即我国《民法典》婚姻家庭编规定的婚姻关系存续期间，始于结婚登记的完成，终于一方被宣告死亡或离婚登记的完成。若夫妻已分居或进入离婚程序，法院更可能认定婚内强奸成立（如磁县案），《现代汉语词典》对强奸的阐述为：男子违背女子意愿使用暴力与对方性交。而《刑法》中强奸的定义为以暴力、胁迫或者其他手段强奸妇女。综上，我们可以将婚内强奸（Marital Rape）定义为在合法婚姻关系存续期间，丈夫违背妻子的意志，采用暴力、胁迫或其他手段强行与妻子发生性关系的行为。其核心在于违背妇女的性自主权，即妻子对性行为的自主决定权未得到尊重。^[1]

（二）婚内强奸的特点

我国刑法第二百三十六条规定“以暴力、胁迫或者其他手段强奸妇女的，处三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由于我国刑法没有明确将丈夫排除在强奸罪主体之外，所以笔者认为婚内强奸是强奸罪的一种特殊形式，两者属于包含与被包含的关系，它与强奸罪有很多相同之处，例如它们都表现为行为人使用强制手段强行与他人发生性关系^[2]，不过婚内强奸并不是普通强奸罪的“家庭版”，作为性暴力的一种特殊形式，它还是有自己的独特之处。

首先，婚内强奸具有隐蔽性。主体是丈夫，对象是妻子，犯罪的主体和对象都相对特定，犯罪的场合通常发生在家庭内部，绝大多数情况下无第三方目击证人，如上海孙某婚内强奸案，丈夫在封闭的空间实施深夜强奸，无目击者。因此婚内强奸具有隐蔽性，正是由于婚内强奸的隐蔽性，使得举证较为困难，普通强奸的认定只需确认为行为人通过暴力、胁迫等方式违背女性意志即可。若发生在夫妻之间，还必须补充证明婚姻处于非正常状态，或丈夫的强制已逾越一般意义上的严重程度，才能成立犯罪。而且身体伤痕易被解释为夫妻争执，体液证据因婚姻关系合法性难以成为定罪核心。

其次，婚内强奸的社会普及度不高。社会普遍“谈性色变”，在司法实践中，即使是普通强奸罪相对容易举证，社会对该罪受害者的认可和同情度也较高，仍然有不少受害者处于恐惧和羞愧心理选择隐忍，不愿向外界提起。而社会对婚内强奸的容忍度较高且重视度和关注度较低。导致妻子在受到了婚内强奸之后，很有可能会秉持着“家丑不可外扬”的想法，不到万不得已的程度，是不会轻易将侵犯公之于众，妻子往往会选择忍让而非起诉，从而助长了婚内强奸犯罪的产生。

再次，婚内强奸具有长期性与反复性。婚内强奸往往伴随着长期的家暴，并且可能愈演愈烈，从言语上的侮辱妻子的人格尊严升级到肢体上对妻子的性暴力，反复遭受丈夫的性蹂躏与摧残^[3]。如尹某与武某婚内强奸，此案深刻影响受害者的身心创伤程度、司法取证难度及法律干预策略。笔者认为，单次行为可能不构成犯罪，但反复侵害的证明需依赖日记、医疗记录等间接证据。

最后，婚内强奸犯罪取决于婚姻关系的正常与否，如果婚姻关系处于诉讼阶段的非正常状态，如离婚诉讼期间和长期分居期间，此时可以推定夫妻双方感情破裂，婚姻关系实际消亡，那么丈夫不具有“婚姻豁免权”，即进行性行为需要征得女方同意，否则就是违背妇女意志，就需要承担婚内强奸的犯罪责任。值得注意的是，我国各地风土人情差异极大，因此对于婚内强奸需要具体问题具体分析，若“一刀切”地认定有罪或无罪，既脱离实际，又损伤法治权威，在司法实践中，时间特征的认定不仅依赖于婚姻关系的法律状态，还需结合婚姻关系的实际状况进行综合判断。

（三）婚内强奸的表现形式

由于婚内强奸中在“婚姻”这层外壳与法律适用、证据规则和社会伦理紧密相连，给“强奸”铺上了大量的灰色地带，使得违背妇女意志这件事在社会、司法等方面都被层层过滤和稀释，所以婚内强奸的表现形式多样，笔者根据中国裁判文书网的公开文书和主流媒体公布的案例，将表现形式分为离婚诉讼期间型、登记未同居型和胁迫暴力型，参见表一。其中胁迫暴力型是最容易被认定的类型，不过其中内蒙古强奸案处于正常的婚姻存续期间，对于婚内强奸的犯罪认定应当综合多方证据，在不冤枉好人的同时也不放过坏人。

表1 婚内强奸的三种表现形式

表现形式	案情简介与判决结果	案例来源
离婚诉讼期间型	王卫明婚内强奸案。1997年法院准予离婚，男方采用暴力手段强行发生性关系。判处有期徒刑三年，缓刑三年。	《刑事审判参考》【第51号】
登记未同居型	上海孙金亨婚内强奸案。2010年领证后双方各自居住，2011年男方趁女方回家取物时将其捆绑并性侵，判处有期徒刑三年，缓刑三年。	(2011)浦刑初字第685号
胁迫暴力型	内蒙古婚内强奸案，在正常婚姻存续期间，男方长期对女方进行家暴，以强行发生性关系，男方3月被羁押到看守所，等待开庭和女方谅解。	https://www.thepaper.cn/newsDetail_forward_15495528

三、婚内强奸的域外立法规制

（一）总体发展趋势

婚内强奸作为全球法律界长期争议的问题，在域外经历了由普遍豁免到逐渐入罪的深刻变革，婚内强奸的立

法与性别观念发展密切相关。在过去很长的时间里,基于“婚姻豁免”原则,许多国家的法律体系曾长期将此行为排除在强奸罪的范畴之外,认为婚姻关系中丈夫对妻子的性行为不构成强奸。这一观念源于古罗马法的“婚姻合意推定”理论,认为妻子只要是与丈夫结婚了,就推定性同意,只要没离婚,丈夫就天然有性权利。《学说汇纂》记载:“妻子不能指控丈夫强奸,因其已交出身体权利。”但随着女性意识的觉醒和思想解放运动的开展,这一传统观念开始受到挑战,越来越多的国家开始废除“婚姻豁免”原则,将婚内强奸纳入强奸罪的范畴,这一变革不仅体现在法律条文的修改上,更反映出社会文明的进步和性别平等的深化。婚内强奸的域外法律规制在不同国家的发展历程和立法态度存在显著差异。

(二) 典型国家和地区对婚内强奸的界定标准和立法情况

由于各国国情不同,对于婚内强奸的立法现状和标准存在显著差异,大致可将其分为三类标准,即完全入罪、有限制入罪和完全不入罪:

完全入罪就是完全废除丈夫的婚姻豁免权,无论婚姻关系是否正常、是否使用了暴力胁迫手段,只要违背了妻子的意志,即可定罪,它确认了婚姻并不能构成对个人性自主权的剥夺,结婚证书并非一张永久的性交同意书。典型的国家包括英国、美国、瑞典,以英国为例,早期的英国强奸罪的主体和对象并不包括丈夫和妻子,丈夫在当时具有婚姻豁免权,十八世纪的英国法理学著作《王冠请求史》中写道:“丈夫不可能亲自对他的合法妻子犯强奸罪,因为他们相互的婚姻同意与契约,妻子已经在这类契约中将自己贡献给丈夫,并且她无法收回这种行为^[4]。”但在二十世纪以后,在 R v. R 案中,英国正式废除了“婚内强奸不犯罪”的司法豁免,认为婚姻不再构成强奸的豁免理由,2003 年的《性犯罪法》第 74 条对同意的定义是“享有自由和能力的个人所作出的同意的选择”,以法律条文的形式明确废除丈夫的婚姻豁免权。美国各州自 20 世纪 80 年代起,陆续废除了婚姻豁免权,如新泽西州和北卡罗来纳州分别在 1981 和 1993 年以法律的形式承认了婚内强奸的非法性,截至 2023 年,美国的五十个州和华盛顿哥伦比亚特区都已将婚内强奸入罪,但是不同州的入罪门槛存在一定的差异,一些州通过特别法规定婚内强奸为性侵,但适用标准不同于普通强奸,由此可见美国对于婚内强奸的看法仍然存在一定矛盾。瑞典早在 1965 年就将婚内强奸和强奸罪同等对待,最高可判 10 年监禁,是婚内强奸入罪的先驱。

有限制入罪,此类国家承认婚内强奸可能入罪,但是入罪门槛、实体或程序以及裁判结果与普通强奸罪不同。典型的国家如印度、日本等,印度《刑法》仍规定,丈夫婚内强奸不为罪,仅当妻子在 15 周岁以下才例外。尽管有强烈的社会和法律改革呼声,但立法层面尚未取消婚内强奸豁免,导致印度社会强奸犯罪率很高,实际认定率却极低。日本《刑法》第 177 条要求“以暴力或胁迫手段奸淫 13 岁以上妇女”,但司法实践中认可婚姻关系破裂时的婚内强奸,不过日本在 2023 年的刑法修正案中将强制性交罪修改为不同意性交等罪,在本质上是对“是否存在暴力或胁迫”向“是否违背对方意愿”的转变^[5],从有限入罪转变为了完全入罪,这一转变是女性社会地位提升、女权主义发展以及公众舆论共同作用的结果。

完全不入罪是法律规定婚内强奸不为罪,丈夫仍存在豁免权,尽管全球趋势是走向入罪,但截至 2025 年,仍有部分国家在法律上保留了婚内强奸豁免权。典型国家如泰国,法律明文规定丈夫不可能对妻子构成强奸罪^[6],成为全球性别平等和人权保护版图上的洼地。

四、典型案例分析

近年来,我国学术界对于婚内强奸的罪与非罪的思想碰撞和观点争论在不断加深,据中国裁判文书网统计,我国婚内强奸的立案率从 2018 年的 5.7% 上升至 2023 年的 18.3%,定罪率从 12.4% 提高至 29.6%^[7]。我国法律对于婚内强奸的态度越来越偏向于从“婚内无奸”到“婚内强奸”,对于婚内强奸的判定标准,可以从我国司法实践中王卫明强奸妻子案、白俊峰强奸妻子案这两个典型案例中看出来。

王卫明强奸妻子案,是中国新刑法实施后首例婚内强奸的判例,是我国司法中具有里程碑意义的案件,王卫明与妻子钱某因感情不和多次起诉离婚,双方分居长达半年,法院已判决准予离婚但尚未生效。王卫明在离婚判决生效前强行与钱某发生性关系,1999 年,上海市青浦县人民法院的判决首次在司法实践中突破了“婚内无奸”的传统观念,确立了在婚姻关系非正常状态下,丈夫违背妻子意愿的行为可能会对妻子构成强奸罪,突破了传统婚内强奸豁免的伦理观念,此案最高人民法院收录为重要判例,为后续类似案件的审理提供了重要的裁判指引。之所以能够有如此轰动,是因为在于其直面了中国刑法理论与实践中的一个长期存在且极具争议的难题:丈夫在何种情况下可以成为强奸罪的犯罪主体?

为了解答此难题,我们可以从与王卫明案形成鲜明对比的白俊峰强奸妻子案进行分析。参见表二。该案中,被告人白俊峰与被害人姚某婚后感情不和,姚某回娘家并提出离婚要求,白俊峰与姚某发生口角争执后强行与其发生性关系,伴随暴力行为,法院最终判白俊峰无罪。此案进一步明确了“婚姻形式要件不能替代实质要件”的认

定标准^[8]。王卫明案和白俊峰案案情相似,判决结果却不同,最主要的原因和区别就是婚姻状态的正常与否(见表三)。王卫明与妻子长期分居并多次起诉离婚,这说明双方感情破裂,并无共同生活意愿。婚姻处于诉讼阶段,王卫明在非正常的婚姻期间使用暴力或胁迫手段强行与妻子发生性关系。虽然婚姻关系在形式上仍然存在,但在当事人的主观认知和客观事实上均已名存实亡,已不能再推定女方对性行为是一种同意的承诺。白俊峰案则是双方处于正常的婚姻关系存续期间,虽然有口头离婚意向,但不具法律效力,由此推定性同意,对白俊峰做出无罪判决。

表2 典型案例对比

要素	1999年王卫明案	1995年白俊峰案
婚姻状态	离婚诉讼中,一审判决离婚但未生效, 婚姻关系非正常存续	妻子口头提离婚,未进入离婚诉讼程序, 婚姻关系正常存续
程序状态	离婚诉讼启动+司法判决	尚未进入正式离婚程序
司法倾向	有限保护性自主权	维护婚姻制度稳定性
判决结果	强奸罪成立(有期徒刑3年,缓刑3年)	不构成强奸罪(无罪)

这两个典型案例都被最高人民法院作为婚内强奸的指导性案例进行“区别对待”,避免了婚内强奸出入罪的“一刀切”的绝对化处理方式,要求法官根据个案中婚姻关系的具体状况进行精细化判断。充分贯彻了民法的意思自治原则和刑法谦抑性的精神^[9]。

五、婚内强奸入罪的理论争议

(一) 肯定说

肯定说主张丈夫无豁免权,即丈夫是强奸罪的主体。首先,从刑法视角来看,强奸罪的主体是一般主体,我国《刑法》第236条没有明确将丈夫排除在强奸罪之外,所谓的丈夫豁免权没有法律依据,因此丈夫在法理上可以构成婚内强奸。其次,从民法视角来看,我国《民法典》第1043条也规定了夫妻应当互相忠实,互相尊重,互相关爱。现代婚姻的关系是建立在夫妻双方权利义务平等的耦合权利义务的基础上的,而不是一方对另一方的支配,任何一方不得滥用性权利,最后,将婚内强奸行为确立为犯罪有利于保护妇女性的不可侵犯的权利^[10],即性自主权,符合现代婚姻的男女平等观念,正如美国佐治亚州史密斯大法官在 Daniel Steven Warren v. The State 婚内强奸案判决书中提到的一样,他认为“一个正常的男人听到这种强迫性行为的细节,觉得这是令人难以置信的……对强奸犯而言,这种行为不是‘爱’,也不是‘狂热’,也不是常规意义上的‘激情’,这只是在贬低女人、是女人蒙羞。……这是毫无争议的强奸”^[11]。肯定说虽然为性自主权的保护呈上了一份满意的答卷,但是却在稳定性上面递交了白卷,一旦妻子以婚内强奸相威胁,丈夫在离婚时的财产分配和子女抚养的问题上就会陷入被动,容易激发家庭矛盾,此外,肯定说将妇女的性自主权过于绝对化,忽视了婚姻关系的特殊性,可能导致司法实践中过于僵硬的认定标准。

(二) 否定说

否定说的政策考量主要体现在维护婚姻稳定和社会和谐上,其理论基础是婚姻契约论,主张婚内强奸不构成强奸罪,即婚内无奸。也就是说,只要确立了婚姻关系,就能推定性同意或默示的许可。陈兴良教授主张“婚内确实存在丈夫违背妻子意志强行发生性关系的情形,但对此不能以强奸罪论处”^[12],丈夫在性行为中即使使用了轻微的强制,其社会危害性也远远小于一般的强奸罪,不应当以强奸罪论处,孙丽芳等学者另辟蹊径,主张妻子对于丈夫暴力或强制的性行为的反抗并非性行为本身,而是暴力或强制的手段,因此可以根据手段的强制性和危害程度来以故意伤害罪或非法拘禁罪等罪名论处,这样可以兼顾惩罚暴力和维护家庭和睦。不过,否定说的局限性也日益凸显。首先,在女性已经是独立个体的今天,男女双方基于平等地位缔结婚姻,意味着夫妻在家庭中地位的平等,婚姻契约论有悖男女平等的观念。其次,有些学者认为婚内无奸符合严格的罪法定原则,由于文字本身的差异性和时代性,不可能覆盖所有的法律事实和行为,因此可能会造成误解,我国刑法对强奸罪规定的是“以暴力、胁迫或者其他手段强奸妇女的”,构成强奸罪,并没有明确强奸罪的主体不能是丈夫,对象不能是妻子,所以否定说的理论基础是站不住脚的。

(三) 折中说

折中说认为上述肯定说和否定说都存在一定的片面性,因此对两种观点进行调和。性本质上是一种美好的事物,是夫妻之间感情的水乳交融,这种行为的发生以夫妻修好为基础并可以促进夫妻感情^[13],但是如果在入罪的问题上过于肯定或者否定,势必都会导致夫妻感情破裂,折中说基于婚姻关系的特殊性,主张对婚内强奸进行具体问题具体分析,也就是说要根据婚姻的状态来进行处理。折中说的学者于改之认为在婚姻关系正常存续期间,丈夫超出了婚内性行为的合理范畴或者不顾妻子的疾苦强行与之性交,手段恶劣、次数较多、后果严重的,若之

后再提起离婚诉讼,可构成婚内强奸^[14]。具体而言,法院正在审理期间、夫妻感情确已破裂,长期分居生活或者双方已达成离婚协议,尚未办理离婚登记手续期间等非正常的婚姻状态下,夫妻关系已经名存实亡了,丈夫是有可能构成强奸罪的,此时其性自主权应得到与普通女性同等的刑法保护,如果婚姻尚未处于诉讼期间或者尚未长期分居,丈夫即享有婚姻豁免权。折中说试图在保护妇女性权利与维护婚姻家庭稳定之间寻求平衡,是目前中国司法实践中被普遍采纳的立场,然而婚姻关系异常的认定标准模糊,缺乏统一的司法引导,在司法实践中法官的自由裁量权较大,主观性相对较强,可能导致裁判尺度不一,从而出现同案不同判的情况。

六、婚内强奸立法规制与完善

笔者虽然赞同婚内强奸犯罪化,但秉着“宁拆十座庙不毁一桩婚”的传统观念,认为婚内强奸需要从实体和程序两个方面进行立法规制,让刑法不仅要打击犯罪,还要保障人权。

(一) 实体法方面完善

我国刑法并未将丈夫排除在强奸罪之外。多数学者主张,在婚姻关系非正常或者进入法律程序的诉讼中,丈夫可以成为强奸犯罪的主体,将婚内强奸行为统一纳入强奸罪的规制范围,明确入罪,统一适用。在《刑法》第236条强奸罪的规定中增加第二款:“婚姻关系存续期间,丈夫以暴力、胁迫或其他手段强奸妻子的,依照前款规定定罪处罚;情节显著轻微、未造成严重后果的,可以进行调解或和解”。同时也应考虑到婚姻关系的特殊性,与普通强奸罪进行区别量刑,设置酌定从宽处理情节,被害人具有完全民事行为能力,表示对犯罪人谅解并经法院确认生效的,可以减轻或者免除处罚^[15]。体现法治的温度。

(二) 程序法方面完善

实务中大多数强奸仅靠被害人口供就能定罪,而婚内强奸具有隐蔽性,对口供的依赖性就更高了。再加上无论是最高人民法院还是省级法院,均未出台专门针对婚内强奸案件中“非正常婚姻状态”认定的证据采信标准或实施细则,更多的依赖法官根据司法判例的自由裁量,增加了裁判的不确定性,因此应该建立特殊的证据规则,明确婚内强奸的入罪规则,统一裁判尺度,除了口供以外,应当放宽证据要求,允许有辅助证据,包括但不限于证人证言、心理评估报告、伤痕鉴定等,还需要结合是否存在夫妻长期不和与分居的情况来进行判断,与物证共同形成证据链,必要的话允许法院依职权调查取证。由于婚内强奸本身就很难证明,为了避免妻子报复丈夫而诬告其强奸,还可以设置诬告反坐制度。

刑法具有谦抑性,是国家控制社会的最后和最极端的救济手段,如果公权力强行介入,很容易导致一个好不容易组成的家庭变得支离破碎,而强奸罪是保护的是女性的性自主权,是为保护女性而生的,同时也是公诉案件,所以会使强奸的事实公之于众,基于保护女性的角度,可能会因为指控丈夫婚内强奸从而使得受害者可能被社会冠以刻板印象,人们对受害者的看法也会带上有色眼镜,不利于对受害者隐私和自尊的保护,对于发生在家庭内部的冲突,应优先考虑其他解决方式。因此可以借鉴台湾地区的立法,赋予被害人程序选择权,将婚内强奸作为告诉才处理的犯罪,除非因为婚内强奸而被被害人重伤、死亡或者涉及公共利益。对于情节轻微,伤害不大且双方自愿调解或和解的婚内强奸案,可以在不影响刑事责任认定的情况下适用调解或和解的前置程序。还可将婚内强奸纳入《反家庭暴力法》等范围,允许受害者申请人身安全保护令、限制令等强制性保护措施。审判阶段应以不公开审理为原则,采取匿名或化名出庭等措施,以保护个人隐私和子女的身心健康。

七、结语

婚内强奸的犯罪化与否,是衡量性别平等与法治文明的重要标尺。也是社会文明进步与性别平等观念深化的缩影。正如约翰·斯图亚特·穆勒在《妇女的屈从地位》中所警示的:

“一个社会是否文明,端看它是否愿意把最私密领域的暴行置于公共正义的审视之下。”愿我们以法律之微光,照亮那些曾被默许的阴影,让婚姻回归尊重与平等的本义。性自主权在婚姻关系中同样应享有充分保护,不应因婚姻关系而被迫让步。我国司法实践虽已逐步在个案中突破了“婚内无奸”观念,但由于立法的长期留白,导致司法标准分化以及案件认定困难。本文基于比较法经验与本土案例分析,提出了在实体法与程序法层面同步完善的立法建议,以期在保护受害人权益与维护婚姻稳定之间实现制度平衡。这一思路不仅具有现实可行性,也为未来刑法修订提供了参考路径。婚内强奸的规制仍需法律的明文规定与社会观念的转变相辅相成,只有这样,才能真正实现性自主权的平等保护。

由于本人才疏学浅、研究水平有限,或许未能提出较为深入和透彻的婚内强奸的入罪方案,但是我认为婚内请将应该在同时保护男性和女性合法权利的情况下进行入罪,要对其入罪条件进行严格的限制和规定,否则会适得其反,影响家庭和睦甚至可能引起男女对立,日后我还将进一步研究和讨论关注对婚内强奸的刑事定罪问题,不断丰富我的思想和方案。

参考文献:

- [1] 张佳. 反家暴法背景下婚内强迫性行为入刑的再审视[D]. 华东政法大学, 2017.
- [2] 葛凡. 婚内强奸的法律规制[D]. 天津师范大学, 2023. DOI:10.27363/d.cnki.gtsfu.2023.000650.
- [3] 余延满, 范硕. 婚内强奸行为罪与罚的考量--基于同居权利和义务视阙下的思考 [J]. 河北法学, 2017, 35 (09): 11-22. DOI:10.16494/j.cnki.1002-3933.2017.09.002.
- [4] 梅辙: 《社会观念视域中的中国婚内强奸问题》, 载《金陵法律评论》2002 年第 01 期
- [5] 李晓明. 境外地区与国际上关于婚内强奸的规定和态度[EB/OL]. [2025-05-12]. <https://www.163.com/dy/article/JVBRI64G0551LSGT.html>.
- [6] 徐凤林. 浅论婚内强奸立法入刑之争[EB/OL]. [2024-04-19]. http://www.law-lib.com/lw/lw_view.asp?no=67583.
- [7] 杨畅. 婚内强奸到底是怎么回事[EB/OL]. [2025-05-07]. <https://zhuanlan.zhihu.com/p/1903539896724992062>.
- [8] 李伟强. “婚内强奸”是否可能构成强奸罪[EB/OL]. [2021-09-26]. <https://www.163.com/dy/article/GKQU7TNU0552K8YM.html>.
- [9] 杨生东. 对“婚内强奸行为”的定罪分析[D]. 兰州大学, 2015.
- [10] 阮方民, 王怀章, 童丽君. 婚内强奸"犯罪化的法理思考 [J]. 吉林师范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 2003, (01): 52-56.
- [11] Pearl S. Buck. *Fighting Angel: Portrait of a Soul*[M]. New York: The John Day Company, 1936.
- [12] 王新宇: 《从性义务到性合意——婚内强制性行为何以为罪》, 载《妇女研究论丛》2014 年第 06 期
- [13] 陈兴良. 规范刑法学 [M]. 1 版. 北京: 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 2003: 345-346.
- [14] 高维俭, 罗江峰. 婚内强奸的“罪”与“罚” [J]. 江西警察学院学报, 2014(1): 9096
- [15] 刘士心: 《美国刑法各论原理》, 人民出版社 2015 年版, 第 157 页

Theoretical Controversies and Legislative Pathways Regarding the Criminalization of Marital Rape: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Equal Protection of Sexual Autonomy

You Chengpeng¹

¹ Tianjin Renai College, Dazhou, Sichuan 635000, China

Abstract: Marital rape has long been a focal point of legal debates due to its implications for sexual autonomy protection and the stability of marital and family relations. The ongoing theoretical controversies include the affirmative theory, negative theory, and compromising theory regarding its legal characterization. In China's judicial practice, legislative gaps have led to the practical dilemmas of "inconsistent verdicts for similar cases" and a "one-size-fits-all approach," which undermine gender equality, familial harmony, and judicial authority. Therefore, a comprehensive discussion on the characterization of this crime has become imperative. This paper adopts an integrated methodology combining case analysis, literature review, and comparative law to innovatively propose a synergistic approach termed "substantive expansion with procedural restraint." Specifically, substantive law reforms would primarily involve adding special clauses to restrict the marital exemption doctrine, while procedural law adjustments would include classifying marital rape as a complaint-initiated offense, establishing rigorous evidence-gathering mechanisms, implementing a counter-charging system for false accusations, and introducing mandatory mediation procedures prior to litigation. This dual-path framework aims to balance crime prevention with human rights protection. The study seeks to provide an actionable legislative reference for addressing marital rape issues in China's legal context.

Keywords: marital rape; sexual autonomy; marital exemption; theoretical debate; legislative pathway

新中国初期“革命外交”影响下的周边观 ——以20世纪50年代初期中印外交实践为例

杨哲¹

(1. 云南民族大学, 云南 昆明 10691)

摘要: 随着解放战争的胜利与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 中国共产党逐步完成了由革命党向执政党的转变。但受自身革命运动经验、国内政治状况和国际外交形势的影响, 在建国之后相当长的一段时期里, 新中国的对外政策带有强烈的革命色彩, 形成了以“阶级斗争”为主要特点的“革命外交”观念。这一观念极大的影响了中国对周边国家的态度与外交政策, 并奠定了建国初期中国周边观的主要基调。20世纪50年代, 出于国内外多方面的考虑, 中印建交, 并在之后十年里外交关系持续升温, 并度过了一段蜜月期。这段外交关系的变化较为集中地反映了“革命外交”理念下中国的周边观念的特点与实质。

关键词: 革命外交; 中印关系; 周边观

DOI: doi.org/10.70693/rwsk.v1i8.1316

引言

“周边”一词通常与“关系”、“外交观”、“区域观”等词连用, 强调一个国家以己为中心看待外部世界, 处理与外部的关系, 并与周边邻国形成的各式外交惯例。而“周边观”指的是一个国家对于其周边邻国在政治、经济、国家性质等多方面的宏观认知和基于此采取的一系列外交政策。中国邻国众多, 在长期的交往中和周边国家建立复杂、多样的关系, 构建起一套以儒家等级秩序思想为指导的“中心-边缘式”架构, 即以“朝贡体系”为核心的周边观。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 周边观发生了改变与拓展。从思维层次上看, 中国领导人开始站在全球战略层面思考亚洲地区问题的; 从范式上看, 革命的传统与阶级斗争思维方式的惯性使得外交观念带有浓烈的革命色彩, 周边观亦是如此。本文将简述新中国成立初期的革命外交理念与受其影响下的周边观, 并以20世纪50年代的中印关系为切入点。

一、革命外交的形成及含义

革命外交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早期最主要的外交思想, 对建国初期的各类外交政策与处事活动产生了深远影响。革命外交的含义主要有两个: 第一为“革命式”的外交, 即将国内革命运动期间使用的阶级斗争方法与统战思维用于外交事物之中, 以“非敌即友”的二分法观念用于处理与国与国之间关系, 以“斗争求团结”的原则处理外事, 虽也产生过“中间地带”的思想, 但仍是斗争的思维为主; 第二为“革命性”的外交, 即对以革命者的身份对以西方帝国主义国家为主导的现存国际体系和体制的合法性提出根本性的挑战。为打破这种旧格局, 早期领导人以国际主义的视野, 对中国周边国家进行了革命援助, “抗美援朝”和“援越抗法”就是其中的代表。中国的革命外交是基于特定的国情和国际局势产生的, 它的产生和发展更是有着一条清晰的脉络。

早期受革命党立场和革命运动主要集中在国内的影响, 不同于革命观念的较早滥觞, 中共“外交观”的形成相对滞后且与当今意义上的“外交”有较大的不同。在当时的中共看来, 在国与国之间只有弱肉强食和压迫与被压迫的关系, 真正意义上的和平外交是不存在的, 更习惯于以反帝斗争的思路来理解国家之间的关系, 认为“反革命势力”是天下乌鸦一般黑, 差不多都是中国革命的敌人, 当然也是中华民族的敌人。日本的扩张是中国的“绝大的

作者简介: 杨哲(2003—), 男, 本科生, 研究方向为中国近现代史。

危险”，美国是“最会杀人的第一等刽子手”，英国也没有“比日本好的地方^[1]。”这使得中共对于“无产阶级世界”以外的国家尤其是帝国主义国家抱有很强的排斥心理，对于同这些国家的外交更是少有考虑。

到1930年时，当时的中共开始考虑创立自己的苏维埃中央政府，对“外交”有了初步的接触与尝试，但非此即彼、与帝国主义势同水火的阶级斗争观念仍占据主导地位，因此他们将外交等同于反帝斗争，认为中国苏维埃政府的对外政策不仅“绝不（能）有任何‘敦睦邦交’或‘亲善邻国’的意义”而且就是俄国布列斯特和约的经验也“不能在中国运用”。苏维埃政府的对外政策，必须以“充分暴露帝国主义罪恶”为目的，因为任何试图和缓帝国主义进攻的企图，都“必然要阻碍着坚决的反帝国主义的斗争^[1]。”这与之前的“对外观”别无二致，彻底的反帝和拒绝与其他资本主义国家有任何联系是当时中共的主流思想。

1929年世界性经济危机爆发后，西方资本主义遭受沉重打击，在极端极权主义和民粹主义的裹挟下，法西斯主义趁机在意大利、德国、日本等国兴起，它们开展军备扩张，力图以军事侵略转移国内矛盾，使世界局势日趋紧张。在此情况之下，1935年7月，在苏联莫斯科召开的共产国际七大，苏联和共产国际要求各党联合国内外的一切力量建立统一战线反对法西斯、保卫苏联。这种号召引起了中共的重视，于当年12月17日至25日，在陕北瓦窑堡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毛泽东做了《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策略》的报告。报告指出：“党的基本的策略任务……不是别的，就是建立广泛的民族革命统一战线。”他认为，只有统一战线的策略才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策略，“我们一定不要关门主义，我们要的是制日本帝国主义和汉奸卖国贼的死命的民族革命统一战线^[1]。”统一战线的提出，使得中共逐渐改变对内、外的认知和政策，开始从斗争中寻找合作。

1936年7月15、16日，毛泽东在陕北保安会见美国记者埃德加·斯诺时，指出“中国苏维埃和中国人民因此要同各国、各国人民、各党派和各群众组织团结起来，组成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统一战线^[2]。”这一宣言可视为中共“外交”工作开始。但这里的“外交”并非是这从国家角度出发的外事活动，而是立足于党政角度，更多地指“党和非党之间，或党与党外势力之间联络交涉的工作”国内的国民党和英、美、苏等国与日本人民及士兵都是“外交”的对象，但前者通常为主要对象，这也体现了中国共产党将“统战”和“外交”两个概念混用的情况。1944年美国军事观察团赴延安考察，中共正式文件才将国内统战和外交相区分，并将其看作是中共“在国际间统一战线的开展”，是“外交工作的开始^[3]。”二战结束后，美苏开始对抗，“两个阵营”理论应运而生，中共很快接受了这一理论，并在革命外交的理念下确定了新中国“一边倒”“另起炉灶”和“打扫干净房子再请客”的外交战略。

纵观中国共产党早期的外交理念与实践，可以发现其思维特点。第一，信奉阶级斗争理论，以非左即右、非敌即友的二分法来分析外交事物，难免带有强烈的革命色彩；第二，并未形成真正的外交观念，将外交更多地视作建立在阶级斗争理论基础上的对外统战工作，其实质是统战工作在海外的延伸。在此思维方式下，形成了一套相应的方法论，即按照阶级斗争思维将统战对象划分为“左、中、右”三派，采取“发展进步势力、争取中间势力、反对（孤立）顽固势力”的策略，其重要思想是“斗争是团结的手段，团结是斗争的目的。以斗争求团结则团结存，以退让求团结则团结亡”，即“以斗争求团结^[3]。”这套方法也被用于新中国早期的外交之中，并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二、中国对印外交观念及实践

中印虽同处于亚洲大陆板块之中，且互为陆上邻国，但喜马拉雅山脉这一天然屏障很大程度上阻碍了中印之间在中古时期的交流。在地缘环境的影响下，近代以前，中印之间虽有过一定的交流，但整体上的程度较低。随着二战结束以来民族解放运动的兴起，中印之间的联系得到了加强。

在革命外交理念的影响下，中国以立场来给周边国家定性，而印度政府起初并不为中共高层所认可。毛泽东认为，印度不是通过暴力革命的方式，而是以和平移交权力的方式取得的，印度获得的仅仅是自治的地位，还不是真正的充分意义上的独立，而以尼赫鲁为代表的印度资产阶级则是帝国主义的傀儡^[3]。但为了解决西藏和平解放这一首要议题，避免印度成为英美制华的工具，中印进行了多次谈判后，最终于1950年4月1日正式确立外交关系。

但值得注意的是，此时的中印建交，带有“权宜之计”的色彩，体现了中国政府稳住“后方”以解决国内和国际问题的考量。内政方面，中印建交谈判主要解决的是“印度政府处理国民党政权遗留的问题，以及印度政府对新中国国际地位的态度问题^[3]。”就西藏问题、边界问题迟迟未能达成一致。此时不提这一敏感话题，固然有出于时机不成熟的考虑，但也有先稳住印度，掌握主动权并积蓄力量解决西藏解放问题的长期考量；外交方面，受“继续革命论”的影响，毛泽东想将中国的革命经验推广到国际之中，帮助“兄弟党和殖民地半殖民地民族取得解放斗争胜利的问题^[4]。”并试图将中国打造为亚洲革命的中心^[4]。这就使得中国需要将更多地国际上担负“援助世界

各国资本主义国家特别是亚洲、澳洲各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的工人阶级和劳动人民的繁重的责任^[5]。”受此影响，中国在这段时期的周边观念和国内的统战观念十分相似，可视同为“发展进步势力、争取中间势力、反对（孤立）顽固势力”。中印关系也在这段时间“既斗争又团结”。建交后，印度对西藏和平解放的阻挠、对抗美援朝的指责以及印度对恢复中国联合国合法席位、坚持一个中国原则等外交往来中都体现了这一观念。

中国周边观念的改变，以及中印关系的转机发生在1953年。在这一年，斯大林于3月5日逝世，苏联高层很快释出缓和局势的信息，希望与以美国为首的资本主义阵营“和平共处”；7月27日朝鲜停战协议签订，中国领土安全的直接威胁得到解除，国家的工作重心也逐步转移到经济恢复与建设上来，这使得中国的对外政策有了一定的调整，开始改善与周边国家的关系，周边观也有了从强调革命向和平共处转向的趋势。

西藏虽在1951年和平解放，但印度政府在西藏仍继承并享有自英国殖民时期攫取的诸多利益，尼赫鲁在1953年9月致电周恩，以图通过谈判解决中印两国在西藏地方的有关问题。出于“进一步稳定西藏局势、突破美国等西方国家对新中国的政治孤立与经济封锁”的需要以及“解决边界问题所需的各种资料准备严重不足^[6]。”的制约，中国采取“暂缓现状”的态度，自1953年12月31日开始，到1954年4月29日，整个谈判耗时近5个月，最终，中印两国签《中印关于中国西藏地方和印度之间的通商和交通协定》。在谈判过程中，周恩来提出了“互相尊重主权、互不侵犯、互不干涉内政、平等互惠和和平共处的原则^[6]。”即初版的“和平共处五项原则”，这体现了“中国领导人为意识形态斗争和不同社会制度的国家之间相处，找出既行得通的、同时能被广泛接受的办法”的尝试^[7]。

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提出，不仅顺应了周边各国要求缓和与和平的诉求，还使得中印关系步入了快车道。此后，中国积极参加了平息亚洲战争的日内瓦会议，在与印度的密切合作中成功促成了全面停止印度支那战争的日内瓦协议的签订；在尼赫鲁的力邀之下，中国成功出席第一届亚非会议，并促使了“和平相处并发展友好合作”十项原则的通过，极大地改善了同亚非国家的关系。同时，政府高层进行了频繁互访，民间交流连续不断，最终形成了“印度——秦尼巴依巴依”的友好关系。

三、革命外交影响下中国周边观的实质

20世纪50年代中国的外交政策，从内容上看经历了从提倡阶级斗争的革命外交思想向以“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为核心的和平友好外交。但其实质并未发生根本性的改变，因为革命是有惯性的，既会影响外交事务决策者的思维方式，也会影响外交决策真正的实施效果与连续性。在提到“一边倒”政策是，毛泽东指出：“积中国四十年和二十八年的经验，中国人不是倒向帝国主义一边，就是倒向社会主义一边，绝无例外^[8]。”而正是这“四十年”和“二十八年”的强调阶级斗争与立场、讲求非敌即友二分法、崇尚不断革命论的革命经验，中共领导人形成了以革命思维处理外交事务的思维定势，加之在外交领域，“由于专门知识准备不充分，经验的缺乏，以及信息不充分和时间紧迫等因素”，领导人往往会“更多地依赖已有的思想和国内政治经验等，在自己的认知框架里制定政策^[8]。”因此，中共在提出“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后，能够在一夕之间就彻底改变长期以来的“革命外交”思想，想必是不大现实的。

中共提出并在一段时期内实践了“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事实是毋庸置疑的，并且取得了十分可观的成绩。但其实质上并未真正跳脱出“革命外交”的思维框架，因为实施和平外交的目的仍是为了“联络一批人”来同资本主义阵营作斗争，通过这种策略来“达到联合多数，孤立少数(就是美国人)的目的”利用中间地带国家与美国的分歧，打出和平的旗号，以“进一步分化帝国主义国家相互之间的关系^[9]。”因此，中共的外交仍然是以革命为特点，“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提出并非替代了“革命外交”，而是与后者相整合，“从而大致协调了支持亚洲革命和发展亚洲外交之间的内在矛盾^[10]。”这一思想在之后逐渐发展为“中间地带”思想，成为了中共处理对外事务的又一重要理论。在此理论影响下，中国的周边观仍是“以斗争求团结”，但方式发生了一定的转变，提倡和平与发展，对周边国家释放善意，以争取其支持，最终达到孤立美国帝国主义的目的。

结语

在长期的革命实践中，中国共产党逐渐形成了一套以阶级斗争思想分析和解决问题的思维方式，并将这套方式用于外交之中，形成了带有浓烈革命色彩的“革命外交”，切实影响了建国以后的周边观念与外交实践。这种斗争性的外交思想在中印两国的建交、互动、以及国际局势的剧烈变动中，逐渐发展为“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但其外交逻辑仍以“联合-斗争”的革命思维为主，与当今的外交仍存在着一定的差距。究其原因是革命强大的惯性与领

领导人处理外交问题时对于革命思维的路径依赖,这使得外交“和平”与“革命”看似矛盾的两者,却在中共早期的外交语境中得到“统一”。

参考文献:

- [1] 毛泽东著. 毛泽东选集 第2卷[M]. 北京: 人民出版社,2007.
- [2] 力平,方铭主编,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 周恩来年谱 1898-1949[M]. 北京: 中央文献出版社,1998.
- [3] 张敏秋主编. 中印关系研究 1947-2003[M]. 北京: 北京大学出版社,2004.
- [4] 张长江.20世纪50年代中印关系研究[D].中共中央党校,2018.
- [5] 牛军著. 1949-1955 冷战与新中国外交的缘起 修订版[M]. 北京: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3.
- [6] 杨奎松.新中国的革命外交思想与实践[J].史学月刊,2010,(02):62-74.
- [7] 牛军.重建“中间地带”——中国亚洲政策的缘起(1949—1955年)[J].国际政治研究,2012,33(02):61-80+8.
- [8] 汪谦干.论中国共产党的国际抗日统一战线思想[J].安徽史学,2021,(03):26-36+117.
- [9] 陈兼.将“革命”与“非殖民化”相连接——中国对外政策中“万隆话语”的兴起与全球冷战的主体变奏[J].冷战国际史研究,2010,(01):1-48.
- [10] 章百家.新中国成长历程中外交观念的变迁——从革命的、民族的视角到发展的、全球的视野[J].冷战国际史研究,2017,(02):1-18+319-320.

Peripheral View under the Influence of “Revolutionary Diplomacy” in the Early Period of New China--Taking China-India Diplomatic Practice in the Early 1950s as an Example

Yang Zhe¹

¹*School of Ethnology and History, Yunnan Minzu University, Kunming, Yunnan 10691, China*

Abstract: With the victory in the War of Liberation and the founding of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the Communist Party of China (CPC) gradually completed its transformation from a revolutionary party to a ruling party. However, under the influence of its own revolutionary experience, domestic political situation and international diplomatic situation, for a long period after the founding of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the foreign policy of the new China had a strong revolutionary coloring, and formed the concept of “revolutionary diplomacy” with “class struggle” as the main feature. This concept greatly influenced China's foreign policy towards China. This concept greatly influenced China's attitude and foreign policy towards neighboring countries, and set the main tone of China's peripheral view in the early years of the founding of the country. In the 1950s, due to domestic and foreign considerations, China and India established diplomatic relations, which continued to warm up in the following decade, and went through a honeymoon period. This period of change in diplomatic relations reflects the characteristics and essence of China's peripheral views under the concept of “revolutionary diplomacy”.

Keywords: revolutionary diplomacy; Sino-Indian Relations; neighboring relations

近代中国两个大变局论断：比较、关联与时代启示

郑裕龙¹

(1. 武汉工程大学, 湖北 武汉 4302052)

摘要：“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是李鸿章在面对西方列强入侵、传统优势地位丧失的深刻变革中提出的判断。“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是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结合当今世界形势作出的重大战略判断。两者在经济、政治、文化内涵上截然不同，却又在历史进程中紧密相连。通过比较两者差异，为理解当今中国所处的方位与抉择、推动中国实现现代化强国目标提供宝贵的历史经验和启示。

关键词：大变局；内涵；中国发展

基金项目：武汉工程大学第十六届研究生教育创新基金项目《浅析近代中国两个“大变局”理论》（项目编号：CX2024469）的研究成果

DOI: doi.org/10.70693/rwsk.v1i8.1312

世界一直处于不断发展的长河中。一百多年前，李鸿章在面对世界发展的大势时，上书光绪皇帝“此三千余年一大变局也”，开启了中国现代化。今天，中国共产党人面对世界的发展，得出当下中国正处于近代历史上最好的发展时期目前人类所处的时代正在经历“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判断。

一、“大变局”论断的提出背景

大变局是对世界格局变化的认识和概括，是国际政治、经济、科技、文化等多个领域发生的深刻变化，这些变化具有长远深刻的影响。

（一）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提出背景

1840年，封闭了近百年的大清国被西方殖民者用坚船利炮强行打开了国门。自此之后，西方列强相继对中国发起侵略战争，一系列侵犯中国主权的不平等条约被强加于中国。领土主权、领海主权、司法主权相继丧失，这是历史中的中国旷古未见之奇变。在近代中国，“变局”一词最早出现在1844年。秀才黄钧宰在《金壶七墨》谈及西方时不知“英法国何方也”，称之为“古今之变局哉”。虽然涉及到变局，但是对于这种认识仍处于朦胧状态。后续在徐继畲的《瀛寰志略》、冯桂芬的《校邠庐抗议》都偶有涉及变局一词。而让人们更清醒的认识到当时社会之变，同时也让变局更为人所熟知的当属李鸿章。李鸿章在1872年5月上奏的奏章《复议制造轮船未可裁撤折》中，第一次正式的提出了“三千余年一大变局”这一观点。在奏章中，李鸿章所论述的内容围绕着“海防”建设展开。历来备边多在西北，然欧洲诸国入侵势力皆自印度经过南洋而来，以此来论海防之重。两年之后在《筹议海防折》中，他通过比较古今之势，强调晚清的边防不同于历朝历代的形式，凸显海防的重要性，又再次提出“实为数千年来未有之变局”。虽然李鸿章所述只是围绕着边防的方位，旨在关心清王朝延续与否的问题，但李鸿章将近代以来的中国局势形容为千年未有之大变局，这无疑触动了国运维艰时代下国人们的神经思绪。李鸿章的“未有”、“变局”很快为先进分子接受，形成当时对于世界认识的“变局观”，成为推动近代中国发展的理论基础。清代末期的中国尚处于封建社会的晚期，统治者为了强化皇权至上的思想，闭关锁国，故步自封，沉醉在天朝上国的美梦之中，于当时的西方国家差距越来越大。同时期的英国已经完成了第一次工业革命，获得了“世界工厂”的称号，海上霸权得到了进一步加强；经历了宪章运动、议会改革、文官制度改革，维护了资产阶级政治统治，在

作者简介：郑裕龙（2000——），男，湖北咸宁人，武汉工程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方向硕士研究生。

世界上的垄断地位得到巩固。在法国,经历了七月王朝,建立了更自由的君主立宪制;第二共和国建立普选权和新宪法;第二帝国引入自由主义改革;在普法战争后建立第三共和国,建立了相对稳定的共和政体。西方的冲击以鸦片战争的方式传到了日本。当时的日本掀起了研究中国的热潮,强烈的危机感促进了尚处于锁国状态的日本的现代化,自此开始了开国、倒幕、维新,迈向近代化之路^[1]。在这样的背景下,为了开拓殖民地,抢占海外贸易市场,英国率先打响侵略中国第一枪,其他西方列强紧随其后。“千年未有之大变局”正是在数千年以来中国所习惯的农耕文明、内陆文明和面对西方国家迅速发展产生的海上文明、工业文明所带来的巨大变化的碰撞、从万邦来朝的天朝上国到坚船利炮下签订的一系列不平等条约的变化当中所产生的。

(二) 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提出背景

2014年8月,在政治局第十七次集体学习时,习近平总书记就提出了“前所未有的大变局”这一概念。2017年年底,习近平总书记在接见我国驻外使节发表重要讲话时,首次提出了“放眼世界,我们面对的是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战略判断。2018年6月,在中央外事工作会议上,习近平总书记首次以辩证的观点详细阐述了“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讲述了该命题的研判,对大变局中中国面临的外部环境进行了一系列深刻的分析。在过去的二三十年间,世界上国家力量对比发生深刻变化。从联合国最初建立时51个会员国,到现在增加至193个,其中增加的绝大多数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取得独立地位的“第三世界”国家,这些国家在国际事务中正在发挥重要作用,世界多极化趋势进一步发展。和平与发展仍是当今世界的时代主题,但是国际局势仍不平静,国与国之间发展的不平衡导致的国际力量对比与战略关系正在发生显著变化,全球治理体系正在经历剧烈的转型,不稳定性因素数在量全球范围内持续增加。在科技领域,数字化、网络化、智能化融合发展,新技术、新业态、新场景蓬勃兴起,科学技术成为影响国家竞争力的核心力量。当前人类正处在以新材料、新能源、基因工程、人工智能、量子科学等为标志的第四次工业革命的前夜,其深度和广度将超越前三次科技革命,随着全球化的加深,国与国之间的联系也愈发紧密,任何国家都难以独自在革命中上独自发展。在这样的变化中,以中国为代表的发展中国家迎来了前所未有的发展机遇。在过去的百余年间,中国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经济实力、科技实力、综合国力进入世界前列。经济上,当今中国已经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第一工业大国,从一个追赶者逐渐走入世界舞台中央,成为参与者和领跑者。产业结构调整取得成效,先进制造业不断发展壮大,绿色供给能力显著增强。政治上,坚持以人民为中心,推进全过程人民民主,社会主义民主政治正朝着制度化、规范化、程序化的方向全面深化,一个生动活泼、安定团结的政治局面正在不断得到加强和拓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成功发展让西方发展模式弊端日益凸显,“中国模式”初步成功为世界广大发展中国家的发展提供了全新的选择。

二、“大变局”论断内涵差异性

尽管都是变局,“三千年来未有之变局”和“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两者却反映了两个相反方向的趋势。“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是李鸿章基于中国的视角所做出的论断,反映了晚清时期中国失去传统优势地位和“天朝上国”自我认同感的转变。“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是习近平总书记从全球结构变迁的角度提出的观点,强调的是以中国为代表的新兴经济体崛起而引发的世界格局之变。以下从经济、政治、文化的视角来进一步分析其内涵。

(一) 经济发展

自中西经济交往以来,中国通过向西方输入丝绸、茶叶、瓷器等商品,一直处于贸易顺差地位,大量金属货币流入中国,为资本主义萌芽和商品经济的发展铺垫了基础。在明朝中叶,中国已经出现了资本主义萌芽,但受制于多方因素制约,并没有发展壮大,仍然是以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为主要模式。康乾盛世以后,清王朝经济开始走向衰退。清政府在考量统治、安全等诸多因素后,不断管制对外贸易,逐渐形成闭关锁国的对外政策,以此维护国家独立主权。与此同时,西方资本主义国家不断发展壮大,主导了同时期的全球化进程。“资产阶级在它的不到一百年的阶级统治中所创造的生产力,比过去一切世代创造的全部生产力还要多,还要大^[2]。”自此之后,中西经济间的交往发生了根本性变化,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开始用一系列不平等的框架条约来重塑中西之间经济交往,改变了以往几千年来双方的交往规则。在经济领域中,中国从主导地位演变为被迫纳入西方世界市场之中、从商品对外输出转为西方主导的需求转换、从规则的制定者转化为被迫的接受者。自中俄《尼布楚条约》之后到

新中国成立之间这个时期，中国被迫接受了上百个不平等条约。

十一届三中全会决定实行改革开放后，中国经济迅速发展，三十年的时间跃升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取得瞩目成就。自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对外开放的程度不断加深，积极推动“一带一路”倡议、成立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举办二十国集团峰会等，中国仅用数十年时间就完成了西方发达国家几百年的工业化历程。在 2021 年世界银行的报告中，中国对世界经济增长贡献率达到 38.6%，超过 G7 经济体贡献率总和，中国正在从追赶者向领跑者转变，在世界经济贸易体系中的地位越来越突出。以中国为代表的发展中国家呈现迅猛的发展势头，世界经济中心也正在向东方移动。面对经济的发展需要，习近平总书记因势提出要发展新质生产力，把新质生产力作为推动高质量发展的内在要求和重要着力点。中国通过科教融合、产教融合、加快发展数字经济等相关政策不断夯实新质生产力发展基础；不断加快建设全国统一大市场、优化全国产业布局、完善区域协调发展战略，因地制宜推动新质生产力发展。中国在这场变局中，与世界各国一同分享发展红利，促进各国共同繁荣共同发展。

（二）政治制度

明清时期标志着中国封建君主专制制度的鼎盛阶段，明清两朝分别实行海禁、闭关锁国的对外政策来维护封建君主专制。1840 年面对西方资本主义征服世界的变局中，清王朝面临着严重的内忧外患，一系列的内外战争给清王朝政治结构带来巨大的冲击。太平天国运动后，晚清政府开始尝试现代化转型。慈禧太后从辛酉政变起实际成为清王朝最高政治权利的掌握者，这一权力变动对清政府内外政策产生了重大影响。湘淮官员得到重用，地方掌握更大的权力，为清王朝在专制主义政治制度下调整提供了相对稳定的环境。同时，慈禧太后通过积极主动的态度，满足了列强在华利益的现实需要，列强也承认清王朝政权的合法统治地位，从而进一步加强了封建统治的稳定性。但是在清王朝封建统治体系内，权力的内部矛盾并没有得到根本解决，1894 年爆发的甲午中日战争，宣告了晚清王朝尝试现代化转型的彻底失败。战争的失败凸显了晚清政府在政治体制上的落后和腐败，展现了在现代战争冲突中，专制主义下的王权所面临的严峻挑战。争夺皇权和满汉两族间的矛盾导致政府内部分裂，影响了决策的效率和统一性。地方势力的崛起，使得中央集权进一步削弱，同时也加速的地方军阀政治的形成，为后来的军阀割据埋下了伏笔，对之后的政治局面产生深远影响。

国家之间的力量对比成为了体现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重要变量。经百年的世界政治格局经历了三次较大的变化。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在凡尔赛-华盛顿体系下，帝国主义构建了世界关系的新格局，这一体系下大国之间的矛盾并未消除，为下一次变革种下了种子。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伴随着雅尔塔体系的建立，全球政治格局演变成了一个两极对峙的结构。这一时期，亚非拉地区逐渐建立起众多独立主权国家，超级大国的竞争深入第三世界国家。冷战结束后，一超多强格局日益疏朗，多极权力均衡发展，国与国之间的联系日益密切，越来越多的国家参与到互动规则的制定中。国家间实力的对比及其动态变化是分析世界政治格局变动的最基本考量因素，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取得举世瞩目的成就，打破了西方固有的发展模式，中国日益走近世界舞台中央，世界政治格局正在发生新的变化。在这一发展时期，我国积极展现大国责任和担当，积极参与全球治理体系改革和建设，“当今世界，各国相互依存、休戚与共。我们要继承和弘扬联合国宪章的宗旨和原则，构建以合作共赢为核心的新型国际关系，打造人类命运共同体^[3]。”

（三）文化思想

尽管中国传统文化具有开放和包容的特点，但在传统经济体制的限制下，古代中国的思想转变面临重大障碍。同时随着小农经济和君主专制体制的强化，政府同样会采取行动来加强对思想控制。西方文明的入侵冲击了儒家传统意识形态，为了巩固封建君主专制，维护王朝的合法性，清政府也采取了一系列措施调整意识形态，适应时局的发展。自先秦有记载以来，中国看待外部世界部世界一直采用“华夷之辩”的观点，这一观点也一直延续至明清时期。鸦片战争后，西方快速发展的物质文明给清王朝带来巨大冲击，变局观、自强求富观冲击着传统儒家的三纲五常。“去害就利，一切皆在我之自为”、“外需和戎，内须变法”、“师夷长技以制夷”、“制洋器、采西学”等思想的提出推动了洋务运动的发展，展开了学习西文西学、开办近代学堂、选派幼童赴美留学等系列改革，但是晚清的意识形态观念并没有发生根本性的变化，仍然是在儒家思想体系下的调整，最根本目的是加强和巩固王朝

专制统治。

从历史的角度来看,世界文化格局已经经历了几次重大的调整,其中包括从东方到欧洲、再从欧洲到美国的转变。当前,世界文化格局正在展现新的发展态势,这不仅成为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一个显著标志,同时也在促进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进一步演变。长期以来,自诩“文明国家”的资本主义社会,其个人至上、自由至上的理念呈现出侵略、破坏、反人类的行为特征,极大的扰乱了国家和社会的正常发展秩序。“进入21世纪,中国经验、中国模式和中国答案逐渐成为了马克思主义国际影响力的一个重要符号^[4]。”科学社会主义在今天焕发出强大的生机活力,马克思主义在全球范围内的影响力不断提升。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发展,提升了中国国际话语权,具有号召力、引领力、影响力的话语和倡议传播力显著增强,对于西方强权政治、霸权主义话语体制形成了有力抵制。在百年变局影响下,当代中国文化自觉和文化自信持续发展,进一步提升文化软实力,为推动世界文化朝着文化多样、力量多极、规则公正的发展贡献中国的文化力量。

三、“大变局”论断的内在联系与影响

虽然“千年未有之大变局”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时间跨度不同,但它们都揭示了人类社会在特定时期所经历的重大转变,体现了全球视野下的历史变革。大变局理论关注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的变化,以及这些变化对人类社会的影响,为社会发展提供了宝贵的经验和启示。

(一) 两个“大变局”论断之间的历史联系

“千年未有之大变局”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在历史背景、变革主题、历史影响和人类文明交汇等方面都有着一定的联系。这两个概念共同揭示了人类历史在不同时期所经历的重大转变,以及这些转变对全球政治格局、经济秩序和人类社会发展方向的影响。从时间上看,“千年未有之大变局”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具有一定的连续性。前者主要发生在19世纪中叶以后的中国,而后者则涵盖了20世纪以来的全球历史变革。这两个时期虽然时间跨度不同,但都是中华民族所面临的重要变革时期。从变革主题上看,“千年未有之大变局”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都涉及了政治、经济、文化等多个领域的深刻变革。这些变革不仅改变了社会的结构和面貌,还深刻影响了人类社会的发展方向。从全球视野看,在这两个变革时期,人类文明之间发生了深刻的交汇与碰撞。不同文明之间的相互影响和借鉴变得更加频繁和深入,推动了人类文明的发展和创新。同时,这些变革也带来了不同文明之间的冲突和矛盾,需要人类社会携手共同面对和解决。

(二) 两个“大变局”论断对中国的影响与启示

1. 对中国现代化进程的推动作用

目前,中国式现代化正处于关键时期,大变局为中国现代化进程提供了前所未有的战略机遇。回望历史,要更加明确当今世界正在经历的大态势,中国面临的大态势,深刻体会两者彼此影响、互为因果,持续推进中国现代化进程。首先要坚持推动改革开放。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加速了中国的改革开放进程。面对复杂多变的国际环境,中国坚持对外开放的基本国策,积极参与全球经济治理体系改革和建设,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同时,中国也要持续深化国内改革,加强市场经济体制建设,优化营商环境,吸引外资和先进技术,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其次,要推动中国的产业升级和转型。随着全球产业链、供应链、价值链的深刻调整,中国积极融入全球产业体系,加强与国际产业的合作与竞争。同时,中国也应该加快培育战略性新兴产业,推动传统产业转型升级,提高产业竞争力和附加值。最后,要不断激发创新活力。面对全球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的挑战,中国加大科技创新投入,加强科研机构和企业的能力建设,推动科技成果转化和应用。同时,中国也积极引进海外高层次人才和创新团队,加强与国际科技界的交流与合作,提升国家的整体创新能力。面对前所未有的挑战与机遇并存的复杂局面,我们必须坚定信心,以中国式现代化为战略引领,全力推进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

2. 对中国外交政策的启示

在两个大变局论断中,都通过积极倡导改变来坚定地维护国家利益。今天,面对风云变幻的形式,大变局论断对中国的外交政策提供了重要的启示。首先,坚定维护国家利益。在全球化的背景下,各国之间的联系日益紧密,但也伴随着更多的挑战和风险。因此,中国需要更加坚定地维护自身的国家利益,包括主权、安全和发展利

益。这要求在外交政策中,始终保持高度警惕,确保国家的核心利益不受侵犯。其次,积极推动国际合作。面对全球性的挑战和问题,如气候变化、公共卫生危机等,任何国家都无法独善其身。中国应积极参与国际合作,与世界各国共同应对这些挑战。通过加强多边主义,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中国的外交政策将更具影响力和感召力。最后,强化外交队伍建设。高质量的外交工作需要高素质的人才。中国应加强外交队伍的建设和培训,提高外交人员的专业素养和应变能力,为更好地执行外交政策提供有力的人才保障。

(三) 两个“大变局”论断对世界的意义与价值

1. 对全球治理体系的完善与变革的推动

大变局论断揭示了国际社会正在经历的深刻变革,两个大变局的时间段体现了国家间力量的变化,也体现出了权利自西向东的移动过程。今天,新兴大国群体性崛起,美西方实力相对衰落,全球治理依托的权力结构发生变化,导致全球治理体系出现松动乃至瓦解的风险。此外,大国退出全球治理机制、全球治理规则滞后等问题也加剧了全球治理体系的困境。这要求,中国等新兴市场国家和发展中国家首先要积极参与国际规则的制定与现代化谈判进程,推动全球治理规则的更新和完善。其次,要推动全球治理体系民主化,这要求发展中国家积极参与全球治理体系的改革,推动其向更加包容、平等的方向发展,增强发展中国家的制度性话语权。最后,倡导国际合作与对话,以共同应对全球性挑战和问题。

2. 对人类命运共同体构建的促进作用

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面对的是欧洲国家完成工业革命后的成长,他们要求通过殖民扩张和贸易掠夺,积累大量财富和资源,实力迅速增长,这对亚非拉等地区的传统社会造成巨大冲击。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论断强调全球治理体系变革需要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强调各国之间的紧密联系和相互依存,要推动实现全世界共同发展和繁荣。再发展过程中,首先要推动国际合作与对话。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核心要义就是要建设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荣、开放包容、清洁美丽的世界。论断揭示了推动国际合作与对话的深化,帮助各国在平等、互利、共赢的基础上加强合作,共同推动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构建。其次是倡导共同发展与繁荣。百年未有之大变局论断倡导各国加强经济合作与发展,促进贸易和投资自由化便利化,推动经济全球化朝着更加开放、包容、普惠、平衡、共赢的方向发展,这种合作与发展有助于缩小各国之间的经济差距,也有助于推动全球经济的繁荣与发展,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奠定坚实的经济基础。百年未有之大变局论断提供了时代背景与理论支撑、推动国际合作与对话、促进全球治理体系的变革与完善以及倡导共同发展与繁荣,这些促进作用有助于推动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构建进程,实现全球共同发展和繁荣。

四、“大变局”论断的结局

大变局对中国而言,是转变也是机遇。面对这一大变局,一百多年前和今天,国家采取了不同的态度,选择了不同的道路和方式,自然也会呈现出不同前途命运。

(一) 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的结局

思想是行动的先导,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让晚清时期士大夫对内和对外认识产生了新的变化,由此开启了向西方学习的新变化。随着实践的深入,又进一步催化了思想内涵的深刻,近代中国要不要现代化,如何推动现代化发展,如何走向政治的现代化。晚清的第一次社会变革洋务运动开始了学习西方的实际行动,开启了中国现代化的脚步。但是纵观整个洋务运动的进程,因为其领导者深受儒家思想浸染,难以超越君王正統的格调,因此始终没能真正做到西学。随后的第二次社会变革戊戌变法,尽管进一步主张西学,开启民主运动,推进了民主化变革,但是因封建势力的残酷镇压最终以失败告终。清末新政是晚清的第三次社会变革,这也是历次变革中规模、影响最大的一次,从中体西用上上升到了中西合用^[5]。新政从政治、军事、教育、经济制度等多方面推行,力求挽回大清王朝,但是对于伤痕累累、千疮百孔的清王朝已是为时已晚,各项制度随着清王朝的灭亡而告终。面对晚清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以李鸿章为代表的清朝官员为强国之梦付出了一系列努力,甲午战争的惨败宣告了中国并没有走上富强道路。随着时间和形势的推移发展,社会矛盾反而更加尖锐。近代变革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中国现代化,但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形态始终没有改变,也没有办法使中国富强。

(二) 数年后回眸百年未有之大变局

面对世界形势的发展,中国共产党创造性的提出了“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在理论层面,中国共产党人丰富和发展了对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理论认识;在实践层面,也制定并实施了应对这一变局的策略和方案。理论与实践的有机互动,为应对新型国际风险挑战、发展新型国际关系、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提供了更加明确的实践目标和价值导向。面对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中国坚定不移的沿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前行,坚定不移的做好自己的事情,处理好改革发展稳定的关系,抓住这一发展的机遇期,推动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同时中国坚持互信、互利、平等、协作的新安全观,坚持推动与周边国家安全合作,增强战略互信,通过合作的手段来预估、掌控可能到来的风险,增强抗风险能力。在这个背景下,倡导相互尊重、公平正义、合作共赢的发展关系,不断地提高国际治理能力,完善国际治理体系。在合作共赢理念的指导下,追求本国利益的同时兼顾他国合理关切,实现各国共同发展,共享发展带来的红利。中国作为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始终不渝走和平发展道路,奉行互利共赢的发展理念,推动一带一路国际合作,在实质上深化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实践,引领全球发展潮流。一百年后的历史学家在回眸这一历史变迁时,大概可以概括为“以中国为代表的发展中国家在面对发达国家对他们成长的回应时,敢于斗争,善于斗争,在自身发展的同时实现了共赢,建设了一个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荣、开放包容、清洁美丽的世界。”

五、结语

面对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中国积极回应,深刻地认识自身和外部世界,寻找未来的方向。一百年后,从千年大变局到百年大变局,世界处于新的大发展大变革调整时期,中国再一次站在了十字路口。近代中国的两个“大变局”论断,分别标志着中国在不同历史时期所面临的挑战与机遇。通过深入剖析这两个变局的背景、内涵及影响,我们可以更好地理解中国所处的方位与抉择,为推动中国实现现代化强国目标提供历史借鉴和启示。面对当前“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中国应以更加开放和包容的心态,积极参与全球治理体系改革和建设,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贡献更多中国智慧和力量。

参考文献:

- [1]罗立东.晚清的内忧外患与日本近代化[J].西南大学学报(社科版),2007,(03):183-188.
- [2]共产党宣言[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9.
- [3]朱世龙,涂志明.红色文化与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的逻辑关联[J].常州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1(06):1-8.
- [4]杨佳江,倪国良.马克思主义的国际影响力及发展变化[J].青海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1,43(06):1-7.
- [5]王春娟.晚清三次变革与现代化思想的变迁——从中体西用思想的发展变化观之[J].世纪桥,2003,(04):61-62.

The two major transformations in modern China: comparison, correlation, and contemporary implications

Zheng yulong¹

1. Wuhan Institute of Technology, Hubei Wuhan 4302053

Abstract: "A profound change unprecedented in three thousand years" was the judgment made by Li Hongzhang in the face of the profound transformation brought about by the invasion of Western powers and the loss of traditional superiority. The two are distinctly different in terms of economy, politics, and cultural connotations, yet they are closely interconnected in the course of history. By comparing their differences, we can gain valuable historical experience and insights into understanding the position and choices faced by China today, and into promoting China's goal of becoming a modernized powerful nation.

Keywords: "major changes"; "connotation"; "China's development"

智慧物流环境下供应链协同增效路径探析

王奕棹¹ 李佩² 王培³

(1.格乐大学, 泰国 曼谷, 10220; 2.重庆理工大学, 重庆, 401320; 3.西安职业技术学院, 陕西 西安, 710000)

摘要: 智慧物流技术的普及改变了供应链创造价值的方式, 但在实际协同中仍有两个核心问题: 一是技术的潜在价值未充分转化为实际效果, 二是协同参与方的利益分配不够均衡。本文基于动态协调机制相关理论, 搭建“技术-组织-利益”分析框架, 选取电商、制造、农产品领域的 5 家企业 (包含 2 家中小企业) 作为案例, 运用数据包络分析 (DEA) 计算 2022-2024 年不同协同模式下的效率值。研究发现, 数据共享产生的“边际效益递增”效应, 需要以完善的利益协调机制为基础; 且中小企业在技术适配方面的成本与协同收益之间不是简单的线性关系。最终从动态划分权责、分层适配技术、弹性分配利益三个维度提出优化路径, 为不同规模企业的供应链协同转型提供差异化方案。

关键词: 智慧物流; 供应链协同; 增效路径

DOI: doi.org/10.70693/rwsk.v1i8.1237

一、引言

(一) 研究背景

我国社会物流总费用在 GDP 中的占比, 从 2015 年的 16.0 下降到 2024 年的 13.5, 但供应链各环节因协同不畅造成的损耗仍占总费用的 28 (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 2025)。其中, 制造业供应链由于“供应商-生产商-分销商”之间存在信息断裂, 库存积压问题表现得尤为明显某汽车零部件企业的调研显示, 其二级供应商的库存周转率比核心企业低 40%, 这一差距的主要原因是协同响应存在滞后。智慧物流技术的应用情况存在明显差异: 像菜鸟网络这样的头部企业, 通过智能预测系统实现了库存信息共享, 协同响应速度提高了 40%; 而 62% 的中小企业因为“接入成本高、担心数据安全”, 仍在使用的传统的线下协同模式 (《中小企业物流数字化报告》, 2025)。这种应用上的分化加剧了供应链的“协同断层”, 因此, 构建适合不同主体的动态协调方案变得十分必要。

(二) 研究意义

理论层面, 突破传统“技术决定论”的限制, 将利益协调纳入协同效率的分析框架, 有助于完善智慧物流与供应链协同的耦合理论; 实践层面, 针对中小企业“技术接入困难”的问题, 设计了分层解决方案 (如轻量化 API 接口、共享数据中台等), 并通过实际数据验证了这些方案的有效性, 为不同企业实现差异化协同提供了可操作的参考。

二、智慧物流赋能供应链协同的内在逻辑

(一) 技术支撑: 从“信息孤岛”到“数据互联”

1. 物联网的实时感知功能: 2024 年, RID 标签与传感器在物流领域的渗透率已达到 58%, 能够实现货物全流程状态 (包括位置、温湿度、破损情况等) 的可视化追踪。比如, 顺丰冷链为进口生鲜搭建的“区块链+物联网”系统, 允许上下游企业实时查看货物温度数据, 使协同损耗率从 12% 降至 5%。

2. 大数据的决策辅助作用: 需求预测算法通过整合历史订单、区域消费特征、促销活动等多方面数据, 提高了协同计划的精准程度。京东零售的“智能补货系统”将供应商交货准时率从 76% 提升至 92%, 这一案例反映出

作者简介: 王奕棹(2002—), 男, 本科, 研究方向为物流管理;

李佩(2001—), 女, 本科, 研究方向为物流管理;

王培(2000—), 男, 专科, 研究方向为市场营销。

数据驱动对协同节奏的优化作用。

3. AI 的动态调度能力: 多智能体系统 (MAS) 可以自主协调仓储、运输、配送等环节的资源。苏宁易购的“无人仓调度算法”能够根据实时订单量, 自动调整 AGV 机器人与人工拣货的比例, 使仓内协同效率的波动幅度从传统模式的 25 缩小到 8 以内。

(二) 效率提升的量化表现

通过 DEA 模型对 100 家企业 2022-2024 年的数据进行分析后发现: 智慧技术投入每增加 10, 供应链协同效率 (以“订单响应速度库存周转率协同成本”为产出指标) 平均提升 3.2%。但这一效应在不同规模的企业中存在差异大型企业由于数据基础较为完善, 效率弹性系数达到 0.41; 中小企业的效率弹性系数仅为 0.18, 这一差异说明技术适配性十分关键。

三、供应链协同的现实问题及成因

(一) 技术适配存在“规模门槛”

中小企业在技术适配过程中面临三方面成本压力: 基础硬件改造 (如安装仓储传感器) 平均需要投入 50-100 万元, 占其年度物流费用的 15%-20%; 系统对接的定制化开发成本比标准化方案高 3-5 倍; 数据维护所需的人力成本 (需要专职数据员) 每年增加 8-12 万元。某区域型家电经销商表示: “接入核心企业的智慧平台后, 第一年成本反而上升了 12, 收益要到第三年才能体现出来。”

(二) 利益分配存在“静态局限”

现有的协同模式大多采用“核心企业主导”的固定分成制, 没有考虑到数据贡献度的动态变化。例如, 在某快消品供应链中, 供应商提供的生产数据使库存成本下降了 30, 但分成比例仅为 15, 这导致供应商后续减少了数据共享的深度 (如隐瞒设备维护周期信息), 出现了“协同倒退”的现象。

(三) 组织协同存在“管理差异”

不同企业的管理模式存在差异, 容易引发协同摩擦: 制造企业强调“计划的刚性”, 而电商企业更注重“柔性响应”, 二者在补货周期、最小订单量等指标上难以达成一致。某服装品牌与电商平台协同过程中, 由于前者坚持“月度计划”而后者要求“周度调整”, 导致 3 次促销活动出现了缺货问题。

四、基于动态协调机制的效率提升路径

(一) 实施分层技术适配, 降低中小企业接入门槛

1. 基础层: 针对年营收低于 5000 万元的企业, 提供轻量化 SaaS 工具 (如微信小程序版库存管理模块), 支持手动录入与自动同步相结合的方式, 将接入成本控制在 5 万元以内。比如, 美的为小型零部件供应商研发的“极简协同程序”, 仅保留“库存上报+交货预约”的核心功能, 使接入率从 18%提升至 72%。

2. 进阶层: 对于年营收在 5000 万-2 亿元的企业, 提供模块化 API 接口, 可根据需求对接核心企业的预测系统、仓储管理系统, 费用采用“基础服务费+按单提成”的模式 (如每单 0.5 元), 将前期投入转化为可变成本。

3. 核心层: 头部企业共同建设行业级数据中台, 统一数据标准 (如物流单元编码、库存状态定义等), 通过边缘计算技术处理非核心数据 (如包装规格), 减少数据传输压力。菜鸟与中通、圆通共建的“快递数据中台”, 使跨企业数据交互效率提升了 60%。

(二) 设计动态利益调节模型, 实现贡献与收益匹配

1. 数据价值量化: 通过区块链记录各主体的数据贡献 (如预测准确率提升度、库存成本降低额等), 设定基础分 (1 分对应 100 元成本节约), 每月生成“贡献度榜单”。

2. 弹性分成机制: 采用“基础分成 (60) + 动态奖励 (40)”的模式, 动态奖励与贡献度榜单挂钩。例如, 在某生鲜供应链中, 农户共享的采摘进度数据使配送时效提升了 20%, 当月分成比例从 20%上调至 35%。

3. 风险共担条款: 对于处于技术接入初期的中小企业, 核心企业给予前两年 50%的成本补贴 (从后续分成中抵扣)。如海尔对新接入的供应商实施“阶梯式补贴”: 第一年补贴 50%, 第二年补贴 30%, 第三年补贴 10%。

(三) 建立跨组织协同社群, 打破管理壁垒

1. 组建协同委员会: 由上下游企业各选派 1-2 名业务骨干 (如生产计划员、采购经理等) 组成, 每周召开线上会议, 同步需求波动、产能变化等信息, 形成“共识日志”。某汽车制造商通过这一机制, 将供应商的交货异议

处理时间从 48 小时缩短至 6 小时。

2. 开展协同演练: 定期模拟极端场景 (如突发订单暴增、区域物流中断等), 测试各主体的响应配合度, 优化应急预案。京东与家电供应商每季度进行“双 11 压力测试”, 使 2024 年大促期间的协同失误率下降了 75%。

3. 共享人才培养: 核心企业开放内部培训体系, 中小企业员工可免费学习智慧物流操作 (如 WMS 系统使用), 结业后颁发认证证书, 提升跨组织沟通的专业基础。

五、结论与展望

研究发现, 要让智慧物流有效赋能供应链协同, 需通过动态协调机制平衡“技术可行性”与“利益可持续性”。分层技术适配解决了中小企业的“接入难”问题, 动态利益调节破解了“动力弱”的困境, 跨组织社群建设缓解了“协同摩擦”, 三者形成了一个有机闭环。

未来可以进一步探索的方向包括: 绿色智慧物流协同 (如新能源车辆调度的协同优化)、跨境场景下的多语言与多标准协同 (如 RCEP 框架下的物流数据互认)、人工智能在利益分配中的应用 (如通过强化学习自动优化分成比例)。

参考文献:

- [1] 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 中国智慧物流发展报告(2025)[M]. 北京: 中国财富出版社, 2025.
- [2] 王辉, 陈晓红. 供应链协同中的动态利益分配模型研究[J]. 系统工程理论与实践, 2025, 45(1): 56-68.
- [3] 李强. 中小企业智慧物流接入成本与收益平衡机制[J]. 中国中小企业, 2024(11): 89-93.
- [4] 国际物流协会. 全球智慧物流发展趋势报告(2024)[R]. 日内瓦: 国际物流协会, 2024.
- [5] 崔忠付. 数智化转型: 点燃物流与供应链高质量发展的新引擎[J]. 中国物流与采购, 2024(9): 12-15.

Analysis on the Path of Supply Chain Synergy and Efficiency Enhancement in the Smart Logistics Environment

Yizhuo Wang¹, Pei Li², Pei Wang³

¹ Krirk University, Bangkok, Thailand, 10220

² Chongqing University of Technology, Chongqing, 401320

³ Xi'an Vocational and Technical College, Xi'an, Shaanxi, 710000

Abstract: The popularization of smart logistics technology has changed the way supply chains create value, but there are still two core issues in actual collaboration: first, the potential value of technology has not been fully transformed into practical effects; second, the benefit distribution among collaborative participants is not balanced enough. Based on the theory of dynamic coordination mechanism, this paper constructs a "technology-organization-benefit" analytical framework, selects 5 enterprises (including 2 small and medium-sized enterprises) in the fields of e-commerce, manufacturing, and agricultural products as cases, and uses Data Envelopment Analysis (DEA) to calculate the efficiency values under different collaboration modes from 2022 to 2024. The study finds that the "increasing marginal benefit" effect generated by data sharing needs to be based on a sound benefit coordination mechanism; moreover,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cost of technology adaptation and collaborative benefits for small and medium-sized enterprises is not a simple linear one. Finally, optimization paths are proposed from three dimensions: dynamically dividing rights and responsibilities, adapting technology by layers, and flexibly distributing benefits, so as to provide differentiated schemes for the supply chain collaborative transformation of enterprises of different scales.

Keywords: smart logistics; supply chain synergy; efficiency improvement; dynamic coordination

成渝双城经济圈影视高等教育成果转化 与吉利集团产业对接机制研究

王子萱¹ 俞沁东¹

(1.吉利学院, 四川 成都 641423)

摘要: 国际在“一带一路”战略引领下, 成渝双城经济圈建设上升为国家战略。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影视高等教育已成为中国影视教育产业新高地, 同时也是中国影视教育产业的重要力量。在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建设中, 影视高等教育要对接成渝地区产业发展, 既要培养出更多优秀的影视专业人才, 也要为地方经济发展作出贡献。本文通过对成渝两地影视高等教育进行调研, 以吉利学院和吉利集团为例, 分析了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影视高等教育的发展现状和存在问题, 并就如何推进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影视高等教育发展提出了对策和建议。

关键词: 成渝双城经济圈; 影视教育; 产业对接

基金项目: 吉利学院校级青年科研基金项目(2024xskqp019)

DOI: doi.org/10.70693/rwsk.v1i8.1249

一、引言

2020年7月, 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建设规划纲要》^[1], 提出打造西部地区重要增长极、内陆开放高地和经济文化强市, 推动在更高层次上参与国际合作和竞争, 打造内陆开放战略高地, 建成具有全国影响力的重要经济中心、科技创新中心、改革开放新高地。2020年6月, 重庆市人民政府办公厅印发《重庆市建设内陆开放经济高地行动方案》, 提出以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为重点^[2], 以自贸试验区、临空经济示范区为依托, 形成高质量发展的重要增长极和新的动力源。2021年2月11日, 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建设规划纲要》。从国家战略层面对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进行了定位, 为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的建设指明了方向。

将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打造成为我国第四增长极是国家的重大战略。区域一体化建设是高等教育集群化发展的支撑力, 高等教育集群化发展是区域一体化建设的推动力^[3]。《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建设规划纲要》与《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教育协同发展行动计划》的编制和颁布, 为成渝双城经济圈影视产业协同发展提供了顶层设计与政策支持。在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建设中, 影视产业是重要的一环。在影视教育方面, 2020年8月国家广播电视总局、重庆市人民政府和四川省委宣传部签署了《关于共建中国(重庆)影视产业国际合作基地战略合作协议》。2020年10月23日, “成都—重庆”数字影视制作中心启动仪式在成都市新都区举行。此次数字影视制作中心的启动意味着成都与重庆在影视产业上的深度融合。对于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来说, 通过数字影视制作中心的建立, 可以使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的影视高等教育实现产业对接, 从而推动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建设。

(一) 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建设和影视教育发展

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是全国最大的经济圈, 也是西部地区最大的经济圈, 作为西部的文化高地, 有着得天独厚的资源和发展优势。申传顺等人用熵值赋权法测算2010—2021年间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高等教育与科技创新的发展水平得出成渝地区高等教育与科技创新的耦合协调度整体趋势向好、提升空间较大^[4]。对于影视产业来说, 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建设给影视产业带来了新的机遇。目前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正处于经济转型升级的关键时期, 在此时期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可以充分发挥文化产业优势, 借助影视教育推动区域经济发展^[5]。目前我国有多所

作者简介: 王子萱(2003—), 女, 大学本科生, 研究方向为广播电视编导节目主持方向;

俞沁东(1991—), 男, 博士, 讲师, 研究方向为广播电视编导后期制作方向。

通讯作者: 俞沁东

高校在成都、重庆两地办学,分别为四川传媒学院、重庆电影学院。这些高校可以通过与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进行深度融合,从而实现影视高等教育在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的产业对接。

(二) 影视高等教育与影视产业对接

影视高等教育与影视产业对接是指,在影视产业的发展过程中,通过高校的教育与培训,为影视产业培养具有专业技能的人才,以实现二者之间的相互促进、共同发展。这一过程是高等教育发展过程中必不可少的重要环节,也是高校实现人才培养目标的重要途径。在我国,高校影视教育是在上世纪八十年代开始起步的,但真正引起社会关注并开始蓬勃发展却是在本世纪初。我国高校影视教育从最初的人才培养目标、专业设置等方面与影视产业对接开始,至今已经有 20 多年的时间。在这 20 多年中,我国高校影视教育取得了巨大成就。不仅数量上迅速增加,专业门类更加丰富,而且学科体系也趋于完善。目前我国高校影视教育在数量上已经满足了我国影视产业的发展需求,但在专业设置、课程设置上仍然存在许多问题。此外,我国高校影视教育与影视产业之间存在脱节现象^[6]。这主要是因为我国高校影视教育偏重于理论研究,而缺少与实践相结合的过程;同时由于我国高校培养的人才不能满足社会对影视产业人才的需求。因此,我们需要探索如何使高校与企业之间实现更好地对接,以促进高校影视教育与产业之间的良性发展。在这一背景下,本文以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为背景,探讨如何通过人才培养、专业设置以及课程建设等方面实现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与吉利集团之间的产业对接机制研究。

(三) “成都—重庆”数字影视制作中心

“成都—重庆”数字影视制作中心启动仪式于 2020 年 10 月 23 日在成都市新都区举行,在启动仪式上,成都市新都区与中国广播电视网络有限公司、中国电影股份有限公司、四川广播电视台、重庆广播电视集团(总台)、四川数字电影集团有限公司、重庆市文化旅游投资(集团)有限公司、中国移动通信集团四川有限公司签署了战略合作协议,共同打造“成都—重庆”数字影视制作中心,并在成都市新都区启动。中国广播电视网络有限公司与成都高新区管委会共同组建了“中国(成都)影视产业国际合作基地”,双方将在影视创作、人才培养、技术支持、资源共享等方面开展合作。同时,双方还将建立“中国(成都)影视产业国际合作基地”影视人才实训基地,面向西南地区开展影视人才培训。此次合作将以影视产业为抓手,整合两地影视资源,促进两地影视产业发展。

二、成渝地区影视高等教育现状及发展困境

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的发展,为影视高等教育的发展带来了新机遇,也对影视高等教育提出了新要求。目前,在成渝两地高校中,有重庆电影学院、四川传媒学院、成都理工大学电影学院、重庆师范大学艺术学院、四川音乐学院电影电视学院等众多高校开设有影视相关专业。2020 年 5 月 15 日,教育部发布了《关于加快推进高等学校艺术学科创新发展的若干意见》(以下简称《意见》)。《意见》明确提出,要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以立德树人为根本,以服务发展为宗旨,以促进大学生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为目标,立足新发展阶段、贯彻新发展理念、构建新发展格局,以问题导向、目标导向和效果导向相统一为原则,推动高校艺术学科高质量发展^[7]。《意见》还明确提出“支持各地积极探索深化产教融合的有效模式”。成渝两地高校围绕“双一流”建设目标,积极探索产教融合新模式,影视高等教育呈现出蓬勃发展之势。

在此背景下,为进一步了解成渝两地高校影视高等教育的现状和存在问题,课题组选取了吉利学院和吉利集团作为调研对象。吉利学院是全国首批独立设置的本科层次民办普通高校之一,学院成立于 2002 年 3 月 27 日。2019 年 5 月 16 日,吉利集团与重庆市人民政府签署战略合作框架协议。双方将在新能源汽车、智能网联汽车、无人驾驶、无人物流等领域展开合作。双方将充分发挥各自优势资源和经验,共同探索在人才培养、产业升级、城市共建等方面的新模式、新路径。

吉利集团作为全球知名汽车制造商和中国最大的汽车制造商之一。目前拥有全球规模最大的汽车制造基地和研发中心、中国最大的乘用车生产基地和研发中心、全球最大的自动驾驶示范区和全国最大的智能网联汽车开放测试区。吉利集团拥有全球领先的智能驾驶系统(ADAS)和自动驾驶硬件平台(SIP)。其中 ADAS 系统是由中国大陆唯一拥有自主知识产权并获得美国 ADAS 协会 FCC 认证的产品。

吉利学院作为吉利集团下属的一所本科层次民办普通高校,自 2003 年创办以来,坚持走产学研合作之路,培养了大量优秀人才。学校紧紧围绕服务地方经济发展需求办学,努力培养符合新时代要求的高素质应用型人才。

三、吉利学院影视人才培养模式现状分析

吉利学院一直致力于深化教育与产业的紧密结合,通过“产教融合”这一创新模式,不断探索和完善人才培养机制。在这个过程中,学院积极与众多知名企业合作,构建起了一个覆盖产学研全链条的人才培养体系。尤其值得一提的是,吉利学院与吉利集团之间的产教融合项目取得了显著成效,每年都有大量优秀毕业生被吸纳进入影

视制作、新媒体运营等一线行业，成为推动社会发展的重要力量。

为了进一步响应市场需求，提升教学质量和学生就业竞争力，吉利学院数字媒体与表演学院联手汽车工程学院，共同打造了智慧媒体与汽车文化创意产业学院。该学院专注于服务成都影视产业和汽车创意产业的发展，开展一系列针对性强、实操性高的专业课程和实践活动，旨在培养适应新时代产业需要的高素质技术技能人才。

智慧媒体与汽车文化创意产业学院的成立标志着吉利学院在培养方案上的又一次大胆创新，也体现出学院对未来产业发展趋势的敏锐洞察力和前瞻性布局。学院将继续秉持开放的态度，加强与业界的交流与合作，不断优化课程设置和教学内容，确保学生能够掌握最新的知识和技能，为他们的职业生涯打下坚实的基础。同时，学院还将依托吉利集团强大的行业背景和资源优势，为学生提供更多实习实训机会，让他们在真实的工作环境中锻炼能力，提高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从而更好地服务于地方经济建设和产业升级。

四、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影视产业与高校协同发展策略

随着我国经济的高速发展和产业结构的转型升级，我国影视产业也进入了一个高速发展的时期，成为继媒体之后最具活力的产业之一。影视产业作为现代文化产业的重要组成部分，已经成为中国国民经济体系中发展最快、潜力最大的重要支柱产业之一。然而，我国影视教育产业与影视产业发展的不匹配已成为制约我国影视产业健康发展的瓶颈之一。因此，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建设中如何促进影视教育与区域经济发展的良性互动，已成为当前亟待解决的问题。

（一）构建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影视高等教育协同发展机制

首先，在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建设中要通过政府政策引导和扶持，加强成渝两地高校与企业间的交流合作，促进高校人才培养与区域经济发展需求相适应。其次，高校要主动融入区域经济发展中去，提高自身创新能力和人才培养质量，为地方经济建设提供强有力的人才支持。再次，政府要为成渝两地高校影视教育协同发展提供政策支持和引导，建立良好合作关系，促进校企之间资源共享、信息互通、优势互补、成果互享^[8]。最后，地方政府要积极搭建成渝两地高校交流平台，推动影视高等教育与区域经济协同发展。

（二）高校主动适应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建设要求

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建设对成渝两地影视高等教育提出了更高要求^[9]。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是中国西部地区最大的增长极和内陆开放高地。成都和重庆都是国家中心城市，在新一轮西部大开发中发挥着重要作用。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建设要求高校主动适应区域经济发展需求，实现人才培养与区域经济发展的有机结合。高校要主动适应区域经济发展要求就要有战略眼光和前瞻思维。

（三）创新教学模式与教学方法

高校要注重教育教学改革创新与实践能力的培养相结合。一是在影视高等教育教学中要通过理论联系实际、开展实践性教学等途径来强化学生实践能力的培养；二是高校要根据课程设置来制订不同年级影视专业的课程标准和毕业标准；三是高校要根据人才培养目标构建起科学合理、符合时代特点和学生需求的影视课程体系；四是高校要改革传统的课堂教学模式和方式方法。

（四）打造特色学科专业与区域产业需求相适应的专业群

高校要根据区域经济发展需求来打造特色学科专业群。一方面要重点培养本地区急需的应用型、复合型、创新型人才；另一方面要将特色学科专业群与区域经济发展需求相适应并不断创新。在创新过程中首先要注重基础研究和应用研究相结合，以应用型、复合型、创新型为目标来构建符合区域经济发展需求的专业群；其次要注重学科交叉与融合，以应用性符合区域经济发展需求的学科专业群；再次要注重学科专业间协同创新，以产学研合作为基础来构建符合区域经济发展需求的学科专业群；最后要注重与行业企业深度融合，以应用型符合行业企业发展需求的学科专业群。

（五）加强师资队伍建设与产学研合作

一是高校可以与影视企业联合建立影视教师工作站、企业博士后工作站等人才培养基地；二是高校可以聘请影视企业领导担任兼职教师，定期为学生授课；三是高校可以与影视企业共同建立科研课题合作项目和专业实习基地等，提高学生实践能力和创新能力；四是高校可以为影视企业提供科研经费支持和技术服务。

五、结语

综上所述,在国家政策支持、资本投入、高校扩招和政策倾斜等多重利好因素的刺激下,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影视高等教育正在快速发展,已成为中国影视教育产业新高地。从中国影视教育产业发展历程来看,从最初的电影学院到现在的民办本科院校,再到吉利学院,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影视高等教育在发展过程中不断完善和调整。本文通过对吉利学院和吉利集团的调研发现,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影视高等教育存在人才培养模式与产业发展脱节、校企合作不深入等问题。因此,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影视高等教育要充分发挥高校引领作用,积极探索“校企合作+产教融合”的创新发展模式;同时,要积极发挥地方政府在高校与企业之间的桥梁纽带作用,进一步建立健全产教融合、校企合作长效机制,形成多方参与、多方联动、共同推进的发展局面。高校与企业应不断提高人才培养质量、提升科研水平和服务能力,建立健全科学合理的人才培养体系和评价体系,形成多方参与、共同推进的发展格局,为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建设作出应有的贡献。

参考文献:

- [1] 邵开泽,刘荣芳,王璐.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教师教育协同发展的背景、价值和实践样本[J].教育科学论坛,2024,(08):16-19.
- [2] 彭勇,柳冬,周欣.典型枢纽城市发展经验对重庆的启示[J].重庆交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1,21(02):46-54.
- [3] 刘长江,周菁若.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高等教育集群化发展研究[J].成都行政学院学报,2023,(05):106-115+119-120.
- [4] 申传顺,柴泽阳,申伟宁.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高等教育与科技创新耦合协调度探析:发展新质生产力的视角[J].成都师范学院学报,2024,40(04):1-11.
- [5] 葛竞,石应洪.成渝双城经济圈建设背景下高等职业教育协同发展路径研究[J].现代职业教育,2024,(23):1-4.
- [6] 李琨.全球化背景下的中国影视教学改革[J].大众文艺,2021,(10):163-164.
- [7] 韩震.基于新时代立德树人根本任务新要求,优化中等职业学校思想政治学科育人目标[J].课程.教材.教法,2019,39(11):4-9.
- [8] 刘涛.探索产教融合育人新路径[J].中国人才,2022,(07):86-87.
- [9] 蒋华林.推动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高等教育一体化发展的思考[J].重庆高教研究,2020,8(04):58-70.

Research on the Mechanism of Achievements Transformation of Film and Television Higher Education in Chengdu-Chongqing Dual-city Economic Circle and Industrial Linkage with Geely Group

Wang Zixuan¹, Yu Qindong¹

¹*School of Digital Media, GEELY University of China, Chengdu, Sichuan 641423, China*

Abstract: Guided by the "Belt and Road" strategy, the construction of the Chengdu-Chongqing Economic Zone has been elevated to a national strategic level. The film and television higher education in the Chengdu-Chongqing Economic Zone has become a new highland in China's film and television education industry and an important force in it. In the construction of the Chengdu-Chongqing Economic Zone, film and television higher education must align with the industrial development of the Chengdu-Chongqing region. It aims to cultivate more outstanding film and television professionals and contribute to local economic development. This article conducts a survey on film and television higher education in Chengdu and Chongqing, taking GEELY University and GEELY Group as examples, analyzes the current development status and existing problems of film and television higher education in the Chengdu-Chongqing Economic Zone, and proposes countermeasures and suggestions on how to promote the development of film and television higher education in the Chengdu-Chongqing Economic Zone.

Keywords: Chengdu-Chongqing Economic Circle; film and television education; industry docking

文旅融合视域下：乡村地区旅游发展与文化传播的发展路径

贺 骁¹ 司孟功^{1*}

(1.北京联合大学, 北京 朝阳 100101)

摘 要: 乡村旅游与文化的融合已成为推动区域发展的关键机制, 在促进经济增长的同时实现文化遗产保护。本文通过文献归纳法, 整合了乡村旅游和文化传播的关键主题, 总结了现有的理论框架和实证发现, 系统性探索了二者的互动关系。研究结果表明: 文化融合通过将地方传统嵌入游客体验显著提升旅游吸引力; 社区赋权强化了社会文化韧性, 与利益相关者参与; 可持续实践有效缓解负面影响, 平衡经济效益与文化生态保护。然而, 政策实施与资源分配仍存在显著缺口, 亟需发展情境化战略。研究强调采用跨学科方法协调文化传播与旅游发展的必要性, 为政策制定提供实操路径。通过整合多元视角, 深化了对乡村旅游文化可持续性的理论认知与实践启示, 为探索包容性融合模式奠定基础。

关键词: 乡村旅游; 文旅融合; 社区参与; 可持续旅游

DOI: doi.org/10.70693/rwsk.v1i8.1260

1. 引言

乡村旅游作为区域发展的转型力量日益受到关注, 在传统产业衰退地区尤为显著。文化与旅游的融合为振兴乡村经济提供了路径, 同时能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并促进跨文化对话。这种协同不仅是经济策略, 更是文化必然——它使乡村社群得以在全球化背景下维护自身身份认同。旅游与文化传播的交汇融合已被广泛证实能提升游客体验、推广地方传统并创造可持续生计^[1], 但其动态机制仍受政策框架、社区能动性和市场需求等复杂因素影响。

乡村旅游的文化经济现象可追溯至全球旅行偏好的宏观转变: 城市游客愈发追求连接地方传统、景观与生活方式的真实沉浸式体验^[2]。此趋势与体验式旅游的兴起相契合, 文化叙事和参与性活动正超越传统观光模式。拥有丰富民俗、手工艺和农耕遗产的乡村地区独具发展优势。然而, 文化商品化现象引发了真实性与文化侵蚀的担忧, 亟需在尊重本土知识与满足现代旅游需求间寻求平衡^[3]。

基于现有研究, 在文化传播机制研究方面, 需要关注如何使乡村旅游有效传递文化价值而不损害传统完整性。在社会文化影响力方面, 现有研究多聚焦经济效益, 却忽视边缘化乡村社区的社文影响^[4]。乡村文旅融合视域下的数字平台应用虽能突破地理限制促进全球参与, 但其文化叙事功能尚未充分挖掘^[5]。现如今也同样存在政策协同缺失的问题, 政府主导的旅游规划与基层文化保护常各自为政, 缺乏共生机制。

弥合这些空白需整合旅游研究、文化人类学与传播理论的跨学科视角。

本研究旨在调和乡村旅游中经济发展与文化可持续性的矛盾。通过文献综述构建文化传播策略性嵌入旅游框架的整体认知, 以赋能社区并守护遗产。为政策制定者提供包容性融合模型的决策依据; 为从业者平衡文化活力与经济韧性提供实践指南; 更在全球可持续发展中贡献乡村文化存续的解决方案。

2. 研究方法

本文采用文献研究法围绕: 文化融合与旅游发展、保护原真性、社区参与和权赋三个纬度展开, 反映了乡村环境中旅游与文化交流之间的相互作用。文化融合与旅游发展探讨了当地传统如何融入旅游产品中, 同时探讨了保护原真性所面临的机遇与挑战。社区参与和赋权则探讨了当地利益相关者在塑造旅游叙事和公平利益共享中的

作者简介: 贺 骁(2002—), 男, 硕士研究生, 研究方向为乡村文旅融合与美食旅游;

司孟功(2001—), 男, 硕士研究生, 研究方向为旅游服务与高星级酒店管理。

通讯作者: 司孟功

作用。可持续旅游实践则评估了平衡经济增长与环境和文化保护的策略,并强调了长期韧性。这些维度共同构成了一个框架,用于分析乡村旅游发展中固有的协同作用和紧张关系。在展开研究的过程中,所选取的相关文献需明确涉及乡村旅游与文化交流的结合,并采用定性或定量方法,且以英文发表。本研究排除了非同行评议的文章、缺乏实证或理论严谨性的研究,以及仅关注城市或非文化旅游背景的研究。确保了与研究维度的一致性,同时保持了学术可信度。

3. 研究结论

3.1 乡村旅游文化融合与发展

将文化元素融入乡村旅游发展已成为在保护当地遗产的同时提高目的地吸引力的关键战略。研究表明,这种整合是通过多个维度进行的,包括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价值化、传统建筑的适应性再利用以及区域身份的战略品牌化。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已被确定为可持续旅游业的基石,特别是在传统习俗因全球化而受到侵蚀的地区。该地展示了如何通过将仪式、手工艺和口头传统融入游客体验中,从而为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延续创造经济激励,通过旅游业振兴非物质文化财产^[6]。同样,过往研究强调了参与式框架的作用,在该框架中,当地社区共同设计以非物质文化遗产为中心的旅游活动,确保与文化价值观保持一致^[7]。一项关于乡村游牧旅游开发的研究表明^[8],哈萨克斯坦的游牧传统演变为“新游牧”旅游文化,引发了人们对文化稀释的质疑。因此在该框架中也应该注意平衡解决商业化和真实性之间的关系。

传统建筑和乡土景观是乡村旅游中文化叙事的有形渠道。历史村落的适应性再利用不仅保护了建筑遗产^[9],还促进了基于地方的旅游经济^[10]。相反,有学者批评了波斯尼亚人工“民族村庄”的激增^[11],媚俗美学破坏了真实性,强调了尊重本土完整性的设计准则的必要性。农业传统,特别是在巴厘岛和中国,农业系统超越功利功能,成为文化偶像。Jatiluwih 梯田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指定为世界遗产,体现了这种协同作用,传统的 subak 灌溉方式吸引了游客,同时维持了农业生计^[12]。

社区参与成为公平旅游业发展的关键,印度尼西亚^[13]和菲律宾^[14]的案例研究证明了这一点。这些研究强调自下而上的方法,当地居民定义旅游叙事,确保在分配经济利益的同时保留文化机构。政策机制也是影响文旅融合的关键因素。研究提出的政策机制,通过多方利益相关者框架将旅游业发展与文化保护目标相结合,进一步将这种整合制度化^[15]。这些维度的相互作用突显了文化融合的多面性,文化融合的成功取决于能否创新与传统、经济目标与文化可持续性之间取得平衡。

3.2 乡村旅游发展重的社区参与与赋权

社区参与已被广泛认定为乡村旅游可持续发展的关键要素,在文化保护与经济振兴相交织的语境中尤为重要。纳入研究的文献表明,有效的社区参与超越表面咨询形式,需要利益相关方在决策制定、收益分配、文化主体性表达三方面共同实现实质性的介入。这些动态机制分为四大核心维度:参与模式、经济社会赋权、文化保护与治理架构。

基于社区参与式旅游(CBT)在多项研究中成为一种主导模式,强调当地居民共同设计旅游倡议的参与性框架。例如,强调了印尼的 CBT 如何在减轻开采风险的同时促进公平的利益分配,尽管在资源分配和管理能力方面仍存在挑战^[16]。同样,CBT 在日惹历史村庄的应用,培训项目提高了社区在遗产保护和旅游管理方面的技能^[17]。文化和自然资源的整合进一步加强了可持续性,正如 Kedung Murung 村所示,湖泊旅游利用当地智慧创造独特的游客体验^[18]。

经济赋权是另一个反复出现的主题,特别是在发展中经济体,旅游业是衰落的农业部门的替代品。在南非,乡村旅游被定位为创造就业机会和减贫的战略工具,这取决于有效的环境管理和道德实践^[19]。印尼的乡村旅游计划展示了政府资助的项目如何刺激当地经济,74910 个村庄被确定为潜在的旅游中心^[20]。微型、小型和中型企业(MSME)在这一过程中发挥着关键作用,和 Anindyasari D 学者^[21]的文献报道一致,倡导创业培训以提高竞争力。

文化保护工作往往与创新的推广策略相互交织。例如,萨莫西尔县的旅游村依赖巴塔克传统作为独特的卖点,但许多文化习俗仍未得到充分利用或维护不善^[22]。数字平台提供了一种解决方案,Lumban Suhi Suhi Village 利用播客和社交媒体吸引年轻一代和国际观众就证明了这一点^[23]。文化节事的推广体现了一种混合方式,将传统表演与在线营销相结合,以扩大影响力^[24]。

治理和政策框架是这些举措的关键推动因素。多方利益相关者的合作机制,其中村政府、私营实体和社区之

间的伙伴关系增强了基础设施和营销能力^[25]。然而,政策差距仍然是一个障碍,特别是在中国的古村落,自上而下的旅游发展往往忽视了社区利益^[26]。这些发现的综合强调了适应性治理模式的必要性,这些模式将旅游业增长与文化可持续性和包容性参与相结合。

3.3 乡村文化背景下的可持续旅游实践

可持续旅游做法已成为平衡农村地区经济发展与文化和环境保护的一个重要框架。纳入的研究揭示了可持续性的多种方法,从生态文化保护战略到社区驱动的绿色旅游倡议。这些做法不仅是可操作的措施,而且代表着乡村旅游如何整合生态管理、文化连续性和经济可行性的根本转变。

多个研究中都涉及了生态系统的评估作用可指导可持续旅游的发展。例如,^[27]提出了一个乡村旅游用地评估系统,该系统包含生态系统服务价值,展示了如何量化生态资产,为规划决策提供信息。这种方法与将乡村景观定位为旅游与保护共存的多功能空间的更广泛努力相一致。同样,研究了中国的生态文化保护区,强调了政策框架如何激励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旅游模式,创造当地利益^[28]。该研究确定了四种不同的发展模式,包括政府-企业-居民合作,强调了制度协调在可持续旅游业中的重要性。

以社区为基础的可持续性举措在若干案例研究中具有突出的特点。巴厘岛的 Pelipur Lara 市场举例说明了绿色旅游原则如何通过传统做法得以实施,其中自然材料和当地产品构成了旅游景点的基础^[29]。这种模式不仅减少了对环境的影响,而且加强了文化认同,创造了有利于工匠和农民的循环经济。同样,有研究评估了 Cau Belayu 村绿色旅游商业计划的实施情况,发现虽然在能源效率和废物管理方面取得了进展,但基础设施和认识差距仍然阻碍了全面采用^[30]。这些调查结果表明,可持续性转变既需要技术干预,也需要社区一级的能力建设努力。

数字技术的整合是可持续旅游业的另一个方面,特别是在加强连通性和降低资源强度方面。针对泰国农业旅游部门的数字媒体互联研究,聚焦于如何提高游客参与度,同时最小化与传统营销相关的碳足迹^[31]。然而,该研究也告诫人们不要过度依赖技术,强调需要保持真实的文化互动。创新与传统之间的紧张关系再次出现^[32], Maleshevo 地区的地理隔离保护了本土知识系统,这些系统现在是可持续旅游产品的基础。这项研究强调了文化弹性本身如何成为一种可持续性资产,减少对外部投入的依赖。

政策一体化是一个贯穿各领域的主题,有几项研究强调需要有连贯的管理框架。在针对发展中国家的研究中,乌兹别克斯坦的乡村旅游前景,倡导将旅游业发展与可持续生计和减贫联系起来的政策^[33]。该研究确定,分权治理在满足地方需求同时保持环境标准方面特别有效。相反,中国遵义市的“一体式”旅游政策存在一定执行差距,自上而下的指令往往无法说明村级生态承载力^[34]。这些对比鲜明的案例突出了可持续旅游政策的背景性质,其成功取决于使国家目标与当地现实相协调的适应机制。

这些对比鲜明的案例突出了可持续旅游政策的背景性质,其成功取决于使国家目标与当地现实相协调的适应机制。这些研究共同表明,乡村文化背景下的可持续旅游不是一个单一的概念,而是生态、经济和社会文化因素的动态相互作用。虽然技术和政策创新提供了重要工具,但传统知识体系和社区机构的持久相关性表明,可持续性最终植根于文化连续性。这种复杂性突出表明,需要进一步的建立综合评价框架,既能适应各种农村现实,又能保持严格的环境和文化保障。

4. 讨论

综合研究结果在整个审查的文献揭示了一些关键的见解,乡村旅游和文化传播的整合。综上所述,这些研究始终表明,文化融合既是旅游业发展的催化剂,也是遗产保护的机制。这种双重功能在地理环境中出现,从巴厘岛的梯田^[12]到中国的乡土村落^[9],这表明了将当地传统融入旅游框架的普遍价值。然而,真实性和商品化之间的紧张关系仍然是一个持续的挑战,特别是当市场力量将游客期望置于文化完整性之上时^[19]。这一矛盾突出表明,需要建立更加微妙的模式,通过参与式认证制度或社区主导的真实性标准,平衡经济可行性与文化保障。这一矛盾突出表明,需要建立更加微妙的模式,通过参与式认证制度或社区主导的真实性标准,平衡经济可行性与文化保障。这些发现的理论意义超出了旅游研究,扩展到文化可持续性和地方发展的更广泛论述。综述的文献共同提出了一个概念框架,其中乡村旅游作为全球和地方系统之间的动态界面,在抵制同质化的同时,调解文化交流^[35]。这种观点挑战了传统的旅游范式,传统的旅游范式通常将文化视为一种静态资源,而不是将其定位为一个由主人和游客共同塑造的不断发展的对话过程。这种重构具有重大的方法学后果,倡导纵向的、民族志的方法,以捕捉旅游环境中出现的文化传播^[36]。

实际上,调查结果突出了政策制定者和社区利益相关者可采取的战略。印度尼西亚和菲律宾基于社区的旅游模式的成功,证明将决策权下放给地方行为者将带来更加公平和基于文化的结果^[16]。这些案例表明,国家旅游政策应优先考虑能力建设方案,以提高社区管理技能,同时保护土著知识产权。同样,文化推广数字工具的整合指出了利用技术促进可持续旅游业的未开发潜力^{[23][31]},但前提是在于数字战略仍然附属于个人文化体验,而不是取代它们。在研究过程中,依然存在限制性因素。亚洲和欧洲研究的地理集中可能会使研究结果偏向于特定的治理模式和文化背景,忽略非洲或拉丁美洲的替代方法。排除非英语出版物,虽然在方法上是必要的,但有可能忽略法语或葡语乡村旅游倡议的宝贵观点。此外,文献中定性案例研究的优势虽然在上下文细节方面丰富,但限制了结论的普遍性。这些制约因素表明,综合调查结果可能过度反映了某些区域的经验,而低估了其他区域的经验,特别是在旅游业在不同的政治经济条件下运作的情况下。

未来的研究应该通过比较研究来解决这些差距,系统地研究不同治理体系和文化背景下的乡村旅游模式。后续研究的开展迫切需要采用混合方法进行调查,通过量化的方法体现文化影响,同时保留民族志观察的深度,特别是针对于一些欠发达地区。数字平台在文化传播中的作用也值得进一步探索,特别是关于乡村旅游内容的算法管理如何影响游客的感知和期望。此外,追踪社区对旅游态度的代际变化的纵向研究可以说明当前的整合战略是否真正促进了文化的连续性或无意中加速了文化的转变。

在政策执行^[34]与社区需求^[24]之间观察到的不一致性指向另一个关键的研究前沿:开发适应自上而下标准化和自下而上定制的治理框架。这些框架可以借鉴设计思维原则,创建模块化政策工具包,村庄可以根据其独特的文化资产和基础设施能力有选择地采用这些工具包。最后,文化旅游的环境方面需要更深入的研究,特别是关于气候变化如何可能破坏目前构成乡村旅游产品基础的传统做法。这些方向共同倡导跨学科研究议程,将旅游研究与文化地理学、数字人文科学和环境科学联系起来。

讨论强调,乡村旅游作为文化交流工具的潜力取决于其在全球化与本土化、保护与创新、游客准入与文化主权之间的矛盾中导航的能力。文献一贯申明,这些悖论的解决办法不能纯粹是技术或经济上的,而必须涉及农村社区希望如何在一个相互联系的世界中界定和维持其文化特性的根本问题。这一认识使乡村旅游不仅成为部门发展战略,而且成为文化间对话和自决的重要媒介。

5. 结论

本研究利用文献分析法展开当代乡村旅游和文化传播的研究,揭示了文化融合、社区参与和可持续性实践如何共同塑造乡村发展的批判性见解。研究结果表明,乡村旅游既是一种经济催化剂,也是一种文化保护机制,但其成功与否取决于真实性与市场需求之间的平衡。社区驱动的模式产生了更公平的结果,同时突出了政策一致性和技术一体化方面的持续差距。

其理论贡献在于将乡村旅游重新定义为全球和地方系统之间在文旅融合视域下的动态互动。在这种动态互动中,文化交流在不损害土著身份的情况下进行。事实上,研究结果提倡在旅游规划中优先考虑地方机构的适应性治理框架。未来的研究应针对现有文献中的地理偏见,探索旅游对文化传播的纵向影响。数字平台与传统文化表达的融合是一个特别有希望但尚未得到充分探索的领域。

最后,本研究强调乡村旅游的变革潜力取决于其协调经济目标与文化可持续性的能力。综合为跨学科方法提供了基础,这些方法不仅将旅游业视为一个行业,而且将其视为文化对话和基于地方的复原力的复杂媒介。

参考文献:

- [1] TANG M, XU H. Cultural integration and rural tourism development: A scoping literature review[J]. *Tourism and Hospitality*, 2023.
- [2] ZHENG T, YU J, CHENG Q, et al. Measurement of tourists' authenticity perception on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of rural tourism[J]. *Sustainability*, 2023.
- [3] MACLEOD D. Cultural commodification and tourism: a very special relationship[J]. *Tourism Culture & Communication*, 2006.
- [4] NURLENA N, TAUFIQ R, MUSADAD M. The socio-cultural impacts of rural tourism development[J]. *Jurnal Kawistara*, 2021.
- [5] YANTI D, HERYADI D Y, CAKRANEGARA P A, et al. Developing rural communication through digital innovation for village tourism[J]. *Jurnal Studi Komunikasi*, 2023.

- [6] Zhang X. Research on the Integration of Intangible Cultural Heritage Protection and Tourism Sustainable Development[J]. GBP Proceedings Series, 2025, 3: 110-115.
- [7] Du Y. Study on the utilization of Intangible Cultural Heritage in the development of rural tourism[C]//6th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Economics, Management, Law and Education (EMLE 2020). Atlantis Press, 2021: 461-466.
- [8] Tiberghien G, **e P F. The life cycle of authenticity: Neo-nomadic tourism culture in Kazakhstan[J]. Journal of Tourism and Cultural Change, 2018, 16(3): 234-247.
- [9] Stojanović K, Đenadić M. Cultural Tourism and Folk Architecture in the Service of Revitalization of Rural Space[C]//Tourism International Scientific Conference Vrnjačka Banja-TISC. 2020, 5(2): 436-453.
- [10] Mechiat S, Dekoumi D. The heritage of historic villages: an asset for the development of cultural tourism (case of the Oued Labiod valley in the Aures, Algeria)[J]. Journal of Cultural Heritage Management and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2023.
- [11] Kljuno A H, Halilovic M. The phenomenon of ethno villages in Bosnian rural tourism[J]. Heritage and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2022, 4(2): 122-133.
- [12] Yan W. Exploring the Traditional Farming Culture and Improving the Local Cultural Confidence: Solving the Problem of Rural Tourism Homogenization[C]//E3S Web of Conferences. EDP Sciences, 2021, 275: 02063.
- [13] Putra I, Adhika I M, Yana A. Reviving cultural tourism in kendran bali indonesia: Maintaining traditional architecture and develo** community-based tourism[J]. Civil Engineering and Architecture, 2021, 9(2): 328-338.
- [14] Damayon S B, Lagrio M A M A, Lorenzo J D, et al. Preserving Cultural Traditions among Ifugao Migrants: A Path to Sustainable Local Eco-Cultural Tourism in the Philippines[J].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Research and Innovation in Social Science, 2025, 9(4): 4840-4850.
- [15] Guo Y. The Research on the Mechanism for the Further Integration of Rural Tourism and Local Culture[C]//2022 2nd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Modern Educational Technology and Social Sciences (ICMETSS 2022). Atlantis Press, 2022: 289-300.
- [16] Bagus S I, Imade S U, Nyoman S I A, et al. Community based tourism as sustainable tourism support[J]. Russian Journal of Agricultural and Socio-Economic Sciences, 2019, 94(10): 70-78.
- [17] Wibowo B A, Darsono D. Community-Based Tourism Design to Develop a Historical Tourism Village in Yogyakarta[J]. Amalee: Indonesian Journal of Community Research and Engagement, 2022, 3(1): 123-138.
- [18] Anindyasari D, Indana K, Safitri A, et al. Develo** Nature and Culture-Based Tourism in Kedung Murung Village: Community Empowerment Approaches[J]. RIGGS: Journal of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and Digital Business, 2025, 4(2): 1738-1742.
- [19] Nicolaides A. Sustainable ethical tourism (SET) and rural community involvement[J]. African Journal of Hospitality, Tourism and Leisure, 2020, 9(1): 1-16.
- [20] Saraswati U. Rural Tourism: Community Empowerment in Sustainable Development[C]//6th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Education & Social Sciences (ICESS 2021). Atlantis Press, 2021: 359-364.
- [21] Anindyasari D, Indana K, Safitri A, et al. Develo** Nature and Culture-Based Tourism in Kedung Murung Village: Community Empowerment Approaches[J]. RIGGS: Journal of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and Digital Business, 2025, 4(2): 1738-1742.
- [22] Pardosi J, Putra I M, Pretty B. Exploration and existence of local wisdom as an effort to build sustainable tourism in samosir regency[J]. Komunitas, 2024, 16(1): 92-110.
- [23] Gultom E. The Sustainable Tourism of Lumban Suhi–Suhi Village Samosir after The Pandemic[J]. Humaniora, 2023, 35(1): 24.
- [24] Rosilawati Y, Daffa N, Ariyati S K. Promotion strategy of Dieng Culture Festival (DCF) as sustainable tourism based on local community[C]//E3S Web of Conferences. EDP Sciences, 2021, 316: 04012.
- [25] Blewitt J. Community, empowerment and sustainable development[M]. Green books, 2008.
- [26] Liu Y. The importance of community participation on Ancient Village tourism development of China[C]//2022 7th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Financial Innovation and Economic Development (ICFIED 2022). Atlantis Press, 2022: 3241-3244.
- [27] Mei R, Han L. Evaluation system of rural sustainable tourism land based on ecosystem service value[J]. Ecological Chemistry and Engineering, 2022, 29(3): 347-369.

- [28] Qimin H E, Zhongchao S H I, Guoxin T A N. Evaluation of Tourism Development Level of Eco-cultural Protection Zones and Their Development Model[J]. *Economic geography*, 2024, 44(3): 209-217.
- [29] Saraswati U. Rural Tourism: Community Empowerment in Sustainable Development[C]//6th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Education & Social Sciences (ICESS 2021). Atlantis Press, 2021: 359-364.
- [30] Widana K A, Utama I K. The management of Cau Belayu Tourism Village based on green tourism business scheme[J].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Green Tourism Research and Applications*, 2020, 2(2): 53-62.
- [31] Khampusaen D, Naiyanit B, Chanprasopchai T. Transforming Rural Landscapes: Unleashing Agro-Tourism Potential Through Digital Media Interconnectivity[J]. *Journal of Ecohumanism*, 2024, 3(7): 2054-2063.
- [32] Mucunski D, Gjorgievski M. Harnessing local wisdom: A cornerstone for rural tourism development[J]. *UTMS Journal of Economics*, 2023, 14(2): 166-176.
- [33] Qarajanova G T. Prospects and Strategies for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of Rural Tourism in Uzbekistan[J]. *Journal of Ethics and Diversity in International Communication*, 2023, 3(12): 126-132.
- [34] Jiang H, Yang Y, Bai Y. Evaluation of all-for-one tourism in mountain areas using multi-source data[J]. *Sustainability*, 2018, 10(11): 4065.
- [35] Duxbury N. Cultural sustainability, tourism, and development: Articulating connections[M]//*Cultural Sustainability, Tourism and Development*. Routledge, 2021: 1-18.
- [36] Graburn N. The ethnographic tourist[J]. *The tourist as a metaphor of the social world*, 2002: 19-39.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cultural tourism integration: the development path of tourism development and cultural communication in rural areas

Xiao He¹, Menggong Si^{1*}

¹ *Beijing Union University, Chaoyang, Beijing 100101, China*

Abstract: The integration of rural tourism and culture has become a key mechanism to promote regional development, and realize the protection of cultural heritage while promoting economic growth. Through literature induction, this paper integrates the key themes of rural tourism and cultural communication, summarizes the existing theoretical framework and empirical findings, and systematically explores the interaction between the two. The results show that: cultural integration can significantly enhance tourism attraction by embedding local traditions into tourist experience; Community empowerment strengthens social and cultural resilience and stakeholder participation; Sustainable practice can effectively alleviate negative impacts and balance economic benefits and cultural ecological protection. However, there is still a significant gap between policy implementation and resource allocation, and it is urgent to develop situational strategies. The study emphasizes the necessity of using interdisciplinary methods to coordinate cultural communication and tourism development, and provides practical paths for policy-making. Through the integration of multiple perspectives, it deepens the theoretical cognition and practical enlightenment on the cultural sustainability of rural tourism, and lays the foundation for exploring the inclusive integration mode.

Keywords: Rural tourism; Integration of culture and tourism; Community participation; Sustainable tourism

“两山”发展理念下生态产品价值实现路径研究

——以承德市为例

高亚琳¹ 魏强¹ 马艺嘉²

(1.河北大学经济学院, 河北 保定 071000, 2.河北大学管理学院, 河北 保定 071000)

摘要:“两山”理念强调生态保护和经济发展的辩证统一, 生态产品价值实现作为“两山”理念背景下的重要实践, 通过把环境效益转换为经济效益, 实现绿水青山和金山银山的协同共生。承德市生态资源丰富, 生态产品价值实现前景广阔。文章以“两山”理念为价值引领, 研究生态产品的特殊性, 并指出承德市现阶段生态产品价值实现面临的问题, 包括科技创新支撑不足, 产业化路径受限, 生态补偿机制不完善等问题, 提出应加强科技的创新和应用, 推广生态产业化经营, 完善生态补偿机制等举措, 以破解承德市生态产品价值实现的困境, 推动生态效益向经济效益的转变。

关键词:“两山”发展理念; 生态产品; 承德市; 经济效益

基金项目:河北省高等学校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项目“京津冀生态资产空间流转与多元化生态补偿机制研究”(SQ2022082)

DOI: doi.org/10.70693/rwsk.v1i8.1196

1 引言

随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 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已经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人们对生态系统服务的需求日益扩大, 对减缓生态破坏和修复环境影响产生了更大的支付意愿。而随着人类对资源的过度消耗以及人类活动对生态环境的破坏, 生态系统提供服务的能力却不断衰退。在这种背景下, “两山”理念应运而生, 两山理论即“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强调经济发展与生态保护的辩证统一, 是生态文明建设核心理念之一,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命题, 揭示了“绿水青山”与“金山银山”之间的深层次本质关系, 阐明了良好的生态环境本身就可以有效促进经济发展^[1]。两山理念是对生态文明理念认识层面和价值层面的深化, 否定了过去以牺牲生态环境来换取短期经济的做法, 两山理念的提出创造性的将绿水青山和金山银山摆在了同一个层面, 并通过出台一系列政策文件和相关法规使全社会更加深刻的认识到生态产品本身的价值, 生态产品价值代表了合理开发生态资源存量, 将其向生态产品转化所带来的经济、文化、社会和生态等方面的效益。党中央始终坚持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 高度重视生态文明建设和生态产品价值实现问题, 党的十八大以来, 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将生态文明建设纳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五位一体”总体布局。2021年4月中共中央办公厅和国务院办公厅印发了《关于建立健全生态产品价值实现机制的意见》, 该文件有力地推动了“两山理论”的不断深化和发展。同时, 也推动了对于生态产品价值实现的路径的探索, 生态产品价值实现是指借助特定机制, 将生态系统提供的产品和服务进行价值转换, 把生态产品的生态效益转变为经济效益, 以更加可度量的方式衡量生态系统的经济价值、社会价值和生态价值的过程, 是对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和两山理论的现实应用和具体落实。生态产品价值实现是对生态产品的价值进行深度挖掘的过程, 是劳动价值论和效用价值论在生

作者简介:高亚琳(2001—), 女, 硕士, 研究方向为人口资源环境;

魏 强(1984—), 男, 博士, 研究方向为环境与发展;

马艺嘉(2005—), 女, 学士, 研究方向为公共管理;

通讯作者:魏 强(1984—), 男, 博士, 研究方向为环境与发展;

态层面的具体践行。

承德市拥有丰富的森林、草原、湿地等优质资源,是京津冀地区的重要水源地和重要生态涵养区,根据河北省生态保护红线,承德市生态保护红线面积为 1.66 万 km², 占全市总面积的 42.08%, 占全省陆域生态保护红线总面积的 43.02%。近年来,承德市大力实施北方防沙带、“三北”防护林六期等生态工程,在为京津冀地区“阻沙源、净气源”等方面发挥了重要的生态作用。承德市秉承“山水林田湖草是一个生命共同体”的理念,进行了大规模的生态修复工程,积极探索生态产品价值转换路径,积极践行改善生态环境就是不断培育和发展新质生产力的理念^[2],推动生态效益向经济效益的转变。但生态产品与其他产品相比有其特殊性,由于其难以度量性、难以分割性、外部性等属性,使得其价值实现具有一定困难。

本文基于此背景,探究承德市生态产品价值实现过程中面临的问题,包括科技创新支撑不足、产业化路径受限、生态补偿机制等问题,针对这些问题,提出应加强科技的创新和应用,推广生态产业化经营,完善生态补偿机制等对策,从而推动承德市优质生态资源向生态产品的转换,推动生态产品价值的实现,使承德市生态优势转变为经济发展潜力,助力绿水青山与金山银山的协同发展。

2 生态产品特殊性

2.1 难以度量性

生态产品包括纯净空气、清洁水质、丰饶土地及宜人气候等多种产品,在维系生态安全、调控生态环境、营造优越居住环境等方面起到重要支持作用,带来巨大的经济和社会福利。生态产品价值构成复杂,既包括直接使用价值、间接使用价值,还包括选择价值和存在价值。生态产品的价值往往难以直观判断,需要通过科学核算体系进行价值转换,但是由于生态产品存在状态的多样化,例如物质产品,包括水产品、农产品等;生态调节服务产品,包括气候调节、水源涵养等,提供的部分服务的不可见性以及服务本身的非物质性,使得生态产品的度量相对缺乏客观性,容易存在测量者个人的主观倾向。生态产品种类繁多,地区和种类差异性大,学界对其内涵及核算指标认识不统一。目前还没有一套能够包含所有生态产品种类的定价机制和计算机制。生态产品的评估和度量往往涉及多个学科领域,例如,统计学,经济学,地理学等,存在知识体系的复杂性和差异性。价值评估和成本核算所需的数据繁琐,数据往往来源于多个统计部门或机构,不同部门、不同机构之间存在一定的数据壁垒,导致数据无法充分流通和共享,且缺乏统一的数据标准和接口,使得数据在交换和共享过程中存在困难^[3]。且部分微观数据难以直接获得,为了保证其准确性需要进行实地调研,获取难度和成本大。生态系统各环节紧密衔接,子系统相互贯穿,缺乏明确边界,在进行价值测量和核算时难以明确划分,以进行区域或系统间的精确核算。生态产品的自然属性使得其在没有人力控制下会面临生态系统变化不确定的风险性,生态产品的数量和质量也会随着时间和空间的不同而改变,不间断的变化也使得生态产品的价值具有动态不确定性,具有难以度量性。

2.2 难以分割性

生态产品的物质特征使得其具有难以分割的特性,生态产品提供的服务需要以物质载体的存在为前提,生态产品和服务的质量受到生态载体物质性的影响。生态服务与生态载体相互支撑,具有难以分割的特性。从生态系统的物质性来看,生态系统往往作为一个有机整体为人类提供产品和服务,作为一个整体链条,生态系统在空间和地域上是连续的,各子系统和环节相互支撑依赖,难以分割。多种生态功能和生态产品只有在一个整体的生态系统内存续,才能有效发挥生态服务作用。例如,植被与土壤进行作用,才能发挥植被土壤保持的作用。生态产品的难以分割性还体现在其产权归属上,部分生态产品由于公共物品的属性而存在产权模糊的问题,当生态产品存在非排他性和非竞争性的特征时,生态产品的产权归属往往涉及多方主体的利益,社会自然资源资产所有权、收益权、承包权与经营权难以完全清晰界定,产权不能进行具体明确的分割,导致生态产品供需主体不明、“家底”不清,权责利难以分辨,生物多样性、气候变化等权益尚难进入自然资源资产交易范围^[4],不利于生态产品的市场化交易,阻碍了生态产品的价值实现。

2.3 外部性

生态产品提供服务的辐射范围广泛,由于其自然属性,部分生态产品缺少明确的产权界限,以公共性生态产品和准公共性生态产品为例,这类生态产品提供的服务范围通常不会局限于特定的个体和群体,在生态产品可以辐射到的范围内,所有人群都可以享受到生态产品和服务,但是市场价格并没有正确反映这种服务,消费者对大部分生态产品的使用都不需要付费,或者付费很少不足以覆盖生态产品的提供成本,生态产品提供者付出的成本也通常不能得到及时有效的补偿。对于这类生态产品,企业通常没有积极性进行提供。在这类生态产品提供产品或服务的过程中,低效与浪费现象严重,难以通过市场机制来进行有效调节,易导致资源的过度消耗。生态产品作为环境公共物品,对污染环境造成的外部性也不会自发的内化在私人成本中。相比较而言,经营性生态产品产权关系较为清晰,人们参与度较高,能够通过市场化途径实现价值交换,但也存在外部性的问题。例如,农户私有的生态林,尽管产权明确,但也在一定程度上改变了周围的局部小气候,增加了区域的生物多样性,改善了空气质量和周边水体质量,产生了外部性。

3 承德市生态产品价值实现面临的问题

3.1 科技创新支撑不足

承德市近年来不断增加生态领域研发经费投入,出台一系列推动政策,但生态产品的价值实现具有复杂性,生态产品价值实现从开发利用、度量监督再到成本核算、后期修复都需要科学技术的支撑。目前,以承德市为代表的生态涵养区在生态产品价值核算、污染治理等方面还存在一定的关键性技术难题与研发短板。此外,生态产品价值实现还需要对生态产品价值进行有效的评估和测量,但承德市气温季节性变化大,四季分明,生态产品种类多样性和差异性较大,生态产品本身也存在数量和质量的季节性差异。目前对于生态产品价值的核算缺乏能够包含所有种类的核算体系和计量方法,难以准确量化生态产品的数量和质量。

承德市科技研发动力不足的原因可以从以下两个方面进行考虑,一是企业对于生态产品相关技术的研发缺乏有效激励,从生产端考量,生态产品方面的投资时间过长,资金与时间投入较高,技术研发成本要大于直接使用的付费成本。从产出端考量,承德市生态产品目前缺乏有效的交易和补偿机制。出于成本效益的考量,企业缺乏生态产品价值实现关键技术研发的动力。此外,承德市科技型企业中,中小企业占比较大,尽管近年来政府不断加大财政资金扶持力度,但由于企业规模较小、人力和资金有限、投入主体不足等原因,缺乏生态领域关键技术攻关的客观条件,难以推动生态产业价值的有效实现。二是缺乏专业人才的支撑,生态领域的科技创新需要专业人才的支撑,承德市与周边大城市相比,发展机会和资源较少,虹吸效应使得承德市人才大量外流,此外,承德市的发展定位更强调京津冀地区的生态屏障,这一发展定位虽然使得承德市的生态环境得到了极大改善,但一定程度上抑制了承德市产业结构和产业体系的完善,同时,由于发展定位的特殊性,承德市较难吸引到高新企业和高素质人才的落户,这使得生态产品价值实现和产业发展缺乏人才支撑。

3.2 产业化路径受限

生态产品产业化带来的经济效益推动市场主体进一步探索生态产品的潜在价值,是生态产品价值实现的重要路径。目前,承德市生态产品的产业化发展仍面临一些问题。

生态产业体系不完善,生态产业化经营模式有限。目前,承德市对于生态产品的开发利用主要集中于原材料供应和初级加工、旅游业等领域,例如,食品加工,中药材加工。生态产品产业化发展欠缺新模式的探索,并且为了保障生态服务的可持续性,承德市限制了一些产业和地区的发展,使得产业体系的完善度受限。此外,承德市技术研发与应用不足,探索产业化发展模式过程中缺乏技术支撑。在清洁能源冶炼、开发、利用等方面存在关键技术或者成本难以下降的限制,生态资源难以有效转化为经济效益。

产权界定不清,产权交易受限。生态产品的公共物品属性、难以分割性等导致产权边界难以清晰划分,尽管有利可图,但市场主体对生态产品的开发利用缺乏确定的权限,市场机制难以发挥作用,容易产生纠纷矛盾,使得生态产品的交易受到极大的限制。

涉及环节多,交易成本较高。生态产品价值实现涉及的流程和环节众多,需要支付人工成本、运输成本、护理成本和信息搜集成本。承德市生态产品价值实现的实践还相对较少,部分生态产品的价值实现过程还需要承担基础设施的建设成本。此外,信息不对称和监管机制的欠缺,在一定程度上导致了生态产品交易市场秩序的混乱,增加了生态产品提供者和消费者双方的信息成本和选择成本。

3.3 生态补偿机制不完善

生态补偿机制是根据生态系统服务价值、生态保护成本、发展机会成本,综合运用行政和市场手段,调整生态环境保护和建设相关各方之间利益关系的一种制度安排^[5]。承德市的发展定位更强调“生态安全屏障”,城市发展具有特殊性,据测算,承德市每年为京津提供约 22 亿 m³ 的水源,占北京密云水库供水量的 56.7%、潘家口水库供水量的 93.4%,其境内的滦河、潮河就是京津的重要水源。承德市作为京津冀重要生态涵养区,在生态保护和修复方面的投入巨大,不仅提供了优质的水源保障,还构建了坚实的绿色生态屏障,其提供的生态服务辐射范围利及京津冀整个地区,承德市为保障生态产品和服务的质量,在一定程度上放弃了产业开发的机会,限制了某些高耗能产业的发展。目前在承德市生态补偿实践中,存在着生态补偿范围小、生态补偿方式单一、监管机制不健全等问题。

近年来,京津冀地区实施的生态补偿项目主要是围绕京津地区的水源涵养生态系统功能开展的,实施范围集中在流域横向生态补偿方面,尚未构建在草地、森林、湿地、大气等方面的生态补偿机制。并且对于承德地区来说,生态补偿机制主要以政府资金补助为主,来源渠道单一,资金规模有限,难以满足生态补偿的实际需求,地区的发展需要完善的产业体系和基础设施,单纯的资金扶持和财政转移支付难以有效推动承德市产业的发展,形成长效激励方式。当前对于生态补偿的相关工作,缺乏完善的法律、体制和机制。并且在生态补偿过程中,资金的发放和使用往往分散在各政府部门,权责不清晰,不同部门的生态补偿资金使用程序、分配、核算等工作程序不一致,难以做到规范管理和有效沟通。

4 承德市生态产品价值实现路径

4.1 加强科技创新与应用

生态产品具有价值构成的复杂性和动态变化的属性,其价值实现需要先进科技的应用推动其价值维度的转换。承德市生态资源丰富且种类多样,可利用遥感技术和地理信息系统,加强对生态资源的监测、评价与管理,建立科学、动态的数据平台,为生态产品价值实现提供精准的数据支持,推动资源的精确确权。完善生态产品价值核

算体系与机制,加强生态产品核算技术标准,优化核算指标体系。不断改进现有生态资源开发利用的技术,推广清洁技术,不断提高生态产品的利用效率,从输入端减少对资源的消耗。并通过大数据与物联网技术的应用,实现生态资源向生态产品转化的全链条智能化管理,降低各环节成本。

丰富创新主体,持续构建“小微、科小、高新、领军”递进培育模式。通过政府科研基金带动、减税降费等经济利益推动企业加强创新活动,促进技术进步,降低治污成本,提高工艺技术。发挥紧邻京津的区位优势,重点引进高新产业,为地区发展注入新动力。此外,生态产品价值实现需要大量的专业人才支撑,应加强生态产品价值评估、交易及管理等领域的人才培养,承德市应深入实施“双引双育”工程,积极引进各类高端人才,为生态产品价值实现提供智力支持。充分发挥承德市邻近京津的地理优势,通过不断优化人才引进政策,实现人才的错位互补,引导人才在区域内产业间的合理流动,加强与京津高校的合作,不断加大对生态技术研发活动的资金投入,建立产学研合作基地,并鼓励科研机构 and 高校开展生态技术创新研究,重点突破可再生能源开发利用、资源循环利用、污染治理等关键技术。

4.2 推广生态产业化经营

生态产业化经营强调可持续发展原则,通过将生态产品的开发利用进行市场化改革,在不消耗减损生态产品价值的基础上,将生态产品的环境效益进行转换,最大发挥出生态产品的经济效益,是生态产品价值实现的重要路径。承德市政府和企业要大力推广生态产品的产业化经营,创新生态产业化经营形式,推动生态产业化与产业生态化结合。区分生态产品的类型,根据纯公共生态产品、准公共生态产品、私人生态产品的不同特性,实施不同的价值实现路径,发挥不同主体的作用。

承德市资源优势明显,其中林地面积占京津冀地区的32%,草地面积占全省的25%,享有“华北之肺”的美誉,有利于打造高附加值生态产业。承德市应立足区域优势,根据地方的资源条件,通过整合生态资源,不断挖掘潜人文特色,打造特色产业^[6],形成独特品牌,增强区域影响力。不断完善基础设施和配套设施,完善交通网络体系,加强与周边城市的互联互通,特别是作为热门旅游城市、人口规模庞大的北京和天津。不断培育新经济新消费新功能,推动生态产业与其他产业的融合发展,通过产业融合拓展产业发展空间,着力培育和发展新能源、节能环保、生态农业、生态旅游、绿色建筑等新兴绿色生态产业,促进其快速发展壮大,实现生态经济的多元化发展,形成新的经济增长点。通过减税降费、政府补贴等措施加强对新兴生态产业的政策支持和资金扶持,并推动生态产业与绿色金融相结合,通过绿色信贷、绿色债券、绿色基金、绿色保险等金融产品和服务,引导和激励更多的社会资本投入到绿色产业中。

在推动承德市生态产业发展的同时强调企业对生态产品的反哺,例如,河北承德露露股份有限公司在深耕杏仁露市场的同时长期推动野生杏树的保护,促进生物多样性的发展。此外,承德市应加大对传统生态产业的技术改造力度,引导传统生态产业进行产品深加工的改造和产业链的延申,进行品牌化建设,并采用清洁生产技术、节能减排技术和循环经济模式,降低生态资源消耗和环境污染,从而实现传统生态产业的转型升级和健康发展。

4.3 完善生态补偿机制

生态补偿机制是处理具有外部性属性的生态产品的成本收益不对等问题的有效方法,承德市要遵循“谁受益、谁补偿,谁保护、谁受偿”的原则,使受益群体和地区承担生态产品提供和保护的成本,负担环境复原和损害救济的成本,精准识别为生态保护作出贡献和牺牲的群体以及地区,给予保护地区和保护主体及时有效的奖补,通过监管机制确保补偿落实到位,并通过政策引导资金向特殊群体和地区倾斜,提高生态保护地区的积极性,实现生态保护与经济发展的互利共赢。此外,引导受益地区对生态保护地区进行及时有效的补偿,要改变单纯通过经济补偿的思路,创新政策补偿、产业补偿、权益补偿等、技术补偿等多种补偿方式,加大对生态保护主体的税收优惠、基础设施帮扶,产业扶持力度和创新技术成果的转移,打造承德市本土产业,丰富产业体系,保障承德市经济的长期可持续发展。

明确生态资源的产权归属,完善生态产品产权交易机制并建立科学合理的生态补偿机制。发挥政府和市场的双重作用,政府要建立健全自然资源统一确权登记制度,加强自然保护地、水流、森林等自然资源登记单元的调查,为生态产品价值实现提供基础支撑和产权保障。完善资源配额交易,通过配额制度设定资源利用的上限,形成交易市场。健全交易市场和平台,开展碳排放权、林权、水权交易、排污许可证等多种交易形式,鼓励多主体参与市场交易,通过市场交易产生生态产品的市场价值。企业、地方政府、生态保护区等利益相关者可以根据自已的需求和资源情况,通过市场购买或出售资源使用权和生态指标^[7]。从而将生态产品的生态效益转换为实实在在的经济价值。

此外,承德市应制定和完善生态补偿方面的法律法规,为生态补偿提供法律制度层次的保障。加强生态环境保护立法工作,明确生态环境保护的责任和义务,加大对环境违法行为的处罚力度。同时,加强生态补偿法律法规的执行力度,确保法律法规的有效实施。

5 结语

生态产品通过为人类提供服务和产品,带来多维度、多层面的价值。对于生态产品的价值实现,需要从“商品”的角度探究生态资源作为商品和服务的价值,包括经济价值、生态价值、文化价值等方面,而由于生态产品的特殊性,例如难以度量性、难以分割性、外部性等特征,生态产品的“商品化”目前还存在着一些阻碍,包括产权界限、交易市场等问题,使得生态产品的潜在价值难以向经济效益转变,承德市作为京津冀重要生态涵养区,

生态资源种类丰富且储量巨大,将优质生态资源转化为具有经济价值的资产,推动生态资源向生态产品转化并实现其价值的过程是承德市发展的绿色引擎。目前,承德市生态产品价值实现还存在一些问题,包括科技创新支撑不足,产业化路径受限,生态补偿机制不完善等问题,生态产品价值实现的困境极大地阻碍了承德市的可持续发展。基于此背景,本文提出加强科技的创新和应用,推广生态产业化经营,完善生态补偿机制等举措,以破解承德市生态产品价值实现的困境,将生态资源优势转化为经济优势,推动“绿水青山”向“金山银山”的转换,实现承德市经济和社会的可持续发展。

参考文献:

- [1] 汪信砚. 论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 [J]. 中南民族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 2023, 43 (10): 1-20+181.
- [2] 庄贵阳,丁斐,王思博. 生态产品及其价值实现探析——基于政治经济学的思考[J]. 中国社会科学, 2024, (11): 4-23+204.
- [3] 刘薇. 新质生产力赋能农业生态产品价值实现: 基本逻辑、作用机理与关键路径[J]. 江西财经大学学报, 2025, (01): 100-111.
- [4] 胡剑波,樊国杰. 民族地区乡村生态产品价值实现助推绿色共富: 逻辑、障碍与路径[J]. 云南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25, 42 (02): 74-82.
- [5] 齐骥.“两山”理论在乡村振兴中的价值实现及文化启示[J]. 山东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19, (05): 145-155.
- [6] 张海峰,沈坤荣,梁若冰,等. 生态补偿奖惩机制改革对大气污染治理的优势效应研究[J]. 管理世界, 2024, 40 (06): 114-133.
- [7] 余妙,祝佳. 基于生态价值观的“生态产业化”发展思路与规划方法探讨——以重庆市巴南区为例 [J]. 城市发展研究, 2024, 31 (12): 102-108.

Research on the Implementation Path of Ecological Product Value under the Development Concept of "Two Mountains": A Case Study of Chengde City

Yalin Gao¹, Qiang Wei¹, Yijia Ma²

¹ School of Economics, Hebei University, Baoding, Hebei 071000, China

² School of Management, Hebei University, Baoding, Hebei 071000, China

Abstract: The concept of "Two Mountains" emphasizes the dialectical unity of ecological protection and economic development. The realization of the value of ecological products is an important practice under the background of the "Two Mountains" concept. By converting environmental benefits into economic benefits, it achieves the coordinated coexistence of green mountains and clear waters and mountains of gold and silver. Chengde City has abundant ecological resources and a broad prospect for realizing the value of ecological products. The article takes the "Two Mountains" concept as the value guide, studies the particularity of ecological products, and points out the problems faced by Chengde City in realizing the value of ecological products at the current stage, including insufficient support for scientific and technological innovation, limited industrialization path, and imperfect ecological compensation mechanism. It proposes to strengthen the innovation and application of technology, promote ecological industrialization management, improve ecological compensation mechanism and other measures to solve the dilemma of realizing the value of ecological products in Chengde City and promote the transformation of ecological benefits into economic benefits.

Keywords: Two Mountains Development Concept; Ecological products; Chengde; Economic Benefits

从成果沉没到生态共生： 高校农业类社会实践成果转化落地的机制创新探索

徐庆学¹

(1.山东理工大学管理学院, 山东 淄博 255000)

摘要: 在乡村振兴战略与农业强国建设背景下, 高校农业类社会实践活动日益活跃, 但成果往往面临“产出即沉没”的困境, 缺乏系统沉淀、转化与应用机制。同时, 基层农业经验传播渠道碎片化, 制约知识共享与推广。本文聚焦高校学生、农村农户、实践单位及涉农组织等多主体协同, 针对成果转化效率低下、产学研转化瓶颈及资源整合困境等问题, 创新构建“一核三环四主体”模式, 以“高校学生农业类社会实践成果产出与孵化”为核心, 依托数字销售平台、农业发展案例库及数字媒体矩阵三环, 实现农产品产销对接、知识流动与生态共生。该模式强调数智赋能与多方互动, 形成可持续发展闭环, 促进高校由知识输出向乡村产业升级转化, 有效破解城乡资源不对称, 激发农业新质生产力, 推动乡村振兴内生动力重构, 具有理论创新意义与实践指导价值。

关键词: 乡村振兴; 高校社会实践; 成果转化; 产学研合作; 生态共生

基金项目: 2025年山东理工大学大学生创新创业训练计划项目《乡信——大学生社会实践农业类成果产出模式与孵化平台共建实践》

DOI: doi.org/10.70693/rwsk.v1i8.1288

一、引言

在全面推进乡村振兴和农业强国建设的背景下, 高校学生的农业类社会实践活动日益增多, 但大量实践成果存在“产出即沉没”的问题, 缺乏有效归集、系统沉淀与落地转化机制。同时, 基层乡村丰富的农业经验与优秀农户案例, 由于传播渠道有限、整合不足, 难以在更大范围内推广应用。为回应这些现实需求, 本研究聚焦高校社会实践参与者、农村基层农户、高校科研机构、实践单位以及涉农社会组织等主体, 聚焦高校学生农业类社会实践成果的系统产出、转化应用与平台孵化, 创新性地构建了以“高校学生农业类社会实践成果产出与孵化”为核心的“一核三环四主体”的协同发展模式。

二、背景与现状

在全面推进乡村振兴和农业强国建设的背景下, 乡村振兴战略已成为中国新时代“三农”工作的总抓手。在政策系统持续推进下, 中国乡村地区迎来了新一轮的制度变革与发展机遇。然而, 在脱贫攻坚全面胜利之后, 如何实现由“输血式扶持”向“内生式发展”的转型, 成为乡村振兴进程中亟待回答的问题。从外部资源输入到内部能力重构, 这样的转化不仅关乎产业、土地、资本等要素重组, 更关乎知识、制度与治理能力的协同塑造(蒋永穆, 2025)。中央一号文件(2023-2025年)连续强调, 推进乡村振兴需加强高校参与, 构建“政产学研用”融合机制, 推动大学生社会实践成果向乡村治理与产业升级转化, 推动乡村人才振兴制度框架和政策体系的形成。高校需发挥知识输出与成果孵化作用, 支持农业科技成果转化与基层应用, 体现了国家对乡村发展的顶层设计, 为高校参与提供了制度保障。

高校作为知识创新与人才供给的重要机构, 被越来越多地嵌入到乡村振兴的协同治理网络中。在服务国家战略、实现学术价值与推动区域发展的多重动因下, 高校逐步从“人才培养者”转型为“多功能发展主体”。通过优化人才培养体系、加强科技创新、提升社会服务能力等方面的探索与实践, 地方高校在服务乡村振兴中发挥了积极作用。要实现地方高校与乡村振兴的深度融合与协同发展, 仍需深化产学研合作, 提高科技成果转化率。(王天

作者简介: 徐庆学(2004—), 男, 本科生, 研究方向为企业管理。

极, 2025)。与此同时, 技术驱动的发展逻辑也深刻改变了乡村振兴的底层结构。高等教育数字化可通过科学研究突破式创新、人才培养结构性优化及“产学研用”深度融合, 推动核心技术突破、数字人才蓄能与科技转化效率提升, 助力新质生产力形成(王艳等, 2025)。在此背景下, 如何发挥高校的科研优势, 通过技术成果的本地化转化支持乡村产业升级, 成为当前实现可持续振兴的关键一环。

近几年来, 大学生社会实践活动在乡村振兴领域开展如火如荼, 规模和影响力持续扩大。2023年全国高校组织动员1100余万师生, 组建30余万支社会实践团队, 其中许多聚焦乡村振兴, 覆盖大量乡村基层。2024年, 这一活动进一步深化, 设立“乡村振兴促进团”专项, 项目包括农业科技推广、乡村治理创新和文化遗产等子领域。然而, 当前高校服务乡村的路径仍面临多重挑战, 比如支持产学研协同育人的相关政策乏力、支持产学研协同育人的动力不足、开展产学研协同育人的机制不畅等。所以, 需要院校、企业、行业、农业部门深度合作, 多层次、多途径、多形式开展产学研协同育人, 既符合产学研合作创新人才培养模式和高职教育校企合作、产教融合规律, 又符合高职教育人才成长规律和高职教育人才培养规律(桂文龙等, 2023)。

三、当前存在的问题

(一) 农业类社会实践各主体协作机制效率有待提升

乡村振兴战略纵深推进为高校农业类社会实践提供了强劲的政策驱动力, 但仍面临机制滞后与执行偏差的挑战。在加快建设农业强国的战略背景下, 农业发展领域大有可为, 但高校学生的农业类社会实践的成果仍存在转化效率低下等问题。近年来, 大学生农业类社会实践活动迅猛发展, 参与规模与深度持续扩展。然而, 政策导向明确且实践成果丰硕的表象下, 大学生农业社会实践往往陷入“产出即沉没”的窘境, 即调研报告、案例分析与技术方案等成果难以实现系统化沉淀与有效转化, 导致知识资源的闲置与浪费。同时, 广泛存在于基层的农业发展经验、优秀农户案例及地方振兴模式, 由于传播渠道的碎片化与整合能力的不足, 难以在更大范围内实现知识共享与示范推广, 凸显出当前乡村振兴战略实施中治理机制的滞后性与协调性不足, 科技创新与成果转化相脱节, 尚未形成有效的利益联动和奖励激励机制, 科技创新与成果转化人才队伍建设相对滞后, 科技创新与成果转化人才队伍建设相对滞后(董雪等, 2024), 亟需通过制度创新与平台构建予以破解。

(二) 农业新质生产力发展需求下的产学研转化存在瓶颈

5G、大数据、区块链等前沿技术的成熟应用显著扩大了农业生产效率的提升空间, 但高校农业类社会实践的技术赋能仍面临转化瓶颈与渗透不均衡的挑战。我国高校科技成果转化取得了显著成绩, 但仍存在重视程度需要加强、指导思想有待调整、专利制度亟待改进、产学研合作仍需深化、中介机构专业化水平尚待提升等问题。(雷朝滋等, 2024)。产学研深度融合人才培养需要克服教育理念与方式亟待更新、拔尖创新人才培养机制不健全、校企导向不同与教学科研失衡导致的动力不足、融合的组织机制有待完善等诸多问题和挑战。与“新质人才”的内在要求和迫切需求相比, 创新型人才培养的理念还存在一定的滞后性。教学的方式方法还不够多元, 尤其是在实践操作环节上有缺项。围绕创新型人才培养的目标上, 高校育人方向与企业真实需求也存在不一致的情况(胡湘永等, 2024)。所以, 高校也需从单纯技术输出转向综合能力构建。同时, 亟需构建“需求导向-技术支持-产业落地”的全链条创新体系以提升转化效能, 通过数字化平台与多主体协作机制, 强化技术渗透的普惠性与可持续性, 激发产学研协同的创新活力。

(三) 多维资源整合亟待破局的协同困境

尽管农业发展领域充满机遇, 但高校农业类社会实践的多维资源整合仍存在破局困境, 根源在于制度壁垒、信息不对称和利益分化等问题(陈耀等, 2024)。在公益助农领域, 当前高校学生社会实践项目与乡村实际需求高度契合的比例低于预期水平, 人才支撑体系亟待强化, 高素质农业经营主体的培养培训或直接供给机制的滞后。同时, 多维协同发展机制尚未健全, 优质农产品的产销精准对接有待进一步提升, 导致产业链上下游的资源流动效率低下。此外, 公益助农模式的影响力相对薄弱, 农业发展的优秀范例知名度不高、传播面较窄, 模范效应的放大作用未能充分显现。农业高职产学研协同育人中, 企业参与动力不足、学校机制不畅, 导致资源整合困境突出(桂文龙等, 2023), 亟需通过构建综合性孵化平台与政策引导的多维协同框架予以破局。

四、创新机制探索

本研究秉持“以农为本、数智赋能”的理念, 聚焦高校农业类社会实践成果的转化应用, 通过构建理论模型, 为对高校农业类社会实践成果的资源整合与数字化创新提供思路, 着力破解农产品产销对接低效、区域品牌

建设滞后、农户增收渠道单一等产业痛点。同时，尝试通过构建“生产端-流通端、消费端”数字化闭环，实现农业价值链重构与效能提升，打造集农产品上行、农技知识共享、产业资源整合于一体的现代农业服务生态系统。

（一）模型构建

构建“一核三环四主体”的立体化公益助农架构，形成多方联动的乡村振兴生态。围绕“高校学生农业社会实践成果产出与孵化”这一核心，依托三大关键工具——自有数字平台、农业发展案例库、数字媒体矩阵，形成紧密联动的三环模式。三环相互支撑、协同发力。通过数字化手段实现农业发展、市场拓展和农村资源的高效利用和经验共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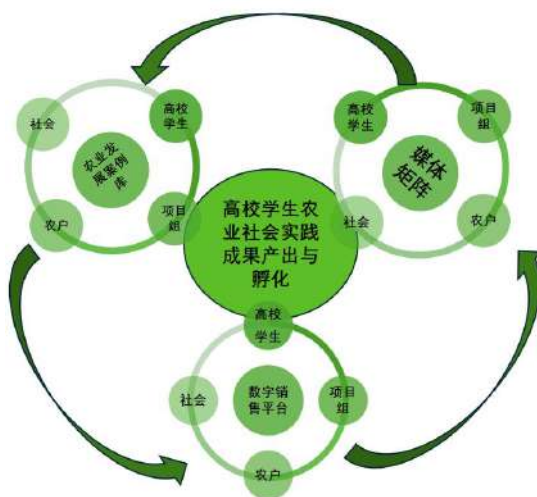


图 1 “一核三环四主体”模式图

构建“一核三环四主体”的立体化公益助农架构，形成多方联动的乡村振兴生态。围绕“高校学生农业社会实践成果产出与孵化”这一核心，依托三大关键工具——数字销售平台、农业发展案例库、数字媒体矩阵，形成紧密联动的三环模式。三环相互支撑、协同发力。通过数字化手段实现农业发展、市场拓展和农村资源的高效利用和经验共享。

环一：数字销售平台



图 2 数字销售平台模式图

数字销售平台是该模型的核心运营载体，也是联结各方资源的桥梁。利用自有的数字平台，各主体能够实现农产品销售、信息传递、资源整合等多重互动。平台需具备产品介绍、电子商务、案例分享、品牌塑造、资源扩

展、合作搭建等多种功能模块，能够实现农户的产品展示、经验分享、合作介绍和资源管理。同时，通过后台大数据分析，平台能够帮助农户和企业精准对接市场需求，优化供需关系，提升产品销售的精准性和有效性。

环二：媒体矩阵



图 3 媒体矩阵模式图

数字媒体矩阵包括了短视频平台、社交媒体、电商直播等新兴数字化传播手段，是模式中进行品牌传播和农产品营销的重要助推器。通过内容营销和社交互动，拉近农户与消费者之间的距离，促进了产品的流通和品牌的建立，进一步推动农产品的市场化。通过多维度、多渠道的宣传矩阵，可以提升农产品和成功案例的知名度，吸引更多消费者和合作伙伴参与助农事业。

环三：农业发展案例库



图 4 农业发展案例库模式图

农业发展案例库是模式中独特的知识共享和经验积累平台。案例库可涵盖从农产品品牌塑造到现代农业技术应用的全产业链经验，助力农业创新和推广。通过收集、整理和展示成功的乡村振兴和农业发展案例，案例库不

仅可以为其他地区的乡村提供学习借鉴的机会,也可以为各方参与乡村振兴的主体提供丰富的成功经验和实用方法。

(二) 主体参与

“一核三环四主体”的发展模式中,高校学生、农业实践项目组、农户和社会四大主体在三环模式的引导下形成循环互动。

主体一: 高校学生

高校学生群体是创新驱动的重要力量。在学生个人、高校与具体社会实践实施项目的合作中,学生深入乡村,参与社会实践活动,帮助乡村提升信息化水平、优化农业生产流程并推动农产品的数字化销售,可以为乡村带来了新鲜的思维和现代化管理理念,也可以为未来的乡村发展注入人才储备。为模式中的农业发展案例库提供更加真实有效的农业发展案例。

主体二: 项目组

项目组是是农业社会实践的管理和执行机构,负责统筹农业资源、社会实践对接、产品制作与销售、制定发展战略以及协调各方力量。项目组通过自有数字平台的管理与运营,保证农户和消费者之间的无缝对接,并不断更新和完善农业发展案例库,为社会各界提供有价值的助农实践参考,为高校学生群体提供社会实践指导。

主体三: 农户

农户是农业发展的直接参与者,也是“一核三环四主体”模式的最终受益者。其他各主体通过提供全方位的技术支持、品牌推广和市场渠道,帮助农户提高农产品的附加值,并实现可持续的增收。同时,通过乡村振兴案例库,农户也可以获取有效的生产和经营建议。

主体四: 社会

社会主体主要指相关企业和消费者等群体,企业和消费者作为模式中的重要社会力量,在推动乡村振兴方面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企业可以通过数字销售平台获得优质农产品,并参与帮助项目发展,形成企业社会责任感的表达,也可以与高校、学生形成合作,提供社会实践岗位,储备未来人才。消费者购买农产品可以满足其对优质农特产品的需求,也支持了乡村的可持续发展。

多方互动: 形成可持续发展闭环

在“一核三环四主体”的模式下,各主体通过数字平台、农业案例库和数字媒体矩阵三大循环紧密互动,形成高效、创新且可持续的农业发展生态模式,有效促进农产品的销售和提升乡村振兴范例的传播力度和影响力,最终形成助农、兴农、富农的多维度生态体系,将为未来的农业发展提供更多可供复制的成功经验,推动农村经济的持续繁荣。

五、结语

在乡村振兴战略与农业强国建设深入推进的背景下,高校农业类社会实践成果转化面临“产出即沉没”的结构性困境,也需要应对多主体协作机制低效、产学研瓶颈与资源整合协同等难题。本文通过理论模型构建,创新提出“一核三环四主体”模式,以成果产出与孵化为核心,依托数字销售平台、农业发展案例库及数字媒体矩阵,实现知识流动、农产品产销对接与生态共生。该模式强调数智赋能与多方互动,形成可持续发展闭环,有效破解城乡资源不对称,推动农业新质生产力激发与乡村振兴内生动力重构。研究不仅丰富了高校参与乡村振兴的机制理论框架,还为实践单位与政策制定提供指导路径。未来,可进一步实证验证模式应用效果,扩展至更多领域,促进人文社会科学与农业实践的深度融合。

参考文献:

- [1]蒋永穆.以发展新质生产力赋能农业强国建设[J].人民论坛·学术前沿,2025,(04):87-97.
- [2]王天极.“三全育人”视角下地方高校服务乡村振兴创新发展的路径研究[J].山西农经,2025,(15):33-35.
- [3]王艳,柯倩,刘汀.高等教育数字化赋能新质生产力的理论逻辑、实现路径与风险防范[J].教育探索,2025,(08):40-45.
- [4]桂文龙,李巨银,刘晶.乡村振兴视角下农业高职产学研协同育人状况探究[J].中国高校科技,2023,(09):62-67.
- [5]董雪,闫立萍.产学研用合作视域下推进辽宁农业科技创新与成果转化深度融合研究[J].农业经济,2024,(03):124-125.
- [6]雷朝滋,刘怡.加快高校科技成果转化推动企业主导的产学研深度融合[J].中国高教研究,2024,(09):13-19.

[7]胡湘永,廖文和.新质生产力视角下产学研深度融合人才培养的创新模式与协同机制[J].南京社会科学,2024,(08):142-149.

[8]陈耀,杨尧均.面向“政产学研用”深度融合的地方高校新型智库建设模式探析[J].智库理论与实践,2024,9(06):122-129.

From Sunk Outcomes to Ecological Symbiosis: An Exploration of Innovative Mechanisms for the Transformation and Implementation of Agricultural Social Practice Results in Universities

Xu Qingxue¹

¹ *Business School, Shandong University of Technology, Zibo, Shandong 255000, China*

Abstract: Under the background of the rural revitalization strategy and the construction of a strong agricultural nation, university agricultural social practice activities have become increasingly active. However, the outcomes often face the dilemma of "sunk upon production," lacking mechanisms for systematic accumulation, transformation, and application. Meanwhile, the fragmented dissemination channels for grassroots agricultural experiences hinder knowledge sharing and promotion. This paper focuses on the multi-subject collaboration involving university students, rural farmers, practice units, and agriculture-related organizations. Addressing issues such as low efficiency in outcome transformation, bottlenecks in industry-university-research integration, and resource integration challenges, it innovatively constructs a "one core, three rings, four subjects" model. Centered on the "production and incubation of university students' agricultural social practice outcomes," this model relies on three rings—digital sales platforms, agricultural development case libraries, and digital media matrices—to achieve docking of agricultural product production and sales, knowledge flow, and ecological symbiosis. The model emphasizes digital intelligence empowerment and multi-party interaction, forming a closed loop for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that promotes the transformation of university knowledge output into rural industrial upgrading. It can effectively resolve urban-rural resource asymmetries, stimulate new quality productive forces in agriculture, and drive the reconstruction of endogenous momentum for rural revitalization, offering theoretical innovation and practical guidance value.

Keywords: Rural Revitalization; University Social Practice; Achievement Transformation; Industry-University-Research Cooperation; Ecological Symbiosis

农业农村现代化：历史演进、现实难题和实践进路

王语霏¹

(1.海南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 海南海口 570228)

摘要：农业农村现代化是中国式现代化基础支撑，是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基础。自中国共产党成立以来始终致力于实现这一伟大目标，并在此过程中取得了显著的成就。然而，我们也必须清醒地认识到，当前农业与农村现代化面临着诸多风险与挑战。国家粮食安全正遭遇非传统性威胁，农业科技创新水平仍有待提升。这些挑战要求我们在新时代背景下，重新审视并推进农业与农村现代化的路径。立足于新的历史起点，必须从耕地、水资源、科技创新和环境保护等多个维度出发，构建全面、系统的保障体系，打破城乡二元壁垒，以高水平开放实现农业农村现代化，确保农业农村现代化与中国式现代化进程相协调，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奠定坚实基础。

关键词：农业农村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历史演进；中国共产党

基金项目：2023 年国家社科基金重点项目《中国式现代化蕴含的独特文明观研究》(23AKS009)；2024 年海南省研究生创新课题《南繁对维护国家粮食安全的历史性贡献研究》(Qhys2024-320)

DOI: doi.org/10.70693/rwsk.v1i8.1273

党的二十大明确提出“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1][2]}的使命任务，同时提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最艰巨最繁重的任务仍然在农村”，要“坚持农业农村优先发展”“加快建设农业强国”^{[1][3]}。习近平总书记在深入推进东北振兴座谈会时特别指出“中国现代化离不开农业现代化”^{[2][18]}。因此，农业农村现代化是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重要组成部分，同时也是重要保证。一定程度上讲，实现农业农村现代化不仅是现代化的目标，其本身就是实现中国式现代化的进程。

进入新时代以来，中国农业现代化以高质量发展为核心导向，并致力于实现多元化的农业发展目标。在新发展理念的引领下，我们积极寻求一条既能高效产出、保证产品安全，又能节约资源、环境友好的农业现代化路径。自 2012 年至今，我国农业已显著向系统化、综合化方向演进。系统化农业的核心在于强调农业生产的整体性、协调性和可持续性，同时重视农业生态系统的平衡与资源的合理利用。通过加强农业科技创新，我们已经推动了智能农业、精准农业的进步，并提升了农业生产的智能化和信息化水平。此外，我们也更加关注农业生态环境的保护与改善，力求实现农业生产的经济效益、社会效益和生态效益的和谐统一。这些措施为我国农业的高质量发展提供了坚实支撑，同时也为乡村振兴战略的推进奠定了坚实基础。

在这一过程中，中国共产党始终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注重保障农民的基本权益，推动农业生产方式的转变，促进农村经济社会的全面发展。新时代，农业农村现代化面临着新的挑战 and 机遇。一方面，全球化和市场化的趋势为中国农业提供了广阔的发展空间和无限的可能；另一方面，资源环境的压力、农业生产方式的转型、农民生活质量的提升等问题也对中国农业现代化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因此，通过梳理四个时期中国共产党人对农业农村现代化的探索历程，我们不断有新的突破和进展。立足于新的历史起点，这既是挑战也是机遇，如何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继续推进农业农村现代化，实现农业农村的全面发展，是摆在党和国家面前的重要任务。因此，要积极寻找相对应的解决措施，以农业农村现代化促进中国式现代化的进一步发展，从而促进二者的良性互动。

一、历史演进：农业农村现代化的发展历程

(一) 初见成效：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对于农业农村现代化的初步探索与实践

我们党自成立以来，充分认识到农民问题是中国革命的核心议题，始终以实现农民群众的福祉为己任，把农

作者简介：王语霏（1998—），女，硕士研究生，主要从事中国近现代农业史方面研究。

民从政治压迫和经济剥削的枷锁中解脱出来。毛泽东通过对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指明了“农民是无产阶级最主要的同盟军”^[3],为中国共产党正确认识农民在民主革命中的地位和作用,制定正确的农民的政策奠定了思想前提。

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中国农村在政治、经济、文化和社会等方面经历了深刻的变革。中国共产党人将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成功开辟了一条有别于俄国十月革命的道路,即“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在这一时期,中国共产党人领导农民进行了大规模的土地改革,旨在实现土地的平均分配,保障农民的土地权益。在国民革命时期,土地政策以“减租减息”和“限制田租”为主要特征;进入土地革命阶段,政策转变为以“对地主土地进行征收”为主;到了抗战期间,又回归到以“减租减息”为核心;最终在解放战争时期,实施了“耕者有其田”的政策。中国共产党在各个历史时期对土地政策进行了持续的调整与完善,这一系列的土地政策的变化过程使农村社会关系得到了根本性的转变,激发了农民的生产积极性,为农业农村现代化奠定了基础。

同时,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也注重农业技术的引进和推广,开始引入现代农业机械,提高农业生产效率。在农业组织方面,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推行了农业合作化运动,建立了人民公社制度。毛泽东同志早在《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中就把合作社运动列为农民运动的一件大事。^[4]“历史表明:发展形式多样的农业合作经济组织,是实践的需要,是农业发展的应然要求。”^[5]这种集体化的农业生产方式促进了农业技术的推广和应用,提高了农业生产效率和质量。此外,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还重视农村的文化教育和社会保障。例如,1931年4月,闽西苏维埃政府提出,要将广大不识字群众有序地分配到工农夜学中去学习;1933年11月,中华苏维埃政府召开中央文化教育建设大会,正式颁布《消灭文盲决议案》。根据决议案的要求,每乡必须设立一个消灭文盲协会,负责领导并推动扫盲运动的深入开展,以提高全民的文化素质和知识水平。^[6]同时,建立农村医疗保障制度和养老制度,改善了农民的生活条件和社会福利。总的来说,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的农业农村现代化探索是一个多元而复杂的过程。它涵盖了土地改革、农业技术推广、农业组织变革、文化教育普及和社会保障建立等多个方面。这些探索和实践不仅为后来的农业农村现代化发展奠定了坚实基础,也为整个国家的社会经济发展提供了重要的推动力。

(二) 曲折发展: 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对于农业农村现代化的艰难探索

在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我国农业农村现代化建设面临诸多挑战。经历了长期战争的中国尚未恢复,经济基础较为薄弱,农业生产技术和设备相对落后,农村发展水平有待提高。同时,我国人口众多、资源有限,国家工业化和城市化进程对农产品供应提出更高要求,而农村发展又需国家加大支持和投入力度。

为推动农业农村现代化,政府采取了一系列有力措施:大规模的土地改革,将土地从地主手中转移到农民手中,实现了“耕者有其田”的目标;推行农业集体化,将个体农民组织成合作社或人民公社;农业技术推广,政府大力推广现代农业技术和管理经验,引进先进的农业机械和种植技术。这些措施旨在提高农业生产效率与质量,增加农民收入,改善农民生活条件及社会福利。通过这些措施的实施,我国农业农村现代化建设取得显著成效,为国民经济发展和人民生活水平提升奠定了坚实基础。

然而,这个时期的探索和实践并不是一帆风顺的。在实践中,也出现了一些问题和困难,如在土地改革过程中,部分地区出现了过激行为,导致土地分配不均和生产效率下降;推行农业集体化政策时,部分地区出现了合作化程度过高、农民生产积极性下降的问题;进行农业技术推广进程中,由于技术推广体系不完善和农民文化水平较低,这些技术的普及和应用受到限制等。虽然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探索农业农村现代化经历了曲折挑战,但是中国共产党人始终坚持推进农业农村现代化的发展,不断探索和创新适合中国国情的发展模式和路径。这个时期的探索和实践为中国农业农村现代化的发展创造了良好条件,也为后来的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提供了宝贵的经验和教训。

(三) 历史突破: 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时期对于农业农村现代化的再出发

在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期,中国共产党始终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不断推进农业农村现代化建设。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我国农业开始逐步走上现代化之路。为了加快农业发展,提高农业经济效益,我国制定了一系列政策文件,1980年1月16日在中央召集的干部会议上正式提出“要把经济发展当作中心”,以提高经济效益为目标的发展思路,制定了“决战农村”“振兴农村经济”的战略任务。江泽民在党的十五大报告提出了“积极发展农业产业化经营,形成生产、加工、销售有机结合和相互促进的机制,推进农业向商品化、专业化、现代化转变”^[7]的战略任务。为了进一步推进农业现代化,党的十五届三中全会通过《中共中央关于农业和农村工作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进一步指出,“发展农业产业化经营是我国农业逐步走向现代化的现实途径之一”^[8]。

在农业现代化的进程中,我国还注重科技创新和人才培养。通过加强农业科技研究和推广,提高农业生产的技术水平和效益。同时,培养了一大批懂技术、会管理的新型职业农民,为农业现代化提供了人才保障。从1978

年至今,经过多年努力我国农业现代化建设取得了显著成效,农业生产方式发生了深刻变化,农业综合生产能力大幅提升,农民收入水平不断提高。同时,在改革开放的不同阶段我们也面临了诸多问题和阻力。为了有效应对这些问题,中央在1982年至1986年间先后制定并发布了五个以三农为主题的中央“一号文件”,例如1982年的“一号文件”首次以中央的名义正式承认包产到户的合法性,1983年的“一号文件”指出要放活农村工商业,1984年的“一号文件”要解决的就是发育市场机制宏观问题等。这些中央一号文件,不仅是制定农业现代化发展政策的重要依据,更是推动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进程的关键文件。通过这些文件的实施,中国农业逐步走上了现代化的发展道路,实现了历史性的突破,也表明了中国共产党对农业现代化的高度重视和坚定决心,为推动农业现代化提供了强有力的政策保障。

中国共产党人在百余年的奋斗历程中不断积累与总结实践经验,形成了一系列重点突出、相互衔接的乡村建设相关理论成果。延安时期,党在制度构建和组织建设方面积累了丰富的基层制度建设经验;20世纪60年代前后,以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为目标的大规模乡村改造运动全面展开;1978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国家逐步将农业生产的自主权、农业生产组织的权利以及农村自治治理的权利归还给农民,以农村经济改革为中心,逐步探索让农民“站起来”到实现“富起来”的道路。新时代以来,乡村振兴战略的提出和实施、农村基层党组织建设、乡村治理体系的构建以及农业农村现代化的推进,均展示了党在乡村建设理论和实践方面的新成果。自2004年至今,中央“一号文件”连续18年聚焦“三农”工作,对“三农”工作作出了一系列重大部署和安排,为新时期“三农”工作提供了重要遵循,凸显了“三农”在现代化建设中的重要地位以及党中央解决“三农”问题的决心。这些理论成果的形成,充分体现了党对乡村发展的深入思考与实践经验的总结,对立足于新起点的乡村建设实现高质量发展具有重大意义。

(四) 高质量发展: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对农业农村现代化的探索与实践

党的18大以来,我国农业农村发展进入新的历史阶段,面临新的机遇和挑战。“十四五”时期将坚持把解决好“三农”问题作为全党工作的重中之重,以实施乡村振兴战略为总抓手,加快推进农业农村现代化,努力开创农业农村工作新局面。党的十八大对加快形成新的经济发展方式作出了全面部署,首次提出要“坚持走中国特色新型工业化、信息化、城镇化、农业现代化道路”^[9]。2014年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了《关于全面深化改革加快推进农业现代化的若干意见》,进一步明确指出我国要“努力走出一条生产技术先进、经营规模适度、市场竞争力强、生态环境可持续的中国特色新型农业现代化道路”^[10]。2021年《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全面推进乡村振兴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的意见》指出“要坚持把解决好‘三农’问题作为全党工作重中之重,把全面推进乡村振兴作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一项重大任务,举全党全社会之力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让广大农民过上更加美好的生活。”^[11]2022年《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做好二〇二二年全面推进乡村振兴重点工作的意见》提出,要“牢牢守住保障国家粮食安全和不发生规模性返贫两条底线,突出年度性任务、针对性举措、实效性导向,充分发挥农村基层党组织领导作用,扎实有序做好乡村发展、乡村建设、乡村治理重点工作,推动乡村振兴取得新进展、农业农村现代化迈出新步伐”^[12]。2024年《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学习运用“千村示范、万村整治”工程经验有力有效推进乡村全面振兴的意见》指出,“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必须坚持不懈夯实农业基础,推进乡村全面振兴”,“以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更好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13]

二、现实难题:农业农村现代化的关键挑战

缺乏农业农村现代化,社会主义现代化便无法实现全面性发展。在我国现代化建设过程中,农业农村现代化发挥着战略性、基础性的关键作用。习近平总书记特别指出:“强国必先强农,农强方能国强。没有农业强国就没有整个现代化强国;没有农业农村现代化,社会主义现代化就是不全面的。”^[14]农业农村现代化的发展,不仅直接关系到农业本身的生产发展,更关系到整个国家的现代化进程。然而,农业农村现代化也面临着诸多关键挑战。

(一) 国家粮食安全面临非传统性挑战

谈及“吃饭问题”,在1919年7月14日发表的《湘江评论》创刊宣言中,毛泽东就明确指出:“世界什么问题最大?吃饭问题最大。”^[15]。在1924年,孙中山在广州国立高等师范学校礼堂演讲三民主义中也指出:“在事业上头一个最重要的问题,就是吃饭问题,我们要解决这个吃饭问题,是先要食粮的生产很充足,次要粮食分配很平均。”^[16]手中有粮,心中不慌。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将“解决好吃饭问题”视为“关系国计民生的重大问题”^[17]^[8],强调“悠悠万事,吃饭为大”^[18],亲自深入各地进行实地考察与调研,并围绕国家粮食安全问题在多次会议讲话中作出重要论述。在党的二十大报告中进一步指出要“全方位夯实粮食安全根基,全面落实粮食安全党政同责,牢牢守住十八亿亩耕地红线”^[19]^[31]。这对于全面推进乡村振兴、加快建设农业强国,确保中国人的饭碗

牢牢端在自己手中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在达成过去我们强调的“保全部、保所有品种”的战略目标后,我国粮食安全形势总体上呈现出良好的态势。然而,鉴于我国人口增长和经济发展的趋势,国内粮食需求的刚性增长将持续存在,而粮食供需的结构性矛盾日益突出。与此同时,我们也面临着一些资源与环境的制约因素,其中最为明显的是土地资源紧张、水资源短缺以及生态条件的承载力超负荷等问题。土地资源的紧张,这是我国粮食生产面临的重要问题之一。随着城市化进程的加速和工业化的推进,大量的耕地被占用,导致可用于粮食生产的土地资源日益减少。而水资源的短缺,也是制约我国粮食生产的重要因素。我国是一个水资源相对紧缺的国家,而粮食生产是用水大户。随着人口的增长和经济的发展,水资源的需求不断增加,而利用率得不到有效提升,导致水资源短缺问题愈发严重。三是生态条件的承载力超负荷。长期以来,我国农业生产存在着过度开发和污染等问题,导致生态环境受到严重破坏。生态环境的恶化不仅影响了粮食生产的可持续性,还对人们的健康和生存环境造成了威胁。

早在1990年,习近平在福建工作时,在《摆脱贫困》中谈及对从小农业到大农业涉及观念的转变,进而指出“大粮食观念替代了以粮为纲的旧观念”^[19]。习近平总书记在2015年中央农村工作会议中首次提出“树立大农业、大食物观念”;不久在2016年发布的中央一号文件中明确表示:“要树立大食物观,面向整个国土资源,全方位、多途径开发食物资源,满足日益多元化的食物消费需求”^[20]。在2017年中央农村工作会议上,习近平总书记进一步指出:“现百姓的食物需求更加多样化了,这就要求我们转变观念,树立大农业观、大食物观”^{[19]88}。党的二十大报告要求树立大食物观,构建多元化食物供给体系,意味着我们要向耕地草原森林海洋、向植物动物微生物要热量、要蛋白,全方位多途径开发食物资源。这既是中国大力发展“大农业”的需要,也是满足居民膳食结构转变、消费需求升级的需要,更是缓解生态压力、践行可持续发展理念的需要。

(二) 农业科技创新动力不足

农业科技是国家粮食安全和重要农产品供给的基石,是突破资源环境约束的必然选择,对推动农业农村现代化发展起决定性作用。在工业化、城镇化的快速发展背景下,实际耕地面积不断减少,农业劳动力总量也有所下降。面对这样的挑战,农业增长必须依靠技术进步,走内涵式发展道路,以实现持续稳定的发展。经过长期的努力,我国农业科技取得了显著进步:“农业科技进步贡献率已超过60%”,“耕种收综合机械化率达71%”。^[21]然而,这些还远远不够,我们与发达国家相比仍存在一定的差距。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矛盾和问题是科技创新的导向,解决瓶颈制约始终是农业技术进步的主攻方向。”^{[2]218}因此,我们必须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重视并紧紧依靠农业科学技术的进步,以化解当前农业面临的多重挑战。一是农业科技创新能力。农业科技是推动农业农村现代化的关键力量。随着农村青壮年劳动力逐步向城市转移、农业生态环境问题日趋严峻,全社会对农产品质量安全重视程度不断提高,这要求我们走更加均衡的农业技术进步道路,将土地产出率、资源利用率、劳动生产率三者之间达成动态平衡。二是创新体系整体效能低下。存在各自为战、低水平重复以及转化率不高等问题,亟需优化提升。针对这些问题,要加强统筹协调,提高创新能力和水平,完善创新服务体系。三是农民对新技术认识和接受程度有限。为此提升农业科技创新水平并加快推广使用,提高农民科技素养,让农民用最好的技术种出最好的粮食。

(三) 城乡发展不平衡不协调

城乡发展一体化对于解决农业、农村和农民问题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同时也是推动农业农村现代化的重要举措。党的十八大以来,党中央一直高度重视“三农”问题,习近平总书记在论述乡村振兴战略时指出,“我国发展最大的不平衡是城乡发展不平衡,最大的不充分是农村发展不充分。”^{[2]275}从“重城市轻农村”到“商品市场化”再到“新型工农城乡关系”的变迁发展,我们不断调整工农关系、城乡关系,统筹城乡发展取得了重大进展,农村社会事业得到了明显改善。然而,我们必须清醒地认识到,由于历史遗留问题和基础建设的薄弱,我国城乡发展不平衡、不协调的问题仍然十分突出。具体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乡村高素质、高技术人才短缺,单向流向城市,农村的优质资源要素被吸附走,导致当前“城市病”与“空心村”问题并存的空间结构性失衡。同时,乡村数字信息技术发展滞后,城乡实行二元管理体制,农业农村现代化相对于快速发展的工业化和城镇化进程仍显滞后,农业的质量效益和竞争力有待提升,城乡间的要素交换存在不平等现象,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的差距也较为明显。因此,我们需要进一步加大城乡发展一体化的推进力度,着重解决这些问题,促进城乡协调发展,提高农业现代化水平。

三、实践进路:农业农村现代化的强化路径

(一) 严守18亿亩耕地红线,构建国家粮食安全全方位保障体系

粮食安全是关乎国计民生的根本性战略问题，是维护社会稳定与国家发展的基石。习近平总书记强调：“粮食多一点少一点是战术问题，粮食安全是战略问题。”^[12]立足新发展阶段，我国始终遵循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保障粮食安全和重要农产品供给的重要论述，通过系统性战略部署与改革实践，探索形成了符合中国国情的粮食安全保障路径。实现粮食生产可持续发展，需强化党政同责机制，从资源保护、技术应用与生态维护多维度协同发力。

其一，树立“大食物观”，强化土地资源保护与高效利用。一方面，严格执行耕地用途管制制度，严控非农建设占用耕地，通过土地综合整治与撂荒耕地复垦等举措稳定耕地面积。习近平总书记明确指出：“18亿亩耕地是红线，是战略底线，是关系国家命脉的安全线。”^[16]必须以最严格的制度守护这一生命线。另一方面，聚焦单产提升与效率优化，推广节水灌溉、精准施肥等现代农业技术，通过农业补贴政策引导农民采用绿色高效生产模式，在耕地规模稳定前提下实现粮食产能提升。其二，构建水资源保障体系，破解农业用水约束。加大农田水利基础设施投入，完善节水灌溉工程网络，推广喷灌、滴灌等节水技术，降低农业用水损耗。同时建立水资源循环利用机制，推进农业面源污染治理与污水资源化利用，提升水资源再生能力，为粮食生产提供可持续水源支撑。其三，推进生态保护与修复，夯实粮食安全生态根基。严格控制化肥、农药过量使用，推广生态种养、轮作休耕等绿色模式，降低农业面源污染风险。建立农业生态环境监测网络，强化动态评估与问题整改，通过土壤修复、湿地保护等工程提升生态承载力，实现粮食安全与生态安全的协同发展。

（二）突破农业技术“卡脖子”瓶颈，强化核心技术自主可控能力

习近平总书记反复强调，要牢牢把住粮食安全主动权，确保“中国饭碗”主要装中国粮、优质粮。2018年在海南考察时，他明确指出：“良种在促进粮食增产方面具有十分关键的作用。”^[22]2013年，国家布局建设西北、西南、海南三大国家级粮食作物种子生产基地，其中海南南繁科研育种基地作为“中国饭碗”的核心支撑，对保障种业安全与粮食安全具有战略意义。突破技术瓶颈、实现核心技术自主可控，是筑牢粮食安全根基的关键。

一是构建多元化农业科研投入机制。加大财政对农业科研的支持力度，提高研发经费占比，重点攻关良种培育、智能装备等关键领域。引导社会资本参与农业科技创新，推动科研机构与农业企业建立协同创新联盟，加速科技成果转化应用。通过建设农村科技示范点，让农民直观体验技术效益，打通技术推广“最后一公里”。二是培育农业科技创新人才队伍。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发展是第一要务，创新是第一动力，人才是第一资源。”^[23]强化农业院校教育改革，突出实践教学比重，推动理论与生产实践融合；鼓励学生参与科研项目与学术交流，培养创新思维与实操能力。建立健全科技人才激励机制，通过成果奖励、职称倾斜等政策激发农业科技人员的创新活力，打造高水平研发团队。三是提升农民科技应用能力。农民作为农业生产主体，其科技素养直接影响技术转化效能。依托基层农业技术推广体系，开展科技培训班、田间指导等精准服务，普及良种选用、智能管理等实用技术。完善农村科技服务平台建设，为农民提供便捷的技术咨询渠道，增强其科技应用主动性与能力。

（三）正确把握城乡关系，持续推进城乡一体化发展

工农关系、城乡关系的协调处理是党治国理政的重要课题。新时代背景下，需以乡村振兴为契机，深化“工业反哺农业、城市支持农村”实践，开创城乡融合发展新局面。

一是构建人才双向流动机制。优化返乡创业就业政策，通过项目扶持、资金补贴等措施吸引高素质人才下沉乡村。依托现代农业产业园、农业科技园区等平台，推广先进技术与管理模式，创造高质量就业岗位，形成“人才回流—产业升级—就业扩容”的良性循环。二是完善农村基础设施体系。加大乡村财政投入力度，重点推进道路硬化、水利提质、电力升级、通讯覆盖等工程，补齐基础设施短板。强化农村电商政策支持，推动数字技术与农业生产、农产品流通深度融合；完善农村物流网络，打通城乡供需衔接通道，促进农业现代化、信息化与新型城镇化协同发展。三是深化城乡制度改革创新。以打破城乡二元结构为核心，推进户籍制度改革，完善城乡统一的社会保障、教育医疗等公共服务体系。建立城乡要素平等交换机制，促进资本、技术、数据等要素向乡村流动，推动城乡资源均衡配置。通过制度创新缩小城乡发展差距，让农民共享现代化成果，实现城乡融合发展的实质性突破。

农业农村现代化是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基础工程，也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关键任务。面对发展中的风险挑战，需通过筑牢粮食安全底线、突破技术创新瓶颈、推进城乡融合发展，确保农业农村现代化与中国式现代化同频共振，为我国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打下坚实的基础。

参考文献：

- [1] 习近平.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而团结奋斗--在中国共产党第二十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M].北京:人民出版社,2022:21-31.

- [2] 论“三农”工作[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22:7-275.
- [3] 毛泽东文集(第7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9:132.
- [4] 史敬棠,张凇,周清,毕中杰.中国农业合作化运动史料(上册)[M].北京:三联书店,1957:73.
- [5] 马桂萍.农民专业合作社与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载体研究[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6:31.
- [6] 刘洪森.党计与生计:中国共产党民生建设的理论与实践(1949-1956)[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7:63
- [7] 江泽民文选(第二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6:24.
- [8] 中共中央关于农业和农村工作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J].求是,1998(21):2-12.
- [9]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十八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上)[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4:837
- [10] 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三农”工作的一号文件汇编(1982-2014)[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4:274.
- [11] 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全面推进乡村振兴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的意见[M].北京:人民出版社,2021:2-3.
- [12] 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做好二〇二二年全面推进乡村振兴重点工作的意见作者[M].北京:人民出版社,2022:2.
- [13] 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学习运用“千村示范、万村整治”工程经验有力有效推进乡村全面振兴的意见[N].人民日报,2024-02-04(001).DOI:10.28655/n.cnki.nrmrb.2024.001240.
- [14] 中央农村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习近平关于“三农”工作的重要论述学习读本[M].北京:人民出版社,2023:16-33
- [15] 中共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中央档案馆.中国共产党重要文献汇编(第一卷)(一九二一年七月--一九二一年十二月)[M].北京:人民出版社,2022:124
- [16] 孙中山选集[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1:862-863.
- [17] 习近平.习近平著作选读(第二卷)[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23:87-88.
- [18] 习近平.习近平著作选读(第一卷)[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23:197.
- [19] 习近平.摆脱贫困[M].福建:福建人民出版社,1992:132.
- [20] 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落实发展新理念加快农业现代化实现全面小康目标的若干意见[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6:10
- [21] 宋洪远.新时代中国农村发展与制度变迁(2012-2022)[M].北京:人民出版社,2023:177
- [22]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习近平关于国家粮食安全论述摘编[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23:46
- [23] 论党的青年工作[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22:14

Agricultural and Rural Modernization: Historical Evolution, Practical Challenges, and Pathways Forward

WANG Yufei

1. School of Marxism, Hainan University, Haikou, Hainan 570228

Abstract: Agricultural and rural modernization serves as the foundational support and an integral component of Chinese modernization. It is also crucial for realizing the great rejuvenation of the Chinese nation. Since its founding, the Communist Party of China has consistently strived to achieve this great goal and has made remarkable accomplishments in the process. However, it is imperative to recognize that agricultural and rural modernization currently face numerous risks and challenges. National food security is encountering non-traditional threats, and the level of agricultural technological innovation still requires further enhancement. These challenges demand that we reexamine and advance the pathways of agricultural and rural modernization in the context of the new era. Starting from a new historical juncture, it is essential to build a comprehensive and systematic safeguard system from multiple dimensions, including arable land, water resources, technological innovation, and environmental protection. Breaking down the urban-rural dichotomy and achieving agricultural and rural modernization through high-level openness will ensure its alignment with the process of Chinese modernization, thereby laying a solid foundation for realizing the Chinese Dream of the great rejuvenation of the Chinese nation.

Keywords: agricultural and rural modernization; Chinese modernization; historical evolution; the Communist Party of China

现代产业学院产教融合长效机制研究 ——以光伏与生物医药类产业学院为例

邹鸣民¹

(1.江西科技学院, 江西 南昌 330098)

摘要: 本文通过典型案例研究方法, 选择了常熟理工学院的光伏科技学院和医药生物技术学院作为研究对象, 深入分析它们在组织管理、课程设置、师资培养、资源投入以及机制保障等方面的运行路径, 探讨如何建立一种可持续且可复制的产教融合长效机制。研究发现, 现代产业学院的高效运行依赖于多元共治的治理体系、岗位导向的课程共建机制、校企联合的协同育人机制、多元投入的资源保障体系以及制度化的政策支撑网络。本文总结出五类关键机制模式, 提出针对性优化建议, 涵盖分类推进、制度标准建设、企业深度参与、动态评估机制与信息平台支撑。研究不仅为现代产业学院长效机制建设提供了理论支撑与实践路径, 也为其他行业学院的机制创新与推广提供了有益参考。

关键词: 现代产业学院; 产教融合; 长效机制; 光伏产业; 生物医药; 校企合作; 人才共育

DOI: doi.org/10.70693/rwsk.v1i8.1293

1 引言

产教融合是我国加快推进建设现代化教育强国、建设创新型国家战略实施进程中, 高等教育服务区域经济社会发展的主要发展模式。从2014年至今, 产教融合处在新时代繁荣发展期。国家先后颁布实施《关于加快发展现代职业教育的决定》^[1]和《现代职业教育体系建设规划(2014-2020年)》^[2], 提出加快建设现代职业教育体系。党的十九大报告提出要“深化产教融合、校企合作”。2019年教育部印发《国家职业教育改革实施方案》^[3]指出要建设一批高水平的现代产业学院, 加快形成“政府引导、行业指导、企业参与、高校实施”的产教融合机制体系。《关于深化产教融合的若干意见》^[4]明确指出, 现代产业学院是教育链、人才链与产业链、创新链紧密融合的重要平台。2020年7月, 教育部与工业和信息化部联合印发《现代产业学院建设指南(试行)》^[5]。指南的印发标志着产业学院建设正处在国家级示范项目实施的新阶段。现代产业学院实现高校政府、企业、行业、院企深度协同, 促进“新工科”“新医科”等“四新”建设, 着力推进光伏、新能源、生物医药等领域的复合型技术技能人才培养。

然而, 当前产业学院合作深度不够、协作机制不畅、课程体系与产业需求脱节等问题仍然制约着产业学院高水平发展。因此, 建设现代产业学院产教融合长效机制, 是解决以上问题、实现高等教育与产业深度融合的关键。本文选择代表新能源产业与生物医药产业的光伏科技学院、医药生物技术学院2个不同类型的产业学院建设典型, 分别剖析建设经验, 总结组织保障、经费保障、实施保障、政策保障等体制机制设计和路径探索, 从分析研究入手提炼可复制可推广的产教融合长效机制模型, 为全国现代产业学院建设提供制度设计参考、实践探索借鉴。

2 文献综述与理论基础

2.1 国外研究现状

产教融合作为全球创新大国优化高等教育质量, 增强国家技术创新能力的战略策略之一, 已经成为产业发展和技术创新的不可替代的国际化趋势。德国职业教育的“双元制”人才培养机制是企业参与人才培养的过程性制度, 美国社区学院与企业实习的耦合体系是围绕岗位需求的过程性制度, 英国“学徒制2.0”行动是促进工作的学徒模式, 且学徒模式的特点是“把工作和学习结合起来”, 以上制度导向均为高校和企业共同参与治理、资源共享及风险共担的发展治理机制^[6]。

作者简介: 邹鸣民(1990-), 男, 博士, 研究方向为产教融合、高等教育国际化。

2.2 国内研究进展

近些年,国家相继发布了《关于加快发展现代职业教育的决定》^[1]《国家职业教育改革实施方案》^[3]以及《现代产业学院建设指南(试行)》^[5]等政策文件,明确将现代产业学院视作推动产教融合的重要手段,建立起“政府引导、行业指导、企业参与、高校实施”的协作机制。在此背景下,国内学界从以下几个方向展开了系统研究:

制度机制创新方面:突出制度设计保障,提倡从政府发起“产教融合型城市”“校企共同体”制度试验区破题,凝练区域特色机制模式^[7]。

组织管理结构与协作机制层:注重高校、企业、政府部门等主体治理结构及相关协作治理机制,提出理事会、专业建设委员会、协商决策和多部门协同工作^[8]。

课程教学内容及教学模式方面:研究“项目式教学”“岗课赛证融合”“双导师制”等教学模式,课程建设要以岗位能力需求和生产实践为导向^{[9][10]}。

成果转化与绩效考核层面:应尝试开展社会企业参与为主的多元考核方式,实现办学效益和用人需求、科技成果和产业转化的有效对接^[11]。

2.3 研究不足与本研究价值

尽管当前关于现代产业学院的研究取得了积极进展,但仍存在以下不足:

一方面,缺乏长效运行机制的系统性建构。现有研究多聚焦在对响应政策的及时回应,以及对实践经验的描述层面,还缺乏制度性、结构性、规范化地对治理机制、投入机制、协同机制等方面的构建^[12]。另一方面,缺乏产业类型差异化机制的构建。由于产业学院所跨产业链条、所嵌入岗位体系存在差异,现有研究尚缺乏针对光伏、新能源、生物医药等产业特点的机制模型和分类构建。此外,缺乏理论和实证支撑。现有研究多以定性的阐述为主,缺少对三螺旋、系统协同、产教融合理论的有效结合,以阐释机制的运行逻辑;缺少足够的实践样本,说服力和推广性较弱。

因此,本文通过对新能源、生物医药两个产业学院典型业态的案例研究,并辅之以3个理论框架、一线调研,围绕组织制度、教学课程、教师协同、资源投入、制度保障5个维度,探讨提炼出产教融合的长效机制运行模式,试图填补理论和实践的空白,并为全国现代产业学院建设提供理论指导和制度途径依据。

2.4 理论基础支撑

为深入探讨现代产业学院产教融合长效机制的制度逻辑与实现路径,本文引入以下三个理论视角:

三螺旋理论(Triple Helix Theory):由Etzkowitz等学者提出,强调政府、大学、企业三方在创新体系中的互动协同作用。该理论认为,通过三元互动可实现知识生产与技术转化的有效融合,正契合现代产业学院“政校企协同”机制构建逻辑^[6]。

系统协同理论(System Synergy Theory):理论认为,复杂系统中各主体的合作必须有组织制度的安排及功能的互补,而产业学院是由高校、政府、行业、企业组成的复合系统,顺畅运行机制的设置应解决供给各方资源配置、目标与价值的协调、利益的整合等问题^[13]。

产教融合理论:产教融合理论认为教育与产业应共同生产产品,实现人和企业及市场之间的有机结合,通过合作办学、资源共享、专业共建等手段达成人才培养与产业发展无缝衔接的人力资本生产模型,在产教一体化基础上,生产出与产业紧密相连的高级人力资本,以此促进企业生存和发展,创造物质性与精神性的财富^[8]。

总之,本文参考已有研究,在3种理论指导下对新能源产业学院及生物医药产业学院的制度建构实践进行研究,通过对典型案例的分析和机制的提炼,提出构建制度配合、深度融合、教育效果明显的产教融合长效机制的理论框架和实践路径。

3 典型案例分析

为此,为研究现代产业学院产教融合长效机制的实践运行路径,选取光伏科技学院和医药生物技术学院2个既有一定行业代表性、与产业发展结合紧密的行业学院为例展开研究,这两个学院分别代表新能源业和生命健康产业,政策上具有结合紧密度高、行业新技术前沿度高、产业发展高潜力度高等特点,且产业学院建设运行周期相对成熟、运行机制相对稳健,代表性和可借鉴价值高。

3.1 常熟理工学院光伏科技学院案例分析

3.1.1. 建设背景与目标

常熟理工学院光伏科技学院成立于 2009 年 6 月,是全国首家以“光伏科技”命名的产业学院,服务苏南光伏产业集群发展。成立初期对接阿特斯、中利集团等本地骨干企业,响应区域对新能源技术人才的强烈需求。学院聚焦太阳能光伏、储能、新能源汽车等方向,致力于培养具备“设计—制造—运维—管理”全流程能力的应用型工程技术人员,办学定位为“地方性、应用型、开放式”^[14]。

3.1.2. 合作机制与课程设置

学院通过“政校企行”多元共建机制,设立校级理事会,联合企业共建课程与实训基地。已累计开发课程 30 余门,覆盖发电系统、驱动控制、电池储能等关键模块;出版教材 14 本(如《太阳能光伏组件技术》《光热转换基础》等),其中 6 本获江苏省教材建设项目立项,覆盖全国 30 多所高校使用。课程体系采用 OBE 导向,形成“组件—系统—集成—综合工程问题”四层级课程结构^[14]。

3.1.3. 师资与协同育人

学院拥有省级新能源教学科研团队,建成“双师型”师资队伍 62 人,其中企业背景教师占比达 45%。与苏州腾晖、金通灵、宇量新能源等 9 家企业共建实训基地,年均接收学生实习 200 人次以上。与企业共同制定培养方案,每年推行协同育人项目 10 项以上,推动“专业课程+企业项目+真实岗位”三位一体融合育人^[14]。

3.1.4. 成效与挑战

学院获得国家级教学成果奖 1 项、省级教学成果奖 8 项,其中 2021 年获江苏省首批四门省级一流本科课程认定。为企业进行技术攻关服务 40 余项,科技成果转移转化 20 余项,累计向苏南地区光伏与新能源领域企业输送 4000 余名毕业生^[14]。

当前挑战包括:部分课程内容更新滞后,需进一步对接产业新技术;企业参与课程设计与教学深度仍有提升空间。

3.2 常熟理工学院医药生物技术学院案例分析

3.2.1. 建设背景与建设目标

2019 年,常熟理工学院依托苏州市“生物医药产业一号工程”战略部署,成立医药生物技术学院,并于 2021 年入选江苏省第二批重点产业学院。学院紧密对接苏州生物医药产业,携手药明生物、智享生物、昭衍新药、BioBAY 等业内领军企业,打造集“新药研发—生产工艺—质量控制—产业放大”为一体的现代产业人才培养平台。其建设目标是:培养符合国家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需求、具有跨学科背景与岗位胜任力的高水平生物医药应用型人才^[15]。

3.2.2. 课程设置与合作机制

学院基于“技术逻辑”,构建“专业—课程—教材”三对接育人体系,开发涵盖新药研发、生产工艺、质量控制、生产放大四大模块的 18 门行业课程,累计达 39.5 学分。推行跨学科、跨专业选拔机制,学生大二可申请进入产业学院,实施“双向遴选”“动态退出”机制,最终通过联合考核可获“专业学位证书+产业学院证书”,并享有“免试用期就业”政策。同时,联合企业共建教材、课程与教学基地,形成产教融合课程群和实训平台^[15]。

3.2.3. 师资队伍建设与协同育人

医药生物技术学院依托“校企联合治理”架构,设立理事会和教学指导委员会,联合制定人才培养方案、课程标准和考核机制。构建“技术+教师+实践”融合型教学团队,打造工程背景与高校资质双融合师资力量。推动企业技术骨干参与授课、教师进企业研修,提升教学实践能力。项目化驱动教学方式鼓励学生参与真实项目,形成“解决问题—实证反哺—能力证书”闭环培养^[15]。

3.2.4. 合作成效与挑战

根据调研数据,产业学院毕业生月收入为 7200 元,比普通毕业生高出 32.5%,92% 的学生在千人以上企业就业,大部分从事的是项目技术主管,毕业生岗位胜任力和适岗性很强,企业的反馈评价是“干得快、贴得紧、沟通好、留得住”。同时也存在诸如课程更新要及时、教师企业经验不够、企业变化要快速等问题,需要通过政策机制不断调整校企协同效率^[15]。

通过对两个产业学院的案例分析,可初步提炼出以下关键机制要素:

协同治理机制:以理事会为核心的多元主体协同管理体系;

课程共建机制:基于岗位能力导向的课程群开发与动态更新机制;

双师共育机制:高校教师+企业导师联合指导的复合育人机制;

成果转化机制:从校内科研向企业技术服务与产品孵化延伸路径;

评价激励机制:学生、教师、企业三方共同参与的多元考评系统。

4 产教融合长效机制分析

综合上述这些案例的实践探索和制度建构经验可以总结出,现代产业学院要推进产教深度融合、机制常态化运行、成果产出可持续,其涉及的治结构机制、合作机制、育人机制、政策机制五大机制须为系统完备、运行有效、反馈有度的长效工作机制。本章讨论了五大机制。

4.1 协同治理机制:构建多元参与、共建共治的新型治理结构

现代产业学院的治理不是传统的学校统领和企业参与,而是“政府牵线、校企共享、行业参与”治理格局。比如上述案例的理事会,有高校和企业的负责人、行业协会和社会相关方面的领导等组成,对于学院的重大事情和学院的整体建设的协调管理。为“上联横贯”的治理组织搭建了桥梁^[16]。

同时,在学校层面设立专门的产业学院管委会,作为运营主体,集中人力资源、教学资源和管理,企业层面则以项目、资金和师资的投入参与学校运营,实现利益共享、风险共担、成果共赢的运行模式。

4.2 专业课程机制:建立产业导向、能力本位的课程协同开发体系

传统专业课程往往脱离产业实际,导致“学用脱节”问题突出。现代产业学院应以产业发展趋势与岗位胜任能力为导向,构建“企业需求→能力分析→课程重组→标准制定→教材编写”的逆向开发流程^[17]。

光伏科技学院开发了“光伏系统工程”“太阳能材料学”等岗位导向型课程^[14],医药生物技术学院则通过产业链拆解建立了“药物合成+临床试验+GMP生产管理”三大模块,形成了与岗位精准匹配的课程结构^[15]。建议以年为节点,及时更新教学内容,根据企业的意见以及行业发展相应进行升级,并加入行业相关的证书(“X证书”)。

4.3 协同育人机制:双主育人与过程考核相结合

产教融合的现代产业学院实行“双主体育”人,即校企双主体,企业参与教育教学等全过程,参与学校的育人工作,不仅提供实践场所和开展实践活动,也要参与学校的育人,包括设计课程中的案例和实践题目,甚至开设计算机、英语等课程,提高教学的“实战”性与“应用”性。育人评价方面,做到课上评价、课下评价、企业评价以及能力测试评价相结合,实行“知识+能力+潜力”三位一体的评价机制^[11]。

4.4 资源投入机制:多元共建、绩效导向的资金与资源保障

有了稳定的资源投入机制,产业学院才能良性运行。实践中,“政府+高校+企业”的建设模式经常采用,“政府提供启动经费和场地,免除税收等优惠政策;企业支付部分实训平台建设和部分课程建设的费用;学校提供硬件设施以及后期的日常运营”。同时建立“业绩决定投入”的增量投入机制,将建设经费与运行绩效绑定,突出以绩效为依据,如光伏科技学院用“项目承包制”,对参加产教融合平台企业依据实际出力的比例给与一定财政奖补和成果分成,激发企业参与主动^[18]。

4.5 制度保障机制:地方支持与国家政策联动

需要通过制定完善系列相关政策和制度进行长效保障。首先,中央层面上要加强推进现代产业学院建设标准与建设指南、出台“产教融合绩效评估办法”,鼓励将其纳入对高校的分类评价指标体系;其次,省市地方主管部门须出台专项扶持文件,鼓励校地之间实现“产教匹配”^[19]。综上所述,现代产业学院的产教融合长效机制建设,应聚焦以下五大关键路径:

多元协同治理体系:决策共谋、过程共管、成果共享;岗位导向课程体系:紧贴产业链、强化实践性;双主育人质量体系:企业深度介入、过程性评价;多元投入保障体系:绩效挂钩、政府引导、企业参与;制度与政策支持体系:国家指导、地方落实、行业监督。

以上机制不仅对光伏和医药行业具有典型意义,还可以为其他产业学院的机制设计提供启发和参考。

5 利益联结与协同育人机制构建

产教融合长效机制的本质是要建立“参与各方利益相融、合作育人”,现代产业学院是将“知识、技术转化”的产教融合载体,进而形成“共同育人、共同发展、共同受惠”的一体化合作共同体,才能使得企业稳定持久深度参与高校人才培养,唯有明确各方参与责权利,健全协同育人制度机制,教育价值、经济价值和社会价值三者共融^[17]。

5.1 专业设置对接产业链,实现人才链与产业链精准耦合

产业学院要基于区域主导产业、重点企业人才需求动态调整办学专业。“光伏科技学院”基于学生企业反馈增设了“智能制造技术”“能源材料工程”专业方向,采用项目带动开发课程模块,使专业群结构与产业链相互嵌合,促进人才供给侧结构性改革^[14]。“医药生物技术学院”基于行业标准和职业能力大纲,采用药物合成—质量检测—临床流程三个阶段,实现课程内容、教学资源、岗位需求融汇贯通^[15]。

5.2 双主体协同育人,实现“校内+校外”融合育才

现代产业学院以“校企双主体协同育人”为核心路径,探索企业深度参与育人全过程。具体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共建课程:企业技术专家与高校教师共同开发课程内容,并以真实项目、案例为载体,提高课程的应用性与挑战度^[9];联合培养:实行“双导师制”,企业导师负责指导学生项目实践、企业文化适应与职业能力训练^[11];实岗实训:打通校内模拟实训与企业真实环境,推行“岗课赛证融通”的育人方式,使学生在真实生产环境中提升综合素质^[11]。

5.3 能力认证与成果评价机制,促进多元主体共担育人成效

传统教育中学生学习的效果是由学校完成评估,而在现代产业学院中,应建立以能力为导向、以产出为核心的评价机制,做到教育成果的“共建共评共享”。

岗位能力认证:基于行业标准与企业要求,推行学生毕业前的职业能力考核与岗位适应度测试,由企业 with 高校共同评定^[11];项目成果认定:将企业项目转化为教学任务,学生提交成果报告、技术方案、应用产品等,企业参与评价环节^[14];实习反馈机制:由企业对学生在岗实习期间的态度、技能、沟通协作等方面进行综合打分,纳入学分认定体系^[10]。

5.4 成果转化与企业参与激励,强化校企合作内生动力

协同育人的长效机制需要企业在产教融合中获得实质性利益与发展空间。应在以下方面构建利益激励与成果共享机制:

科技成果转移转化的激励机制:搭建学院研发成果、企业产品和技术之间的桥梁,学院教师研究成果交给企业孵化,企业则拥有优先使用权和联合申请专利权等^[13];

企业导师评价与绩效激励:对积极参与育人的企业导师给予政府专项经费补贴或职称评价加分;

项目分成机制:教学成果或学生项目若进入产业化,可实行“按技术贡献+投资比例”分红,形成持续的合作收益闭环^[13]。

5.5 就业导向机制,畅通学生发展与企业引才双通道

产业学院需将“订单式”“定向式”“实习转就业”机制常态化。通过如下机制实现学生高质量就业与企业精准引才:建立毕业生优先录用制度,项目实训优秀者可优先入职企业;推行“实习=试用”模式,将实习表现作为签约参考;实施“人才回流”机制,鼓励学生毕业后返校授课、创业或参与研究项目,增强学院的人才内循环。企业普遍对产业学院毕业生的能力素质给予高度评价,认为其“可以独立执行操作”“企业融合度高”“沟通能力强”,特别是在学习能力、创新能力和解决问题能力方面表现优异,深受用人单位欢迎^[12]。

产业学院只有通过利益机制和育人机制的双重协同,才能真正实现产教融合的稳定运行。构建“共建专业—共育人才—共评成果—共享利益”的协同逻辑闭环,才能形成政府引导下的企业主体责任落实、高校育人能力增强、学生就业质量提升的多赢格局^[16]。

6 机制模式比较与优化建议

产业学院作为一个宏观概念,在共性的条件下,产教融合的机制也因区域基础实力、区域产业发展状况、高校禀赋等的差异存在类型上的多样与个性差异。通过对光伏科技学院与医药生物技术学院2个产业学院机制的比较研究,分析不同类型的产业学院具有不同类型的治理结构、合作水平及资源配置,为不同类型产业学院的建设提供了不同路数的典型案例。

6.1 机制模式比较分析

由此可见,研发型产业学院偏重科研支撑和技术转化,适合医药、生物、信息等高技术产业;应用型产业学院偏重实践实训和技能培训,适合制造、新能源等制造产业。两种不同机理的实践探索,是“因事制宜、因产制宜”机理的创新^[12]。

6.2 机制优化路径建议

分类推进机制建设,避免一刀切模式复制:高校应根据自身特点、区域产业结构以及合作企业的类型,确定产业学院的建设类型,例如资源类地方高校可以以技术技能型人才培养为目标,具有较高科研能力的学校可以选择“产业科研平台+高端人才培养”的模式。

完善制度标准体系,推动机制常态化运行:教育主管部门应尽快出台现代产业学院建设的制度框架、运行标准与评估细则,包括理事会运作规范、课程共建流程、成果分配办法等,使产业学院从“项目制”向“制度化”过渡。

强化企业深度参与,增强合作稳定性:鼓励企业从“被动参与”转向“主动治理”,探索企业投资入股、共建法人实体型学院等模式,增强其对教学过程、人才培养结果的控制力和认同感,实现从“参与者”到“责任人”的角色转变^[11]。

建立动态评估与退出机制,提升运行效能:建立定期评价的制度,动态调整合作课程、合作人才、合作内容,对于不能持续合作的企业和专业、达不到质量要求的企业和专业要实现能进能出,保持产业学院运行的高质与活力^[10]。

推动信息平台建设,实现资源协同与数据共享:创建“产业学院运行信息平台”或“产教协同数据平台”,开展与企业的教学数据、实习实训需要、人才培养成效等实时交流,提升资源配置效率和透明程度^[14]。

现代产业学院成熟的重要标志还体现在差异化发展机制模式上,各类型现代产业学院必须结合实际情况,取长补短,动态化构建产教融合长效推进机制,在发挥有效机制作用下,结合政策推动和技术信息化建设,达到高质量的“从建得快”到“建得好”。

7 结论与研究展望

7.1 研究结论

现代产业学院是深化产教融合的制度创新,是实现高等教育对接产业升级、技术技能人才高质量发展的必由之路。本文结合光伏科技学院和医药生物技术学院现代产业学院发展实践与相关政策,从产教融合治学结构、产教融合协同育人、产教融合课程开发、产教融合资源配置和制度保证五个方面提出现代产业学院建立产教融合长效机制的思路,主要有如下研究成果。

“三元协同”是核心治理机制:政府引导、企业参与、高校主导的多方共建治理模式,是确保机制有效运行的基础^[17]。

“反向设计”是课程构建关键:以岗位能力为导向的课程体系更新机制,推动了教育内容与产业需求的同步演进^[14]。

“双主育人”是人才培养特色:企业与高校协同承担教学任务,提升学生的实际操作能力与职业适应力^[9]。

“多元投入”是资源保障根基:构建政府、高校、企业三方投入机制,实现资金、平台、师资等多方面共建共享^[14]。

“制度化联动”是机制持续动力:通过常态化协商、动态评估与政策配套,推动机制从临时性合作走向制度化运行^[19]。

研究不仅梳理总结了产业学院机制建设的典型模式,更为全国各高校因地制宜创建具有自己特色产教融合平台提供了实践可行方案与政策建议。

7.2 研究不足与展望

尽管本文基于两个具有代表性的案例展开了深入分析,但仍存在一定局限:

样本范围有限:仅聚焦于光伏与生物医药领域,未涵盖更多行业与区域类型产业学院,研究的外推性尚需进一步验证。

实证深度不足:研究以定性分析为主,缺乏大样本数据支持,未来可引入量化问卷与绩效指标进行实证研究。

动态演化机制未充分探讨:产教融合机制具有发展性特征,后续可关注其随政策变化与产业升级而演化的动态调整机制。

下一步研究需要扩充案例,强化数据支撑,聚焦制度机制和教育质量的因果关系分析,从而为现代产业学院建设质量和制度的成熟度分析提供政策工具、参考依据。

参考文献:

- [1] 国务院.(2014).《关于加快发展现代职业教育的决定》.
- [2] 教育部等6部门.(2014).《现代职业教育体系建设规划(2014-2020年)》
- [3] 国务院.(2019).《国家职业教育改革实施方案》
- [4] 国务院.(2017).《国务院办公厅关于深化产教融合的若干意见》.
- [5] 教育部、工业和信息化部.(2020).《现代产业学院建设指南(试行)》
- [6] Cai, Y., & Etzkowitz, H. (2020). Theorizing the Triple Helix model: Past, present, and future. *Triple Helix*, 7(2-3), 189-226.
- [7] 黄景德, & 李晨瑜. (2024). 广东省特色产教融合长效机制的建设与实践. *Advances in Social Sciences*, 13, 464.
- [8] 李昌奎. (2025). 产教融合的理论框架构建——基于人力资本、制度经济学与创新网络的综合分析. *Integration of Industry and Education*, 7(2), 1-14.

- [9]孙涛, 王洪森, 朱汉帅, & 司鑫鑫. (2024). 基于现代产业学院背景下的药学类校企合作课程建设研究. *药学教育*, 40(2), 22-27.
- [10] 吴永玲, & 王学军. (2025). 校政企协同背景下生物医药类应用型人才培养模式探索与实践研究. *Advances in Education*, 15, 709.
- [11] 刘睿, 刘岩, & 李正. (2025). 校企共赢机制的现代产业学院建设思路探讨——以天津中医药大学中药制药现代产业学院为例. *药学教育*, 41(1), 16-20.
- [12] 卢双盈, & 刘新钰. (2015). 国家职业教育改革创新示范区探索现代职业教育体系的实践与思考. *中国职业技术教育*, 27, 10-15.
- [13] Melnyk, L. H., Kovalov, B. L., Mykhailov, S. O., Mykhailov, O. O., & Starodub, I. A. (2022). Dynamics of reproduction of economic systems in the transition to digital economy—in the light of synergetic theory of development.
- [14] 张晞, 张根华, 钱斌, & 徐惠钢. (2021). 行业学院模式的产教融合共同体——以常熟理工学院光伏科技学院为例. *高等工程教育研究*.
- [15] 罗兵. (2021). 科技助推现代产业学院高质量发展——以常熟理工学院医药生物技术应用学院为例. *常熟理工学院学报*, 2021 35 (05)
- [16] Wang, Y., & Pan, Y. (2023, May). Research on the Synergy of Sci-Tech Financial Services in Guangdong-Hong Kong-Macao Greater Bay Area Based on the Synergy Model of Composite System. In *Proceedings of the 2023 8th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Big Data and Computing* (pp. 87-93).
- [17] 严沛萌. (2024). 关于高等职业教育深化产教融合的思考. *Vocational Education*, 13, 1317.
- [18] 石猛, & 刘蕾. (2014). 我国现代职业教育体系研究: 回顾与展望. *职教论坛*, 30(34), 48-52.
- [19] 李泳璋, & 李永朱. (2024). 我国现代产业学院建设研究. *Advances in Education*, 14, 1591.

Research on the Long - term Mechanism of Industry - Education Integration in Modern Industry Colleges: A Case Study of Photovoltaic and Biomedical Industry Colleges

Zou Mingmin¹

² Jiangxi University of Technology, Nanchang, Jiangxi 330098, China

Abstract: Through the typical case study method, this paper selects the School of Photovoltaic Science and Technology and the School of Pharmaceutical Biotechnology of Changshu Institute of Technology as research objects, conducts an in - depth analysis of their operation paths in organizational management, curriculum setting, faculty training, resource investment, and mechanism guarantee, and explores how to establish a sustainable and replicable long - term mechanism for industry - education integration. The study finds that the efficient operation of modern Industry colleges depends on a governance system of multi - co - governance, a curriculum co - construction mechanism oriented by positions, a collaborative education mechanism jointly established by schools and enterprises, a resource guarantee system with multiple investments, and an institutionalized policy support network. This paper summarizes five key mechanism models and puts forward targeted optimization suggestions, including promoting by classification, building institutional standards, enabling enterprises to participate deeply, establishing a dynamic evaluation mechanism, and providing support through an information platform. This research not only provides theoretical support and practical paths for the long - term mechanism construction of modern Industry colleges but also offers useful references for the mechanism innovation and promotion of other industry - specific colleges.

Keywords: Modern Industry college; Integration of industry and education; Long - term mechanism; Photovoltaic industry; Biomedical industry; School - enterprise cooperation; Joint cultivation of talents

中小企业 A 公司基层员工绩效考核研究

董学鹏¹

(1.南京钟山颐养园老年公寓, 江苏 南京 210000)

摘 要: 随着新冠疫情的爆发, 中小企业处于艰难多变的市场环境, 要想求生存, 谋发展, 实施绩效考核是企业生存壮大的重要路径。绩效考核的落地执行, 需要企业上上下下的高度配合, 关注全流程的细枝末节, 开头困难, 做好更难。本文通过选择具有中小企业典型特征的 A 公司为例, 基于相关绩效考核理论, 采用问卷调查、文献分析等技术方法, 深入探究 A 公司基层员工绩效考核存在的问题、存在问题的原因分析等, 提出依据企业经营目标制定绩效考核目标、树立正确的绩效考核理念、建立健全的企业组织架构、健全企业内部沟通机制、客观公正地运用绩效考核结果五大对策, 以期突破解决 A 公司基层员工绩效考核面临的难题, 也为其他同行提供参考与借鉴。

关键词: 中小企业; 绩效考核; 目标管理

DOI: doi.org/10.70693/rwsk.v1i8.1217

一、A 公司人力资源现状及绩效考核存在的问题

A 公司成立于 2008 年, 是广州某从事内销服装品牌企业, 主要从事中大童儿童服装的研发、设计、生产、销售业务, 历经十几年的发展, 公司由 6 名创始人, 发展至如今 300 人的员工队伍。公司设置 12 个部门, 具体有: 总裁办公室、人力资源部、总务部、财务部、信息技术部、研发中心、生产中心、采购中心、销售部、客户服务部和市场营销部, 业务范围主要以国内市场为主, 在为企业创造价值的同时, 也承担起部分社会责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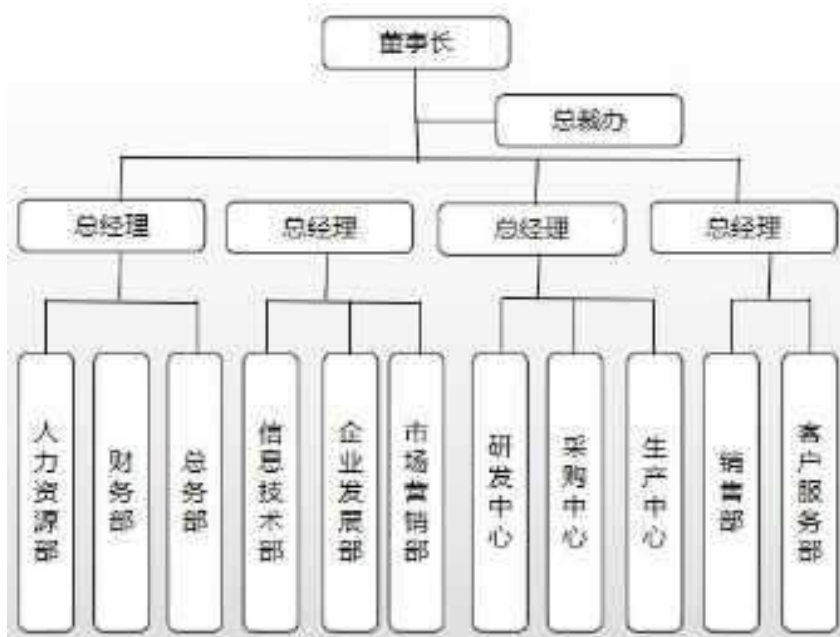


图 1 A 公司组织架构图

作者简介: 董学鹏 (1998.08-), 男, 本科, 管理学学士, 国家三级工, 企业人力资源管理师, 研究方向为企业人力资源管理与绩效管理。

数据统计至 2022 年 02 月, A 公司拥有在岗职工 300 人, 具有备硕士及以上学历的有 20 人, 本科学历的 60 人, 大学专科学历的 80 人, 中专及高中以下 140 名, 员工大部分以工厂女工为主, 基本满足 A 公司现阶段对于人才的知识和学习能力要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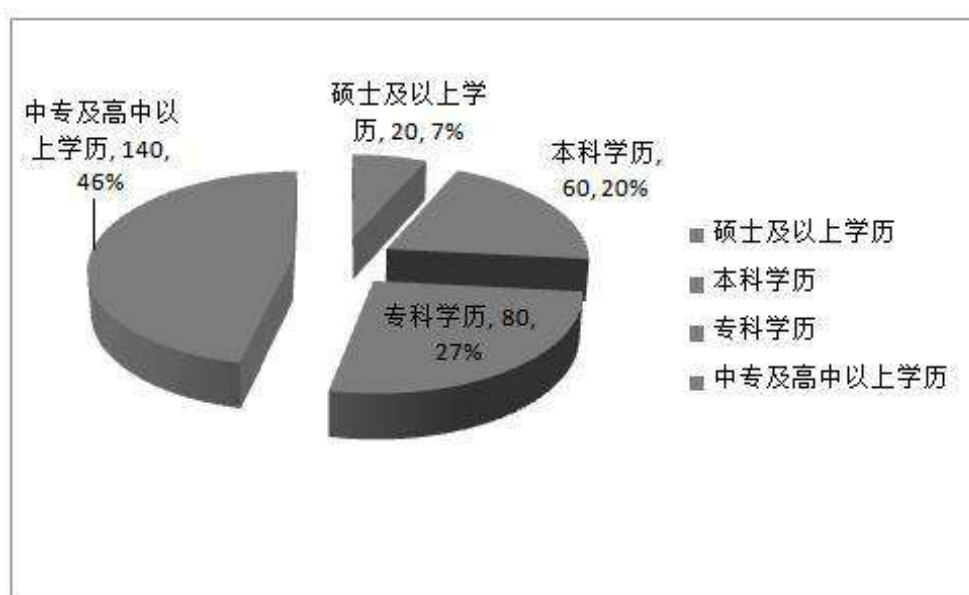


图 2 A 公司员工学历情况分布状况图

通过数据统计分析:A 公司基层人员的年龄段结构分布在 20-25 岁的员工人数 20 人, 占比 6.67%, 年龄段结构分布在 25-30 岁的员工人数 40 人, 占比 13.33%, 年龄段结构分布在 30-35 岁的员工人数 60 人, 占比 20.5%, 年龄段结构分布在 35-40 岁的员工人数 80 人, 占比 26.67%, 年龄段结构分布在 40-45 岁的员工人数 100 人, 占比 33.33%, 可以得出 A 公司人员整体年龄分布较为平均, 符合服装行业特性, 人员年龄结构具有行业活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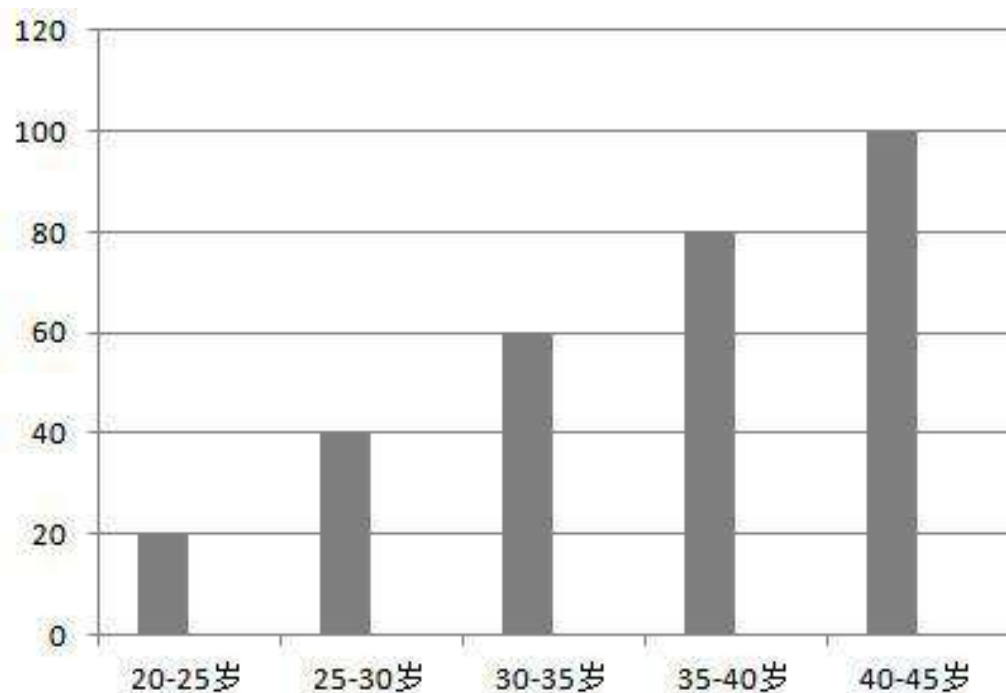


图 3 A 公司员工年龄情况分布状况图

从 A 公司基层人员男女性别比例结构分析, A 公司人员主要以女性员工为主, 符合服装行业从业人员特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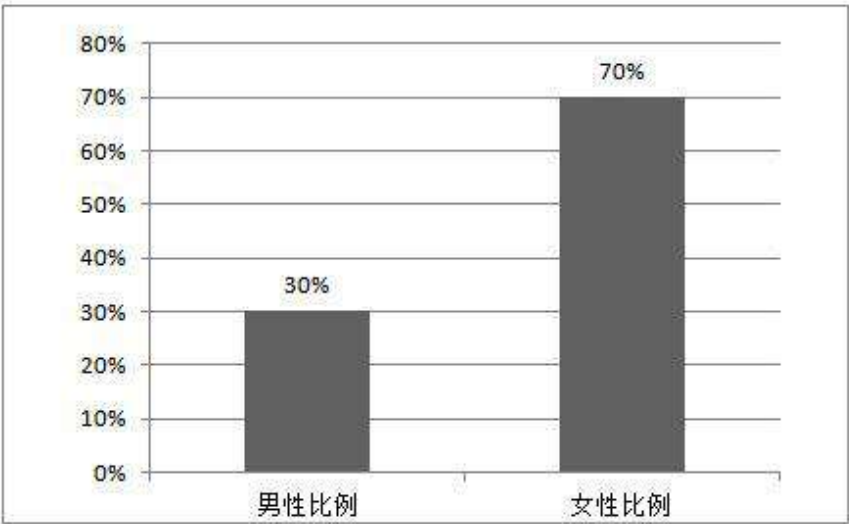


图 4 A 公司员工性别情况分布状况图

本绩效考核调查问卷的总体设计过程，采用参考行业内绩效考核相关调查资料及研究成果，将影响绩效考核的重要因素作为调查问卷的核心内容，设计包含 7 个维度的问题分类，共计 42 道问题，在绩效考核调查问卷的设计初期，还咨询 A 公司部分高层管理人员及 HR 部门人员的建议，以便切实获得 A 公司绩效考核的现实状况，为改善 A 公司绩效考核提出合理化对策。

表 1 A 公司问卷调查维度表

序号	问题分类	数量	备注
1	企业战略	2道	
2	组织协同	7道	
3	绩效管理目标及计划	10道	
4	绩效管理实施与辅导	3道	
5	实施绩效管理	6道	
6	绩效管理考核结果应用	12道	
7	绩效管理工作满意度及支持	2道	
8	合计	42道	

在 A 公司人力资源部门的协调和组织下，对 A 公司员工按管理层级进行分阶层随机抽样问卷调查，总计发放问卷 100 份，调查对象为高层管理者的 10 人，样本占比 10%；中层管理者的 20 人，样本占比 20%，基层管理者 30，样本占比 30%，普通员工 40 人，样本占比 40%；问卷调查对象涵盖不同管理层级员工，具有广泛性。问卷调查结束后，实现回收有效问卷调查表 85 份，回收有效样本 185 份，涵盖高层管理者 3 人，中层管理者 10 人，基层管理者 27 人，普通员工 38 人；问卷回收率 92.92%。

通过整理问卷调查表发现，A 公司高层管理者对组织战略、组织协同及绩效目标计划的应用了解相对较高一些，但对绩效实施辅导、实施绩效考核、结果应用及工作满意度不太满意；A 公司中层管理者未能清晰认识组织战略，对组织目标、绩效目标及计划应用相对明确一点，对于公司开展绩效考核方面的工作相对清晰；A 公司基层管理人员对公司的应用了解非常低，大部分人是不知道的，组织协同能力也较低，对公司的绩效考核目标、计划、辅导、考核应用均支持度较少。基层员工对公司的组织战略、协同均较低。总体看来 A 公司内部的绩效考核混乱，中高层对绩效考核也不太清楚，随着组织层级的下降，组织的作用越来越弱化，公司总体效率非常低，推行的绩效考核基本是走形式，员工的工作技能得不到正确的对待，

有困难也得不到指导,公司整体上下缺乏畅顺的沟通等问题,详细原因,还需继续分类细分整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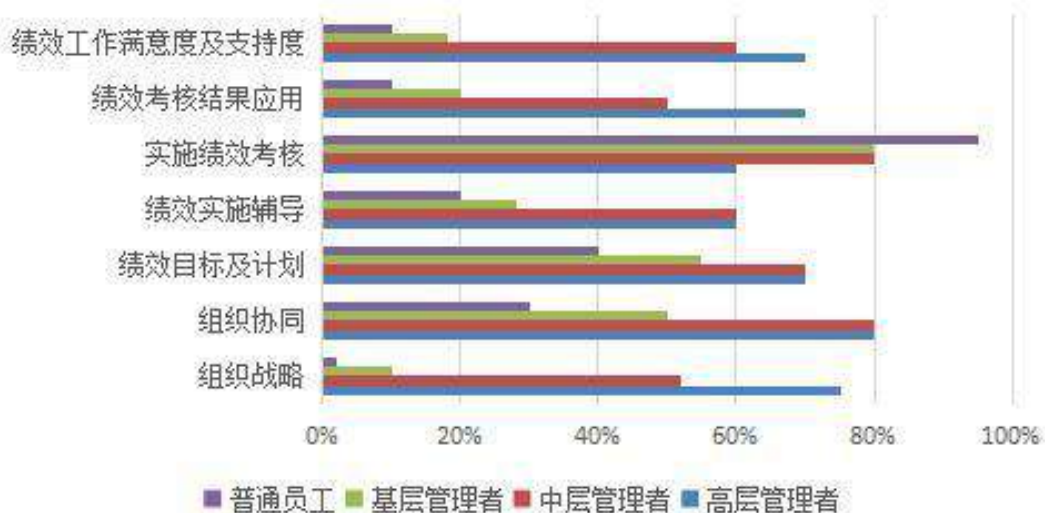


图5 A公司问卷调查结果统计表

通过整理、分析、归纳、绩效考核调查问卷, A公司的绩效考核总体呈现如下重点问题: 总体反映出A公司基层和中层管理人员, 基本对公司战略、绩效考核的概念不清楚、也不理解, 认为两者之间不具有直接的关联。公司仅关注销售部门的销售业绩和公司的年利润率以及各部门的短期目标, 公司并未制订长期的发展战略, 以致基层和中层人员缺乏绩效考核系统思维, 不理解公司战略与绩效考核关系, 未将组织层面、部门层面以及个人层面有机结合, 搭建三足鼎立的支柱平台, 助力实现组织绩效。

根据调查结果, A公司基层员工绩效监控与绩效反馈缺失, 员工只埋头做自己的事, 干成什么样, 全凭借个人能力, 中高层人员并未提供切实的指导。绩效考核考核结束后, A公司并未将绩效考核结果以任何形式告知员工, 员工无法获取个人在工作创造的成果展示, 长此以往, 能力高的员工得不到重视, 能力低的员工得过且过。这样不公平的考核机制, 无法正确评估员工的工作产出和薪酬福利的关联, 已造成部分核心员工流失的趋势。

通过问卷调查了解到, A公司大部分中基层员工, 认为绩效考核评价缺乏合理性, 绩效考评不能真实反应员工的工作输出成果, 中层和低层员工把考核误认为扣工资的依据, 人力资源部门大包大揽, 唱独角戏, 没有兼顾效率和公平, 考核目标不明确, 针对性不强, 考核重点不突出, 容易也出现考核坐山车, 轮流坐庄的情况。

A公司的绩效考核, 基层员工与中高层管理人沟通较少, 基层员工基本充当“扯线公仔”上面怎么说, 下面怎么做, 未能开通对上和对下的互通信息渠道, 即使接受调查也是走形式, 不到迫不得已很少沟通, 制度和考核基本是管理部门自行编制出来, 并未听取相关部门意见, 这样的管理, 必定先天不足。

在A公司企业流行一句话“考老板的法宝, 分分员工的命根”把考核当权杖, 挑软柿子捏, 考上不考下, 考核周期一刀切, 职能部门压力小, 用强制分布来营造假公平现象, 导致员工负面情绪积累过多, 严重影响企业的工作效率。

二、A公司基层员工绩效考核存在问题的原因分析

企业战略目标涵盖管理的诸多内容, 绩效考核应以企业的战略目标为指导, 协助创造经营效益。通过问卷调查了解到, A公司基层员工绩效考核意识薄弱, 中高层管理对于绩效考核的认知较为薄弱, 绩效考核目标的设置与企业的战略目标相背离, 各部门只是根据现状来安排近期的工作, 缺乏整个战略目标的指导, 难以实现与企业战略目标的无缝对接, 本位主义严重, 以致管理能力和工作效率较难提升, 得过且过, 有事不想干事, 没事不找事, 偶尔还因协同工作问题, 引发部门之间或部门内上下级之间的工作冲突。

绩效考核就是对于实现绩效的人、财、物等一切因素进行管理控制以达到企业目标的行为。A公司成立十几年来, 企业内人员基本还是处于相对稳定状态, 推行绩效考核势必迫使大部分人走出舒适区, 去适

应变化。包括公司的中高层也是如此。A 公司基层员工现行的绩效考核距制订的初衷相差甚远，还导致公司的经营业绩下滑 10%，主要原因还是在于中高层没有在企业内部统一思想，没有进行宣传，也没有引起重视，导致有员工产生抵制行为，认为是克扣员工工资的工具。

A 公司在绩效考核的经济投入方面，总体来说，能省就省，能不花就不花，节约一分钱，也是创造一分钱收益。A 公司虽然推绩效考核，但并未设置专人专岗的职位，由人力资源部统筹管理，部门内人员视工作量灵活安排工作，受自身学历和经验限制，难以对各部门提供有效的咨询及支持性服务。又因公司的指标设计未能准确的反映工作岗位的成果输出，致使考评结果不准确。公司除销售部门外，有相当一部分部门的绩效考核指标是由人力资源部门制订的，缺乏科学的监督机制，加上人力资源意识缺乏，导致绩效考核工作难以推动。

管理者应主动构建顺畅的沟通渠道，才能保证工作的顺利执行。A 公司的管理层人员绩效考核认知薄弱，不具备战略意识和战略目标的分解能力，上级领导安排干啥有就干啥，在制订绩效考核目标的进程中，有的由人力资源部一刀切，有的由高层直接下达目标。上下级之前未能就工作任务的难易、工作量大小进行双向的沟通，导致员工因无法准确理解工作的要求，难心全身心的投入工作，更不用说绩效的反馈机制，也是形同虚设。

A 公司因未制订贴合企业实际的绩效考核目标，以致绩效考核考核结果运用效果差，基层员工的工作输出成果并未与考核标准相结合，工作业绩无法实现与工作报酬直接挂钩，员工多有不满。B 企业为节约成本，并未将薪酬结果直接运用于员工薪酬调整、职位升迁、职业发展培训等，绩效考核考核结果运用的片面性，这种“走形式的打分游戏”只能导致员工“磨洋工”，或者造成人员流失。

三、A 公司基层员工绩效考核完善的具体对策

3.1 依据企业战略目标制定绩效考核目标

企业的行为，从一定程度上应反映企业的战略或总体目标，绩效考核应作为企业管理的核心，A 公司人力资源部门应当做到将绩效考核考核与晋升制度、奖惩制度等挂钩，切实激发公司人员深层次的工作潜能与动机。A 公司应针对企业现状及人员状态进行深度摸底，切实将企业现状与人员状态联系起来，基于企业战略目标为指导，制订契合企业现状的绩效考核目标。帮助企业员工缕清思路，宣贯极具企业特色的个性化绩效考核目标思维方式，让每一个部门和员工认识到个人目标的完成，也是组织绩效目标的完成，个人和组织的需要均能得到满足，才能创造出更大的效益。

3.2 树立正确的绩效考核观念

要彻底改变 A 公司绩效考核面临的问题，管理者需革新绩效考核观念，深度挖掘绩效考核的功能，搭建自上而下，由里到外畅通的沟通渠道，实时监控绩效进程和提供必要的辅导，帮助员工建立目标责任感，形成与公司绩效考核观念相一致的价值取向，培育员工潜能，深度激发员工的工作热情。A 公司应不定期组织基层员工生活会，或基层员工培训大会，学习新技能、新理念，加强内部的沟通交流，要让员工认识到，观念的变革推动个人技术技能的革新，倡导员工的利益与公司的利益的一致性，帮助员工提高工作技能，提高物质或精神方面的激励，在满足员工需求的同时，一并达成组织的绩效。管理者也应深刻地认识到员工与企业发展的关系，管理应不局限于管人、管事，管理最深层的魅力，应来源于唤起员工的工作动机，通过满足个人需求，使员工时刻保持努力工作的动机，帮助实现组织战略。

3.3 建立健全的企业组织架构

A 公司应着手搭建健全的组织架构，想要做好绩效考核工作应设置专门的绩效岗位管理人员，由人力资源部门设置专门的绩效岗位管理人员，岗位名称为绩效考核专员，教育经历为大学本科以上，人力资源或相关专业出身，具有高度的落地执行能力。公司的管理层应组建绩效考核质量管理委员会，由董事长直接管理，向董事长直接汇报工作，该委员会的负责人可以从公司的高层管理者兼职，公司绩效考核的推行离不开公司高层领导的持续扶持和鼓励，员工的自我价值需求也需要来自高层的力量。健全的架构，有利于科学系统的推进绩效考核的革新，进而解决公司的难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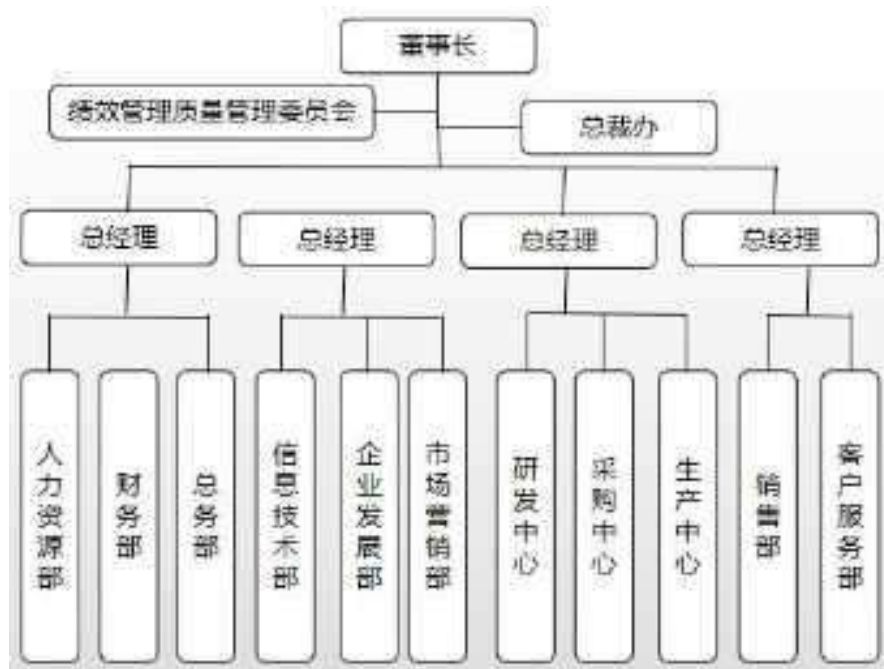


图 6 A 公司组织架构图

3.4 健全企业内部沟通机制

A 公司应注重与员工关系的改善，加强双向的沟通，沟通的方式有很多，比如：针对具体工作展开的沟通，就某项目展开的沟通以及员工面临工作问题无法处理进而需要的沟通支持。企业应关注培育沟通机制的形成，搭建上下闭合循环的沟通系统，切实保障管理信息完整的上传下达，消除管理者与被管理者长期存在的沟通壁垒。重视员工与企业效益之间的平衡，始终应以员工为主导，鼓励员工主动沟通愿意沟通，提早预判将会产生的问题，将问题解决于未发之时。逐步摆脱沟通不畅顺的局面，营造宽松、严谨、机智、活泼的企业氛围，定期组织企业民主生活茶话会、总经理访谈面对面、设立合理化建议信箱等不拘形式的交流活动，点燃员工的工作激情，激发主人翁责任意识，促使员工产生自我内驱力，将个人命运与公司利益绑定在一起，迸发出深层次的潜能，全力推进公司和个人的和谐发展。

3.5 客观、公正地运用绩效考核结果

绩效考核结果的运用，最深层的作用是帮助员工提升绩效，帮助企业提高效益。绩效考核结果的灵魂，在于其的多维度和多场景应用，反馈和应用于员工改进效能，帮助企业和员工共同进步，如果绩效考核仅用于发放奖金或者扣发工资，那么考核的作用是不科学，是有局限的。绩效考核结果的应用，还要与员工的职业发展、个人兴趣等价值观因素相结合，例如：设计职业生涯锚定计划等，满足深层次的员工激励需求。A 公司的绩效考核管理应用，也应将上述流程落实到实处，避免形式化。

四、结论

随着全球经济的放缓，全面提升企业的综合管理能力势在必行，推行绩效考核也刻不容缓，本文选择具备中小企业典型特征的 A 公司基层员工为研究对象，灵活应用绩效考核所涉及的相关理论，深刻剖析 A 公司绩效考核所遇到的问题，通过应用问卷调查、文献分析等技术方法，探究问题产生的真实原因，提出依据企业战略目标制定绩效考核目标、树立正确的绩效考核理念、建立健全的组织架构、健全企业内部沟通机制、客观公正地运用绩效考核结果五大改善对策，以期能对 A 公司会有所助益，能帮助改进和解决 A 公司的绩效考核问题，促进 A 公司的持续发展。

绩效考核最主要的作用就是最大限度地激发人力潜能，使员工的需要与组织的需要相结合，以激发强烈的动力，促进个人和组织绩效的达成。由于本人学识所限，也受本人眼界、知识储备等因素的影响，所

选择的文献资料未免有不完善的地方，也无法深刻的研究所有问题，还期望能到老师的悉心指正。在本论文研究结束后，中小企业绩效考核所涉及的研究焦点，依然是继本论文后续需要学习和发展的方向。

参考文献:

- [1]王雪,王梦婷.酒店基层员工绩效考核方案优化研究——以J酒店为例[J].中国市场,2022(35):97-99.DOI:10.13939/j.cnki.zgsc.2022.35.097.
- [2]于梦琦.基于数据模型的员工绩效考核机制研究[J].现代商业,2022(33):26-28.DOI:10.14097/j.cnki.5392/2022.33.008.
- [3]汤钰锋.基层员工绩效考核方案设计——招商局重工有限公司[J].中小企业管理与科技,2022(20):85-87.
- [4]苏加兵,刘凯,范柱烽,王冬.新时期企业加强员工绩效考核的优化措施探讨[J].企业改革与管理,2022(19):89-91.DOI:10.13768/j.cnki.cn11-3793/f.2022.1056.
- [5]邓样明,刘琰.T公司基层员工绩效考核的问题与优化[J].江苏商论,2021(12):122-124.DOI:10.13395/j.cnki.issn.1009-0061.2021.12.033.
- [6]周静芳.完善国有企业基层员工绩效考核制度的原则与策略[J].企业改革与管理,2020(03):100-102.DOI:10.13768/j.cnki.cn11-3793/f.2020.0358.
- [7]闫凯琪,王学军.绩效考核公平感对基层员工工作绩效的影响研究[J].中国市场,2020(02):117-118.DOI:10.13939/j.cnki.zgsc.2020.02.117.
- [8]史善进.化解基层员工绩效考核难题[J].人力资源,2019(18):88-89.
- [9]侯成杰.银行基层机构员工绩效考核与管理模式发展研究[J].财经界,2019(14):165-166.DOI:10.16266/j.cnki.cn11-4098/f.2019.09.120.
- [10]贾延梅.油田基层员工绩效考核研究[J].企业改革与管理,2019(03):101-102.DOI:10.13768/j.cnki.cn11-3793/f.2019.0332.

Research on Performance Evaluation of Grassroots Employees in Small and Medium-sized Enterprise A

Dong Xuepeng¹

¹ Nanjing Zhongshan Welfare Home for the Elderly, Nanjing, Jiangsu 210000

Abstract: With the outbreak of COVID-19, small and medium-sized enterprises are in a difficult and changeable market environment. In order to seek survival and development, the implementation of performance appraisal is an important path for enterprises to survive and grow. The implementation of performance appraisal requires the high cooperation of the enterprise, paying attention to the details of the whole process, which is difficult at the beginning, and more difficult to do a good job. This paper by selecting the typical characteristics of small and medium-sized enterprises as an example, A company, based on the relevant performance appraisal theory, questionnaire, literature analysis, in-depth explore the problems of A company grassroots staff performance appraisal, problems, based on the enterprise management objectives, set up correct performance appraisal concept, establish and improve the enterprise organization structure, improve the internal communication mechanism, objective and fair use of the performance appraisal results of the five countermeasures, in order to solve the breakthrough A the company grassroots staff performance appraisal problems, also provide reference and reference for other peers.

Key Words: Small and medium-sized enterprises; performance appraisal; management by objectives

乡村振兴背景下关于绿色农业技术研究的文献可视化分析

魏 斌¹, 赵丽婷², 刘锦清³, 李翔⁴

(1.四川民族学院 马克思主义学院, 四川甘孜 626001; 2.兰州信息科技学院 马克思主义学院, 甘肃兰州 730300; 3.成都银杏酒店管理学院, 四川成都 611743; 4.成都体育学院, 四川成都 610041)

摘 要:在乡村振兴战略深入推进的时代背景下,绿色农业技术作为实现农业可持续发展与生态文明建设的重要支点,已日益成为学术界关注的焦点。本文基于中国知网(CNKI)期刊数据库,采集2016—2023年间以“绿色农业技术”为主题词的相关研究文献共885篇,借助CiteSpace、SPSS与SATI等多种可视化与统计分析工具,从发文趋势、作者合作网络、研究热点等维度,系统梳理当前绿色农业技术研究的知识图谱与学术演化路径。研究发现,该主题研究整体呈现出“稳中有升、峰后回落、趋势可期”的发展状态,绿色农业技术研究发文量总体呈上升趋势,2020年达高峰;二是核心作者群体尚未形成稳定的协作网络,研究力量呈现出一定程度的分散性;三是研究主题紧扣农业绿色转型、农户技术采纳行为、农业污染治理等领域,展现出典型的政策导向性与现实回应性。本文的文献计量分析不仅揭示了绿色农业技术研究的阶段性特征和热点演变趋势,也为今后深入开展乡村振兴背景下的绿色农业技术创新研究提供了数据支撑和理论参考。

关键词:乡村振兴;绿色农业技术;文献可视化分析;CiteSpace;农业绿色发展

基金项目:西北民族大学中央高校基本科研业务费专项资金项目(31920240127-52)“数字经济赋能临夏州乡村治理高质量发展机制与路径探赜”。

DOI: doi.org/10.70693/rwsk.v1i8.1168

一、引言

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指出,贯彻落实好新发展理念,抓好生态文明体系构建,协调完善绿色转型,促进人与自然协调向好发展。绿色农业技术作为三农问题中的重要组成要素,在农业生产中,采用绿色技术可以减少环境危害、提高产出效益,并促进可持续发展,为乡村振兴提供技术保障。“绿色农业技术是农业绿色发展的重要科技支撑,兼具资源循环利用和生态污染治理之效。”^[1]在党领导的乡村振兴热潮下,推进绿色农业技术高质量向前发展,促进我国农业生产新模式、新方向、新思路,俨然成为了新时代赋予的新任务与新挑战。现阶段,绿色农业技术是推进乡村振兴战略不可或缺的重要技术路线,这不仅从实践内涵层面来看,还是理论内容维度来说,都是构建新农业发展格局的“助推器”。“农业绿色生产技术可以保障农产品安全,改善农产品品质,提高农产品价格,整体上提升农户收入水平。”^[2]目前,学术界对于绿色农业技术研究已经有了颇多成果,且有不同学术领域涉及绿色农业技术研究,但缺少对于该领域研究的文献计量研究,为此本文通过科学的文献计量方法,系统化呈现学术界对于该领域的学术研究现状,且寻求研究新热点、新动态,为学界提供研究新思考。

二、数据研究来源与研究工具

本文将CNKI期刊数据库作为数据来源,检索条件如下:通过高级检索选定主题词为“绿色农业技术”,共检索出1099篇期刊论文,时间跨度从2016年-2023年。为确保研究数据的可信度,本文通过人工筛选,剔除

作者简介:魏 斌(1999-),男,甘肃通渭人,法学硕士,新疆社会学学会会员,就职于四川民族学院马克思主义学院。研究方向: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社会治理研究。

赵丽婷(1998-),女,甘肃陇南人,法学硕士,兰州信息科技学院助教。研究方向:思想政治教育。

李 翔(2000-),男,四川资阳人,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体育旅游。

通讯作者:刘锦清(1999-),男,甘肃陇西人,教育学硕士,就职于成都银杏酒店管理学院。

[1]刘丽萍,孙伟琳,刘丽,等.异质性农技培训主体对农户绿色农业技术采纳行为的影响研究[J].中国农业资源与区划,2023,44(04):162-171.

[2]陈梅英,黄守先,张凡等.农业绿色生产技术采纳对农户收入的影响效应研究[J].生态与农村环境学报,2021,37(10):1310-1317.

报纸、随笔、书评、佚名作者的论文以及与主题不相关研究,选取其中 885 篇期刊论文作为研究样本。CiteSpace 分析软件是由美国德雷塞尔 (Drexel) 大学教授陈超美所研发“由于 Citespace 技术是基于长时间、大尺度、广样本下文献数据的客观分析,能够避免传统文献梳理的主观认知缺陷,便于客观呈现学科研究的前沿热点图景及其演变轨迹。”^[3] 本文结合 SPSS 软件、Citespace 软件、Sati 软件,以党的十九大为背景,查取 2016 年-2023 年国内 885 篇以绿色农业技术为主题词发表的期刊论文进行可视化分析,并运用 Bursts 检测算法进行具体操作。

三、绿色农业技术研究统计分析

(一) 发文量分析

从发文量分析中,可了解到该领域研究的发文演进历史与未来发文量趋势。该发文量呈现线性指数趋势(公式: $Y = 36.905e^{0.2621x}$),且 $R^2=0.6495$,拟合效果良好,文献发文量在未来有上升趋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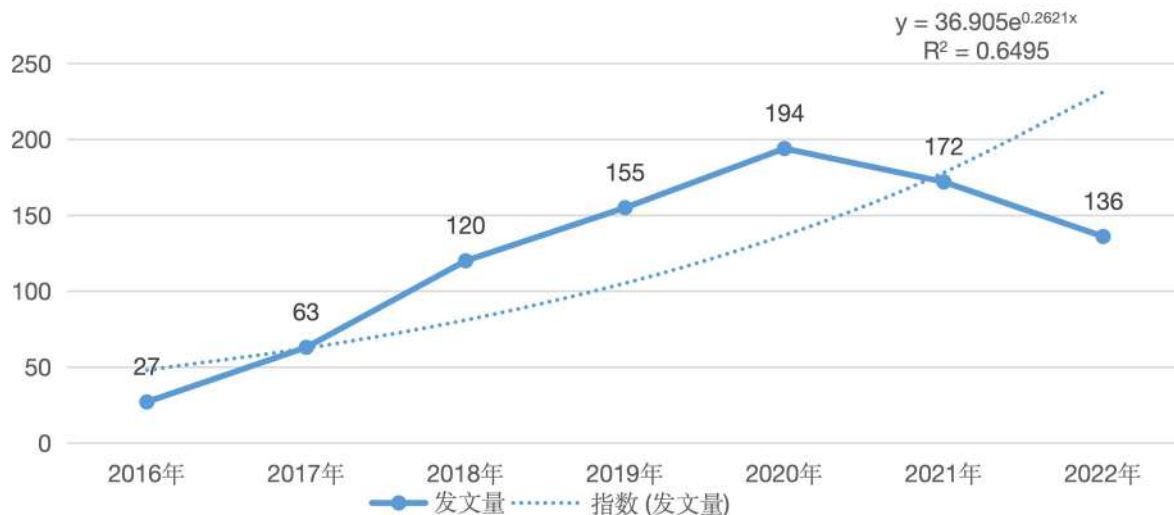


图 1 发文量趋势图

由 2016 年—2022 年发文量趋势图可知,2016 年发文量为 27 篇,是近七年中发文量最低的年份,研究还处于起步阶段,而 2020 年发文量为 194 篇,已达到峰值。同样,对于绿色农业技术的发展也不乏国家的政策引导。“‘十三五’期间,中央财政支持设立了国家重点研发计划‘农业面源和重金属污染农田综合防治与修复技术研发’重点专项(简称‘农业面源专项’)”^[4]该项目着重关注绿色农业技术,良好的政策环境为学术界研究提供了较好学术氛围。2016-2020 年期间,发文量呈现逐年上升趋势。2020 年之后,发文量已呈现逐年衰败态势,但不排除疫情短期影响,从图 1 拟合趋势来看,该领域研究依旧是“三农问题”研究的“急先锋”。分析得出,新时代以来,该领域发文量可分为两个阶段,2020 年为发文趋势的分水岭。本文结合现实背景分析这一情况,由于绿色农业技术研究离不开实地考察,需学界做出大量实验研究,但新型冠状病毒肆虐全球,破坏相关研究机构与学者开展实验研究,影响了 2021、2022 年的学术研究,但随着新冠疫情结束,未来研究预测将回归正轨。

(二) 作者分析

学者是学术研究的主要参与者,同时也是学术成果的生产者。“每个领域的核心研究作者和核心研究机构代表着该领域研究的最高水平,他们引领着研究领域的发展方向。”^[5]通过利用 Citespace 6.1.R6 作为分析发文的核心作者,将软件切片长度 (SliceLength) 设为 1,通过设定 Threshold 为 2,得出核心作者共现谱图,运行得到包含 223 个网络节点,48 条网络线,网络密度为 0.0019。网络密度是一个衡量网络连通性的重要指标,反映了网络中节点之间联系的紧密程度。从软件中生成的作者共现图谱可看出,网络连接节点数较少,节点连接稀疏。核心作者之间没有形成一个规模性协作的格局,侧面反映出在该领域存在影响力较大的专家学者“独占鳌头”,与其他研究者的联系相对较少。

为进一步探究该领域核心作者,本文通过普莱斯定律进行测度。公式为: $M = 0.749\sqrt[3]{N_{MAX}}$ (其中, M 为核心作者群中发文量最少作者的发文数量, N_{MAX} 为发文量最多的作者)由图 3 可知, $N_{MAX}=4$,故得出结果如

[3]毕学进.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国经济史研究的热点、趋势与展望——基于 Citespace 空间可视化分析方法的计量研究[J].北京社会科学,2019(12):85-101.

[4]徐长春,熊伟,刘婕.国家重点研发计划农业面源专项服务绿色发展的主要成效与机制探索[J].农业资源与环境学报,2023,40(03):699-704.

[5]张勇.我国高校阅读推广研究演进路径、热点与趋势分析[J].图书馆工作与研究,2020(08):87-97.

下:

$$M = 0.749^2 \sqrt{N_{\text{MAX}}}$$

$$M = 0.749^2 \sqrt{4}$$

$$M = 1.498$$

根据公式得出结果,按照向上取整原则,发文量为两篇以上的作者为高产核心作者,共28位。发文量最多的作者为张俊飏(华中农业大学经管学院二级教授、博士生导师,华中农业大学农业绿色低碳发展实验室主任)。他提出了一种有效方法来促进农户采纳绿色农业技术,即通过社会互动方式提高农民信心与技能,激发其掌握技术的积极性。另外,还找到情景互动对某些特定技术的采纳影响更为明显,并提出要有针对性的推广绿色农业技术。^[6]这些研究结论对解决农业可持续发展所面临的现实困境具有重要意义,可帮助相关部门更好地制定和推广农业绿色技术政策和方案,促进农业高质量发展。

(三) 机构分析

本文通过EXCEL软件与Citespace相结合,对发文机构进行可视化分析,得出发文量最高的前六名研究机构分别为:华中农业大学经济管理学院、湖北农村发展研究中心、塔里木大学经济与管理学院、山东省菏泽市东明县长兴集乡人民政府、石河子大学经济与管理学院、中国农业大学经济管理学院。这六个机构在绿色农业技术领域的研究产出较多,其研究成果对乡村振兴和农业可持续发展具有重要的意义。从软件中分析得出,发文主要为高校科研单位、地方基层政府及农业科研单位。分析其原因发现:由于绿色农业技术的推广需在实践中推广落地在基层农村中,这直接与地方基础政府的相关工作人员相接触,因此地方基层政府在该领域接触较深。通过进一步分析研究机构的研究方向和热点,研究发现:关于绿色农业技术研究词主要包括:绿色农产品生产技术、农业资源环境保护技术、农村生态文明建设、农业农村建设等方面。

(四) 期刊分析

学术期刊是学术研究的载体,能够反映学术界对于该领域研究的现实状况。通过对对于学术期刊进行结构性分析,研究发现,《农家参谋》《种子科技》《农业开发与装备》三本期刊刊载量最多,分别为85篇、72篇和56篇。

表1 部分研究期刊载文分析

发文期刊	载文量 (篇)	占文献总量比
农家参谋	85	9.6%
种子科技	72	8.1%
农业开发与装备	56	6.3%
南方农业	41	4.6%
农业与技术	33	3.7%
农民致富之友	33	3.7%

本文采用布拉德福定律,以寻求核心区期刊。将该领域的期刊划分为三种类型:核心区期刊、相关区期刊和非相关区期刊^[7]。核心区期刊指在该领域拥有较高影响力和重要性的期刊;相关区期刊指在该领域发表了相关文章但影响力和重要性不如核心区期刊;非相关区期刊则指在该领域刊载相关文章较少的期刊。该公式为: $K = 2 \ln(e^E \times y)$, 其中K为核心区期刊,E为欧拉系数 ($E=0.5772$),Y为本领域期刊最大刊文量,由表2可得, $Y=85$ 。使用对数计算法则 $\log_c(ab) = \log_c a + \log_c b$ 计算过程如下: $2 \ln(e^{0.5772} \times 85) \approx 10.04$ 。

根据四舍五入原则, $K=10$ 。所以刊文量超过10篇的期刊都为核心区期刊。从上表分析可知,学界对于绿色农业技术的研究的核心区期刊相对其他领域较多,意味着国内对于绿色农业技术的研究受到了学界乃至社会广泛关注和重视,相关的学术成果在该领域内具有较高价值和影响力。同时,该领域研究成果也将有助于推动乡村振兴战略的实施,促进农业生产方式的转型升级,推进可持续农业发展,提高农业生产效益和农民收入水平,从而推动农业现代化的进程。

四、绿色农业技术研究的热点分析

[6]张丰翼,颜廷武,张俊飏.社会互动对农户绿色技术采纳行为的影响:基于湖北省1004份农户调查数据的分析[J].生态与农村环境学报,2022,38(01):43-51.

[7]王知津,李博雅.近五年我国情报学研究热点动态变化分析——基于布拉德福定律分区理论[J].情报资料工作,2016(03):34-40.

“对关键词进行分析能够较好地把握研究领域的热点问题”^[8]。通过对高频关键词共现网络的分析,可更加直观地洞察学术界对某一研究领域热点问题的集体关注,并藉此揭示出隐藏于关键词背后的学术范式、话语建构以及知识生产的逻辑路径。通过 CiteSpace 软件,得出该领域目前学术研究的高频关键词,本文将频次大于 39 的高频关键词按照从高到低排序,如表 3 所示。频次排名较高的关键词有:绿色技术(332 次)、种植技术(244 次)、推广(143 次)、推广策略(87 次)。其中,绿色农业一词成为了该领域学术界主要关注的热点话题。

表 2 高频关键词部分

序号	关键词	频次	中介中心性
1	绿色农业	332	0.56
2	种植技术	244	0.1
3	推广	143	0.08
4	推广策略	87	0.03
5	绿色技术	63	0.12
6	技术推广	58	0.08
7	农业生产	54	0.13
8	绿色防控	34	0.1
9	应用	33	0.04

在关键词共现网络中呈现出明显的聚类效应和较强的中心性,这表明绿色农业技术研究领域已形成了相对稳定的学术议题框架与研究生态。其中“绿色农业”以最高频次和 0.56 的中介中心性,凸显出其在当前农业技术革新和生态文明建设议题中占据枢纽地位。“绿色农业”这一关键词频繁出现在文献中可反映出该领域研究在“绿色农业技术”的研究中扮演着引领话语导向、定义学术范畴、推动问题创新的重要角色。与此同时,“绿色农业”的研究维度较为宽泛,其不仅可从单纯的技术维度加以研究,也可从社会学视角去进行理论方面的审视,例如可从生态伦理、发展正义以及乡村治理现代化等复合型社会议题着手。随着乡村振兴战略的全面实施,绿色农业已然超越了传统技术进步与生态保护的双重范畴,进而演化成为一种以生态化、可持续化为核心导向的农业治理新思路。因此,不论从治理逻辑的新范式出发还是从治理实践的新路径思考,绿色农业的相关研究将继续成为推进乡村发展的重要研究课题,其研究成果旨在破解传统农业技术应用过程中生态效益与经济效益之间的冲突与困境,为重构人与自然的和谐互动与共同发展新型农业社会形态而生。因此,“绿色农业”成为社会发展范式转型和治理结构创新的时代关切与学术自觉。

从高频关键词表中,“种植技术”、“绿色技术”等次级高频关键词的集中出现则体现了学界在生态农业领域中,对于具体的技术关注与实践取向具有共识性特征。具体来看,技术关键词的出现既反映了当前学术界在推动绿色农业生产提升方面所作出的实践探索,也呈现出绿色农业领域在知识体系构建与技术实践路径方面的日趋完善。“在全面推进乡村振兴战略的背景下,以数字农业为代表的现代农业技术体系成为乡村振兴战略的重要抓手,受到了国家层面的高度重视和坚定支持。”^[9]。技术一词的频繁共现也在侧面折射出农业技术在乡村振兴与可持续发展语境中逐渐呈现出整体性、系统性、集约化的发展趋势。相关部门不再孤立地解决单一农业问题,而是不断向社会-生态系统整体治理的方向着手处理。

此外,研究推测,高频关键词表中的“推广策略”、“技术推广”、“推广对策”等词的频繁出现,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绿色农业技术研究在学界正经历着研究范式的转换与提升过程,即从以往单纯追求技术可行性的检验与探索逐渐走向理论研究与实践行动的交互生成,进而强调技术应用推广的系统性、适配性以及策略性。从文献计量研究的文本性到实践里路的现实性,这些关键词的出现意味着学术界开始关注绿色农业技术从理论到实践落地的有效路径,强调技术与治理、技术与政策之间如何产生良性互动,从而在一定程度形成了从理论阐释、技术应用到政策实施“三位一体”的知识-行动闭环结构。

五、绿色农业技术研究演进路径分析

结合绿色农业技术研究的研究嬗变来看,在乡村振兴战略背景下,绿色农业技术研究的演进路径主要体现在特定历史时期学术界对于生态文明、农业现代化与可持续发展议题的研究与思考。因此,研究基于 SPSS 26.0 软件的系统聚类法,通过关键词的组间平均联接法形成谱系聚类图(如图 2 所示),进一步厘清该领域的知识演化轨迹和逻辑范式的内在特征。透过图谱分析学术脉络,并尝试从更为清晰的分析视角去呈现研究趋势。并通过谱系图尝试分析理论研究范式是如何转型的,并分析这种范式转型背后隐藏着的学术共同体认知逻辑的是如何跃升

[8]王志刚,胡宁宁.国家治理研究进展、热点探析与趋势展望(1989—2022)[J].哈尔滨工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3,25(01):33-41.

[9]梁梁晓贺,吴侯,周爱莲,等.农业科技政策扩散格局及新时期下路径优化研究[J].农业现代化研究,2025,46(03):397-412.

的、理论话语是如何转变的,从而寻求现阶段农业实践活动是如何由粗放向精细、由零散向整体的深刻变迁过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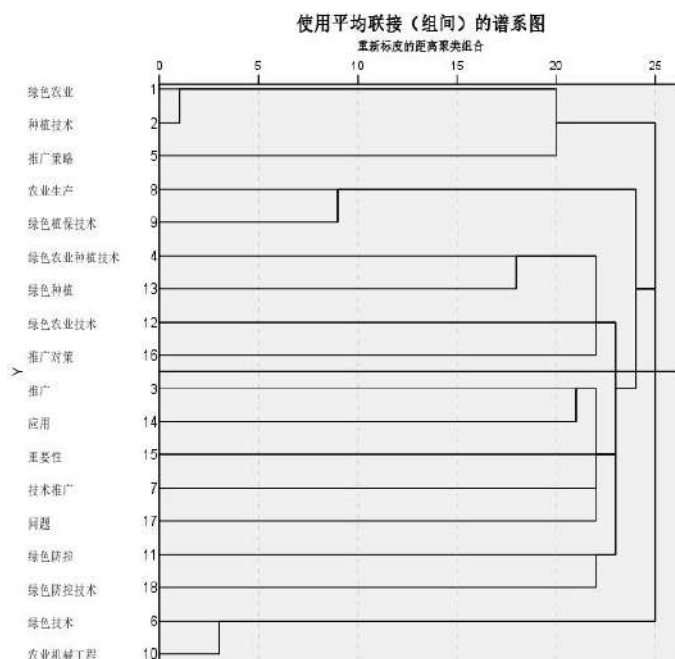


图 2 谱系图

(一) 绿色农业技术研究的初始阶段：“技术本体”与“生产模式”耦合

由聚类谱系图谱中分析可知,因乡村振兴战略的提出从宏观视域中出发,为社会发展提供了新的图景,并为生态文明视域下的学术研究提供符合时代浪潮的的理论自觉与实践诉求。“智慧农业能促进农村经济发展,带动农村产业结构优化升级,锻造农业上下游产业链,统筹农业资源采取科学经营的方式落实区域农业产业生产,并打造满足当地农村发展实际所需的多功能地域经济发展模式。”^[10]回溯绿色农业技术研究的初始阶段,推测该领域研究的源头在一定程度呈现出:学术研究的关注点往往局限于农业生产的基层一线,并从“技术本位”的知识性特征折射出具体技术的工具理性特点。这一阶段的研究主体主要表现为对农业生态问题的经验主义回应,主要是围绕相关专门性的生产技术展开研究,诸如绿色肥料的应用、生物农药的研发、生态种植技术的实践等内容,这些内容也成为该阶段研究文献中的高频叙事方式。

从聚类谱系图来看,在早期研究中,“绿色农业”与“种植技术”两个关键词的快速联结,恰恰能够彰显出农业技术作为农业生产实践过程的重要生产资料,具备明显的工具属性。这可从侧面体现出学术界在回应当时农业生产模式粗放、农业环境污染严重等现实困境时所作出的直观的理论实践选择。而这一时期的学术研究往往将“技术进步”视作是提升农业生产效率、减少环境负面效应的关键一招。因此,“种植技术”在早期学术研究中占据核心位置,而以牺牲生态环境为代价促进农业经济的矛盾,也将成为当时学术界关注的热点问题。然而,从相关研究中可以发现,当时学术界的研究对于生态伦理考量和制度性反思研究相对较少,学术研究的“工具理性”隐性陷阱深藏于学术研究中。

而这种陷阱主要反映的是研究主体过于依赖技术本身的功能性而忽视了技术与制度、技术与社会之间的内在复杂性关系,因此,这种单纯的技术实践逻辑难以突破技术本身所带来的局限性。简单来说,早期研究无法更好实现技术与生态文明的深度融合,此阶段的学术研究普遍存在着理论抽绎相对不足的缺陷,并表现为研究成果多是实践案例或实验结果的展示。

与此同时,通过分析得出,囿于学术界所提出的技术成果在一定程度缺乏相应的推广平台,仅去依靠农业生产者个体或市场自发性落地是无法有效推广成果转化及普及,因而导致绿色农业技术在推广实践过程中可能出现障碍与瓶颈现象。此外,研究主体在这一阶段过于关注技术本身的效率性与经济性而导致生态农业技术在实际应用中出现异化,即在追求经济效益的过程中可能忽视并弱化了技术背后的生态伦理价值。

因此,总结这一阶段的学术特征可以清晰看到技术本位的工具理性话语所可能存在的悖论。其主要从两个方面体现,一是学术界试图通过具体的应用技术去解决生态问题,二是因缺乏整体生态观念,技术实践难以摆脱局部、零散与低效的现实问题。这种悖论也促使学术界不得不进行更为深入的理论反思与方法创新。

[10]杨莹,陈赟,何学松.我国智慧农业发展的模式创新、症结堵点与推进策略[J].农业经济,2024,(07):3-6.

（二）绿色农业技术研究的中期拓展阶段：“推广应用”与“治理策略”交织

随着学术界对于绿色农业技术研究不断深化,学术话语从单纯的技术理性逐步迈入了更为复杂的社会治理逻辑阶段。由聚类谱系图可知,“推广”“推广策略”“技术推广”“推广对策”等关键词从孤立的状态逐渐聚合并逐渐形成了更为庞大和复杂的聚类网络。研究分析可知,这一现象的出现并非是当时学术界单纯地扩大研究视野或丰富研究话语,而是出现了学术认知范式的本质性跨越与知识生产逻辑的重大转型。这种转型不仅意味着学术界对技术实践的深层次思考,也体现出绿色农业技术正从单维的技术操作逻辑迈向整体的治理逻辑、从孤立的学术实践进入到政策与社会实践的互动场域。

分析得出,这一阶段研究的典型特征在于技术从单纯的农业生产手段逐渐转变为生态农业治理结构中必不可少的重要条件因子。换言之,“推广”等相关关键词的出现,其背后的原因是由于绿色农业技术实践的社会嵌入性越来越强,也就是学术界开始主动思考农业技术如何能更好地与乡村社会结构、政府政策体系、市场环境、农户生产意愿和生态文明价值之间实现耦合。这种治理策略与社会推广路径的嬗变和演进表现出极强的复合性与综合性特征,也意味着学术界已经开始认识到绿色农业技术的有效推广并非仅单纯依靠农业技术自身的优越性,而必须依靠技术与社会环境、利益主体之间的协调互动。因此,这一阶段研究与早期技术工具理性的研究话语不同的是研究者开始以更为宏观的视野对绿色农业技术的推广逻辑进行深入浅出的研究。

研究发现,在绿色农业技术推广策略研究中,在CNKI数据库中,现阶段学术界共发表191篇论文,鲜见核心期刊刊载学术研究。从研究可知,学术话语更多开始关注技术推广中的“制度供给”与“行为激励机制”问题。在部分研究中,相关学者会以:农业技术在推广中如何激励农户积极采用绿色技术、如何通过政策工具撬动地方政府和农业企业的积极参与、如何克服技术推广过程中的制度性障碍等研究问题展开研究。因此,这种研究取向开始探索通过系统的政策干预、激励机制设计、市场资源整合等多种策略手段去有效实现绿色农业技术的社会转化与广泛推广。

同时,这种策略导向的研究也逐渐暴露出技术推广过程中的复杂社会现实。学术界逐渐发现,“东部地区农业绿色发展水平显著高于西部和中部,各地生态环境和经济条件差异明显,直接影响绿色技术推广的适应性与接受程度”^[11]。例如,经济欠发达地区与经济较为发达地区的农户对新技术的接受意愿和行为逻辑可能大相径庭。与此同时,不同地区的地方政府在绿色技术推广中的角色定位与执行力度也存在不同程度的差异。因此这些复杂的社会现状时刻提醒相关学者必须深入理解技术应用背后的多元社会治理逻辑,才能真正实现绿色农业技术的有效推广。

从治理实践维度来看,这一阶段的研究还涉及到具体的政策路径与实施机制问题。学术界关注如何制定科学有效的技术推广政策,比如财政的补贴机制、农业技术培训与服务体系建设、农业合作社模式创新、农村基层治理结构优化等研究课题。此类研究使得技术推广不再简单停留在实验室阶段或试验田的局部实践,而是真正进入到政策主导的治理结构当中,进而形成了政策治理与技术推广之间的相互协同与动态嵌入。

（三）绿色农业技术研究的深化阶段：“生态治理”与“整体性范式”发展

“国际经验表明了经历了农业高速发展之后,许多地区都有一个向绿色发展转换的过程”^[12],从聚类图中可明显察觉“绿色防控技术”“绿色植保技术”和“绿色种植”等关键词正逐渐形成更为鲜明和完整的研究网络。学术界在长期实践探索与理论反思基础上对农业技术本质与农业生态治理之间互动关系的更为深刻的认识和整体性的再思考。

绿色农业技术研究的深化阶段标志着绿色农业技术研究开始超越传统的线性思维和孤立技术方案,结合“两山”理论的出现呈现出更为系统的研究。其中,“绿色防控技术”等词的出现体现为这类技术将农作物病虫害的防治置于整个农业生态系统的整体视域中,进而更为科学的考虑到了生态系统的自然调节机制、生态平衡的维持方式等内容,并强调利用自然界的生态关系进行病虫害的生物控制和防治。在这一阶段的研究中,相关学术研究还提出生态治理的长期性、复杂性和系统性等问题。而这一阶段的学者开始更加关注如何在生态治理过程中处理好人类活动与生态环境之间的辩证关系。具体来说,就是要通过绿色技术改善农业生态环境,并保障农户的经济利益和社会可持续发展的需求,这也与国家的主要矛盾的转变相互印证。从马克思主义辩证关系的深入思考促使绿色农业技术研究更加全面地考量农业技术的生态-社会-经济三重效益,强调技术应用的长期性、系统性与可持续性。从研究中发现,这一阶段也表现出显著的跨学科交叉特征。马克思主义哲学、生态学、农业经济学、社会学等学科的知识与方法被广泛引入绿色农业技术的研究领域之内,从而丰富和完善了相关理论研究的范式和方法。在这一研究阶段,对于不同区域间农业生态治理模式的比较研究、不同生态保护模式对农村社区社会结构影响的

[11]吕明,黄宜,陈蕊.中国绿色农业区域差异性分析[J].农村经济,2022,(12):78-87.

[12]杜志雄,金书秦.从国际经验看中国农业绿色发展[J].世界农业,2021,(02):4-9+18.

研究、以及生态农业模式下农户经济行为的研究等均体现出绿色农业技术研究逐渐向知识交叉融合和跨学科探索趋势演变。

（四）绿色农业技术研究的未来趋势：“机械工程”与“智能技术”的潜在整合

随着智能技术的出现,农业技术与智能科技的耦合成为了现阶段生产力发展的时代需要。从聚类图中可知“农业机械工程”一词孤立与其他关键词。分析这一现象背后的原因发现,并非是机械技术在绿色农业研究中可有可无,而是由于农业机械技术在既有研究体系内的嵌入度还需进一步提升,其尚未与绿色农业技术课题的研究形成真正意义上的交互共振与深度融合。这一学术研究预示了未来绿色农业技术研究可能面临的巨大理论与实践创新空间,也就是智能技术与机械技术的生态整合范式创新。随着 AI、云计算、大数据等新质生产力的发展,旧式的农业发展模式显然已经被时代所淘汰。从农业生产发展的历史演变看,农业机械工程长期以来以追求生产效率最大化为主要目标。而随着乡村振兴战略深入推进以及生态文明理念日渐成熟,智能化、科技化水平的提升推动着学术界相关研究不得不重新思考机械技术应用的生态逻辑与社会适配性问题。

当前,全球农业发展正处于深刻的技术转型时期,以人工智能、云计算、大数据为代表的智能技术在农业领域快速渗透,并渐进式呈现出与农业机械技术深度融合的态势。这种融合带来生产效率与劳动生产率的显著提升,但在一定程度带来了新的研究困境,例如由智能化衍生出的更为复杂的生态伦理问题、社会治理机制等问题。因此,本研究可以预见未来绿色农业技术研究的主流方向将不可避免地 toward 智能机械技术与生态农业技术的融合方向快速推进。

研究推测,智能技术与农业机械的融合首先会表现在技术手段上的升级换代与智能转型等方面,如无人驾驶农业机械、智能灌溉与施肥装备、无人机植保和智能化耕作设备的迅速涌现与广泛应用等内容。智能机械技术的普及与应用将有效降低农业生产中化肥农药的过度施用,减少生态环境负担,提高劳动生产率、降低人员需求进而在一定程度可促进人的解放,并实现精准、生态、智能化、绿色的农业生产目标。

结合现阶段实际发展情况来看,未来学术界的研究趋势显然还需继续深耕农业机械技术与智能技术的深层次结合。简单来说就是智能机械技术应用不应孤立于绿色农业技术体系之外,而应在技术逻辑背后实现生态目标的技术整合与制度调整。具体可通过智能技术的生态化设计实现农业机械装备在作业过程中自动规避生态敏感区域,自动监测农业生态环境指标,主动反馈并调节农业机械作业模式,从而真正构筑一个以生态平衡为核心目标的农业技术体系。

与此同时,在未来研究中学界还需进一步关注政府、企业、科研院所与广大农民之间的协同治理模式的完善,以保障智能机械技术在农村地区的推广与落地。特别是在西部经济相对较弱的地区,如何实现智能机械技术与当地生态、社会、经济环境相协调,成为未来绿色农业技术研究的重要课题之一。在未来趋势中,智能技术与机械技术的生态融合与创新还将带来农业生产模式的根本性变革,并进一步推动农业生产模式从粗放式发展迈向集约、精细与智能化的转型阶段。

因此,聚类图谱中“农业机械工程”关键词的孤立性揭示出农业机械技术与绿色农业技术体系之间融合将会成为未来研究的热点课题。正是因为新质生产力的发展带来的以智能技术为引擎,以生态治理为核心,以制度创新为保障,以多学科融合为路径为特质的研究特点,构筑出了一种真正能够回应农业治理现代化的绿色农业技术范式。这种新的技术范式的形成也必将显著推动农业生产与生态治理的双重目标实现,也将极大拓展绿色农业技术研究领域的理论深度与实践广度。

参考文献:

- [1]刘丽萍,孙炜琳,刘丽,等.异质性农技培训主体对农户绿色农业技术采纳行为的影响研究[J].中国农业资源与区划,2023,44(04):162-171.
- [2]陈梅英,黄守先,张凡等.农业绿色生产技术采纳对农户收入的影响效应研究[J].生态与农村环境学报,2021,37(10):1310-1317.
- [3]毕学进.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国经济史研究的热点、趋势与展望——基于 Citespace 空间可视化分析方法的计量研究[J].北京社会科学,2019(12):85-101.
- [4]徐长春,熊伟,刘婕.国家重点研发计划农业面源专项服务绿色发展的主要成效与机制探索[J].农业资源与环境学报,2023,40(03):699-704.
- [5]张勇.我国高校阅读推广研究演进路径、热点与趋势分析[J].图书馆工作与研究,2020(08):87-97.
- [6]张丰翼,颜廷武,张俊飏.社会互动对农户绿色技术采纳行为的影响:基于湖北省 1004 份农户调查数据的分析[J].

生态与农村环境学报,2022,38(01):43-51.

- [7]王知津,李博雅.近五年我国情报学研究热点动态变化分析——基于布拉德福定律分区理论[J].情报资料工作,2016(03):34-40.
- [8]王志刚,胡宁宁.国家治理研究进展、热点探析与趋势展望(1989—2022)[J].哈尔滨工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3,25(01):33-41.
- [9]梁晓贺,吴俟,周爱莲,等.农业科技政策扩散格局及新时期下路径优化研究[J].农业现代化研究,2025,46(03):397-412.
- [10]杨莹,陈赞,何学松.我国智慧农业发展的模式创新、症结堵点与推进策略[J].农业经济,2024,(07):3-6.
- [11]吕明,黄宜,陈蕊.中国绿色农业区域差异性分析[J].农村经济,2022,(12):78-87.
- [12]杜志雄,金书秦.从国际经验看中国农业绿色发展[J].世界农业,2021,(02):4-9+18.
- [13]魏斌,马玉堂.数字经济与乡村振兴有效衔接的研究演进、热点及发展趋势分析[J].长春理工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4,37(05):125-136.

Visual Analysis of Literature on Green Agricultural Technology Research under the Background of Rural Revitalization

Wei Bin ¹, Zhao Liting ², Liu Jinqing ³, Li Xiang ⁴

(1. School of Marxism, Sichuan Minzu University, Ganzi, Sichuan 626001; 2. School of Marxism, Lanzhou Information Technology College, Lanzhou, Gansu 730300; 3. Chengdu Bilin Hotel Management College, Chengdu, Sichuan 611743; 4. Chengdu Sports University, Chengdu, Sichuan 610041)

Abstract: Against the backdrop of the in-depth advancement of the rural revitalization strategy, green agricultural technology, as an important fulcrum for achieving sustainable agricultural development and ecological civilization construction, has increasingly become the focus of academic attention. Based on the China National Knowledge Infrastructure (CNKI) journal database, this article collected a total of 885 research papers with the title "Green Agricultural Technology" from 2016 to 2023. By leveraging various visualization and statistical analysis tools such as CiteSpace, SPSS, and SATI, it analyzed from dimensions including publication trends, author collaboration networks, and research hotspots. Systematically sort out the knowledge graph and academic evolution path of current green agricultural technology research. Research findings indicate that the overall development of research on this topic shows a pattern of "steady growth with a slight increase, a decline after the peak, and a promising trend". The number of published papers on green agricultural technology research is generally on the rise, reaching a peak in 2020. Second, the core author group has not yet formed a stable collaborative network, and the research force shows a certain degree of dispersion. Thirdly, the research themes closely revolve around areas such as the green transformation of agriculture, farmers' technology adoption behaviors, and agricultural pollution control, demonstrating typical policy orientation and practical responsiveness. The bibliometric analysis of this article not only reveals the phased characteristics and hot evolution trends of green agricultural technology research, but also provides data support and theoretical reference for the in-depth research on green agricultural technology innovation under the background of rural revitalization in the future.

Keywords: Rural revitalization Green agricultural technology Visual analysis of literature CiteSpace;" Green development of agriculture

中国馆的叙事建构与传播景观研究： 以 2025 年大阪世博会为背景

常景皓¹

(1. 北亚利桑那大学, 美国 亚利桑那州 AZ 86011)

摘 要：2025 年大阪世博会中国馆以“中华书简”为主题，将竹简意象、书法符号与园林动线融合，构建出集建筑美学与文化叙事于一体的传播性景观。本文基于艺术国别学视角，探讨中国馆如何通过空间组织、材料选择与符号建构，展现国家文化形象与时代精神。在强调文化厚度的同时，逐步引入情感引导与数字技术，为国际传播创造新的感知路径。文章主张，通过构建叙事化参与机制与情绪联结结构，展馆能够在保持文化自主性的基础上，实现跨文化传播的延展性。结合评估模型构建与传播行为追踪，中国馆在文化表达上具备持续优化的空间叙事潜能，具备向国际共享叙事平台演化的条件。

关键词：艺术国别学；传播性景观；艺术学；文化叙事；空间表达

DOI: doi.org/10.70693/rwsk.v1i8.1248

一、研究背景

2025 年大阪世博会以“构想未来社会”为主题，聚焦科技、文化与生态三大议题，成为全球主要国家展示国家形象与文化理念的重要平台。中国馆作为最早动工并面积领先的外国自建馆之一，其设计理念“中华书简”自发布起便引发建筑界、传播学界与公众的持续关注^{[4][3]}。展馆外观以竹简意象展开，结构采用绿色钢架与竹材结合，内部空间沿用传统园林“曲径通幽”式布局，形成一个融合传统意象与当代传播功能的多维叙事空间。从空间形式、材料象征到文化符号的选择，中国馆呈现出一种低调、沉静但张力充足的文化表达方式，体现了中国在当前国际传播环境下的战略审慎与文化自信^[2]。

以往的世博会中，中国国家馆设计曾长期处于被动迎合的“东方主义”表达结构中，建筑风格往往以异域奇观或符号堆叠为主要视觉策略，缺乏文化主体性与叙事深度^[10]。但近年来，随着文化软实力战略的推进与国际传播体系的重塑，中国在重大国际文化场域中的形象表达逐渐由“陈列”向“讲述”转变^[7]。中国馆不再仅仅展示过去的“中”，而是通过构建具有情节性的空间路径、可辨识的文化符号与沉浸式体验机制，传递正在发生的中国与可以共鸣的中国。

尽管中国馆在视觉风格与文化内容上呈现出高度统一的象征结构，但从传播学角度观察，其内部叙事仍较为抽象，缺乏具象化情感锚点与角色路径。相比之下，同期的日本馆通过“阿童木牺牲自我拯救人类”的 IP 故事，以及“黑杰克医生研发人造心脏”的医学幻想叙事，使建筑空间成为文化情节的传播媒介^[4]。阿童木与人造心脏的联动，强化了视觉冲击与技术表达，建立起生命哲学与国家愿景之间的情感桥梁。这类传播方式更容易激发国际观众的情绪共鸣与记忆固着效应，也更符合当下数字传播时代对故事化表达的需求。

本研究将围绕中国馆如何在文化深度与跨文化传播效率之间实现更有效的叙事转换展开讨论。文章主张：中国馆在建筑哲思与文化象征方面已具备坚实基础，但在叙事结构、情感渗透与数字互动三个维度上，仍存在可优化的空间。如何借助数字技术扩展空间的表达能力，如何引入叙事角色激发观众情感参与，如何在保持文化尊严的前提下实现具象转译，构成本文的核心问题意识。

本文采用跨案例比较与传播理论建模相结合的方式。通过对日本馆等国际展馆的叙事策略、互动模式与传播机制进行剖析，提取可供参考的实践路径；结合中国馆当前设计内容与媒介结构，从共情传播理论、文化符号传播、数字参与传播等角度进行分析建构。

作者简介：常景皓(1999—)，男，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为区域文化与数字计算研究。

二、中国馆建筑设计传播策略的优势分析及优化路径探讨

本次大阪世博园中国馆国际展区，占地面积达到 3500 平方米，是外国自建馆中的较大规模建筑^[3]。展馆选址地块呈长条形，南侧紧邻主干道，西侧毗邻中央景观区域。建筑师利用场地特点，巧妙地将入口设计为统一大门，既解决了空间形态冲突问题，也突出了建筑外观的雄伟气势^{[3][5]}。

空间布局的优势还体现在室内参观动线的精细设计中。中国馆内部采用了传统园林的布局模式，通过曲径通幽、步移景异的空间叙事方式，创造了丰富的感官体验。观众在行进过程中能感受到空间的变化，文化记忆也因此更容易形成。这种空间布局策略与传播学的共情机制使得参观者能够更直接地与展馆的文化内涵产生互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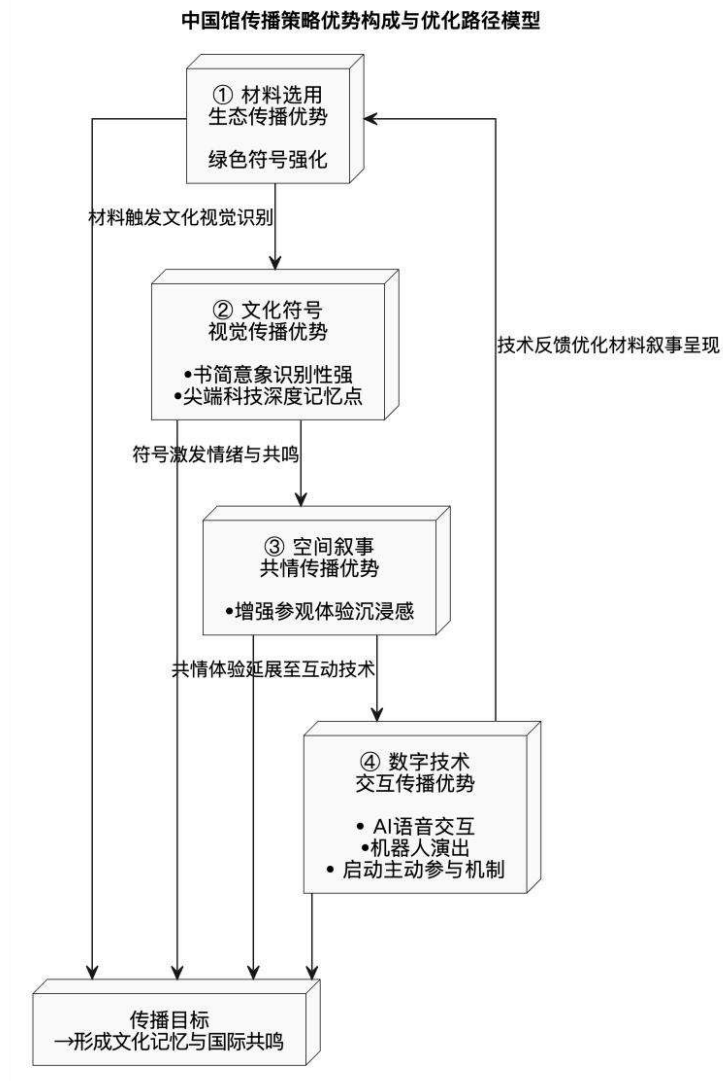


图 1 中国馆传播策略优势构成与优化路径模型

图 1 展示了上述策略在传播路径中的结构性整合，强调了四个优势维度之间的因果关联与协同效应，以及如何共同导向“再文化化”的传播目标。

1. 材料选用的生态传播优势分析

中国馆主体选用竹材作为外部装饰材料，强调了可持续发展的绿色理念。竹材不仅是中国文化的重要象征，还是环保、经济、可再生的建筑材料^[3]。这种材料的选择表达了中国积极应对全球气候变化问题的态度，突显了负责任的国家形象。

与日本馆强调 CLT 循环经济材料不同，中国馆采用的竹材更具明确的文化符号价值。竹子这一元素易于形成视觉记忆，能够有效强化参观者的文化认知。竹材本身所传递的生态价值，也使文化传播更容易与国际社会广泛认同的环境保护议题产生联结。

2. 文化符号的视觉传播优势分析

国馆的设计采用“中华书简”为核心意象,建筑外立面刻有大量的中国古典名句,以书法的多样字体呈现。这一视觉符号设计有效地传达了中华文化的历史厚度和美学特质,提供了清晰的文化传播符号^[3]。

研究表明,清晰而具体的视觉符号在国际传播中更容易形成文化记忆点,并且能够在跨文化传播中实现更广泛的传播效果^[11]。中国馆通过竹简与书法的符号联结,不仅体现了传统文化的延续性,也突出了文化符号的现代传播适配性。

3. 叙事策略的共情传播优势分析

中国馆在设计中运用园林空间的曲径通幽模式与竹简书法的文化符号表达,巧妙地激发了参观者的文化共鸣感根据共情传播理论,能够引发情感共鸣的叙事结构与视觉语言,往往具有更高的国际传播效能。

4. 数字技术应用的传播优势分析

数字技术在展览设计中的应用为国际传播提供了丰富的可能性。中国馆已初步涉及数字技术应用,人工智能互动展项的设置,为观众提供了新颖且互动性强的文化体验^[5]。具体表现为 AI 互动屏幕和语音识别等技术,这些技术的应用有效地增强了展览的互动参与度。

数字技术也广泛应用于世博会展馆中,提升了展览的视觉与互动体验效果。日本馆、葡萄牙馆等展馆均利用数字互动技术增强观众体验与文化记忆。

三、中国馆传播策略与国际案例比较

1. 日本馆的传播策略与启示

2025 年大阪世博会日本馆以“生命的循环”为设计理念,强调可持续发展的建筑形式与情感化的叙事路径^[4]。馆内采用了 CLT 循环建筑材料,通过明确的生态与生命哲学表达,吸引观众的关注。展馆设计融合动漫 IP 故事,结合阿童木与黑杰克 IP,以故事情节作为体验参观的重要线索,构成明确的情感联结点。

这一策略的优势在于叙事的具体化与情感化,使观众在参观时更容易理解与接受展馆所传达的信息。阿童木 IP 通过自我牺牲的情节,触发参观者的情感共鸣,成功实现深度的文化传播。黑杰克 IP 则通过 IPS 细胞制造的人造心脏展项,以强烈的视觉冲击感突出展馆的科技与生命主题。

中国馆未来的优化策略可从该类成功案例中提取有益经验,重点在于增强展览内容中具象化、可感知的叙事元素。尽管中国馆并未采用动漫 IP 等视觉识别度高的文化符号,但仍可借助历史人物、科技成就等具备文化代表性与时代表意的素材,构建具有情节推进与情感张力的叙事结构。通过设定明确的情感触发机制,引导观众在文化理解与情感共鸣之间建立内在通路,从而提升展馆在跨文化传播中的感染力与记忆深度。

2. 叙事共情传播模式的构建

共情传播理论认为,文化传播的有效性取决于能否激发观众的情感共鸣与认知认同。动画电影《哪吒之魔童闹海》成功重构了传统神话的叙事,通过个体自主精神的现代表达,创造了明确的情感共鸣点^[7]。这种叙事模式使传统文化在国际范围内成功实现了跨文化传播。

作为一种可供借鉴的叙事模型,该模式强调通过具象化人物与情境构建增强情感共鸣的传播路径。在展览内容设计中引入具有人物主线的叙事结构,并赋予角色明确的主体性与当代表达价值,有助于激发观众的情感投入与文化认同。并且关注虚拟空间的交互机制。在展馆空间中嵌入虚拟社交平台与线上互动界面,可促使参观者在实体与数字之间建立持续性联结,从而提升观众的主动参与度与文化传播的多维延展性。

3. 生态传播策略的国际经验

在国际传播领域,生态可持续发展已成为展馆设计的重要方向。日本馆的 CLT 材料使用、厨余垃圾处理与再利用的生态系统设计,体现了明确的生态传播理念^[4]。这种生态传播策略体现了对环境保护议题的全球共识,有利于提高展馆传播的国际接受度。

中国馆在生态理念的呈现上已建立起初步的传播优势,尤其在竹材材料的选择与绿色发展理念的视觉转化方面,展现出明确的象征性表达。为了进一步提升生态传播的深度与参与度,展馆设计可强化互动性维度,通过可操作的装置或数字展示系统,呈现竹材在其生命周期中的环保特性与应用路径,使观众在动态体验中深化对可持续发展理念的认知。

在文化传播层面,中国馆的“中华书简”主题具备鲜明的视觉识别特征与高度的文化记忆触发力。通过对书法

形态与竹筒意象的现代转译,展馆实现了传统文化元素在视觉语言中的有效嵌入,彰显出文化自信与形式创新的融合能力。然而,面向国际受众的未来传播策略仍有进一步拓展的空间,尤其是在互动性机制的构建方面。若能结合数字媒介、虚拟现实或触感反馈等技术手段,使观众在书写或解码竹筒内容的过程中形成身体参与与文化沉浸,将有助于提升传播效果的情感深度与文化理解的具体性。

四、文化传播的可衡量性与系统性

1. 从设计成果到传播表现的转化逻辑

中国馆的空间设计、美学语言和材料选取已经构建出较为完整的文化表达系统。但在国际传播语境中,展览行为的意义不止于展示形式本身,还包括观众对展览内容的接受、理解与记忆。这种从设计者视角转向观众视角的评估逻辑,使传播不再停留于输出,而必须关注传播是否真正被接受、被记住、被再现。

当代文化传播的核心不再是信息密度的叠加,而是情节性结构与情感触发机制的建立。对中国馆传播策略的理解,也应超越建筑美学层面的判断,进入传播效能的动态分析领域。这就需要有一个既能捕捉文化接受强度,又能记录传播轨迹的多维评估机制。

2. 有效传播的核心标准:情感联结与文化记忆的建立

传播是否有效,不能仅以人流数量或馆内装置复杂程度衡量。在当前的国际文化竞技场中,真正构成传播力的,是文化符号能否在人群中留下记忆,能否激发观众自发分享与再讲述的愿望。这意味着中国馆需要被置于一个可追踪、可比较、可解释的传播指标体系中,重新界定影响力核心。

情感共鸣成为其中的关键维度。传播过程中的情绪触发点是否明确、参与式体验是否自然、文化内容是否被观众转化为个体叙述,都是可评估的传播指标。而文化符号的记忆强度。

3. 系统化评估模型的构建思路

已有研究表明,多维指标体系可以有效辅助世博会传播效应的分析与改进。TOPSIS方法已被用于历届世博会传播影响力评估,其核心在于排除主观赋权,用综合指标还原真实效应^[12]。这一模型提供了参考基础,但其真正意义并非数据的排名,而是通过数据捕捉文化传播中“哪些机制被激活了,哪些机制未被触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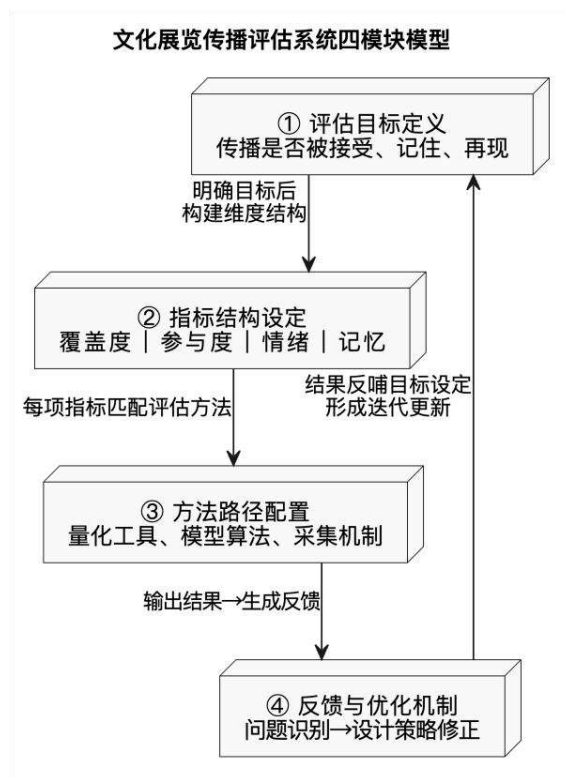


图 2 文化展览传播评估系统四模块模型

该四模块模型的起点是“评估目标定义”，其明确传播是否引发接受、记忆与再现，从而构建出清晰的叙事意图结构。在此基础上，通过“指标结构设定”，将传播过程分解为覆盖、参与、情绪与记忆四类变量，这些指标为后续分析提供具体操作路径。“方法路径配置”则匹配了数据采集与量化方式，确保模型的可运作性。最终，整个系统以“反馈与优化机制”形成循环，通过观众回应推动叙事策略的再设计，完成文化传播的二次激活。

构建评估模型的关键，不在于套用复杂算法，而在于厘清传播目标、观众路径与叙事策略之间的关系。“参观人数”可体现传播覆盖面，“互动频次”反映参与深度，“情绪关键词”揭示情感触发点，而“内容记忆点”则是最终的文化留存效应。这些变量共同构成传播过程的立体剖面，有助于将叙事性展览从美学事件转化为传播学现象。

传播效果评估并非为了证明展馆的得失，而是为传播行为建立一个开放式反馈结构。在多元观众共处、符号接受差异巨大的国际博览会场域中，评估机制不仅是传播科学化的基础，也是一种文化对话方式。它提醒设计者从观众角度重新审视符号的意义生成过程，也为后续文化表达提供了数据支持与经验积累。

从这个角度看，评估模型并非一种技术附属品，而是整个文化传播系统的重要组成部分。通过评估，传播行为获得了“被回应”的机会；通过回应，文化叙事获得了“再讲述”的可能。这正是国家文化从陈列走向故事、从展示走向共鸣的转变逻辑。

五、 可持续的国家叙事机制

中国馆不是孤立的建筑项目，而是国家在全球场域中进行文化表达的一次发声。在当前国际传播格局加速演化的背景下，文化输出不再以“形式展示”为中心，而以“叙事持续性”“观众参与性”“符号感染力”作为衡量标准^[7]。评估机制的建立，不是为了框定一次展览的边界，而是为了开启国家叙事的新阶段。

中国馆在构建视觉美学与文化哲思的同时，更需要一个能延续文化影响力的传播逻辑。这种逻辑不以展期为限，不以空间为界，而是在被感知、被共鸣、被记住之后，持续延展于各类传播渠道之中。这条传播链路的启动装置把一次性的视觉经验，转化为持续性的文化记忆，完成从国内叙事向国际话语转译的全过程。

六、 结语

本研究围绕 2025 年大阪世博会中国馆的传播策略展开分析，提出了具体的传播优化建议与实施路径。研究发现，中国馆在空间布局、材料使用、文化符号表达、叙事结构和数字技术应用等方面，已初步展现出较为明显的国际传播优势。特别是在文化符号运用上，“中华书简”与竹简书法的视觉化表达，使文化内涵清晰易懂，更容易形成文化记忆点。

通过国际案例的比较分析，日本馆在 IP 故事叙事、生态材料使用与情感化互动设计上，提供了经验与启示。中国馆未来可以从具体叙事元素、互动技术应用与生态传播互动设计等方面进一步优化，以提高展览的文化共鸣与国际传播效能。特别是共情传播理论的引入，为展馆设计提供了明确的优化方向，有利于提高观众的文化参与感与情感联结效果。

本研究认为，当前中国馆的传播设计已体现出一定程度的国际传播意识，在符号构建与视觉表达上具备鲜明的文化辨识度。然而，整体跨文化传播效果在互动性营造与情节性叙事的构建方面仍有提升空间。

未来研究可围绕观众情感响应、数字互动技术应用与国际展馆传播策略比较三方面展开，重点在于提升展览叙事的情境沉浸与文化共鸣效果，从而为中国馆等国家展馆提供更具实效性的跨文化传播路径与设计指引。为中国馆等未来国家展馆的设计提供多元文化语境下的理论支点与实践范式。通过上述研究的纵深拓展，有助于进一步明确文化展馆在全球传播体系中的战略定位，增强叙事导向的传播效能。构建具有跨文化传播效能的中国叙事体系，进而有效促进我国文化软实力的可持续增长。

参考文献：

- [1] 藤田美術館. 藤田美術館について[EB/OL]. [2025-07-11]. <https://fujita-museum.or.jp/about/>
- [2] 赵君香. 博物馆视觉信息的传播研究[D]. 山东大学, 2019. DOI:10.27272/d.cnki.gshdu.2019.000345.
- [3] 鲁小波, 王爽, 戴鑫靖, 等. 东北亚区域旅游一体化的潜力研究[J]. 海洋经济, 2025, 15(02): 79-89. DOI:10.19426/j.cnki.cn12-1424/p.2025.02.008.
- [4] 韩恺. 一切从身体出发——论日本丰岛美术馆的设计哲学[J]. 艺术博物馆, 2025, (Z1): 112-118.
- [5] 仓方俊辅, 曲闻. 使流动性成为可能的稳固性之形日本大阪中之岛美术馆[J]. 时代建筑, 2024, (06): 74-81. DOI:10.13717/j.cnki.ta.2024.06.074.

- [6] 空间生产：美术馆的城市赋能和价值传播 论坛综述[J]. 艺术当代,2024,23(04):102-105.
- [7] 唐镰大辅,宋刚,刘泽儒.日本廉价化[J].21 世纪商业评论,2024,(08):80-85.
- [8] 徐晓语.赴日本游客更青睐 廉价出行 ? [N]. 解放日报 ,2024-06-02(004). DOI:10.28410/n.cnki.njfrb.2024.002416.
- [9] 孙芳冰.观众拓展视角下的美术馆公共教育模式研究 [D]. 河南大学,2024.DOI:10.27114/d.cnki.ghnau.2024.003281.
- [10] 潘小多.日本的现代艺术馆为何总在 偏远之地 [N]. 环球时报 ,2024-04-22(013). DOI:10.28378/n.cnki.nhqs.2024.002440.
- [11] 刘青梅.日本 观光外交 战略的推行模式、成效和困境 [J]. 日本问题研究,2024,38(01):11-21.DOI:10.14156/j.cnki.rbwtj.2024.01.002.
- [12] 段邦禹.美术馆弹性空间设计研究[D].中央美术学院,2015.
- [13] 李宁.场所精神营造研究[D].中央美术学院,2014.
- [14] 李鸿儒.当代美术馆互动式体验空间构成初探[D].中央美术学院,2014.
- [15] 杨源弘.论建立中国民营跨国视觉艺术机构的必要性[D].中国艺术研究院,2012.
- [16] 俞文君.上海都市博物馆研究[D].华东师范大学,2005.
- [17] 胡晚君.现代性视觉机制下的主体危机[D]. 福建师范大学, 2022. DOI:10.27019/d.cnki.gfjsu.2022.001167.

Narrative Construction and Cultural Communication of the China Pavilion: A Case Study of Expo 2025 Osaka

JingHao Chang¹

¹ Northern Arizona University, Flagstaff, USA

Abstract: The China Pavilion at Expo 2025 Osaka adopts the theme of “Chinese Bamboo Scroll,” integrating bamboo symbolism, calligraphic motifs, and garden-inspired spatial sequences to construct a communicative landscape that merges architectural aesthetics with cultural narration. This paper, grounded in the framework of art-based national studies, examines how the pavilion conveys national identity and contemporary values through spatial design, material selection, and symbolic expression. While emphasizing cultural depth, the pavilion also introduces emotional guidance and digital interaction, creating new pathways for cross-cultural perception. The study suggests that by incorporating narrative participation structures and affective linkage mechanisms, the pavilion can extend its communicative function while preserving cultural subjectivity. With the support of evaluative models and trajectory-based communication tracking, the pavilion demonstrates narrative flexibility and potential for integration into a globally resonant storytelling framework.

Keywords: art area studies; communicative landscape; art theory; cultural narration; spatial expression

传播性景观的建构逻辑：日本藤田美术馆的视觉体验机制分析

常景皓¹

(1.北亚利桑那大学, 美国 亚利桑那州 AZ 86011)

摘要:在社交媒体主导的视觉传播时代, 艺术场馆如何在碎片化、图像化、快速化的参观习惯中保持文化价值, 成为重要议题。本文以日本大阪藤田美术馆为案例, 分析其如何通过空间组织、视觉构图与动线设计, 建构出一种传播性景观。藤田美术馆以小体量、高频率的视觉触点回应游客的拍照行为与短时参观需求, 形成了一个观看即传播的体验闭环。通过对其茶屋、庭院、展厅等场所功能的剖析, 本文指出该馆实现了“快速可感知、轻度可再现”的文化策略, 不仅满足游客视觉表达与社交分享的需求, 也在空间尺度上保持了艺术场馆的公共文化属性。借助视觉文化批评理论反思传播机制所引发的观看规训与审美标准化问题, 指出传播性景观作为一种艺术空间模式, 需要在参与感与深度之间建立新的平衡。藤田美术馆的实践, 为当代城市中小型艺术空间在新媒介语境下的转型提供了参考样本。

关键词:传播性景观; 藤田美术馆; 视觉体验; 空间设计; 艺术国别学

DOI: doi.org/10.70693/rwsk.v1i8.1246

一、研究背景

视觉艺术的展示方式, 正在被新媒介文化深刻改变。尤其是在短视频、图像社交平台广泛渗透的背景下, 传统美术馆面临传播路径、观众行为与空间组织方式的多重重构。参观不再是线性知识获取的过程, 而成为观看后拍摄, 拍摄后分享的连续行为链^[2]。

与此同时, 城市文化空间也进入轻量化转型阶段。游客的文化消费越来越依赖临时决定、可视表达和社交触达^[8]。传统重叙事、长停留的美术馆形式, 在短期旅游结构中面临适应压力。如何在快速化参观与文化承载之间找到平衡, 成为艺术空间设计与传播策略的关键问题^[6]。

在这样的语境下, 日本藤田美术馆提供了一个高度凝练的样本。它既没有牺牲文化厚度, 也没有拒绝传播逻辑。通过空间微型化、参观流程精简化与图像友好性布置, 它构建出一种新的传播性景观。本文从这一案例出发, 尝试分析其空间设计、视觉体验与观看机制, 并在此基础上反思艺术传播在媒介时代的可能转向。

二、藤田美术馆的历史定位与空间构成逻辑

藤田美术馆坐落于日本大阪市中心, 毗邻地铁与环状线, 仅步行一分钟即可抵达。与传统印象中宏伟厚重的美术馆不同, 它体量小巧, 总参观时长约为25分钟。即便如此, 它却形成了一种高度完整的文化体验。从建筑、动线到茶屋的空间构成, 这座美术馆清晰地回应着当代游客轻量化参观-快速打卡-自我记录的三重需求。

藤田美术馆的创设初衷, 即来自私人收藏的公共化愿景。其创办人藤田传三郎提出: “这些国宝不应作为个人私有物被隐秘收藏, 而应向世人广泛公开, 与同好共享, 也为研究者提供资料”^[1]。这是一个典型的从私藏到公益的美术馆发展路径。也正因为此, 藤田美术馆的视觉与传播结构, 并不完全服从于商业机制, 而是围绕如何以最少的空间成本构建最大文化体验展开策划。这种愿景, 为它后续的空间策略奠定了方向。

1. 建筑的紧凑节奏与观看即完成的体验逻辑

从建筑上看, 藤田美术馆改造自日本二战前的藏品库房。这种旧建筑改建的逻辑, 为它的空间属性赋予了特有的紧凑性和集中感^[1]。在有限的空间中, 展厅被组织成数个相互贯通的小型房间, 每个展区集中展示一类或一

主题藏品。整个参观过程中，观众始终处于一种节奏感明确的观看流程中。不同于沉浸式、沉思型的大馆模式，这里强调的是观看即完成的节奏感，以及视觉接触 + 轻度参与的参观闭环。

视觉体验不仅存在于展览空间内部，也包含前厅区域。观众一进入馆内，即被引导至设有传统茶点的あみじま茶屋。这是一个面向庭园的开放式吧台。在这里，可以购买日式团子和抹茶，并在不进入庭院的情况下透过巨型玻璃窗观赏庭景^[1]。这种空间构造，不是为了深度沉浸，而是为了提供一个看起来就很美的观看场景。观众可以拍照、驻足、分享。这种无需进入即可打卡的机制，本质上是一种传播性景观的组织方式。

如空间生产理论所指出，现代城市的文化空间正逐步演变为流量兼容型场所^[6]。藤田美术馆所提供的体验并非碎片化，而是微结构化的场景编排：视觉-饮食-空间-叙事被浓缩成一条紧凑动线。它满足了游客在短时间内完成文化体验的心理，也符合当下数字传播环境中 短视频优先、图片先行的审美秩序^[2]。

更重要的是，这种空间结构不仅有效率，也有情感温度。藤田美术馆并未将茶屋、前厅、庭园当作单纯的附属功能，而是有意识地将其构造成视觉节点与体验连接点。这些节点不仅被拍摄，也被记忆，被分享。这种被预设的观看方式，既引导游客进入一个可传播的路径，也让他们在其中感受到轻松、愉悦、被欢迎的氛围。这种情感维度，是其空间魅力的一部分。

2. 微结构化场景与极简叙事的传播路径

总的来看，藤田美术馆的空间组织呈现出一种极简但完整的视觉叙事。它的成功并非靠展品的数量，而在于其空间节奏与观看需求之间的精准配合。这种配合，正是传播性景观的核心所在。既不是完全的商业布景，也不是沉重的艺术殿堂，它以小体量完成了传播、文化、参与三种功能的融合。这为我们理解当代视觉艺术场馆提供了一个轻盈而有力的样本。

三、 传播机制与观看逻辑的建构

1. 从参观动线到图像路径

进入藤田美术馆的过程，从一开始就是被组织过的传播路径。空间并不仅仅为了展示艺术作品而存在，它也为观看行为本身而设计。换句话说，参观不仅是一种文化消费，更是一种视觉生产的过程。

藤田美术馆的空间结构强调顺畅、简洁、可预期。观众无需研究动线图，也不需要专业知识。进入即体验，拍照即传播。每一个空间节点都具备拍照友好性与视觉构图性。从茶屋、庭院到展厅，每处位置都成为图像生成的触发点^[1]。这是一种嵌入式的视觉机制。不是观众寻找美，而是空间为观众准备好了可视即传播的图像模块。

2. 观众的“内容生成者”身份

这种设计本质上反映了短视频与社交媒体主导的观看逻辑。正如先行研究中，赵君香所指出的当代博物馆视觉信息的传播，强调的是碎片化、交互性与再传播能力^[2]。也就是说，展览不再是封闭式欣赏，而是一种参与式图像协作。每一个参观者都是拍摄者，也是内容生成者。美术馆变成了内容平台，而不仅仅是艺术容器。

但这种机制也有其隐蔽的规训性。观众在被动接受空间布景的同时，也在主动配合应当拍照到应当打卡的视觉规范。正如先行研究中胡晚君的观点，现代视觉机制往往成为一种权力技术，通过观看塑造个体行为与情绪^[7]。观众在藤田美术馆中，虽然获得自由拍摄的愉悦，却也被引导进入一种标准化的观看姿态。镜头角度、站位、表情、甚至饮品摆放，逐渐趋向统一。这是一种温和而有效的视觉驯化过程。

3. 自由体验下的视觉标准化

同时，藤田美术馆也避免了某些大型展馆中的高压观看体验。在那里，展品往往沉重，空间宏大，参观者需要保持距离、压抑情绪，避免打扰。这种传统观看方式在新媒介环境下正面临挑战。藤田美术馆恰恰反其道而行之。它鼓励随意、轻松、亲密的观看方式，甚至将观看转化为“参与——吃一串团子”，坐在玻璃窗前看庭院，就是参与文化的一种方式^[1]。

但问题也在于此：这种参与是否过于轻薄？当拍照成为参观的核心行为，美术馆是否失去了 引发沉思 的能力？这正是当下 传播性景观 必须面对的张力。一方面，它扩大了文化空间的触达边界，让更多人进来。另一方面，它也可能牺牲了艺术体验的深度，令观众停留在视觉层面，而非精神层面。

在这种张力之中，藤田美术馆的策略更偏向视觉亲和力与情境构造。它不强迫观众理解艺术，而是邀请观众感受氛围。通过空间的温度与动线的温柔，它构建了一种观看即沉浸的轻型结构。这种结构，既是传播机制的体现，也是对当代视觉文化节奏的回应^[6]。

4. 轻量化结构中的传播转化

从传播学角度看,这是一种 现场即传播的机制^[2]。观众无需等待展后评价,也无需长时间整理感受。拍照、上传、互动,这一切在参观中即时完成。藤田美术馆本身,就像一个微型图像生产工厂,有节奏、有输出、有回馈。这种机制使其在竞争激烈的文旅场景中获得持续流量,也形成了一种具有文化温度的传播场所身份。

藤田美术馆不仅是一个展览空间,更是一个视觉文化发生的节点。它建构了新的观看逻辑,平衡了审美、参与与传播三者之间的关系。它的成功之处,不仅在于拍照好看,更在于让可传播性成为艺术体验的一部分,而非其对立面。这种观看机制,正是传播性景观得以成立的基础。

5. 传播结构中的技术类型与感知特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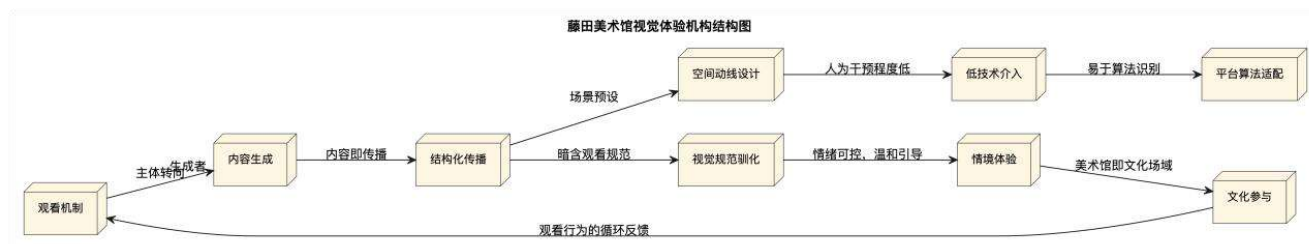


图1 藤田美术馆视觉体验机制结构图

藤田美术馆在视觉传播机制上的有效性,并不依赖于沉浸式技术、交互屏幕或 AR 导览系统。相较于近年来流行的 teamLab 展览或数字艺术博物馆,该馆几乎不使用任何高科技媒介。它的技术策略,是低干预、低显性、但高感知效率的轻技术空间。

这种空间传播结构属于结构性媒介设计的一种类型。它不是将技术置于视觉中心,而是通过空间组织、动线引导、视觉窗口预设等方式,实现对观众拍摄行为的引导与内容生成的激励^[2]。例如,前厅玻璃窗设置的角度与光线布局,使其成为天然的拍照背景;展厅中的陈列顺序,使得拍照路径与参观顺序自然重合。

从传播技术的类型角度看,这是一种低媒介可视觉×高信息输出力的组合。它的技术不是硬件性的,而是结构性的;不是设备化的,而是动线化的。这种方式更贴合普通游客的参观习惯,也更容易被社交媒体上的视觉算法所识别和推荐^[2]。

这种技术策略的最大特点是可复制性高。美术馆无需投入大额设备资金,仅需在场景构成、视觉结构与参观节奏上做出设计,就可构建传播效果。这对中小型城市文化场所,尤其具有现实借鉴价值。

藤田美术馆针对自身馆内的使用特点使用了一种情境嵌入式的软性传播技术。它通过场所本身的设计语言,实现了比设备更具传播能力的观看触发结构。这种低技术介入×高传播效率的美术馆类型,正在成为当代视觉文化空间的一种趋势性模型。

四、批判性视角与文化反思

1. 传播性景观的深层张力

传播性景观的形成,并非只是设计选择。它是现代视觉文化中的结果,是观看方式、媒介逻辑与文化心理长期作用的复合产物。藤田美术馆的空间设计,确实回应了游客对轻松、快速、拍照友好型场所的期待。但它所构建的传播机制,也隐藏着某些深层的文化张力。

回到观看本身。观看从来不是中性的行为。在现代社会,观看已不只是感知,更是一种社会行为,也是一种控制机制。先行研究多次指出,“视觉机制本身已成为现代社会中一种潜在的权力技术,通过‘观看’建立起对个体的规训关系”^[17]。在藤田美术馆,每一个窗景、角落、物件的布置,都在诱导拍摄行为。观众的自由,其实是在特定构图逻辑中被安排好的自由。这种被动的参与感,令人放松,却也在潜移默化中压缩了主体的判断力与沉思力。

2. 自由背后的构图逻辑

在社交媒体的传播结构下,好拍、容易构图、好成为艺术空间的设计考量。这一转向虽带来了流量,却也加剧了图像内容的标准化趋势,短视频中的场景布局成为视觉信息快速输出的核心符号^[2]。这意味着艺术空间开始为传播而设计,而非为艺术体验本身而构建。这种趋势不可避免地牺牲了复杂性、多义性与精神性。藤田美术馆虽然精致,但其传播友好性是否最终会压缩艺术作品的阐释空间?这是值得警惕的问题。

3. 从控制到协作的转向

观众来到美术馆,不仅是为了看展,而是为了被看见在看展。自拍、团子、抹茶、庭院背景……这一切构成了一种我在美术馆的视觉叙事。自我展示与社交参与是推动传播性景观不断扩张的两股动力。胡晚君将其称为自我展示的强迫症^[17],指出现代观众逐渐被社交平台的观看逻辑重塑,自我认知被置于他人点赞与算法推荐的机制中。这使得美术馆逐步沦为打卡模板,成为构建个人身份的舞台。

这种转向并非全然消极。从传播社会学的角度看,让观众成为内容参与者本身就是一种赋权机制。它打破了传统美术馆中专业—非专业的认知壁垒。从这个意义上看,藤田美术馆所做的,是一次主动的传播结构革新。它没有牺牲文化性,而是以轻盈的方式延续了一种美的生活感知^[6]。

问题的关键,不在于拍照行为是否降低了艺术性,而在于我们如何理解美术馆的公共功能边界。如果拍照成为一种文化参与方式,那么艺术空间如何同时保障深度体验与传播友好?如果一切都可打卡,观众是否还能在图像之外沉淀出精神感受?

藤田美术馆提出的方案是。不追求沉浸式数字互动,但也没有放弃文化叙事。它让空间自己说话,让视觉场景成为讲述者。它用庭院、茶屋与展厅,组织出一条安静却能被分享的文化路径。这种路径不是深度阅读式的,也不是肤浅浏览式的,而是快速可感知+轻度可再现的中介结构。它的意义,在于提供了一种可复制的艺术空间传播样式,也为全球城市中小型美术馆的发展提供了启示。

五、传播性景观的挑战与可能性

传播性景观的出现,为艺术空间打开了新的传播路径。但它也带来了不容忽视的挑战。

当被拍摄、被转发、成为首要设计目标时,空间的叙事性与批判性可能被压缩。审美体验趋向同质,文化表达变得单向^[17]。这是所有面向社交平台开放的场馆共同面对的问题,也就是美术馆功能边界的模糊化。虽然参观者可以自由拍照、分享,但他们的观看行为已被空间预设和传播算法所引导。在这种结构中,自由成为可计算的情绪反馈^[2],而真正的思考与对话空间反而减少。

随着观看机制中的主动性滑落,传播性景观也带来了积极的可能性。它扩展了观众参与的广度,使得更多人能在轻松状态下接触艺术、表达感受、建立情感链接。它让艺术空间回归城市日常,成为文化的可进入场,而非文化殿堂。

关键不在于拒绝传播,而在于重构传播与文化深度的关系。挑战与机遇并存,这正是当代艺术传播的新现实。

六、结语与展望

藤田美术馆提供了一个独特的样本。它既不是宏大叙事的文化场所,也不是数字互动的技术展馆。它安静、小巧、节制,却又异常适配当代城市的文化节奏。它用25分钟的参观流程、1000日元的低票价、轻松的拍照路径,完成了一次看起来轻盈、背后复杂的传播设计。

它所构建的是一种兼顾空间审美与传播机制的传播性景观。它将建筑、展品、动线、茶点融合成一个可被观看、可被记录、可被分享的场所。这种场所不是被动展示,而是主动组织观看。它理解游客的拍照行为,也设计了被拍的角度。它不是为了制造打卡热点,而是在回应一种正在发生的视觉文化转向。

先行研究指出,碎片化媒介环境已重构了文化消费方式^[6]。藤田美术馆的应对策略,不是抵抗,不是拒绝,而是适度转化。它把打卡变成文化进入的起点,而非终点。它让拍照不再是文化的外层,而成为空间体验的一部分。这种策略,是智慧的,是温和的,也极具现实参考价值。

我们也不应过度美化这类空间实践和商业模式。传播性景观天然存在觉同质化与观看规训的风险^[17]。当所有美术馆都变成短视频工厂时,艺术是否还能保有想象与思考的空间?这正是未来艺术传播需要持续回应的问题。

正因为有这些张力,藤田美术馆才成为了一个需要关注的答案。在高流量、短注意力、重图像的媒介环境中,它用一种近乎反常规的方式做出了自己的路径选择。它没有放弃文化深度,也没有拒绝观众需求。它站在二者之间,做出调和。这种调和,不仅是传播策略的选择,更是一种视觉文化的价值判断。

未来的视觉艺术空间,可能不再是高墙深院,也不必是沉浸式迷宫。它可能是像藤田美术馆这样的小场所,一个半小时可以抵达、30分钟可以完成、但留下感知与记忆的地方。这种轻型文化空间,将成为越来越多城市中的重要节点。

对中国当代视觉艺术场馆而言,这种模式具有一定的启发性。它提醒我们,美术馆不必追求大、贵、多,而应追求结构紧凑、情绪友好、传播有效的空间组织方式。这不是降低艺术,而是重新理解公共文化的含义。在观众主导的视觉时代,美术馆不是展示的终点,而应是对话和交流的窗口。

参考文献:

- [1] 藤田美術館. 藤田美術館について[EB/OL]. [2025-07-11]. <https://fujita-museum.or.jp/about/>
- [2] 赵君香.博物馆视觉信息的传播研究[D].山东大学,2019.DOI:10.27272/d.cnki.gshdu.2019.000345.
- [3] 鲁小波,王爽,戴鑫靖,等.东北亚区域旅游一体化的潜力研究[J].海洋经济,2025,15(02):79-89.DOI:10.19426/j.cnki.cn12-1424/p.2025.02.008.
- [4] 韩恺.一切从身体出发——论日本丰岛美术馆的设计哲学[J].艺术博物馆,2025,(Z1):112-118.
- [5] 仓方俊辅,曲闻.使流动性成为可能的稳固性之形日本大阪中之岛美术馆[J].时代建筑,2024,(06):74-81.DOI:10.13717/j.cnki.ta.2024.06.074.
- [6] 空间生产:美术馆的城市赋能和价值传播 论坛综述[J].艺术当代,2024,23(04):102-105.
- [7] 唐镰大辅,宋刚,刘泽儒.日本廉价化[J].21世纪商业评论,2024,(08):80-85.
- [8] 徐晓语.赴日本游客更青睐 廉价出行? [N].解放日报,2024-06-02(004). DOI:10.28410/n.cnki.njfrb.2024.002416.
- [9] 孙芳冰.观众拓展视角下的美术馆公共教育模式研究[D].河南大学,2024.DOI:10.27114/d.cnki.ghnau.2024.003281.
- [10] 潘小多.日本的现代艺术馆为何总在 偏远之地 [N].环球时报,2024-04-22(013). DOI:10.28378/n.cnki.nhqsb.2024.002440.
- [11] 刘青梅.日本 观光外交 战略的推行模式、成效和困境[J].日本问题研究,2024,38(01):11-21.DOI:10.14156/j.cnki.rbwtj.2024.01.002.
- [12] 段邦禹.美术馆弹性空间设计研究[D].中央美术学院,2015.
- [13] 李宁.场所精神营造研究[D].中央美术学院,2014.
- [14] 李鸿儒.当代美术馆互动式体验空间构成初探[D].中央美术学院,2014.
- [15] 杨源弘.论建立中国民营跨国视觉艺术机构的必要性[D].中国艺术研究院,2012.
- [16] 俞文君.上海都市博物馆研究[D].华东师范大学,2005.
- [17] 胡晚君.现代性视觉机制下的主体危机[D].福建师范大学, 2022. DOI:10.27019/d.cnki.gfjsu.2022.001167.

The Logic of Communicable Landscapes: An Analysis of Visual Experience Mechanisms in the Fujita Museum, Japan

JingHao Chang¹

¹ Northern Arizona University, Flagstaff, USA

Abstract: In an era dominated by social media and visual communication, how art spaces respond to fragmented, image-oriented, and fast-paced visiting behavior has become a central issue. This paper takes the Fujita Museum in Osaka, Japan, as a case study to analyze how it constructs a "communicable landscape" through spatial organization, visual composition, and path design. By emphasizing compactness and visual accessibility, the museum forms a self-contained experiential loop where "viewing is sharing." From the teahouse and courtyard to the exhibition rooms, the museum integrates viewing, interaction, and cultural memory into a concise and photograph-friendly structure. This strategy satisfies both tourists' needs for quick cultural consumption and social display, while preserving the public cultural function of the museum. Furthermore, drawing on critical visual culture theories, this paper reflects on the underlying mechanisms of visual standardization and behavioral regulation embedded in these spaces. It argues that the model of "communicable landscape" offers valuable insights for small and medium-sized art venues seeking transformation under the pressure of platform-driven media logic. The Fujita Museum thus exemplifies a possible balance between visual pleasure and cultural depth, providing a new framework for the adaptive evolution of contemporary art spaces.

Keywords: communicable landscape; Fujita Museum; visual experience; spatial design; art area studies

认知语言学视域下的现代汉泰量词比较研究述评

苏盛滢¹ 孙月红²

(1. 南宁理工学院, 广西 南宁 530100, 2. 广西民族大学相思湖学院, 广西 南宁 530031)

摘要: 量词是汉语与泰语中的共同点, 并且也是两种语言的语言特征之一。由于, 国内目前大部分研究是基于汉语文献的视角出发, 而泰语文献其实对于汉泰量词比较研究存在着不同的认识。通过对比汉语量词和泰语两个方面的文献检索数据, 进而运用对比研究方法、认知语言学理论和词汇语义学理论, 着重对现代汉泰量词的含义、语法特征及语义系统进行比较研究。

关键词: 认知语言学; 量词; 现代汉语; 泰语

基金项目: 广西高校中青年教师科研基础能力提升项目(编号 2025KY1093)

DOI: doi.org/10.70693/rwsk.v1i8.1256

引言

汉语量词与泰语量词同属于汉藏语系, 并且丰富的量词都是现代汉语与现代泰语的语言特征之一。在汉语与泰语中, 量词的使用都较为普遍, 都属于高频率使用的语法, 这些反映了汉泰民族对于认知客观世界的独特性。但是中泰学生还是存在着不同的文化背景, 认识思维方式也存在着差异, 无论是母语中的量词还是第二语言中的量词对于学生来说都会面对着复杂多样的语法特征及语义系统, 也为学生所不能理解, 使得量词成为了他们习得过程中最难的语法点之一。

在实际的教学过程中需要有理论的支撑, 在检索文献后发现关于汉语和泰语语言本体学类的比较文章数量稀少, 无法形成一个理论系统的支撑, 尤其是汉语与泰语的量词比较研究, 进而发现汉语与泰语的量词比较研究十分有必要。同时, 现有的一些汉泰量词比较研究中多是以汉语理论为基础视角, 多以汉语文献为主分析汉泰量词比较, 对于泰语量词本身的泰语理论稍有忽略。本文则希望通过汉语及泰语理论双视角进一步挖掘汉泰量词比较研究及教学中需要的理论支撑, 同时通过汉语及泰语理论双视角, 以便更加多维度的可以对汉泰量词比较研究分析, 形成更加完备的汉泰量词比较研究系统的构建, 进而服务于面对泰国学生的汉语量词教学实践。

1. 基于汉语文献视角下的汉泰量词比较

在中国知网以“汉泰量词”为关键词进行检索后发现与之相关的期刊及论文共计有五十六篇。主要集中在4个方面的相关研究: 一是对汉泰量词进行了一个大体的对比研究, 主要集中在浅析语法搭配比较研究, 分析汉泰量词搭配的异同; 二是类型学下的汉泰量词比较研究。运用类型理论分贝描写、对比了汉泰与量词语义系统, 同时找出了汉泰量词系统共有的以及各自所特有的分类, 基于此提出对于汉语量词的教学建议及策略; 三是泰国留学生或是泰国学生学习汉语量词的偏误分析; 四是仅有的两篇关于认知视阈下的汉泰语量词对比研究, 但是研究对象都是形状量词。通过此研究我们可以得出汉语与泰语形状量词的运用主要是取决于人们理解与把握客观世界和清静的认知能力的结论。

1.1 汉泰量词概述

汉语中关于量词最早的描述是来自于《马氏文通》“故凡物之公名有别称以记数者, 如车乘马匹之类, 必先

作者简介: 苏盛滢(1994—), 女, 博士研究生, 研究方向为汉泰比较研究、汉语教学、区域国别研究;

孙月红(1980—), 女, 副教授, 研究方向为汉语国际教育。

之。”马庆株先生曾经在给何杰老师《现代汉语量词研究》一书作序论时曾写道：“与常用外国语相比，量词是汉语的特点。”并且可以总结到汉语中的量词主要作用是用来表示人、动作或事物数量单位的词，而其中最主要的作用就是表达事物的单位和动作行为的度和量。

裴晓睿(2001)老师用汉语所编著的《泰语语法新编》中提到：“表示事物、行为计算和区分单位的词叫做量词。”

汉语中的量词分类较为繁杂，从中选取三种较为经典以及可靠的分类方法来作为汉泰量词比较研究的理论支撑。首先是黎锦熙(1957)先生在《汉语语法教材》提到的汉语量词分为名量词、动量词和形量词。胡裕树先生从词的功能角度与意义角度出发将汉语量词分为动量词、物量词和度量衡量词。黄伯荣、廖旭东(2017)两位老师的《现代汉语》中提到汉语量词的两大分类即是名量词和动量词，还同时指出在汉语量词中还存在这一些时量词和复合量词。

根据裴晓睿老师所编撰的《泰语语法新编》这一在国内泰语专业中所用的教材中提到泰语量词在泰语中不是写作在我们国内泰语教材中常用的“□:bLRkZ”，而是“x[:TiwYP”，译为分类的量词这也直接说明了泰语对于量词作用的清晰界定，在泰语量词中也是将量词分为两大类动量词与名量词。其中又将名量词分为五大类别分别是个体量词、集合量词、度量词、临时量词和自主量词。[1]

1.2 汉泰量词语法特征

通过一些汉语相关权威的教材及文献我们可以将汉语量词的语法特征总结如下：

1.汉语量词在句子中，汉语量词不能单独充当句子成分，但是量词短语可以作定语、状语、宾语或者补语。

2.量词的搭配构成在汉语语法中又称为量词短语。其中量词短语又可以分类为两种：一种是数量短语，由数词与量词构成，如一把抓住、几件事、看几次等；另外一种是指量短语即指示代词放在量词前面，如这件事、那个人。

3.单音量词一般都可以进行重叠，单独作为句子成分，例如充当定语、状语、主语、谓语，但是与量词短语所区别的是不能做补语和宾语。例句如下：

(1) 条条大路通罗马。(做定语)

(2) 步步高升。(做状语)

(3) 个个都是好样的(做主语)

(4) 繁星点点。(做谓语)

(4) 量词短语中的数量短与也可以进行重叠，格式有“AA”、“AABB”、“一 A 一 A”和“一 AA”共四种。

根据汉语文献及相关汉语所出版的泰语教材我们可将泰语量词语法特征总结如下：

1.泰语量词大部分放在数词的后面。例如 □k@ ɔ̌f (两绳子大象)。

2.泰语量词的存在主要是为了让大家区别各种事物的特性。例如 f@wɔk (一双鞋)f@wɔk k@ (一双鞋中的其中一只)f@wɔk d^ (一只鞋)。

3.泰语量词也存在着量词短语，与汉语量词相同，也分为两种：指量短语和数量短语，放在名词的后面，以便于更加清楚地指代名词。泰语中指量短语的表达为:RkR(名词)+w^;(数词)+□/ɔ̌R /y (指示代词)。泰语中数量短语与汉语相同:RkR 名词+w^;(数词)+□:bEiRkZ(量词)。数量短语以修饰名词为主，也可充当句子成分，做主语、宾语、谓语、状语。

4.泰语中量词短语还可指量词(除度量词外)与形容词、区别词、非谓语形容、动宾结构、介宾结构、中状结构、主谓结构、结构助词。例如 d□@□fw.ZQ\ZMk，按照泰语字面意思是翻译为书本普通，但其实正确的翻译过来应该为这本普通的书。

1.3 “语法化理论”与汉泰量词

沈家煊(1994)在《“语法化”研究纵观》中说明“语法化理论”来自于西方语言学，由法国语言学家 Meillet 提出，指的是语言学中的意义是在词的转化为无实在意义，表达语法功能成分这样一种过程与现象。语法化是历史层面发展的演变过程和现象。同时，在汉语与泰语中存在着名词或少量动词化为量词的过程，这样的—个转变正好可以运用语法化理论进行解释。

1.4 基于认识语言学视角下的汉泰量词语义系统分析

根据英国语言学家克罗夫特 (Croft, W.)、克鲁斯 (Cruse, D.) (2006) 在其著作《认识语言学》一书中提到认知语言学是近 20 年来在国际理论语言学界 (特别是欧美) 新兴的一个语言学学派, 其确立标志为 1989 年春由勒内·德尔文 (Rene Dirven) 组织的在德国杜伊斯堡 (Duisburg) 召开的第一届国际认知语言学大会。此次大会宣布于 1990 年发行《认知语言学》杂志, 成立国际认知语言学协会 (ICLA), 出版认知语言学研究的系列专著。

王寅 (2002) 与英国语言学家克罗夫特 (Croft, W.)、克鲁斯 (Cruse, D.) (2006) 都有对认知语言学进行相关研究并有著作《认知语言学》, 对于认知语言学主要研究的方向总结如下:

(1) 语言研究必须同人的概念形成过程的研究联系起来。

(2) 词义的确立必须参照百科全书般的概念内容和人对这一内容的解释 (construal)。

(3) 概念形成根植于普遍的躯体经验 (bodily experience), 特别是空间经验, 这一经验制约了人对心理世界的隐喻性建构。

(4) 语言的方面都包含着范畴化, 并以广义的原型理论为基础。

(5) 认知语言学并不把语言现象区分为音位、形态、词汇、句法和语用等不同的层次, 而是寻求对语言现象统一的解释。

通过中国知网对于关键词“认知语言学”与“汉语量词”的搜索, 找到相关的文献共计六篇。主要有三个角度进行相关的分析与研究: 一是认知理论对于对外汉语量词教学中的启示; 二是关于认知视阈下的汉语形状量词对比研究, 仅有一篇; 三是汉语量词认知研究。

陈妹新 (2016) 的《认知视阈下的汉泰语形状量词对比研究》从认知视角浅析现代汉语与泰语中具有代表性的 16 个汉语形状两次与对应的 15 个泰语形状量词为研究对象。从认知视角进行对比研究, 探究其之间的共性交集和个性差异, 同时总结认知理论指导下对泰汉语形状量词的教学建议。

2. 基于泰语文献视角下的汉泰量词比较

通过泰国版知网 Thailis 和 Thaijo 检索关键词“汉泰量词”“汉语量词”“量词”等, 找出相关文献共计有 63 篇。主要有五个研究方向: 一是研究泰国某一地区的泰语量词, 例如北部泰语量词、南部泰语量词等。二是泰语量词历史溯源, 对泰语量词的历史变迁进行相关的整理; 三是日泰量词比较研究, 量词也是日语的语法特征之一, 因此在今后的研究中对于汉泰量词比较研究也可借鉴一下日泰量词比较研究的研究方法; 四是泰语量词教学研究。主要集中在小学或者中学教学中的研究。五是汉泰量词比较研究, 总共只有 4 篇。

Rk@ck' □RPē (2000) ē[cOkU^ k]:bkwTē[Sw-Š[S-□:bLRkZzRYkbkĪR: ^k@□SYkbk{P[《现代汉语量词考察与泰语量词比较研究》分析汉语的量词类别及语法特点, 比较研究汉泰量词语法特征, 主要涉及三个方面: 位置 (搭配)、分类和数词量词。

2.1 泰语量词概述

MĀC' P \Li: \ Ykb {P[□S:k□fck\ (2016) 一书中是这样解释泰语中的量词 “Ykbk{P[□-□:bLiRkZ@w:RRkZ-ŠSf:□:bLi:f@RkZk@dk□:bLiRkZ□z□d^k[fk@ ”(泰语有量词, 其作为名词的附类, 名词放在量词的前面有许多种使用搭配方法。)

2.1.1 起源概述

Rk@d^@ @ŭŌ:ō (1985) 总结到泰语起源于素可泰时期, 并且将泰语量词的来源分为两大类:

(1) 量词来源于名词, 名词语法化

a. 名词的本身作自己的量词

例如 w&f@ 5 w&f@ (城 5 城) Tĭ 2 Tĭ (门 2 门)

b. 非名词本身作量词, 但是仍然来源于名词

例如 @ 3 wZN\ (高 3 米)

(2) 量词来源于动词。与动词相匹配, 但需要模糊动词原来的本义。

例如 w:□kUZ 5 w:□k (盘头发 5 个)

而上述观点与步连增 (2011) 所提到的汉语量词起源的一个观点——记忆辅助说具有一定的相同性, 汉藏语系中存在反响型量词 (echo classifier), 又称拷贝型量词, 反身量词, 回应量词等, 指被修饰或限制

的名词或动词形式相同或部分相同。比如傣语中的房间三房间。同时,游顺钊认为“在量词出现以前,当在一个数量名词结构中表达书目的字相当多时(如人万三千八十一人)”。

âĒ[P @d.f (1982) 提出表量或句法的需要说。名词与其他附属名词组合在一起,是为了表现现状、特征、尺寸或者使其他事物表量更加清晰。这个说法与周法高(1959)所提到过量词的出现是因为觉得“名词+数词”的表现法还不够清晰可以相对应。

□Pǎ`@ũ W@ {W^? (1989) 提到泰语量词来源与汉语量词起因相同,部分量词用法相近,并且在其他的语言中也有一些相似的量词,例如马来语、缅甸语等。

2.2.2 泰语量词特点

Sirasa chalainanont (2011) 在 :k\wTē[Swǎ[-□:bLRkZYkbbĪR□S□:bLkZYkbb{P[!z□↗Z□SRkZ (汉泰量词比较研究) 总结泰语量词特点如下:一是泰语的部分词汇有固定的量词,不能使用其他量词进行替代。例如 wǎf (锯子)——ĒR (把);二是一个量词可以用于多个名词。相同的一个名词也可以搭配多个量词;三是一些名词与量词有联系,但是也有一些量词与这个名词没有任何联系或者规律。四是部分抽象的事物在泰语中没有量词,例如景色、环境、声音等。

:kFARk Rk=aa^(2015) 在 :k\z□Ykbb (语用) 同一个名词,在不同情况下,搭配的量词也不相同。例如:“□k@ ”(大象)如果表示御驾使用的大象量词则还是使用“□k@ ”。如果是普通情况见到的象,则使用 wǎf (绳),但如果是在森林里、丛林里见到的象,则使用“ (头)。

2.2 汉泰量词分类比较

R\ŶLŶRwZQk (1984) 提到泰语量词分类主要是通过名词和动词扩展出来的。可以根据名词的常态进行分组,比如人类、动物、无生命事物、神佛等。无生命事物的量词会单独进行分类,比如根据外貌形状、品种,以及一些特性相近的事物。通过泰语量词的分类,我们也可以看到泰国及泰语对于进行组合事物的标准是什么。

YANG LIZHOU (2005) 进行的分类

(1) 名量词

可数名词量词

具象事物量词

单个量词(人类、动物、方位、事物、植物)

组合量词

单独抽象的名词

复数具体名词(与人类、植物、事物相组合)

(2) 动量词

2.3 泰语量词搭配研究

TiĀPâ cZ (1990) 总结的泰语量词搭配

1.:k (动词) + -□:bLRkZ (量词)

2.:R`Z□S (数量词) + -□:bLRkZ (量词)

3.:R`Z□S (数量词) + :R`Z□S (数量词) + -□:bLRkZ (量词)

4.:R`Z□S (数量词) + -□:bLRk (量词) + -RkZ (名词)

5.-RkZ (名词) + :R`Z□S (数量词) + -□:bLRkZ (量词)

6.-RkZ (名词) + -□:bLRkZ (量词) -RkZ (名词)

根据其他的泰语量词的相关文献及泰语语法书对于泰语量词搭配特征还可以进行如下总结:一是与人类名词进行搭配的量词,会根据性别、年龄、职业、阶级地位、品性来选择相应的量词,甚至连前辈、贤者、社会地位高的人所使用的量词都会有所区别;二是佛陀、神仙、鬼怪所搭配使用的量词也会有所区别;三是植物的量词搭配还会根据植物的不同部分来选择搭配,例如玉米中的整个玉米与玉米头部所使用的量词就是不一样的。

3.研究过程所需语料来源汇总

- 3.1 北京大学汉语语言学研究现代汉语语料库;
- 3.2 朱拉隆功大学现代泰语语料库;
- 3.3 其他语料来源相关研究文献、著作以及部分语料对话;
- 3.4 根据现在汉泰语语法自行造句。

结语

通过相关的文献研究综述后,对于认知语言学理论应用于汉泰量词的研究思路的脉络逐渐清晰。认知语言学被认为是词及更大的语言单位进入无限知识网络的入口,并且认知语言学中认为量词的使用主要取决于人的认知结构,是隐喻思维在语言中的再现形式。认知语言学家从神经学 Edelman (1992) 和认知心理学家 Rosch-Lloyd (1978) 中证明了这一观点。在各种认知能力中,一个主要的和普遍的认知能力是想象 (imagination),即把一些概念投射到另一些概念中去。这就是为什么想象机制的隐喻和转喻会成为认知科学家研究的重点之一,认知隐喻、认知转喻以及规约意象是量词范畴化的动因认知基础。认知语言学在汉泰量词间的运用是旨在强调量词的各个义项之间的内在联系,以及汉泰量词语法的系统性。

基于认知语言学理论分析后的汉泰量词比较研究运用到汉泰量词教学实践中,首先是可以更加系统性的教授汉泰量词,其次是便于学生运用图式理论分解分析汉泰量词的语法点,同时建立基于意象图式的语义家族系统。还可以使学习者提高自学的自觉性,无论是在课前还是课后都会提升对于汉泰语量词学习的兴趣,并且在课后还可以自行总结归纳更适于自己记忆的量词分类并对于汉泰语量词进行比较记忆,同时掌握各个语义义项之间的联系。认知语言学理论指导下的汉泰量词教学,更加进一步的提高了教师教学过程当中的跨语言文化意识。

参考文献:

- [1] 裴晓睿.泰语语法新编[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1.
- [2] 袁焱,龙伟华.汉泰名量词比较研究——从泰国学生偏误谈起[J].云南师范大学学报,2006,(01):75-79.
- [3] 曹鹏.语言类型学视野下汉泰动量词对比及其在对泰汉语教材中的应用研究[D].鲁东大学,2024.
- [4] 张赅.类型学背景下的汉泰语量词语义系统对比和汉泰量词教学[J].世界汉语教学,2009,23(04):508-518.
- [5] 王博,王军.百年汉语量词研究述评[J].宁夏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20,42(01):21-28.
- [6] 张鹭.从认知角度探讨对外汉语量词教学策略的建构[J].黑龙江高教研究,2011,(03):178-180.

A Review of Comparative Studies on Quantifiers in Modern Chinese and Thai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Cognitive Linguistics

Su Shengying¹, Sun Yuehong²

¹ Nanning College of Technology, Nanning, GuangXi 530100, China

² Xiangsihu College of GuangXi Minzu University, Nanning, GuangXi 530031, China

Abstract: Quantifier is a common denominator in Chinese and Thai, and it is also one of the linguistic characteristics of the two languages. However, most domestic studies are based on the perspective of Chinese literature, while Thai literature has different understandings on the comparative study of Chinese quantifiers and Thai quantifiers. By comparing the literature retrieval data of Chinese quantifiers and Thai quantifiers, and using the comparative research method, cognitive linguistics theory and lexical semantics theory, this paper focused on the comparative study of the meaning, grammatical characteristics, and semantic system of quantifiers in modern Chinese and Thai.

Keywords: Cognitive Linguistics; Contemporary Chinese language; Thai language; Quantifier; Comparative

浅析漏窗及其纹样美学

井怡然¹

(1.北京林业大学, 北京 100089)

摘要:在中国古代园林建筑中,花窗是建筑窗户的一种装饰和美化形式,它既具备实用的功能,又拥有装饰功能,其中蕴含的艺术观赏性、审美情趣性和文化内涵极大丰富了人们的精神世界,体现了中华民族的文化底蕴。

关键词:漏窗;纹样;建筑美学;中国园林建筑

DOI: doi.org/10.70693/rwsk.v1i8.1259

花窗在历史的发展中推演出了许多种类,从其表现形式上来看,花窗可被分为漏窗,洞窗,景窗三类^[1],其中漏窗的造型最为丰富多变,由明朝计成所著的《园冶》中共记录了4000余种漏窗图案,足以见其形态多样,历史悠久。

一. 漏窗的简述

漏窗又被成为漏花窗,顾名思义窗洞内有漏空图案的窗即为漏花窗,它既有通风采光的作用,又可以使密闭的空间视野开阔,减缓或免除狭小空间的闭塞感,增加空间的层次感,通过移步换景起到极强的装饰作用,在苏州古典园林中极为常见。在《园冶》卷三的《墙垣》中,有这样一段关于漏窗的描述:“凡有观眺处筑斯,斯避外隐内之义。古之瓦砌连线、叠锭、鱼鳞等类,一概屏之,聊式几于左。”^[2]其意思大致为但凡是可供欣赏的墙外风景,都可以建造漏窗,它有避外隐内的意思。古代用砖瓦堆砌连线,叠锭、鱼鳞等类别,这里一概摒弃,绘制成左图(图1-1所示)的形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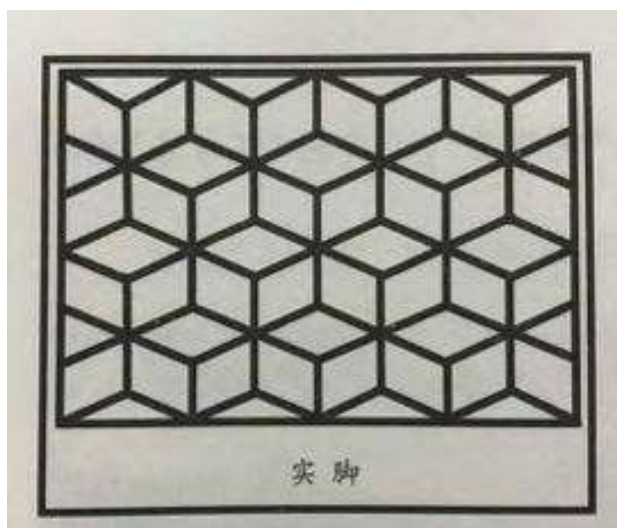


图 1-1

二. 漏窗的类别及功能

作者简介:井怡然(2004—),女,本科生,研究方向为环境设计、非遗文化传播与空间融合、可持续设计。

2.1 漏窗的类别

在我国的古园林建筑中,漏窗是一种特殊且普遍的装饰形式,这是装饰在南方地区尤为显著,由于园林所处地理位置不同,拥有者所处社会阶级不同,制作漏窗的材料也有所不同,但主要可以分为瓦砌漏窗,砖细漏窗,灰塑漏窗等等。其中瓦砌漏窗和砖细漏窗在园林中运用更多。瓦砌漏窗(如图 2-1 所示)是制作漏窗的最传统的做法,一般使用望砖作为边框,选用瓦片、木片、竹筋(或铁片、铁条)等作为窗芯,各个构件之间选用麻丝纸筋灰浆粘结,使边框和窗芯融为一体,并在其顶部设置有过梁;^[3]。砖细漏窗(如图 2-2 所示)顾名思义是由砖细构件构成的,其以油灰作为为粘结材料,适当的加以竹梢、钢丝等材料粘结各个构件。灰塑漏窗(如图 2-3 所示)是以纸筋灰浆为主要材料制作而成的漏窗,边框的搭设与砌窗相似,中间的图案的骨架以铁丝等材料构成,并佐以纸筋灰浆制作而成。



图 2-1



图 2-2



图 2-3

2.2 漏窗的功能

漏窗作为窗户的一种,其首先起着通风、采光等所有窗户均具有的基本作用;其次,漏窗设计通常采用几何形态来表现,要求设计者具有丰富的想象力和精细的雕刻技艺,因此被视为一种装饰艺术,有着透景和为墙面增添美感等艺术装饰层面的作用,既不完全暴露,又不完全遮挡,给人以可望而不可及之感。其装饰作用旨在使室内外景色形成呼应、相得益彰,以增加园林的视觉层次与空间感,使住客和游人在室内也能欣赏到室外的美景,透过漏窗观赏园中的景色,虚实相间、步移换景,可达到景中有画,画中有景的艺术效果。^[4]

三、漏窗的特征及图案

3.1 漏窗的特征

漏窗的特征顾名思义突出在“漏”,窗洞内设有镂空图案是其的典型特征,暗含了其宗旨为虚实结合。漏窗的位置灵活多变,多建于园林的廊、墙之上。高度约 1.5 米,与人的视线平齐,方便游人观赏游玩。

3.2 漏窗的图案

漏窗的图案极为丰富,《营造法原》中记载道“园林墙垣,常开空宕,以砖瓦木条构成各种图案,中空谓之花墙洞,又称漏墙、漏洞,方便远眺,有避外隐内之意。花墙造型不一,或方,或圆,或六角,或八角,或扇形,或叶形等,窗框内的构图又因用材不同而异,造园构形,更无限制,可随造园者之匠心,而成精美之花纹”。^[5]其中就描述了漏窗的图案之丰富,形态之各异,细节之精美。

3.2.1 漏窗窗框图案

漏窗窗框的形式多种多样,据总结可将其分为两类,一类是由简单的几何形体(如图 3-1 所示)组成的,一类是由多个形体组合而成的复杂形体(如图 3-2 所示)。简单的几何形体有矩形、圆形、多边、扇形等等。复杂形体的形态就比较丰富多样了,有多种几何形态组合成的花纹,也有以常见生活用品器具或自然动植物为主题的花纹。^[6]园林讲究日涉成趣,因此,即使再狭小的空间,人们也要做出不同的漏窗形态,以供人欣赏。漏窗窗框

的形式多与环境或功能呼应,比如建筑傍水则临水的漏窗呈现出荷叶或鱼等形状;建筑依山则靠山的漏窗呈现竹子、小鹿等形状;饮茶之处的漏窗做出茶杯茶壶等形状;读书温习之所的漏窗呈现出书本砚台等形状。但位于走廊部分的漏窗窗框大多以矩形为主,其形状大小间距都相似或相同,这样的设置使廊道在视觉上更加具有流通感,更具有节奏感和音韵美,以弱化空间的闭塞感。



图 3-1



图 3-2

3.2.2 漏窗窗芯图案

比起漏窗窗框的图案,窗芯的图案更为丰富,其图案同样可分为几何纹样(如图 3-3 所示)和自然纹样(如图 3-4 所示)两类,但也会有两种纹样混合运用的情况。几何纹样为主的图案形式有套方、曲尺、回文、万字、冰纹等,其多用瓦片、薄砖、木竹材等制作。^[7]以冰裂纹、冰梅纹、回字纹为代表,多分割规整,排列规律。自然纹样的取材范围十分广泛,题材多托物言志,多采用象征吉祥或风雅的动植物和人物故事等等为原型,象征寓意人们的美好愿景与期盼,蕴含着造园者的思想情感与内涵品格。

3.2.2.1 几何纹样

几何纹样中造园者多采用卍字纹、冰裂纹等等自然符号来表达对自然现象的崇拜与敬畏。这些自然符号都是通过自然形态发展来的,通过不断地抽象变化而成,通过这些图案象征太阳,火,宗教等等。

3.2.2.2 自然纹样

漏窗窗芯的自然纹样以吉祥为主,人们在选取纹样时多选择瑞兽。其中“四灵”:龙、凤、龟、麒麟在漏窗窗芯自然纹样的选择中占据重要地位,人们运用这些吉兽图形表达出对驱灾求福的追求。蝴蝶象征着美好生活,作为自然界常见的昆虫之一,也是常见的自然纹样之一,造园者通过蝴蝶来表达自己对美好生活的期盼和对长乐永康的向往。蝙蝠象征着多福,它的“蝠”与“福”同音,寓意有福,幸福,同时蝙蝠也象征着长寿,具有“福寿绵长”之意。因此被广泛运用于漏窗中。

花卉纹样在漏窗中也得以广泛运用,“花”通“华”《说文解字》中记载:“开花,谓之华。又曰:五色为之夏。”花,包涵中华民族的审美理想,华夏就是五种颜色的花朵。^[8]漏窗窗芯中常见的花卉纹样有牡丹纹、梅花纹、荷花纹、石榴纹、葡萄纹等等。牡丹象征荣华富贵和繁荣昌盛,受世人喜爱;梅花象征贞洁坚韧,表达出高尚的品格节操;荷花寓意洁身自好、品格纯洁高尚;石榴和葡萄则是多子,寓意多子多孙。这些被选用的花卉纹样大多饱含吉祥寓意,反映出人们的期许与向往,同时也蕴藏着博大精深的中国文化。

汉字也经常被选作为自然纹样出现在漏窗中,这些汉字纹样多以图案化的形式表达,以达到和谐美观的效果,如“福、禄、寿、喜”,满足了人们想要多福多喜多禄多寿的心理。



图 3-3



图 3-4

四. 漏窗的美学思考

4.1 漏窗的节奏美

在苏州古典园林中,造园者通过精心布置漏窗,巧妙地利用它们在厚重的园墙上的排列和布局,创造出一种独特的节奏美。漏窗不仅使得园林空间显得通透轻盈,还形成了充满动感的视觉路径,引导游客在园林中畅游,不断发现新的美景和景观。这不仅令人感受到空间的流动和变化,同时也激发了游客的美感和审美享受,使他们沉浸在园林独特的艺术氛围中。

漏窗常以廊、墙为载体,以点的形式呈现,大致可分为以下三种类型。一,单点排列,常布置在廊道尽端或过渡性转角空间中,使得漏窗成为空间的焦点,突显出廊道或转角的特殊性,同时通过漏窗的开口,引导视线和空气流动,增加空间的开放感和通透感。二,四至六点连续排列,常布置在连接相邻空间的廊道中,或院落隔墙之上,在视觉上形成连贯的线条,也在功能上增加了漏窗的覆盖面积和装饰效果,为相邻空间之间的过渡增添了一种连续性和流动性。三,多点排列,常布置在连接或划分园林区域性空间的游廊中,创造了连续的视觉动线和空间分隔,同时也通过漏窗的多样性和密度,丰富了游廊的景观体验和空间感受,使整个园林更加富有层次和变化。

4.2 漏窗的形式美

漏窗的形态样式极具美感,不仅如此,漏窗中的景色也别具一格,以窗棂做画框,自然做画布。为了更好地与园林景观融合,园林廊道和墙壁上的漏窗通常选择素雅的灰白色调。而室内建筑中的漏窗则多采用原木色、深红色或褐色调,整体搭配清新自然,营造出宁静而雅致的氛围。

在苏州古典园林中,花窗装饰艺术是精神与审美的完美结合体现。这些装饰图案不仅丰富多彩,而且源于对外部世界的深刻观察和感悟。造园者从外部事物中汲取形制、情致和神韵,将其内化为理想化的形象,然后再通过具体的装饰图案进行外化呈现。这些图案不仅是造园者内心理想的真实反映,同时也反映出当时社会的审美趣味和价值取向,值得深入考究。

参考文献:

- [1] 焦晓晴.苏州古典园林花窗造景艺术研究[D].安徽:安徽工程大学,2022:10-16
- [2] (明)计成.园冶[M].北京:中华书局,2011.
- [3] 郑湘阳.北京皇家园林与苏州私家园林花窗艺术比较研究[D].南京林业大学,2012.
- [4] 陈絮,钱永宁.苏州留园漏窗的视觉符号转化[J].中国建筑装饰装修,2023,23(18):114
- [5] 姚承祖.营造法原[M].北京: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1986:59
- [6] 焦晓晴.苏州古典园林花窗造景艺术研究[D].安徽:安徽工程大学,2022:12-13
- [7] 于友先.中国大百科全书-第2版:建筑园林城市规划.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2009年
- [8] 曹林娣.透风漏月—花窗[M].北京:中国电力出版社,2021:56.

A Brief Analysis of the Aesthetics of Leak Windows and Their Patterns

Jingyiran¹

¹Beijing Forestry University, Beijing 100089, China

Abstract: In ancient Chinese garden architecture, flower windows are a form of decoration and beautification of architectural windows, which have both practical and decorative functions, and the artistic ornamentation, aesthetic interest and cultural connotation contained in them greatly enrich people's spiritual world and reflect the cultural heritage of the Chinese nation.

Keywords: Leaky windows; patterns; architectural aesthetics; Chinese garden architecture

中小型主题公园的服务质量与品牌资产、游客满意度、目的地形象间的影响关系研究

武 扬¹ 张蒙蒙¹ Sangguk Kang¹ 汤 亮²

(1. 韩国国立江陵原州大学, 韩国 江陵 25457, 2. 安徽铜陵学院, 安徽 铜陵 244000)

摘 要:近年来, 国内外大型主题公园集团纷纷宣布加大投资力度, 在巩固一线大都市业务的同时, 加速向二、三线城市布局。面对大型主题公园的强劲扩张态势, 作为市场弱势群体的中小型主题公园, 其生存与发展空间愈发受限。在此背景下, 如何实现高质量发展、如何赢得游客青睐、以及如何打造具有独特价值与市场影响力的品牌, 已成为中小型主题公园经营者亟需思考与解决的核心问题。基于此, 本研究以访问过“开封万岁山武侠城”的国内游客为调查对象, 采用实证分析方法, 探讨作为中小型主题公园核心要素之一的服务品质对品牌资产、游客满意度及目的地形象的影响关系。研究结果表明: 员工服务与信息服务显著影响品牌形象; 信息服务、配套设施及游乐项目对品牌认知度具有正向作用; 信息服务与配套设施显著影响游客满意度; 品牌资产对游客满意度具有直接影响; 品牌资产与游客满意度均是塑造和提升目的地形象的重要因素。本研究不仅为后续相关领域的学术研究提供了重要的理论依据, 也为中小型主题公园经营者及地方政府部门提出了切实可行的实践策略——以提升服务质量推动主题公园发展, 以主题公园品牌影响力促进地方经济活力。通过政企协作与资源整合, 可实现主题公园的可持续发展, 并为地区文化、旅游及经济的多元化发展提供有力支撑。

关键词: 中小型主题公园; 服务质量; 品牌资产; 游客满意度; 目的地形象

DOI: doi.org/10.70693/rwsk.v1i8.1274

一、绪论

主题公园作为集休闲、娱乐、美食与观光功能于一体的综合性旅游度假区, 凭借多样化的体验项目, 深受全球游客喜爱。根据 AECOM 与 TEA 联合发布的《2023 全球主题公园和博物馆报告》显示, 2023 年全球排名前十的主题公园集团共接待游客 5.12 亿人次, 较上年增长 30%; 全球前 25 名主题公园游客总量达 2.45 亿人次, 同比增长 23%。这一增长趋势在中国市场同样表现突出。2023 年, 中国 86 家大型及特大型主题公园共接待游客 1.3 亿人次, 同比增长 71.84%, 营业收入达 303.89 亿元, 接近上一年的两倍。

庞大的消费基础、持续增长的经济水平和不断提升的生活质量, 成为推动中国主题公园高速发展的关键因素。与此同时, 国际品牌也逐步认识到中国市场的巨大潜力, 乐高乐园、哈利·波特制片厂之旅、小猪佩奇户外主题乐园等纷纷宣布将进驻中国。这些国际品牌依托其强势 IP 在中国具有较高的知名度和影响力, 进一步加剧了主题公园市场的竞争格局。

拥有强大品牌资产的主题公园不仅能够持续吸引大量游客, 还能带动当地相关产业的发展, 甚至对周边城市产生辐射效应。例如, 迪士尼乐园、环球影城、长隆海洋王国、爱宝乐园、鲁斯特欧洲公园等国内外知名主题公园, 在推动地区经济、增加就业岗位和提升地区形象等方面发挥了积极作用。凭借品牌影响力和优质服务, 大型主题公园的市场份额不断扩大, 而中小型主题公园则面临盈利能力下降、可持续发展难度加大的困境。为应对日

作者简介: 武 扬(1997—), 男, 博士研究生, 研究方向为中小城市旅游、旅游市场营销、节庆活动;

张蒙蒙(1995—), 女, 博士, 研究方向为城市旅游、生态旅游、主题公园;

Sangguk Kang(1981—), 男, 博士, 副教授, 博士生导师, 研究方向为旅游资源学、旅游开发学;

汤 亮(1979—), 男, 博士, 讲师, 研究方向为数字经济、战略管理、文化产业。

通讯作者: Sangguk Kang

趋激烈的市场环境，中小型主题公园正在试图通过提升服务质量来增强游客满意度，进而建立品牌信任，促进游客的再访和口碑传播。

目前关于主题公园服务质量的相关研究多以大型主题公园为对象，其研究成果在中小型主题公园上的适用性尚有局限。因此，本研究以中国具有代表性的中小型主题公园——开封万岁山武侠城为案例，通过实证分析探讨服务质量在品牌资产构建中的作用，并进一步分析服务质量对游客满意度及品牌资产的影响关系，并考察这些变量是否对目的地形象产生间接作用。研究结果旨在为提升中小型主题公园市场竞争力提供实践路径，同时为地方政府在制定相关扶持政策方面提供理论参考与实证支持。

二、理论性背景

（一）服务质量

围绕服务质量的多维度研究在各学科领域持续推进，不同的研究视角导致学者们对服务质量的解读略有差异。Kurniawan 等^[1]认为，服务质量是指公众期望的服务与实际接受的服务之间的差距程度，提供符合公众需求的高质量服务对于保障顾客满意度至关重要。Dewi 等^[2]则指出，服务质量是消费者对组织及其服务相对优劣的主观感知，高质量服务不仅能增强游客的重访意愿，也有助于提升旅游目的地形象。由此可见，准确理解消费者的期望是提供优质服务的前提，这一原则适用于所有类型的服务组织。

此外，已有研究指出，主题公园的服务大致可分为两个维度：一方面是游客通过主题公园这一服务产品所获得的效用，即“技术性服务”；另一方面是服务的提供方式，即“功能性服务”^[3]。换言之，主题公园服务由配套设施、游乐项目、演出活动等构成的技术性服务，与员工服务、信息服务等功能性服务要素共同组成。구원일^[4]将员工服务、配套设施与信息服务作为影响主题公园服务质量的重要因素进行研究，并指出这些因素均会对游客的信任度与口碑产生影响。한진옥等^[5]则认为，员工服务、价格、演出活动、游乐项目是影响服务质量的关键因素，且实证结果显示，这些因素对情感价值有显著影响，对经济价值有部分影响，进而影响游客的再次访问意图。综合以上研究成果，本研究将主题公园的服务质量定义为，游客对其期望与实际体验之间差异的主观感知。同时，将员工服务、信息服务、配套设施、游乐项目及演出活动作为核心变量加以探讨。

（二）品牌资产

品牌是承载产品或服务独特价值的重要载体，企业通过塑造鲜明的品牌形象，实现与竞争对手的有效区隔，从而获取并维持自身的竞争优势。当消费者对某一品牌产生认知，并在亲身体验或外部环境的影响下形成积极、独特且深刻的印象时，便构成了品牌资产。유춘운^[6]将品牌资产定义为，当旅游目的地被游客视为品牌时，游客通过与其他目的地的对比，为该目的地赋予的独特的无形资产与综合价值。研究还通过实证分析发现，品牌认知度、品牌形象与感知质量是影响游客满意度的关键因素。진신等^[7]在地方节庆研究中，则将品牌资产界定为地方节庆质量水平及其评估结果所形成的成果，且其评价可能因个人偏好与判断标准的差异而有所不同。研究还指出，成熟的品牌资产有助于塑造积极的地区形象。基于先行研究，本研究将主题公园的品牌资产定义为，游客在体验过程中所感知的优质服务与独特价值，促使其对品牌的信任、认同与忠诚，从而在品牌本体价值之外所形成的无形资产与附加价值。此外，本研究将品牌形象与品牌认知度作为品牌资产的核心维度进行研究。

（三）满意度

游客满意是指游客在购买旅游产品、接受服务以及参与旅游活动的过程中，基于个人经验所形成的一种主观心理状态。这一心理状态来源于游客对旅游活动所能带来结果的期望与实际体验之间的比较与评估^[8]。游客满意度不仅反映旅游体验的整体接受度，也是预测其后续行为（如再次访问或推荐他人）的重要指标，因此在多个研究领域中广泛作为结果变量使用。鉴于其在解释游客行为意图方面的重要作用，本研究将满意度定义为，游客对旅游场所整体体验优劣程度的心理评价。换言之，游客的体验感知越积极，满意度越高；反之，则满意度越低。

（四）目的地形象

Crompton^[9]于1979年提出的目的地形象定义，在旅游领域研究的早期阶段被广泛采用。他认为，目的地形象是个体对某一旅游地所形成的信念、观念与印象的综合体。有研究指出，目的地形象在游客行为中发挥着两项关键作用：一方面，它影响游客在目的地选择过程中的决策判断；另一方面，它还作用于游客作出选择后的行为反应，包括实际参与、评估以及未来的行为意图^[10]。虽然大量研究聚焦于目的地形象对游客满意度的影响，但也有学者指出，游客满意度亦能够影响其对目的地的整体印象，既目的地形象^[11]。为验证这一可能的因果路径，本研究将旅游目的地形象定义为，游客基于在旅游地的实际体验所形成的对该地区的个人态度，这种态度一旦形成，

短期内难以轻易改变。

三、研究设计

(一) 研究模型

本研究旨在探讨中小型主题公园的服务质量与品牌资产、游客满意度、目的地形象间的影响关系。为此，在前期研究的基础上设定了如图 1 所示的研究模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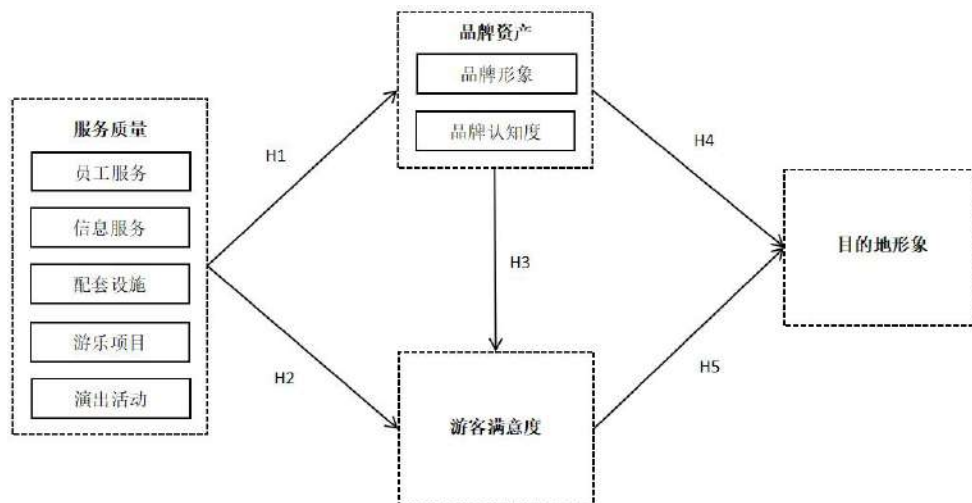


图 1 研究模型

(二) 研究假设

假设 1: 服务质量对品牌资产具有正向(+)影响。

假设 2: 服务质量对游客满意度具有正向(+)影响。

假设 3: 品牌资产对游客满意度具有正向(+)影响。

假设 4: 品牌资产对目的地形象具有正向(+)影响。

假设 5: 游客满意度对目的地形象具有正向(+)影响。

(三) 数据收集与分析方法

为实现研究目标，本研究对服务质量（员工服务 5 个问题；信息服务 3 个问题；配套设施 4 个问题；游乐项目 4 个问题；演出活动 4 个问题）、品牌资产（品牌形象 4 个问题；品牌认知度 4 个问题）、游客满意度（4 个问题）与目的地形象（5 个问题）四个核心变量的相关文献进行了梳理，并据此编制出了符合研究方向的调查问卷。问卷采用李克特五点量表（1=完全不同意，5=非常同意）进行测量。调查于 2025 年 7 月 21 日至 2025 年 8 月 2 日期间实施，调查对象为最近两年（2023 年 7 月至 2025 年 7 月）期间曾到访开封万岁山武侠城的国内游客，填写方式为通过问卷星程序线上填写。问卷共回收 373 份，剔除重复和无效问卷后，最终将 327 份有效样本使用 SPSS 26.0 分析软件进行统计分析。

四、实证分析

(一) 样本的一般特性检验

为了解样本的基本人口统计特征，进行了频率分析，结果如下。性别分布：男性为 107 人（32.72%），女性为 220 人（67.28%）；年龄分布：18-29 岁为 61 人（18.65%），30-39 岁为 114 人（34.86%），40-49 岁为 83 人（25.38%），50-59 岁为 37 人（11.31%），60 岁及以上为 32 人（9.79%）；职业：学生为 61 人（18.65%），公司职员为 86 人（26.3%），公务员/军人为 47 人（14.37%），农业/畜牧业/渔业从事者为 28 人（8.56%），企业家/个体经营/管理者为 17 人（5.2%），专门职业者（医生、教师、律师、工程师等）为 40 人（12.23%），退休及自由职业者为 32 人（9.79%），其他职业为 16 人（4.89%）；月收入：不足 3000 元为 54 人（16.51%），3000-5999 元为 96 人（29.36%），6000-8999 元为 88 人（26.91%），9000-11999 元为 41 人（12.54%），12000 元及以上为

48 人 (14.68%) ; 同伴类型: 独自为 113 人 (34.56%) , 与家人同行为 44 人 (13.46%) , 与朋友/同事同行为 74 人 (22.63%) , 与恋人/伴侣同行为 57 人 (17.43%) , 团体同行为 39 人 (11.93%) ; 信息获得途径: 社交网络为 135 人 (41.28%) , 他人 (家人、朋友等) 推荐为 82 人 (25.08%) , 广告宣传为 51 人 (15.6%) , 新闻媒体为 36 人 (11.01%) , 其他为 23 人 (7.03%) 。

(二) 信度与效度分析

分析结果显示, 各因素的 Cronbach's α 系数介于 0.814 至 0.870 之间, 且各测量项目的 CITC 值均高于 0.5, 表明测量项目之间具有良好的内部一致性与相关性, 研究数据具有较高的信度。此外, 所有测量项目的共同度均超过 0.5, 说明其能够较好地解释各自所属的潜在因子。KMO 值均大于 0.8, Bartlett 球形度检验结果的 p 值均小于 0.05, 说明数据非常适合进行因子分析。旋转后各因素的累计方差解释率超过 65%, 表明提取的因子具有良好的解释力。综合上述, 各潜在变量的设定合理, 研究模型具有良好的结构适配度。

(三) 假设验证

1) 假设 1: 服务质量对品牌资产具有正向(+)影响。

如表 1 所示, 员工服务、信息服务会对品牌形象产生显著的正向影响关系, 但配套设施、游乐项目、演出活动并不会对品牌形象产生影响关系。信息服务、配套设施、游乐项目会对品牌认知度产生显著的正向影响关系, 但员工服务、演出活动并不会对品牌认知度产生影响关系。因此, 假设 1 被部分采纳。

表 1 服务质量对品牌资产的影响验证

从属变数	独立变数	非标准化系数		标准化系数	t	p-value	共线性诊断	
		B	标准误差	Beta			VIF	容忍度
品牌形象	常数	2.072	.278	-	7.446	.000**	-	-
	员工服务	.134	.050	.152	2.666	.008**	1.213	.825
	信息服务	.157	.052	.185	3.028	.003**	1.385	.722
	配套设施	.089	.053	.092	1.687	.093	1.113	.898
	游乐项目	.093	.051	.108	1.808	.072	1.341	.746
	演出活动	-.000	.058	-.000	-0.003	.997	1.320	.758
	R ² =.139,调整后的 R ² =.125,F=10.349,p=.000***,Durbin-Watson=1.822							
品牌 认知度	常数	1.508	.293	-	5.151	.000**	-	-
	员工服务	.059	.053	.061	1.107	.269	1.213	.825
	信息服务	.172	.054	.185	3.155	.002**	1.385	.722
	配套设施	.236	.056	.224	4.248	.000**	1.113	.898
	游乐项目	.168	.054	.180	3.120	.002**	1.341	.746
	演出活动	-.024	.061	-.023	-0.397	.692	1.320	.758
	R ² =.199,调整后的 R ² =.187,F=15.955,p=.000***,Durbin-Watson=2.024							
*:p<.05,**:p<.01,***:p<.001,下同								

2) 假设 2: 服务质量对游客满意度具有正向(+)影响。

如表 2 所示, 信息服务、配套设施会对游客满意度产生显著的正向影响关系, 但员工服务、游乐项目、演出/活动并不会对游客满意度产生影响关系。因此, 假设 2 被部分采纳。

表 2 服务质量对游客满意度的影响验证

从属变数	独立变数	非标准化系数		标准化系数	t	p-value	共线性诊断	
		B	标准误差	Beta			VIF	容忍度
游客 满意度	常数	2.104	.294	-	7.154	.000**	-	-
	员工服务	.044	.053	.048	0.826	.410	1.213	.825
	信息服务	.131	.055	.147	2.387	.018*	1.385	.722
	配套设施	.226	.056	.223	4.049	.000**	1.113	.898
	游乐项目	.069	.054	.077	1.272	.204	1.341	.746
	演出活动	-.001	.061	-.001	-0.013	.989	1.320	.758
	R ² =.123,调整后的 R ² =.110,F=9.018,p=.000***,Durbin-Watson=1.979							

3) 假设 3: 品牌资产对游客满意度具有正向(+)影响。

如表 3 所示, 品牌形象、品牌认知度全部均会对游客满意度产生显著的正向影响关系。因此, 假设 3 被采纳。

表 3 品牌资产对游客满意度的影响验证

从属变数	独立变数	非标准化系数		标准化系数	t	p-value	共线性诊断	
		B	标准误差	Beta			VIF	容忍度
游客 满意度	常数	2.488	.270	-	9.225	.000**	-	-
	品牌形象	.191	.057	.182	3.346	.001**	1.038	.963
	品牌 认知度	.171	.052	.178	3.272	.001**	1.038	.963
$R^2=.077$,调整后的 $R^2=.071$, $F=13.546$, $p=.000***$,Durbin-Watson=1.960								

4) 假设 4: 品牌资产对目的地形象具有正向(+)影响。

如表 4 所示, 品牌形象、品牌认知度全部均会对目的地形象产生显著的正向影响关系。因此, 假设 4 被采纳。

表 4 品牌资产对目的地形象的影响验证

从属变数	独立变数	非标准化系数		标准化系数	t	p-value	共线性诊断	
		B	标准误差	Beta			VIF	容忍度
目的地 形象	常数	2.044	.285	-	7.170	.000**	-	-
	品牌形象	.199	.060	.178	3.301	.001**	1.038	.963
	品牌 认知度	.217	.055	.212	3.925	.000**	1.038	.963
$R^2=.091$,调整后的 $R^2=.085$, $F=16.227$, $p=.000***$,Durbin-Watson=1.985								

5) 假设 5: 游客满意度对目的地形象具有正向(+)影响。

如表 5 所示, 游客满意度会对目的地形象产生显著的正向影响关系。因此, 假设 5 被采纳。

表 5 游客满意度对目的地形象的影响验证

从属变数	独立变数	非标准化系数		标准化系数	t	p-value	共线性诊断	
		B	标准误差	Beta			VIF	容忍度
目的地 形象	常数	2.832	.231	-	12.262	.000**	-	-
	游客 满意度	.205	.058	.193	3.542	.000**	1.000	1.000
$R^2=.037$,调整后的 $R^2=.034$, $F=12.543$, $p=.000***$,Durbin-Watson=1.996								

五、结论

近年来, 随着各大品牌主题公园投资方加快全国战略布局, 不仅深耕北京、上海、广州、深圳等一线核心城市, 同时也逐步扩展至人口密度较高、经济发展良好的二、三线城市。这一发展态势在推动大型主题公园快速扩张的同时, 也不断压缩了中小型主题公园的生存空间, 使其面临前所未有的可持续发展挑战。在此背景下, 本研究以开封万岁山武侠城为研究案例, 旨在通过实证分析探讨中小型主题公园的服务质量、品牌资产、游客满意度与目的地形象之间的影响机制, 进而为提升中小型主题公园的整体服务水平、强化品牌影响力、增强市场竞争力提供理论依据与实践参考。

根据分析结果, 可得出以下理论性启示。首先, 假设 1 的验证结果表明, 员工服务与信息服务对品牌形象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这意味着, 员工提供的服务越细致周到, 主题公园提供的信息越完善, 越有助于树立积极的品牌形象。此外, 信息服务、配套设施以及游乐项目对品牌认知度也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 说明完善的信息传递、齐全便利的园内设施, 以及多样、有趣、新颖且安全的游乐项目, 是增强游客品牌认知度的关键因素。其次, 假设 2 的验证结果显示, 信息服务与配套设施对游客满意度产生显著正向影响, 表明游客在评价主题公园时, 十分重视其便利性和实用性服务。假设 3 的验证结果显示, 品牌形象与品牌认知度均对游客满意度产生显著的正向影响。这表明, 可信赖、知名度高的品牌是游客选择该主题公园的重要考量因素, 同时, 游客对品牌的信赖程度会直接影响其整体满意度。假设 4 的验证结果指出, 品牌形象与品牌认知度均对目的地形象具有显著正向影响。这意味着, 拥有良好品牌资产的主题公园不仅有助于提升自身价值, 也能进一步增强游客对该地区的整体好感与认

同感。假设 5 的验证结果显示, 游客满意度对目的地形象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即, 游客在主题公园中获得越高的体验感与情绪价值, 对目的地的整体印象也会越积极、评价越正面。综上所述, 本研究系统梳理并验证了服务质量、品牌资产、游客满意度、目的地形象之间的相互关系, 进一步强调了服务优化与品牌建设在促进中小型主题公园可持续发展中的关键作用。因此, 本研究在丰富相关理论体系的同时, 也具有较高的学术价值。

根据研究结果, 可得出以下实践性启示。为增强中小型主题公园的品牌资产, 并进一步提升游客满意度, 管理者应重点围绕员工服务、信息服务、配套设施以及游乐项目四个方面进行系统性升级与优化, 力求为游客营造一个便利、舒适、愉悦、放松且富有趣味性的旅游环境。首先, 在员工服务方面, 应通过定期培训, 使员工及时掌握园区的最新运营信息, 提升其服务技能与专业素养。同时, 建议制定统一的服务规范, 以确保员工衣着整洁、态度亲切、举止礼貌、服务主动, 从而塑造积极阳光的员工形象。针对服务过程中出现的复杂或特殊问题, 员工应及时进行总结和上报, 由管理层进行归纳整理, 并将有效的应对方案反馈至全体员工, 作为参考与培训材料, 以提升整体服务效率与应变能力。其次, 在信息服务方面, 园区应充分利用官方网站、社交媒体等渠道, 及时发布游玩攻略、活动安排及注意事项, 提升游客的知情度与参与度。线上线下均应提供清晰、直观的项目导览图和路线规划图, 帮助游客合理安排行程。此外, 园区内部的路线指引、安全提示等标识应醒目、规范、易于理解, 以提高游客的游览便利性和整体体验感。在配套设施方面, 应结合市场趋势和游客需求, 适时更新或新增具有吸引力的游乐设施。同时, 应完善各类附属服务设施, 如餐饮设施: 主题餐厅、美食街、饮品店、小吃摊等; 零售设施: 纪念品店、主题商品店、便利店等; 游客便利设施: 游客服务中心、休息区、医务室、母婴室、饮水机、自动售水机、寄存柜、行李寄存服务、无线网络、移动充电站, 以及手推车、婴儿车、轮椅、雨伞等租赁服务; 观览设施: 园区摆渡车、游览车、多媒体展厅、表演舞台、特色打卡点等。上述设施的完善不仅能有效延长游客的停留时间, 还能显著提升游客的整体满意度。最后, 在游乐项目方面, 公园应提供种类丰富、形式新颖、内容有趣、体验刺激且保障安全的项目。除了传统项目(如过山车、摩天轮、海盗船等)外, 更应结合本地历史、文化、民俗、人物传说等元素, 开发具有地方特色与文化价值的创意体验项目, 如角色换装与沉浸式扮演; NPC 互动与任务闯关; 手工艺制作与非遗体验; AR/VR 科技互动、4D 影院观影; 亲子互动游戏、考古探险等沉浸式体验; 与园区演员共同参与的即兴表演等。这些项目不仅能加深游客对园区的文化认同感, 还能够激发游客的情感共鸣, 进而提升其重游意愿与口碑传播的积极性。综上所述, 唯有在“服务-设施-内容”三个层面实现协同优化, 主题公园方能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脱颖而出, 形成差异化品牌优势, 并实现可持续发展。此外, 地方政府部门亦应加大对中小型主题公园产业的扶持力度, 为其可持续发展提供有力保障。在宣传推广方面, 可借助政府门户网站、官方社交媒体账号、城市广告大屏幕等渠道, 对中小型主题公园进行广泛宣传, 并通过与周边城市的文旅部门合作, 实现跨区域宣传联动, 从而有效扩大游客来源市场和品牌影响力。在政策支持方面, 政府应出台有利于中小型主题公园健康发展的扶持政策。例如, 适当简化园区土地扩张、设施改造等审批流程, 降低行政壁垒; 同时, 可针对园区运营提供一定期限的税收减免、财政补贴、创新激励等政策工具, 以缓解企业运营压力, 激发园区升级活力。在交通接驳方面, 建议增加通往主题公园的公共交通线路, 优化站点设置, 提升交通可达性。特别是对于位于城郊或交通节点较远的中小型主题公园, 应开通从机场、高铁站直达园区的大巴线路, 以提高游客出行便利度, 增强目的地吸引力。值得强调的是, 目的地形象是外地游客对该地印象、态度与评价的综合体现, 是影响游客首次到访及重游意愿的重要前因, 也是推动地方旅游业乃至整体经济发展的关键因素。本研究通过实证分析发现, 中小型主题公园的服务品质对品牌资产与游客满意度具有显著正向影响, 并进一步作用于目的地形象的形成与提升。因此, 主题公园的管理者应与地方政府建立紧密协作机制, 实现资源互补与政策协同, 共同致力于推动中小型主题公园品牌的国际化发展, 并以此促进地区文化传播、旅游升级及经济增长。

尽管本研究取得了诸多成果, 但仍存在一定局限性。本研究以近两年(2023 年 7 月至 2025 年 7 月)期间访问过开封万岁山武侠城的国内游客为调查对象。然而, 随着时间推移, 该主题公园在设施、服务及运营等方面可能发生变化, 游客的体验感受亦会有所不同。此外, 开封万岁山武侠城每年还接待大量境外游客, 但本研究未将其纳入分析范围。因此, 未来研究可分别针对近期访问过该主题公园的国内游客与境外游客开展调查与对比分析, 以揭示不同文化背景下游客体验感的差异, 从而提升研究结论的广泛性、实用性与可靠性, 并为中小型主题公园实现品牌国际化提供更具体、更具针对性的参考方向。

参考文献:

- [1] Kurniawan, A., Hidayatun, U. S., Tasrim, et al. Enhancing Customer Loyalty: The Role Of Service Quality In Customer Satisfaction. *Journal of Lifestyle and SDGs Review*, 2025, 5(2):e04412-e04412.
- [2] Dewi, P. R. A., Sukaatmadja, I. P. G., Giantari, I. G. A. K. The Role of Destination Image Mediates the Influence of Tourist Experience and Service Quality on Revisit Intention (Study on Domestic Tourists Tanah Lot Tourism Destination Areas). *European Journal of Business and Management Research*, 2024, 9(1):21-30.
- [3] 유명희. 테마파크의 서비스 품질과 이용성이 재방문의도에 미치는 영향연구. *한국사진지리학회지*, 2012, 22(1):53-64.
- [4] 구원일. 테마파크에서 제공하는 서비스품질이 방문객 신뢰 및 구전효과에 미치는 영향. *관광경영연구*, 2020, 96(-):93-112.

- [5] 한진옥, 정병옥, 김진옥. 테마파크의 서비스품질이 재방문의도에 미치는 영향: 정서적가치와 경제적가치의 매개효과 검증. 호텔경영학연구, 2023, 32(3):35-51.
- [6] 유춘운. 관광스토리텔링, 경험적 가치, 브랜드 자산, 러브마크, 만족도 관계연구. 전주대학교 일반대학원, 박사학위논문, 2020.
- [7] 진신, 유지건, 김영국. 지역축제 브랜드자산, 지역이미지 및 지역애착도 간의 관계연구: 다렌 맥주축제를 중심으로. 비즈니스융합연구, 2024, 9(2):167-172.
- [8] 한금주, 류인평. 농촌관광 서비스품질, 체험, 이미지, 만족, 충성도 관계연구. 관광경영연구, 2020, 100(-):449-472.
- [9] Crompton, J. L. An assessment of the image of Mexico as a vacation destination and the influence of geographical location upon that image. Journal of Travel Research, 1979, 17(4):18-23.
- [10] Lee, C. K., Lee, Y. K., Lee, B. Korea's destination image formed by the 2002 World Cup. Annals of tourism research, 2005, 32(4):839-858.
- [11] 김미정, 강문실. 축제 체험요소에 따른 방문객 만족도가 지역이미지에 미치는 영향연구- 제주마축제를 중심으로 -. 호텔리조트연구, 2018, 17(1):135-151.

Exploring the Interrelationships among Service Quality, Brand Equity, Tourist Satisfaction, and Destination Image: Evidence from Small and Medium-Sized Theme Parks

Yang Wu¹, Mengmeng Zhang¹, Sangguk Kang¹, Liang Tang²

¹ Gangneung-Wonju National University, Gangneung, Korea

² Tongling University, Tongling, Anhui 244000, China

Abstract: In recent years, major domestic and international theme park groups have intensified their investments, consolidating operations in first-tier metropolitan areas while rapidly expanding into second- and third-tier cities. This aggressive expansion has increasingly constrained the survival and development space of small and medium-sized theme parks, raising critical questions for their operators regarding how to achieve high-quality development, attract visitors, and build brands with distinctive value and market influence. To address these challenges, this study conducts an empirical investigation using visitors to Wansui Mountain Martial Arts City in Kaifeng as the sample. The research examines the impact relationships between service quality—an essential component for small and medium-sized theme parks—and brand equity, tourist satisfaction, and destination image. The findings indicate that employee service and information service significantly influence brand image; information service, supporting facilities, and amusement programs have a positive impact on brand awareness; information service and supporting facilities significantly affect tourist satisfaction; brand equity exerts a direct positive effect on tourist satisfaction; and both brand equity and tourist satisfaction play crucial roles in shaping and enhancing destination image. This study contributes to the literature by providing empirical evidence on the role of service quality in the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of small and medium-sized theme parks. The results offer practical implications for both park operators and local governments, highlighting the importance of enhancing service quality to strengthen brand equity and leveraging brand influence to boost local economic vitality. Collaborative efforts between public and private sectors, coupled with resource integration, are recommended to support the sustainable growth of theme parks and promote diversified cultural, tourism, and economic development.

Keywords: Small and Medium-Sized Theme Parks; Service Quality; Brand Equity; Tourist Satisfaction; Destination Image

华语女性电影的创伤叙事与复原机制

李春裔¹ Low Yong San²

(1.新余学院, 江西 新余 338004, 2.马来西亚理科大学, 槟城 槟榔屿 11800)

摘 要: 创伤类华语女性电影主要呈现三类心理创伤: 自然灾害、父权物化与依恋关系幻灭。女性普遍缺乏稳定情感支持, 母亲缺席加剧孤立, 同性情谊与互助成为替代性“安全基地”。应对路径分为逃避真实与面对真实: 前者依赖防御机制导致情绪固着与创伤重演, 后者通过容纳丧失与哀悼重建现实联系并实现心理超越。作品细腻展现女主角的创伤修复过程, 凸显父权语境下身份认同的文化批判与疗愈价值。

关键词: 华语女性电影; 文本分析; 创伤叙事; 复原机制

基金项目: 2025 年新余学院博士启动金资助项目阶段性研究成果

DOI: doi.org/10.70693/rwsk.v1i8.1290

进入 20 世纪 80 年代中后期, 性别研究与女性主义电影理论在华语语境中逐渐兴起。在女性主义思潮的推动下, 一些影片开始有意识地突破传统叙事框架, 拒绝将女性角色简化为供男性消费的视觉对象, 而是尝试塑造兼具多重性格气质与复杂心理层次的女性形象。这些形象在颠覆既有性别刻板印象的同时, 也揭示出女性主体在男性欲望符号系统中的被规训与自我表达受限的处境。

回望华语女性题材电影史, 长期以来, 女性角色的形象建构与叙事意义多被男性视角主导, 独立精神与真实经验的呈现极为有限。随着女性主义理论在华语世界的传播, 越来越多的导演尝试将女性置于叙事核心, 使其不再仅是情节推进的工具, 而是具备能动性、思想深度与情感厚度的主体。女性电影指的是在创作中自觉地探讨女性意识, 以鲜明地颠覆父权中心文化地女性主义创作方式书写女性地电影^[1]。这类作品不仅展现女性在家庭与社会结构中的抗争与成长, 也揭示制度与文化对女性生存空间的塑造与限制。

香港邵氏影业在 1972 年推出的《爱奴》是华语电影中率先出现具有女性主体意识的叙事作品, 然而影片仍旧以感官化的演绎吸引观众, 女性形象仍被异化为视觉奇观。随着女性主义等思潮的传播, 华语女性电影逐渐摆脱早期猎奇化的倾向, 开始深入描绘女性的日常生活与内心世界, 为其赋予更为多元和完整的主体性。

华语女性电影多聚焦个体叙事而非宏大历史叙事。尽管部分作品将人物情绪置于特定时代背景中, 如《蝴蝶》《游园惊梦》《刺青》等, 但叙事核心仍聚焦女性的情感与命运。这些影片以冷静客观的视角呈现女性的生活抗争, 既无浪漫化修饰, 也不流于单一批判, 而是以悲悯与理解为失语群体发声。通过对无意识冲突、防御机制及心理创伤的细腻刻画, 影片唤起观众的情感共鸣, 促使其在感性层面理解女性的生存困境。

“对具体影片进行精神分析批评, 主要有影片人物形象的无意识心理、电影作者的创作心理和影片观众的观影心理这三个切入角度”。^[2]电影作者的创作心理与影片观众的观影心理的切入角度可归咎纳入作者研究和受众研究的范畴。对具体影片进行精神分析批评, 对影片人物形象的无意识心理进行分析将是本论文拟使用的研究方式。影片人物形象的无意识心理可归属于艺术形象研究范畴, 影片中的人物形象往往取自于现实中的人物, 尤其是取自于影片编导的个人经验甚至是大的社会历史背景下的集体记忆, 这些人物形象所代表的是一种复合的、立体的心灵世界。

一、创伤的心理学概念

心理创伤性事件一般指来自外界突发性的、引起个体极大精神压力的极端异常事件, 心理创伤指来自生活中

作者简介: 李春裔(1982-), 性别女, 学历博士, 研究方向为影视文化、传播学;

Low Yong San(1972-), 性别男, 学历博士, 研究方向为海外华人群与文化研究、区域国别学。

具有较严重的异常事件所引发的心理、情绪甚至生理的不正常状态。根据林德曼 (Lindemann) 在 1944 年对心理创伤的定义, 是一种对原有依恋关系突然的、无法控制的破坏^[3]。一般上个体自身具有心理调节能力, 经过一段时间的自我调整能够将心理创伤自动痊愈, 这个时间段通常不会超过三个月, 然而也会有一些心理创伤的影响会延续较长的时间, 甚至可能是伴随终身的, 个体面对创伤通常会有无能无助感。

心理创伤的观念强调人类的脆弱性而非坚韧性, 可能引起心理创伤的事件非常多样化, 从严重的自然灾害事件如地震、海啸, 到人为的灾难事件如战争、交通事故、暴力伤害, 又或者如家人离世、亲密关系断裂、疾病等等个人经历, 都可能造成心理创伤。“这些认知闪回是创伤性事件的残留: 这些想法是在创伤发生时, 或创伤发生很短之后产生的, 而且会在压力状况下重新出现。”^[4]心理创伤的核心经历是自主权的丧失和与他人感情联系的中断, 因此, 治愈伤痛的基础在于重建创伤患者的自主权和创造新联系。复原仅能在患者拥有人际关系的情况下进行, 不可能在隔绝中进行, 在与其他人重建联结的过程中, 创伤患者需要重塑由创伤经历损坏或扭曲的心理机能, 包括基本的信任感、自由意志、主动性、能力、自我认同和亲密感。^{[4]240}

二、创伤叙事的三重维度: 自然灾害、男权物化与依恋幻灭

在创伤语境下的华语女性电影中, 主要呈现出三种类型的心理创伤, 由自然灾害引发的创伤、男权社会对女性的物化与轻视引发的创伤、原有依恋关系突然幻灭的人祸型创伤。“依恋一般被定义为婴儿和他的照顾者 (一般为母亲) 之间存在的一种特殊的感情关系。它产生于婴儿与其父母的相互作用过程中, 是一种感情上的联结和纽带。”^[5]创伤经历可能只涉及某个单独的事件或经历, 也可能是在一段时期内承受着苦难或者牺牲, 例如童年期长时间的被忽视、情感虐待或者暴力恐吓等。创伤事件经历发生的年龄也至关重要, 如果在特定的心理年龄段遭遇心理创伤无法自动痊愈时, 将导致该心理年龄被固着, 当心理发展的某个阶段得到过分的满足或者受到挫折会导致固着, 固着将导致无法正常地进入性心理发展的下一个阶段。

(一) 自然灾害引发的心理创伤

人类文明史始终与自然灾害相伴, 地震、海啸等不可抗力事件不断揭示着人类的脆弱性。周美玲导演的《刺青》以 2009 年的台湾地区为叙事背景, 女主角小竹在台湾地区九二一大地震中失去了父亲。地震当晚, 小竹未能及时救援, 父亲为救弟弟阿青不幸身亡。这一创伤性事件导致小竹与阿青长期陷入父亲死亡的阴影中, 阿青因目睹父亲死亡, 在记忆、自我意识与认知功能上出现崩解, 表现为自闭与失语; 小竹则因未能救援父亲深感内疚, 逐渐封闭情感, 隔绝与他人的情感联结。为与阿青建立情感链接, 小竹给自己纹上与父亲手臂上相似的彼岸花刺青, 将生活重心完全放在工作与照顾弟弟上。自幼失去父母照顾的少女小绿一直在寻找九岁时给予她温情的邻居姐姐, 当她在刺青店认出小竹后, 两人之间的情感纠缠开启了创伤修复的心理过程。影片既呈现了创伤对心理结构的破坏, 如记忆断裂与情感隔离, 也探讨了个体在创伤后的生存策略-或通过人际联结尝试修复。

(二) 男权社会中的女性物化与反抗

在男权社会中, 男性通过家庭与社会的支配性特权, 将女性物化为妻子或母亲的角色, 剥夺其作为独立个体的主体性。这种男性中心主义的统治模式, 使女性的自我意识在母性与妻性的压迫下逐渐消解, 沦为功能性存在。华语女性电影通过对女性物化现象的极端书写, 揭示了男权社会对女性的压迫及其造成的心理创伤。《爱奴》中女性如同商品一般在拥有权利的男性间流转, 《自梳》中的意欢被父亲作为债务抵偿出售, 玉环则被丈夫作为利益交换的工具, 《双镯》中将女性禁锢在母性与妻性下, 女性成为奴仆式的手脚和传宗接代的工具, 自我意识与话语权被剥夺, 沦为某种职能的载体。这些影片共同呈现了女性在男权体系下的困境, 其反抗往往以复仇式的自我毁灭或情感依附式的妥协共生为代价。然而, 影片也暗示了破局的可能, 女性间的情感联结, 或以自梳女的断发仪式为标志的身体自主的宣言, 成为打破物化链条的微弱曙光。

(三) 依恋幻灭的创伤叙事

华语女性电影通过对依恋关系破裂的细腻刻画, 揭示了突发性分离对个体心理造成的深远影响。《爱丽丝的镜子》中无法建立稳定的依恋关系的创伤; 《蝴蝶》中承载情感的重要客体突然离去导致心理创伤, 直到遇见少女小叶才逐渐敞开心扉, 展现了创伤修复的艰难过程; 《飞跃情海》中小英因父亲滥赌被迫离开表姐小三, 失去表姐小三的庇护后陷入孤独与怯懦, 多年后重返渔村却因小三的离去再次陷入孤独, 揭示了依恋破裂对心理的持久伤害。《命运化妆师》中敏秀因社会禁忌与恋人陈庭分离, 长期压抑情感, 直到找回被爱的记忆才逐渐修复内

心创伤。这些影片通过不同角色的经历，共同呈现了依恋关系破裂后的心理困境，从焦虑、压抑到孤独与疏离，同时也暗示了通过情感联结与自我觉察实现创伤修复的可能。

三、创伤的困境建构：“安全基地”的缺失与替代

作为孩子的养育者，父母亲尤其是母亲对孩子的影响力格外的重要，在养育过程中父母与孩子间出现密切的情感纽带，会对孩子未来的情感模式产生深远的影响，这份情感纽带可能形成个体情感的安全基地。“个体与父母的相处经历和他以后建立情感纽带的能力之间有非常强烈的因果关系”。^[6]“个体不论处在哪一个年龄阶段，当他们确信在困难来临之际，自己身后站着一个或者多个可以为自己提供援助、值得信赖的人时，他们便能够安心快乐的将自己的潜力发挥到极致，我们信赖的人---被我称为依恋对象---可以为我们提供一个安全基地”。^{[5][17]}在创伤类华语女性电影中，亲子关系的薄弱性成为个体心理复原的重要障碍。影片中的母亲形象往往表现为缺席或失职，无法为女性角色提供情感支持，这一现象与重男轻女的社会文化习俗密切相关。在父权制与儒家伦理的双重规训下，女性个体不仅面临暴力或贫困类的外部环境的威胁，更因缺乏情感复原的安全基地而陷入心理孤立。此时，来自同性的共情联结成为绝境中唯一的疗愈资源，如《自梳》中玉环与意欢的互助关系、《蝴蝶》中小叶对阿蝶的情感支持。这种替代性安全基地的建构，为创伤个体提供了情感庇护。

（一）亲子关系的缺失与创伤

在创伤类华语女性电影中，创作者常将女性置于一种无回应与无求助的绝境中，凸显其生存困境。部分女性角色的成长环境呈现出类孤儿状态般，在《飞跃情海》中，小英的父亲因滥赌远走他乡，迫使她承担替父还债的家庭责任，其情感依托仅来自表姐小三的短暂庇护。类同孤儿般长大的女性，没有完整的体验过被家庭成员稳固的关爱，当创伤事件发生后，他们没有可以退回的安全基地修复疗愈内心的创伤。这种叙事设置不仅揭示了父权制下女性的生存困境，也通过极端情境的建构，批判了传统家庭结构的功能缺失与情感剥夺。另一部分女性虽被设定为父母双全，但其父母形象往往表现为脆弱或失职，无法提供有效的情感支持。《自梳》中意欢的父亲为抵债将其卖予老翁为妾，母亲虽在场却选择跪求女儿接受命运，导致意欢从躁狂性反抗转向抑郁性自我攻击；《蝴蝶》中阿蝶的母亲将婚姻失败的痛苦完全暴露给女儿，使其成为情绪裹挟的对象，导致阿蝶无法摆脱母亲的悲伤；《命运化妆师》中敏秀的母亲因丈夫出轨陷入抑郁，角色反转让女儿敏秀成为家庭的主要照顾者；《爱丽丝的镜子》中晓镜的母亲沉迷于恋爱关系，忽视女儿的情感需求，导致晓镜无法学会正确的情感表达；《刺青》中小竹的母亲缺席，父亲在地震中为救弟弟去世，小竹被迫承担起照顾失忆弟弟的责任，同时内化父亲的超我形象，形成自我束缚；小绿则因母亲在地震后遗弃她而沉溺于幻想，通过否认现实保留对母亲的虚假依恋，成年后以网络视讯的方式延续幼年的情感模式。这些影片通过塑造失职父母形象，揭示了代际创伤的传递机制，以及女性在缺乏情感支持下的心理困境——从自我攻击到情感隔离，再到幻想依赖，最终陷入虚假自我的生存状态。

（二）困境下女性情谊的替代性疗愈

在《双镯》《自梳》中，男性普遍以物化与利用的姿态对待女性，女性的社会价值与情感需求被忽视。《双镯》里，惠花被限定在婚育价值，秀姑则循规蹈矩，二人因同样的压迫处境惺惺相惜，为彼此梳理惠安女发髻、整理衣衫、拭泪，以细腻的身体照料抵抗孤立与冷漠。《自梳》中，意欢被父亲与情人利用，玉环亦被丈夫视为交易筹码，她们在相互扶持中走入彼此生活，即便分离，玉环依旧以自梳女的方式延续意欢的精神。

《飞跃情海》《爱丽丝的镜子》中，男性多为滥赌、暴力或欺骗之徒，女性间的情感支持成为唯一的安全港。《命运化妆师》《蝴蝶》虽呈现出温情与体贴的年轻男性，但始终未能建立真正平等的情感连接，父辈男性则多有背叛与不忠。女性间建立的情感纽带不仅疗愈旧有创伤，还在隐形中取代了异性关系的情感功能。《刺青》则将创伤与情感回避并置，小竹、小绿、阿青因地震失去亲人，小竹将灾难与女性爱恋画上等号，封闭自我，直至小绿的出现才促使她重建情感连接；同时，小竹也成为小绿直面现实生活的契机，彰显女性互助在创伤修复与自我认同生成中的重要作用。

四、创伤应对的双重路径：防御机制与哀悼疗愈的影像叙事

当创伤引发的丧失情绪无法被容纳时，个体往往借助否认、解离等防御机制逃避现实，情绪也因此固着于创伤发生的时空，削弱现实功能，陷入破坏性循环。若能在尊重现实的基础上接纳悲伤、愤怒与恐惧，并完成哀悼，便有机会重建与生活的联系，实现创伤疗愈与心理超越。

在创伤类女性影片中,这种应对呈现为“逃避真实”与“面对真实”两种路径。前者缺乏心理安全基地,过度依赖防御机制,导致创伤思维强化并长期固着;后者则容纳丧失、完成哀悼,逐步恢复现实连接,最终实现疗愈与超越。这一叙事不仅揭示了创伤应对的二元模式,也为女性心理复原提供了影像参照与文化意义。

(一) 防御机制的固化与创伤重演

创伤未能有效释放时,个体的防御方式易固化。在创伤发生的时空中,这种防御具备功能性与适应性,能应对即时威胁;但随着环境变化,精神状态仍固着于创伤现场,形成创伤性思维模式,其典型表现是强迫性重复。通过重演创伤情境试图掌控无法消解的痛苦。当个体拒绝接受丧失并过度依赖防御机制时,现实功能受损,情绪固化于创伤时空,最终削弱现实审视能力。《爱丽丝的镜子》中晓镜因母亲长期沉迷不稳定恋情而遭遗弃,在与好友阿咪的关系中不断重演创伤性思维,担忧被抛弃,并以引诱阿咪男友的方式试图掌控命运。这揭示了创伤固着对情感模式的深远影响,以及防御机制的双刃剑效应。

反向形成作为创伤防御机制,表现为情感或行为的反向转化。《刺青》中,小竹因父亲去世与弟弟自闭深感愧疚,将自我快乐视为罪过,以冷静自持掩盖情绪,并纹上父亲同款彼岸花维系情感链接,拒绝自我需求。《爱奴》中,爱奴在被拐卖与凌虐后,将求生欲化为复仇使命,通过隔离情绪、讨好权势最终复仇,但忽视了正义力量的存在,反映了该机制对现实审视的损害。《刺青》中的小绿则是创伤性幻想依赖的典型。幼年遭地震与母亲遗弃后,她构建幻想世界回避现实,成年后以网络视讯女郎的虚拟身份,将身体与情感商品化以维持心理平衡,映射了父权结构下女性生存的困境。

(二) 哀悼丧失与创伤修复

容纳丧失与完成哀悼是创伤疗愈的核心,其关键在于直面真实而非固着于创伤心理。“复原的过程可以基本的分为三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安全的建立,第二个阶段是回顾和哀悼,第三个阶段是重建与正常生活的联系”。^[41]⁴⁵接受现实为超越创伤奠定基础,通过重构内在互动模式,个体虽未直接化解问题,却能生成新的应对策略。若仅依赖固化的防御机制,则会因僵化而加剧痛苦。防御机制与痛苦本质上是分离的,因而重塑思维模式成为剥离痛苦、重建现实联系的关键途径。

在创伤类女性影片中,《命运化妆师》中的敏秀、《飞跃情海》中的小英与《刺青》中的小竹通过容纳丧失与哀悼痛苦,逐步重建内在情绪察觉;而《蝴蝶》中的阿蝶与《自梳》中的玉环、意欢则通过建立安全感关系,接纳并哀悼创伤下的丧失,最终修复与现实的联系。这些叙事不仅揭示了创伤复原的阶段性特征,也为女性的心理疗愈提供了影像参照。

《飞跃情海》展现了女性在安全环境下接受情感拒绝并哀悼丧失的过程。小英自幼缺乏父母关爱,将对表姐小三的依赖转化为幻想性依恋,幻想自己是祝英台寻找梁山伯。尽管小三未能回应小英的同性情谊,但她始终以关怀与保护的姿态支持小英。小三虽未接受小英的爱情,却尊重她的情感差异,既不拒绝也不试图改变她。这种无条件的接纳使小英最终放下执念,在旁白“妾已无所求,君亦无需愁,奈何人已远,梦醒已千年”中完成情感释怀。《命运化妆师》中的敏秀则过度使用“否认”的防御机制,否认作为防御机制,是假定自己已经感知到了现实,否认有四个种类:本质否认、行为上的否定、幻想中的否认和言语上的否认。敏秀使用的防御机制为本质否定,也即有大量的证据证实真实存在仍然对现实加以否认,固着于理想化道德而压抑真实情感需求。在调查陈庭死因的过程中,她逐渐接纳被爱的真相,完成哀悼,最终走出创伤思维,开启重建情感连接的可能性。两部影片通过不同叙事路径,揭示了女性在情感拒绝与丧失哀悼中的心理复原过程。

《自梳》中的玉环与意欢通过彼此接纳与互助保护,建构了一种替代性家庭结构。玉环自幼被卖身为妓,曾寄希望于被富人赎身以争取生存空间,但在意欢的真诚对待与陪伴下,逐渐改变了对男性依附的幻想。意欢因父亲欠债被抵债时,玉环以钱财赎回其自由;当意欢因堕胎事件被逐出姑婆屋后,玉环陪伴她卖水饺为生,直至战火将两人分开。两位女性在冷酷的生存环境中,通过情谊重获信任感,直面内心真实情感流动,展现了女性间情感联结的力量。《蝴蝶》中的阿蝶则因少女时期的创伤长期陷入精神固着,无法摆脱对真真出家的内疚感。在小叶的陪伴下,她通过哀悼丧失与重构记忆,逐渐从解离状态中脱离,最终走出创伤,开启新的人生篇章。两部影片通过不同叙事路径,揭示了创伤疗愈的核心过程:接纳现实、哀悼丧失与重建联系,为女性的心理复原提供了影像参照。

结语

纵观创伤类华语女性电影，心理创伤主要呈现三种类型：自然灾害、男权思想下的物化压迫，以及依恋关系幻灭。影片中的女性普遍缺乏稳定的亲子支持，在父权制与重男轻女的文化规训中，其主体性与情感需求被系统性忽视。当创伤发生时，失去安全情感基地的她们往往陷入孤立与无助，而来自同性的共情与互助，成为唯一的情感支撑。在应对创伤的方式上，影片展现出两种路径：一是逃避真实，如《爱丽丝的镜子》的晓镜、《刺青》中的小绿及《爱奴》中的爱奴，她们过度依赖防御机制，使情绪固着于创伤时空，严重损害现实功能；二是面对真实，如《自梳》中的玉环与意欢、《命运化妆师》的敏秀、《飞跃情海》中的小英及《蝴蝶》中的阿蝶，她们通过容纳丧失与哀悼痛苦，逐步重建与现实的联系，实现疗愈与心理超越。与西方女性电影常以社会秩序之外的暴力对抗为核心不同，华语女性电影更倾向于与主流叙事融合，通过细腻展现情感复原过程，揭示重建自我认同在创伤疗愈中的文化独特性与社会批判性。这些作品不仅刻画了女性在父权制下的生存困境，也以女性情谊的力量，提供了兼具文化根植性与疗愈价值的影像范本。

参考文献:

- [1]张晨阳.当代中国大众传媒中地性别图景[M].北京: 中国传媒大学出版社,2010:125.
- [2]史可扬.影视批评方法论[M].广州: 中山大学出版社,2009:81.
- [3]Lindemann E. Symptomatology and management of acute grief[J]. The American Journal of Psychiatry, 1944, 101(2):143.
- [4]赫尔曼·朱迪斯 著,施宏达,陈文琪 译. 创伤与复原[M]. 北京: 机械工业出版社, 2019:124.
- [5]李娜. 成人依恋、嫉妒和情绪调节的关系研究[D]. 兰州: 西北师范大学, 2012:3.
- [6]Bowlby J. 著,余萍,曾铮 译. 情感纽带的建立与破裂[M]. 北京: 世界图文出版有限公司北京分公司, 2017:150.

Trauma Narratives and Mechanisms of Recovery in Chinese-language Women's Cinema

Li Chunyi¹, Low Yong San²

¹Xinyu University, Xinyu, Jiangxi 338004, China

²Universiti Sains Malaysia, Penang 11800, Malaysia

Abstract: Trauma-centered Chinese-language women's films primarily depict three categories of psychological trauma: natural disasters, patriarchal objectification, and the collapse of attachment relationships. These films reflect a broader pattern of emotional instability among women, often exacerbated by maternal absence, which deepens their sense of isolation. In response, bonds of female friendship and mutual support emerge as alternative "safe havens." The characters' coping mechanisms fall into two main trajectories: avoidance of reality and confrontation with it. The former depends on psychological defense mechanisms, leading to emotional stagnation and the recurrence of trauma; the latter involves accepting loss and engaging in mourning as a means to rebuild ties with reality and achieve psychological growth. These films offer nuanced portrayals of the protagonists' journeys of healing, foregrounding both a cultural critique of patriarchal identity constructs and the therapeutic potential of such narratives.

Keywords: Chinese-language women's cinema; textual analysis; trauma narratives; mechanisms of psychological recovery

中文短视频在国际中文语音教学中的应用研究

丁笑寒¹

(1.中国石油大学(华东), 山东 青岛 266000)

摘要:随着互联网技术的发展,国际中文的教学方式产生了巨大的变革。在短视频流行的当下,汉语教学与短视频的结合势在必行。为探讨短视频在国际中文语音教学中的应用,笔者以短视频文化为切入点,通过分析短视频的特征、语音教学的重要性以及短视频对于对外汉语语音教学的重要意义,并且探讨了短视频与语音教学各个环节结合的可行性,以期为国际中文教育领域内的语音教学提供一些助益。

关键词:国际中文教育; 中文短视频; 语音教学

DOI: doi.org/10.70693/rwsk.v1i8.1318

1 短视频的定义及特征

1.1 定义

当前,短视频作为一种新兴视频媒介,以移动互联网与移动智能终端为支撑,采用用户自发制作等方式进行内容创作与传播。由于短视频的播放长度相对较短、且内容信息传递速度较为迅速,其已成为了当下备受瞩目的新媒体形式之一^[1]。而对于汉语学习者而言,他们普遍对语言中所包含的中华文化怀有一定兴趣,因此短视频可作为其课内外学习的有效载体。

此处需要注意的是,笔者在本文中所提到的“短视频”,指的是在对外汉语语音教学中可以使用且能够满足对外汉语教育的实际需求的视频资源。具体来说,指一些达到普通话标准、语速适宜、内容恰当的短视频资源。并且,本文所提到的短视频时长并没有明确的限制。短至几十秒,长至几分钟的短视频,只要主题明确,内容简洁明了,就能用作国际中文语音课堂的教学。同时,短视频的表现形式并不是一成不变的,只要其能有效地辅助教学并提升教师的教学效能,那么这些内容都应纳入本文定义的短视频范畴内。

1.2 特征

作为近年兴起的全新视频类型,与传统媒体相比,短视频主要具有以下四种优势:

1.2.1 传播范围广、速度快

得益于互联网技术的进步和各大移动平台的快速发展,短视频成为当代传播速度最快的媒介之一。总体而言,短视频通过两种途径传播:其一是依靠短视频平台自身。在短视频平台,用户可将感兴趣的短视频添加至收藏夹、进行转发并与其他用户分享。并且,为了获得更为丰富的浏览量,短视频创作者倾向于将其作品上传至多个短视频平台,例如抖音、哔哩哔哩、小红书等,这便导致短视频的传播速度十分迅速,传播范围更加广泛。其二,众多社交网络媒介也发挥了异常显著的传播作用。依托这些微信、QQ等社交工具的传播优势,短视频内容的分享与推广得到进一步实现。

1.2.2 内容简练,符合需求

短视频作为时长限定的新媒体形式,要在极短的时间内吸引观众观看并保持其持续观看的意愿,就必须拥有鲜明的、个性化的特征。因此,内容创作者往往不断追求内容的革新与升华,例如,在评述某一事件或对象时,创作者需要能够提出具有创见的观点,或为观众带来新奇的体验,或为他们带来有价值的资讯,进而实现与受众需求的统一。所以,短视频的内容一定是精简凝练的,也一定是符合观众兴趣与需求的。

1.2.3 形式多样,制作简单

不同于传统视频模式,短视频以其较低的创作门槛和简单快捷的创作程序在社交网络上独树一帜,使得非专业人员也可以创作并传播视频。当前,随着如抖音、哔哩哔哩等短视频软件的兴盛与普及,短视频的创作难度进一步降低。在这些平台上,日益精简化的操作流程及其提供的一系列实用工具如视频滤镜、音频素材、视觉特效等便捷功能,以其多样的形式与简单的创作方法大幅提高了传统视频制作与传播的效率与便捷度。

1.2.4 内容个性化

作者简介:丁笑寒(2001—),女,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为面向汉语国际教育的汉语本体研究。

在观看短视频的过程中,观众往往会发现视频内容与其兴趣与喜好极为接近。这便是由于在短视频内容上传阶段,制作者往往会赋予作品相关的标识标签。基于此,平台的智能推荐系统便能通过捕捉至关重要的标签热度动态,实时准确地掌握用户喜好的演变规律,进而为用户呈现与其喜好最为匹配的短视频作品。并且,对于推荐结果,用户通常可以选择“喜爱”或“不感兴趣”对视频进行反馈,用以构成平台精准预测用户偏好的基础数据^[1]。平台对用户偏好的认知愈深刻,未来其所进行的内容推荐便愈能贴合用户心理预期和审美需求,从而形成了短视频个性化的特点。

2 语音教学在国际中文教育中的重要意义

2.1 语音教学的定义

语音课是第二语言教学过程中的重要组成部分,其要求学习者掌握标准的汉语发音、节奏和语调,从而实现有效的交流。毫无疑问,语音课程是学习者掌握这门语言的基石:教师通过教授汉语的语音知识和基础发音技巧提升学习者的听、说、读、写语言能力,并为培养其使用汉语进行交际的能力奠定坚实的基础。在实际课堂教学中,教师不仅要教会学生学习汉语的声、韵、调等基础知识、引导学生建立正确的发音规则与良好的发音习惯,也要适当引导他们进一步了解中国文化,增强其跨文化意识。

2.2 语音教学的重要意义

2.2.1 其他语言项目的基础

在人类的社会中,语言是交流的手段。而在语言中,最基本的要素就是语音——人们在社交活动中使用的工具必须以语音形式表现出来,并且需要通过语音系统来传达和表达这些信息。如果没有语音,语言也将不复存在。因此,对语言发展而言,语音作为一种有益的物理媒介,构成了其存在的基础^[2]。由此可见,语音与其他语言项目息息相关,在汉语作为第二语言的教学过程中,语音学习也是其他语言项目以及语言技能学习的基础,而语音学习的效果也会对其他语言项目的理解与语言技能的掌握产生一定的影响。

2.2.2 掌握听说技能的基础

在任何语言的教育过程中,语音的教授都被视为关键的一环,其既能影响学习者对词汇、语法等知识的掌握程度,也会影响到学习者的听与说能力。语音掌握基础与听力和口语能力息息相关——如果学习者的“语感”在学习初期没有得到及时的培养,那么其口语和听力能力必然难以达到较高的水平。因此,良好的语音学习是培养学习者汉语交际能力的关键和基础。

3 中文短视频在语音教学中应用的重要意义

3.1 为教师提供全新的教学手段,调动学习者积极性

在传统教学中,语音课程无外乎由听、说、练这三个教学步骤组成。这种教学手段固然有效,但长期采用同一种单一的学习方法对学习者的来说枯燥无味,无法充分调动学习者学生的积极性,也会导致课堂教学脱离真实的语言环境。因此,在语音教学中引入生动直观、真实可感短视频资源,可以使学习者可以在近乎真实的语言环境中体验情景式学习^[3]。与此同时,短视频的特殊时长在有限的课堂时间内具有极大优势——学习者可以在极短时间内快速吸收相应知识,教师也可充分预留练习与活动时间。由此可见,教师采取音视频模仿等教学方法使其不再局限于单一的传统的讲授与练习的教学方式,可以有效提升课堂对学习者的吸引力,从而达到理想的语音教学效果。

3.2 提供真实交际案例,提升交际能力

对外汉语教学的首要目的是培养学习者运用汉语进行交际的能力。而语音教学作为汉语学习的基础,也必须贯彻实用性原则、为语言交际服务。将短视频资源作为汉语教学的素材运用于语音教学之中,一方面,可以为语音教学提供近乎真实的目的语交际环境与流利、地道的语言输入,弥补课堂教学的不足;另一方面,短视频作为一种特殊的视频形式,其内容往往与目的语群体的日常生活息息相关,以应对他们在日常生活的交际需求。

3.3 丰富教学内容,语音教学与文化教学相结合

舒曼(1978)在“文化适应假说”中提到,从语言和文化的关系来看,第二语言习得的过程实际上就是逐步适应目的语文化的过程,第二语言学习者对目的语与文化的适应程度或将决定该学习者对于目的语的掌握程度^[4],这就表明了语言教学不能脱离文化教学。而与此同时,艺术来源于生活,由中国人所创作的短视频生动地再现着目的语群体的思想行为与生活方式,囊括了各方面的中国文化,包括经济、政治、法律、宗教、教育、道德观念以及中国社会特有的特色习俗。因此,教师将中文短视频运用在对外汉语语音教学中,不仅创新了汉语语音相关知识的输入方式,也在潜移默化中向汉语学习者传播了丰富而广泛的中国文化知识,从而丰富了课堂教学内容并拓展了学习者的知识面。而学习者在积累文化知识的同时,也能在相关的文化环境中进一步提高自身的汉语口语水平。

3.4 有利于教材编写与师资队伍水平的提高

短视频的开发优势不仅体现于语音课堂教学,也为汉语教材编写与师资队伍水平的提升提供了全新思路。就教材而言,在汉语语音的教学过程中,研究者可将与汉语教学与习得相关的短视频内容作为学习资料进行收集、归纳和整理,借助现代化的手段将中文语音教材进行多种形式的开发,尤其是听说教材,从而有效解决教师因缺少材料导致的进行语音教学的难题^[9],并将教材内容与生活实际有机结合。而对于教师而言,他们在教学过程中不仅需要重视学习者的学习需求、也要关注学习者的情感世界。不同于往常教学视频的冗长刻板,网络短视频大多诙谐有趣、内容通俗易懂。教师深入地将当代短视频作为教学材料纳入课堂,可以保证教学内容符合学习者的兴趣与需要,实现理想的教学效果。

4 短视频与国际中文语音教学的有机结合

4.1 适用于国际中文语音课堂的短视频特点

若要将短视频有效应用于国际中文语音教学中,教师首先需要选取适用于国际中文语音课堂的短视频,具体特点表现如下:

4.1.1 主题贴近真实生活

当前,各平台上的短视频类型多样、内容广泛、题材丰富,与对外汉语语音教材各单元的教学主题高度契合的视频类型层出不穷;同时,前文提到,大多数传播在社交媒体中的短视频往往具有时效性,能够反映现代社会的流行文化与当今中国的主流思想。然而,由于短视频基数庞大,其展示的内容极为丰富。例如,一些对于社会现象、科学研究等内容进行科普的短视频,其所涉及的语言知识对于汉语初学者来说较为晦涩,所包含的语音信息也比较复杂。而与社会交往方面相关的视频,如介绍中国人的家庭、饮食、习俗、生活、节日等信息,其中所涉及的词汇与句子发音相对简单,且主题相对明晰、内容生动有趣——这类视频通常与初级学习者的语音学习需求相适配。因此,教师在选取适用于对外汉语语音课的短视频时,应尽可能选取贴近学生在目的语社会基本生活的视频,令学生听得懂、感兴趣,从而充分发挥短视频的作用。

4.1.2 语音地道流利

对于汉语语音学习者而言,他们正处于汉语学习的初阶阶段,即正积极构建听说技能的基础的阶段。鉴于此,教师所提供在课堂的短视频,应选取具有清晰的语音语调的内容。并且,教师在选取过程中应确保视频语速应相对缓慢或符合常速,且视频中的人物的语音和语调表达可以准确地对汉语语音的轻重高低进行示范。只有通过这种真实呈现的方式,学习者才可以自然而然地接受流畅、纯正的汉语输入。

4.1.3 直观易懂

一般来说,汉语语音学习者往往接触汉语时间较短,对汉语语音和词语概念之间的联系相对缺乏认知。相比而言,中高级阶段的学习者则已经对汉语有了一定程度的掌握,脑中已经具备了一定的语言系统。因此,不同于中高级学习者,汉语语音学习者在接触新词汇时,往往难以直接联系读音与意义。对此,为汉语语音学习者选取相关课堂短视频时,教师应重点考虑内容的直观性,以让其充分理解为优先。

4.1.4 趣味性

在启蒙阶段,汉语语音学习者所面临的学业任务繁重,心理压力较大。因此,教师需巧妙激发学习者内在的积极动力,持续调动学习者的积极性,特别是在初级汉语语音课程的设计中:在讲授某一语音知识时,教师应采用充满活力且具备一定新意的短视频素材——这类素材应紧贴年轻群体的兴趣爱好,例如涉及到具有地域特色的风土人情、美食佳肴、民间习俗等元素,使汉语学习者真正感兴趣,激发他们对汉语学习及中国文化的热爱,使语言教学中的文化教学能够更为顺利地进行。

4.1.5 针对性强

教师在选择教学所需的中文短视频时,还要针对性地选取相关资源,即所选视频主题应与所教学内容有较强的关联性。并且,对于语音学习者这类初学者而言,教师需要为学生挑选那些生词较少、意义简洁、对话重复率较高且发音清晰的短视频,并选择其感兴趣的视频内容。同时,教师也要结合具体教学内容与不同的教学目的,选择合适的视频作为教学辅助工具。例如,为了帮助学习者理解汉语的拼音规则,可将拼音教学融入到一些短小精悍、朗朗上口的视频当中,通过具有针对性的视频让学习者学习声韵拼合,并进行反复练习,增强其对所学知识的理解和记忆。在播放视频的过程中,教师还可以设计一些富有意义且生动有趣的练习活动,增强学习者观看和模仿的积极性。

4.2 短视频资源与具体教学环节的有机结合

4.2.1 导入环节

相较于其他课堂教学,在语音课堂上,大部分学习者所面临的是一套全新的语音系统,故而更容易产生畏难情绪。因此,课堂导入环节尤其重要——有效的导入能够帮助学习者更好地了解所学内容,并有效增强他们的学习兴趣,从而使其后续学习变得更加愉悦和轻松。因此,在语音教学中,教师应注重在教学开端就营造良好的学习氛围,而使用短视频这一媒介恰能为学习者提供具有启发意义且生动有趣的导入环节。因此,在语音课堂的导入环节,教师可以在课程导入环节引入短视频,采用包括语音带读、文化知识科普与中文影视作品剪辑等多种类型的短视频进行播放,为教学的顺利进行作好铺垫。

4.2.2 讲解新知识环节

讲解新知识始终是课堂的主要环节,在这一环节中,教师通常采用多种教学方式与课堂活动来协助学习者掌

握并理解新知识。然而,在具体教学实践中,课堂环境的有限性导致学习者注定缺少真实的语言交际环境。而为了克服这一缺陷,教师可以适当采取短视频资源辅助教学。相较于传统文本导向的教学方法,短视频能够为学习者提供更为立体和多元的、接近真实的语境。教师运用短视频进行展示新知识,可以够利用已掌握的语音知识为桥梁,引导学习者拓展语音知识面,最大程度发挥短视频媒介在课程教学中的作用优势。因此,在进行语音新知识讲解的教学设计时,教师应充分考虑融入短视频教学的策略。

4.2.3 练习巩固环节

对于汉语学习经历尚浅的学生、特别是对于语音学习者而言,练习巩固环节中大量的模仿性训练对于提升其语言感知能力颇为有效。然而,长期单一的机械式训练可能导致学生感到枯燥乏味、甚至导致其学习兴趣下降。因此,教师可以适当改变练习方式,适时引入短视频素材来进行课堂活动以吸引学生注意力,从而使课堂氛围活跃起来。例如,在练习环节中,教师可以利用短视频在课堂上开展互动式的课堂活动:教师可以将学习者以汉语语音水平作为依据进行分组,在课堂上播放语本节课相关的、其感兴趣的短视频资源,要求各小组进行对视频中涉及的音频内容进行模仿,并互相纠正小组成员发音上的错误。通过这种活动方式,教师可以保证每位学习者亲身参与进了课堂之中,并且,这样一种相对真实的交际环境也在满足学习者学习动机的同时增强了其开口说话的自信心,有助于达到理想的教学效果^[7]。

4.2.4 布置作业环节

为了帮助学习者巩固及内化课堂所获取知识,传统作业模式往往将重点放在复习所学内容、完成相应习题等方面。而为了进一步提高学习者完成作业的积极性和趣味性,教师可以借助短视频创新课后作业形式,例如制作展示语音知识的短视频等。此外,教师还可以组织学生组成协作小组,结合课程内容创作录制情景剧短视频,并在后续课堂上展示。此类作业不仅要求学生运用课堂学习的语音知识,也对其口语表达能力提出了实践要求,并且以创意有趣的形式激发学习者完成作业的积极性,可以达到良好的巩固练习效果。

5 总结

当下,在互联网迅速发展普及的浪潮之中,将短视频引入国际中文语音教学的各个环节是大势所趋。为适应教学方式的转变,汉语教学工作者应在丰富多样的网络短视频资源中汲取精华,探索适用于教学的资源,创新教学方式,拓展教学思路,推动国际中文教育事业的蓬勃发展^[4]。

参考文献:

- [1] 黄浩. 短视频行业发展现状与主要模式[J]. 中国国情国力,2020(10).
- [2] 冯思齐. 中文歌曲在对外汉语教学中的应用[J]. 宁波广播电视大学学报, 2021, 19 (01).
- [3] 赫佳瑶. 网络短视频在对外汉语网络教学中的应用研究[J]. 理论观察, 2021, (05).
- [4] 李文佳. 中文影视资源在对外汉语口语教学中的应用研究[J]. 西部学刊, 2022, (10).
- [5] 孟竹. 新媒体视角下自媒体教育探究——以短视频为媒介的对外汉语教学为例[J]. 传媒论坛,2020(08).
- [6] 李南羲. 视频类素材在对外汉语课堂教学中的应用研究[D]. 陕西师范大学,2019.
- [7] 王长潇, 孙玉珠. 技术与文化的张力:创意短视频跨文化共情传播[J]. 当代传播,2021(01).

Application of Short Videos in International Chinese Pronunciation Teaching

Ding Xiaohan¹

¹ China University of Petroleum, Qingdao, Shandong 266000, China

Abstract: With the advancement of technology, the methodologies of international Chinese language education have undergone significant transformations. Amid the current popularity of short videos, the integration of Chinese language instruction with this medium has become inevitable. To explore the application of short videos in international Chinese pronunciation teaching, this study will take short video culture as its starting point to analyze the characteristics of short videos, the importance of pronunciation teaching, and the significant value short videos offer for Chinese pronunciation teaching. Furthermore, this study will explore the feasibility of integrating short videos into various stages of pronunciation instruction, aiming to contribute beneficial insights to international Chinese pronunciation teaching.

Keywords: ICLE; Chinese short videos; Pronunciation teaching

博物馆展陈设计中互动性缺失成因与改进策略

祁俊¹ 贺敏靓²

(1.广州工商学院, 广东 广州 510800, 2.广西师范大学, 广西壮族自治区 桂林 541006)

摘要: 在“博物馆热”持续升温的背景下, 部分展览却陷入“高投入、低参与”的困境, 本质是展陈互动性缺失导致观众“缺席”。本文从互动性的核心内涵(行为、认知、情感三层互动)出发, 结合当前博物馆展览中内容晦涩、技术滥用、教育目标偏离及评价机制缺位等典型问题, 揭示其成因在于传统“以物为中心”思维惯性、技术应用失衡、教育功能弱化及反馈机制缺失。基于此, 提出构建“以观众为中心”的改进策略: 通过理念转型强化需求导向, 以分层设计、虚实融合等技术赋能提升互动深度, 融入探究式学习激发主动思考, 建立“展前-展中-展后”闭环机制延伸体验链条, 并依托多维互动创造多元营收。最终推动博物馆从“静态展示”转向“动态对话”, 实现公共文化服务效能与教育价值的双重提升, 使其真正成为公众终身学习的“第二课堂”与文化认同的精神家园。

关键词: 博物馆展陈设计; 沉浸式体验; 博物馆交互; 观众参与

基金项目: “瑶乡筑梦”现代农业生态园展厅设计(KYHX2025165)

DOI: doi.org/10.70693/rwsk.v1i8.1310

一、引言

2025年暑期“文博游”热度不断升温成为文旅市场的显著现象, 2024年全国博物馆接待游客人同比增长1亿余人次。^[1]博物馆作为文化传承核心载体的功能重要性持续增加, 折射出公众对高质量文化展陈体验的高需求、深层次体验, “到此一游”的浅层次观看将逐渐被生层次主动参与互动与深层次解读所替代, 观众追求在与展品、策展人、文化内容中实现对话, 建构文化认知和情感共鸣。从博物馆角度来看, 观众需求增长与国家推动博物馆转型战略中“增强展陈过程中的观览互动性、体验性”体验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推动文物活化利用”。逐步提升传统模式中“以物为中心”的展陈设计, 转向“以人中心”的服务逻辑。^[2]博物馆成为假期家庭出游、研学体验时, 展陈设计能否满足“观众看什么、如何看、怎样参与其中”的基本诉求, 体现博物馆教育功能。进一步对博物馆文创产业商业内容迭代, 完成博物馆文化服务功能, 提高博物馆经济服务, 拓展更多服务的可能性。

与“文博游”的整体热度相比, 部分博物馆展览在展览过程中体验的是“观众席的缺失”: 精心策划的文物展陈前只留下观众的匆匆一瞥, 多媒体屏幕看不到驻足者, 互动体验设备成为照片背景板。其“观众缺席”现象的本质是展陈设计中互动性缺失的体现, 无法满足的深层次、高质量文化体验需求。具体而言, 当前展陈互动性缺失主要体现在三个层面: 内容呈现仍沿袭以“文物+标签”的线性排列, 学术性内容无法满足观众群体理解与感知、可参与描述性弱; 其二, 技术设备应用流于形式, 虽配有多形式自助设备、耳麦、VR等技术手段, 但大多形式功能能依旧单一(如自助讲解耳麦力播放标签文字内容、VR设备展示文物三维模型), 缺乏对普通观众的理解能力考虑, 进行深度内容解读; 其三, 教育功能定位偏颇, 博物馆教育层面中将观众目的简单划分成“信息传达”, 未通过有效问题引导、互动行为设计激发观众主动思考, 最终使展览沦为仅供观赏的“文物展览的橱窗”。

就观众而言, 参观体验依旧止步于“看热闹”“瞥一眼”层面, 难以形成对文物内在价值与历史背景的深层次阅读理解; 对博物馆而言, 大量资源投注的展览, 却因无法吸引观众深度参与而逐步降低博物馆的公共文化服务效能, 长此以往将会削弱公众对博物馆的持续关注。在“文博热”快速增长的背景下, 若因不能即时优化展陈设计的互动体验, 博物馆将面临“热流量”与冷参与”问题并发的矛盾。即参观人数虽呈现上升趋势但实际文化传播效果依旧未能突破更大范围, 阻碍博物馆从“文化展览的橱窗”向“文化体验教育课堂”的本质转型。

二、互动性的核心内涵: 从“单向传递”到“双向对话”

当代博物馆转型发展的关键特征在于“互动性”, 突破传统展陈设中“以物为中心”的单方面叙述展示形式。互动并非简单等同于“触摸屏式资料呈现”“点击播放投影”等表层的多媒体播放, 是指通过感官体验、欣慰参与、情感共鸣等多维度方式, 与展品、展览空间以及其他参与者建立动态形式联系的深层次交流过程。具体而言, 博物

作者简介: 祁俊(1997—), 男, 硕士, 助教, 研究方向文创设计;

贺敏靓(1998—), 女, 硕士, 研究方向产品设计。

通讯作者: 祁俊

馆展示的互动性体现在相互关联、层层递进的层次。

2.1 物理构建行为互动体验

物理构建可操作的、直接的活动，观众与展品在行为互动直接建立联系。这类互动体验注重强调“直接动手参与”和“亲身参与体验”，其中包括操作简单亦或者复杂的各类装置（如博物馆文物拼接复原、建筑榫卯结构拼接）、参与解谜互动游戏或者任务挑战（如文物移动拼接推理、历史人物对应连线图）、以及 VR 模拟实践活动（如绍兴博物馆 3D 模拟考古挖掘、非遗体验馆的传统工艺体验场所）。通过在实践活动中亲身参与，行为上逐步激发观众自主探索的兴趣与好奇心，设置较为容易完成的实践活动增强成功后的满足感，使得静置的展品、工艺在观众的操作中逐渐“活态化”，最终形成展陈物与观众之间的第一层连接。

2.2 思维认知促进深度互动理解

聚焦观众思维层面的刺激与引导，观众在精心设计的具有强烈逻辑展陈中，主动思考并且进行展陈的知识内容构建。该类互动主要表现为：设置启发性思考问题（如“传国玉玺为何一角用金子包裹？”“迅哥儿上学的路程有多远？”）、以及设置情境展示画面（如借助多媒体呈现古生物海洋环境、投影呈现原始人天气环境）。思维认知互动除了简单的信息接收，更需要注重引导观众参观时发现展陈背后的逻辑线索、展品文化联系与历史背景，在观众思维主动建立知识之间的关联，从“被动接收”到“主动探求”的思维转变。

2.3 情感价值共鸣创造文化认同

情感层面的互动是互动形式中较高的互动层次，主要通过叙事设计与展陈环境共同营造情感氛围，在观众与展品之间构建情感链接与情感价值共鸣。借助故事化叙述策略展示内容（如某件文物经过几个人的守护最后得以保存、语文课本中的“金色的鱼钩”课文）、三维沉浸式空间营造（通过光影音效技术呈现历史场景，例如鲁迅故里中的《社戏》场景复原；通过空间布局引导观众理解和情绪变化的浙东运河博物馆“浙东运河大事记大型雕塑”）以及多感官刺激（结合视觉、嗅觉、触觉等非视觉元素增强体验真实性的天津张园《津门往事》实景演出）实现。情感互动中观众不仅能够理解文物的“物”层面内容，同时也能感受到其中承载的人文精神与文化温情，进而在心理层面产生情感共鸣，形成对非物质文化遗产价值的深刻认同，最终完成从认识到情感认同的完整互动闭环。

三个层级的互动呈现相互支撑、层层深入，共同构成博物馆在展陈互动性的完整内涵。博物馆教育理念革新与技术应用相互结合，创新展览形式，将博物馆从“以物为中心”向“以人中心”转型，观众从“被动旁观者”进展成“主动探索者”。通过构建多维互动体系，促使博物馆真正实现从单向传递文物知识的“文化展览的橱窗”向双向对话的文化交流服务场所转变。

三、互动性缺失的典型表现与负面影响

3.1 互动层面的断裂典型表现

较多展览延续传统展览模式即通过时间脉络或其他线性脉络核心，简化展陈“展品文本基础信息”的线性排列，搭建出“以物为中心”的单向展陈模式。^[3]在文本的说明上采用简单或者复杂的专业化文本描述展品内容，部分博物馆在实物展览中用简单文本，借助自助讲解器等设备讲解复杂的文本内容。文本说明中密集使用“形制”“生活方式”“工艺特征”等专业术语，常见在青铜器展示中看到“x 朝 xx 纹，xx 形”“x 代 xx 釉面，xxx 纹”等描述，超出青少年与文化背景差异较大的观众认知。信息密度和表达方式的过于密集和专业化，显示出博物馆的内容传达缺少认知适配设计，没有根据不同观众群体对信息密度与表达方式调整，例如对儿童提供图文结合的内容简化版本的解读，对未具备相关知识储备的观众提供生活化类比说明（如“该器具相当于汉代普通百姓喝酒的花生碟”）。展品的价值解释上未能够呈现该文物“为何如此重要”，较多的标签设计停留在文物“身份证”描述（年代信息、材质、出土信息）的表层信息，以及未阐述其在展览中的能够反应对展览主题的关联以及单个展品所反映的社会生活、技术水平、文化成因等深层次内容。简单的标签、复杂的文本内容使得观众只能被动的接受信息，难以与展品建立与自身认知体系有效的关联，继而无法理解展品所代表的重要内容，展品最终沦为“新鲜的、看不懂”的展品”。

3.2 形式层面的粗糙技术与“伪互动”

博物馆的数字技术与互动装置的应用比例逐步增高，科学的互动体验能有效深化观众对展品内容的理解并强化教育意义。但设计逻辑偏离内容核心，或仅停留于表面形式，则可能产生适得其反的效果。常见的博物馆互动装置可划分为三大类基础互动装置：多媒体互动、触控屏交互、静态模型展示互动。多媒体屏幕互动仅能够播放固定的影音内容，且常因技术适配度不足导致画质模糊、音效失真，单段视频时长局限在 5-10 秒，亦或是观众无选择权、无暂停和回放；触控屏类仅能够展示文物的 3D 模型效果，如缩放细节、无法拆分、简单的展品部分拼接互动；静态模型因材质限制无法触摸操作，如铠甲等复原模型仅做展示效果、建筑模型只在玻璃展柜中观看。技术的应用较为粗糙，如 VR/AR 的体验内容与展品无实质关联，也无相关解释（如原始人房屋投影内容与展厅内容、主题内容毫不相关），互动体验的影像内容只是简单的文物文本展示。互动设备会因设备故障率高、操作复杂、网络不稳定等问题降低观众参与意愿，互动设备逐渐沦为摆件。

3.3 参与层面的行为被动与浅层化

在缺乏互动设计的展览中,观众的观看行为表现出停留时间短、观看内容浅层化。由于缺少对展品内容的有效参与机制,以“快速、看一眼”为主要现象,在展柜前只是简单的观看展品外观,简单阅读文本信息。在缺少讲解员的情况下,观众的提问、讨论、自主探索意向会因无法得到回答减少深度参与行为。这种单向的信息接受模式对不同年龄层次的观众产生同等程度的负面影像:青少年因缺乏引导式问题或互动任务的启发,难以引起好奇心驱动下的自主学习,难以将碎片化信息内容与完整的展览主题、展厅设计核心内涵相互结合。观众仅能够接触的是展品的表象信息,既无法深入把握展品的工艺细节、历史使用背景与文化价值,更难理解片段对展览主题的系统性内容认知。展陈设计排除了思考、互动行为以及对话交流等深度互动环节时,观众实际是在“未知其全貌”的未能经历内容建构的状态中完成了参观。这种“观后即走”得观展方式,使得物馆作为“非正式教育机构”得和兴功能——提供公共文化服务,通过展陈引导观众学习了解文化内容无法真正有效实现,最终博物馆得教育功能和文化传播效果双重落空。

四、互动性缺失的成因分析

4.1 以“物”为中心的惯性设计思维

博物馆在展陈设计中受到“典藏-展示-观摩”模式影响深远,设计逻辑聚焦“如何呈现文物本体”“承载大量游客同时观摩”,而非“如何让观众理解文物价值”。为保护展品,展览优先考虑完整展示,将展品放置在橱窗中进行保护,牺牲了观众近距离观察和触碰的可能性。展品以时间脉络或者类框架展开展陈,叙事方式较为单一,缺乏对观众兴趣点的挖掘。博物馆常过度重视“学术价值”却忽视不同年龄段观众的知识储备差异,面对博物馆密集的说明文字超出普通观众的认负荷,观众难以有效理解展品内容与价值并形成评价。

4.2 形式大于内容的“伪互动”

数字技术为互动提供了多种新可能,但是部分博物馆存在技术滥用与脱离实际需求的问题。大量的触控屏、投影、VR设备仅具备基础功能,如播放画质稍显模糊的固定视频、展示3D模型,未设计有效互动逻辑,观众无法通过操作改变内容。部分装置脱离实际需求,界面设计忽视审美、操作复杂,甚至因频繁使用导致故障频发。为降低维护成本,博物馆要求观众下载专用小程序或APP操作互动装置,增加了使用门槛,削弱了互动体验的流畅性与便捷性。

4.3 教育目的偏离“启发性思考”

博物馆教育因展陈形式设计思路,将教育简化为知识信息的灌输,而非启发性思考。^[4]展品的文本描述停留在基础信息的描述,复杂文本的描述中缺乏对展品深度阅读的引导。观众观看展品时常常借助自主讲解器阅读复杂文本,而在复杂文本的内容主要缺乏展品的信息指向展览意义导向,缺失互动设计链路。文本描述中始终没有呈现对问题链条设计和任务驱动设计,难以有效引起观众的主动探索与讨论。

4.4 评价机制的缺位

展陈效果评价过度聚焦文物等级、展览规模、技术投入等硬性指标,却忽视观众实际体验,如停留时间、互动装置使用率、反馈意见。博物馆缺乏对观众行为的系统观察与数据收集,难以针对性优化互动设计或调整说明文字。此外,跨学科协作不足,团队以文物专家为主,缺少教育学、心理学等专业人员参与,导致设计视角单一,难以从观众认知规律出发优化体验,最终形成“一次投入、长期不变”的僵化模式。

五、改进策略:构建“以观众为中心”的互动性展陈体系

针对当前博物馆展陈互动性缺失的成因,本文提出“理念—技术—教育—机制”四维协同的改进策略,旨在通过全流程优化推动博物馆从“静态展示”向“动态对话”转型,实现博物馆展览吸引力与教育效能的双重提升。

5.1 从“展示文物”到“连接人”的理念转型

通过前置的用户研究、重构叙事逻辑、建立多元评价体系,让展品成为连接观众与文化的对话媒介。展览策划初期通过问卷调研和用户访谈,明确观众的核心需求与兴趣点。对观众重点了解的文物内容进行策划,借助问卷星等工具对不同年龄段、不同文化背景的观众进行访谈,聚焦例如亲子家庭聚焦关注的展品背后的趣味故事、历史爱好者侧重的社会变迁逻辑,为后续设计提供需求依据资料。

策展打破传统编年史或者类别学的单一框架形式,采用“问题导向”或“故事线”设计,展品在具体生活场景或历史进程中展览。例如,以“一件工艺品的生命过程:从制造厂到使用场景”为主线,串联相关原料、工艺步骤、流通过程、使用场景,其中拓展原料的标本展示,工艺步骤的模型展示、交互场景设计、数字技术应用,流通过程中地图演进,使用场景的模型搭建。在具体场景中的叙事方式能够自然激发观众置身其中的体验以及观众好奇心和强烈的探索欲。

展览之后发放相关问卷,调研观众参与过程中对互动装置使用、学习效果的知识接受程度、情感反馈的情绪起伏波动、推荐的具体理由纳入展览评估体系,代替单一的“文物等级”“展馆规模”等硬性指标,引导设计团队从

展览落地即结束到持续优化, 最终实现“静态展示”向“动态对话”的教育功能与深层次互动。

5.2 从“互动工具”到“深度互动载体”的技术服务

数字技术与互动装置真正服务内容传递与观众需求, 则需要分层设计、实时反馈与叙事融合, 构建“实用性、趣味性、有深度价值”的互动体验。

针对差异化观众群体设计分层互动形式: 面向儿童设置群体开发可触摸式文物复原模型与游戏化任务(如安全材质部件拼装、故事角色匹配), 激发直观探索兴趣; 为青少年及普通观众构建 AR/VR 场景复原类互动(如汉代墓室画砖生活场景模拟、文物历史事件解谜游戏), 强化情境代入感; 配置深度资料查询终端(支持高清文物细节图放大下载、学术文献链接扩展), 满足专业研究者的学术需求。

可触摸式展品复原模型、游戏化文物复原任务, 如搭建安全材料的展品部件模型、匹配相关的故事以及人物形象等。针对主要的青少年和普通观众提供 AR/VR 等场景复原式较为复杂的互动式场景, 例如以汉代墓室画砖为主题的生活场景、通过线索拼凑文物背后相关历史事件的解谜类游戏。提供可以深度查询资料的设备终端, 拓展资料的链接内容、可放大的高清文物细节图传输下载、相关学术文献链接等形式满足专业观众与研究学者的学术研究需求。

融合数字技术实现虚实交互与实时反馈: 结合 AR/VR、数字孪生等技术创建虚实融合场景, 还原历史场景或文物修复过程。结合传感器与 AI 技术建立动态交互机制, 例如在一些历史性革命会议场景借助投影观看会议表决场景, 历史人物借助投影出现在观众邻座, 通过手势识别同步观众动作与历史人物行为, 举手表决联动音效反馈, 最终发出“表决通过”“表决不通过”的人物声音, 将单一图文展示升级为置身其中的沉浸式参与体验, 显著提升教育效能与情感共鸣。

5.3 从“信息传递”到“探究式学习”的教育指导

以教育学原理为指导, 通过问题引导、任务驱动与多感官刺激, 推动观众从被动接收转向主动建构知识体系。设计递进式问题链嵌入展品说明(如“这件器物的纹饰有何特殊含义?”“它与同期其他文物存在哪些关联?”), 引导观众通过观察对比自主发现答案; 整合听觉(集市叫卖声)、触觉(可触摸文物复制品)、嗅觉(祭祀香氛模拟)等多维感官体验, 复原历史场景细节, 强化情感联结。鼓励观众基于综合感知发起讨论(如现场交流、线上平台延伸), 将即时体验转化为持续性学习行为, 最终实现认知深度与互动趣味性的双重提升。

5.4 从“单向输出”到“持续迭代”的机制优化

建立起从“设计-实施-反馈-优化”的闭环管理机制, 依靠动态数据检测与跨学科协作, 实现展览内容的灵活调整与持续优化, 确保展陈设计始终贴合观众需求。建立多维数据采集与分析机制: 通过红外传感设备精准捕捉观众停留区域与时长分布, 结合互动装置后台记录的操作行为数据(如点击热点、任务完成路径), 并整合问卷调研的定性反馈, 系统梳理观众行为模式与需求特征, 形成展览前期的精准用户画像与需求分析报告。

实施分阶段优化策略: 短期调整聚焦快速响应(如替换过时互动游戏任务、更新展品说明文字的通俗表达), 确保展览内容的即时鲜活性; 长期优化则着眼于深度创新(如重构互动区域主题内容、开发文物 DIY 工坊、增设角色扮演拍照等社交型挑战), 通过定期主题更新维持展览的吸引力与参与热度, 分阶梯完成博物馆观众体验观感感受, 进一步丰富观众观展体验。^[5]

5.5 构建“展前-展中-展后”闭环体验

将互动性贯穿展览全生命周期, 通过展前预热、展中深化与展后延伸的三阶段策略, 系统强化观众参与深度与粘性。

展览前: 在博物馆官网、社交媒体推送与展览相关的互动问答、宣传展品相关背景故事, 激发观众参观兴趣; 同步推广互动主题文创(如文物造型盲盒、解谜手册), 既预热展览热度, 又培育文创消费市场。

展览中: 打造多维互动体验, 对展品说明文字进行简明扼要与引导式思考, 同时辅助二维码等相关形式解读; 结合数字技术和多感官体验打造深度参与; 设置参与式展览项目, 社交媒体打卡发布与博物馆相关内容鼓励观众通过社交媒体打卡分享观展内容, 联动线上活动兑换文创礼品, 扩大展览传播效能。

展览后: 搭建社交媒体、官网留言等观众交流平台, 引导观众上传参展照片、分享观展心得, 持续激发讨论热度; 开发展览内容相关文创产品, 拓展展览中多维度互动设计内容的周边产品, 如可触摸的文物复制品、历史场景参与影像照片、AR 浏览内容的文物介绍、语音讲解的相关明信片等。将展览中的多维互动延伸至线下日常, 通过创意性强、互动性高的文创产品持续为博物馆创造营收项目, 形成“展览结束、互动不止”的长效运营机制。

六、结论

中国幅员辽阔、历史悠久, 各地域在漫长发展中孕育了多元民族风貌、独特文字体系、创新科技成就与传统工艺精华, 这些璀璨文化要素共同构筑了中华文明的丰富内涵, 成为中华民族文化基因的核心组成。新时代“科技兴国”“教育强国”战略背景下, 博物馆作为文化传承与教育传播的核心载体, 亟需强化其社会教育功能。然而, 当前博物馆展陈互动性的缺失, 本质上是传统“以物为中心”思维与公众文化需求错位的必然结果。要破解“观众缺席”困境, 博物馆必须回归本质使命——通过文物连接人、借助互动激发思考。未来展陈设计应推动从“静态展示”到“动态对话”的转型, 以观众需求为出发点, 以技术理性应用为支撑, 以教育深度融入为核心, 构建“可触摸、

可思考、可共情"的全方位体验。通过"展前-展中-展后"闭环策略创造多元营收:展前以互动文创(如文物盲盒、解谜手册)培育市场;展中借数字互动与社交打卡联动兑换礼品刺激消费;展后开发文物复制品、AR明信片等IP衍生品延伸价值,形成"线上销售+线下体验"的持续营收链,最终推动博物馆转型为公众终身学习的"第二课堂"与文化认同的精神家园。

参考文献:

- [1] 国家文物局.暑期“文博游”撬动文旅消费新增量[EB/OL].(2025-08-12)[2025-08-15].http://www.ncha.gov.cn/art/2025/8/12/art_2664_197922.html
- [2] 刘巍.从以“物”为中心的诠释到以“人”为中心的解说——评《博物馆说明牌:一种解说方法》(第二版)[J].自然科学博物馆研究,2022,7(04):80-88.
- [3] 颜雪莲.博物馆陈列展览的困境与破局[J].文物鉴定与鉴赏,2025,(11):68-71.
- [4] 洪瑞祥,杨正,严冰熔.西方博物馆教育:旨趣变迁、发展动向与本土超越[J].比较教育学报,2024,(06):88-97.
- [5] 辜应康,唐秀丽.博物馆馆观众体验评价指标体系与提升策略:以上海市博物馆为例[J].上海第二工业大学学报,2023,40(04):371-379.

Analysis on the Causes of Interactive Deficiency in Museum Exhibition Design and Corresponding Improvement Strategies

Qijun¹, He Minliang²

¹ *Guangzhou College of Technology and Business, Guangzhou, Guangdong 510800, China*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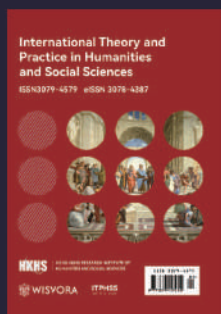
² *Guangxi Normal University, Guilin, Guangxi Zhuang Autonomous Region 541006, China*

Abstract: Amid the ongoing "museum boom," some exhibitions are facing the dilemma of "high investment but low participation," which essentially stems from the lack of interactive design leading to audience "absence." This paper starts with the core connotation of interactivity (encompassing behavioral, cognitive, and emotional dimensions), and analyzes typical issues in current museum exhibitions—such as abstruse content, technology misuse, deviated educational objectives, and absent evaluation mechanisms—to reveal their root causes: the inertia of the traditional "object-centered" mindset, imbalanced technology application, weakened educational functionality, and lack of feedback mechanisms. Based on these insights, it proposes improvement strategies centered on the "audience-centered" approach: strengthening demand orientation through conceptual transformation, enhancing interactive depth via technological empowerment (e.g., layered design and virtual-physical integration), stimulating active thinking by integrating inquiry-based learning, establishing a closed-loop mechanism ("pre-exhibition, during-exhibition, post-exhibition") to extend the experience chain, and creating diversified revenue streams through multidimensional interactions. Ultimately, it aims to drive museums from "static displays" to "dynamic dialogues," achieving dual enhancements in public cultural service efficiency and educational value, and transforming them into a "second classroom" for lifelong learning and a spiritual home for cultural identity.

Keywords: Museum exhibition design; Immersive experience; Museum interaction; Audience participation

WISVORA 出版社：专注于学术出版管理，WISVORA 出版社提供期刊编辑、论文出版和国际索引、期刊创办、期刊托管等服务，增强学术研究的全球传播和影响力。

www.wisvora.com



人文与社会科学学刊

《人文与社会科学学刊》是由香港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院主办的学术期刊，致力于为人文与社会科学领域的研究者提供一个高质量的学术交流平台。本刊重点关注学术研究中的理论创新与实践应用，旨在探讨人文与社会科学领域的核心议题，促进知识的广泛传播与共享。作为一份面向全球中文学术界的专业期刊，本刊倡导跨学科、跨文化视角的学术探讨，为学术界和实践领域之间搭建桥梁，推动社会科学知识的进步与应用。

印刷出版 ISSN 3079-4579

电子出版 ISSN 3078-4387

ISSN 3079-4552



学术赠阅

权责声明

期刊所刊载的评论、意见、观点等均出自文章作者个人立场，不代表本出版社的观点或看法。对于文章任何部分及文内引用材料给任何个人、机构、及其财产所带来的任何损失及伤害，本出版社均不承担任何责任。我们郑重声明，本出版社的出版业务，不构成对任何产品商业性能的保证，也不表示本社已承认本社出版物中所述内容适用于某特定用途。如有疑问，请寻找专业人士协助。